

斯大林著

列寧主義問題



！ 來 起 合 聯 ？ 者 產 無 界 世 全

119.142
554-2=7
2

斯大林著

列寧主義問題



3 0232 0235 5



外國文書出版局印行

一九四九年莫斯科

校 譯 眞 唯



И. Сталин.

本版列寧主義問題，係按蘇聯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三九年俄文版（第十一版）譯出。爲求譯文儘量精確，我們在準備排印這個譯本時，又按俄文原本把舊版中文譯本仔細校訂過一次。本書引證下面註明的頁碼，概指各該著作俄文版本頁碼而言。

目次

原版出版局聲明	一五
論列寧主義基礎(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	一九一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二二
(二) 方法	二八
(三) 理論	三五
(四) 無產階級專政	五二
(五) 農民問題	六四
(六) 民族問題	六七
(七) 戰略與策略	八六
(八) 黨	一〇二
(九) 工作作風	一一六
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到十月革命之路一書底序言)	一一九
(一) 十月革命底內外環境	一九
(二) 論十月革命底兩個特點；或十月革命與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	二二
(三)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什維克策略底幾個特點	三九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	五二

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	一五八—二二九
(一) 列寧主義底定義	一五八
(二) 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	一六一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一六三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一六六
(五) 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黨和工人階級	一七六
(六)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	二〇二
(七) 為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奮鬥	二一七
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答楊(斯基同志))	二三〇—二四二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答斯、頗克羅夫斯基同志)	二四三—二五四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為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而作)	二五五—二六三
在糧食戰線上(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紅色教授學校、共產主義學院以及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的談話摘錄)	二六四—二七五
列寧與聯合中農問題(答c同志)	二七六—二八七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演說)	二八八—二九九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摘錄)	三〇〇—三六二
(一) 階級的變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三〇〇
(二) 在共產國際各問題方面的意見分歧	三〇七
(三) 在國內政策各問題方面的意見分歧	三一三

(一) 階級鬥爭問題——三一四。(二) 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三一九。(三) 農民問題——三二三。	
(四) 新經濟政策和市場關係問題——三二六。(五) 工業發展底速度和城鄉結合底新形式問題——三三〇。(六) 理論家的布哈林——三三九。(七) 是五年計劃呢，還是兩年計劃呢——三五〇。	
(八) 播種面積問題——三五三。(九) 糧食採辦工作問題——三五五。	三六〇
(四) 反對右傾的鬥爭問題	三六三—三七六
大轉變的一年(爲十月革命十二週年紀念而作)	三六四
(一) 在勞動生產率方面	三六五
(二) 在工業建設方面	三六八
(三) 在農業建設方面	三七六
結束語	三七六
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三七七—四〇〇
(一) 「平銜」論	三七九
(二) 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	三八一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三八三
(四) 城市與鄉村	三八八
(五) 論集體農莊底本質問題	三九二
(六) 階級的變動和黨政策中的轉變	三九六
(七) 結論	三九九

論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問題.....	四〇一—四〇五
勝利衝昏頭腦(論集體農莊運動問題).....	四〇六—四一二
給集體農莊工作同志們的答覆.....	四一三—四三五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糧社主義工業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四三六—四四六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四四七—四六九
(一)勞動力.....	四四八
(二)工人工資.....	四五〇
(三)勞動組織.....	四五四
(四)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智識界問題.....	四五八
(五)舊生產技術智識界中轉變的徵象.....	四六一
(六)論經濟核算制.....	四六四
(七)用新的方式來工作,用新的方式來領導.....	四六六
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四七〇—四八四
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報告).....	四八五—五三〇
(一)五年計劃底國際意義.....	四八五
(二)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和實現這一任務的道路.....	四九五

(三)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五〇〇
(四)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五〇九
(五)五年計劃在改善工農物質狀況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五一五
(六)五年計劃在城鄉間商品流轉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五二〇
(七)五年計劃在與敵對階級餘孽鬥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五二四
(八)一般結論·····	五二八
論農村中的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	五三一—五四四
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五四五—五六一
(一)集體農莊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五四五
(二)我們最近的任務，是要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	五五三
(三)幾點個別的意见·····	五五六
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五六二—六四五
(一)世界資本主義底經濟危機和蘇聯底外部狀況·····	五六二
(二)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危機底變動——五六四。(三)資本主義各國政治狀況的尖銳化——五七〇。	
(三)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五七七。	
(二)蘇聯國民經濟繼續高漲和內部狀況·····	五八二
(一)工業高漲——五八五。(二)農業高漲——五九一。(三)勞動者物質狀況和文化水準的提高——	
六〇六。(四)商業高漲與運輸業——六一二。	

(三) 籍	六一七
(一) 思想上政治上的領導問題——六一九。(二) 組織上的領導問題——六三二。	
幾句代替結論的話	六四五
在克列姆里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	六四六—六五二
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六五三—六六九
(一)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	六五三
(二)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根源	六五八
(三) 新的人材和新的技術定額	六六三
(四) 最近的任務	六六六
(五) 兩句話	六六八
論蘇聯憲法草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非常第八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六七〇—七〇二
(一) 憲法委員會之成立及其任務	六七〇
(二)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在蘇聯生活中發生的變更	六七一
(三) 憲法草案底基本特點	六七九
(四) 安產階級對憲法草案的批評	六八四
(五) 對於憲法草案的修正和補充	六九一
(六) 蘇聯新憲法底意義	七〇一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九三八年九月作)	七〇三—七三六

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七三七—七九八

（一）蘇聯底國際形勢……………七三七

（一）各資本主義國家裏新的經濟危機。爭奪銷售場，原料來源以及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尖銳化——七三八。（二）國際政治形勢的尖銳化，戰後和約體系的崩毀，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開始——七四三。（三）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七四九。

（二）蘇聯底內部狀況……………七五一

（一）工業與農業更進一步的高漲——七五二。（二）人民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更進一步的提高——七六六。（三）蘇維埃制度更進一步的鞏固——七七二。

（三）聯共（布）更進一步的鞏固……………七七五

（一）改善黨成份的辦法。把組織單位分小。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工作——七七六。（二）挑選幹部，提拔幹部，佈置幹部——七七九。（三）黨的宣傳工作。用馬列主義教育黨員和黨的幹部——七八二。（四）幾個理論問題——七八五。

原版出版局聲明

本版（第十一版）列寧主義問題與第十版不同處，就是在本版內加進了下列具有比較迫切意義的新著作：（一）在克列姆里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二）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三）論蘇聯憲法草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非常第八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四）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斯大林同志爲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所寫的著作，一九三八年九月）；（五）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爲保存本書原有篇幅起見，在本版列寧主義問題內沒有編入先前載於第十版的如下著作：與第一屆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與英國作家威爾士的談話。

這些更改是經作者同意後實行的。

列寧主義問題

論列寧主義基礎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

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

獻給

紀念列寧時應徵入黨的同志們

斯大林

列寧主義底基礎，是個很大的題目。要詳盡說明這個題目，就得著作一整本書，甚至要著作好幾本書。因此，我的講演，自然不能是對於列寧主義的詳盡說明，而至多也只能是對於列寧主義基礎的一個簡要敘述。雖然如此，但我認為作這樣一個敘述，藉以指出幾個為順利研究列寧主義所必要的基本出發點，是有益處的。

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這還不是敘述列寧的世界觀底基礎。列寧的世界觀與列寧主義底基礎，按範圍來說，並不是一回事。列寧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世界觀基礎當然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但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敘述列寧主義應當從敘述馬克思主義底基礎來開始。

敘述列寧主義，就是敘述列寧在他的著作中所加進於馬克思主義總寶庫裏，因而自然是與列寧名字分不開的那些特別的和新貢獻。我在自己的講演中，只是要在這個意義上來敘述列寧主義基礎。

那末，列寧主義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列寧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俄國環境的特殊條件中。這個定義是含有一部分真理的，可是它絕對不能概括全部真理。列寧確實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了俄國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十分巧妙。可是，如果列寧主義僅僅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俄國特殊環境中，那末列寧主義就會純粹是民族的，而且僅僅是民族的現象了；就會純粹是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根源於整個國際發展過程的國際現象，而並不單只是俄國的現象。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認為這個定義是帶有片面性弊病的。

另外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把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底革命原素復活起來，而與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據說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已變成溫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撇開這種將馬克思學說割裂成革命部分與溫和部分的愚癡庸俗的意見不說，那就須要承認：甚至這個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定義，也含有一部分真理。這一部分真理，就在於列寧確實復活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埋沒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內容。但這只是一部分真理。關於列寧主義的全部真理，是在於列寧主義不僅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一步，在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新條件下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革命（我們是指無產階級革命而言）以前的時期，在帝國主義還沒有充分發展的時期，在訓練無產者去作革命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不可避免的直接實踐問題的時期活動的。而馬克思與恩格斯底門生列寧，則是在帝國主義充分發展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展着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已在一個國家裏獲得了勝利，打破了資產階級民主制，開闢了無產階級民主制紀元，即蘇維埃紀元的時期活動的。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的發展。

人們通常都說列寧主義具有非常戰鬥，非常革命的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列寧主義之所以具有這個特性，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它不能不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底特色；第二，列寧主義是在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搏戰過程中長成和鞏固起來的，而與這個機會主義作鬥爭，過去和現在都是爲對資本主義進行順利鬥爭所必要的預備條件。不要忘记：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有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所以與這個機會主義作無情鬥爭，也就不能不是列寧主義底主要任務之一。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即是在資本主義底矛盾已達到極點，無產階級革命已成為直接實踐問題，準備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的舊時期已達到盡頭，而轉變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新時期的條件下長大形成的。

列寧稱帝國主義爲「垂死的資本主義」。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底矛盾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着就有革命開始了。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是下列三個矛盾。

第一個矛盾，就是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工業國裏壟斷性的托拉斯和新迪加，銀行和財政寡頭擁有莫大的勢力。與這種莫大勢力鬥爭時，工人階級通常採用的手段，如職工會與合作社，國會黨與國會鬥爭等，已經完全不夠了。或者是投降於資本，依舊過着每况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是運用新式武器，——這就是帝國主義在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面前提出的問題。帝國主義把工人階級引到革命。

第二個矛盾，就是各財政集團間以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爲爭奪原料產地，爲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就是爲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瘋狂鬥爭，就是爲重分那已經瓜分完結的世界而進行鬥爭，就是那些尋求「日光下的地盤」的新起財政集團和列強，爲反對那些不肯放鬆既得贓物的老舊財政集團和列強而進行特別猛烈的鬥爭。各資本家集團間這瘋狂鬥爭底特點，就在於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原素，即帝國主義戰爭，爲奪取別國領土而進行的戰爭。

而這個情況底特點，又在於它使帝國主義者彼此削弱，使資本主義陣地整個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時機接近，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定要實現的事情。

第三個矛盾，就是爲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十多萬萬殖民地和依賴國人民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對極廣闊殖民地和依賴國內十多萬萬居民施行最橫蠻的剝削和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就是這種剝削和壓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時，不得不不在那裏敷設鐵路，設立工廠，建立工商業中心。無產者階級的出現，本地智識界的產生，民族意識的覺醒，解放運動的加強，就是這個「政策」不可避免的結果。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內革命運動之加強，就是顯然證明這一點。這個情況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爲這個情況根本破壞資本主義底陣地，把殖民地和依賴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力量變爲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力量。

帝國主義底主要矛盾，把舊的「繁榮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大體上就是如此。

十年前所爆發的帝國主義大戰底意義，也就是它把所有這些矛盾集合爲一團，並投入天秤底一端，因而加速和便利了無產階級底革命戰鬥。

換句話說：帝國主義不僅使革命成了不可避免的實踐問題，而且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良好條件。

這就是產生了列寧主義的國際環境。

有人會向我們說：好吧，但這種情形對於當時並不是，而且也不能是模範式的帝國主義國家的

俄國，究竟有什麼關係呢？這種情形對於首先是在俄國工作，而且首先是爲俄國而工作的列寧，究竟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恰好是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策源地，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底故鄉呢？

因爲俄國當時是帝國主義所有這一切矛盾底集合點。

因爲俄國當時孕妊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所以祇有俄國能用革命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國是各種壓迫——資本主義壓迫、殖民地壓迫及軍事壓迫——表現得最無人道和最野蠻的策源地。誰不知道，俄國資本底莫大勢力是與沙皇制度底專橫暴虐溶合起來了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民族主義底侵略性，是與沙皇制度對非俄羅斯民族所施行的屠殺政策溶合起來了呢？誰不知道，對土耳其、波斯及中國整批區域的剝削，是與沙皇制度對這些區域的佔領溶合起來了，是與侵佔領土的戰爭溶合起來了呢？列寧說得對：沙皇制度是「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沙皇制度把帝國主義各種最壞因素集中起來，並使之加倍厲害了。

其次，沙皇俄國是西方帝國主義最大的後備力量，這不僅是說它任憑外國資本自由進口活動，讓外國資本操縱俄國國民經濟中如燃料和冶金業這樣有決定作用的部門；而且是說它能拿出千百萬兵士去供西方帝國主義者使用。試回想一千二百萬俄國軍隊，爲保證英法資本家極高利潤，而在帝國主義戰線上犧牲流血的事實吧。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僅是帝國主義在東歐的看門狗，而且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代理人，它從巴黎

和倫敦、柏林和布達佩斯得到借款，而從人民身上榨取幾萬萬盧布來繳付利息。

最後，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國主義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及中國等等勾當中最忠實的同盟者。誰不知道帝國主義大戰是沙皇政府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行的呢？誰不知道俄國是這次戰爭底重要角色呢？

正因為如此，所以沙皇制度底利益就與西方帝國主義底利益互相錯綜起來，終於結合成了一個帝國主義利益的紐結。西方帝國主義是否能不預先試用自己一切力量來和俄國革命拚鬥爭以圖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便會甘心喪失像舊時沙皇資產階級俄國這樣一個在東方的強大支柱，這樣一個富有人力物力的來源呢？當然不能！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誰想打擊沙皇制度，誰也就不免要動手打擊帝國主義；誰起義反對沙皇制度，誰也就必須起義反對帝國主義，因為誰要是真不想僅打破沙皇制度，並且還要完全剷除沙皇制度，那末他實行推翻沙皇制度時，也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於是，反沙皇制度的革命就與反帝國主義革命，便與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起來，且一定要轉變為反帝國主義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

而且，當時在俄國又興起了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個革命是以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為首，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俄國革命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這樣的革命決不能半途而廢，它一勝利就應向前進展，樹起反帝國主義的起義旗幟，——這難道還須證明麼？

正因為如此，所以俄國當時定要成為帝國主義各種矛盾底集合點，這不僅是說因為這些矛盾在

俄國帶有特別醜惡和特別難堪的性質，所以正是在俄國最容易暴露出來，也不僅是因為俄國當時是西方帝國主義底最重要支柱，它將西方財政資本與東方殖民地聯接起來；而且是因為當時僅僅在俄國才有能夠用革命方法來解決帝國主義矛盾的真實力量。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俄國革命不能不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它不能不在一開始發展時就具有國際的性質，因而也就不能不根本震動世界帝國主義底基礎。

在這樣的實際情況下，俄國共產黨人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於俄國革命底狹隘民族範圍內呢？當然不能！恰巧相反，當時整個環境，無論是國內的環境（深刻的革命危機）或國外的環境（戰爭），都推動他們把自己的工作超出這個範圍，把鬥爭擴展到國際舞臺上去，揭破帝國主義底癰疽，證明資本主義必遭破產，打碎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最後，推翻本國資本主義，而替無產階級鍛鍊出新的鬥爭武器，即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以促進世界各國無產者為推翻資本主義而奮鬥的事業。俄國共產黨人不能不這樣行動，因為祇有在這條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在國際環境內發生某種變化，足以保障俄國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危險。

正因為如此，所以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策源地，而俄國共產黨人底領袖列寧便成了列寧主義底創造者。

俄國和列寧底「遭遇」，差不多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和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底「遭遇」一樣。德國當時也是孕妊着資產階級革命，正好像俄國在二十世紀初期一樣。當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寫道：

「共產黨人現在的主要視線是繫注於德國，因為德國正處於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因為德國將在一般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十七世紀英國和十八世紀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革命。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一定要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序幕」。

換句話說：當時革命運動底中心是移往德國了。

顯然，馬克思在上述這段話中所指出的情況，也就是恰巧德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故鄉，而德國無產階級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創造者的大概原因。

關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也要這樣說，而且更要這樣說。當時的俄國是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它應當在歐洲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德國（英法更不用說）更發展的無產階級來實現這個革命；並且所有一切事實都指明這個革命定會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底酵母和序幕。所以不是偶然的，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當俄國革命還剛現萌芽時，就在他所著的做什麼？一書中寫了以下的預言：

「歷史現在向我們（即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註）提出的最近的任務，是比其任何一國無產階級所有一切最近任務都要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把歐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而且是把亞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結果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為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二頁）。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是一定要移到俄國來了

大家知道，俄國革命底進程是綽綽有餘地證實了列寧這個預言的。

既然這樣，那末作過這樣革命和具有這樣無產階級的國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底故鄉，又有什麼奇怪呢？

這個無產階級底領袖列寧，同時也成了這個理論和策略底創造者以及國際無產階級底領袖，又有什麼奇怪呢？

(二) 方法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有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佔統治的整個時代。爲要說得確切起見，我應當補充說：這裏所指的，不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統治，而只是機會主義在事實上的統治。在形式上，當時領導第二國際的，是所謂「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謂「正統派」，即考茨基及其他等人。可是，在事實上，第二國際底基本工作是按照機會主義路線進行的。機會主義者由於他們那種慣於遷就的小資產階級天性而遷就了資產階級，而「正統派」又爲着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爲着維持「黨內和平」起見，遷就了機會主義者。結果就造成了機會主義佔統治的局面，因爲資產階級底政策與所謂「正統派」底政策已經是完全結合爲一了。

這是資本主義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即所謂戰前的時期：當時帝國主義那些將要引起巨大災變的矛盾，還沒有來得及全形暴露；當時工人的經濟罷工和職工會，還多少是「照常」發展着；當時

用選舉鬥爭和國會黨團，還能達到「黨心醉目」的成效；當時人們把合法的鬥爭形式頌揚得萬入雲霄，並想用合法手段來「打死」資本主義，——總而言之，當時第二國際底黨是長得肥肥胖胖，根本不願意認真想到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羣衆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論，而是與生動的羣衆革命鬥爭脫離了關係，變成了陳腐教條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理論觀點和理論斷片。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曾記起馬克思底理論，但目的是要割割這理論中的生動的革命的精髓。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見解和小氣的政客手腕，議會的外交手段和議會的拉攏行爲。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曾通過些「革命的」決議和口號，但目的是要把這些決議和口號擱置起來。不是使黨根據本身錯誤來領受教育和學習正確革命策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問題，掩蔽和抹煞這些問題。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曾不嫌說到迫切困難的問題，但目的是要用一種「橡皮性的」決議來敷衍了事。

第二國際底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庫，就是這樣。

而同時，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搏戰的新時代，却已經到臨。在財政資本底莫大勢力面前，舊的鬥爭方法已經是顯然不夠而無能爲力了。

當時必須重新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工作及其整個工作方法，必須驅除庸俗見解，狹隘觀點，政客手腕，叛徒行爲，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必須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武庫，拋棄那一切生鏽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式的武器。不做這種預備工作，那就根本不能去與資本主義交

戰。不做這種工作，那末無產階級在新的革命搏戰面前就會陷於武裝不足，或且簡直沒有武裝的危險。

把第二國際底骷髏馬戲拿來做一番總檢查和總清洗的這一光榮任務，就落到了列寧主義肩上了。列寧主義底方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出來和鍛鍊出來的。

這個方法底要求是怎樣呢？

第一，是要在羣衆底革命鬥爭火焰中，在生動的實踐火焰中檢查第二國際底各種理論教條，即是要恢復那個被破壞了的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消滅理論與實踐分離的狀態，因為祇有這樣，才能造成具有革命理論武裝的真正無產階級的黨。

第二，是要不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口號和決議（它們的口號和決議是不可相信的），而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實際行為，根據它們的行動來檢查第二國際黨底政策，因為祇有這樣，才能獲得和配受無產階級羣衆底信任。

第三，是要按新的革命的風格，根據教育羣衆和準備羣衆去作革命鬥爭的精神去改造全部黨的工作，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準備羣衆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第四，是要無產階級黨進行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黨根據本身錯誤來領受訓練和教育，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教育出黨底真正幹部和真正首領。

列寧主義方法底基礎和實質，就是如此。這個方法是如何實際應用了的呢？

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有一些理論教條，他們總是死守成規，動輒藉口於這些教條。且舉其中幾條來看吧。

第一個教條：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條件。機會主義者硬說：無產階級本身如果在全國人口中不佔多數，便不能奪取政權，而且不應當奪取政權。一點證據也沒有，因為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沒有可能來辯證這個荒謬觀點。列寧回答第二國際方面的老爺們說：就算是這樣吧；可是，既然形成了相當的歷史環境（戰爭，農村危機等等），使無產階級雖佔人口少數，但有可能把極大多數勞動羣衆團結在自己周圍，——那末，為什麼它不應奪取政權呢？為什麼無產階級不應利用順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來衝破資本戰線，並加速總解決呢？難道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說過，如果當時在德國可以用「某種再版農民戰爭」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情況，就會「很好」了麼？豈不是大家都知道，當時德國無產者是比——譬如說——一九一七年俄國無產者相對地少些麼？難道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實踐還沒有表明，第二國際方面的英雄們這一個得意的教條，對於無產階級是絕無絲毫實際意義麼？羣衆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打擊和打破了這個陳腐教條麼？

第二個教條：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數的現成的能夠組織國家管理的文化幹部和行政幹部，便不能保持政權，於是起初必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造就這種幹部，然後才可以奪取政權。列寧回答道：就算是這樣吧；可是，為什麼不能把事情這樣顛倒過來，先奪取政權，為無產階級底發展造成一種順利條件，然後一日千里地前進，來提高勞動羣衆底文化程度，來造就很多由工人出身的領導幹

部和行政幹部呢？難道俄國的實踐還沒有表明，在無產階級政權下，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之增長，要比在資本政權下面迅速百倍和徹底百倍麼？羣衆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把機會主義者這一個理論教條也無情打破了麼？

第三個教條：政治的總罷工方法是無產階級所不可採用的，因為這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沒有根據（請看恩格斯底批評），在實踐上是有危險（能破壞國家經濟生活底常態，能虛耗工會基金），所以它不能代替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即國會鬥爭形式。列寧主義者回答說：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當時所批評的，並不是任何總罷工，而只是某一種總罷工，即無政府主義者爲代替無產階級政治鬥爭而提出的無政府主義者經濟總罷工，——試問這與政治總罷工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麼人和在什麼地方證明了國會鬥爭形式是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呢？革命運動底歷史，難道不是證明國會鬥爭僅僅是組織無產階級在國會以外鬥爭的學校和助力麼？難道不是證明在資本主義下，工人運動底基本問題，是要用強力，用無產階級羣衆直接鬥爭，用他們的總罷工，用他們的武裝起義來解決麼？第三，關於以政治總罷工方法來代替國會鬥爭這個問題，是從那裏找來的呢？主張政治總罷工的人，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地方企圖過用國會以外的鬥爭形式來代替國會的鬥爭形式呢？第四，俄國革命難道還沒有表明政治總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最大學校，是在衝擊資本主義堡壘最前夜動員和組織最廣大無產階級羣衆的不可替代的手段麼，——試問這與那些因恐怕會破壞經濟生活常態進程，因恐怕會虛耗工會基金而發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把機會主義者這一個教條也打得粉碎了麼？

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說：「革命理論並不是教條」，「革命理論是只有與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繫起來，才會最終形成的」（見幼稚病），因為理論應當服務於實踐，因為「理論應當回答實踐所提出的問題」（見人民之友），因為理論是應當由實踐材料來考驗的。

至於講到第二國際各黨底政治口號和政治決議，那末，祇要回憶「以戰爭對付戰爭」這一口號底歷史，就足以瞭解這些黨底政治實踐是何等虛偽和腐敗，它們以堂堂的革命口號和決議來掩蔽它們的反革命勾當。大家都還記得第二國際在巴塞爾代表大會上舉行的堂皇示威，當時第二國際威嚇帝國主義者說，如果帝國主義者敢於開始戰爭，那就要遇到慘象百出的起義；並且提出了「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嚇人口號。可是誰不記得：不久以後，在戰爭正待開始時，巴塞爾決議却已束諸高閣，而向工人們提出了新的口號，即為資本主義祖國光榮而互相殘殺的口號呢？革命的口號和決議，如果不加以實行，那豈不是顯然一文不值麼？祇要把列寧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政策，拿來和第二國際在戰爭時期的叛徒政策比較一下，就能懂得機會主義底政客是何等卑鄙，而列寧主義底方法是何等偉大了。這裏我不能不引證列寧所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的一段話，他在那裏無情地痛斥了第二國際首領考茨基不顧按實際行動去估計黨，而企圖按紙上口號與文件去估計黨的那種機會主義態度。

列寧說：

「考茨基所實行的，是標本式的市儈庸人政策，竟以為：提出口號，便能改變事情。

全部資產階級民主史都是揭破這個幻想的：爲欺騙民衆起見，資產階級民主派向來和現在都提出隨便那一種「口號」。問題是要考察他們是否誠意，把他們所說的話拿來和他們的行動比較，不要以唯心或騙人的空話爲滿足，而要澈底找到階級的現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七七頁）。

我還不說第二國際各黨懼怕自我批評的態度，我還不說它們那種極力掩蔽自身錯誤，抹煞迫切困難問題，用一些關於百事大吉的虛偽話頭，用一些消磨生動思想，使黨難於根據自身錯誤去領受革命教育的虛偽話頭來遮蓋自身缺點的态度，它們這種態度是受到了列寧譏笑和痛斥的。列寧在他所著幼稚病一書中論到無產階級黨底自我批評問題時寫道：

「政黨對本身錯誤所持的態度，就是表明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在真正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所負義務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底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有人說：揭露自身錯誤和實行自我批評，這對於黨是有危險的，因爲這會被敵人利用來反對無產階級黨。列寧認爲：這種反駁是不鄭重的，並且是完全不正確的。關於這一點，列寧還在一九〇四年，當我們黨還幼稚而不甚大時，就在他所著進一步一書中說道：

「他們（指馬克思主義者底敵人而言）。——斯大林註）看見我們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

洋洋得意起來；他們爲着自己的目的，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黨種種缺點的小冊子中的個別句段。可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已久歷戰鬥，飽受風霜，決不會爲這區區針刺所驚嚇，却能夠不管這些針刺，而依然繼續其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是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發展而被克服的」（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列寧主義方法底特徵，大體上就是如此。

列寧方法底原理，在馬克思學說中，基本上已經有了，這個學說，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在實質上是批評的革命的學說」。列寧底方法就是澈頭澈尾都爲這種批評的革命的精神所貫注的。可是，如果以爲列寧底方法僅僅是把馬克思底方法恢復，那是不正確的。在事實上，列寧底方法不僅是把馬克思底批評的革命的方法恢復了，不僅是把馬克思底唯物辯證法恢復了，而且是把這個方法具體化和往前發展了。

(三) 理論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三個問題來講：（一）理論對於無產階級運動的意義，（二）對自發「理論」的批評，（三）無產階級革命論。

（一）理論底意義。有些人認爲列寧主義是實踐重於理論，就是說，列寧主義底主要點是將馬克思主義原理化爲事實，是「執行」這些原理，至於說到理論，那麼據說列寧主義似乎是很不關心這

點的。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曾屢次嘲笑列寧對於理論，特別是對於哲學表示「不關心」。同樣，大家也知道，現在許多列寧主義的實際工作者不很喜愛理論，特別是因為他們由於環境關係而不得不忙於浩繁的實際工作。我應當指出，對列寧及列寧主義所持的這種非常奇怪的見解，是完全不正確，而且是絕對不合於事實的；實際工作者忽視理論的趨向，是完全與列寧主義底精神相矛盾，而且包含着有害於事的巨大危險。

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經驗。當然，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可是，理論如果是在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繫中形成的，那它就能成為工人運動底偉大力量；因為，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能使運動具有信心，使它有確定方針的能力，使它能瞭解四周事變底內在聯繫；因為，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使實踐不僅能瞭解各階級在目前如何行進和向那裏行進，而且能瞭解這些階級在最近將來會如何行進和向那裏行進。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說過和幾十次重複說過下面這個著名原理：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列寧比誰都更瞭解理論底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我們黨這樣的黨，因為我們黨擔負有國際無產階級先進戰士的作用，而又處於複雜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中。他還在一九〇二年預察到我們黨所擔負的這種特殊作用時，就認為必須指出：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祇有受先進理論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現在當列寧關於我們黨作用的預言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列寧這個原理更具有特別巨大的力量和特別重大的意義。

依據唯物主義的哲學，把從恩格斯到列寧這時期最重要的科學成果綜合起來，並從各方面去批評馬克思主義者隊伍裏的反唯物主義的派別，這是個極重大的任務，而担任實現這個任務的，不是別人，却正是列寧，——這件事實可算是列寧異常重視理論的最明顯表現。恩格斯說：「唯物主義應當隨同每一個新的偉大發現而採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別人，而正是列寧在其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這部傑作裏面，為自己的時代實現了這個任務。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雖很喜歡嘲笑列寧「不關心」哲學，但他自己却甚至沒有敢於認真着手來執行這個任務。

（二）對自發論的批評，或關於先鋒隊在運動中的作用。自發論是機會主義底理論，是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理論，是在實際上否認工人階級先鋒隊，即工人階級黨領導作用的理論。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底革命性質，反對使工人運動循着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路線行進，而主張使工人運動唯一按資本主義「可以履行」「可以接受」的要求路線行進，完全主張採取「阻力最少的路線」。自發論是工聯主義底思想體系。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使自發運動帶着覺悟的和有計劃的性質，反對黨在工人階級前

面行進，反對黨把羣衆提高到覺悟底水準上，反對黨領導運動，而主張使運動中的覺悟成份不致妨害運動按照自己的道路行進，使黨祇聽從自發運動，跟着這運動後面做尾巴。自發論是減低覺悟成份在運動中的作用的理論，是「尾巴主義」底思想體系，是任何機會主義底邏輯基礎。

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這個理論就已經出現於舞台，而在實際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謂「經濟主義者」，否認在俄國有成立獨立工人政黨之必要，反對工人階級爲推翻沙皇制度而進行的革命鬥爭，鼓吹運動中的工聯主義政策，根本要把工人運動交給自由資產階級去領導。

舊火星報所進行的鬥爭和列寧在其做什麼？一書中對「尾巴主義」理論所作的精彩批評，不僅打破了所謂「經濟主義」，而且創造了俄國工人階級真正革命運動底理論基礎。

如果沒有進行這個鬥爭，那末當時就莫要想在俄國創造獨立的工人政黨，就莫要想由這個政黨在革命中起領導的作用。

可是，崇拜自發性的理論不僅是俄國的現象。它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黨裏都是最廣泛流行的，雖然形式稍微有些不同。我所指的，就是第二國際首領們重複得令人作嘔的所謂「生產力」論，這個理論辯護一切事物，調和一切人們；它當某些事實早已爲大家聽得討厭以後，才把這些事實指出來並加以解釋，而一經指出以後，就安心不管了。馬克思說：唯物主義的理論不能祇以說明世界爲限，它還應當改造世界。可是，考茨基及其夥伴們却不管這一點，他們寧願停留在馬克思公式底前半段上。請看應用這個「理論」的許多例子之一吧。人們說，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第二國際各黨曾發表過恐嚇言論，說如果帝國主義者開始戰爭，那它們就宣佈「以戰爭對付戰爭」。人

們說，在戰爭正待開始時，這些黨就把「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個口號束諸高閣，而實行了一個相反的口號——「爲帝國主義祖國而戰」。人們說，因爲這樣變更口號的結果，致使幾百萬工人犧牲了性命。可是，如果以爲這裏有什麼人應負其咎，某人叛變了或叛賣了工人階級，那就想錯了。絕對沒有過這樣的事情！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這樣發生的。第一，因爲國際是「和平工具」，而不是戰爭工具。第二，因爲在當時所有的那種「生產力水準」下，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生產力」「應負其咎」。考茨基老爺底「生產力論」正是這樣向「我們」解釋的。而誰不相信這個「理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黨底作用呢？黨在運動中的意義呢？可是，黨對於像「生產力水準」這樣的決定因素，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這種假冒馬克思主義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大堆來。

顯然用不着證明：這個以掩飾機會主義真面目爲使命的冒牌「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列寧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前就與之作過鬥爭的那個「尾巴主義」理論在歐洲的變形表現罷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打破這種理論上的假冒，就是在西方創立真正革命黨的預備條件。

(三)無產階級革命論。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是從三個基本原理出發的。

第一個原理：財政資本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內佔統治地位；發行有價證券，是財政資本底一種主要業務；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是帝國主義底基礎之一；財政寡頭底莫大勢力，是財政資本統治底結果，——所有這些都揭露出壟斷資本主義底粗暴寄生性質，使資本主義的托拉斯和斯迪加底壓迫更加百倍令人難受，使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義憤更加增長，把羣衆引到無產階級革命作

爲唯一救星（見列寧所著帝國主義）。

由此就得出第一個結論：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宗主國」內部的無產階級戰線上的爆發原素日益增長。

第二個原理：加緊向殖民地和依賴國輸出資本；擴展「勢力範圍」和殖民地領土，一直囊括全地球；資本主義變成爲極少數「先進」國用財政資本奴役，用殖民政策壓迫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各個民族經濟，各個民族領土，變爲所謂世界經濟這整個鍊條底環節，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成兩個營壘：一個是剝削並壓迫着廣大殖民地和依賴國的極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另一個是迫得要進行鬥爭以求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極大多數殖民地和依賴國（見帝國主義）。

由此就得出第二個結論：殖民地國家裏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國外的，即殖民地戰線上的反帝國主義義憤原素日益增長。

第三個原理：對「勢力範圍」和殖民地的獨佔；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的發展，使那些已經搶得領土的國家和那些希望得到自己「份額」的國家爲重分世界而進行瘋狂的鬥爭；帝國主義的戰爭是恢復那已被破壞的「均勢」的唯一手段，——所有這些，就使得第三條戰線，即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線，緊張起來，因而削弱帝國主義，並使頭兩條反帝國主義戰線，即革命的無產階級戰線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戰線，易於聯合起來（見帝國主義）。

由此就得出第三個結論：在帝國主義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的殖

民地革命，必然聯合成爲一個世界革命戰線，以反對世界帝國主義戰線。

列寧把以上一切結論綜合爲一個總結論，說「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前夜」*（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一頁）。

因此，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及其性質、範圍和深度問題的觀察法，以及這革命底一般方案，也就隨着改變了。

從前，通常都是根據某一單個國家底經濟狀況去分析無產階級革命底前提。現在，這種觀察法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根據世界上所有一切國家或多數國家底經濟狀況，根據世界經濟底狀況去觀察這個問題，因爲各單個國家與各單個民族經濟已經不是孤獨自在的單位，已經變爲所謂世界經濟這整個鍊條底各個環節了，因爲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轉變爲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就是極少數「先進」國用財政資本奴役，用殖民政策壓迫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

從前，通常都是說在各個別國家裏，或者更確切些說，在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裏，已否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底客觀條件。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整個統一體系中已經具有革命底客觀條件；而且，如果整個體系，或者更確切些說，因爲整個體系已經成熟到發生革命的程度，那末這體系中有些國家在工業方面發展不足的情形，就不能成爲對於革命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從前，通常都是說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作為單個的孤獨自在的現象，而以單個的民族的資本戰線為敵方。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各單個的民族的資本戰線已經變成所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這個鍊條底環節，必須拿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總戰線來對抗這世界帝國主義戰線。

從前，總是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純粹是某一個國家內部發展底結果。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首先就應當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是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各個矛盾發展底結果，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鍊條在某個國家裏破裂的結果。

革命將在那裏開始呢，資本戰線首先會在那裏，會在那個國家裏被衝破呢？

從前，一般人通常都是回答道：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地方，在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份較多的地方。

不，——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反駁道，——並不一定要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資本戰線將在帝國主義鍊條最弱的地方被衝破，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鍊條在其最弱處破裂的結果；而且，開始革命的國家，衝破資本戰線的國家，也許會是個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而其他的資本主義較多發展的國家，却依舊留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

在一九一七年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的鍊條，在俄國是比在其他國家裏薄弱些。這鍊條就在這裏被衝破，而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出來。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在俄國展開了以革命無產階級為首的偉大人民革命，而無產階級擁有數千百萬被地主所壓迫所剝削的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因為

當時在俄國與革命對立的，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極醜惡的帝國主義代表，它沒有絲毫的威信，而為人民所共恨。雖然當時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比較——譬如說——法國或德國，英國或美國低些，可是帝國主義的鍊條在俄國却原來是薄弱的。

在最近將來，這鍊條將在什麼地方被衝破呢？仍然是在它最弱的地方。譬如說，這鍊條也許會在印度被衝破。為什麼呢？因為印度有年輕而奮勇的革命無產階級，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民族解放運動這樣一個顯然偉大，顯然嚴重的同盟者。因為在印度與革命對立的，是一個盡人皆知的敵人，即是沒有絲毫威信，而理應為印度被壓迫被剝削羣衆所共恨的外國帝國主義。

這鍊條很有可能會在德國被衝破。為什麼呢？因為例如在印度發生作用的那些因素，在德國也開始發生作用；同時，印度與德國兩國在發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別，當然不能不影響到德國革命底進程和結局。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說：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不會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平衡『成熟』，而會是經過某些國家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過帝國主義大戰中的第一個戰敗國家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被剝削的道路來完成的。另一方面，正由於這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底影響，東方已最終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五至四一六頁）。

簡而言之：帝國主義戰線鍊條被衝破，通常是在其最弱的環節上，但無論如何，總不一定要在

資本主義較多發展的地方，總不一定要在無產者佔百分之幾，農民佔百分之幾等等的地方發生的。

正因為如此，所以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人口總數裏所佔百分數的統計數字，在解決無產階級革命問題時，已失去了第二國際那些不懂帝國主義而又懼怕革命如懼怕瘟疫的書獃子們所喜歡賦予給它的特殊意義。

其次。第二國際底英雄們向來都說（而且現在還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隔着一條不可逾越的深淵，或至少是有一座萬里長城使這兩個革命彼此隔着一個多少長久的間斷時期，在這個間斷時期中，已獲得政權的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而無產階級則積聚力量 and 準備反資本主義的「決鬥」。這個間斷時期，通常是以好幾十年來計算，或者更長久些。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它祇是，而且不能不祇是資產階級反革命慾望底掩蓋物和粉飾品。顯然用不着證明：在孕妊着許多衝突和許多戰爭的帝國主義環境內，在「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的環境內，當「繁榮的」資本主義已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語），而革命運動正在全世界各國發展的時候，當帝國主義聯合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反動勢力，包括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在內，因而使一切革命勢力，由西方的無產階級運動到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都必須聯合一致的時候，當非與帝國主義作革命鬥爭就不能推翻封建農奴制度餘孽的時候，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種條件下，在一個多少發展了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會和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會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俄國革命史已經顯然證明這個原理是正確而不容置辯的。無怪乎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前夜時，就在他所著的兩個策

略這本書裏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個鍊條底兩個環節，看做俄國革命發展規模底一貫而完整的表現：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癱瘓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癱瘓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火星派在一切關於革命發展規模的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狹隘到極點了」（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我還不說列寧其他較晚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是比在兩個策略中更明顯地表現爲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底基石之一。

而有些同志却以爲列寧在一九一六年時才得出這個思想，以爲列寧在一九一六年以前還認爲俄國革命將停滯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於是政權也將從工農專政機關手裏轉到資產階級手裏，而不是轉到無產階級手裏。據說這種斷語甚至流行到我們的共產主義報章上來了。我應當指出，這種斷語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完全不合於事實的。

我可以引證列寧在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上（一九〇五年）的著名演說，他在這篇演說中不是把工農專政，即民主革命勝利，稱爲「秩序組織」，而是稱爲「戰爭組織」（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二六四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論臨時政府的幾篇著名論文（一九〇五年），他在這幾篇論文裏描

寫俄國革命底發展前途時向黨提出的任務，就是「務必使俄國革命成爲多年的運動，而不是幾個月的運動；務必使這革命不僅謀得現時執政當局底細微讓步，而是要完全推翻這個執政當局」；他在這幾篇文章裏發揮了這個前途，並把這個前途和在歐洲發生的革命聯繫起來，而繼續寫道：

「假如能夠做到這一步，那時：那時，革命的火焰將延燒到歐洲；那在資產階級反動高壓下備受折磨的歐洲工人也將發動起來，並向我們表明『這應當怎樣做』；那時，歐洲底革命高潮就會反轉過來影響俄國，而使幾年的革命時代變成幾十年的革命時代。」（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九一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發表的著名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寫道：

「無產階級在現時，而且在將來還會不惜犧牲地爲奪取政權，爲成立共和國，爲沒收土地：爲吸收『非無產者民衆』參加那使資產階級、俄羅斯擺脫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即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奮鬥。無產階級將立刻利用資產階級俄羅斯從沙皇制度下，從地主土地權力下解放出來的局面，當然不是爲了幫助富裕農民來反對農村工人，而是爲了聯合歐洲無產者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八頁）。

最後，我還可以引證列寧所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的一段著名言論，他在這裏援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著。

引了我們剛才從兩個策略中引證過的那一段說明俄國革命發展規模的話，而得出如下的結論：

「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進程已證實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協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性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然後協同貧農，協同半無產階級，協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農村的富人、富農和投機者，所以革命就變成社會主義的革命。除了無產階級底準備程度及其與農村貧民聯合的程度以外，企圖用其他東西來分隔這兩個革命，企圖在它們中間建立一座人工造成的萬里長城，那就是極端曲解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用自由主義來代替它」（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一頁）。

看來是已經夠了。

有人會向我們說：既然這樣，那末列寧為什麼進行鬥爭反對「不斷（不停頓）革命」論呢？

因為列寧主張「用盡」農民底革命能力，澈底利用農民底革命毅力，以便完全消滅沙皇制度，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斷革命」論者却不懂得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輕視農民底革命毅力，輕視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能力，因此就妨害了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事業，妨害了把農民團結於無產階級周圍的事業。

因為列寧主張以政權過渡於無產階級來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論者却想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開始，殊不知他們這樣作法，就是不願看見像農奴制度餘孽這樣的「小事情」，就是不

肯顧及俄國農民這樣的嚴重力量；殊不知他們用這樣的政策，祇能阻止把農民爭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事業。

所以，列寧進行鬥爭反對那些「不斷」革命論者，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停頓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就是主張不停頓革命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為無產階級最大後備力量的作用，而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

「不斷」革命論並不是一個新思想。這個思想最初是由馬克思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在他那著名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一八五〇年）中提出來的。我們的「不斷論者」，正是從這個文件中取得不停頓革命這一思想的。必須注意到，我們的「不斷論者」從馬克思那裏把這個思想拿來以後，就多少改變了這個思想，而一改變了它，就把它「弄壞了」，使它不適於實用了。當時需要列寧用自己的老練的手法來糾正這個錯誤，取得馬克思真正的不停頓革命這一思想，而使它成為自己的革命論底基石之一。

請看馬克思在其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中列舉他號召共產主義者應當爭得的許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後，怎樣說到不停頓革命問題吧：

「民主派的小資產者是希望至多也只實行上述要求，便立刻結束革命的，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却要使革命成為不停頓的，直到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都被撤銷統治地位，無產階級爭得國家政權，無產者底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統治國家內都發展到使各國無產者間的競爭歸於停止，以及至少是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裏的

時候爲止」。

換句話說：

(1) 馬克思並沒有主張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來開始革命事業，這與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底計劃相反；

(2) 馬克思祇是主張以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來完成革命事業，一步一步把資產階級各派從政權高峯上推倒下去，以便在爭得無產階級政權以後，再把革命火焰燃遍於世界各國，這與列寧根據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而教導我們的一切，以及他在我們革命過程中所實行的一切，完全相合。

由此可見，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不僅是輕視了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不僅是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底意義，而且改變了（改變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論，使它不適用於實用了。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也就嘲笑了我國「不斷論者」底理論，稱之爲「奇怪的」和「漂亮的」理論；責備他們不願意「想一想，爲什麼實際生活在整個十年內都與這個漂亮理論背道而馳」（列寧這篇論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即是在俄國「不斷論者」底理論出現以後經過十年的時候寫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七頁）。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認爲這個理論是半孟什維主義的，說這理論「從布爾什維克方面拿去的，是號召無產階級作堅決的革命鬥爭和奪取政權的思想，而從孟什維克方面拿去的，就是『否認農民作用』的思想（見同卷所載列寧論革命中的兩條路線一文）」。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關於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來「立刻」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就是這樣。

其次，從前認爲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爲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也要有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共同發動。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以這勝利有可能爲出發點，因爲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底不平衡性和躍進性，帝國主義內部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那些矛盾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國革命底歷史已直接證明了這一點。不過這裏必須記着：只有一些完全必要的條件具備時，才能順利推翻資產階級；沒有這些條件，就根本談不到什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請看列寧在他所著幼稚病一書裏怎樣說到這些條件吧：

「一切革命，特別是二十世紀所有三次俄國革命所證實的革命基本規律，就在於：爲着革命，僅僅只是被剝削被壓迫羣衆覺得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革還不夠；爲着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時，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沒有全國的危機（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爲着革命，第一，必

着這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須要多數工人（或至少是要多數有覺悟、有思想、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明瞭革命是必要的，並抱有爲革命而犧牲的決心；第二，必須要統治階級遭到政府危機，這種危機甚至將最後的羣衆都捲入政治運動；，使政府軟弱無力而使革命者有可能迅速推翻政府」（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二頁）。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還不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革命獲得勝利的國家裏的無產階級，既已鞏固自己的政權並領導着農民，就能夠而且應當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不是說，它這樣就會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即最終勝利呢？換言之，這是不是說，它單靠一國力量就能夠最終鞏固社會主義並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外國武裝干涉，也就是說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復辟呢？當然不是。爲要達到這點，至少必須有革命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因此，發展和援助其他國家內的革命，乃是獲得勝利的革命底切實任務。因此，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的革命，不應把自己看作是自滿自足的東西，而應看作是用以加速其他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助力和工具。

列寧用兩句話說明了這個意思，他說，獲得勝利的革命底任務，就在於「最大限度地實行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世界各國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底特徵，大體上就是如此。

(四) 無產階級專政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三個基本問題來講：（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

（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首先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其進展，其發展規模，其成績，祇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具體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是這革命底機關，是這革命底最重要支撐點，其使命就是要：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底反抗，並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使革命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這是革命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能夠做到的。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的相當階段上創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特設機關作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它就不能夠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就不能夠保持勝利並向前進展到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

「革命底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列寧）。這是不是說，事情祇限於取得政權，奪取政權呢？當然不是。取得政權——這僅僅是事情底開始。資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被推翻以後，由於許多原因，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它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因此，全部事情都在於要保持政權，鞏固政權，使它成為不可戰勝的。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怎樣辦呢？為要達到這個目的，至少是必須實現在革命勝利後「第一天」就會擺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的三個主要任務：

(1) 打破那些已被革命所推翻所剝奪的地主和資本家底反抗，消滅他們圖謀恢復資本政權的所有的一切行動；

(2) 用團結一切勞動者於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來組織建設工作，並使這工作向着那準備肅清，消滅階級的方向進行；

(3) 將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軍隊，以便與國外敵人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需要，就是爲着實行這些任務，完成這些任務。

列寧說：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乃是一整個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就不免還保存有復辟希望，而這種希望就變爲企圖復辟的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是不會料到會被人推翻的，是不相信這點，不願想到這點的，所以他們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之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來拚命鬥爭，以求恢復他們已被奪去的『天堂』，以求保護他們從前過着多麼甜蜜生活，而現在却被這班『平凡的賤人』弄得貧困破產（或者弄到從事『平凡』勞動）的家庭。而跟着剝削者資本家走的，又有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總是猶豫不決，動搖不定，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又因革命遭遇困難而張惶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魂顛倒，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從這一個營壘跑入那一個營壘」（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五頁）。而資產階級是自有根據來圖謀復辟的，因爲資產階級在被推翻以後，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它

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

列寧說：

「如果剝削者僅在一個國家內被打倒了——而這當然是標本的現象，因為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情形，——那末他們依然是比較被剝削者強有力些。」（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底力量何在呢？

第一，「就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就在於資產階級各種國際聯繫底力量和堅固性」（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第二，就是「在革命以後的長時期內，剝削者還必然保存有一些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金錢（金錢不是一下子就可消滅的），還有某些動產，往往是很多的動產，還有種種聯繫，組織技能和管理技能，還有熟悉一切管理「秘訣」（習俗，方法，手段和機會）的知識，還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並與高等技術人員（過着資產階級生活並抱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員）接近，還有更大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技能（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第三，是「在於習慣底力量，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為，可惜小生產在世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因為「消滅階級，這不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是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

還是消滅小商品生產者，但這種人是不可以驅逐，不可以鎮壓的，須要和他們和睦共居，可以（而且應當）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並且只能是用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者的工作來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和第一八九頁）。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反對較強大的敵人，爲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正因其被推翻而增加十倍」，「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同上，第一七三頁和第一九〇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要在短時期內完成這些任務，要在幾年內實現這一切，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不應把無產階級專政，把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看做是轉瞬即逝的時期，看做是一批「最革命的」法律與法令，而要把它看做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其中包含有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堅持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却，勝利和失敗。這一個歷史時代之所以必要，不僅是爲要創造那些保證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經濟上和文化上的前提，並且是爲要使無產階級能夠：第一，把自己教育並鍛鍊成爲能夠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按照那個保證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方向來重新教育並改造小資產階層。

馬克思向工人說過：

「你們應當經歷十五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鬥，不僅是爲了改變現存

的關係，而且是爲了把你們自己改變成爲能夠進行政治統治的人」（見馬恩全集，第八卷，第五〇六頁）。

列寧繼續並發展馬克思這個思想時寫道：

「將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及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使他們大家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樣，也將要「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在長期鬥爭中來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因爲無產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擺脫自己那些小資產階級成見的，這些成見不是用神術，不是依聖母意旨，不是依口號、決議、法令底意旨所能擺脫，而是只有在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影響作長期的艱苦的羣衆鬥爭中才能擺脫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八頁和第二四七頁）。

（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由上所述，便可明白看出：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保留而不侵犯舊經濟政治制度的條件下所進行的平常更換政府人員，更換「內閣」等等的辦法。各國孟什維克與機會主義者害怕專政如洪水猛獸，竟用所謂「爭取政權」概念來抹煞了專政概念，通常都把「爭取政權」歸結爲更換「內閣」，歸結爲由謝德曼和諾斯克、麥克唐納和亨德孫這一類人來組織新內閣和上台執政。顯然用不着解釋：這種以及諸如此類更換內閣的辦法，是與無產階級專政，是與真正無產階級爭取真正政權，毫無相同之處的。麥克唐納和謝德曼輩在保留着資產階級舊制度的條件下掌握政權，所謂他們的政府，並不能是別的，而不過是資產階級

御用的服務機關，不過是帝國主義癱疽的遮蓋物，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以反對被壓迫被剝削羣衆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便於，不順利並難於剝削和壓迫羣衆時，它就需要這些政府來做屏風。當然，這種政府之出現，乃是「他們那裏」就是說，在資本家們那裏，在「希普路」那裏情況不安底微候；雖然如此，但這種政府仍舊不免是稍加粉飾的資本政府。麥克唐納爾政府或謝德曼政府，是與無產階級爭得政權相隔天壤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政府底更換，而是擁有新的中央政權機關和新的地方政權機關的新國家，是在舊國家，即資產階級國家廢址上產生的無產階級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資產階級制度基礎上產生出來，而是在破壞資產階級制度的過程中，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在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過程中，在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化的過程中，在無產階級強力革命過程中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以對資產階級施行強力為倚據的革命政權。

國家是統治階級運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反抗的機器。按這一點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與其他任何階級專政都沒有絲毫區別的，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是用以鎮壓資產階級的機器。但是這裏有一個根本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迄今以前所有一切階級國家是剝削者少數對被剝削者多數施行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被剝削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施行的專政。

簡而言之：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受法律所限制，而以強力為倚據，並得到被剝削勞動羣衆同情和擁護（見國家與革命）。

由此就得出兩個基本結論：

第一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供一切人享受，既供富人享受，又供貧民享受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是新式的民主國家，即供無產者和一般窮人享受的民主國家；必然是新式的專政國家，即爲反對資產階級而施行的專政國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三頁）。考茨基及其夥伴們關於普遍平等、「純粹」民主及「十足」民主等等的廢話，是要用資產階級立場來掩飾一件無疑的事實，即是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不能有平等的事實。「純粹」民主論是爲帝國主義強盜所馴育飼養的工人階級上層份子底理論。這理論底使命，就是要掩飾資本主義底癱疽，掩飾帝國主義並賦與它一種精神力量來反對被剝削羣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者是沒有得到，而且不能得到真正「自由」的，這至少是因爲房屋、印刷所、紙料倉庫等等爲享有「自由」權所必要的東西，乃是剝削者獨享的特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羣衆是沒有真正參加，而且不能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的，這至少是因爲甚至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並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理德輩和司丁尼斯輩、洛克費爾輩和摩爾根輩所指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剝削者少數底民主，是以限制被剝削者多數底權利爲基礎，是以反對這多數爲目標的。祇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被剝削者才有可能享受真正「自由」，無產者和農民才有可能去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被剝削者多數底民主，是以限制剝削者少數底權利爲基礎，是以反對這個少數爲目標的。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之產生，決不能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的結果，而祇能是由於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打破資產階級軍隊，打破資產階級官吏機關，打破資產階級警察的結果。

「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序言上這樣說。無產階級革命「：不應如迄今以前一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毀壞」——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

——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致顧格爾曼的信內這樣說。

馬克思這一句以大陸為限的話，竟被各國機會主義者和孟什維克作為藉口來喊道：可見，馬克思會假定資產階級民主有和平發展為無產階級民主的可能，至少對於歐洲大陸以外幾個國家（英國和美國）是有可能的。的確，馬克思會假定說有這種可能，並且有根據來假定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美兩國有這種可能，因為當時還沒有壟斷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帝國主義，當時在這些國家中，由於特殊的發展條件，還沒有充分發展的軍事機關和官僚制度。在充分發展的帝國主義尚未出現以前，情形會是這樣。可是，經過三四十年以後，這些國家中的情形已根本改變；此時帝國主義已經發展並普及於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此時軍事機關和官僚制度在英美也已經出現，此時英美和平發展底特殊條件已經消失了，於是把這些國家看作例外的見解也就自然應當失去時效了。

列寧說：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個例外已經失去時

效。英國和美國，本來是盎格羅撒克遜「自由制」——在沒有軍事機關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在全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後的代表，現在它們兩者已經完全落入一般歐洲式的，號令一切，壓制一切的官僚軍事機關底污濁血脈泥潭中了。現時，無論在英國或美國，「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就是打碎和毀壞「現成的」（已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在這裏造成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地步的）「國家機器」（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頁）。

換句話說：關於無產階級強力革命的定律，關於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是這種革命底預備條件的定律，乃是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裏革命運動必不可免的定律。

當然，在遙遠的將來，如果無產階級在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獲得勝利，如果現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形勢已由社會主義包圍的形勢所代替，那時某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那時這些國家裏的資本家由於國際環境「不利」的關係，也許認為最好是「自願地」向無產階級作嚴重的讓步。可是，這個假定祇是關於遙遠的和可能的將來。但對於最近的將來，這個假定是沒有任何根據，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

所以列寧說得對：

「如果不用強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的來代替它，那末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四二頁）。

（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就是壓倒資產階級，打

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很明顯的。但是要運用什麼組織才可以完成這個巨大工作呢？至於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基礎上長成的無產階級舊式組織，不能實現這個工作，那是不容懷疑的。究竟是無產階級底那一種新式組織能夠實現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掘墓人底作用，不僅能夠打破這架機器，不僅能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夠成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基礎呢？

無產階級底這個新式組織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比舊式組織優越的地方何在呢？

就在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最能包括一切的羣衆組織，因為蘇維埃，而且只有蘇維埃，才能包括所有的工人而無一例外。

就在於蘇維埃是這樣唯一的羣衆組織，只有這樣的組織能包括所有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工人和農民，兵士和水兵，因此在這個組織中，羣衆先鋒隊方面，即無產階級方面對於羣衆鬥爭的政治領導，就能最容易和最完全地實現。

就在於蘇維埃是羣衆革命鬥爭、羣衆政治發動及羣衆武裝起義底最強有力的機關，是能夠打破財政資本及其政治附屬物莫大勢力的機關。

就在於蘇維埃是羣衆本身底直接的組織，即最民主的，因而也就是羣衆底最有威信的組織，這組織能盡量便利羣衆去參加新國家底建設和管理，能盡量展開羣衆在爲毀壞舊制度而奮鬥中，在爲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而奮鬥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創造能力。

蘇維埃政權就是把各地方蘇維埃統一成爲一個總的國家組織，成爲無產階級這個被壓迫被剝削羣衆先鋒隊，這個統治階級的國家組織，即統一爲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恰巧從前受資本家地主壓迫的那些階級底最羣衆化和最革命的組織，現在却是「整個國家政權，全部國家機關底經常的和唯一的基礎」，「恰巧那些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在法律上雖有平等權利，而「在事實上，也被人用千百種方法和詭計所排擠而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權利和自由的羣衆，現在却被吸收來經常地和一定地，而且是起着決定作用地參加對於國家的民主管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三頁）。

正因爲如此，所以蘇維埃政權是新形式的國家組織，而在原則上與那種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和國會議制的舊式國家組織不同；它是新式樣的國家，不是適合於剝削和壓迫勞動羣衆的任務，而是適合於使他們完全解除任何壓迫和任何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

列寧說得對：自蘇維埃政權出現時起，「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度時代就完結了；全世界歷史底新篇章，即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就開始了」。

蘇維埃政權底特徵何在呢？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是當還有階級存在時所有一切可能國家組織中最羣衆化和最民主的國家組織，因爲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剝削農民在反對剝削者鬥爭中結合與合作的場所，並在自己的工作中以

* 所有一切着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這個結合與合作爲倚據，所以它是居民多數統治少數的政權，是這個多數底國家，是這個多數專政底表現。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是階級社會一切國家組織中最有國際性的組織，因爲它既然是打破一切民族壓迫而以各族勞動羣衆底合作爲倚據，所以它使這些羣衆易於在統一的國家聯盟內聯合起來。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按其本身結構來說，便使被壓迫被剝削羣衆底先鋒隊，即無產階級，即蘇維埃中最有團結和最覺悟的核心，易於領導這些被壓迫被剝削羣衆。

列寧說：「一切革命和一切被壓迫階級運動底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經驗，都教導我們說：祇有無產階級能夠統一並領導被剝削勞動居民中散漫的落後的階層」（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四頁）。蘇維埃政權底結構，使這個經驗底指示易於實現。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既將立法權和行政權合併在統一的國家組織內，並用生產單位的工廠來代替地域選舉區，於是就把工人和一般勞動羣衆同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繫起來，教導他們去管理國家。

就在於祇有蘇維埃政權能够使軍隊擺脫其對資產階級長官的服從，把軍隊由在資產階級制度下面壓迫人民的工具，變爲使人民從本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壓迫下面解放出來的工具。

就在於「祇有蘇維埃的國家組織能夠真正一下子打破並最終地破壞舊的，即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和法官的機關」（同上）。

就在於只有蘇維埃國家形式能吸引被剝削勞動羣衆組織無條件地經常參加國家管理，所以只有它能準備使國家組織消亡，這種消亡是將來的無國家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底基本現象之一。

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就是那個久經尋找而終於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這個形式底範圍中也就應當實現無產階級底經濟解放，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是這種形式底萌芽。蘇維埃政權是這種形式底發展和完成。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說：

「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的民主制度形式：而且是唯一能夠保證最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一頁）。

（五）農民問題

從這個題目，我拿出四個問題來講：（一）問題提法，（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四）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

（一）問題提法。有人以為列寧主義中的基本要點是農民問題，以為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並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問題。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為政權而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是一個附帶的問題。

著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可是，這個情況，絲毫也不會使農民問題喪失其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所無疑具有的那種嚴重迫切的意義。大家都知道：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隊伍內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在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前夜開始，當時關於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全盤擺在黨面前，而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已具有了迫切的性質。同時，大家也知道：俄國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具有更迫切的性質，當時因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因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問題而發生了無產階級在當前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而這是不言而喻的：誰想要去奪取政權並準備去奪取政權，誰就不能不注意到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中的一部分，因此也就是列寧主義最迫切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各黨之所以漠視農民問題，甚至簡直否認農民問題，不僅是因為在西方有特殊發展條件，而首先是因為它們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不想引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懼怕革命，誰要是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誰也就不會注意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因為在他看來，同盟者問題是不關痛癢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把自己譏笑農民問題的態度，看作他們文雅風度底表現，「真正」馬克思主義底表現。其實，這裏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也沒有，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漠視農民問題這樣重要的問題，其實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就無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馬克思主義。

問題是這樣：因為農民生活底某些條件而潛伏在農民內部的革命能力，是否已經用完了呢，如

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否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能力，將農民，將農民中被剝削者多數，由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他們從前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是這樣，而且現在還是這樣——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爲多數農民具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爲着無產階級專政底利益來利用這些革命能力。俄國三次革命底歷史都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點的結論。

由此所得出的實際結論，就是要援助，一定要援助勞動農民羣衆爲反對奴役和剝削而進行的鬥爭，爲解脫壓迫和貧困而進行的鬥爭。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應當援助任何一種農民運動，而是說要援助直接或間接便利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這樣或那樣協助無產階級革命，促使農民變爲工人階級後備力量和同盟者的那些農民運動和農民鬥爭。

(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是從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起，一直到包括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爲止。這一時期底特徵，就是農民擺脫自由資產階級影響，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轉到無產階級方面，轉到布爾什維克黨方面來。這一時期底歷史，乃是立憲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與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爭奪農民的歷史。杜馬時期就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因爲前後四屆杜馬時期給了農民一個實驗的教訓，而明白告訴農民說：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擁護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擁護沙皇；農民所能向之求得幫助的唯一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只是證實了杜馬時期底教訓，使農民最終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最終陷於孤立，因爲戰爭年份已經完全指明：希望

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同盟者那裏得到和平，就完全是畫餅充飢，自作幻想。如果沒有杜馬時期底實證教訓，那末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會沒有可能。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就是這樣形成的。在爲推翻沙皇制度而共同鬥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是這樣形成的，而這個領導權結果就引到了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是按照另一條道路進行了的。當時在那裏，革命中的領導權，並不是屬於那時由於本身幼弱而沒有成爲並且不能成爲獨立政治力量的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當時在那裏，農民擺脫農奴制度而得到的解放，並不是從那時人數尚少而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裏得到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裏得到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與自由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舊制度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因此，在那裏，革命底結果是使資產階級底政治比重大大加強了。

而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產生的，却是與此完全相反的結果。在俄國，革命底結果並不是使資產階級這個政治力量加強，而是使它削弱，並不是使它的政治後備力量增加，而是使它喪失了基本的後備力量，即喪失了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自由資產階級推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無產階級推到了首位，把數千百萬農民團結到了革命無產階級周圍。

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所以在比較短促時間內就轉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此。無產階級領導權，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萌芽和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俄國革命爲什麼有這個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沒有先例的特殊現象呢？這個特殊現象是從

何而來的呢？

這是因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在比西方更發達的階級鬥爭條件下面開展的，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到這時候已經變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自由資產階級則因懼怕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已喪失任何的革命性（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訓以後），並與沙皇及地主結成聯盟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必須注意下面幾個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情況：

（1）俄國工業在革命前夜的空前集中，例如，大家知道，當時俄國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中作工的人，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五十四，而當時美國這樣工業發展的國家在同樣的大工廠裏作工的人，却只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顯然用不着證明：單是這一個情況，在具備有布爾什維克黨這樣的革命黨的條件下，就使俄國工人階級變成全國政治生活裏最大的力量。

（2）企業裏醜惡不堪的剝削形式，再加上沙皇衛隊殘酷不堪的警察壓制，——這個情況便使工人每一個嚴重的罷工都變成巨大的政治行動，並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爲徹底革命的力量。

（3）政治上萎靡不振的俄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已變成效忠於沙皇政府的直接反革命勢力，這不僅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已把俄國資產階級拋入沙皇制度底懷抱，而且因為俄國資產階級是直接依賴於政府定貨的。

（4）當時在農村中存在着最醜惡最難堪的農奴制度餘孽，更加上地主專權，——這個情況便把農民拋入了革命底懷抱。

(5) 沙皇制度壓制一切有生機的東西，並以自己的專橫來加深資本家和地主底壓迫，——這個情況便把工農鬥爭匯合爲統一的革命巨流。

(6) 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這一切矛盾匯合成爲深刻的革命的危機，並使革命具有莫大的衝擊力量。

在這樣的條件下，農民應向那裏走呢？農民應向誰求得援助來反對地主專權，反對沙皇專橫，反對那毀滅一切，破壞農民經濟的戰爭呢？向自由資產階級麼？然而它是敵人，——這是由前後四屆杜馬底多年經驗所證明了的。向社會革命黨人麼？社會革命黨人當然比立憲民主黨人「好些」，他們的政綱也是「合適的」，幾乎是農民的政綱，可是，既然社會革命黨人想祇倚靠農民，既然他們在敵人勢力主要泉源的城市中軟弱無力，試問他們能幹出什麼事情呢？什麼地方有一個新力量，無論在鄉村或城市中，都能不顧一切，勇敢站在前列去與沙皇及地主作戰，並幫助農民擺脫奴役，擺脫沒有土地的情況，擺脫壓迫，擺脫戰爭呢？一般說來，當時在俄國是否有這樣的力量呢？是的，有這樣的力量。這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它還在一九〇五年時，就已經表明出自己的強大能力，自己的鬥爭到底的本領，自己的勇氣，自己的革命性。

無論如何，另外一種担得起這件事情的力量是沒有的，並且是無從找得的。

正因爲如此，所以農民在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接近社會革命黨人以後，終於覺悟到必須服從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勇敢的革命領袖底領導。

以上是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那些情況。

(三) 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是從二月革命(一九一七年)起，到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止。這個時期比較不長，總共祇有八個月；但從羣衆底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上看來，可以大膽說這八個月是等於平常憲制發展時期的好幾十年，因為這八個月是革命底八個月。這個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於社會革命黨人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而從新轉向於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唯一澈底的革命力量，是唯一能引導國家達到和平的力量。這個時期底歷史，乃是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爭奪農民，爭奪農民多數的歷史。決定這一鬥爭命運的，是聯合政府時期，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爲繼續戰爭而鬥爭，前線上的六月進攻，兵士死刑律，科爾尼洛夫暴動。

如果從前，在前一時期內，革命底基本問題是要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權，那末現時，在二月革命以後時期中，當沙皇已被推翻，而綿延不斷的戰爭已將國家經濟完全破壞，使農民完全破產時，關於消除戰爭的問題就成爲革命底基本問題了。重心顯然已從純粹國內性質的問題轉移到基本問題，即戰爭問題上了。「結束戰爭」，「擺脫戰爭」——這就是疲困不堪的全國人民，首先是農民所發出的共同呼聲。

可是當時爲要擺脫戰爭，就必須推翻臨時政府，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必須推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政權，因爲當時他們，而且祇有他們，總是拖延戰爭，要把戰爭拖延到「勝利的結局」。當時，除非推翻資產階級，實際上已沒有別的出路可以擺脫戰爭。

這已經是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它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最後一派，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極左派，即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黨拋出政權以外，以便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政權，即蘇維埃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的黨，主張以革命鬥爭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力謀民主和平的黨，即布爾什維克黨，來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都贊助了工人為爭得和平，為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鬥爭。

當時在農民前面沒有別的出路，而且不能有別的出路。

這樣，克倫斯基政府時期就是給與勞動農民羣衆的一個最大的實驗教訓，因為它明白指明了：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政權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之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不過是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約言，而在事實上他們所施行的，還是那個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祇有蘇維埃政權，才是唯一能引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之繼續拖延，祇是更加證實這個教訓正確，催促革命前進，並推動千百萬農民和兵士羣衆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周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之孤立，已成爲確定不移的事實。如果沒有聯合政府時期底實證教訓，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沒有可能。

以上便是促使資產階級革命轉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那些情況。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形成的。

(四)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如果從前，在革命第一個時期，主要問題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後來，在二月革命以後，首要問題是推翻資產階級來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那麼現時在國內戰爭結束

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問題就成為首要問題了。加強和發展已收歸國有的工業；爲此目的而利用國家所調節的商業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繫起來；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以便後來逐漸減少糧食稅定額，而辦到用工業製造品去交換農民生產品；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制，吸收千百萬農民來參加合作制，——這就是列寧爲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而擬定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當前任務。

有些人說：這個任務也許是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所不能勝任的。有些懷疑派甚至說：這個任務簡直是空想的，是無法實行的，因爲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小生產者組成的，因此不可利用他們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底基礎。

但懷疑派是弄錯了，因爲他們沒有注意到這裏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其中主要的情況。

第一。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爲一談。蘇聯農民不能不與西方農民不同，因爲蘇聯農民經歷了三次革命底教訓，他們同無產階級一起，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獲得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而西方農民却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獲得了土地，因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農民既慣於重視他們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並因有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而獲得了自由，便不能不是非常願與無產階級實行經濟合作的力量。

恩格斯曾說：『社會黨奪取政權，已成為最近將來的事情』，『爲要奪得政權，黨就應當首先從城市裏跑到鄉村裏去，而成為在鄉村裏有勢力的黨』（見恩格斯所著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版）。他這一段話是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寫的，而他所指的是西方農民。俄國共產黨人在三次革命中是在這方面做過了巨大的工作，已經在鄉村裏爲自己造成了我們的西方同志所不敢夢想的影響和支柱。——這還須要證明麼？這個情況，不能不根本促進了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實行經濟合作的事業，——這怎麼可以否認呢？

懷疑派硬說小農是與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請聽恩格斯關於西方小農所說的話吧：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極力設法改善小農生活，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共耕制，要是他們決意這樣辦的話；如果他們還不能決意這樣辦，那我們就要設法給予他們儘多的時間，讓他們在他們那一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其所以要這樣來作，不僅是因為我們認定有可能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而且也是爲着黨的直接利益。被我們救全而沒有降落爲無產者，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的農民人數愈多，社會改造也就會愈加迅速和愈加容易實行。如果我們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極限，讓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後一個小農都變成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犧牲品時，才來進行這個改造，那是沒有益處的。我們在這方面爲着農民利益而必須犧牲一些社會公款，這從資本主義經濟底觀點上看來，好像是白費金錢，然而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爲這種物質犧牲，會使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

時能節省大批經費，也許能節省十倍。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對待農民」（見恩格斯所著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版）。

恩格斯說這些話時，是指西方農民而言。可是，他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實行得這樣容易，這樣完全，——這難道不很明白麼？祇有在蘇維埃俄羅斯，才能立刻實行並完全實行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實行爲這點所必要的「物質犧牲」，實行爲這點所必要的「慷慨對待農民」；在俄國，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有利於農民的辦法已經在實行之，——這難道不很明白麼？這個情況也一定要便利並推進蘇維埃國家底經濟建設事業，——這怎麼可以否認呢？

第二。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爲一談。西方農業是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是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發生瓦解和解體是完全自然的。在俄國却不是這樣。我國農業是不能按這樣的道路去發展的，因爲單是有蘇維埃政權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國有化的事實，也就不容許農業按這條道路發展。俄國農業應按另一條道路，即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在農村中發展羣衆合作制並由國家以優待借款來幫助這合作制的道路去發展。列寧在他論合作制的論文中正確指示說：我們俄國的農業應當按新道路去發展，即經過合作社吸收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原則逐漸灌輸於農業，起初灌輸於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灌輸於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去發展。

因有農業合作社工作而在農村中所發生的一些新現象，在這方面是極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農業總社內產生了以農業各部門（如蔗、馬鈴薯、油類等等）為標準的新的巨大的組織，這些組織是有廣大前途的。其中例如蔗業總社包括有許多種蔗農民生產協作社。這個蔗業總社供給農民以種子和生產工具，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所有的蔗類產品，大批銷售於市場，保證農民得以分沾利潤，這樣就是經過農業總社而把農民經濟與國家工業聯繫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照我的意思，這是國家社會主義大生產制中的家庭農業體系。我在這裏說國家社會主義生產中的家庭農業體系，是與資本主義生產制中的家庭工業，例如紡織業部門的家庭工業體系相比擬而言；在資本主義的家庭生產體系下，家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裏領得原料和工具，並把所有一切生產品交給資本家，所以他們事實上是在家庭裏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過是指明我國農業究竟應當按那條道路發展的許多標誌之一。我在此地還不說其他農業部門方面的其他類似的標誌。

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農民是會很願意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破產道路的。

請看列寧關於我國農業發展道路所說的話吧：

「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而且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所鄙視為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這樣來鄙視的合作社，便把完備社會主義社會建

設成功所必需的一切麼？這還不是說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列寧往下講到必須用財政及其他辦法來幫助合作制，認爲合作制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新的民衆組織原則」和新的「社會制度」時說道：

「每個社會制度之產生，都需要有相當階級底財政幫助。不待說，「自由」資本主義之產生，是花費過許多萬萬盧布的代價的。現時我們所應當特別幫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應當認識和具體實行。可是，必須正確瞭解我們對於這種制度的幫助，就是說，要知道我們並不是幫助隨便一種合作社週轉，而只是幫助有真正民衆切實參加的合作社週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三頁）。

所有這些情況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懷疑派是不對的。

就是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爲列寧主義把勞動農民羣衆看作是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

就是說明：執政的無產階級能夠運用而且應當運用這個後備力量，以便把工業和農業聯絡起來，提高社會主義建設，爲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保證過渡於社會主義經濟所絕對必需的那個基礎。

(六) 民族問題

從這個問題目中，我拿出兩個主要問題來講：（一）問題提法，（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一）問題提法。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已發生許多極大的變化。第二國際時期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絕對不是一回事。不僅就它們的範圍來說，而且就它們的內部性質來說，都是大不相同的。

從前，通常都把民族問題限制在一些主要祇是關係於「文明」民族的問題底狹隘範圍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以及歐洲其他某些民族——這就是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所關懷其命運的一些主權不全的民族。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殘酷民族壓迫的若干萬萬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却通常都是落在他們的視線以外。他們總是不敢把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拿來相提並論。兩三個空空洞洞，不痛不癢，竭力躲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案——這就是第二國際底活動家所能藉以自誇的一切。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兩重性和半途性，要算是已被取消了。列寧主義揭破了這種極不合理的現象，而打破了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歐洲人和亞洲人，帝國主義底「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之間的牆壁，因此便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來了。於是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了依賴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脫帝國主義桎梏的世界問題。

從前，通常都把民族自決原則曲解，把它縮小爲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底某些首領甚至把民

族自決權變成文化自治權，即被壓迫民族設立自己文化機關的權利，而讓全部政權仍舊操在統治民族手中。結果便使民族自決思想有從反對兼併政策的工具變成辯護兼併政策的工具的危險。現在，這種糊塗觀念，要算是已被克服了。列寧主義擴大了民族自決權這個概念，而將其解釋爲依賴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完全分立的權利，各民族獨立國家生存的權利。於是就完全排除了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爲民族自治權來替兼併政策辯護的可能。於是，民族自決原則就由欺騙羣衆的工具——在帝國主義大戰時，它無疑是被社會沙文主義者用做這種工具的，——而變成了揭破一切帝國主義貪慾和揭破一切沙文主義鬼蜮伎倆的工具，變成了用國際主義精神給予羣衆政治教育的工具。

從前，通常都把被壓迫民族問題看作是純粹法權的問題。冠冕堂皇地宣佈「民族平權」，發表無數種鼓吹「民族平等」的宣言，——這就是第二國際黨覺得心滿意足的事情，它們抹煞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批民族（少數）靠剝削別一批民族而生存時，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法權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把民族問題從堂皇宣言的天空拿到了地上來，而指出：如果無產階級黨不直接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鬥爭，那末「民族平等」的宣言就不過是空洞的虛偽的宣言。於是被壓迫民族問題，就成了援助、幫助、真正和經常幫助被壓迫民族爲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真正民族平等，爭取自己國家獨立生存而鬥爭的問題。

從前，通常都用改良主義觀點來看待民族問題，把它當作是一個單獨的孤立的問題，當作是與資

本政權，推翻帝國主義，實現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總問題無關的問題。人們當時都是不說自明地認定，歐洲無產階級是不必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聯合而能獲得勝利的，以爲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是儘可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大道，不必進行反帝革命鬥爭，而能於無形之中，「自流地」得到解決的。現在，這種反對革命的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已經證明，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又已經證實：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繫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革命必須與殖民地和依賴國反帝解放運動結成革命的聯盟，才能得到勝利。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中的一部分，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中的一部分。

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革命解放運動所含有的革命能力，是不是已經用完了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不是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能力，是不是可以把握依賴國和殖民地國家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革命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革命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爲被壓迫國民族解放運動含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運用這些革命能力來力謀推翻共同的敵人，來力謀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底機密，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都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點的結論。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必須結助，必須堅決地積極地幫助各被壓迫民族和依賴民族底民族解放運動。

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一切個別具體情形下，對於任何的民族運

動都要加以幫助。這只是說要幫助趨向於削弱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而不是趨向於鞏固和保持帝國主義的那種民族運動。有時候，個別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也許與無產階級運動發展底利益相衝突。在這種條件下，當然是談不到什麼幫助的。民族權利問題並不是什麼孤立的自滿自足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這個總問題中的一部分，它服從這個總問題，並且要從這個總問題觀點上去觀察它。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擁護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底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爲什麼呢？因爲當時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是「反動民族」，是在歐洲的「俄國前哨」，是專制制度底前哨，而當時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却是爲反對專制制度而奮鬥的「革命民族」。因爲在當時幫助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就是間接幫助歐洲革命運動死敵的沙皇制度。

列寧說：

「民主運動底個別要求，包括民族自決在內，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而是一般民主主義（現在是一般社會主義）世界運動中的一部分。在個別的具体情形下，部分也許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必須拋棄這一部分」（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至二五八頁）。

關於個別民族運動問題，關於這些運動底可能反動性問題，——當然，如果不是從形式觀點上，不是從抽象法權觀點上，而是從革命運動底利益觀點上來具體估量個別民族運動，——就是如此。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也要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無疑具有的革命性，也正與

某些個別民族運動底可能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殊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間，民族

運動底革命性並不一定要以無產階級份子參加這運動爲前提，並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革命政綱或共和政綱爲前提，並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民主基礎爲前提。阿富汗國王爲阿富汗獨立而進行的

鬥爭，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雖然阿富汗國王及其戰友是抱有君主制的觀點，因爲這個鬥爭能削弱、瓦解和掘毀帝國主義；然而例如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倫諾德里和謝德曼，切爾諾夫和唐恩，

亨德孫和克萊因斯這些「激烈的」民主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革命家」與共和派，在帝國主義

大戰時所進行的鬥爭，却是反動的鬥爭，因爲這個鬥爭結果是粉飾並鞏固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取得勝利。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爲埃及獨立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客觀上也是

革命的鬥爭，雖然埃及民族運動底首領是資產階級出身，具有資產階級身分，並反對社會主義的；然而，英國工黨政府爲保持埃及及依賴地位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却是反動的鬥爭，雖然

這政府底開員是無產階級出身，具有無產階級身分，並「贊成」社會主義的。更不必說其他較大的殖民地國家和依賴國家，如印度和中國底民族運動了，這些國家在力爭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

驟，即令這一步驟違背形式民主制要求，也還是對於帝國主義的一種非常嚴重的打擊，即毫無疑義是革命的步驟。

列寧說得對：在估計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時，不要以形式民主爲標準，而要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爲標準，就是說，「不要單獨看待，而要以世界範圍爲標準」（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頁）。

(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在解決民族問題時，是從下列原理出發的：

(1) 世界已分成兩個營壘：一個營壘是為數極少的文明民族，佔有財政資本並剝削地球上絕大多數居民；另一個營壘是組成這絕大多數居民的殖民地和依賴國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

(2) 被財政資本所壓迫所剝削的殖民地和依賴國，是帝國主義最巨大的後備力量和最嚴重的實力來源；

(3) 殖民地和依賴國被壓迫民族所進行的反帝革命鬥爭，是他們擺脫壓迫和剝削的唯一道路；

(4) 最重要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5) 發展國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利益，要求把這兩種革命運動聯合為一條反對共同敵人帝國主義的共同戰線；

(6) 如果不建立並鞏固共同革命戰線，那末發展國中的工人階級就不能勝利，而被壓迫民族就不能從帝國主義桎梏下解放出來；

(7) 如果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不直接而堅決地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來反對「祖國」帝國主義，那就沒有可能建立共同革命戰線，因為「壓迫他族人民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馬克思)；

(8) 這種援助就是堅持、擁護和實現這樣一個口號：民族有分立權，民族有獨立的國家存在權；

(9) 不實行這個口號，便不能保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勝利物質基礎的統一世界經濟中的聯合與合作；

(10) 這種聯合祇能是自願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相互友愛基礎上產生的。

由此就有民族問題上的兩方面，即兩個趨向：一個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殖民地基礎上產生的力求在政治上擺脫帝國主義束縛而組織獨立民族國家的趨向；另一個是因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形成而產生的力求使各民族在經濟上彼此接近的趨向。

列寧說：

「在資本主義底發展過程中，可以看見民族問題方面的兩個歷史趨向。第一個趨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之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之發生，民族國家之建立。第二個趨向就是民族間各種聯繫之發展和頻繁，民族界限之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底國際統一之成立。這兩個趨向都是資本主義底世界規律。第一個趨向盛行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第二個趨向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而走向於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時的特點」(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三九至一四〇頁)。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個趨向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若不剝削殖民地，若不用強力把殖民地束縛在「統一」的整體範圍內，便不能生存；因為帝國主義祇有靠兼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才

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而如果不實行兼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那它就根本不成其爲帝國主義。

對於共產主義，却恰巧相反，這兩個趨向不過是一件事情底兩方面，就是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這件事情底兩方面，因爲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祇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能實現；各民族自願聯合的建立，祇有經過使殖民地離開「統一的」帝國主義「整體」而分立的道路，祇有經過使殖民地變爲獨立國家的道路才能達到。

因此，必須堅強果決而毫不間斷地反對各統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國）「社會主義者」底大國沙文主義思想，他們不願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不願意幫助「他們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爲擺脫壓迫而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以真正國際主義的精神，接近依賴國和殖民地勞動羣衆的精神，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的工人階級。如果俄國無產階級沒有獲得舊俄帝國內各被壓迫民族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國革命就不會勝利，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也就不會被擊破。可是，爲要獲得這些民族同情和援助，俄國無產階級當時應該首先打破俄國帝國主義鎖鍊，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壓迫。不然，就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就不能樹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不能創造那個絕妙的民族合作的組織，即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組織，它是各民族將來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聯合的實際榜樣。

因此，必須反對各被壓迫國社會黨人底民族閉關主義、狹隘觀點和孤獨思想，他們不願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狹隘眼界，不瞭解本國解放運動和統治國無產階級運動間的聯繫。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保持被壓迫國無產階級底獨立政策，便不能保持它和統治國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去進行推翻共同敵人的鬥爭，進行推翻帝國主義的鬥爭；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實現國際主義。

這就是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和被壓迫民族裏勞動羣衆的道路。請看列寧說明共產主義運動用國際主義精神教育工人的這種雙方面工作的言論吧：

「這種教育工作：在壓迫的強大民族裏與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裏，在兼併的民族裏和被兼併的民族裏，能具體相同麼？」

顯然是不可能的。要達到所有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進而溶合爲一的共同目的，顯然是要走各不相同的具體道路，可以說是異道同歸。如果壓迫的、兼併的強大民族中的社會民主黨人僅僅一般鼓吹民族溶合，而同時却忘記了，即令是一分鐘忘記了「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佐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張與小民族溶合（用兼併手段），如尼古拉第二主張與加里西亞「溶合」，威廉第二主張與比利時「溶合」等等，——那麼這樣的社會民主黨人在理論上就是可笑的學理主義者，在實踐上就是帝國主義底幫兇。

在壓迫國家裏，工人底國際主義教育重心，是要工人宣傳並堅持被壓迫國家底分立自由。不然，就不會有國際主義。壓迫民族裏的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如果不作這種宣傳，那末我們就可以，而且應該鄙視他，視之爲帝國主義者，視之爲惡棍。這是一個無條件的要求，那怕在社會主義未成功以前，分立底機會祇有千分之一是可能和「可以實現的」……

反之，小民族裏的社會民主黨人却應當以我們這個總公式——各民族「自願聯合」——末尾二字爲其鼓動工作底重心。他既可贊成本民族底政治獨立，又可贊成本民族加入鄰近某個國家，而並不違反他爲國際主義者底義務。可是，他在任何場合都應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主義和孤獨思想，而主張顧全整體和總體，主張使部分利益服從全體利益。

對問題未加思索的人，也許以爲壓迫民族裏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分立自由」，而被壓迫民族裏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聯合自由」，是「有矛盾」的。可是，祇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知道，要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溶合這一目的，除實行這個原則以外，是沒有其他道路，而且不能有其他道路可走的」（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六一至二六二頁）。

（七）戰略與策略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六個問題來講：（一）戰略和策略是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科學，（二）革命階段與戰略，（三）運動來潮退潮與策略，（四）戰略領導，（五）策略領導，（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

（一）戰略和策略是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科學。第二國際統治時期，主要是在多少和平發展環境中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的時期。這是把國會活動當作階級鬥爭主要形式的時期。當時關

於偉大階級衝突問題，關於準備無產階級去作革命搏戰問題，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問題，似乎都是不迫切的問題。當時的任務，祇是歸結於利用一切合法發展道路來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適應着當時無產階級處於在野黨地位，並且似乎應當始終處於在野黨地位的那種條件去利用國會活動。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時期和在這樣瞭解無產階級任務的情況下，既不能有完整的戰略，也不能有籌劃週到的策略。當時，祇有關於策略和戰略的一些片斷的零碎的觀念，但策略和戰略是沒有的。

第二國際滔天的罪惡，並不在於它實行了利用國會鬥爭形式的策略，而是在於它誇大了這種鬥爭形式底意義，差不多把這種鬥爭形式看作是唯一的，而一到公開的革命搏戰時期，當國會外的鬥爭形式問題已成為首要的迫切問題時，第二國際各黨就退避了新的任務，不去接受這些任務。

祇有到下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公開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當推翻資產階級的問題已成為直接的實踐問題時，當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問題（戰略）已成為最迫切問題之一時，當一切鬥爭和組織形式——國會的形式和國會外的形式（策略）——都已經完全確切表現出來時，祇有在這個時期，才能定出無產階級鬥爭底完整的戰略和籌劃週到的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被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活埋了的那些關於戰略和策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這個時期被列寧發掘出來而重見天日的。但列寧並沒有以恢復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個別策略原理為限。他還向前發展了這些原理，補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將這一切統一為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規則和基本準則的體系。列寧所著做什

麼？兩個策略，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及幼稚病等書，毫無疑義都是加進到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馬克思主義底革命武庫中去的最寶貴的貢獻。列寧主義底戰略和策略，乃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科學。

(二)革命階段與戰略。戰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革命某一階段上的主要打擊方向，製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後備力量）底相當佈置計劃，在革命這一階段整個過程中爲實現這個計劃而奮鬥。

我們的革命已經過兩個階段，而自十月革命以後，則已進入第三個階段。戰略也與此適應而改變過。

第一個階段。這階段包括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目標是推翻沙皇制度，完全消滅中世紀制度餘孽。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力量是農民。基本打擊底方向是使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孤立，這個資產階級想抓得農民並想用與沙皇制度妥協的方法來消滅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癱瘓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第二個階段。這階段包括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目標是在俄國推翻帝國主義，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力量是貧農。鄰國無產階級是意料中的後備力量。拖延的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危機是順利的時機。基本打擊底方向是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陷於孤立，這個民主派想抓得勞動農民羣衆並想用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方法來結束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無產階級與貧農聯盟。「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癱瘓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同上)。

第三個階段。這階段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開始的。目標是在一國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運用這專政作為支撐點，以便在世界各國推翻帝國主義。革命已經超出一國範圍，世界革命時代已經開始。革命底基本力量是一國無產階級專政，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主要的後備力量是各發展國內的半無產者和小農羣衆，各殖民地 and 依賴國內的解放運動。基本打擊底方向是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孤立，使第二國際各黨孤立，這些黨是與帝國主義妥協政策底基本支柱。力量底佈置計劃是無產階級革命與各殖民地及依賴國解放運動聯盟。

戰略是關係於革命底基本力量及其後備力量的。它因革命由一個階段轉入另一階段而變更，而在某一階段整個時期內，大體上是不變更的。

(三)運動來潮退潮與策略。策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運動來潮或退潮，革命高漲或低落這個較短時期內的行動路線，就是為實現這個路線而鬥爭，其方法就是以新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來代替舊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以新的口號來代替舊的口號，把這些形式配合起來等等。戰略底目標是要取得——譬如說——反沙皇制度戰爭或反資產階級戰爭底勝利，澈底完成反沙皇制度鬥爭或反資產階級鬥爭，而策略底目標却没有這樣重大，因為策略並不是要爭得整個戰爭底勝利，而是要爭

得某些戰役底勝利，某些戰鬥底勝利，有成效地實行某些適合於那個革命高漲或低落時期具體環境的運動與發動。策略是戰略中的一部分，是服從於戰略的，是服務於戰略的。

策略是依着來潮退潮而變更的，在革命第一個階段時期（由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戰略計劃始終沒有變更，而策略在這個時期內却變更過幾次。在由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時期，黨底策略是進攻的，因為當時有着革命來潮，運動是向上升的，所以策略也應當根據這個事實來決定。同時，與此適應的鬥爭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適合於革命來潮底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罷工，政治示威，總政治罷工，抵制杜馬，武裝起義和革命戰鬥口號，就是這個時期內互相交替的鬥爭形式。當時，組織形式也因鬥爭形式變更而變更了。工廠委員會，農民革命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蘇維埃和較為公開的工人黨，就是這個時期內的組織形式。

在由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時期內，黨不得不轉而採取退却策略，因為當時是革命運動低落，是有着革命退潮，所以策略也就不能不顧到這個事實。同時，鬥爭形式以及組織形式也與此適應而變更了。不是抵制杜馬，而是參加杜馬；不是杜馬外的公開的革命活動，而是杜馬內的活動和杜馬內的工作；不是總政治罷工，而是局部經濟罷工，或是簡直不作聲息。當然，黨在這個時期內是隱秘起來，而羣衆的革命組織也就由文化教育組織、合作社、保險社以及其他合法組織所代替了。關於革命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也要這樣說，在這兩個階段中，策略變更過幾十次，而戰略計劃却始終沒有變更。

策略是關係於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的，是關係於這些形式底更代和配合的。策略在

革命某一階段上可以依革命來潮或退潮，依高漲或低落為轉移而變更幾次。

(四) 戰略領導。革命底後備力量有兩種：

直接的：(1) 本國的農民和一般過渡階層，(2) 鄰國的無產階級，(3) 殖民地和依賴國內的革命運動，(4) 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品與成果，而無產階級為收買強有力的敵人並取得暫息時間起見，是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實力優勢的條件下，暫時放棄一部分勝利品和成果的；

間接的：(1) 本國各個非無產者階級間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與衝突是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去削弱敵人並加強自己後備力量的，(2) 各個與無產階級國家敵對的資產階級國家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大戰），這些矛盾、衝突和戰爭是無產階級在進攻時或在被迫退却機動時可以利用的。

關於第一種後備力量，用不着多說，因為它們的意義是大家都知道的。至於第二種後備力量，因其意義並不時常都很明顯，所以必須指出：有時候，它們對於革命進程是有頭等的意義。例如在第一次革命時和第一次革命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社會革命黨人）和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人）間所發生的衝突，其巨大意義是未必可以否認的，因為這種衝突在使農民擺脫資產階級影響這件事情上，毫無疑義是起了相當的作用。在十月革命時期，各基本帝國主義者集團間拚命戰爭的事實所有的巨大意義，更是不可否認的，因為當時各國帝國主義者忙於他們相互間的戰爭，沒有可能集中力量來反對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而無產階級却正因此而有可能來直接實行組織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政權，並準備撲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現在，當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日益加

深，當它們彼此間的新戰爭成爲必不可免的事情的時候，這種後備力量對於無產階級，一定會有日益重大的意義。

戰略領導底任務，就是要正確運用這一切後備力量來達到革命在其某一發展階段上的基本目標。怎樣才算是正確運用後備力量呢？

就是要執行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其中主要的便是：

第一。當革命時機已經成熟時，當進攻在以全力進行時，當武裝起義已急待發動時，當調動後備力量去緊緊跟上先鋒隊已成爲決定成功的條件時，——在這個決定勝負的關頭，應當把革命底主要力量集中在敵人最易受傷處。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這時期內的戰略，可算是表明這樣運用後備力量的實例。毫無疑義的，在這時期內，敵人最易受傷處就是戰爭。毫無疑義的，黨正是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把極廣大民衆集合到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周圍。黨在這時期內的戰略，就是以舉行遊行示威來訓練先鋒隊去作街道上的發動，同時在後方經過蘇維埃和在前線上經過兵士委員會去調動後備力量，使其緊緊跟上先鋒隊。革命底結局表明了：當時後備力量是運用得正確的。

列寧轉述馬克思與恩格斯關於武裝起義的著名原理，而把戰略上運用革命力量的這個條件說明如下：

「無論何時都不要把武裝起義當作兒戲，而是要在開始起義時就切實知道必須進行到底。必須在決定勝負的關頭，在決定勝負的地點，集合大大超過敵人的力量，否則那更有準備和更有組織的敵人就會把武裝起義者消滅下去。武裝起義既已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來幹，

並且一定和絕對要實行進攻。「防守是武裝起義底死路」。必須努力抓得良好時機，趁着敵人軍隊還是分散時，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猛擊。每天（如果是說一個城市，就可說每一小時）都必須力謀獲得即令是小小的勝利，以便無論如何都維持「精神上的優勢」（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九至三二〇頁）。

第二。要估計到危機已達到頂點，先鋒隊已具有戰鬥到底的決心，後備力量已具有贊助先鋒隊的決心，敵人隊伍內的情緒已極端混亂的情形而選定施行致命打擊的時機，開始武裝起義的時機。

列寧說：

那時，決戰時機可算是完全成熟了，就是說，如果「一切敵視我們的階級勢力已經充分錯亂，他們彼此間已充分突衝起來，已因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充分疲竭」，如果「一切猶豫動搖而不穩定的中間份子，即那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在人民面前充分揭露自己，已因實踐方面的破產而充分丟醜」，如果「在無產階級中，羣衆贊助進行最堅決最奮勇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那種情緒，已經開始並很強大地高漲起來。那時，革命時機就成熟了；那時，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正確估計到以上簡述的一切條件，並正確選定時機，那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九頁）。

十月武裝起義之舉行，可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違背這個條件，就會弄出危險的錯誤，即所謂「失掉速度」，就是說，黨就會落在運動進程後

面，或者過於跑到前面，因而就會造成失敗的危險。有一部分同志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企圖由逮捕民主會議代表來開始武裝起義，要算是這樣「失掉速度」的例子，要算是不會選擇武裝起義時機的例子，因為當時在蘇維埃內部還表現着動搖情緒，前線還在猶豫不決，後備力量還沒有被拉來緊緊跟上先鋒隊。

第三。要勇往直前地實行既定的方針，不顧所有一切橫在前進途中的阻難和障礙，其所以必須如此作，是要使先鋒隊不致失去鬥爭底基本目標，使羣衆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這個目標前進並努力團結在先鋒隊周圍。違背這個條件，就要弄出莫大的錯誤，即海員們所熱悉的所謂「失掉方針」。我們黨在緊接民主會議以後所採取的錯誤步驟，——黨當時決定參加預備國會，——要算是這樣「失掉方針」的例子。當時，黨似乎是忘記了預備國會是資產階級企圖把俄國從蘇維埃道路轉移到資產階級國會制度道路上去的手腕，黨參加這種機關，就會紊亂全部計劃，就會使那些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作革命鬥爭的工農迷失道路。這個錯誤是因布爾什維克退出預備國會便被糾正了的。

第四。當敵人力量強大時，當退却必不可免時，當受敵人挑撥迎戰是顯然於己不利時，當在那時力量對比下祇有實行退却才能使先鋒隊免受打擊並保存其後備力量時，就必須隨機應變地運用後備力量來實行正確的退却。

列寧說：

「革命黨應當補習。它們已學習過怎樣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了學會怎樣進攻而外，

還必須學會怎樣正確退却。必須瞭解，——而且革命階級已在根據本身的沉痛經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是得不到勝利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七頁）。

這種戰略底目標就是要贏得時間，瓦解敵人，養精蓄銳，以便然後轉為進攻。

締結布列斯特和約，可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這和約使黨有可能贏得時間，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瓦解敵人勢力，為自己保留着農民，養精蓄銳來準備向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進攻。

列寧當時說道：

「我們締結單獨和約，便能在現時可能的最大限度內從彼此敵對的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下擺脫出來，利用它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是阻礙它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的，——而取得相當的行動自由時間來繼續並鞏固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九八頁）。

列寧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三年以後說道：

「現在，就是最蠢的傻子都看得見：『布列斯特和約』是加強了我們自己而分散了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一種讓步」（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七頁）。

以上便是保證有正確戰略領導的主要條件。

（五）策略領導。策略領導是戰略領導底一部分，它是服從戰略領導底任務與要求的。策略領導底任務，就是要精通無產階級底一切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並保證這些形式底正確運用，以取得

在一定勢力對比下爲準備戰略勝利所必要的最高限度的效果。

怎樣才算是正確運用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呢？

就是要執行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其中主要的便是：

第一。要把這樣一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提到第一位，這種形式因爲最適合於當時運動來潮或運動退潮底條件，所以能便利和保證把羣衆引到革命陣地上，把千百萬羣衆引到革命戰線上，把這些羣衆佈置在革命戰線上。

問題並不是要便先鋒隊覺悟到保存舊制度之不可能和推翻這個舊制度之不可避免。問題是要使羣衆，使千百萬羣衆瞭解這種不可避免性並表示出贊助先鋒隊的決心。可是，羣衆只有經過本身經驗才能瞭解這一點。任務是要使千百萬羣衆有可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瞭解推翻舊政權之不可避免，並提出使羣衆易於根據經驗來察知革命口號正確的那種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

如果黨在當時沒有決定參加杜馬，如果它沒有決定集中力量去進行杜馬工作，並根據這工作去發展鬥爭，使羣衆易於根據本身經驗察知杜馬之無用，立憲民主黨人約言之虛偽，與沙皇制度妥協之不可能，農民與工人階級聯盟之必不可免，——如果當時沒有決定這樣做，那末先鋒隊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它與羣衆的聯繫。如果沒有羣衆在杜馬時期的經驗，那末立憲民主黨人就不會被揭破，而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會是不可能的了。

召回主義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它能使先鋒隊脫離自己千百萬人的後備力量。

如果無產階級當時跟着一九一七年四月號召它舉行武裝起義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走，那末黨就會

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它在廣大農民和兵士羣衆中的影響，因為當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沒有揭破自己是戰爭和帝國主義底擁護者，因為當時羣衆還沒能根據本身經驗察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關於和平、土地與自由的言辭之虛偽性。如果沒有羣衆在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的經驗，那末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就不會陷於孤立，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是不可能的了。因此，「耐心解釋」各小資產階級黨底錯誤並在蘇維埃內部進行公開鬥爭的策略，是當時唯一正確的策略。左派共產主義者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它能把黨由無產階級革命底領袖變成一小羣徒託空言而毫無根基的陰謀家。

列寧說：

「單靠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站在直接贊助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至少是站在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的立場上時，單叫先鋒隊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了。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個立場，僅靠宣傳，僅靠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本身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底基本定律，這個定律現時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德國都已十分有力而彰明較著地證實了。不僅俄國文化落後，往往不識字的羣衆，就連德國文化程度頗高，個個識字的羣衆，也必須親身閱歷一番，感覺到第二國際武士們的政府真是完全懦弱無能，完全沒有氣節，完全沒有辦法，完全向資產階級逢迎獻媚，完全卑鄙齷齪，感覺到如果不成立無產階級專政，那就必不可免會有極反動份子（俄國的科爾尼洛夫，德國的賈卜及其同類）的專

政，然後才堅決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八頁）。

第二。要在每個一定時機內找到事變過程鍊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一抓住這個環節，便能握住整個鍊條而準備好達到戰略成功所必要的條件。

問題是要從黨面前許多任務中間挑出一個當前任務，解決這個任務是當時工作底中心點，實行這個任務，就能保證順利解決其他一切當前任務。

我們可以用兩個例子來表明這個原理底意義：一個例子可從很久以前時期（黨形成時期）引來，另一個例子則可從我們所最切近的現今時期（新經濟政策時期）引來。

在黨形成時期，當時無數小組和組織還沒有彼此聯繫起來，手工業方式和小組習氣自上至下地腐蝕着黨；當時思想上的分離是黨內生活底特徵，——在這時期，整個鍊條中的基本環節和黨面前各項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創辦全俄秘密報。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那種條件下，祇有經過全俄秘密報，才能造成黨內意見一致的中堅，它能把無數小組和組織統一起來，準備思想統一和策略統一底條件，並這樣來奠定組成真正黨的基礎。

在由戰爭過渡到經濟建設時期，當時工業正處在萬分破壞狀態中，農業正苦於城市產品不足；當時國家工業與農民經濟的結合，已成了順利社會主義建設底基本條件，——在這時期，事變過程鍊條中的基本環節，所有一切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發展商業。爲什麼呢？因爲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工業和農民經濟祇有經過商業才可結合起來；因爲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有生產而沒有銷路，便是致工業於死命；因爲祇有藉發展商業去擴展銷路，才可擴展工業；因爲祇有在商業方面鞏固

以後，只有把握住商業以後，只有把握住這個環節以後，才可希望把工業與農民市場結合起來，並順利解決其他的當前任務，以便造成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

列寧說：

「僅僅一般地做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共產主義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裏找出鍊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這個環節是爲了把握住整個鍊條並穩穩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所必須用全力抓住的」：「目前：這樣的環節就是要由國家對國內商業實行正確的調節（指導），來振興國內商業。商業便是在歷史事變鍊條中，即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各個過渡形式中的「必須用全力抓住的環節」：」（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二頁）。

以上便是保證有正確策略領導的主要條件。

（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革命的策略與改良主義的策略有什麼區別呢？

有些人以爲列寧主義反對一切改良，反對一切通融和一切妥協。這種見解完全不對。布爾什維克十分知道：在某種意義上說來，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種條件下，一般改良以及通融和妥協，是必要而且有益的。

列寧說：

「爲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最頑強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事先拒絕採用機動手段，拒絕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

盾（那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與各種可能的同盟者（那怕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了極點麼？這豈不是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艱難險阻，未經考察，未通人跡的高山時，却預先拒絕有時要迂迴前進，有時要折轉回來，放棄已選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各樣的方向麼？」（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一〇頁）。

問題顯然不在於改良或妥協和通融，而是在於怎樣使用改良和妥協。

由改良派看來，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過是用作談話資料，藉以轉移視線的小事情罷了。所以改良主義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條件下，必然要變為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手段，瓦解革命的手段。

由革命家看來，却恰巧相反，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家看來，改良是革命底副產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條件下，自然要變為瓦解資產階級政權的手段，鞏固革命的手段，向前發展革命運動的支撐點。

革命家接受改良，是要利用它為運環鉤來把合法的工作與不合法的工作聯繫起來，是要利用它為掩飾物來加強不合法的工作，這種工作底目標就是要用革命精神準備羣衆去推翻資產階級。

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與妥協辦法的實質。

反之，改良派接受改良，却是為要拒絕任何不合法的工作，破壞那準備羣衆去作革命的事業，而安息於「恩賜」改良底福蔭之下。

這就是改良主義策略底實質。

關於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改良和妥協問題，就是這樣。

可是，在帝國主義被推翻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情形就有些改變了。在某種條件下，在某種環境中，無產階級政權也許不得不暫時放棄用革命手段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而採取逐漸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採用列寧在論金子底作用這篇著名論文裏所說的那條「改良主義道路」，採取迂迴行進的道路，採取改良和向非無產者階級讓步的道路，以便瓦解這些階級，給革命以暫時時間，養精蓄銳和準備實行新進攻的條件。不可否認：這種道路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改良主義道路。只是應當記着，這裏有一個根本特點，即在這種情形下的改良，是從無產階級政權方面出發的，它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它給無產階級政權以必要的暫息時間，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無產者階級。於是，在這種條件下，改良就變成與改良相反的東西。

無產階級政權之所以能夠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革命在前一時期內的發展規模已很廣大，而開展了很廣闊的場所，使得可以實行退却，用暫時退却的策略，用迂迴行進的策略來代替進攻的策略。

這樣，從前，在資產階級政權下，改良是革命底副產品，而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改良底來源却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勝利品，即由這些勝利品所構成而為無產階級所支配的後備力量。

列寧說：

「祇有馬克思主義，才確切地正確地決定了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但馬克思當時只能從一方面，即是只能在無產階級甚至在一個國家中都還沒有獲得多少穩固、多少長久的初次勝利的

環境裏看見這種關係。在這樣的環境裏，正確關係底基礎，就是把改良看成無產階級所作革命階級鬥爭底副產品：當無產階級即令只是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時，於是在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上便有一種新東西出現了。在原則上，事情仍如以前一樣，但在形式上却已有一個爲馬克思本人所不能預察到的變化；可是這個變化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哲學與政治觀點，才能瞭解的：在獲得勝利之後，對於獲得了勝利的國家說來，當實力已極度緊張地運用過而弄得顯然的：不夠去用革命手段實行這種或那種過渡時，它們（即指改良。——斯大林註）雖在國際範圍內仍舊是「副產品」，還是爲取得暫息時間所必要的和理所當然的手段。勝利給予了很多的「後備力量」，使我們甚至在被迫退却時，也有所憑藉而支持下去，——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都有所憑藉而支持下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四至八五頁）。

（八）黨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多少是和乎發展的時期，第二國際各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國會的鬥爭形式，算是基本的鬥爭形式，——在這種條件下，黨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它後來在公開革命戰鬥條件下所具有的那種嚴重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反對他人攻擊第二國際而替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各黨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所以它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就表明自己無力採取什麼嚴重辦法。這是完全對的。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

明：第二國際各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是不適用的，它們並不是無產階級底戰鬥黨，不是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黨，而是遷就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是因此，所以在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並不是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黨在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役者。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下，在這樣的黨領導下，當然是談不到什麼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可是，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是階級公開衝突時期，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而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種種新的任務：要按新的革命的軌範去改造全部黨工作，要用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教育工人，要準備和提上後備力量，要與隣國無產者聯盟，要與殖民地 and 依賴國解放運動建立堅固的聯繫，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以為這些新任務可用那些在國會制度和和平條件下教育出來的老舊社會民主黨力量來解決，那就是自陷於絕望的境地，自陷於不可避免的失敗了。担負有這樣的任務而以老舊的黨為領導，那就會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境地。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情形的。

因此，就必需有新的黨，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很勇敢，足以引導無產者去爭取政權；這個黨要很有經驗，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這個黨要很機敏，足以繞過所有一切橫在前途中的障礙。

沒有這樣的黨，便根本不要想去推翻帝國主義，不要想去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底黨。

這個新的黨有什麼特點呢？

(一)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黨首先就應當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黨應當包含工人階級所有一切優秀份子，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性，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大無畏的忠實性。可是，它要成為真正先進的部隊，便應當用革命理論，用運動規律底知識，用革命規律底知識把自己武裝起來。沒有這一點，它便不能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便不能引導無產階級。如果黨只限於登記工人階級羣衆底日常情緒和思想，如果它跟在自發運動底尾巴後面走，如果它不善於克服自發運動底頑固性和政治冷淡性，如果它不善於超出於無產階級底片刻利益以上，如果它不善於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水準上來，那它就不能成為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頭前，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應當跟在自發運動底尾巴後面走。第二國際各黨是鼓吹「尾巴主義」的，它們是資產階級政策底傳達者，而這政策是要把無產階級變成爲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部隊觀點上，並能夠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水準上的黨，才能使工人階級離開工聯主義的道路，而將它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工人階級鬥爭底困難，說到鬥爭環境底複雜，說到戰略與策略，說到後備力量與隨機應變，說到進攻與退却。這些條件底複雜程度，與戰爭條件比較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羣衆以正確方針呢？無論那一個作戰的軍隊，若不甘願遭受失敗，便非有經驗豐富的司令部不可。無產階級如果不願聽憑可咒的敵人去宰割，就更非有

這樣的司令部不可，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可是這個司令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能夠成爲這樣的司令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就等於軍隊沒有司令部。黨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司令部。

可是，黨不能只是先進部隊而已。同時它應當是本階級底部隊，即本階級中的一部分，它應當與本階級有根深蒂固的聯繫。當階級還沒有消滅時，當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來補充時，當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整個升到先進部隊水準時，先進部隊與工人階級其餘羣衆間的區別，黨員與非黨員間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個區別變成了隔離，如果黨閉關自守而與非黨羣衆脫離，那末黨就不成其爲黨了。如果黨不與非黨羣衆發生聯繫，如果黨與非黨羣衆沒有聯絡，如果這些羣衆不接受它的領導，如果黨在羣衆中沒有精神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黨就不能領導階級。不久以前，我們黨從工人中接收了二十萬新黨員。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情況，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走進黨來，不如說是由所有其餘的非黨員羣衆送進黨來的，這些非黨羣衆積極參加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而且非有他們的贊同，一般就沒有接收過新黨員。這件事實說明：廣大的非黨工人羣衆是把我們黨看作是他們自己的黨，看作是親近親切的黨，他們認爲黨之發展和鞏固是與他們切身利益攸關的，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信託於黨底領導。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種不可捉摸的精神上的線索把黨與非黨羣衆聯結起來，那末黨就不能成爲本階級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黨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

列寧說：

「我們是階級底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甚至完全是整個

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領導下行動，都應當儘量密切地接近於我們黨；可是，如果以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是整個階級都能升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即自己的社會黨底覺悟程度與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義」了。還沒有過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黨人懷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職工組織（較為原始，比較容易為落後階層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是整個工人階級。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它的一切羣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責任是要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水準，那就只是欺騙自己，故意漠視我們的巨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了」（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至二〇六頁）。

（二）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如果它想真正領導本階級底鬥爭，它還應當是本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黨底任務非常偉大而繁雜。黨應當在非常困難的國內國外發展條件下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它應當在環境要求進攻時引導無產階級去進攻；它應當在環境要求退却時使無產階級避開敵底打擊；它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羣衆灌輸鬥爭中的紀律精神和計劃精神，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只有當它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底體現者時，只有當它自己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時，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條件，便根本談不到黨對於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真正領導。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是在列寧所提出的我們黨章第一項著名條文中就規定了的，在這個條文中把黨看作是組織底總和，而把黨員看作是黨內某一組織底成員。孟什維克還在一九

○三年就反對這個條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入黨的「制度」，要求把黨員「稱號」散佈於每個「大學教授」和「中學生」，每個「同情者」和「罷工者」，即每一個給黨以某種援助，但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任何一個黨組織的人。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新奇「制度」在我們黨內鞏固了，那末結果一定會使黨內充滿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一定會把黨變成一個界限模糊，沒有定形，組織渙散而沉沒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東西，抹煞黨與階級中間的界線，拋棄黨應把無組織羣衆提高到先進部隊水準的任務。不待說，在這樣的機會主義「制度」下，我們黨是不能夠在我們革命進程中實現其爲工人階級底組織中堅作用的。

列寧說：

「從馬爾托夫底觀點看來，黨底界線還是極不確定的，因爲「每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爲黨員」。試問這種散漫性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是使「名稱」廣濶散佈而已。它的害處就是造成一種把黨與階級混爲一談的破壞組織的思想」（同上，第二一一頁）。

可是，黨並不僅是黨內各個組織底總和。同時，黨還是這些組織底統一體系，是這些組織正式統一起來的統一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爲全體黨員所必須執行的實際決議。沒有這些條件，黨就不能成爲能有計劃有組織地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

列寧說：

「從前，我們黨還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各個部分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

間，除掉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說造成了一種權力，思想威信變成了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應該服從黨的上級機關〔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九一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那些不穩定的份子方面的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爲「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末黨這個整體底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會是不可能的了。列寧主義在組織問題上就是始終一貫實行這些原則的。列寧把反對這些原則的鬥爭，叫做是應受譏笑，應被痛斥的「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

請看列寧在他所著進一步一書中評論這些不穩定份子時所說的話吧：

「這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是俄國虛無主義者所特有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兇惡可怕的「工廠」；部分服從整體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他們一聽見在中央領導之下實行分工，便發出可憐而又可笑的狂吠，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絲釘」；他們一聽見有人提起黨底組織章程，便裝出看不起人的樣子，發出鄙視的意見，說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顯然的，這種關於所謂官僚主義的喊聲，不過是爲要掩飾他們對於中央機關人員的不滿意，不過是爲要裝飾門面而已……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爲你是由代表大會不根據我的意見，而違反着我的意見所委任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爲你倚據代表大會底形式決議，而不倚據我的同意；你作事極端機械，因爲你只倚據黨代表大會底「機械

的」多數，而不顧及我想得到補選位置的願望；你是專制魔王，因為你不願意把權柄交給舊時的親熱夥伴」*（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〇頁和第二八七頁）。

（三）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可是，黨並不是工人階級底唯一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其他為順利進行反資本門爭所絕對必需的組織，如職工會，合作社，工廠組織，國會黨團，非黨婦女聯合會，出版機關，文化教育組織，青年團，革命戰鬥組織（在公開革命發動時期），以及蘇維埃，即國家組織形式（當無產階級已在執掌政權時）等等。這些組織，大多數都是非黨的，而只有某一部分是直接接近於黨或成為黨底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下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它們，那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種鬥爭範圍內的階級陣地，因為如果沒有它們，那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担负有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產階級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組織既然這樣繁多，怎樣去實現統一領導呢？怎樣才可担保在領導上不因組織太多而發生各自為政的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幹自己特別範圍內的工作，因此它們也就不會互相妨害的。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即這一切組織都應當按照一個方向來進行工作，因為它們都是為一個階級，即是為無產者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這一切組織進行工作時所應當依照的路線，即總方向呢？那裏有這樣一個中心組織，它不僅是因有必要

*這裏所說的「夥伴」，是指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顧特列索夫等人而言，他們不服從第二次代表大會底決議，而贊備列寧為「官僚主義者」。——斯大林註。

的經驗，能定出這條總路線，而且因有充分的威信，可以激動這一切組織實行這條路線，以達到領導方面的一致，而排除發生不協調現象的可能呢？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底黨。

黨具備有一切條件來做到這一點：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優秀份子集合點，這些份子是真無產階級底非黨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經常領導它們的；第二，因為黨既是工人階級優秀份子集合點，所以它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這些首領能夠領導本階級組織底一切形式；第三，因為黨既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它是能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因而把工人階級所有一切非黨組織都變成爲服務機關，變成使黨與本階級連結起來的引帶的唯一組織。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這當然不是說，非黨組織，如職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服從黨的領導。問題只是要使所有參加這些組織的黨員，這些毫無疑義是有影響的人，都採取一切說服辦法，使得這些非黨組織在自己工作中與無產階級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底政治領導。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說：黨是「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領導應當普及到無產階級其他各種組織中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四頁）。

正因為如此，所以主張非黨組織「獨立」「中立」，而繁殖着一些獨立國會議員和脫黨出版家，近視工會活動者和市儈化合作運動者的那個機會主義理論，是和列寧主義底理論與實踐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無產者階級內部和這個階級各組織中間的主要的領導的基本。可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把黨看成爲自我目的，看成爲自滿自足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而且同時又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工具，當無產階級還沒有爭得專政時，便運用它來爭得專政，而在無產階級已爭得專政時，便運用它來鞏固並擴大專政。如果政權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如果帝國主義底條件、戰爭底不可避免性以及危機存在的情形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所有一切力量集中到一個地點，把革命運動所有一切線索集中在一個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末黨底意義就不能提到這樣高，黨底作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組織。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首先就是因爲黨是無產階級自己爲順利奪取政權所必要的戰鬥司令部。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集合於自己周圍，並在鬥爭進程中把整個運動底領導都集中起來的黨，那末，俄國無產階級就會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了。

可是，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並不祇是爲了爭得專政，而且更是爲了保持專政，鞏固專政和擴大專政，以謀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

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向千百萬無產者羣衆灌輸紀律精神和組織精神；這就是說，要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間造成能防範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腐蝕影響的一種骨幹和堡壘；這就是說，要加強無產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級方面的組織者工作；這就是說，要幫助無產者羣衆把自己教育成爲能夠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要做到這一切，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民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鬥爭中鍛鍊成鋼鐵一般的黨，沒有爲本階級裏全體忠誠份子所信任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羣衆情緒和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就是爲着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當階級消滅時，當無產階級專政消亡時，黨也一定會跟着消亡的。

（五）黨是意志底統一，不容有派別組織存在。如果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強有力的黨，那就不能爭得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如果沒有意志底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上的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那末黨內鐵一般的紀律是完全不可能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排斥黨內

有意見鬥爭的可能。恰巧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定有黨內批評和黨內意見鬥爭。這更不說，紀律應當是「盲目的」。恰巧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定有自覺的和自願的服從，因為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為真正鐵的紀律。可是，當意見鬥爭已經終結，批評已經完結，決議已經通過後，全體黨員意志底統一和行動底統一，便是為保證黨內統一和黨內鐵的紀律所絕對必要的條件。

列寧說：

「在現今國內戰爭尖銳的時代，共產黨為要實現自己的職責，就一定要它是組織得最集中的，就一定要在它內部有幾乎和軍事紀律一樣的鐵的紀律統治着，就一定要全黨中央是擁有廣泛全權而為全體黨員所共同信任的權威機關」（摘自共產國際的條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八二至二八三頁）。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下的黨內紀律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在爭得專政以後的黨內紀律，也要這樣說，而且更要這樣說。

列寧說：

「誰只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黨內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在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派別組織之存在，無論與黨內統一或與黨內鐵的紀律，都是不能相容的。顯然用不着證明：既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而既有幾個中央，就是表明黨內沒有總的中央，就是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減弱和破壞紀律，減弱和破壞專政。第二國際底黨既然反對無

產階級專政和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當然是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這一類自由主義玩藝的，因為它們根本就不需要鐵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底黨既然把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作為自己工作底基礎，便不能容許「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黨是意志底統一，而不容許有任何派別組織活動和黨內權力分散現象。

因此，列寧就「從保持黨內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意志統一」是保證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本條件這一觀點出發，來解釋「派別組織活動底危險性」，而我們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就把這個解釋明文載入論黨內統一這個專門決議案內。

因此，列寧就以「無條件地立刻開除黨籍」相威脅，來要求「完全消滅任何派別組織活動」，並「立刻解散所有一切根據這個或那個政綱形成的集團」（見論黨內統一決議案）。

（六）黨是靠清除自身中間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的機會主義份子，是黨內派別組織活動底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閉關存在的階級。農民、市僧、智識界中那些被資本主義發展所陷於無產者化的人，總是源源不絕地流入無產階級隊伍裏來。同時，無產階級上層份子又發生腐化過程，他們大半是被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額外利潤所餵養的工會領袖和國會議員。列寧說過：「這個已經資產者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階層，按其生活方式，工資份量以及整個世界觀說來，是完全市僧化了的，——他們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底主要社會（不是軍事）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是十足的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傳達者」（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七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集團，這樣或那樣鑽入黨內，帶進動搖和機會主義的精神，腐化和猶疑的精神。他們就是派別組織活動和瓦解現象底主要來源，是實行搗亂和從內部破壞黨組織的主要來源。在自己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去與帝國主義者交戰，便會陷於兩面被攻，腹背受擊的地位。因此，對這班份子作無情鬥爭，把他們逐出黨外，乃是順利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底預備條件。

主張用黨內思想鬥爭方法「克服」機會主義份子的理論，主張在一個黨範圍內「消除」這些份子的理論，是一種腐敗而危險的理論，它有使黨陷於癱瘓和終身殘廢的危險，有使黨聽憑機會主義者宰制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喪失革命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喪失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在自己隊伍內有馬爾托夫輩與唐恩輩、頗特列索夫輩與阿克雪里羅得輩，那末我們黨當時就會不能走上大道，就會不能取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就會不能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如果說我們黨已創立了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了自己隊伍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為它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維克。無產階級黨發展和鞏固的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靠清除自身中間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

列寧說：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有孟什維克，那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獲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在原則上是很顯然的。這是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具體證實了的：在俄國有過很多次的困難情形，當時如果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就會一定·是·被·推·翻·了·；在意大利，大家都認為快要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的決戰。在這樣的時機，不僅把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屠拉梯主義者驅逐出黨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能夠動搖或正在動搖到去和改良主義者維持「統一」的出色共產黨員驅逐出去，撤銷他們的一切負責職務，都能成為甚至有益的事情：在革命前夜和在為革命勝利而作最殘酷的鬥爭時，黨內最小的動搖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壞革命，都能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為這個政權還沒有穩固，因為逼攻這個政權的力量還非常強大。如果動搖領袖在這個時候滾開去，那就會不是滅弱，而是加強黨，加強工人運動，加強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至四六四頁）。

（九）工作作風

這裏不是說文學作風。我在這裏所說的是工作作風，是列寧主義實踐中的一種很特殊的要素，它能造成特別式樣的列寧主義工作者。列寧主義是理論的和實踐的學校，它能造成特別式樣的黨工作者和國家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這作風底特徵是什麼呢？它的特點怎樣呢？這樣的特點有兩個：第一，就是俄國人的革命胆略；第二，就是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列寧主義底作風，便是黨和國家工作中這兩個特點底結合。

俄國人的革命胆略是能消除頑固習氣，守舊思想，保守主義，思想停滯和盲從老舊傳統態度的

一種消毒劑。俄國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種興奮的力量，它能喚起思想，推動前進，破壞舊物，開展前途。沒有它，便不能前進一步。可是，如果不把它和工作中的美國人求實精神結合起來，那它在實踐中就會大有可能墮落為空洞的「革命的」馬尼洛夫精神。這種墮落例子簡直是不可勝數的。誰不知道有一種「革命的」臆造主義和「革命的」設計主義病症，其來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置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國作家愛倫堡在他那篇標題為共產主義完人（完善的共產主義的人）的小說中，描寫過一些患有這種病症的「布爾什維克」底風格，說他們立意擬定一個理想完人標準表：結果竟在這個「工作」裏「淹死了」。這篇小說中雖有些過於誇大之處，但它正確地抓住了這種病症，却是毫無疑義的。可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苛刻無情地譏笑過患有這種病症的人。他痛斥了這種迷信臆造主義和發號施令主義病症，稱之為「共產黨員誇大狂」。

列寧說：

「共產黨員誇大狂，就是說有一些側身於共產黨內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的人，竟妄想用共產黨員名義來發號施令，便能解決他自己的一切任務」（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〇至五一頁）。

列寧通常都用日常平凡的事情來與這種「革命的」空砲對立，並以此而着重指出：「革命的」臆造主義，是與真正列寧主義底精神或字句絕對相反的。

列寧說：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少發些政治喧聲，多注意些極平凡的，可是生

動的：共產主義建設事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四三頁和第三五頁）。

反之，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却是能消除「革命」馬尼洛夫精神和虛幻臆造主義的一種消毒劑。美國人的求實精神是一種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認有什麼阻礙，而以其切實堅忍精神掃除一切和任何障礙，它對於一件事情只要已經開始來做，就一定要做到底，那怕這件事情並不怎樣大；如果沒有這個力量，那末認真的建設工作是無法作成的。可是，如果不把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和俄國人的革命胆略結合起來，那它就大有可能墮落為狹隘的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誰不知道這種狹隘的實踐主義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病症，往往使某些「布爾什維克」墮落下去，離開革命事業呢？皮里略克在他那篇標題為荒涼年份的小說中描寫過這種特殊的病症，描寫過某些俄國「布爾什維克」底風格，說他們遍身都充滿着行動意志和實踐決心，「幹得」很「起勁」，可是看不見前途，不知道「究竟是爲着什麼」，結果是誤入迷途，離開了革命工作道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冷酷地譏笑過這種事務主義病症。列寧痛斥了這種病症，稱之爲「近視的實踐主義」，「無頭腦的事務主義」。他通常都用生動的革命事業和我們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須具有的革命前途來與這種病症對立，並以此而着重指出：無原則的事務主義，也同「革命」臆造主義一樣，是與真正列寧主義絕對相反的。

俄國人的革命胆略與美國人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便是黨和國家工作中列寧主義底實質。

只有把這兩點結合起來，才可得到列寧主義工作者底完整風格，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

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到十月革命之路——書底序言——

(一) 十月革命底內外環境

有三個外部情況，是使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能比較易於打破了帝國主義鏈條，因而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的。

第一個情況：十月革命是在兩個基本帝國主義集團，即英法集團和德奧集團拚鬥爭時期開始的，當時這兩個集團忙於彼此間的決死鬥爭，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物力來認真注意到與十月革命作鬥爭。這個情況對於十月革命是有巨大的意義，因為它使十月革命能利用帝國主義內部殘酷衝突來鞏固和組織自己的實力。

第二個情況：十月革命是在帝國主義戰爭進程中開始的，當時那些苦於戰爭而渴望和平的勞動羣衆，被客觀情勢本身引到無產階級革命，作爲擺脫戰爭的唯一出路。這個情況對於十月革命是有極大的意義，因為它使十月革命能把爭取和平作爲強有力的工具，使十月革命能易於把蘇維埃革命與結束可恨戰爭的事業聯結起來，因而使十月革命能在西方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族中間獲得廣大的同情。

第三個情況：當時在歐洲有雄偉的工人運動，在西方和東方有被長期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革命危機日益成熟的事實。這個情況對於俄國革命是有莫大的意義，因為它使俄國革命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能在俄國境外獲得可靠的同盟者。

可是，除這些外部情況以外，十月革命還有許多使它易於獲得了勝利的內部順利條件。

下述幾點，要算是這些條件中的主要條件：

第一，十月革命享有俄國工人階級絕大多數羣衆最積極的擁護。

第二，它享有渴望和平與土地的貧農和大多數兵士羣衆不容置疑的擁護。

第三，它有布爾什維克黨這樣一個久經鍛鍊的政黨爲首，爲其領導力量，而這個政黨之所以強有力，不僅是因為它有豐富的經驗和多年造成的紀律，並且是因為它與勞動羣衆有廣大的聯繫。

第四，十月革命所遇着的，是些比較易於克服的敵人，即是比較軟弱的俄國資產階級，被多次農民「騷動」弄得完全頹喪的地主階級，以及在戰爭進程中完全遭受破產的妥協黨（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

第五，十月革命擁有新國家的廣大疆域，它在這個疆域內能夠自由機動，能夠在環境要求退却時實行退却，能夠暫時休息，能夠養精蓄銳等等。

第六，十月革命在其反對反革命的鬥爭中，能憑藉於本國所具有的充足的糧食、燃料和原料的資源。

這些內外情況配合起來，就造成了使十月革命較爲易於獲得勝利的特殊環境。

這當然不是說，十月革命在內外環境方面沒有什麼不利的條件。例如，這樣一個不利條件，即十月革命處於相當孤獨地位，它旁邊和隣近沒有一個可爲它所倚靠的蘇維埃國家這一事實，該有多大作用呢？毫無疑義，例如德國將來發生的革命在這方面是會處於比較便利地位的，因爲它隣近有我們蘇聯這樣一個實力強大的蘇維埃國家。至於十月革命底這樣一個不利條件，即無產階級在全國人口中不佔多數的事實，那更不必說了。

可是，這些不利條件祇是着重說明十月革命上述內外特殊條件有巨大意義而已。

我們一分鐘都不可忘記這些特殊條件。在分析一九二三年秋季德國事變時，特別應當記着這些特殊條件。托洛茨基首先就應當記着這些特殊條件，因爲他竟籠統地把十月革命拿來與德國革命比擬，並放肆痛斥德國共產黨底真正錯誤和虛構錯誤。

列寧說：

「俄國在一九一七年那種歷史上非常新奇的具體形勢下，是容易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而俄國要繼續這個革命，並把這個革命貫徹到底，却就比西歐各國難些了。我還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已經指出這一點，此後兩年來的經驗已完全證實這種論斷是正確的。俄國當時的特殊條件：（一）有可能將蘇維埃革命與藉這個革命結束工農深受其苦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事業，聯結起來；（二）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利用兩個雄震全球的帝國主義強盜集團間的決死鬥爭，這兩個集團當時不能聯合起來反對它們的敵人蘇維埃；（三）有可能支持較爲長期的國內戰爭，這這局部是因爲我國疆域極廣和交通不便；（四）當時在農民中有非常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運動，使無產階級黨能把農民黨（即社會革命黨，其大多數是激烈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那裏的革命要求拿來，並因無產階級奪得政權而一舉實現之，——這樣的特殊條件，現時在西歐是沒有的，而且這些條件或類似條件的重演，是不很容易的。因此——除其他某些原因以外，——西歐要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就比我們難些」（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五頁）。

列寧底這一段話，是不可忘記的。

（二）論十月革命底兩個特點；或十月革命與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

十月革命有兩個特點，是爲着瞭解這個革命底內容和歷史意義而首先就必須認識的。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就是這樣一件事實：在我國所誕生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在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基礎上，在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勞動羣衆的條件下產生的政權。第二，就是這樣一件事實：在我國所奠定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在一個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裏，而在其他資本主義更爲發展的國家依然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獲得勝利的結果。這當然不是說十月革命再沒有其他特點了。

可是，現時對於我們重要的正是這兩個特點，這不僅是因為它們確切表明十月革命底實質，而且是因為它們十分明白地揭露出「不斷革命」論底機會主義本性。

我們來簡略分析這兩個特點吧。

關於城鄉小資產階級勞動羣衆問題，關於把這些羣衆奪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極重要的問題。革命底命運如何，無產階級專政堅固與否，是要看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城鄉勞動羣衆究竟是擁護誰，是擁護資產階級，還是擁護無產階級，是成爲資產階級後備力量，還是成爲無產階級後備力量這一點爲轉移的。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八七一年革命所以遭受失敗，主要是因為農民後備力量曾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十月革命所以獲得勝利，是因為它從資產階級方面奪得了農民後備力量，它把這些後備力量奪到了無產階級方面來，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成了城鄉千百萬勞動羣衆底唯一領導力量。

誰沒有瞭解這一點，誰就永遠也不會瞭解十月革命底性質，無產階級專政底本性，我國無產階級政權對內政策底特點。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老練戰略家」用精敏手腕所「巧妙」挑選出來，並「合理憑藉於」某些居民階層的簡單政府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以推翻資本和達到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爲目標，而以無產階級担任領導爲條件的階級聯盟。

所以，這裏所說的，並不是什麼「稍微」輕視或「稍微」誇大農民運動底革命能力，如某些要外交的「不斷革命」論者現時所愛說的那樣。這裏所說的，是由於十月革命結果而產生的新的無產

階級的國家底本性。這裏所說的，是無產階級政權底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底基礎。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即勞動者先鋒隊與人數衆多的非無產者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智識界等等），或與大多數勞動者建立的特式階級聯盟，是反資本的聯盟，是爲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反抗及其復辟企圖而建立的聯盟，是爲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而建立的聯盟」（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其次：

「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我們把這個科學的歷史學的哲學的拉丁名詞譯成更簡單的語句，那就是說：在謀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實行這種推翻時，在爲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這一事業中，在謀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祇有一個階級，即城市工人和一般工廠工人，即工業工人，才能領導全體被剝削勞動羣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六頁）。

列寧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專政論，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底特點之一，就在於它是列寧無產階級專政論底模範式的實現。

有些同志以爲這個理論是只與俄羅斯實際情形有關的純粹「俄國的」理論。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說到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非無產者階級勞動羣衆時，不僅是指俄羅斯農民而言，並且是指蘇聯境內那些不久以前還是俄國殖民地的邊區裏的勞動份子而言。列寧始終不倦地說：

如果不與這些異族羣衆聯盟，俄國無產階級便不能獲得勝利。列寧在他論述民族問題的各篇論文中以及在其共產國際各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都再三說過：如果沒有各先進國無產階級與各被奴役殖民地被壓迫民族間的革命聯盟，那末世界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什麼是殖民地呢，豈不也是那些被壓迫的勞動羣衆，豈不首先就是農民勞動羣衆麼？誰不知道，殖民地解放問題在實質上就是那些非無產者階級勞動羣衆擺脫財政資本壓迫與剝削而獲得解放的問題呢？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決不是什麼純粹「俄國的」理論，而是世界各國所必須採用的理論。布爾什維主義不只是俄國的現象。列寧說：「布爾什維主義是可供世界各國效法的策略模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六頁）。

十月革命第一個特點底特徵，就是如此。

從十月革命底這個特點方面看來，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們不來多講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場，當時他「簡單」忘掉了農民是革命力量，而提出了「不要沙皇，而政府是工人的」的口號，即是不需要農民參加革命的口號。現在，甚至拉狄克這位愛與外交的「不斷革命」論者也不得不承認：「不斷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是離開實際環境而「向空一躍」。現在，大概是人人都認為不值得再來和這「向空一躍」周旋了。

我們也不來多說托洛茨基在大戰時期，例如在一九一五年的立場，當時他在他所著為政權而鬥爭一文中，由「我們處於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不是使資產階級民族與舊制度對立，而是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民族對立」等語出發，而作出結論，說農民底革命作用定會減少，說沒

收土地的口號已沒有它從前所有的那種意義。大家知道，列寧在剖解托洛茨基這篇論文時，責備托洛茨基爲「否認」「農民作用」，說「托洛茨基在事實上幫助俄國自由派工人政治家，而這些政治家是把「否認」農民作用瞭解爲不願意發動農民去革命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八頁）。

我們倒不如來看看托洛茨基關於這個問題的比較晚些的著作，看看他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奠定，而他已能根據事實來檢查他的「不斷革命」論，並改正他那些錯誤的時期內所發表的著作。就拿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爲一九〇五年一書所作的序言來說吧。請看托洛茨基在這篇序言中如何說明了「不斷革命」：

「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變和十月罷工間，在本書作者方面形成了他獲得「不斷革命」論名稱的那些對於俄國革命發展性質的觀點。這個與妙名稱底含義，就是認爲俄國革命，雖然直接擺在它面前的是資產階級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止在這些目的上面。若不先使無產階級執掌政權，革命就不能解決它那些最近的資產階級的任務。而無產階級獲得政權後，又不能在革命中以資產階級範圍來限制自己。恰恰相反，無產階級先鋒隊，正是爲保證其勝利起見，還在其統治最初時期內，就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主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在這種情形下，它不僅會與那一切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初期贊助過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衝突，而且會與那些協助過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衝突。在農民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地位中的矛盾，祇有在國際範圍內，在無產階

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

托洛茨基就是這樣說明他的「不斷革命」的。

祇要把這段言論拿來與以上從列寧幾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著作中引來的幾段言論對照一下，就可看出橫在列寧無產階級專政論與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間的整個深淵了。

列寧說，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階層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而托洛茨基則說，「無產階級先鋒隊」會與「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衝突」。

列寧說，無產階級領導被剝削勞動羣衆。而托洛茨基則說，「在農民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地位中的矛盾」。

據列寧說，革命首先要從俄國本國工農中間吸取自己的力量。而托洛茨基則認為，祇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吸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國際革命竟只得遲些到來，那又怎樣辦呢？我國革命有沒有什麼光明前途呢？托洛茨基認為是沒有任何光明前途的，因為「工人政府地位中的矛盾，祇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按這個計劃說來，我國革命祇有一個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種矛盾中苟延殘喘，在等待世界革命時連根枯朽。

據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無產階級專政是以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爲倚據，以「完全推翻資本」和「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爲目標的政權。

據托洛茨基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是與「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衝突」，祇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力求解決「矛盾」的政權。

這個「不斷革命論」，究竟與那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著名孟什維主義理論有什麼區別呢？其實是毫無區別的。

這裏沒有絲毫懷疑的餘地。「不斷革命論」並不是什麼對農民運動革命能力所表示的一種簡單的輕視。「不斷革命論」是對農民運動所表示的一種逕直否認。列寧無產階級專政論的輕視。

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是變相的孟什維主義。

十月革命第一個特點，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第二個特點特徵怎樣呢？

列寧在研究帝國主義時，特別是在大戰時期，發現了關於各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政治上不平衡發展，躍進式發展的規律。按這個規律底含義說來，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是發展得不平衡的，並不是按一定次序發展，不是某一個托拉斯、某一個工業部門或某一個國家始終走在前面，其他托拉斯或其他國家則依次落伍；——而是躍進式的，在某些國家發展中發生停頓，在別些國家發展中却發生一種躍進。同時，落伍的國家「完全合乎情理地」希圖

保持舊陣地，而躍進的國家也同樣「合乎情理地」希圖奪取新陣地，結果就使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軍事衝突成為絕對不可避免的事情。例如，德國情形會是如此，在半世紀以前，德國同英法比較起來，還是一個落後國家。日本當時同俄國比較起來，也是如此。可是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紀初期，德國和日本已向前躍進得很遠，德國已超過法國，並已開始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而日本則已超過了俄國。大家知道，從這些矛盾中就產生了不久以前的帝國主義大戰。

這個規律是從下述各點出發的：

- (1)「資本主義已變成極少數『先進』國用殖民政策壓迫，用財政資本扼制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摘自列寧所著帝國主義法文版序言，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四頁)。
- (2)「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雄震全球而全身武裝的惡獸(美英日)，它們把全世界捲入它們自己為瓜分自己贓物而進行的戰爭」(同上)。
- (3)財政資本壓迫的世界體系內各種矛盾的增長以及軍事衝突的必然性，結果就使帝國主義世界戰線容易被革命打破，而由個別國家來衝破這條戰線是可靠的情形。
- (4)最可靠的情形，是在帝國主義戰線線條最弱的地方和國家，即是在帝國主義最鬆懈而革命最易展開處衝破這條戰線。
- (5)因此，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那怕是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裏獲得勝利，而同時在其他國家，那怕是資本主義更為發展的國家裏，却還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情形，是完全可能而且可靠的情形。

簡括說來，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底基礎，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第二個特點何在呢？

十月革命第二個特點，就在於它是實際應用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論的模範。

誰沒有瞭解十月革命底這個特點，誰就永遠也不會瞭解這革命底國際本性，這革命底偉大國際力量，這革命底特殊對外政策。

列寧說：

「經濟上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且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因為「若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所進行的較為長期的堅持鬥爭，便無法保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自由聯合起來」（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各國機會主義者硬說，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開始於——如果按他們那種理論說來，無產階級革命一般應在什麼地方開始的話——工業發展的國家；他們硬說，這些國家在工業方面愈發展，社會主義勝利底機會也愈多；而且在他們看來，在一個國家內，況且是在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是完全不近情理而絕對沒有可能的。還在大戰時，列寧就已倚據各帝國主義國家不平衡

發展律，提出他關於社會主義能在一個國家，那怕是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裏獲得勝利的這個無產階級革命論，來與機會主義者對立。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已完全證實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是正確的。

從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看來，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是怎樣一回事呢？

就拿托洛茨基所著小冊子我國革命（一九〇六年出版）來說吧。

托洛茨基寫道：

「除非有歐洲無產階級底直接國家幫助，俄國工人階級便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權，便不能把自己暫時的統治變為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這是不容片刻懷疑的」。

這一段話是說明什麼呢？就是說明：「除非有歐洲無產階級底直接國家幫助」，換言之，在歐洲無產階級尚未奪得政權以前，在一個國家內——這裏是指在俄國內——社會主義勝利是不可能的。

這個「理論」與列寧認為社會主義能「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原理，有什麼相同處呢？

這裏顯然是沒有絲毫相同處的。

可是，就假定說：托洛茨基這本小冊子因為是在一九〇六年出版，當時還難於斷定我國革命底性質，所以這本小冊子就含有一些無意中的錯誤，而不完全符合托洛茨基在較晚時期內的觀點吧。

我們就拿托洛茨基所著的另一本小冊子，即和平綱領來說，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

前夜出版，而現時（一九二四年）已編在一九一七年一書中再版了。托洛茨基在這本小冊子裏，批評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並拿歐洲聯邦口號來與之對立。他硬說：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勝利祇能是歐洲幾個聯合為歐洲聯邦的基本國家（英俄德）底勝利，否則完全是不可可能的。他簡直說道：「除非德國發生革命，則在俄國或英國是絕對不能有勝利革命的，反過來說也是一樣」。

托洛茨基說：

「為反對歐洲聯邦口號而提出的唯一的稍許具體的歷史意見，由那在瑞士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布爾什維克黨當時的中央機關報——斯大林註）歸納為以下一句話：「經濟上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社會民主黨人就作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因此無須以創立歐洲聯邦為每一個別國家內無產階級專政底前提。各國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平衡，——這是完全不容爭議的意見。可是，這不平衡性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國、奧國、德國或法國底資本主義水準不是一樣的。可是，與非亞兩洲比較起來，所有這些國家都是已經成熟到了實現社會革命的資本主義「歐洲」。至於任何一個國家在自己的鬥爭中都不應「等待」別國，——這本是一個淺顯的思想，重複提起這個思想，是有益而且必要的，好使平行的國際行動觀念不致被等待主義的國際不動觀念所代替。我們不等待別國而在民族範圍內開始鬥爭並繼續鬥爭，因為我們完全相信我們的創始定會推動其他各國家內的鬥爭；假如這一點竟不能實現，那末如果以為革命俄國——譬如說——能在保守主義歐洲面前支

持得住，或以爲社會主義德國能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孤獨保留下去，就未免是絕無希望的想法，這是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可證明的。

由此可見，這仍然是社會主義在歐洲各基本國家內同時勝利論，而這種論調通常都是絕對排斥列寧關於社會主義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革命論的。

不待說，爲要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爲要完全保障免除舊制恢復的危險，是必須有數國無產者們共同努力的。不待說，除非有歐洲無產階級來援助我們俄國革命，我們俄國無產階級便不能擋住那種合力的進逼；同樣，除非有俄國革命去援助西方革命運動，這個運動便不能如它在俄國成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那樣迅速地向發展。不待說，我們是需要援助的。但什麼是西歐無產階級對我國革命的援助呢？歐洲工人對於我國革命的同情，他們破壞帝國主義者武裝干涉計劃的決心？

——所有這些是不是援助呢，是不是嚴重的幫助呢？當然是嚴重的幫助。如果沒有這種援助，如果沒有這種不僅歐洲工人，而且各殖民地國家和依賴國家所給予我們的幫助，那末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處於困難地位了。這種同情和這種幫助，再加上我們紅軍底實力和俄國工人挺身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決心，——所有這些，至今是否足夠擊退帝國主義者進攻，並取得爲進行認真建設工作所必要的環境呢？當然是足夠的。這種同情現時是在增長呢，還是在減弱呢？絕對是在增長的。這樣，我們有沒有各種順利條件，不僅能推進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事業，並且能幫助西歐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族呢？當然是有這種條件的。俄國無產階級專政七年來的歷史，就是燦爛說明這一點。能不能否認我國已有雄偉勞動高潮開始呢？當然是不能否認的。

既然這樣，那末托洛茨基說革命俄國不能在保守主義歐洲面前支持下去的議論，還能有什麼意義呢？

它祇能有一種意義：第一，托洛茨基沒有感覺到我國革命內部的實力；第二，托洛茨基不瞭解西方工人和東方農民給予我國革命的精神援助所含有的無限意義；第三，托洛茨基沒有覺察到現時正腐蝕着帝國主義的那種內部虛弱症。

托洛茨基因為醉心於批評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論，於是他在自己於一九一七年出版並於一九二四年再版的小冊子和平綱領中，便不知不覺地完全打破了自己。

可是，也許托洛茨基底這本小冊子也是陳舊了，也由於某種原因而不復符合他的現時觀點了？我們且拿托洛茨基最近的著作，當無產階級革命已在一個國家，即在俄國獲得勝利後所寫的著作來說吧。例如，我們就拿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為他的和平綱領這本小冊子新版所寫的跋言來說吧。他在這篇跋言中寫道：

「無產階級革命在民族範圍內不能勝利完成，——這一句在和平綱領中屢次重復說過的斷語，也許有某些讀者覺得它已被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及五年來的經驗所推翻了。可是，這樣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工人國家在一國內，而且是在一個落後國內擋住了全世界，——這個事實是表明無產階級有巨大實力，而這種實力在其他較先進較文明的國家內，是能作出真正神奇的事業來的。可是，我們雖在政治上軍事上保持為一個國家，但我們並沒有達到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地步，甚至於還沒有接近到這個地步：當其餘歐洲國家還是資產階級統治時，我們為

反對經濟孤立性而鬥爭，便不得不設法去與資本主義世界妥協；同時可以大胆說：這些妥協至多也祇能幫助我們醫治某些經濟創傷，求得某種進步，可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底真正高漲，却祇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各最重要國家內獲得勝利後，才會成爲可能哩！*。

托洛茨基這種說法，顯然是違反實際情形，而拚命想挽救「不斷革命論」於完全破產地步的。這樣說來，那就是無論你們怎樣設法辯解，但你們不僅「沒有達到」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地步，而且甚至還「沒有接近」到這個地步。原來有人曾希望「與資本主義世界妥協」，但這些妥協原來也沒有絲毫結果，因爲無論你們怎樣設法辯解，但在無產階級尚未「在歐洲各最重要國家內」勝利以前，「社會主義經濟底真正高漲」總是辦不到的。

那末，既然在西方還沒有勝利，於是俄國革命也就祇能「二中取一」：或者是連根枯朽，或者是蜕化爲資產階級國家。

無怪乎托洛茨基說我們黨「蜕化」已經說到兩年之久。

無怪乎托洛茨基在去年已預言我們國家定會「滅亡」。

這個奇怪「理論」，怎能與列寧的「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理論相容呢？

這個奇怪「前途」，怎能與列寧所說新經濟政策一定使我們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前途相容呢？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這個「不斷」絕望的思想，怎能與列寧底如下一段言論——舉例來講——相容呢：

「社會主義現時已經不是一個遙遠將來的問題，或某種抽象幻景的問題，或某種偶像的問題。我們對於偶像的意見仍然如舊，仍然是很不好。我們已把社會主義拉入日常生活中，而在這裏我們應當把事情弄清楚。這就是我們時期的任務，這就是我們時代的任務。讓我在結束演說時表示一個信念，就是無論這個任務怎樣困難，無論這個任務和我們舊時任務比較起來是如何新穎，無論這個任務會使我們受到多少困難，但我們大家同心協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幾年以內，無論怎樣都一定會解決這個任務，所以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一定會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六六頁）。

這個前途「不斷」黑暗的思想，怎能與列寧底如下一段言論——舉例來講——相容呢：

「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而且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所鄙視的合作社，便把完備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所必需的一切麼？這還不是說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這裏顯然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絲毫可以相容的地方。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是對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論的否定；反之，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是對「不斷革命」論的否定。

不相信我國革命底力量和本事，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底力量和本事——這就是「不斷革命」論底內幕。

迄今以前，通常都只指出「不斷革命」論底一方面，即是它那種不相信農民運動含有革命能力的思想。現在，爲說得公允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須補充指出它的另一方面，即是它那種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具有力量和本事的思想。

托洛茨基底理論與孟什維主義所謂除非無產階級革命「在西歐各基本國家內」預先勝利，則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何況是在一個落後國家內——勝利就不可能的通常理論，有什麼區別呢？

其實是毫無區別的。

這裏絲毫沒有可以懷疑的餘地。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是變相的孟什維主義。

近來，在我們的刊物上出現了一些腐敗的外交家，他們力圖私販「不斷革命」論，說它是可與列寧主義相容的東西。他們說：固然，這個理論在一九〇五年時原來是不適用的。可是，托洛茨基底錯誤就在於他當時跑得太遠，竟企圖在一九〇五年環境裏應用當時還不可應用的理論。可是後來，——他們說，——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當革命已經完全成熟時，托洛茨基底理論却已完全適得其所了。不難猜到：這些外交家中的最主要的角色，就是拉狄克。請聽他說吧：

「戰爭在力求爭得土地與和平的農民和各小資產階級政黨間掘成了一條深淵：戰爭已把農民交給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布爾什維克黨來領導了。當時有可能實現的，已不是工農專政，而

是以農民爲倚靠的工人階級專政。羅沙、盧森堡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反對列寧時所提出的主張（即「不斷革命」）。——斯大林註），事實上竟成了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階段」。

這裏每字每句，都是顛倒是非。

說在戰爭時「有可能實現的，已不是工農專政，而是以農民爲倚靠的工人階級專政」，——這話是不對的。其實，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就是工農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特殊錯綜結合起來的實現。

說拉狄克所含義不提的「不斷革命」論是於一九〇五年時由羅沙、盧森堡和托洛茨基提出的，這話是不對的。其實，這個理論是巴烏斯和托洛茨基所提出的。現在，經過十個月以後，拉狄克已來自行更正，認爲必須把巴烏斯大罵一頓，說他不應當提出「不斷革命」論。可是，拉狄克也必須把巴烏斯同道人托洛茨基罵一頓，才算公道哩。

說一九〇五年革命所摒棄了的「不斷革命」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階段」上，即是在十月革命時，竟成了正確主張，——這話是不對的。十月革命底全部進程，十月革命底整個發展過程，都已表明，都已證明，「不斷革命」論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不斷革命」論是與列寧主義基礎完全不相容的。

用甜蜜議論和腐敗外交，是不能掩蓋「不斷革命」論和列寧主義間的無底深淵的。

(三)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

布爾什維克策略底幾個特點

爲要瞭解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的布爾什維克策略，至少是必須認清這個策略底幾個特別重要的特點。其所以必須這樣作，尤其是因爲在許許多多談論布爾什維克策略的小冊子中，正是往往把這些特點忽略了。

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個特點。如果聽信托洛茨基，那就會以爲在十月革命準備史中，總共只有兩個時期，即偵探時期和武裝起義時期，其他一切，都是由於誤信邪說。一九一七年的四月遊行是什麼呢？「結果來得『太左的』四月遊行，是個偵探性的發動，其目的是要檢驗羣衆情緒，檢驗羣衆與蘇維埃內大多數人的相互關係」。而一九一七年的七月示威又是什麼呢？按托洛茨基底意見說來，「其實，這一次示威也不過是在運動底新的更高階段上所舉行的一次新的，規模更大的偵探動作」。不待說，依照我們黨要求所舉行的一九一七年的六月示威，在托洛茨基看來，更應稱爲「偵探動作」了。這樣說來，還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布爾什維克已經有了工農組成的現成的政治軍隊，如果布爾什維克無論在四月間，六月間，七月間，都不曾調用這支軍隊去舉行武裝起義，而祇作過一些「偵探動作」，那就是因爲，而且祇是因爲當時「偵探得來的消息」，還沒有供出順利的「情報」。

不待說，這種對於我們黨政治策略的簡易化的觀念，無非是把通常的軍事策略與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策略混爲一談而已。

其實，所有這些示威遊行，首先就是羣衆自發衝動底結果，羣衆反戰義憤湧現於街道上的結果。

其實，黨在當時的作用，是在於給那些自發產生的羣衆發動以一定的形式和領導，使之按照布爾什維克底革命口號來進行。

其實，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間，布爾什維克還沒有什麼現成的政治軍隊，而且不能有現成的政治軍隊。布爾什維克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間的鬥爭和階級衝突進程中，造就着這個軍隊（而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時，則已終於造成了這個軍隊），他們實行造就這個軍隊，是既經過四月遊行，又經過六月示威和七月示威，又經過區議會和全城市議會選舉運動，又經過反科爾尼洛夫叛亂的鬥爭，又經過奪取蘇維埃的鬥爭的。政治軍隊與軍事軍隊不同。如果軍事指揮部在臨戰時就已擁有現成的軍隊，那末黨却要在鬥爭本身進程中，在階級衝突進程中，按羣衆自己根據本身經驗而確信黨口號正確，確信黨政策正確爲標準，來逐漸造就自己的軍隊。

當然，每一次這樣的示威遊行，同時也相當揭示出那不可一望而知的勢力對比關係，也有相當偵探作用，但偵探作用在此地不是示威遊行底動機，而是示威遊行底自然結果。

列寧分析十月武裝起義前夜的事變，並拿這些事變與四月至七月間的事變比較時說道：

「此時情形恰巧不與四月二十一—二十一日前夜、六月九日前夜、七月三日前夜的情形一

樣，因為在當時所發生的是自發激動，而這種激動是我們黨所沒有捉摸到（如四月二十日），或是設法加以約束而把它形成爲和平示威的（如六月九日與七月三日）。因為當時我們很知道：蘇維埃還不是我們的，農民所相信的還是李別爾唐恩和切爾諾夫的道路，而不是布爾什維克的道路（武裝起義），所以還不能有大多數民衆跟從我們走，所以武裝起義還是爲時尚早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四五頁）。

專靠一個「偵探動作」，顯然是做不出多大事情來的。

問題顯然不在於「偵探動作」，而是在於：

漲的；

（1）黨在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內所進行的鬥爭，始終是倚靠於羣衆革命運動自發高

（2）黨倚靠着自發高漲時，始終保持了自己對於運動的獨佔領導；

（3）黨這樣來領導運動，就易於編制羣衆政治軍隊去舉行十月武裝起義；

（4）這樣的政策不能不使十月革命全部準備工作都在一個黨，即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進行；

（5）這樣準備十月革命，又使十月武裝起義的結果，政權落到了一個黨，即布爾什維克黨手裏。

總之，一個黨，即共產黨獨佔領導，是十月革命準備工作底基本要點，——這就是十月革命底特徵，這就是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什維克策略底第一個特點。

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布爾什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在帝國主義環境中的勝利就會不可能了。

這就是十月革命與法國一八七一年革命不同而優勝於它的地方，因為在法國一八七一年革命中，革命底領導是由兩個黨所分担，而且無論其中那一個黨都不能稱為共產黨。

第二個特點。這樣，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是在一個黨，即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進行的。可是，黨是怎樣進行這個領導的呢，這個領導是循着什麼路線進行的呢？這個領導是循着使各妥協黨，即在革命總解決時期內最危險的集團陷於孤立的路線，是循着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的路線進行的。

列寧主義底基本戰略規則何在呢？

這個規則就在於認定：

- (1) 在革命總解決關頭迫近時期內，妥協黨是革命敵人底最險惡的社會支柱；
- (2) 除非使這些黨陷於孤立，就不能推翻敵人（沙皇制度或資產階級）；
- (3) 因此，在革命準備時期，主要的鋒芒應當是使這些黨陷於孤立，使廣大勞動羣衆離開它們。

在進行反沙皇制度鬥爭時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時期（一九〇五至一九一六年），沙皇制度底最險惡社會支柱是自由保皇黨，即立憲民主黨。為什麼呢？因為立憲民主黨是妥協黨，是要大多數民衆，即整個農民去與沙皇制度妥協的黨。自然，黨在當時是把主要打擊用去反對立憲民主

黨人，因為除非使立憲民主黨人陷於孤立，便不能指望農民與沙皇制度決裂，而不保證有這種決裂，便不能指望革命勝利。許多人當時不瞭解布爾什維克戰略底這一特點，而責備布爾什維克過分「仇恨立憲民主黨人」，說在布爾什維克方面反對立憲民主黨人的鬥爭「蒙蔽了」反對主要敵人，即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可是，這些毫無根據的責備，祇是暴露他們簡直不懂布爾什維克力求使妥協黨陷於孤立，以便促進戰勝主要敵人和加速這種勝利的戰略。

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戰略，那末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就會不可能了。

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中，各鬥爭勢力底重心已移到新的位置上來了。沙皇已不存在了。立憲民主黨已由妥協勢力變成當權勢力，變成帝國主義底統治勢力了。此時，鬥爭已經不是在沙皇制度與人民間來進行，而是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來進行了。在這個時期內，帝國主義底最險惡社會支柱是小資產階級民主黨，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為什麼呢？因為這些黨在當時是妥協黨，是要勞動羣衆去與帝國主義妥協的黨。自然，布爾什維克當時的主要打擊，是用去反對這些黨，因為當時除非使這些政黨陷於孤立，便不能指望勞動羣衆與帝國主義決裂，而不保證有這種決裂，便不能指望蘇維埃革命勝利。許多人當時不瞭解布爾什維克戰略底這一特點，而責備布爾什維克「過分仇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責備布爾什維克「忘記了」主要目標。可是，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都燦爛說明，布爾什維克祇有採用這個策略，才能保證十月革命勝利。

這個時期的特點，就是農民勞動羣衆更加革命化，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失望，離開這些

黨，而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這一能使國家達到和平的唯一澈底革命力量周圍。這個時期底歷史，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方面與布爾什維克方面爲爭取農民勞動羣衆，爲抓得這些羣衆而鬥爭的歷史。決定這個鬥爭命運的，是聯合政府時期，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爲繼續戰爭而鬥爭，前線上的六月進攻，兵士死刑律，科爾尼洛夫暴動。而這些事實結果祇是證實布爾什維克戰略正確而已。因爲當時若不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便不能推翻帝國主義者政府，而不推翻這個政府，便不能擺脫戰爭。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的政策，原來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總之，使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陷於孤立，是領導十月革命準備事業的基本路線，——這就是布爾什維克戰略第二個特點。

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布爾什維克戰略底這個特點，那末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就會懸在空中了。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托洛茨基在他所著的十月底教訓中完全沒有說到，或幾乎完全沒有說到布爾什維克戰略底這個特點。

第三個特點。這樣，黨對於十月革命準備事業的領導，是循着使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陷於孤立的路線，循着使廣大工農羣衆脫離這些黨的路線進行的。可是，黨是怎樣具體實現了這個使這些黨陷於孤立的路線，是在什麼形式中，什麼口號下實現了這個路線的呢？這個路線是在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羣衆革命運動形式中，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下實現的，而實現

的手段就是爲把蘇維埃由羣衆動員機關變成武裝起義機關，變成政權機關，變成無產階級新國家機關而鬥爭。

爲什麼布爾什維克當時正是緊緊抓住蘇維埃，作爲能促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陷於孤立，能推進無產階級革命，並負有引導千百萬勞動羣衆達到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使命的基本組織槓桿呢？

蘇維埃是什麼呢？

列寧還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就已經說過：

「蘇維埃是新式國家機關，第一，它能保證有工農武裝力量，同時這個武裝力量是不像舊時常備軍那樣和人民隔離，而是和人民最密切聯繫着的；在軍事方面說來，這個武裝力量是比舊時軍隊強大得不可比擬的；在革命方面說來，它是無可替代的。第二，這個機關保證與羣衆，與大多數人民發生一種不可分離，易於審查，易於復新而爲舊時國家機關所完全沒有的密切聯繫。第三，這個機關底成份是由人民所選出，無須官僚形式手續而逕依民意來更換的，所以它比舊時機關要民主得多。第四，它保證和各種各樣的職業有堅固的聯繫，所以它能不要什麼官僚而使各種各樣的極深刻的改良易於實行。第五，它保證有先鋒隊底組織形式，即被壓迫、工農階級中最覺悟最努力最先進部分底組織形式，所以它是被壓迫階級先鋒隊所能用以激動、教育、訓練和領導這些階級全體廣大羣衆的機關，而這些羣衆向來都是完全處在政治生活以外，處在歷史以外的。第六，它保證有可能把議會制底長處和直接選民主制底長處結合起來，就是說，

把立法權和法律執行權結合於選出的人民代表身上。與資產階級議會制比較起來，這是在民主制發展過程中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一大進步：如果革命階級底民衆創造力沒有創立出蘇維埃，那末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就會是沒有希望的事情，因為毫無疑義的，無產階級決不能利用舊機關來保持政權，而新的機關又不是能一下子創立成功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五八至二五九頁）。

正因為如此，所以布爾什維克就緊緊抓住蘇維埃，作爲促進十月革命組織事業和無產階級國家新式強大機關創立事業的基本組織環節。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從其內部發展方面看來，是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布爾什維克遭受七月失敗以前，在兩個政權並存時期）和第二個階段（在科爾尼洛夫暴動失敗以後）。

在第一個階段上，這個口號是要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聯盟破裂，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組織蘇維埃政府（因為蘇維埃在當時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把持的），保證在野黨（即布爾什維克黨）有自由鼓動權，保證各政黨能在蘇維埃內自由鬥爭，預期着布爾什維克將能經過這個鬥爭方法而按革命和平發展道路來奪取蘇維埃，並改變蘇維埃政府底成份。這個計劃當然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它毫無疑義能夠促使造成那些爲保證專政所必要的條件，因為它既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執掌政權，並迫使他們在事實上實施他們反對革命的政綱，便能加速揭破這些黨底真正本性，促使它們陷於孤立，促使它們脫離羣衆。可是，布爾什維克在七月事

變時的失敗打斷了這個發展過程，因為這次失敗使軍閥和立憲民主黨的反革命佔得優勢，並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拋入這反革命底懷抱。這個情況就使黨不得不從日程上暫時收回「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而到革命新高漲條件下再把它提出來。

科爾尼洛夫暴動底潰敗便開闢了第二個階段。「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又擺在日程上來了。可是，此時這個口號底意義，已不像第一個階段上那樣了。這個口號底內容已經根本改變了。此時，這個口號是要和帝國主義完全決裂，並使政權轉到布爾什維克手上，因為蘇維埃中的大多數已經是布爾什維克的了。此時，這個口號是要革命經過武裝起義而直接進到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此時，這個口號是要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並使無產階級專政具有國家形式。

把蘇維埃變成國家政權機關這一策略所含有的莫大意義，就在於它使千百萬勞動羣衆脫離帝國主義，揭破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是帝國主義工具底面目，並把千百萬勞動羣衆一直引到無產階級專政。

總之，把蘇維埃變為國家政權機關這一政策，是使各妥協黨陷於孤立和使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的最重要條件，——這就是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什維克策略底第三個特點。

第四個特點。為使情景完全明白起見，我們還須說明一個問題：布爾什維克怎樣和為什麼能把自己的黨口號變成了千百萬羣衆用以推動革命前進的口號呢，布爾什維克怎樣和為什麼不僅能使先鋒隊和工人階級大多數，而且使人民大多數來確信黨政策正確呢。

問題是在於：爲着革命勝利——如果這個革命是包括千百萬羣衆的真正人民革命的話，——單

靠黨口號正確，還是不夠的。爲着革命勝利，還要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要羣衆根據自身經驗來確信這些口號正確。只有如此，黨底口號才會成爲羣衆本身的口號。只有如此，革命才會成爲真正人民的革命。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什維克策略底特點之一，就是它善於正確指明那些自然會把羣衆引到黨口號下面來，可以說是引到革命門口，因而使羣衆易於根據自身經驗來覺察、檢驗和察知這些口號正確的道路和轉折。換言之，布爾什維克策略底特點之一，就在於這個策略不把領導黨的方法與領導羣衆的方法混爲一談，而是明白看見第一種領導方法和第二種領導方法間的區別，所以它不僅是領導黨的科學，而且是領導千百萬勞動羣衆的科學。

把布爾什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表現得彰明較著的實例，就是召集和解散立憲會議的經過。

大家知道，布爾什維克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已提出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口號。大家知道，立憲會議是根本與蘇維埃共和國基礎相矛盾的資產階級國會。試問怎麼會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就是布爾什維克既然向着蘇維埃共和國前進，而同時却要求臨時政府立刻召集立憲會議呢？試問怎麼會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就是布爾什維克不僅參加過立憲會議選舉，而且還親自召集過立憲會議呢？試問怎麼會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就是布爾什維克在實行武裝起義一個月以前，在由舊制度過渡到新制度時，竟容許把蘇維埃共和國與立憲會議暫時配合的可能呢？

其所以「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是因爲：

- (1) 立憲會議思想是當時在廣大民衆中間最流行的思想之一；
- (2) 要求立刻召集立憲會議的口號能促使揭破臨時政府底反革命本性；

(3) 爲要使立憲會議思想在民衆心目中完全破產，就須引導這些羣衆拿着他們關於土地、和平以及蘇維埃政權的要求走到立憲會議門前，因而使他們與實際的具體的立憲會議相接觸；

(4) 祇有這樣，才能使羣衆易於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立憲會議底反革命性和將其解散之必要；

(5) 所有這些，也就自然預定了可以容許把蘇維埃共和國與立憲會議暫時配合，作爲消除立憲會議的手段之一；

(6) 這種配合，既然是在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的條件下實現，所以祇能使立憲會議服從蘇維埃，使立憲會議變爲蘇維埃底附屬品，使立憲會議無能爲害地自行消亡下去。

顯然用不着證明：布爾什維克若沒有採取這個政策，便不能把立憲會議解散得如此順利，便不能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後來在「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這一口號下進行的各種發動遭到這樣厲害的破產。

列寧說：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我們參加了俄羅斯資產階級國會的選舉，即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我們當時的策略是否正確呢？：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豈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國共產黨人，都更有理由來說國會制度在俄國是政治上已經過時的東西麼？當然，我們是更有理由來說這樣說的，因爲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國會是否早已存在，而在於廣大勞動羣衆已如何準備好（在思想上，政治上，實踐上準備好）來採用蘇維埃制度，解

散（或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俄國城市工人階級、兵士和農民，由於有種種特別條件，已準備得非常好來採用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會，——這是完全不容置辯，完全確定的歷史事實。雖然如此，但布爾什維克並沒有抵制立憲會議，而是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和以後都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一至二〇二頁）。

為什麼布爾什維克黨沒有抵制過立憲會議呢？列寧說，這是因為：

「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以前幾個星期內，甚至在這個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不僅不使革命無產階級受到什麼害處，反而使它易於向落後羣衆證明這種國會為什麼應被解散，易於把這種國會解散成功，易於使資產階級國會制度成為『政治上過時』的東西」（同上）。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托洛茨基不瞭解布爾什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而唾棄立憲會議與蘇維埃配合「論」，說這是希法亭主義。

他不瞭解：在實行武裝起義口號而蘇維埃勝利很有把握的條件下，容許這個配合而召集立憲會議，是唯一革命的策略，是與那種把蘇維埃變成立憲會議附屬品的希法亭策略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策略；他不瞭解：某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決不能使他有根據去非難列寧和黨主張在相當條件下成立「配合國體」的那個完全正確的立場（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三八頁）。

他不瞭解：布爾什維克如果沒有對立憲會議採取這種特殊政策，那他們就不能把千百萬民衆奪到自己方面來，因而也就會不能把十月武裝起義變成深入的人民革命。

很有趣的，就是托洛茨基甚至唾棄那些在布爾什維克論文裏遇見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認爲使用這些字眼是有傷馬克思主義者體面的。

托洛茨基顯然忘記了：列寧這位不容置疑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間，即是在專政勝利前一月，還說「必須使全部政權立刻轉歸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民主派掌握」（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九八頁）。

托洛茨基顯然忘記了：列寧這位不容置疑的馬克思主義者，引證馬克思致爾格爾曼的那封有名的信（寫於一八七一年四月）上所說打破官僚軍事國家機關是大陸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的言論時，白紙黑字寫過下面一段話：

「馬克思所說破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是『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這個非常深刻的意見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從馬克思口中說出『人民』革命這一概念來，這似乎是很奇怪，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份子和孟什維克這些司徒盧威信徒，這些想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人，也許會把馬克思這句話宣佈爲『失言』。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曲解成非常鄙陋的自由主義思想，以爲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對立以外，再沒有什麼別的東西；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對立的見解也是極端死板的：在一八七一年的歐洲大陸上，無論在那一國內，無產階級都還沒有成爲人民大多數。把真正大多數人民吸引到運動中來的『人民』革命，當時祇有將無產階級和

農民兩者都包括在內，才能成爲這樣的革命。在當時正是這兩個階級組成爲「人民」。這兩個階級因爲同受「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所壓迫、摧殘和剝削而聯合起來。打碎這個機器，毀壞這個機器，——這就是「人民」，大多數人民，即工人和大多數農民底真正利益，這就是貧農和無產者自由聯盟底「預備條件」，而沒有這個聯盟，則民主制就不穩固，社會主義改造就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至三九六頁）。

列寧這一段話，是不可忘記的。

總之，善於把羣衆引到革命陣地上來，藉以使羣衆根據本身經驗確信黨口號正確這一點，是保證把千百萬勞動者牽到黨方面來的最重要條件，——這就是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什維克策略底第四個特點。

我認爲，以上所述，已完全足以使人認清這個策略底各個特徵了。

（四）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

毫無疑義的，革命在歐洲各基本國家內同時勝利的籠統理論，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不能勝利的理論，乃是一個矯揉造作而毫無生氣的理論。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七年來的歷史，並不是證實了這個理論，而是推翻了這個理論。這個理論不僅不可採納爲世界革命發展底方案，因爲它是與顯然的事實相矛盾的。它尤其不可採納爲一個口號，因爲它不是展開，而祇是束縛那些因爲某種歷史條件

而有單獨衝破資本戰線可能的個別國家底首倡精神；因為它不是推動個別國家去積極進攻資本，而祇是推動個別國家去消極等待「總解決」時機；因為它不是在個別國家無產者中間培養革命堅決精神，而是培養漢姆列特猶疑精神，顧慮「萬一別國不來援助，那又怎麼辦呢」。列寧說得完全對：無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標本的現象」，而「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却祇能是「罕有的例外情形」（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可是，大家知道，列寧的革命論並不以此為限。它同時還是世界革命發展論。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並不是一個自滿自足的任務。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的革命，不應把自己看作是自滿自足的東西，而應看作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助力和工具。因為革命在一個國家——這裏是說在俄國——獲得勝利，不僅是帝國主義不平衡發展和日益崩潰過程的產物，而且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

毫無疑義的，世界革命底發展道路，已不像從前在革命還沒有在一個國家內勝利以前，在充分發展的帝國主義，即「社會主義革命前夜」尚未出現以前所能想像的那樣簡單了。因為現在已出現了這樣一個新因素，如在充分發展的帝國主義條件下發生作用的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發展規律，這個規律是說明軍事衝突必不可免，世界資本戰線一般削弱，而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因為現在已出現了這樣一個新因素，如處在西方與東方間，處在世界財政資

益層上面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註。

本剝削中心與殖民地壓迫舞台間的偉大蘇維埃國家，單是這個國家存在的事實，就能使全世界革命化。

所有這些，都是在研究世界革命道路時不可不顧到的因素（關於其他的次要的因素，我姑且不講）。

從前，人們通常認為革命底發展道路，將是社會主義成分首先在那些更為發展的「先進」國家裏平衡地「成熟起來」。現在，這個觀念已需要重大的改變了。

列寧說：

「現在國際關係的體系已形成得這樣，即在歐洲有一個國家被各戰勝國所奴役，——這就是德國。再則，西歐有些國家，而且是最老的國家，因獲得勝利而處於一種便利地位，能夠利用這一勝利來向本國被壓迫階級作一些不關重要，但終能把這些國家裏的革命運動推延下去，而造成某種「社會和平」局面的讓步」。

「同時東方許多國家，如印度和中國等等，正因為受到最近這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影響而完全被拋出了自己的常軌。它們的發展已最終循着一般歐洲式資本主義軌道去進行了。在它們那裏已開始醞釀着一般歐洲式的事變。現在全世界上的人都看得清楚：這些國家已被捲入到不能不引起整個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發展漩渦中去了」。

因為有這種情形，由於有這種情形，所以「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不會是像我們從前所期待的那樣完成的。它們這一種發展的過程，不會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

裏平衡「成熟」，而會是經過某些國家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過帝國主義大戰中的第一個戰敗國家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被剝削的道路來完成的。另一方面，正由於這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底影響，東方已最終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五至四一六頁）。

除此以外，如果還注意到這樣一件事實，即不僅是各戰敗國和殖民地被各戰勝國所剝削，而且一部分戰勝國也落入兩個最強大戰勝國，即英美兩國財政資本剝削的羅網；所有這一切國家間的各种矛盾是使世界帝國主義解體的一個最重要因素；除這些矛盾以外，在每個國家內部，還有各種極深刻的矛盾存在着和發展着；所有這一切矛盾，又因有偉大蘇維埃共和國與這些國家並存的事實而日益加深和尖銳化，——如果注意到這一切，則特殊國際形勢底情景，就會多少完全了。

最可預期的，是世界革命將會經由許多新國家用革命手段脫離帝國主義國家體系，而同時各帝國主義國家底無產階級却援助這些新國家底無產者的道路發展。我們看見，第一個脫離了這體系的國家，第一個獲得了勝利的國家，已獲得其他各國工人羣衆和一般勞動羣衆底援助。沒有這種援助，它便不能支持下去。毫無疑義，這種援助一定會增強和發展起來。但同樣毫無疑義的，是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愈澈底鞏固，這個國家愈迅速變成爲更加擴展世界革命的基礎，變成爲更加破壞帝國主義的主要武器，那末世界革命發展過程，許多新國家脫離帝國主義體系的過程，也一定會來得愈迅速，愈澈底。

如果說沒有幾個國家內的無產者共同努力，第一個獲得解放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就不可能，——這固然是正確的；那末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其餘各國工人羣衆與勞動羣衆的幫助愈切實，則世界革命也將愈迅速和愈徹底發展，——這同樣也是正確的。

這種幫助應當表現於什麼呢？

第一，這種幫助應當表現於獲得勝利的國家「最高限度地實行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世界各國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第二，這種幫助應當表現於一國「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三至二三三頁）。

獲得勝利的國家所給予的這種幫助底特點，不僅在於它能加速其他各國無產者底勝利，而且還在於它既然促進這一勝利，同時也就是保證社會主義在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內達到最終的勝利。

最可預期的，是在世界革命發展進程中，會造成個別蘇維埃國家內社會主義策源地和這些策源地在全世界範圍內組成的體系，去與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帝國主義策源地和這些國家在全世界範圍內組成的體系並列，而這兩個體系間的鬥爭，就會充滿世界革命發展底歷史。

列寧說：

「因為若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所進行的較爲長期的堅持鬥爭，便無法保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自由聯合起來」（同上）。

十月革命底世界意義，不僅在於它是一個國家在衝破帝國主義體系這件事業中的偉大創始，不僅在於它是帝國主義國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策源地，而且還在於它是世界革命第一階段和世界革命繼續發展過程底強大基礎。

因此，不僅那些忘掉了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而宣稱一國革命勝利純粹是民族現象和僅僅是民族現象的人，說得不對。而且那些雖記得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而竟企圖把這個革命看作一種祇應接受外援的被動現象的人，也說得不對。其實，不僅十月革命要有其他各國革命底援助，而且其他各國革命也要有十月革命底援助，以求加速和推進推翻世界帝國主義的事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

獻給

聯共（布）列寧格拉組織

斯大林

（一）列寧主義底定義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裏所給的那個有名的列寧主義定義，大概已經爲大家所公認了。這個定義就是：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

這個定義是否正確呢？

我認爲是正確的。其所以正確，第一是因爲它正確指出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認定它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而與某些批評列寧的人妄說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後產生的那種意

見相反。其所以正確，第二是因為它正確指出列寧主義底國際性質，而與社會民主黨硬說列寧主義祇能適用於俄國民族環境的那種意見相反。其所以正確，第三是因為它正確指出列寧主義與馬克思學說的有機聯系，認定它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而與某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認為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更進的發展，而僅僅是恢復馬克思主義和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俄國實際情形的那種意見相反。

所有這些，似乎是不需要什麼特別解釋的。

然而，在我們黨內，却還有些人認為必須給列寧主義下一個與此不同的定義。例如，季諾維也夫認為：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戰爭與直接在一個農民國家裏開始的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季諾維也夫所特別着重指出的句子，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把俄國底落後性及其農民性質放進到列寧主義定義中去，這究竟是表明什麼呢？

這是表明，他把列寧主義從國際無產階級學說變為俄國特殊情況底產物。

這是表明，他替鮑威爾和考茨基助威，因為鮑威爾和考茨基正是否認列寧主義能適用於其他資本主義更為發展的國家的。

不待說，農民問題對於俄國有極重要的意義，我們俄國是一個農民國家。可是，這件事實對於

●着重點是季諾維也夫自己加的。——斯大林註。

估計列寧主義底基礎，究竟能有什麼意義呢？難道列寧主義僅僅是根據俄國條件和專為俄國製定的，而不是根據帝國主義條件和為一般帝國主義國家製定的麼？難道列寧以下諸著作，如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派」幼稚病等等，祇是對於俄國有意義，而不是對於一般帝國主義國家皆有意義麼？難道列寧主義不是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經驗底綜合麼？難道列寧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不是對於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黨都是適用和必要的麼？難道列寧說「布爾什維主義是可供世界各國效法的策略模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六頁），不是說得正確麼？難道列寧說「蘇維埃政權與布爾什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具有國際意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一至一七二頁），不是說得正確麼？難道例如列寧以下一段話不是說得正確麼：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由於俄國很落後和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質，所以與先進國家比較起來，不免有一些特點。但俄國基本力量及社會經濟底基本形式也是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一樣的，所以這些特點只能牽涉到非最主要之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〇八頁）。可是，如果所有這些都是對的，那末難道不應當由此得出結論說，季諾維也夫所下的列寧主義定義，決不能算是正確的麼？

這種以民族為限的列寧主義定義，怎能與國際主義相容呢？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二) 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裏說：

「有人以爲列寧主義中的基本要點是農民問題，以爲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並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問題。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爲政權而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是一個附帶的問題。」

這個原理是否正確呢？

我認爲是正確的。這個原理是完全從列寧主義定義中得出來的。的確，既然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又是無產階級專政，那末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當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就是闡明這個問題，就是論證這個問題並使其具體化。

可是，季諾維也夫顯然是不同意於這個原理的。在他所著紀念列寧一文裏說道：

「我已經說過，農民作用問題是布爾什維主義，即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

季諾維也夫底這一原理，明明是完全從他所下的那個不正確的列寧主義定義中得出來的。因此，這一原理，也和他所下的列寧主義定義一樣，是不正確的。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內容」(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三七頁)，這一提綱是否正確呢？是絕對正確的。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與策略，這一提綱是否正確呢？我認爲是正確的。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由此所應得出的結論是：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列寧主義底根基，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

帝國主義問題，帝國主義發展的躍進性問題，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無產階級國家問題，這國家底蘇維埃形式問題，黨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作用問題以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恰巧都是列寧所闡明的問題，——這難道不是事實麼？正是這些問題構成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底基礎和根基，——這難道不是事實麼？不闡明這些基本問題，就根本不能從無產階級專政觀點上去闡明農民問題，——這難道不是事實麼？

不待說，列寧是個深知農民問題的人。不待說，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問題，對於無產階級有極重要的意義，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底組成部分。可是，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沒有擺着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也就不會有無產階級底同盟者這個附帶問題，即農民問題，——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沒有擺着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個實踐問題，也就不會有與農民聯盟的問題，——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如果列寧不是站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基礎上來闡明農民問題，而是離開這個基礎，站在這個基礎以外來闡明這個問題，那他就會不是一個最大的無產階級思想家，像他實在是的那樣，而不過是一個簡單的「農民哲學家」，像國外那些舞弄文墨的庸人時常把他描寫成的那樣了。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農民問題是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那末列寧主義對於那些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對於非農民的國家，就是不適用的，就是不必要的；

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那末列寧主義就是世界各國無產者底國際學說，它對於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國家——其中也包括那些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都是適用而且必要的。

二者必取其一。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在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裏，認為「不斷革命論」是輕視農民作用的「理論」。那裏說道：

「所以，列寧進行鬥爭反對那些「不斷」革命論者，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停頓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就是主張不停頓革命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為無產階級最大後備力量的作用」。

我對俄國「不斷論者」所作的這個評語，直至最近都是大家所公認的。可是，這個評語一般說來雖是正確，但還不能認為是詳盡無遺的。一方面，一九二四年的辯論；另一方面，對於列寧著作的仔細分析，都已經指明：俄國「不斷論者」底錯誤，不僅在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底作用，並且還在

於他們輕視了無產階級能領導農民的力量和本事，還在於他們不相信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

因此，在我所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小冊子裏（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已經擴大了這個評語，並且用另一個更完全的評語來把它替代了。在這本小冊子裏關於這點是這樣說的：

「迄今以前，通常都只指出『不斷革命』論底一方面，即是它那種不相信農民運動含有革命能力的思想。現在，爲說得公允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須補充指出它的另一方面，即是它那種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具有力量和本事的思想」。

這當然不是說，列寧主義曾經反對，或者現在反對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所宣佈的那個無括弧的不斷革命思想。恰巧相反。列寧是正確瞭解並發展了不斷革命思想的唯一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列寧與「不斷論者」間的區別，就在於「不斷論者」曲解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思想，把它變成了毫無生氣的書本上的奧理，而列寧則採納了純粹的不斷革命思想，把它變成了自己的革命論基礎之一。要記着，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已提出來的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便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具體實現形式之一。請看列寧遠在一九〇五年論到這個問題時所說的話吧：

「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恰巧是依照我們的力量爲標準，依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爲標準，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停頓的革命*。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我們決不半途而廢：

我們決不陷於冒險主義，決不違背自己的科學良心，決不追求便宜的聲譽，所以我們只能說，而且只是說一點：我們將用全力幫助全體農民去實現民主革命，以便我們無產階級黨更易於儘快過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務，即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八六至一八七頁）。

再看列寧經過十六年以後，即是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後，論到這個問題時所說的話：

「考茨基輩，希法亭輩，馬爾托夫輩，切爾諾夫輩，黑爾克維特輩，龍格輩，麥克唐納爾輩，屠拉梯輩以及「第二半」馬克思主義中的其他英雄們，不能瞭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相互關係。前一革命轉變為後一革命*。後一革命順便解決前一革命底問題。後一革命鞏固前一革命底事業。鬥爭，而且祇有鬥爭，才能解決：究竟後一革命能夠如何搶過前一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頁）。

我請特別注意前一段話，這段話是從列寧發表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的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一文中引來的。我着重指出這一點，因為有些人至今還硬說列寧祇是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後，大概在一九一六年左右，才得出了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即不斷革命思想。這一段話毫無疑義地說明他們已經是深入迷途了。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之點何在呢？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間的區別，可以歸納爲下列五個基本要點：

(1) 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義經濟較爲現成的形式已經具備時開始發生的，這種形式還在公開革命發生以前，就已在封建社會內部生長和成熟了，而無產階級革命却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底現成形式尚未具備，或幾乎尚未具備時開始發生的。

(2) 資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就是奪取政權，並使這政權適合於現有的資產階級的經濟，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却是要在奪取政權以後來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3) 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以奪取政權來完成的，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却祇是無產階級革命底開始，並且要把政權利用爲改造舊經濟和組織新經濟的槓桿。

(4) 資產階級革命祇限於用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去執掌政權，所以它無須打破舊國家機器；而無產階級革命却要把它所有一切剝削者集團都從政權高峯上推倒下去，並使全體被剝削勞動羣衆底領袖，即無產階級，去執掌政權，所以它必須打破舊國家機器而以新的代替之。

(5) 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在若干長久時期內把千百萬被剝削勞動羣衆團結在資產階級周圍，正因為這些羣衆是被剝削勞動羣衆；而無產階級革命要想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務，即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建成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却能夠而且應當使這些被剝削勞動羣衆去同無產階級結成長期的聯

盟，正因為他們都是被剝削勞動羣衆。

請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幾個基本原理吧：

列寧說：

「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區別之一，就是對於由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說來，還在舊制度內部，就已有新經濟組織逐漸形成起來，而這些經濟組織就逐漸改變着封建社會所有各方面。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祇有一個任務——掃除、摒棄和破壞舊社會所有一切桎梏。任何資產階級革命一完成這個任務，就算是完成了它所應作的一切：它加強着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社會主義革命却處在完全另外一種情況中。由於歷史進程轉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落後，則它由舊時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也越困難。這裏除破壞任務而外，更加上一種空前困難的新任務，即組織任務」（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

列寧往下又說：

「如果俄國革命那種經歷了一九〇五年偉大經驗的民衆創造力，不是尙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就創立了蘇維埃，那它們在十月間就會無論如何也不能奪得政權了，因為在當時，成功只是依靠於那包括千百萬羣衆的運動已有現成的組織形式爲轉移。蘇維埃就是這種現成的形式，因此我們在政治方面就能預期我們後來所經歷的那些燦爛的成功和全盤的凱歌行進，因為新政權形式已經預備好了，而我們祇須頒佈幾道法令來把蘇維埃政權從它在革命最初幾月間的胚胎狀態

中，變成爲在俄羅斯國家內奠定的法定形式，即變成爲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

列寧說：

「還剩下兩個極困難的任務，而這兩個任務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按照我們革命在最初幾月間所經歷的那種凱歌行進道路來解決的」（同上）。

「第一，這就是擺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內部組織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就在於當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時，已有資本主義關係底現成形式，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却得不到這種現成關係，不過是有資本主義那些最發展的形式，而資本主義那些最發展的形式，實際上又祇包括一小部分工業上層，却還極少觸及農業。組織統計，監督各巨大企業，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爲一整架大機器，變成爲一個使幾萬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動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擺在我們肩上的偉大組織任務。據現時勞動條件看來，這個任務無論如何都是不容許如我們從前解決國內戰爭任務那樣用高呼「烏啦」的方式來解決的」（同上，第三一六頁）。

「第二個極大的困難：——即國際問題。如果我們很容易就打破了克倫斯基匪股，如果我們很容易就在本國創立了政權，如果我們毫未費力就得到了關於土地社會化和工人監督制的法令，——如果我們很容易就獲得了所有這一切，那就只是因爲當時徹倖湊成的條件，在一個短時間內給我們擋開了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帝國主義擁有全部資本勢力，擁有組織得極其完備而

成爲國際資本真正實力和真正優越的軍事技術，——它無論如何，無論在什麼條件下，無論按國際帝國主義底客觀地位來說，或按它所體現的那個資本主義階級底經濟利益來說，都是不能與蘇維埃共和國和平共處的，——其所以不能，是由於商務聯繫，是由於國際財政關係。在這裏，衝突是必不可免的。由此就有俄國革命面前的最大困難，就有它所應解決的最大歷史問題：必須解決國際任務，必須引起國際革命」（同上，第三一七頁）。

無產階級革命底內部性質和基本意思，就是如此。

沒有強力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可以實現這種根本改造資產階級舊制度的事業呢？

當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以爲可用和平方式，在適應於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範圍中來實現這樣的革命，那就是精神錯亂，神經失常，或者是公然無恥地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了。

我們必須特別着重，特別堅決指出這個原理，因爲無產階級革命暫且還祇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是被那些仇視它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着，而且國際資本又不能不幫助這個國家裏的資產階級。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被壓迫階級底解放，不僅非有強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七三頁）。

「那些自稱爲『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奴僕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說：『首先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要讓大多數居民，在保存私有制度的情形下，即是在保存資本權力和資本壓迫的情形下，去表示贊成無產階級黨，——只有在那時候，無產階級黨才能夠，才應當奪取政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七頁）。

「我們却說：首先要讓革命無產階級去推翻資產階級，打破資本壓迫，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關，——那時候，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便能用剝奪剝削者的辦法來滿足大多數非無產者勞動羣衆底需要，而迅速取得這些羣衆底同情和擁護」（同上）。

列寧往下又說：

「無產階級爲要把大多數居民奪到自己方面來，第一，就應當推翻資產階級而奪得國家政權；第二，就應當粉碎舊國家機關而施行蘇維埃政權，這樣就一舉而打破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者勞動羣衆中間的統治、威信以及影響；第三，就應當用革命手段，用剝奪剝削者的辦法來滿足非無產者勞動羣衆底經濟需要，以便徹底剷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者勞動羣衆中間的影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一頁）。無產階級革命底特徵，就是如此。

既然這樣，既然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特點，又是怎樣呢？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請看列寧所下的一個最概括的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吧：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底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獲得了勝利，奪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反對那雖已被打敗，但未被消滅，未嘗絕跡，未嘗停止反抗的資產階級，反對那加緊反抗的資產階級」（同上，第三一一頁）。

列寧反對把無產階級專政與「全民的」政權、「全民公選的」政權、「非階級的」政權混為一談，而說道：

「奪得了政治統治的那個階級，是在深知它是獨自奪取政治統治時奪得這個統治的。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底內容。祇有當一個階級知道，祇有它獨自奪取政權，而不用妄說什麼「全民的、全民公選的、全民尊崇的」政權的空話來自欺欺人時，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才有意思」（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八六頁）。

但這並不是說，一階級底政權，不和其他階級瓜分政權，而且不能和其他階級瓜分政權的無產者階級底政權，竟不需要其他階級被剝削勞動羣衆底幫助，竟不需要與這些羣衆結成聯盟便可實現自己的目的。恰巧相反。這個政權，一階級底政權，祇有經過無產階級與各小資產階級勞動羣衆，首先是與農民勞動羣衆實行的特式聯盟，才能奠定並貫徹到底。

這個特式聯盟究竟是什麼呢，其內容何在呢？這個與其他非無產者階級勞動羣衆實行的聯盟，一般是否和一階級專政思想相矛盾呢？

這個特式聯盟底內容，就在於這個聯盟底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這個特式聯盟底內容，就在於國家底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即無產階級黨，即共產黨，這個黨是不和其他政黨瓜分領導權，而且不能和其他政黨瓜分領導權的。

可見，這裏的矛盾僅僅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即勞動者先鋒隊與人數衆多的非無產者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智識界等等），或與大多數勞動者建立的特式階級聯盟*，是反資本的聯盟，是為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反抗及其復辟企圖而建立的聯盟，是為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而建立的聯盟。這是在特殊環境，即在猛烈國內戰爭環境中形成的特種聯盟；這是社會主義堅決的擁護者與其動搖的同盟者間的聯盟，有時則是社會主義堅決的擁護者與「中立者」間的聯盟（那時，聯盟就由鬥爭協定變為中立協定）；這是那些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以及精神上都不相同的階級間的聯盟」（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加米涅夫在他某一個報告中反對這樣瞭解無產階級專政時說道：

「專政並不是*一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

我認為，加米涅夫在這裏首先就是指我所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小冊子中的一段話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而說的，該段原文如下：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老練戰略家』用精敏手腕所『巧妙』『挑選出來』，並『合理憑藉於』某些居民階層的簡單政府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以推翻資本和達到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爲目標，而以無產階級擔任領導爲條件的階級聯盟」。

我現在還是完全擁護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因爲我認爲它是和列寧所下的那個前面引證過的定義完全相符的。

我斷定說：加米涅夫用這樣絕對肯定方式宣稱「專政並不是一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的說法，是和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毫不相容的。

我斷定說：祇有不懂工農結合思想，不懂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思想，不懂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權思想的人，才能這樣說。

祇有不懂下面這個列寧提綱的人，才能這樣說，而這個提綱就是：

「當革命在其他國家裏還沒有到來時，祇有與農民協定*，才能救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祇有不懂得下面這個列寧原理的人，才能這樣說，而這個原理就是：

「專政底最高原則*就是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夠保持自己的領導作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用和國家政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〇頁)。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最重要目的之一是鎮壓剝削者時說道：

「專政這一科學概念底意思，無非是無所限制，不受任何法律，絕對不受任何條規所拘束而直接憑藉於強力的政權」：「專政就是(請立憲民主黨人老爺們永遠記着)無所限制的，憑藉於強力而不是憑藉於法律的政權。在國內戰爭時，任何獲得了勝利的政權都祇能是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四一頁和第四三六頁)。

可是，專政雖然非有強力不可，但無產階級專政當然不僅僅是強力。

列寧說：

「專政雖然非有強力不可，但專政並不僅僅是強力，而且比先前勞動組織更高的勞動組織」(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〇五頁)。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是對剝削者採用的強力，甚至主要不是強力。這種革命強力底經濟基礎，它富有生命力和必獲勝利底保證，就在於無產階級是代表着並實現着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組織。要點就在這裏。共產主義所具力量底來源及其必然會完全勝利底保證，就在這裏」(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五至三三六頁)：「它(即專政。——斯大林註)的主要實質，就在於勞動羣衆底先進部隊，其先鋒隊，其唯一領導者，即無產階級底組織性與紀律性。無產階級底目的，就是創立社會主義社會，消滅社會劃分為階級的現象，使社會全體組成員都成為勞動者，消滅任何人剝削人制度底基礎。這個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實

現的，而是需要一個較爲長久的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一方面因爲改組生產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另一方面因爲根本改變生活一切部門是需要時間的，第三方面因爲慣於按小資產階級方式經營，按資產階級方式經營的那種巨大習慣勢力，是只有經過長期堅忍鬥爭，才能克服的。所以馬克思也就說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時期是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同上，第三一四頁）。

無產階級專政底特徵，就是如此。

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有三個基本方面：

（1）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鎮壓剝削者，保衛國家，鞏固與其他各國無產者間的聯繫，保證世界各國革命底發展和勝利。

（2）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使被剝削勞動羣衆完全離開資產階級，鞏固無產階級與這些羣衆的聯盟，吸收這些羣衆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保證無產階級對這些羣衆實行國家領導。

（3）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組織社會主義制度，消滅階級，保證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無國家的社會。

無產階級專政便是所有這三方面底合一。無論其中那一方面，都不能提出來作爲無產階級專政底唯一特徵，反轉來說，只要缺少其中某一方面，就足以使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復成爲專政。因此，無論除去這三方面中的那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危險。祇有把所有這三方面總合起來，才能得出一個完備而周到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

無產階級專政有其各個時期，各種特別形式，各種不同的工作方法。在國內戰爭時期特別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強力方面。可是，從這裏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國內戰爭時期沒有進行任何建設工作。不進行建設工作，便無法進行國內戰爭。反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特別表現得明顯的，却是專政底和平工作，組織工作和文化工作，革命法制等等。可是，從這裏同樣也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建設時期，專政底強力方面已經消失或可能消失。現時，在建設時期中，鎮壓機關、軍隊以及其他組織，也是如在國內戰爭時期一樣必要的。如果沒有這些機關，那末專政就沒有可能進行有若干保證的建設工作。不要忘記，革命暫且還祇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不要忘記，既然還有資本主義包圍，也就會有武裝干涉的危險，以及由此危險而發生的一切結果。

(五) 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黨和工人階級

我在上文裏已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歷史必然性方面，從其階級內容方面，從其國家本質方面，最後是從其應在整個歷史時期，即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所謂過渡時期內實現的破壞任務和創造任務方面說明了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我們就要從無產階級專政底結構方面，從其「機構」方面，從「引帶」、「槓桿」以及「指導力量」底作用和意義方面來說說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引帶」、「槓桿」以及「指導力量」總和起來，就構成「無產階級專政底體系」（列寧），而且無產階級專政底日常工作就是經過這些東西來實現的。

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這些「引帶」或「槓桿」是什麼呢？這個「指導力量」是什麼呢？為什麼需要這些東西呢？

槓桿或引帶就是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不運用這些組織，便無法實現專政。

指導力量就是無產階級底先進部隊，就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領導力量。

這些引帶，這些槓桿，這個指導力量是無產階級所必需的，因為如果沒有它們，那末無產階級在其爭取勝利的鬥爭中，在有組織有武裝的資本面前，便會成爲手無寸鐵的軍隊。這些組織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組織，那末無產階級在其爲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的鬥爭中，在其爲鞏固自己政權而進行的鬥爭中，在其爲建設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中，便會必遭失敗。這些組織底一貫幫助和先鋒隊底指導力量是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若何長久堅固的無產階級專政，便會是不可能的。

這些組織是什麼呢？

第一，這就是工人職工會及其在中心和各地的支脈，即許多生產的、文化的、教育的以及其他組織。它們把所有各業工人都聯合起來。這不是黨組織。職工會可以稱爲包括我國統治階級，即工人階級全體組成員的組織。它們是共產主義學校。它們從自己隊伍中提出優秀份子來担任一切管理部門方面的領導工作。它們把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份子與落後份子聯繫起來。它們把工人羣衆與工人階級先鋒隊連結起來。

第二，就是蘇維埃及其在中心和各地的許許多多的支脈，即行政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以及其他的國家組織，更加上無數自動組織起來的勞動羣衆團體，它們環繞着這些組織，並把這些組織與居民連結起來。蘇維埃是所有一切城鄉勞動者底羣衆組織。這不是黨組織。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直接表現。所有一切關於鞏固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都是經過蘇維埃實現的。無產階級對農民所實行的國家領導，就是經過蘇維埃實現的。蘇維埃把千百萬勞動羣衆和無產階級先鋒隊連結起來。

第三，就是所有各種合作社及其所有一切支脈。這是勞動者底羣衆組織，而不是黨組織。它們把勞動者聯合起來，首先是把他們作爲消費者聯合起來，然後又逐漸把他們作爲生產者聯合起來（農業合作社）。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廣闊建設時期，這種組織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它便利着無產階級先鋒隊與農民羣衆的聯繫，並使有可能來把農民羣衆引入社會主義建設底軌道。

第四，就是青年團。這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而不是黨組織，但它是很接近於黨的。其任務就在於幫助黨用社會主義精神教育年輕後輩。它以年輕後備人材供給無產階級在所有一切管理工作部門方面的其他一切羣衆組織。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無產階級進行廣闊文化教育工作時期，青年團已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最後，就是無產階級底黨，無產階級底先鋒隊。黨底力量就在於它把無產階級一切羣衆組織中所有無產階級優秀份子都吸收到自身中來。黨底使命就在於統一無產階級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羣衆組織底工作，並把它們的行動指向於一個目標，指向於解放無產階級的目標。把它們統一起來並

指向於一個目標，是絕對必要的，否則無法保證無產階級鬥爭底一致，否則無法領導無產階級羣衆去爲政權而鬥爭，爲建設社會主義而鬥爭。可是，能統一並指導無產階級所有一切羣衆組織底工作的，却只有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即無產階級底黨。只有無產階級底黨，只有共產黨，才能執行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這個基本領導者的作用。

爲什麼呢？

「第一，因爲黨是工人階級優秀份子集合點，這些份子是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時常領導它們的；第二，因爲黨既是工人階級優秀份子集合點，所以它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這些首領能夠領導本階級組織底一切形式；第三，因爲黨既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它是能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因而把工人階級所有一切非黨組織都變成爲服務機關，變成爲使黨與本階級連結起來的引帶的唯一組織」（見論列寧主義基礎）。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基本領導力量。

「黨是無產階級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列寧）。

總之：職工會是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它首先就是在生產方面把黨和本階級聯繫起來；蘇維埃是勞動者底羣衆組織，它首先就是在國家方面把黨和勞動者聯繫起來；合作社主要是農民底羣衆組織，它首先就是在經濟方面，在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把黨和農民羣衆聯繫起來；青年團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其使命就是幫助無產階級先鋒隊用社會主義精神教育新起後輩並培養年

輕後備人材；最後，黨是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基本指導力量，其使命就是領導這一切羣衆組織，大體說來，專政「機構」底情景，「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底情景，便是如此。

沒有黨爲基本領導力量，便不能有若何長久堅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用列寧底話來表示，「一般和整個說來，結果就是一個在形式上非共產黨的，靈活而比較廣潤的，很有力量的無產階級的機關，而黨就是經過這個機關去和本階級以及羣衆發生密切聯繫的；階級專政就是經過這個機關而在黨領導下來實現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二頁）。這當然不是說，黨能夠或應當代替職工會、蘇維埃以及其他羣衆組織。黨是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的。但它並不是直接來實現這個專政，而是運用職工會，經過蘇維埃及其支脈來實現這個專政的。沒有這些「引帶」，便不能有若何堅固的專政。

列寧說：

「沒有一些把先進階級先鋒隊和這階級羣衆，把這先鋒隊和勞動羣衆連結起來的「引帶」，便不能實行專政」：「黨是把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吸收到自身中來的，而這個先鋒隊就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沒有職工會這樣的基礎，便不能實現專政，便不能執行國家職能。這些職能是必須經過一些也是新式特別機關，即經過蘇維埃機關來實現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五頁和第六四頁）。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例如，在我們蘇聯這裏，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裏，有一件事實要算是黨領導作用底最高表現，即我們的蘇維埃組織或其他羣衆組織，非有黨底領導指示，便不會決定任何一個重要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也許可以說：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是它的先鋒隊「專政」，是它的黨，即無產階級基本領導力量「專政」。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如何說明了這點吧：

「田涅爾說，他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不過他所瞭解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完全和我們所瞭解的一樣。他說，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瞭解爲在實質上*是無產階級中有組織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的確，在資本主義時代，即是在工人羣衆遭受不斷剝削而不能發展其人類才能的時代，工人政黨底最大特點，就在於它們只能包括本階級底少數。政黨只能包含本階級底少數，正好像真正覺悟工人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裏都祇佔全體工人少數一樣。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這個有覺悟的少數能領導廣大工人羣衆，並引導他們前進。如果田涅爾同志說他是個根本反對政黨的人，但同時他又主張由少數最有組織最革命的工人來給整個無產階級指示道路，那我就說，我們彼此在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差別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七頁）。

但這是不是說可以在無產階級專政和黨領導作用（黨「專政」）間畫一個等號，可以把前後兩者看作一個東西，可以用後者去代替前者呢？當然不是這個意思。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例如蘇林就說過「無產階級專政是我們黨專政」（見列寧關於黨的學說，第九五頁）。這個提綱顯然是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若不離開列寧主義底立場，是否可以認爲這種把兩個東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西看作一個東西的說法是正確的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原因如下。

第一。上面從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演說中所引來的那一段話裏，列寧並沒有把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他祇是說，『祇有有覺悟的少數（即黨。——斯大林註）能領導廣大工人羣衆，並引導他們前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瞭解爲在實質上，是無產階級中有組織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說『在實質上』，這還不是說『完全』。我們往往說民族問題在實質上是農民問題。而這是完全正確的。但這還不是說，農民問題可以概括民族問題，農民問題按範圍來說是和民族問題相等，農民問題和民族問題是一個東西。不必證明：民族問題按範圍來說是比農民問題更廣泛，更豐富的。同樣，關於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也要這樣說。如果說黨是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而在這個意義上說，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黨『專政』，那這還不是說，『黨專政』（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東西，前者按範圍來說是和後者相等。不必證明：無產階級專政按範圍來說是比黨領導作用更廣泛，更豐富的。黨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是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什麼其他的專政。誰把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誰就是用黨『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無論決定那一個重要問題，都要有黨方面的領導指示。這是完全正確的。但這是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僅僅是黨底領導指示呢？這是不是說，因此就可以把黨底領導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指示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呢？當然不是這樣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黨底領導指示再加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對於這些指示的實現，再加上居民對於這些指示的實施。由此可見，這裏是有許多過渡和中間階段的，這些過渡和中間階段是無產階級專政很重要的因素。於是，在黨底領導指示與這些指示底實施之間，便有了被領導者底意志和行動，本階級底意志和行動，本階級願意（或不願意）擁護這些指示，善於（或不善於）實行這些指示，善於（或不善於）正確依照環境要求來實行這些指示的情況。顯然不必證明：担负有領導責任的黨，是決不能不顧及被領導者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是決不能忽視本階級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因此，誰把黨底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誰就是用黨底指示來代替本階級底意志和行動。

第三。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獲得了勝利，奪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這一階級鬥爭能表現於什麼呢？它能表現於無產階級進行許多武裝動作去打破那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所舉行的襲擊，或打破外國資產階級所舉行的武裝干涉。在無產階級政權尚未鞏固時，它能表現於國內戰爭。在政權已經鞏固後，它能表現於無產階級所進行的廣大的組織工作和建設工作，並吸收廣大羣衆來參加工作。在所有這些情形下，行動人物都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黨，僅僅一個黨，不要本階級贊助而單靠自身力量來舉行所有這一切動作的事情，是從來也沒有看見過的。黨通常祇是領導這些動作，其所以能領導這些動作，祇是由於它獲得本階級底贊助。因為黨不能概括本階級，不能代替本階級。因為無論黨有怎樣重要的領導的作用，但它始終是本階級底一部分。因此，誰把黨底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誰就

是用黨來代替本階級。

第四。黨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底直接執政的先鋒隊，是領導者』（列寧）。在這個意義上，黨掌握着政權，黨管理着國家。但這還不是說：黨是越過國家政權，無須國家政權而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的；黨是越過蘇維埃，不經過蘇維埃而管理國家的。這還不是說：可以把黨和蘇維埃，把黨和國家政權看作一個東西。黨是政權底中堅。但它不是國家政權，決不可把它和國家政權看作一個東西。列寧說：『我們是執政黨，所以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上層』與黨『上層』溶成一片，——它們現時在我國是溶成一片，而且將來也會是如此』（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〇八頁）。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列寧並不是想以此認定：我們所有一切蘇維埃機關，例如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運輸機關，我們的經濟機關等等，都是我們黨底機關；黨能代替蘇維埃及其支脈；可以把黨和國家政權看作一個東西。列寧屢次說『蘇維埃體系是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四頁和第一五頁）；但他從來沒有說黨是國家政權，黨和蘇維埃是一個東西。包含有數十萬黨員的黨，領導着包括有數百萬人——黨員和非黨員——的蘇維埃及其在中心和在各地方的支脈，但黨不能夠而且不應當用自己去代替它們。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並受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來實行的』；『黨底全部工作，都是經過不分職業而包括一切勞動羣衆的蘇維埃進行的』（見列寧全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二頁和第一九三頁）。專政是「必須：經過蘇維埃機關來實現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四頁）。因此，誰把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誰就是用黨來代替蘇維埃，代替國家政權。

第五。無產階級專政概念是個國家概念。無產階級專政本身是一定要包含有強力概念的。如果按專政這個名詞底本來意義來瞭解專政，那末沒有強力，就不會有專政。列寧所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就是「直接憑藉於強力的政權」（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一五頁）。所以，如果對於無產者階級來講黨專政，並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那就會是說：黨不僅應當是本階級底領導者、領袖和導師，而且應當是對本階級採用強力的一種國家政權。因此，誰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誰就是默然認為可以把黨底威信建築在強力上面，而這種想法是荒謬絕倫的，是完全和列寧主義不能相容的。黨底威信是由工人階級底信任來維持的。工人階級底信任又不是可能用強力取得，——用強力祇能喪失工人階級底信任，——而是要黨有正確理論，要黨有正確政策，要黨對工人階級忠誠，要黨與工人階級羣衆有聯繫，要黨有決心並善於說服羣衆來相信其口號正確，才可以取得的。

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著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由此所應得出的結論是：

(1) 列寧使用黨專政這個字，並不是指專政這個字底本來意義（『憑藉於強力的政權』）而言，而是指假借意義而言，指領導而言。

(2) 誰把黨底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誰就是曲解列寧，而謬將用強力對付整個工人階級的職能歸之於黨。

(3) 誰把實際上非黨所有的那些用強力對付工人階級的職能歸之於黨，誰就是違背先鋒隊和本階級之間，黨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底起碼要求。

這樣，我們就直接說到了黨和本階級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工人階級中的黨員和非黨員間的相互關係問題。

按列寧所下的定義，這種相互關係是『工人階級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的相互信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黨應當仔細傾聽羣衆底意見，應當細心對待羣衆底革命本能，應當研究羣衆底鬥爭實踐，並根據這點來審查自己政策底正確性，所以它不僅應當教導羣衆，而且應當向羣衆領教。

第二，這就是說：黨應當一天一天取得無產階級羣衆底信任，應當用自己的政策和工作來取得

。若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羣衆底擁護，它不是應當命令羣衆，而首先是應當說服羣衆，使羣衆易於根據本身經驗來認識黨底政策正確，所以它應當是本階級底領導者，領袖，導師。

違背這些條件，就是違背先鋒隊和本階級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就是破壞『相互信任』，既破壞階級紀律，又破壞黨的紀律。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即工人階級中的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是忠勇的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列寧往下又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鬥爭中鍛鍊成鋼鐵一般的黨，沒有爲本階級裏全體忠誠份子所信任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羣衆情緒和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見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可是，黨是怎樣取得本階級這種信任和擁護的呢？無產階級專政所需要的鐵的紀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它是在什麼基礎上長成的呢？

請看列寧如何說明這點吧：

「革命無產階級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檢驗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它對革命的忠實心，它的堅毅性，自我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是由於它善於與最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繫，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與他們溶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正確，由於它的政治戰略與策略正確，同時須使最廣大羣衆都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其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能成爲以推翻資產階級而改造全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黨，便不能實現其內部的紀律。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要想建立紀律的企圖，就不免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矯飾。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又不是能一下子產生的。只有長期的努力，艱苦的經驗，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的理論，才能使這種條件易於造成，但這個理論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在與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繫起來，才能最終形成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卷，第一七四頁）。

其次：

「爲要獲得戰勝資本主義的勝利，就要領導的政黨（共產黨），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與羣衆（即全體被剝削勞動者）間保持有正確的相互關係。只有共產黨，如果它真是革命階級底先鋒隊，如果它包括有革命階級中的一切優秀份子，如果它是由完全覺悟，十分忠實，受堅持革命鬥爭經驗所教育所鍛鍊過的共產主義者組成的，如果它把自己與本階級全部生活密切聯繫起來，而經過這個階級又與全體被剝削者羣衆聯繫起來，並享有這個階級和這些羣衆底完全信任，——只有這樣的黨，才能領導無產階級去作最無情的、堅決的、最後的鬥爭，反對一切資本主義勢力。另一方面，只有在這樣的黨領導下，無產階級才能展開其全部革命進攻威力，使那些被資本主義腐化了的很少數工人貴族、舊工會領袖以及合作社領袖等方面必不可免的冷淡以至於反抗行爲，完全不能發生作用，——只有在這樣的黨領導下，無產階級才能充分施展它因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結構本身所致，而比它在人口總數中所佔份額更大得不可計量的能力」（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一五頁）。

從這些引證裏就應得出如下的結論：

（1）黨底威信和工人階級中間爲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鐵的紀律，並不是建築在恐嚇或黨底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無限」權力上，而是建築在工人階級對黨的信任，工人階級對黨的擁護上；

(2) 工人階級對黨的信任，並不是一下子可以取得，不是憑靠用強力對付工人階級，而是要憑靠黨在羣衆中的長期工作，黨底正確政策，黨善於使羣衆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黨底政策正確，黨善於保證自己得到工人階級底擁護，並善於引導工人階級羣衆；

(3) 沒有黨以羣衆底鬥爭經驗爲後盾的正確政策，沒有工人階級底信任，便不會有而且不能有黨底真正領導；

(4) 如果黨享有本階級底信任，如果黨底領導是真正的領導，那就不可把黨及其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因爲若沒有深受工人階級信任的黨底領導（黨「專政」），便不能有若何堅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黨底威信和鐵的紀律不是一句空話，便是誇張和冒險。

決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領導（「專政」）對立起來。其所以不能，是因爲黨底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主要東西，如果這裏所說的是若何堅固的完全的專政，而不是例如巴黎公社那樣不完備不堅固的專政。其所以不能，是因爲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領導是站在一條工作路線上，是按照一個方向行動着的。

列寧說：

「單從提出『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黨），還是羣衆專政（羣衆黨）？』這一問題的事實來看，就可知道人們思想糊塗到了極端不可思議，無可救藥的地步：

誰也知道，羣衆是劃分爲階級的；，在大多數情形下，至少是在現代文明國內，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負責職務而稱爲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如果：一般地把羣衆專政和領袖專政對立起來，那就是荒謬愚蠢到可笑的地步』（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七和第一八八頁）。

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這個正確原理所由出發的前提，是認爲在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在黨與本階級間保持有正確的相互關係。它所由出發的假設，是認爲先鋒隊與本階級間的相互關係是常態的，是保持在「互相信任」範圍內的。

可是，如果先鋒隊與本階級間正確的相互關係，如果黨與本階級間「互相信任」的關係破壞了，那又會怎樣呢？如果黨這樣或那樣使自己與本階級對立起來，違背了自己與本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基礎，違背了「互相信任」底基礎，那又會怎樣呢？這種情形，一般說來是否可能呢？是的，是可能的。這種情形在如下的場合是可能的：

(1) 如果黨在羣衆中的威信不是建築在它的工作與羣衆底信任上，而是建築在它的「無限」權力上；

(2) 如果黨底政策顯然不正確，而它又不願加以修改，不願糾正自己的錯誤；

(3) 如果政策在大體上雖然正確，但羣衆還沒有準備好來領會這個政策，而黨又不願意或不善於等待一下，讓羣衆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黨政策是正確的。

在我們黨底歷史上，有過許多次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各種集團和派別組織所以倒塌而消散

了，就是因為它們違背了這三個條件中的某一個條件，有時甚至把所有這些條件都違背了。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把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專政」（領導）對立起來的說法，只有在如下的場合，才不能認為是正確的：

（1）如果對於工人階級來講不是把黨專政瞭解為本來意義上的專政（「憑藉於強力的政權」），而是瞭解為黨底領導，即是正如列寧所瞭解的那樣，絕對不容許用強力對付整個階級，不容許用強力對付本階級多數的那種領導；

（2）如果黨有根據來做本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就是說，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政策是適合於本階級利益的；

（3）如果本階級，如果本階級底多數，都接受這個政策，領會這個政策，並由於黨底工作而確信這個政策正確，信任黨並擁護黨。

違背這些條件，就一定會引起黨與本階級間的衝突，引起它們彼此的分裂，引起它們彼此的對立。

是否可以用強力來迫使本階級接受黨底領導呢？當然是不可以的。無論如何，這樣的領導是不會有何長久的。如果黨想始終都是無產階級底黨，那它就應當知道，它首先和主要是工人階級底領導者，領袖，導師。我們不能忘記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裏關於這問題所說的話：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使它能够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使它在一切被剝削勞動者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

建設自己社會生活事業中，能做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底導師，領導者和領袖。*（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八六頁）。

如果黨底政策是不正確的，如果黨底政策是與本階級底利益相衝突的，那是否可以認為它是本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下，黨如果始終都做領導者，就應當修改自己的政策，應當糾正自己的政策，應當承認自己的錯誤，並糾正這個錯誤。為證實這個原理起見，或可從我們黨歷史中援引這樣一件事實，如廢除餘糧收集制時期，當時工農羣衆顯然不滿意於我們的政策，當時黨就實行，公開誠懇地實行修改這個政策。請看列寧當時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如何說明廢除餘糧收集制而施行新經濟政策的問題吧：

「我們不應當設法隱瞞什麼，而應當爽直說：農民不滿意於我們與他們彼此間現有的相互關係形式，不願意這種相互關係形式，並且再不會這樣生存下去。這是不容置辯的。他們這種意志已表現得很肯定。這是絕大部分勞動居民底意志。我們應當顧及這一點，而且我們是很清醒的政治家，所以能夠爽直說：讓我們來修改我們對農民的政策吧。」*（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如果黨底政策竟因本階級在政治上落後——假定說——而還沒有得到本階級底信任和擁護，如果黨竟因事變尚未成熟——假定說——而還未能說服本階級來確信這個政策是正確的，那末是否可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以認為黨只要以自己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政策爲理由，就應當擔起提倡和領導責任去組織羣衆底決鬥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下，黨如果想做真正的領導者，就應當善於等待一下，應當說服羣衆來確信黨政策正確，應當幫助羣衆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這個政策正確。

列寧說：

「如果革命黨在各革命階級先進隊伍內以及全國內沒有爭得多數，那就說不上什麼武裝起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二頁）。

「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多數底觀點轉變，則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却又是由羣衆底政治經驗所造成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一頁）。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被我們奪得了。這是主要點。如果沒有這一點，那就連走向勝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這與勝利相隔還很遠。單靠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站在直接贊助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至少是站在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而完全不會援助其敵人的立場上時，單叫先鋒隊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了。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個立場，僅靠宣傳，僅靠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本身的政治經驗」（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八頁）。

大家知道，我們黨在一九一七年間，由列寧提出四月提綱到十月武裝起義的時期內，正是這樣行動的。而正因為它依照列寧這些指示行動了，所以它就在武裝起義中獲得了勝利。

先鋒隊與本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底條件，大體上就是如此。

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而先鋒隊與本階級間的正确關係又沒有破壞，那末什麼是領導呢？

這種條件下的領導，就是善於說服羣衆來相信黨底政策正確，提出並實行一些能把羣衆引到黨底立場上來，並使他們易於根據本身經驗認識黨政策正確的口號，把羣衆提高到黨底覺悟水準，這樣來保證得到羣衆底擁護，並使羣衆有進行決鬥的決心。

因此，說服方法是黨領導本階級的基本方法。

列寧說：

「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有了打敗俄國資產階級和協約國資產階級的兩年半空前勝利以後，竟提出『承認專政』作爲加入職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在羣衆中間的影響，幫助孟什維克。因爲共產黨員底全部任務，就是要善於說服落後份子，要善於在他們中間做工作，而不是臆造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去和他們隔開。」（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七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應當說服一切工人，直至最後一個爲止，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着手行動，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開始行動。絲毫也不是。這只是說，黨在進行決定勝負的政治行動以前，應當進行長期革命工作，以保證自己得到多數工人羣衆底擁護，至少是取得本階級多數底善意中立。否則那關於爭取工人階級多數到黨方面來是勝利革命必要條件的列寧原理，就會沒有任何意思了。

好吧，而如果少數不願意，如果少數不肯自願服從多數底意志，那又應怎樣對待這個少數

呢？黨既已得到多數底信任，它是否可以，是否應當強迫少數底意志呢？是的，是可以而且應當的。領導是由說服羣衆的方法——黨用以影響羣衆的基本方法——來保證的。可是，這並不絕對排斥，而是預定要採用強迫手段，如果這強迫手段是有工人階級多數對於黨的信任和擁護爲其基礎的，如果這強迫手段是在說服了多數以後來對少數採用的。應當記起我們黨內在職工會問題辯論時期對於這一點的爭論。當時，反對派底錯誤，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底錯誤，是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在於反對派當時認爲可以採取強迫手段呢？不是的，並不在這裏。當時，反對派底錯誤，是在於它既不能說服多數來相信它自己立場正確，既已喪失多數底信任，却竟還是要去採用強迫手段，竟堅持要「振刷」那些擁有多數信任的人。

請看列寧當時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發言中所說的話吧：

「爲要建立工人階級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的相互關係，相互信任，那末如果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犯了錯誤：就須糾正這個錯誤。可是，當人們竟開始來擁護這個錯誤時，這就會成爲政治危險底來源。如果我們沒有根據枯士梭夫在這裏所表明的那些情緒來採取盡可能的民主辦法，那我們就會陷於政治破產了。我們應當首先說服，然後才實行強迫。我們無論如何都應當首先說服，然後才實行強迫*。我們未能說服廣大羣衆，於是就違背了先鋒隊與羣衆間的正確相互關係」（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列寧在他所著的論職工會小冊子裏也是這樣說：

「只有當我們首先已爲強迫手段奠定了說服基礎時，我們才正確而有成效地運用了強迫手段」（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七四頁）。

而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爲，沒有這些條件，則任何領導都是不可能的。因爲，如果拿黨來說，那就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黨內行動底一致；如果拿整個階級來說，那就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階級行動底一致。否則在工人階級隊伍內就會發生分裂，渙散和解體。

黨的正確領導底基礎，大體上就是如此。

任何其他對於領導的見解，都是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官僚主義，隨便說它是什麼都可以，只不可說是布爾什維主義，不可說是列寧主義。

如果在黨與工人階級間，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保持有正確的相互關係，那就不可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領導（「專政」）對立起來。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尤其不可把黨與工人階級，把黨底領導（「專政」）與工人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蘇林根據不能把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這一點，就作出了不正確的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我們黨專政」。可是，列寧不僅說這樣對立是不可容許的。他同時還說，把「羣衆專政與領袖專政」對立起來也是不可容許的。那豈不是要根據這一點而把領袖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麼？如果我們循着這條道路走去，那我們就會應當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我們領袖專政」。而把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的政策，也就是要得出這種愚蠢結論來的哩！

季諾維也夫對於這問題的見解是怎樣呢？

季諾維也夫在實質上也與蘇林抱着同一觀點，就是把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不過有這樣一點分別，就是蘇林說得更直爽更明顯，而季諾維也夫却在那裏「兜圈子」。只要拿季諾維也夫所著列寧主義一書中的下述一段話來看，就可相信這點：

「按其階級內容看來，——季諾維也夫說，——蘇聯現存的制度是什麼呢？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蘇聯政權底直接彈簧機是怎樣呢？是誰實現工人階級政權呢？是共產黨呵！在這個意義上，在我們這裏，是黨專政。蘇聯政權底法律形式是怎樣呢？十月革命所創立的新式國家制度是怎樣呢？這就是蘇維埃制度。二者是絲毫不相矛盾的」。

二者不相矛盾，這當然是對的，如果對於整個工人階級來講是把黨專政瞭解為黨領導的話。可是怎樣可以根據這一點而在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專政」，蘇維埃制度與黨「專政」間畫一個等號呢？列寧曾把蘇維埃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而他這種看法是對的，因為蘇維埃，我們的蘇維埃，乃是勞動羣衆在黨領導下團結於無產階級周圍的組織。可是，列寧究竟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在什麼著作內，曾在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黨「專政」與蘇維埃制度間畫過一個等號，如現在季諾維也夫所作的一樣呢？不僅黨底領導（「專政」），而且領袖底領導（「專政」）也是與無產階級專政不相矛盾的。那豈不是要根據這一點而宣稱我們的國家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

● 著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家，也就是說黨專政的國家，也就是說領袖專政的國家麼？而季諾維也夫暗中偷運的那個把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的「原則」，也就是要得出這種愚蠢結論來的哩。

列寧在他的無數著作中稍許說到黨專政問題的地方，我只找到五處。

第一個地方，就是他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什維克的論戰；他在這裏說：

「當有人責備我們是一黨專政，而提議——如你們已經聽到的一樣——建立社會黨人統一戰線時，我們就說：『是的，是一黨專政！我們是站在這個基礎上，而且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地，因為這是在幾十年內奪得了整個工廠產業無產階級先鋒隊地位的黨』（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二三頁）。

第二個地方，就是在關於戰勝高爾察克事致工人和農民的信；他在這裏說：

「人們（特別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有他們大家，甚至其中的「左派」）把「一黨專政」——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人專政——當作稻草人來恐嚇農民。從高爾察克實例中，農民已學會不怕稻草人了。或者是地主資本家專政（即鐵的政權），或者是工人階級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三六頁）。

第三個地方，就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與田澤爾論戰時的演說。這篇演說，我在上面已經引證過了。

第四個地方，就是在幼稚病一書裏的幾行文字。這幾行文字，我在上面已經引證過了。

第五個地方，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大綱底草稿，這個草稿曾在列寧文存第三冊上發表，其中

有一個小題目叫做「黨專政」（見列寧文存，第三冊，第四九七頁）。

必須指出，在這五個地方中的兩個地方，即第二個地方與第五個地方，列寧是把「黨專政」這幾個字放在括弧以內的，這顯然是着重指明這個公式含有不確切的假借的意思。

同樣必須指出，在所有這五個地方，對於工人階級來講，列寧並不是把「黨專政」瞭解為本來意義的專政（「憑藉於強力的政權」），而是瞭解為黨底領導。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列寧在他任何一個解釋或祇是提及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作用的基本著作或次要著作中，連暗示也沒有暗示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我們黨專政」。恰巧相反，這些著作中每頁每行都是大聲反對這個公式的（請看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幼稚病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論黨底作用的提綱中，沒有一個字，真是沒有一個字說到過黨專政；而這些提綱是在列寧直接領導下規定的，並且列寧在其多次演說中屢次引證過這些提綱，認為它們是正確規定黨任務及其作用的模範。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

（一）列寧並沒有認為「黨專政」這個公式是無可非難的精確的公式，所以這個公式在列寧著作中間用得極少，並且有時還加上括弧；

（二）在很少數的地方，當列寧與敵人論戰而不得不說黨專政時，他通常都是說「黨專政」，

就是說我們黨獨掌政權，和其他政黨瓜分政權，而且他總是解釋道，對於工人階級來講，黨專政應當瞭解爲黨底領導，黨底領導作用；

(三)凡是在列寧認爲須要爲黨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作用下一個科學定義時，他絕對只是說黨對於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樣的地方有幾千處）；

(四)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沒有「猜想到」要把「黨專政」這個公式寫入論黨底作用的基本決議，即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那個決議中；

(五)從列寧主義觀點上看來，那些將黨「專政」，因而也就是將「領袖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或企圖將這些東西看作一個東西的人是不對的，在政治上是近視的，因爲他們這樣就違背了先鋒隊與本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底條件。

我還不說，把「黨專政」這個公式拿來而不加以上述附帶條件，就能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造成許多危險和政治缺憾。把這個公式拿來而不加以附帶條件，那就是等於：

(一)向非黨員羣衆說：切勿辯駁呀，切勿議論呀，因爲黨是無所不能的，因爲我們這裏是黨專政；

(二)向黨幹部說：勇敢些幹吧，強硬些逼迫吧，不傾聽非黨員羣衆底意見也是可以的，因爲我們這裏是黨專政；

(三)向黨上層說：可以自滿自足一下，或許還可以驕傲一下，因爲我們這裏是黨專政，「因而」也就是領袖專政。

正是在現今這時候，在羣衆底政治積極性高漲時期，指出這些危險是很適宜的，因爲此時黨有決心去仔細傾聽羣衆底意見，對於我們是有特別價值的；此時體貼羣衆要求，是我們黨底基本訓條；此時黨在政策方面必須有特別的審慎性和特別的靈活性；此時驕傲的危險，是黨在正確領導羣衆方面所遇到的最嚴重危險之一。

不可不記起列寧在我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至理名言：

「在人民中，我們（共產黨人。——斯大林註）還只是滄海一粟，只有當我們正確代表人民意識時，我們才能管理國家。否則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羣衆，於是整架機器就要倒塌」（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五六頁）。

「正確代表人民意識」，這就是保證黨能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執行其爲基本領導力量的光榮作用的必要條件。

（六）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裏（一九二四年四月，第一版），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

「從前認爲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爲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也要有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共同發動。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

情形了。現在，必須以這勝利有可能爲出發點，因爲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底不平衡性和躍進性，帝國主義內部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那些矛盾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見列寧主義基礎）。

這個原理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是不需要什麼解釋的。這種說法是用去反對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的，因爲社會民主黨人硬說，沒有在其他各國內同時勝利的革命，無產階級要在一個國家內奪得政權，就是空想。

可是，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裏，還有第二種說法。那裏說：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還不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社會主義底主要任務，即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任務，尚待解決。沒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的無產者共同努力，是否可能解決這個任務，是否可能在一個國家內達到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呢？當然是不可能的。爲要推翻資產階級，只需要一個國家底努力就夠了，這是我國革命底歷史向我們證明了的。爲要獲得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爲要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單靠一個國家底努力，特別是像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家底努力，就不夠了，——爲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共同努力』（見論列寧主義基礎初版）。

★指這本小冊子初版而言。

這第二種說法是用來反對那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是用來反對托洛茨基份子底意見的，因為托洛茨基份子認定，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專政，當其他國家內還沒有勝利革命時，便不能「抵擋那保守主義的歐洲」。

在這個限度內，——但只是在這個限度內，——這種說法在當時（一九二四年四月）是足夠的，而且它毫無疑義是有過相當益處的。

可是，後來當列寧主義在這方面所受的批評在黨內已被克服時，當在眼前已擺着一個新問題，即無須外援而能單用我們本國力量來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時，第二種說法便顯然不夠，因而也就不正確了。

這種說法底缺點何在呢？

它的缺點就在於它把兩個不同的問題聯結成爲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有沒有可能用一國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是應當給以肯定回答的；另一個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可不可以認爲它無須革命在其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便完全有保障免除外國武裝干涉危險，因而免除舊制恢復危險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是應當給以否定回答的。我還不說，這種說法可以使人設想，以爲用一國力量來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事；而這種想法當然是不正確的。

根據這一點，我就在我所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小冊子裏（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改變了，糾正了這種說法，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說有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危險的完全保障，另一個問題是說有在一個國家內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這一點是用以下兩個方

法達到的：第一，把「社會主義完全勝利」解釋成爲「免除舊制恢復危險的完全保障」，這是有經過「幾國無產者共同努力」才可做到的；第二，是根據列寧所著論合作制小冊子來宣佈一個不容置辯的真理，即我們擁有爲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見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這個新的說法，也就是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論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底任務這一著名決議底基礎，在這個決議上注意到資本主義穩定的事實而考察了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一九二五年四月），並認爲用我國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能而且必要的。

這個新的說法，同時也是我所著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工作總結這本小冊子底基礎，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即是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閉會以後立刻出版的。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提法的問題，在這本小冊子內說：

「我國有兩種矛盾。一種矛盾是內部的矛盾，即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此地是指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而言。——斯大林註）。另一種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其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此地是指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而言。——斯大林註）。第一種矛盾是完全可用一國努力來克服的，第二種矛盾却要有幾國無產者共同的努力才能解決，——誰把這兩種矛盾混爲一談，誰就犯了最粗鄙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誰就是糊塗。」

* 後來，我在論列寧主義基礎小冊子以後各版中，已用這個新的說法代替了舊的說法。

塗蟲，或者就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見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工作總結)。

關於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在這本小冊子內說：

「我們能夠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將和農民一起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去建設它」：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我們有：一切必要條件來克服所有一切內部困難以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能夠而且應當用自身的力量來克服這些困難」(同上)。

而關於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問題，在這裏則說：

「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就是免除武裝干涉企圖，因而就是免除復辟企圖的完全保障，因為若何嚴重的復辟企圖，只有在外來的嚴重援助下，只有在國際資本援助下，才有可能。因此，各國工人所給與我國革命的援助，尤其他們即令在幾個國家內勝利，是完全保障第一個獲得勝利國家免除武裝干涉和復辟企圖的必要條件，是保證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必要條件」(同上)。看來是很明白了。

大家知道，在我所著問題與回答小冊子(一九二五年六月)內，以及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中央政治報告中(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是這樣來解釋這個問題的。

事實就是如此。

我認為這些事實是大家都知道的，是連季諾維也夫也知道的。

如果現時在黨內思想鬥爭後幾乎已有兩年，並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通過了相當決議(一九二五年四月)之後，季諾維也夫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做結論時，竟

把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所著小冊子內一個完全不充分的陳舊說法拖出來，作爲解決這個早已解決的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的基礎，——那末季諾維也夫這種特殊的姿態，就只是證明他在這個問題上完全弄糊塗了。在黨已向前進展了的時候把它拉轉去，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決議已由中央全會批准以後迴避這個決議，這就是不可救藥地陷入了矛盾，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離開列寧道路，自己承認自己遭了失敗。

什麼是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呢？

這就是說，可能用我國內部力量來解決工農矛盾，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並在他國無產者同情與贊助下，但是無須他國無產階級革命預先勝利，便能利用這個政權來在我國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

沒有這種可能而建設社會主義，便是沒有前途的建設，便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建設。誰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誰不相信我國技術落後不是在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這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礙，誰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否認這種可能，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是離開列寧主義。

什麼是除非有他國革命勝利，社會主義就不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完全的最終的勝利呢？

這就是說，沒有至少幾國革命勝利，便不能完全保障免除武裝干涉的危險，也就是說，不能完全保障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危險。否認這一個不容置辯的原理，便是離開國際主義，離開列寧主義。

列寧說：

「我們不僅在一個國家裏生活着，而且是在各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裏生活着，而蘇維埃共和國與各帝國主義國家長期並存是不可能的。歸根結底，不是這個獲得勝利，就是那個獲得勝利。而當這個結局還未到來時，蘇維埃共和國與資產階級國家間的許多最可怕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統治階級，即無產階級，如果它願意統治並實行統治下去，那它還要用自己的軍事組織來證明這一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二頁）。

列寧在另一個地方說：

「我們面前有一個極不穩固，但終究是毫無疑義，不容置辯的相當的均勢。這是否會長久保持下去——我可不知道，而且我認為這是無法知道的。因此我們必須極其謹慎從事。我們政策中第一個訓條，由我們政府在一年以來工作中所得出的第一個教訓，一切工農所應當領會的教訓，就是要時刻警戒，要記着，我們是被那些公開表示極端仇恨我們的份子、階級和政府所包圍着的。必須記着，我們隨時都有間不容髮地遭到各種侵襲的危險」（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一七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季諾維也夫對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所持的觀點，又是怎樣呢？

請聽阿：

「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至少應當是瞭解爲：（第一）消滅階級，因而也就是說，（第二）取

消一階級專政，此地是說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季諾維也夫往下又說道：「爲要更確切認識一九二五年在我們蘇聯的問題是怎樣，便要分清兩件事情：（第一）有保證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這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當然是在一個國家範圍內也完全可以設想的；（第二）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即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社會」。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季諾維也夫並不是把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最終勝利瞭解爲有免除武裝干涉危險和免除復辟危險的保障，而是瞭解爲有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至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季諾維也夫却把它瞭解爲不能夠而且不應當達到建成社會主義的一種社會主義建設。得過且過，茫無前途的建設，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季諾維也夫底立場。

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明知不能建設成功而去建設，——這就是季諾維也夫所說出來的一種荒謬已極的結論。

但這是戲弄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呵！

季諾維也夫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做的結論中，還有這樣一段話：

「你們看一看，例如雅可福烈夫同志在最近這次庫爾斯克州黨代表會議上，竟講出什麼話來了。他問道：「我們在四面都受資本主義敵人包圍的條件下，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據上述一切，我們是有理由來說，我們不僅建設着社會主義，而且我們雖然暫且還是單獨的，暫且還是世界上唯一的蘇維埃國度，唯一的蘇維埃國家，但我們

定能建成這個社會主義」(庫爾斯克真理報，第二百七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這難道是列寧主義的問題麼？難道這裏沒有民族狹隘性的氣味麼？」*。

這樣，據季諾維也夫說來，承認有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就是站在民族狹隘性觀點上，而否認這種可能，却是站在國際主義觀點上。

可是，如果這是對的，——那末，一般是不是值得爲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份子而進行鬥爭呢？由此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這種勝利沒有可能麼？

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份子投降，——這就是從季諾維也夫所持論據底內部邏輯中得出的結論。

而這種與列寧主義毫不相干的荒謬議論，季諾維也夫却向我們捧出來作爲「國際主義」，作爲「十足的列寧主義」！

我斷定說：季諾維也夫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最重要問題上，是離開列寧主義而滾到孟什維克蘇漢諾夫觀點上去了。

讓我們來看列寧底言論吧。列寧還在十月革命以前，即在一九一五年八月論到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時，就已說過：

「經濟上政治上發展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

* 著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可能首先在少數或且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列寧這段話裏加有着重點的「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一語，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獲得了勝利的那個國家底無產階級，在奪得政權以後，能夠而且應當在本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而「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顯然用不着證明：列寧底這個明顯而確定的原理，是無須再加解釋的。否則列寧號召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就會令人莫解了。

由此可見，列寧底這個明顯原理，是與李諾維也夫說什麼我們能「在一國範圍內」建設社會主義而沒有可能把它建成的那個反列寧主義的糊塗「原理」相隔天壤的。

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即是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說的。可是，也許在一九一七年有了奪取政權的經驗以後，他的觀點已經有了變更吧？我們來看列寧在一九二三年寫的小冊子合作制吧。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列事說：

「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而且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所鄙視的合作社，便把完備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所必需的一切麼？這還不是說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換句話說：我們能夠而且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擁有爲建成這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

要比這些話說得更清楚些，大概是很困難的吧。

你們試把列寧底這個典型原理與季諾維也夫用以反駁雅可福烈夫的那個反列寧主義論調比較一下，就會懂得，雅可福烈夫只是重複了列寧認爲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的言論，而季諾維也夫斥責雅可福烈夫時表示反對這個原理，便是離開列寧而站上了孟什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站上了認爲在我們國家裏因技術落後而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

試問，如果我們沒有打算建成社會主義，那我們究竟爲什麼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奪取了政權呢？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本來是不應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奪取政權的，——這就是從季諾維也夫所持論據底內部邏輯中得出的結論。

其次，我斷定說：在關於社會主義勝利的這個最重要問題上，季諾維也夫違反了我們黨底明確決定，而這些決定是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論共產國際執委會擴大會議底工作與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底任務的著名決議裏明文規定了的。

讓我們來看這個決議吧。這個決議論到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問題時說道：

「兩個直接對立的社會體系並存的事實，經常引起資本主義封鎖及其他種種經濟壓迫手段、武裝干涉以及復辟的危險。因此，幾個國家內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底唯一保障，即免除復辟危險的保障。*」。『列寧主義教導說：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就是說有免除資產階級關係復辟危險的完全保障*，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從這裏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除非有技術上經濟上更為發展國家方面的「國家幫助」（托洛茨基語），就沒有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見決議）。

由此可見，決議是把社會主義最終勝利解釋為免除武裝干涉和免除復辟危險的完全保障，而與季諾維也夫在他所著列寧主義一書中的解釋完全相反。

由此可見，決議是認為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無須有技術上經濟上更為發展國家方面的「國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家幫助」，便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而與季諾維也夫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作結論時所用來反駁雅可福烈夫的那種論調完全相反。

試問這不是季諾維也夫對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決議的鬥爭，而是什麼呢？

當然，黨的決議有時也不是沒有過錯的。有時候，黨的決議也含有錯誤的。一般說來，可以假定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底決議也含有一些錯誤。也許季諾維也夫認為這決議是錯誤的。如果這樣，那末他就應當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地指出這一點。但不知季諾維也夫為什麼沒有這樣作。他寧願選定另外一條道路，即從後方來襲擊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底決議，同時連一句話也不提起這個決議，對決議不作任何公開批評。季諾維也夫大概是以為這條道路最容易達到目的。而他的目的却只有一個，就是要「改善」決議和「稍微」修改修改列寧。顯然用不着證明：季諾維也夫是打算錯了。

季諾維也夫底錯誤是從何處發生的呢？這錯誤底根源何在呢？

據我看來，這錯誤底根源，就在於季諾維也夫深信我國技術落後是在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這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障礙，深信無產階級因我國技術落後而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四月黨代表會議以前的一次黨中央會議上，曾試圖提出這個論據。可是，他們當時受到了反駁，不得不實行退却，竟在表面上服從了與他們相反的觀點，即中央大多數底觀點。可是，季諾維也夫雖然在表面上服從這個觀點，但始終都與這個觀點繼續作了鬥爭。請看我們黨莫斯科委員會在給列寧格勒州黨代表會議的覆信中如何說明了聯共（布）中央內的這次「事件」吧：

「不久以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政治局擁護了一種觀點，以為如果國際革命不來拯救我們，那我們就會因我國技術經濟落後而不能克服內部困難。而我們和中央大多數却認為：我們不管我國技術落後，並且違反着這種技術落後，而能夠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正在建設着，並一定會建成它。我們認為：這樣進行建設，當然是比在世界革命勝利條件下緩慢得多，但我們終究是前進着，而且要繼續前進。我們同時認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底觀點，是表示不信任我國工人階級以及跟着我國工人階級走的農民羣衆底內部力量。我們認為這個觀點是離開列寧主義立場的」（見覆信）。

這個文件是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開頭幾次會議時出現於報章的。季諾維也夫當然有可能就在代表大會上發言反對這個文件。很可注意的，就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竟沒有找到證據來駁斥我們黨莫斯科委員會所提出來反對他們的那個嚴重責備。這是不是偶然的事呢？我認為這不是偶然的事。這個責備顯然是打中了目標。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以用緘默辦法來「回答了」這個責備，正是因為他們「無言可答」。

新反對派看見有人責備季諾維也夫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事業，便表示氣憤。可是，既然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已經討論了整整一年，既然季諾維也夫觀點早已被中央政治局推翻了（一九二五年四月），而黨關於這個問題已形成了一定意見，並已把這意見明文規定於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底著名決議中（一九二五年四月），但季諾維也夫還是敢於在所著列寧主義一書內（一九二五年九月）發表言論來反對我們黨底觀點，然後還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重復這種言論，——

那末，季諾維也夫這樣頑強固執地堅持自己的錯誤，若不是因為季諾維也夫中了，且無可救藥地中了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事業的病毒，又是因為什麼呢？

季諾維也夫樂於把自己這種不相信的態度解釋為國際主義。但試問從什麼時候起，在我們這裏竟把那在列寧主義根本問題上離開列寧主義的行為解釋為國際主義呢？

如果說在這裏違反國際主義和違反國際革命的不是我們黨，而是季諾維也夫，那豈不是正確些麼？因為，試問我們這個「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是世界革命底根據地，而是什麼呢？但這個國家沒有能力來建成社會主義，那它是否能夠成為世界革命底真正根據地呢？如果這個國家沒有能力在自己這裏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份子，沒有能力在自己這裏達到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那它是否能夠保持其為吸引世界各國工人的最大中心，像它現在毫無疑義是這個最大吸引中心一樣呢？我認為是不能夠的。但從此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勝利，鼓吹這種不相信的態度，結果就會使我國喪失世界革命根據地資格，而使我國喪失這種資格，結果就會削弱世界革命運動麼。社會民主黨人老爺們是用什麼手段來恐嚇工人，使工人離開我們的呢？就是鼓吹說「俄國人決不會幹出什麼事情來」。我們現在是利用什麼來打擊社會民主黨人，而吸引一批工人代表團到我們這裏來，因而鞏固全世界共產主義陣地的呢？就是利用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績。所以，誰鼓吹不相信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成績的觀點，誰就是間接幫助社會民主黨人，誰就是削弱國際革命運動底發展規模，誰就必然離開國際主義，——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由此可見，季諾維也夫底「國際主義」，是與他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十足的列寧主義」一樣惡劣的。

因此，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把新反對派觀點估計爲「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估計爲「曲解列寧主義」，是估計得正確的。

(七) 爲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奮鬥

我認爲，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觀點，是新反對派底基本錯誤。我所以認爲這個錯誤是基本錯誤，是因爲新反對派其他一切錯誤都是從這個錯誤裏產生出來的。新反對派在新經濟政策問題，國家資本主義問題，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底本質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合作社作用問題，與富農鬥爭方法問題，中農底作用和比重問題方面所犯的一切錯誤，都是從反對派底基本錯誤中，從他們不相信有可能用我國力量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一錯誤觀點中產生出來的。

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這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就是不相信，農民基本羣衆由於我國發展中的某些條件而能被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第二，就是不相信，我國無產階級既掌握着國民經濟命脈，便能把農民基本羣衆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反對派關於我國發展道路問題的議論，就是默然從這兩個論據出發的，至於反對派是自覺地或是不自覺地這樣做，那都是一樣。

可能把蘇聯農民基本羣衆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麼？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裏，對於這個問題有以下兩個基本原理：

(一)「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爲一談。蘇聯農民不能不與西方農民不同，因爲蘇聯農民經歷了三次革命底教訓，他們同無產階級一起，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獲得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而西方農民却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獲得了土地，因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農民既慣於重視他們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並因有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而獲得了自由，便不能不是非常願與無產階級實行經濟合作的力量」。

(二)「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爲一談。西方農業是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是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發生瓦解和解體是完全自然的。在俄國却不是這樣。我國農業是不能按這樣的道路去發展的，因爲單是有蘇維埃政權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國有化的事實，也就不容許農業按這條道路發展。俄國農業應按另一條道路，即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在農村中發展羣衆合作制並由國家以優待借

款來幫助這合作制的道路去發展。列寧在他論合作制的論文中正確指示說：我們俄國的農業應當按新道路去發展，即經過合作社吸收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原則逐漸灌輸於農業，起初灌輸於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灌輸於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去發展」：「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農民是會很願意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破產道路的」。

這兩個原理是否正確呢？

我認為所有這兩個原理，對我們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整個建設時期，都是正確而不容置辯的。這兩個原理祇是列寧下述幾個著名提綱底表現，這些提綱就是關於無產階級與農民結合，關於把農民經濟納入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體系以內，關於無產階級應當協同農民基本羣衆走向社會主義，關於使千百萬農民羣衆合作化是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康莊大道，而且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發展條件下，「在我國，單純的合作制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發展」（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那末，在我們國家裏，農民經濟可能而且應按什麼道路發展呢？

農民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經濟。農民經濟按絕大多數農戶來說，是小商品經濟。而小商品農民經濟又是什麼呢？它是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十字路口的經濟。它既可能發展到資本主義方面去，如現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情形那樣，也可能發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如在我們國家裏，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所要發生的情形一樣。

為什麼農民經濟這樣不穩固，這樣不獨立呢？原因何在呢？

原因是由於農民經濟散漫，無組織，依賴於城市，依賴於工業，依賴於信貸制度，依賴於國家政權性質，最後是由於一個大家所知道的情形，即無論在物質方面或在文化方面，農村是跟着城市走的，而且是應當跟着城市走的。

農民經濟按資本主義道路去發展，就是使農民發生最深刻的分化——在一個極端上形成巨大的大地產，在另一個極端上引起大衆貧困化。這樣的發展道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農村，農民經濟，是依賴於城市，依賴於工業，依賴於城市集中信貸，依賴於政權性質，而在城市裏統治一切的却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信貸制度，資本主義國家政權。

在我們國家裏，城市既有完全另一種面貌，工業既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運輸業、信貸制度、國家政權等既是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裏，土地國有化既是全國通行的法律，——那末，農民經濟是否必須按這條道路去發展呢？當然不必按這條道路去發展。恰巧相反。正因為城市是農村底領導者，而在我國城市裏統治一切的又是掌握着國民經濟一切命脈的無產階級，所以農民經濟就應當按另外一條道路去發展，即按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去發展。

這是條什麼道路呢？

這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農戶在合作制各方面普遍合作化，把散漫農戶團結在社會主義工業圈，在農民中間，起初是在農產品銷售方面和農戶所需要的城市製造品供給方面，然後是在農業生產方面培植集體制原則。

而且愈往前去，這條道路也就愈加成爲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必不可免的道路，因爲銷售方面的合作化，供給方面的合作化，以至於信貸和生產方面的合作化（共耕社），是提高農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使廣大農民羣衆免除貧窮破產的唯一手段。

有人說，我國農民按其地位說來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因此他們不能按社會主義的道路發展。說農民按其地位說來不是社會主義性的，——這當然是對的。但這並不是一種足以反對農民經濟按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論據，因爲事實已經證明農村是跟着城市走的，而在城市裏指揮一切的却是社會主義工業。在十月革命時，農民按其地位說來也不是社會主義性的，他們當時完全沒有想要在我國奠定社會主義。他們當時所努力要求的，主要是消滅地主政權和結束戰爭，奠定和平。可是，他們當時終究跟着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走了。爲什麼呢？因爲當時推翻資產階級，由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擺脫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道路，是奠定和平的唯一道路。因爲當時沒有其他的道路，而且不能有其他的路。因爲當時我們黨探得了，找到了一個可把農民特殊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與全國共同利益（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使前者服從後者，而結果是農民認爲可以接受並且有利的標準。所以農民雖有其非社會主義的性質，還是跟着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行進了。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關於把農民吸入這個建設軌道問題，也要這樣說。農民按其地位說來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可是，他們應當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因爲除與無產階級結合以外，除與社會主義工業結合以外，除經過農民羣衆合作化而把農民經濟納入社會主義發展總軌道以外，就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其他足以救農民於貧窮破產境況的道路。

為什麼正是經過農民羣衆合作化呢？

因為羣衆合作化就是「我們所找到的一個能把私人利益、私人商業利益和國家對於這種利益的審查監督結合起來的標準，能使這種利益服從於公共利益的標準」（列寧），這個標準是農民認為可以接受而且有利的，這個標準使無產階級能把農民基本羣衆吸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因為農民利於經過合作制來銷售自己的商品並為自己的經濟供給機器，所以農民應當按羣衆合作化道路走去，而且一定會按這條道路走去。

而在社會主義工業領導下實行農戶羣衆合作化，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小商品農民經濟離開必然使農民大批破產的舊的資本主義的道路，而過渡到新的發展道路，即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正因為如此，所以為使農民經濟按新道路發展而奮鬥，為吸收農民基本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奮鬥，是我們黨底當前任務。

因此，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是作得正確的，它在所通過的決議上說：

「農村裏的社會主義建設基本道路，就是在保證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國家信貸機關以及無產階級所掌握的其他經濟命脈底經濟領導作用日益加強的條件下，吸收農民基本羣衆來參加合作社組織，並保證這個組織按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同時利用、克服並排擠這組織裏的資本主義份子」（見代表大會根據中央工作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

新反對派最深重的錯誤，就是不相信農民能按這條新道路去發展，看不見或不懂得這條道路在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道路。其所以不懂得這一點，就是因為它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能在我國獲得勝利，不相信我國無產階級能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

由此也就不懂得新經濟政策底兩重性，誇大新經濟政策底短處，把新經濟政策解釋為多半是退却。

由此也就誇大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份子底作用，並輕視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各個積極（社會主義工業、信貸制度、合作制、無產階級政權等等）底作用。

由此也就不懂得我們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本質，而對列寧合作制計劃底正確性持懷疑態度。

由此也就吹大農村中的分化，在富農面前張惶失措，輕視中農作用，企圖破壞黨關於保證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並一般就在黨底農村政策問題方面忽東忽西地亂攪。

由此也就不懂得黨為吸收千百萬工農羣衆來參加工業和農業建設，參加振興合作社和蘇維埃，參加國家管理，參加反官僚主義鬥爭，參加力求改善改造我們國家機關而進行的那種代表着新的發展階段，並且是保證社會主義建設所絕對必要的巨大工作。

由此也就感覺沒有希望，並因在我國建設中看見困難而茫然無主，懷疑我國工業化底可能，悲觀式地胡說黨在蜕化等等。

在他們那裏，在資產者們那裏，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好的；在我們這裏，在無產者們這裏，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壞的；如果西方不能及時發生革命，那我們的事情就要倒台了，——這就是新反對派底一般論調，而這種論調，在我看來是取消派的論調，但不知爲着什麼（大概爲着令人發笑）反對

派竟把它假冒爲「國際主義」。

反對派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季諾維也夫說，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却。所有這些說法，當然都是不對的。其實，新經濟政策是黨容許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而預期社會主義成份定會戰勝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其實，新經濟政策只是以退却而開始了的，但它是打算着在退却過程中實行重新佈置力量並舉行進攻的。其實，我們實行進攻已有幾年了，而且進攻得很有成效，我們發展着我們的工業，發展着蘇維埃商業，排擠着私人資本。

可是，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說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却，——這個提綱底意思是怎樣呢？這個提綱是從什麼出發的呢？

它是從一種不正確的設想出發，就是以爲在我們這裏現時所發生的是單純的資本主義恢復過程，是單純的資本主義「復歸」過程。正因為反對派這樣設想，所以它懷疑我國工業底社會主義本質。正因為反對派這樣設想，所以它在富農面前張惶失措。正因為反對派這樣設想，所以它非常匆忙地抓住那些關於農民分化的謬說數目字。正因為反對派這樣設想，所以它特別善於忘記中農是我國農業裏的中心人物。正因為反對派這樣設想，所以它輕視中農底比重，而懷疑列寧底合作制計劃。也只有用這種設想，才可以「論證」新反對派那種不相信新的農村發展道路，不相信吸收農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的觀點。

其實，現在我國所發生的，並不是單方面的資本主義恢復過程，而是雙方面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社會主義發展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的矛盾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克服資本主

義成份的過程。這無論在有國家工業爲社會主義基礎的城市中，無論在有與社會主義工業結合的羣衆合作制爲保證社會主義發展的基本環鈎的農村中，都是不容置辯的。

單純的資本主義恢復過程是不可能的，這至少是因爲我國政權是無產階級的政權，大工業是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運輸業和信貸事業是由無產階級國家支配着。

分化決不能像先前那樣厲害，中農仍是農民底基本羣衆，而富農則不能再有舊時那樣的力量，這至少是因爲我國土地已實行國有而禁止買賣，我國商業政策、信貸政策、賦稅政策以及合作社政策，又是以限制富農剝削趨勢、提高最廣大農民羣衆幸福以及剷除農村兩極對立現象爲目標的。我還不說，我們現在與富農的鬥爭，不僅是按着舊路線進行，即按着組織貧農去反對富農的路線進行，而且是按着新路線進行，即按着鞏固無產階級和貧農兩者與中農羣衆聯盟去反對富農的路線進行。反對派不懂得按第二條路線去與富農作鬥爭的意思和意義，——這件事實就是再次證實反對派是滾到舊的農村發展道路，滾到資本主義的農村發展道路上去。在這條舊道路上，富農和貧農是農村中的基本力量，而中農則「日益磨滅」。

反對派說合作制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而且還援引列寧所著糧食稅一書，於是它就不相信有可能利用合作制作爲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環鈎。反對派在這裏也犯了極粗鄙的錯誤。這樣來解釋合作制，在一九二一年，在糧食稅寫就時，是充分而可令人滿意的，當時在我國還沒有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當時列寧是把國家資本主義設想爲我國經濟中可能的基本形式，而把合作制拿來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着觀察的。可是，這種解釋現在已經不夠了，已被歷史所超過了，因爲從那時起，時

間已經改變了，社會主義工業在我國已經發展了，國家資本主義沒有發育到當時所願意的那種程度，而合作制現在已包括有一千萬以上的社員，已與社會主義工業結合起來了。

難道不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在糧食稅發表以後兩年，即是在一九二三年，就用另外一種看法去觀察合作制，認為「在我們的條件下，合作制往往是與社會主義完全符合的」麼？（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難道不正是因為在這兩年內，社會主義工業已經長大，而國家資本主義沒有發育到應有程度，所以列寧也就不是把合作制拿來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着觀察，而是把它拿來與社會主義工業配合着觀察麼？

合作制底發展條件已經改變了。於是對於合作制問題的看法也應有所改變。

例如，請看列寧所著論合作制小冊子（一九二三年）裏闡明這個問題的一段燦爛言論吧：

「在國家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第一是私人企業，第二是集體企業。在我們的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因為它是建築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土地上，是建築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生產資料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在這一個小小的引證中，解決了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我們的現存制度」並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非國家資本主義。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與「我們的制度」相配合着的合作企業是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的」。

我認為是很難比這說得更明白的了。

又請看列寧這本小冊子中的另一段話吧：

「在我國，單純的合作制發展，就等於（只有上述一點「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發展，因此我們也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都有了根本變更」（同上）。

很明顯的，我們在論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中遇見對於合作制的新估計，而這種新估計是新反對派所不願承認的，是新反對派力圖違反着事實，違反着明顯真理，違反着列寧主義而默然不提的。

拿來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着觀察的合作制，是一回事；而拿來與社會主義工業配合着觀察的合作制，却是另一回事。

可是決不能由此作出一個結論，說在糧食稅與論合作制小冊子中間有一條什麼深淵。這種結論當然是不正確的。例如只須從糧食稅中引證一段話，就可立刻看出糧食稅與論合作制小冊子在合作制估計問題上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的。請看這一段吧：

「由租讓制過渡到社會主義，是由一種大生產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大生產形式。由小業主合作制過渡到社會主義，是由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這種過渡是比較複雜的，但它在成功時就能包括更廣大的民衆，就能把舊的關係，社會主義前期的，甚至資本主義前期的，即最頑強反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抗一切「革新」辦法的那些關係底深固根蒂被除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三七頁）。從這一引證中可以看出，列寧還在寫糧食稅時，即在我們還沒有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時，就已認為合作制在成功時能變成爲反對「社會主義前期的」關係，亦即反對資本主義關係的強大鬥爭工具。我認爲正是這一個思想，後來就成了他所著論合作制小冊子底出發點。

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由此就應得出如下的結論：新反對派不是按馬克思主義觀點，而是按形而上學觀點去觀察合作制問題的。新反對派不是把合作制看作與其他現象配合着，例如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着（一九二一年），或與社會主義工業配合着（一九二三年）的歷史現象，而是把它看作一種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看作「自在之物」。

由此就有反對派關於合作制問題的錯誤，由此反對派就不相信農村可能經過合作制去向社會主義發展，由此反對派就滾到舊的道路上去，滾到資本主義的農村發展道路上去。

新反對派在社會主義建設各個實際問題方面的立場，大體上就是如此。

結論只有一個：反對派底路線——如果它有路線的話，——反對派底猶豫和動搖，反對派底不相信態度和見難慌張心理，就是要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因爲，如果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却，如果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本質是有疑問，如果富農幾乎萬能，合作制很少希望，中農作用日益降落，新的農村發展道路很成問題，黨幾乎是在蛻化，而西方革命又還不如此逼近，——既然這樣，那末在反對派底武庫裏究竟還剩下什麼呢？那末在對我國經濟裏的資本主義成份作鬥爭

中，它究竟是指望於什麼呢？單靠一部「時代哲學」是不能跑去作戰的呵。

很明顯的，新反對派底武庫，即使一般可以稱為武庫，也是值得羨慕的。這個武庫不是為着進行鬥爭，尤其不是為着勝利。

很明顯的，黨如果帶着這樣一個武庫跑去作戰，那它就會「一舉」而斷送自己的性命，——就會簡直只好向我國經濟裏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

因此，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作得完全正確，它在決議中說道：「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奮鬥，乃是我們黨底基本任務」；解決這任務所必要的條件之一，就是「要堅決反對那種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態度，反對那種企圖把我們「澈底社會主義式的」（列寧）企業看作「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思想」；「這樣的思潮使羣衆不能自覺地對待一般社會主義建設以及社會主義工業，所以只能阻止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增長的過程，而幫助私人資本來和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作鬥爭」；「因此，代表大會認為必須進行廣泛教育工作去克服這種曲解列寧主義的觀點」（見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根據聯共（布）中央工作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歷史意義，就在於它根本揭破了新反對派底錯誤，排斥了新反對派底不相信和號泣態度，明白確切地指出了繼續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道路，給黨指出了勝利的前途，因而用確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勝利的堅強信念武裝了無產階級。

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答楊——斯基同志——

楊——斯基同志！

你的來信當然已按時收到了。回信稍遲，請你原諒。

(1) 列寧說：「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問題，都是國家政權問題。」（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四二頁）。政權究竟是集中在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手上；究竟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被推翻，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取得政權，——這就是「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問題」。

黨在革命某一階段整個時期內都保存其效力的基本戰略口號；若不完全全倚據於列寧底這個根本提綱，便不能稱為基本口號。基本口號要成為正確的口號，便一定要以對階級力量作馬克思主義分析為基礎，要規定階級鬥爭戰線上革命力量底正確佈置計劃，要促使把羣衆引上爭取革命勝利的戰線，引上新階級爭取政權的戰線，使黨易於用廣大民衆編成一支為完成此任務所必需的強大的政治軍隊。

在革命某一階段當中，是能有失敗和退却、失利和個別策略錯誤的，但這還不是說基本戰略口號不正確。例如，我國革命第一階段上的基本口號，即「聯合全體農民，反對沙皇和地主，中立資

產階級，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而奮鬥」的口號，是完全正確的，雖然一九〇五年革命遭受了失敗。

所以，決不可把黨底基本口號問題，與革命在其某一發展階段上遭受失敗或失利的問題，混爲一談。

也能有這樣一種情形，就是黨底基本口號在革命進程中雖已做到推翻了幾個舊階級或一個舊階級底政權，可是從這個口號中產生出來的一些重要革命要求却沒有實現，或實現這些要求的事情竟延長到一整個時期，或需要一次新革命才可將其實現，但這還不是說基本口號不正確。例如，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地主，可是沒有達到實行沒收地主土地等等，但這還不是說我們在革命第一階段上的基本口號不正確。或者再舉一個例子：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使政權過渡到了無產階級手上，可是沒有一下子就達到以下兩點：（1）一般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2）局部是在鄉村裏使富農陷於孤立，而却把這件事情延長到相當時期，——但這還不是說我們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基本口號，即「聯合貧農，反對城鄉資本主義，中立中農，爲無產階級政權而奮鬥」的口號，是不正確的。

所以，決不可把黨底基本口號問題，與這個口號所產生的某種要求底實現期限和實現形式問題，混爲一談。

因此，決不可根據某一時期內革命運動底個別成功或失敗的事實來估計我黨戰略口號，更不可根據實行這些口號所產生的某種要求的期限或形式來估計我黨戰略口號。只有用馬克思主義態度

分析階級力量，從力爭革命勝利，力求使政權集中於新階級掌握而正確佈置革命力量的觀點出發，才可來估計我黨戰略口號。

楊——斯基同志，你的錯誤就在於你忽略了這個最重要的方法論問題，或是沒有懂得這個問題。

(2) 你在來信中寫道：

「說我們只有在十月革命以前聯合全體農民而進，這算正確麼？當然是不正確的。『聯合全體農民』這一口號，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第一時期都是有效的，因為當時全體農民都利於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

於是，照你這段話說來，黨在革命第一階段內（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當問題是要推翻沙皇地主政權而建立工農專政時的戰略口號，是與黨在革命第二階段內（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當問題是要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時的戰略口號，沒有區別的。於是，你是否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區別。而你之所以犯了這個錯誤，是因為你大概不願意瞭解一件簡單事情，即戰略口號底基本題目是革命一定階段上的政權問題，是究竟那個階級應被推翻和那個階級應取得政權的問題。顯然用不着證明：你在這裏是根本不對的。

你說：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第一時期，我們都曾實行「聯合全體農民」這一口號，因為當時全體農民都利於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可是，誰告訴過你，說十月政變和十月革命只是限於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或是以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作為自己的基本任務呢？你這個說法是從

何處得來的呢？難道可以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容納在資產階級革命範圍以內麼？難道爭取無產階級專政不是超出了資產階級革命範圍麼？怎麼可以斷定說富農（他們也是農民哩）能贊助我們推翻資產階級和使政權轉歸無產階級掌握呢？怎麼可以否認我們實行土地國有、廢除土地私有權、禁止土地買賣等等法令，實行這個雖然不能算是社會主義法令的事業，是在與富農鬥爭中，而不是在與富農聯合中進行的呢？怎麼可以斷定說富農（也是農民）能贊助蘇維埃政權剝奪工廠、鐵路、銀行等等的法令，或無產階級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呢？怎麼可以斷定說十月革命底基本內容不是實行諸如此類的辦法，不是推翻資產階級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呢？

固然，十月革命底主要任務之一，是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沒有十月革命，便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澈底完成；同樣，十月革命若沒有把資產階級革命澈底完成，那它本身也就不能鞏固起來，而既然十月革命實行澈底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它也就當然遇到了全體農民底同情。所有這些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難道根據這點，就可斷定說，把資產階級革命澈底完成，不是十月革命進程中的附帶現象，而是十月革命底本質或基本目的麼？十月革命底主要目的，即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剝奪資本家等等，究竟被你拋棄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如果戰略口號底主要題旨是任何一個革命底基本問題，即政權由一個階級轉歸另一階級的問題，那末由此就可明白看出：無產階級政權把資產階級革命澈底完成的問題，決不可與推翻資產階級和爭得這個無產階級政權的問題混為一談，即是說不可與這成了革命第二階段戰略口號主要題

旨的問題混爲一談。

無產階級專政底最大成績之一，就是它把資產階級革命澈底完成了，並把中世紀一切污垢都盡行剷除了。這對於鄉村是有最重要意義的，並且真正是有決定意義的。除非如此，便不能實行把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兩者匯合起來，如馬克思還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就已經說過的那樣。除非如此，無產階級革命本身便不能鞏固。而且在這裏須要注意以下一個重要情況。把資產階級革命澈底完成，並不是一舉而成的事情。其實，這件事情會延長到一個整時期，不僅包括一九一八年一段時間，如你在來信內所說的那樣，而且還包括一九一九年一段時間（窩爾加河流域和烏拉爾）以及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烏克蘭）。我在這裏是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進攻而言，當時在全體農民面前都擺着有地主政權復辟的危險，當時農民——正是全體農民——不得不團結在蘇維埃政權周圍，以保證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並爲自己保全這一革命底果實。實際生活過程底這一種複雜性和多樣性，專政底這種直接社會主義任務與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彼此「奇巧的」錯綜結合，是應時刻注意到的，以便正確瞭解你從列寧著作中引來的言論以及黨口號具體實現的情形。可以說這種錯綜結合情形是證明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口號不正確麼，是證明這個口號與黨在革命第一階段上的口號沒有區別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相反的，這種錯綜結合情形，恰巧證明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口號，即聯合貧農，反對城鄉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爲無產階級政權而鬥爭等等的口號，是正確的。爲什麼呢？因爲要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就須首先在十月革命時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並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因爲只有這樣一個政權，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澈底完成，而爲要在十月革

命時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就須在十月革命以前準備和組織一個能夠推翻資產階級，能夠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相當的政治軍隊；而且不必證明，這樣一個政治軍隊，我們只有在無產階級與貧農聯合，反對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的口號下，才能把它準備和組織起來。很明顯的，沒有這樣一個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實行的戰略口號，我們便不會有這樣一個政治軍隊，於是也就不會在十月革命時獲得勝利，就不會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於是也就不會有可能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

正因爲如此，所以不可把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事情，與革命第二階段上以保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爲任務的戰略口號對立起來。

只有用一個方法，才可避免所有這一切「矛盾」，就是要承認革命第一階段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略口號與革命第二階段上（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口號有根本區別，我們在革命第一階段時期是聯合全體農民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奮鬥，而我們在革命第二階段時期則是聯合貧農反對資本政權和爲無產階級革命而奮鬥。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因爲對革命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上階級力量的分析，使我們一定要承認這一點。否則無法解釋爲什麼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我們是在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口號下進行工作，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我們却用無產階級與貧農底社會主義專政口號來替換它了。楊——斯基同志，你同意吧：在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間用一個口號代替另一個口號的事實，按照你的公式是無法解釋的。

列寧還在他所著的兩個策略小冊子裏，就指出了黨底兩個戰略口號間的這個根本區別。他把

黨在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的口號規定如下：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癱瘓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換言之：聯合全體農民，反對專制制度，中立資產階級，爲民主革命而奮鬥。

至於黨在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時的口號，他却規定如下：

「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癱瘓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同上）。

換言之：聯合貧農及一般半無產階層，反對資產階級，中立城鄉小資產階級，爲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

這是在一九〇五年寫的。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把當時政治情況估計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與資產階級實際政權錯綜結合局面時說道：

「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底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夠而使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歸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掌握」（摘自列寧所著四月提綱，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八頁）。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底，當十月革命準備工作正以全力進行時，列寧在農民與工人這篇專門論文內寫道：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能夠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當時的（指一九〇五年而言。——斯大林註）基本定義。而這個定義是對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已再次證實了這一點。只有領導着貧農*（即我們黨綱所說的半無產者）的無產階級能夠用民主和平來結束戰爭，醫好戰爭創傷，開始實行那些已成爲絕對必要而刻不容緩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時的定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一一頁）。

決不應把這一點瞭解成如此：似乎我們這裏現在是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這當然是不對的。我們是在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下走到十月革命的，並且我們在十月革命時已在形式上實現了這個口號，因為我們當時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行聯盟，並與他們瓜分過領導權，雖然事實上我們當時就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因為我們布爾什維克在當時是佔大多數的。可是，自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盲動」以後，自我們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聯盟破裂以後，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在形式上也不存在了，因為此時領導權已完全轉入一個政黨手中，即轉入我們黨手中，而我們黨是決不會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黨瓜分國家領導權的。這在我們方面就叫作無產階級專政。

最後，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寧迴顧革命所已經過的道路時寫道：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是的，當我們還協同全體農民前進時，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這是我們十分明白認識到了的，是我們從一九〇五年起已說過數千百次的，我們從來沒有試圖跳過歷史過程中的這個必經的階段，也沒有試圖用法令把它取消……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從四月起，即在十月革命很久以前，在我們奪取政權很久以前，我們就已公開說過，並向民衆解釋過：現在，革命決不能停止在這個地方，因為國家已前進了，資本主義已前進了，破產現象已達到空前程度，這種破產現象要求（不管誰願意與否）採取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步驟。否則便不能前進，便不能挽救備受戰爭摧殘的國家，便不能減輕被剝削勞動者底痛苦。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進程已證實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協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性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然後協同貧農，協同半無產階級，協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農村的富人、富農和投機者，所以革命就變成社會主義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〇至三九一頁）。

由此可見，列寧屢次着重指出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時期內所實行的第一個戰略口號，是與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所實行的第二個戰略口號有極深刻區別的。前一時期的口號是協同全體農民反對專制制度；後一時期的口號是協同貧農反對資產階級。

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事情是延長到了十月革命以後一整個時期的，既然我們當時實行激

著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底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全體」農民當時不能不同情於我們，——這件事實，如我在上面說過的那樣，絲毫也不能動搖下面一個基本原理，即我們是協同貧農走向十月革命並在十月革命中獲得勝利的，我們是協同貧農，在富農（也是農民）反抗，中農動搖下，共同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當時的任務之一）。

看來是很明白了。

（3）其次，你在來信內寫道：

「我們是在聯合貧農和中立中農的口號下走到十月革命的。」這一斷語，是否正確呢？當然是不正確的。依上面所說過的理由以及從列寧著作中摘引過的幾段言論看來，就可明白這個口號只有在「農民內部階級分化已經成熟」（列寧語）時，即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產生出來」。

照你這段話說來，黨走上中立中農的道路，不是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也不是在十月革命時，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貧委取消以後。這是完全不對的，楊—斯基同志。恰巧相反，中立中農的政策，不是在貧委取消以後，一九一八年以後開始的，而正是在那時候完結的。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中立中農的政策，在我們的實踐中已被取消了（而不是被施行了）。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宣佈我們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開幕時說道：「舊時的社會主義優秀代表，當他們還相信革命和在理論上思想上効勞於革命時，曾說要中立農民，就是說，即令不能把中農變成積極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階層，至少也要把他們

變成不妨礙革命，取中立態度，不站在我們的敵人方面的社會階層。這種抽象的理論上的任務提法，對於我們是完全明白的。可是，這種提法是不夠的。我們已進入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此時已須具體地詳細地規定一種為農村工作經驗所考驗過的基本規則和指示，而這種規則和指示就是我們為着對中農採取堅固聯盟立場所應當遵照執行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一四頁）。

由此可見，結果是恰巧和你在來信內所說的相反，你在這裏把我們真實的黨的實踐顛倒過來，把中立中農政策底開始和終結混為一談了。

當我們還在實行推翻資產階級時，當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時，中農總是懷喪呻吟，總是在革命與反革命間搖動不定，因此也就必須使他中立。當中農已開始相信資產階級「真是」已被推翻，蘇維埃政權已在鞏固，富農正被擊破，紅軍已開始在國內戰爭戰線上獲得勝利時，他們就開始轉到我們方面來了。正是在這樣一個轉變以後，列寧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我黨第三個戰略口號才有可能提出，這口號就是倚靠貧農並與中農建立堅固聯盟，向前去為社會主義建設而奮鬥。

你為什麼竟把這件盡人皆知的事實忘記了呢？

其次，據你的信上所說，在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時以及在這個革命勝利以後最初時日中立中農的政策，是不正確的，是不適用的，因此也就是不能採納的。楊——斯基同志，這是完全不對的。實際

著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情形恰巧相反。正是在實行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時以及在無產階級政權尚未鞏固以前，中農是最表示動搖和反抗的。正是在這個時期，必須聯合貧農，中立中農。

你在堅持自己的錯誤時，說農民問題不僅對於我國，而且對於其他「與十月革命前的俄國經濟多少相似的」國家，都有巨大的意義。後一意見當然是對的。可是，請看列寧在他提交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的土地問題提綱內，怎樣說明了各國無產階級黨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期對待中農的政策吧。列寧把貧農，或更確切些說，「農村被剝削勞動羣衆」，確定爲農村工人、半無產者，或極小農和小農所組成的單個集團，然後講到中農是農村特別集團的問題時，說道：

「按其經濟含義說來，『中農』是一種小農，他們依據所有權或租佃權所佔有的一塊土地，雖然也是不大，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他們這塊土地通常還是不僅使他勉強維持家庭和產業，而且能得到某些可以——至少在很好年份——變爲資本的剩餘；這種小農是常常僱傭他人勞動力的：革命無產階級不能，至少是在最近的將來和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開始時，不能力求把這個階層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它只應當力求中立這個階層，即使其不能積極贊助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鬥爭」（見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速記錄，第六一〇至六一一頁）。

既然如此，怎麼還可以說中立中農的政策，在我們這裏「只有」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產生」，即是在鞏固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政權——事業中已有決斷成功以後才能「產生」呢？

由此可見，關於各國無產階級黨在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無產階級政權時的戰略口號問題，也如中立中農問題一樣，是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的。

(4) 由上所述，就可明白看出：你從列寧著作中所摘引的幾段言論，絲毫也不能與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基本口號對立起來，因為：第一，這幾段言論不是談論黨在十月革命前的基本口號，而是談論在十月革命後把資產階級革命澈底完成的問題；第二，它們並不是推翻這個口號，而是證實這個口號正確。我在上面已經說過，而且現在不得不再重復說一遍：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實行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是不能與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前把政權問題作為主要題旨的戰略口號對立起來的。

(5) 你說到莫洛托夫同志所發表於真理報上的那篇有名的文章論我國資產階級革命（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真理報），說正是這篇文章「推動」你來向我要求解釋。我真不知道你是怎樣閱讀他人文章的，楊—斯基同志。我也讀過莫洛托夫同志底文章，而且我認為這篇文章是與我們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關於黨對農民口號問題所說的話，絲毫不相矛盾的。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文章內，不是說黨在十月革命時期的基本口號，而是說黨既然在十月革命後實行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它當時獲得了全體農民底同情。可是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指出這件事實，並不是否認，反而是證實這樣一個基本原理正確，即我們是協同貧農，中立中農，反對城鄉資產階級，而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否則我們就不會能把資產階級革命澈底完成了。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

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

——答斯、頗克羅夫斯基同志——

頗克羅夫斯基同志！

我認為，你在今年五月二日寫來的信，並不使我有什麼緣由，有什麼必要來作一個詳細的回答，所謂逐條的回答。其實，你這封信和楊—斯基同志那封信比較起來，並沒有絲毫特別新穎的東西。我之所以終究來回答你這封信，就是因為它包含有一些直接恢復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加米涅夫立場的成分。只是爲了揭破這些恢復加米涅夫立場的成分起見，我才認爲要給你一個簡短的回答。

(1) 你在來信裏說道：「其實，我們從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時期內所實行的，是與全體農民聯盟的口號」，「黨從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時期內所主張所擁護的，是它對農民所提出的那個舊口號，即與全體農民聯盟的口號」。

第一，照你這樣說來，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四月至十月），並沒有力求把貧農與富裕農分開，而是把農民看作一個整體。

第二，照你這樣說來，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並沒有用「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新口號，來代替「工農專政」的舊口號，而是停留在舊時的立場上，即停留在列寧於一九〇五年著的兩個策略小冊子裏所規定的立場上。

第三，照你這樣說來，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爲反對蘇維埃動搖妥協態度，爲反對中農在蘇維埃內和前線上動搖態度，爲反對他們在革命與反革命勢力間動搖態度，爲反對他們在七月事變時，即是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妥協份子所把持的蘇維埃協同反革命將軍一起來實行孤立布爾什維克的時候，表現得特別厲害的動搖妥協態度而鬥爭的政策，——即布爾什維克爲反對某些農民階層動搖妥協態度而進行的鬥爭，原來是無的放矢而絕對不需要的。

最後，照你這樣說來，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堅持工農專政的舊口號，原來是對的；而列寧當時認爲這個口號已經陳舊並宣佈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新口號，却原來是不對的。

只要提出這些問題，就可以明瞭你這封信從頭到尾都是荒謬絕倫了。

可是，因爲你是一位很喜歡從列寧著作裏引證個別句段的人，於是就讓我們來看看引證吧。

不必花費多大工夫，就可以證明：列寧認爲從革命向前發展方面看來，在二月革命以後俄國土地關係中的新現象，不是無產階級與全體農民間的利益一致，而是貧農與豐裕農間的分裂：貧農趨向於無產階級，而豐裕農則跟隨着臨時政府走。

請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與加米涅夫及加米涅夫派爭論時如何說明了這一點吧：

「現在，來指望於與農民有一致利益，這對於無產階級黨是不可容許的」（摘自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二四五頁）。

其次：

「我們現時在一些農民代表大會決議上已看見有要等到召集立憲會議時去解決土地問題的思想，——這是傾向於立憲民主黨的豐裕農、底勝利」（摘自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拉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七六頁）。

再其次：

「也許農民將握取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權。我不但不忘記這個可能性，不把自己的眼界局限於今天，而且我直率而明確地規定土地綱領時，還顧計到一種新現象，即雇農貧農與豐裕農間所發生的更深的分裂。」（摘自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所寫論策略書一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三頁）。

這就是列寧在二月革命後的農村新環境裏所看出的新穎的和重要的現象。

這就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後的時期內規定黨政策時所持的出發點。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拉全市代表會議上，就是根據這個原理而說出一段話來的：「我們僅僅在這裏，在當地，才知道工兵代表蘇維埃已把政權交給臨時政府了。工兵代

若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表蘇維埃是無產階級與兵士專政底實現；而兵士大多數都是農民。這也就是工農專政。可是，這個「專政」已與資產階級妥協了。所以我們也就要重新審查「舊」布爾什維主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七六頁）。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寫下述一段話時，也是根據這個原理出發的：

「誰在現時還只說『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那他就是落後於實際生活，因而也就是在實際上跑到了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鬥爭，就應被送到革命以前的『布爾什維克』古董陳列所（可以叫做『舊布爾什維克』陳列所）裏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一頁）。

在這個基礎上也就產生了代替工農專政舊口號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

你可以說——而你在這封信內正是這樣說——這是企圖跳過尚未完成的農民革命的托洛茨基立場，但這樣說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正如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反駁列寧時那種說法沒有理由一樣。列寧當時完全顧到這種反駁，所以他說道：

「托洛茨基主義是主張『不要沙皇，而政府是工人的』。這種主張是不對的。小資產階級是存在着，決不可把它一筆勾銷。但它有兩部分。它的貧苦的*部分是與工人階級一塊兒走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八二頁）。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加米涅夫底錯誤，以及現在你頗克羅夫斯基同志底錯誤，就是不善於指明，不善於着重指出小資產階級——在這裏是說農民——兩部分間的區別；就是不善於從全體農民羣衆中間劃出貧農部分來，並根據這一點來規定黨在一九一七年由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的環境內的政策；就是不善於由這一點推論出一個新口號，黨的第二個戰略口號，即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

我們且根據列寧著作來循序考察「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間的實際歷史吧。

一九一七年四月：

「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底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夠而使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歸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掌握*」（摘自列寧所著四月提綱，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八頁）。

一九一七年七月：

「只有革命工人——如果他們獲得貧農*擁護的話——能夠打破資本家底反抗，引導人民去實行無代價地奪取土地，達到完全自由，消除飢荒，打破戰爭，達到正義的堅固的和平」（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七七頁）。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一九一七年八月：

「只有領導着貧農」（即我們黨綱所說的半無產者）的無產階級能夠用民主和平來結束戰爭，醫好戰爭創傷，開始實行那些已成爲絕對必要而刻不容緩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時的定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一一頁）。

一九一七年九月：

「只有無產者與貧農，專政能夠打破資本家底反抗，表現出政權方面真正偉大的勇敢果決精神，使自己無論在軍隊或農民中間，都能得到羣衆方面熱烈奮勇和真正英勇的擁護」（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四七頁）。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月，列寧在布爾什維克能否保持國家政權一書中反對新生活報時寫道：

「或者是全部政權轉歸資產階級——而這是你們早已不擁護的，而且連資產階級自己也甚至不敢提及的，因爲它知道，在四月二十號至二十一號，人民只把肩膊一聳就把這樣一個政權拋開了，而現在呢，將會多倍堅決地和多倍冷酷無情地拋開這樣一個政權。或者是政權轉歸小資產階級，即是轉歸這個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同盟（聯盟，協定），因爲小資產階級不願意而且不能夠單獨和獨立採取政權，這是由一切革命底經驗所證明了的，是由經濟科學所證明着的，這經濟科學說明，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可以站在資本方面，可以站在勞動方面，但站在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中間是站不住的。這個同盟在俄國半年以來已經嘗試過數十百種方法而終歸失敗了。最後，或者，*全部政權轉歸無產者和貧農*，反對資產階級，以便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這是還沒有嘗試過的，而這是你們新生活報方面的老爺勸人民不要去幹的，你們用自己在資產階級面前的恐懼心理去恐嚇人民。第四種辦法是連臆造也臆造不出來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七五頁）。

事實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準備史中所有這一切事實和事變，你都「平安」迴避過去了；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爲反對那些坐在蘇維埃內的「農民業主」底動搖妥協態度而進行的鬥爭，你都從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平安」一筆勾銷了；列寧底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你都把它「平安」埋葬了，而你同時却又裝腔做勢，說這還不是橫豎曲解歷史，不是橫豎曲解列寧主義。

頗克羅夫斯基同志，你從這些言論中，從這種舉不勝舉的言論中，就應知道：布爾什維克在九一七年二月後所持的出發點，並不是聯合全體農民，而是聯合農民中的貧苦部分；布爾什維克在走向十月時所實行的口號，並不是工農專政的舊口號，而是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新口號。

由此可見，布爾什維克爲了實行這個口號，就必須反對蘇維埃所表現的動搖妥協態度，反對坐在蘇維埃裏的那一部分農民所表現的動搖妥協態度，反對那些叫作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小資產階級民主政黨所表現的動搖妥協態度。

由此可見，沒有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新口號，我們當時就不能聚集一支充分強大的政治軍，來克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妥協態度，使某一部分動搖的農民中立起來，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因而保證有可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由此可見，「我們是協同貧農，在富農（也是農民）反抗，中農動搖下，走向十月革命並在十月革命中取得勝利的」（見我給楊—斯基同志的回信）。

這樣看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以及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內主張正確的原來是列寧，而不是加米涅夫。而你頗克羅夫斯基同志現在來恢復加米涅夫立場，就未免是落到一個不大的夥伴裏去了吧。

（2）你引證列寧說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是在全體農民贊助下取得政權等語，來與上述一切對立。說我們在全體農民相當贊助下取得政權，——這是完全對的。可是，你竟忘記補說一件「小事情」：在十月革命時和在十月革命後，全體農民只是在我們實行徹底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限度內，才贊助過我們。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小事情」，它在這裏是有決定意義的。「忘記」這樣重要的「小事情」，並因此而抹煞最重要的問題，這決不是布爾什維克所應有的態度哩，頗克羅夫斯基同志。

從你的來信內可以看出，你把列寧所說的全體農民贊助過我們的話，與這個也是列寧所規定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黨口號對立起來了。可是爲要把列寧這句話與以上從列寧著作中摘引來

的言論對立起來，爲要有根據用你所引列寧說及全體農民的幾句話，來駁倒以上所引列寧說及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的幾段言論，——爲要這樣作，就至少必須證明兩件事情。

第一。必須證明：把資產階級革命澈底完成，是十月革命中的主要點。列寧認爲：資產階級革命澈底完成，是十月革命底「副」產物，十月革命「順便」解決了這個任務。你首先就必須駁倒列寧這個原理，並證明十月革命中的主要點不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不是使政權轉歸無產階級掌握，而是把資產階級革命澈底完成。請你頗克羅夫斯基同志試試證明這一點吧，你如果能夠證明這一點，那末我就決意承認：我們黨在一九一七年由四月至十月間的口號，不是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而是工農專政。從你的來信內可以看出，你認爲你決不可來幹這種過分冒險的事情；但你却企圖「順便」證明說，在十月革命最重要問題之一上，在和平問題上，似乎全體農民整個都贊助過我們。這當然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頗克羅夫斯基同志。在和平問題上，你落到庸人觀點上去了。其實，和平問題當時在我們這裏就是政權問題，因爲當時只有使政權轉歸無產階級掌握，才可以指望擺脫帝國主義戰爭。你大概是忘記了列寧以下幾句話：「只有使政權轉歸另一個階級掌握，才可結束戰爭」，「打倒戰爭，並不是拋棄鎗枝，而是使政權轉歸另一個階級掌握」（摘自列寧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拉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八一頁和第一七八頁）。

總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你應當證明十月革命中的主要點是把資產階級革命澈底完成，或者你不能證明這一點，——那時自然要得出結論說，在十月革命中，全體農民只是在我們實行澈底完

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限度內，才贊助過我們。

第二。你就應當證明：布爾什維克不必在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一貫實行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不必根據這個口號來一貫反對各小資產階級黨底妥協主張，不必根據這個口號來一貫揭露某些農民階層及其在蘇維埃中的代表們底動搖態度，便能在十月革命時和在十月革命後，在他們實行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限度內得到全體農民底贊助。請你試試證明這一點吧，願克羅夫斯基同志。那末，為什麼我們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得到了全體農民底贊助呢？就是因為我們得到了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可能。為什麼我們得到了這種可能呢？就是因為我們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而用無產階級政權把它代替了，只有無產階級政權才能夠把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完成。為什麼我們得以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呢？就是因為我們在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下進行了十月革命準備工作，就是因為我們根據這個口號來一貫反對了各小資產階級黨底妥協主張，就是因為我們根據這個口號來一貫反對了坐在蘇維埃裏的那些中農底動搖態度，就是因為我們當時只有在這樣一個口號下才能克服中農底動搖態度，打破各小資產階級黨底妥協主張，組織一支能夠為使政權轉歸無產階級掌握而鬥爭的政治軍。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些決定了十月革命命運的預備條件，那我們無論在十月革命時或在十月革命以後，都是不能得到全體農民贊助的。

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匯合的問題，就是要這樣來瞭解的哩，願克羅夫斯基同志。

正因為如此，所以把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後全體農民底贊助，與我們是在無產階級與貧農專

政口號下準備十月革命的事實對立起來，就等於絲毫不懂列寧主義。

你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你頗克羅夫斯基同志既沒有懂得十月革命進程中社會主義的任務與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錯綜結合的事實，也沒有懂得從黨第二個戰略口號，即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中得出的十月革命個別要求如何見諸實現的訣竅。

讀到你的來信時，簡直可以發生這樣一種感想，以為不是我們曾把農民拿來替無產階級革命服務，却反而是「全體農民」——包括富農在內——曾把布爾什維克拿去替他們服務。如果布爾什維克是這樣容易「受僱」去替非無產者階級服務，那末布爾什維克底事業就會很糟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加米涅夫立場就是使你腳跟動搖的東西，頗克羅夫斯基同志。

(3) 你硬說斯大林看不見一九〇五年環境與臨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時環境間的區別。你這種說法當然是不莊重的。我沒有這樣說，而且也不能這樣說。我在我的信內只是說：黨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工農專政口號，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已得到了證實。而這當然是對的。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在農民和工人一文中就是這樣描寫情況的：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能夠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當時的（指一九〇五年而言）。——斯大林註）基本定義。而這個定義是對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已再次證實了這一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一一頁）。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太「講辯證法的」同志啊，你不過是想來吹毛求疵罷了。

(4) 其次，你企圖證明斯大林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而把他在列寧主義問題一書裏說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後有與中農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的話，與他說在十月革命前中農抱着妥協主張的提綱對立起來。不必花費多大工夫，就可證明你這樣把兩個不同現象看作一個東西，是絕對不合科學的。在十月革命前的，即資產階級執政時的中農，與在無產階級專政已鞏固後的，即資產階級已被剝奪、合作制已經發展、基本生產資料已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裏時的中農，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把兩種中農看作一個東西，把它們混為一談，就是把現象看作與歷史環境沒有聯繫的東西，而喪失一切前途。這頗與李諾維也夫混淆年月時期，胡亂引證他人言論的態度相同。如果這叫做「革命辯證法」，那就須承認羅夫斯基同志是打破了一切「辯證」魔術記錄了。

(5) 其餘的問題，我不談及，因為我認為我與楊—斯基同志通信中已把這些問題說得透澈無遺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十月革命國際性質

——爲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而作——

十月革命並不是單只「民族範圍內的」革命。它首先就是國際性世界性的革命，因爲它是全世界人類史中由資本主義舊世界進到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根本轉變。

從前所有的革命，通常是以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執掌政柄而結束的。剝削者是更換了，但剝削制依然存在。奴隸解放運動時期的情形是如此。農奴武裝起義時期的情形是如此。英法德等國有名的「大」革命時期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不來說巴黎公社，因爲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爲反對資本主義而扭轉歷史的第一次光榮英勇的嘗試，但終究是沒有成功的嘗試。

十月革命是在原則上與這些革命不同的。它的目的，並不是要用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用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而是要消滅任何人剝削人的現象，消滅所有一切剝削者集團，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這迄今所有一切被壓迫階級中最革命階級底政權，組織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正因爲如此，所以十月革命底勝利是人類史中的根本轉變，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命運中的根

本轉變，是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根本轉變，是全世界被剝削羣衆底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風俗和傳統、文化和思想體系中的根本轉變。

十月革命所以是國際性世界性的革命，其基礎就在這裏。

世界各國被壓迫階級所以對十月革命表示深刻同情，把它看作是他們獲得解放的保障，其根源也是在這裏。

可以指出幾個基本問題，來表明十月革命影響全世界革命運動發展的情形。

(1)十月革命首先一個出色處，就是它衝破了世界帝國主義戰線，在一個最大資本主義國家裏推翻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並使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

被僱傭者階級、被驅策者階級、被壓迫被剝削者階級，破天荒第一次在人類史上昇到了統治階級地位，並以身作則來鼓舞着世界各國無產者。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即帝國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十月革命剝奪了地主資本家底生產工具和資料，並將其變成社會公有財產，因而把社會主義所有制與資本主義所有制對立起來。於是它就揭破了資本家說資產階級所有制神聖不可侵犯，恆久不變的騙人鬼話。

十月革命奪得了資產階級手裏的政權，褫奪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權利，毀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並把政權交給了蘇維埃，因而把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民主制，與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即資本主義民主制對立起來了。

拉法格還在一八八七年就正確地說過：在革命以後第一

天，「所有從前一切資本家都將被褫奪選舉權」。於是十月革命就揭破了社會民主黨人說現在有可能經過資產階級國會制度而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騙人鬼話。

可是，十月革命並沒有而且也不能停留在這一點上。十月革命把資產階級舊制度毀壞後，就着手建設社會主義新制度了。十月革命底十週年，也就是黨、職工會、蘇維埃、合作社、文化組織、運輸業、工業和紅軍建設工作底十週年。蘇聯社會主義在建設戰線上各種毫無疑義的成功，已經具體表明：無產階級能夠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管理國家，能夠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建設工業，能夠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領導全部國民經濟，能夠不顧資本主義包圍而順利建設社會主義。那說被剝削者非有剝削者不行，正如頭腦和其他肢體非有胃部不行一樣的舊「理論」，並不僅是古代史上有名的羅馬元老阿古利巴一人底心得。這個「理論」是現在一般社會民主黨政治「哲學」底基礎，特別是社會民主黨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聯合政策底基礎。這個具有了成見性質的「理論」，是現在阻礙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化的最大障礙之一。十月革命最重要結果之一，就是它給了這種騙人「理論」一個致命的打擊。

十月革命所有這些結果以及諸如此類的結果，過去和現在都不能不大大影響到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底革命運動，這難道還須證明麼？

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各國蒸蒸日上發展，世界各國無產者對蘇聯工人階級同情的增長，以及大批工人代表團接踵來參觀蘇維埃國家，——所有這些盡人皆知的事實，都是毫無疑義地證明十月革命所散播的種子已經開始產生果實了。

(2)十月革命不僅在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不僅在「宗主國」裏動搖了帝國主義。十月革命還打擊了帝國主義底後方，打擊了帝國主義底外藩，震撼了帝國主義在各殖民地 and 依賴國裏的統治。十月革命既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便打斷了民族殖民地壓迫的鎖鍊，使一個幅員廣大國家內所有一切被壓迫民族都擺脫了這種壓迫。無產階級除非同時解放被壓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底特點，就是它在蘇聯實行了民族殖民地革命，不是以各民族相互仇視和各民族相互衝突爲旗幟，而是以蘇聯各族工農互相信任和親密接近爲旗幟，不是爲着民族主義，而是爲着國際主義。

正因爲民族殖民地革命在我國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和在國際主義旗幟下進行的，所以素被賤視的民族，素被奴役的民族，也就破天荒第一次在人類史上昇到了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民族的地位，並以身作則來鼓舞着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即世界各被壓迫國人民與無產階級聯盟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殖民地革命的時代。

從前，「照例總是」認爲：世界自古以來，就分成下等人種和高等人種，分成黑色人種和白色人種，前者沒有達到文明的能力，只有淪爲被剝削者的命運，而後者是唯一的文明代表者，負有剝削前者的使命。現在，這種奇談要算是已被打破，已被擊潰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了這種奇談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爲它在事實上表明了，那些獲得解放而捲入蘇維埃發展軌道上來的非歐洲民族，其能推進真正先進文化和真正先進文明的能力，是絲毫不亞於歐洲民族的。

從前，「照例總是」認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方法，使民族彼此脫離的方法，使民族彼此分開的方法，使各民族勞動羣衆間民族惡感加強的方法，是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唯一方法。現在，這種奇談要算是已被推翻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了這種奇談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它在事實上表明了，用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方法解放被壓迫民族，是可能而且適當的；因為它在事實上表明了，各民族中的工農根據自願原則和在國際主義基礎上結成兄弟聯盟，是可能而且適當的。世界各國勞動者將來在世界統一經濟基礎上聯合的榜樣，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巍然存在的事實，不能不是對於這點的直接的明證。

不待說，十月革命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結果，過去和現在都不能不大大影響到殖民地和依賴國裏的革命運動。中國，印度，印度和其他各國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以及這些民族對蘇聯的同情日益增長，——所有這些事實，都是對於這點的不容置疑的明證。

安然剝削和安然壓迫殖民地和依賴國的紀元，已經過去了。

殖民地和依賴國裏民族解放革命的紀元，這些國家中無產階級覺醒的紀元，無產階級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紀元，已經到來了。

(3) 十月革命既把革命種子散播到了帝國主義底中心和後方，既削弱了帝國主義在「宗主國」的勢力，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統治，於是就使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存在本身都發生問題了。

如果資本主義自發發展的過程，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因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因衝突和武裝接

觸不可避免，最後因發生空前未有的帝國主義大屠殺，已轉變為資本主義腐化和衰亡的過程，那末十月革命以及一個極大國家因有十月革命而脫離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事實，就不能不加速了這一過程，一步一步地根本破壞着世界帝國主義底基礎。

不僅如此。十月革命不僅動搖了帝國主義，它同時還為世界革命運動建立了強大的公開的基礎，即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礎是世界革命運動從來未曾有過的，而現在它却能把這個基礎作為靠山了。十月革命為世界革命運動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公開的中心，這個中心是世界革命運動從來未曾有過的，而現在它却能在這個中心周圍團結起來，組織全世界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統一革命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了。

首先，這就是說，十月革命給了世界資本主義一個永遠不能治好的致命傷。正因為如此，所以資本主義永遠不能回復它在十月革命以前所有過的那種「均衡」和「穩固性」了。資本主義儘可局部穩定，儘可使自己的生產合理化，儘可把國家管理權交給法西斯主義，儘可暫時壓制工人階級，可是它永遠也不能回復它從前所引以自誇的那種「安寧」和「確信心」，那種「均衡」和「穩固性」了，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此時革命火焰必然要時而在帝國主義中心，時而在帝國主義外藩爆發起來，使資本主義的補綴方法一概無效，使資本主義底死期日益迫近。正好似著名寓言上所說的那樣：「剛剛抽出尾巴來，鼻子又陷落下去了；剛剛抽出鼻子來，尾巴又陷落下去了」。

第二，這就是說，十月革命已把全世界各被壓迫階級底力量和比重、勇氣和戰鬥決心，提到了

一定的高度，使各統治階級不得不把它們看作嚴重的新因素。現在已經不可把世界勞動羣衆看作是徘徊於黑暗鄉裏，茫無前途的「盲目人羣」了，因為十月革命已爲他們建立了一座替他們照耀道路，指明前途的燈塔。如果從前沒有一個全世界公開集議場可以表明和規定被壓迫階級底希望和志願，那末現在却已有這種集議場了，這就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毫無疑義的，如果這個集議場竟被消滅，那末肆無忌憚的黑暗反動勢力，就會長期籠罩着各「先進國」底社會政治生活。誰也不能否認，甚至單是「布爾什維克國家」巍然存在的事實，就牽制着黑暗反動的勢力，而促進被壓迫階級爭取本身解放的鬥爭。其實，全世界各國創作者之所以非常兇狠仇恨布爾什維克，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歷史又在重復着，不過是在新的基礎上重復着罷了。正如從前在封建制度覆亡時期，「雅可賓黨人」這一名詞，曾引起世界各國貴族底驚恐憎惡一樣，現今在資本主義覆亡時期，「布爾什維克」這一名詞，也同樣引起各資產階級國家底驚恐和憎惡。反過來說，正如從前巴黎是供與盛資產階級底革命代表們避難和學習的場所一樣，現在莫斯科是供與盛無產階級底革命代表們避難和學習的場所。對雅可賓黨人的仇恨，不會救封建制度於滅亡。對布爾什維克的仇恨，也不能救資本主義於不可避免的潰滅，——這難道可以懷疑麼？

資本主義「穩固」的紀元，已隨身帶着什麼資產階級制度不可動搖的奇談而一同過去了。資本主義滅亡的紀元，已經到來了。

(4) 十月革命不僅是經濟關係和社會政治關係方面的革命。十月革命同時又是智慧中的革命，是工人階級思想中的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在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旗幟下，在

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旗幟下誕生和強固起來的。因此，十月革命是表明馬克思主義對於改良主義的勝利，是表明列寧主義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勝利，是表明第三國際對於第二國際的勝利。

十月革命在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間，在列寧主義政策與社會民主主義政策間，掘成了一個不可逾越的深淵。從前，在無產階級專政尚未勝利以前，社會民主黨能拿馬克思主義旗幟來自炫，雖不公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但絲毫也不設法，絕對不設法促進這個思想的實現，——當時，社會民主黨還能夠這樣作，因為這對於資本主義是沒有任何危險的。當時，在那個時期，社會民主黨在表面上還與馬克思主義混合着，或幾乎是與馬克思主義混合着。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以後，大家都已明白看見馬克思主義底目標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底勝利能表明什麼了，於是社會民主黨再也不能拿馬克思主義旗幟來自炫，再也不能向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獻媚，否則就會使資本主義受到相當的危險。社會民主黨早已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底精神，結果也就不得不脫離馬克思主義底旗幟，而公開和決然反對馬克思主義底產兒，反對十月革命，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此時，社會民主黨已不能不表示離開馬克思主義，而且果然已表示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因為在現時條件下，誰不公開地奮勇地擁護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誰不進行革命鬥爭反對本國資產階級，誰不創立使本國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的條件，那他就不能以馬克思主義者自稱。社會民主黨與馬克思主義間已隔着一個深淵。從今以後，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已是馬克思主義底唯一代表者和堡壘了。

可是，不僅如此。十月革命不僅已使社會民主黨與馬克思主義隔開，而且還把社會民主黨拋到那些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而直接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們營壘中去了。阿得列爾輩、鮑威爾輩、威爾斯輩、列維輩、龍格輩、勃魯姆輩這班老爺們咒罵「蘇維埃制度」，而讚美國會制度的「民主」，其用意就是想說：他們現在進行着鬥爭，而且將來還會進行鬥爭，爲着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爲着要在各「文明」國家裏保存資本主義奴隸制度。現時的社會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思想支柱。列寧說得萬分正確：現時的社會民主黨政治家，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在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中，他們是必然會站在「凡爾賽派方面反對巴黎公社社員」的。除非消滅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就無法消滅資本主義。因此，資本主義衰亡的紀元，同時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中衰亡的紀元。十月革命底偉大意義，其中有一點也就在於十月革命表明列寧主義必然戰勝世界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

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統治的紀元，已經完結了。
列寧主義和第三國際統治的紀元，已經到來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七日

發表於真理報第二百五十五期

在糧食戰線上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紅色教授學校，共產

主義學院以及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的談話摘錄——

問題：我國糧食事業困難的基本原因是什麼呢？逃出這些困難的出路何在呢？既有這些困難，那末對於我們一般工業發展速度，特別從輕工業與重工業對比較關係方面看來，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回答：驟然看來，也許覺得我國糧食困難是一種偶然現象，只是由於設計工作不好，只是由於在經濟計算工作中有些錯誤。可是，只有驟然看來才會覺得是這樣。其實，這裏困難原因是更深刻得多的。設計工作不好，經濟計算工作上的錯誤，在這裏起了頗大的作用，——這是有絲毫懷疑的，可是，如果以設計工作不好與偶然錯誤來解釋一切，那就大錯特錯了。輕視設計工作底作用與意義，那是錯誤的。可是，誇大計劃原則底作用，以爲我們已達到可能計劃與調節一切的發展階段，那就更錯誤了。不要忘記，在我們國民經濟中，除那些服從於我們計劃影響的成分而外，還有另一種成分，即暫且尚不服從於計劃工作的成分，最後還有些敵視我們的階級，而這些階級是不可用單純的國家計劃局的設計工作手續來克服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認爲不可把一切都歸結爲簡單的偶然現象，歸結爲設計工作錯誤等等。

那末，我國糧食戰線上種種困難基本原因何在呢？

我國糧食困難基本原因，就在於我國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是比糧食需要額增長速度慢些。工業是在增長着。工人數量是在增長着。城市是在增長着。最後，需要商品糧食的各種技術作物（棉、麻、糖蘿蔔等等）出產區域，是在增長着。所有這些情形，就使糧食需要額，商品糧食需要額迅速增長起來。而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却慢得要命。不能說我們今年採辦得來的由國家支配的糧食比去年或前年少些。恰巧相反，我們今年所採辦得來的由國家支配的糧食，要比過去幾年多得多。可是，我們現在畢竟遇到了糧食困難。請看幾個數字吧。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共採辦有四萬三千四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萬二千三百萬普特，所採辦得來的糧食剩留在國內的有三萬一千一百萬普特。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共採辦有五萬九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萬五千三百萬普特。所採辦得來的糧食剩留在國內的有四萬四千三百萬普特。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共採辦有五萬七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二千七百萬普特。所採辦得來的糧食剩留在國內的有五萬四千九百萬普特。換言之，在本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已經採辦來供國內需要的，比去年多一萬萬普特，比前年多二萬三千萬普特。可是，我們今年在糧食戰線上還是遇到了困難。

我有一次做報告時已經說過，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特別是富農，利用這些困難來破壞蘇維埃經濟政策。你們知道，蘇維埃政權已採取好些辦法來消滅富農底反蘇維埃發動。因此，關於這點，我現在不來多說。我在這裏所注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所指的，就是關於商品糧食出產額增長得緩

慢的原因問題，就是關於雖然我國播種面積和糧食出產總量已經達到戰前程度，而我國商品糧食出產額還是比糧食需要額增長得慢些的問題。

我國播種面積已達到戰前程度，這難道不是事實麼？是的，這是事實。糧食出產總量在去年已等於戰前出產額，就是說已達到五十萬萬普特糧食，這難道不是事實麼？是的，這是事實。那末為什麼雖有這些情況，而我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少至兩倍，而輸出國外的糧食却幾乎比戰前少至二十倍呢？這首先和主要是因為在十月革命發生後，我國農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已從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多的巨大地主經濟和巨大富農經濟，過渡到了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少的小農經濟和中農經濟。戰前我國有一千五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個體農戶，而現在我國却有二千四百萬至二千五百萬農戶，——單是這一點就已說明現在我國農業底主要基礎，是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少的小農經濟。巨大農莊，不管它是地主農莊也好，富農農莊也好，或是集體農莊也好，其所有的長處，就是它能採用機器，利用科學成績，採用肥料，提高勞動生產率，所以它能出產最多的商品糧食。反之，小農經濟所有的弱點，就是它沒有這種可能性，或幾乎沒有這種可能性，所以它是半消費性的經濟，商品出產量很少的經濟。例如拿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來說吧。它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佔它們的總產量百分之四七點二。換言之，它們所羅出的商品糧食比戰前地主農莊所出產的還要多。而小農農莊和中農農莊呢？它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只等於它們的出產總量百分之一點二。可見，這裏的差別是很大的。

從下面的數字中，便可看出過去戰前時期與現在十月革命後時期糧食生產底結構情形。這些數字是中央統計局委員茹蒙啓諾夫同志製定的。據茹蒙啓諾夫同志在說明書裏附帶聲明說，這些數字並

不能說完全精確，而只能使人作出一種大約的計算。但這些數字完全足使我們明白，從一般糧食生產底結構上看來，特別從商品糧食生產底結構上看來，戰前時期與十月革命以後時期是有很大差別的。

大戰以前：

糧食出產總量			商品糧食(運出農村以外的)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商品糧食所佔百分數
(1)地主	六〇〇	一二・〇	二八一・六	二一・六	四七
(2)富農	一,九〇〇	三八・〇	六五〇・〇	五〇・〇	三四
(3)中農和貧農	二,五〇〇	五〇・〇	三六九・〇	二八・四	一四・七
總計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三〇〇・六	一〇〇・〇	二六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

糧食出產總量			商品糧食(運出農村以外的)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商品糧食所佔百分數
(1)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	八〇・〇	一・七	三七・八	六・〇	四七・二
(2)富農	六一七・〇	一二・〇	一二六・〇	二〇・〇	二〇・〇
(3)中農和貧農	四,〇五二・〇	八五・三	四六六・二	七四・〇	一一・二
總計	四,七四九・〇	一〇〇・〇	六三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三・三

這個統計表是說明什麼呢？

第一，它說明絕大部分糧食出產，已從地主富農方面轉到小農中農方面。這就是說，小農中農既已完全解脫了地主壓迫，在基本上打破了富農勢力，於是就得到了最切實改善自己物質狀況的可能。這是十月革命底結果。基本農民羣衆從十月革命方面所獲得的最大利益，首先就表現在這裏。

第二，它說明我國商品糧食底基本擁有人，是小農，尤其是中農。這就是說，不僅從糧食出產總量方面看來，而且從商品糧食出產額方面看來，蘇聯在十月革命之後，已變成小農經濟的國家，中農成了農業方面的「中心人物」。

第三，它說明地主經濟（巨大經濟）已被消滅，富農經濟（巨大經濟）已縮減至三倍有奇，我國已由巨大地主富農經濟過渡到只能糶出百分之十一的產品的小農經濟；同時在糧食生產方面又還沒有若何發展的巨大公共經濟（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這些情形，本來應當而且果然已使商品糧食出產額比較戰前銳減了。雖然我們現在糧食出產總量是與戰前產額一樣，而我們現在所有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少至兩倍，——這是事實。

這就是我們在糧食戰線上困難底基本原因。

正因爲如此，所以不可把我們在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當作是簡單的偶然現象。

毫無疑義的，還有一個情況也在這裏起了某種不良作用，這就是我們商業機關承担了本來沒有必要的一種替許多中小城市供給糧食的義務，結果是不能不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國家糧食儲存。可是，我們在糧食戰線上遇到困難的基本原因，當然不是這個情況，而是我國農業商品額增長得遲

慢，而同時商品糧食需要額却增長得很迅速的事實。

出路何在呢？

有些人認為出路就在於恢復富農經濟，在於發展和擴展富農經濟。這些人不敢說要恢復地主經濟，因為他們大概懂得，在現時來談這類事情，是很危險的。可是，唯其如此，他們也就更高興說必須多方發展富農經濟，以利用於：蘇維埃政權。這些人認為蘇維埃政權可以同時倚靠於兩個彼此對立的階級：一方面倚靠於以剝削工人階級為經濟原則的富農階級，另一方面倚靠於以消滅任何剝削為經濟原則的工人階級。這真是只有反動派才表演得出來的把戲。不必證明：這種反動「計劃」，是與工人階級利益，與馬克思主義原則，與列寧主義任務沒有絲毫相同處的。有人說，富農並不「劣於」城市資本案，富農絲毫也不比城市耐潑曼危險些，因此我們現在不必「害怕」富農，——這種說法是自由派的空話，是用來催眠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底警惕性的。不要忘記，如果說我們在工業方面能用供給工業商品總量十分之九的巨大社會主義工業去和城市小資本案對立，那末我們在農村生產方面所能用去與巨大富農生產對立的，却不不過是尚未強固而糧食產量尚比全體富農農莊糧食產量少至八倍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不懂得巨大富農農莊在農村中的意義，不懂得富農在農村中的比重超過資本案在城市工業中的比重百倍的事實，那就是神經錯亂，完全離開列寧主義，而投奔到工人階級底敵人方面去了。

那末，出路究竟何在呢？

(1) 首先，出路就是把落後的散漫的細小農場聯合為大規模的公共農莊，這種公共農莊是得

到機器供給，用科學成績武裝起來，而能夠生產最多商品糧食的。出路就是要在農業方面由個體的農民經濟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的經濟。

[列寧還在十月革命最初時日，就已號召我們黨去組織集體農莊。從那時起，關於集體農莊思想的宣傳，在我們黨內是始終沒有停止過的。可是，關於建設集體農莊的號召，直到近來才獲得羣衆方面的響應。這首先是因爲農村中合作社運動的廣闊發展，已在農民情緒上準備了一個趨向於集體農莊的轉變，而有許多集體農莊現時已能每俄畝出產一百五十至兩百普特糧食，其中商品糧食佔全部收成百分之三四十的情形，又在貧農和下層中農裏面造成了很願意加入集體農莊的趨向。還有一個情況在這裏也有不小的意義，這就是我們國家直到最近以來才獲得了大大資助集體農莊運動的可能。大家知道，國家在今年所已支出幫助集體農莊的款項，比去年多至兩倍（在六千萬盧布以上）。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是完全正確的，它認爲羣衆集體農莊運動所需要的條件已經成熟，認爲加強集體農莊運動是提高我國糧食生產商品額的最嚴重方法之一。

據中央統計局統計，集體農莊在一九二七年的糧食出產總量不下五千五百萬普特，其一般平均商品額是等於百分之三十。本年年初所發生的那個成立新集體農莊的廣闊浪潮和實行擴大舊集體農莊的事實，將使集體農莊糧食產量到本年年底大大增加起來。任務就是要保持現時集體農莊運動發展速度，擴大集體農莊規模，取消那些虛張的集體農莊，而組織真正的集體農莊，並規定各集體農莊必須把全部商品糧食交給國家和合作社機關，不然就領不到國家方面的津貼和借款。我認爲只須遵守這些條件，那我們經過三四年後，就能從集體農莊方面得到約近四五千萬普特的商品糧食。

人們有時候把集體農莊運動與合作社運動對立起來，大概認為集體農莊是一回事，而合作社却是另一回事。這當然是不對的。有些人甚至把集體農莊與列寧底合作社計劃對立起來。不待說，這種對立是絲毫不合情理的。其實，集體農莊是一種合作社形式，是最明顯的生產合作社形式。有銷售合作社，有供給合作社，也有生產合作社。集體農莊一般說來是合作社運動不可分開的組成部分，局部說來是列寧合作社計劃不可分開的組成部分。實行列寧合作社計劃，就是把農民從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集體農業合作社。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我們的集體農莊，是在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發展和加強了的時候才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2) 其次，出路就是要擴大和鞏固原有的蘇維埃農莊，組織和發展新的巨大蘇維埃農莊。據中央統計局統計，現有蘇維埃農莊糧食出產總量，在一九二七年不下四千五百萬普特，其中商品額佔居百分之六十五。毫無疑義，在國家予以相當贊助下，蘇維埃農莊就可大大提高糧食生產了。可是，任務並不以此為限。蘇維埃政權已經決定，在那些沒有農民份地的區域內應組織新的巨大的蘇維埃農莊（每個農莊由一萬至三萬俄畝不等），這些農莊經過五六年後，就應出產約近一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組織這些蘇維埃農莊的工作，已在着手進行。任務就是無論如何都要實現蘇維埃政權底這個決定。我認為：只須完成這些任務，那我們大約經過三四年後，就能夠從新舊蘇維埃農莊方面得到八千萬至一萬萬普特左右的商品糧食了。

(3) 最後，出路就是要一貫提高小農和中農個體經濟底收成率。我們不可以而且不應當贊助巨大的個體經濟，即富農經濟。可是，我們可以而且應當贊助小的中等的個體農民經濟，提高它的

收成，把它引上合作制底軌道。這是一個舊的任務，是我們還在一九二一年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時就已特別用力宣佈過的任務。這個任務後來又由我們黨在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加以批准了。現在因為在糧食戰線上發生困難，這個任務底重要性也就更其明顯了。因此，應當堅決執行這個任務，也如必須堅決執行頭兩個任務，即關於集體農莊的任務和關於蘇維埃農莊的任務一樣。

所有一切材料，都是說明農民經濟底收成率在幾年以內便能增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現在我國所使用的木犁，不下五百萬。只須用鐵犁代替這些木犁，就可使我國糧食產量大大增長起來。更不必說，我們將用某種最低限度數量的肥料、優良種子和小型機器等等供給農民經濟。訂立合同，與整鄉整村訂立關於供給它們以種子等等，同時一定要它們交出相當數量糧食的條約，就是提高農民經濟收成率和吸收農民加入合作制的最好方法。我認為：只須在這方面認真工作，那末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便能從小農和中農個體經濟方面取得不下一萬萬普特的新增商品糧食了。

所以，只須執行這一切任務，那末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國家就會擁有二萬萬至二萬五千萬普特的新增商品糧食，而在國內和國外都頗能機動自如了。

為逃出糧食戰線上的困難所必須採取的辦法，大體上就是如此。

除採取這些基本辦法而外，還要採取一些臨時辦法來改善關於用商品供給農村的設計工作，並且使我們各商業機關不再擔任供給許多中小城市糧食的義務，——這就是現時的任務。

除這些辦法而外，是不是還應當採取其他某些辦法，譬如說採取降低我國工業發展速度的辦法，因為我國工業增長是使糧食需要額迅速增長，甚至於暫時還超過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的？不

是的，是不應當的。無論如何都是不應當的！降低工業發展速度，就是削弱工人階級，因為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每個前進步驟，每個新工廠，按照列寧說法，都是工人階級底「新要塞」，足以加強它在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鬥爭中，在反對我國經濟裏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中的陣地。恰巧相反，我們應當保持現時的工業發展速度，我們應當在一有可能時就更加發展這個速度，以便把大批商品輸入農村，並從那裏多多收取糧食，以便把機器供給農業，首先是供給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以便把農業工業化，並提高農業生產底商品額。

也許爲着更加「慎重」起見，應當阻延重工業發展速度，把主要是供應農民市場的輕工業變成我國工業底基礎吧？無論如何都是不應當的！這就會是自殺，這就會是破壞我國全部工業，連輕工業也在內。這就會是離開我國工業化底口號，把我國變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底附屬品。我們在這裏所持的出發點，就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著名的指示，這些指示是我們全黨所絕對必須遵行的。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吧：

「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與旺，也還不夠，——我們還要有重工業」。

其次：

「我們在各方面，甚至在學校經費方面，都實行節省。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知道。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爲獨立國家的地位」（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九頁）。

列寧底這些指示，是不可忘記的。

既然採取上面所指出的辦法，那末工農聯盟又將怎樣呢？我認為這些辦法只會促進工農聯盟鞏固的事業。的確，如果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加快速度發展起來；如果由於直接幫助小農中農的結果，他們農莊上的收成率提高起來，而合作社又會包括日益廣大的農民羣衆；如果國家又得到幾萬萬普特爲實行機動辦法所必要的新有商品糧食；如果由於實行這些以及諸如此類辦法的結果，富農將被壓制，漸被克服，——那末工農聯盟內的工農矛盾就會因此而日益消失，糧食採辦事業方面的非常手段將沒有採取的必要，廣大農民羣衆將日益轉向農業集體形式，而爲克服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將日益帶有羣衆的有組織的性質，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工農聯盟事業只會因實行這種辦法而得到利益，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只是應當注意一點：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並不是什麼簡單的聯盟。這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兩者階級聯盟底特殊形式，其目的是：（1）加強工人階級底陣地，（2）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作用，（3）消滅階級和消滅階級社會。對於工農聯盟的任何其他一種瞭解，都是機會主義，孟什維主義和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作什麼都可以，只是不可叫作馬克思主義，不可叫作列寧主義。

怎樣使工農聯盟思想與列寧說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一著名原理相容呢？這裏沒有矛盾麼？這裏只有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矛盾。其實，這裏是沒有絲毫矛盾的。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把農民估計爲「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同時他在這個

報告中又再三論證工農聯盟底必要，說「專政底最高原則，就是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夠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很明顯的，列寧無論如何也沒有認為這裏有絲毫矛盾。

應怎樣瞭解列寧說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一原理呢？這是不是說農民階級是由資本家組成的呢？不是的，不是說這一點。這是說，第一，農民是個特別階級，它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因此也就與無產階級不同，因為無產階級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這是說，第二，農民是從自己隊伍中分沁出，產生着和培養着資本家、富農以及其他各種剝削份子的階級。

這個情況是對於工農聯盟組織事業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麼？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並不是與全體農民聯盟。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這樣一個聯盟，不與農民資本主義份子作鬥爭，不與富農作鬥爭，是不能實現的。這樣一個聯盟，不把貧農當作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組織起來，是不能鞏固的。因此，現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只有在列寧所提出的一個著名口號，即倚靠貧農，與中農成立堅固聯盟，一分鐘也不停止反富農鬥爭的口號下，才能實現。因為只有在實行這個口號的條件下，才能把農民基本羣衆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軌道上來。

你們由此就可知道：在列寧這兩個公式之間只有臆造的矛盾，似是而非的矛盾。其實它們是沒有絲毫矛盾的。

列寧與聯合中農問題

——答C同志——

C同志！

你說列寧在他那篇論索洛卿的著名論文中所提出的口號，即「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協定，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農鬥爭，而只是穩穩地倚靠着貧農」這一口號，是「貧農時期」的口號，是「所謂中立中農時期末」的口號，——你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貧農委員會是成立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到一九一八年十月末，我們在農村中的勢力已超過富農，中農已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了。中央當時根據這個轉變，就決定取消蘇維埃與貧農委員會間的兩個政權並存局面，改選村鎮蘇維埃，把貧農委員會溶化在新選出的蘇維埃中去，也就是說取消貧農委員會。大家知道，將這個決定當作蘇維埃正式的決定提出來，是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議決的。我所指的，是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在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所通過的決議，即改選村鎮蘇維埃以及把貧農委員會溶化於蘇維埃中去的決議。列寧那篇標題為索洛卿底寶貴自供而宣佈與中農協定口號以代替中立中農口號的論文，又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呢？它是在一九一八年十

• 本文篇幅，略有刪減。——斯大林註。

一月二十一日出現的，即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以後，幾乎經過兩星期時出現的。列寧在這篇論文內直截說道：我們之所以採取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因為中農已轉向我們這方面來了。請看列寧底話吧：

「我們在農村裏的任務，就是消滅地主，打破剝削者和富農投機份子底反抗；爲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只能穩穩地倚靠半無產者，即倚靠「貧農」。但中農並不是我們的敵人。他過去動搖過，現在動搖着，而且將來還會動搖的，但感化動搖份子的任務，却與推倒剝削者以及戰勝積極敵人的任務不同。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協定，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農鬥爭，而只是穩穩地倚靠着貧農，——這就是現時的任務，因為正是在現時，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中農轉向我們這方面來是必不可免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九四頁）。

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由此所應得出的結論是：列寧底口號所指的不是舊時期，不是貧農委員會和中立中農時期，而是新時期，即與中農協定時期。所以，它所反映的，不是舊時期底末尾，而是新時期底初頭。

可是，你關於列寧口號的斷語，不僅在形式上不對，不僅在所謂年月方面不對，而且按實質說來也是不對的。大家知道，列寧所提出的關於與中農協定的口號，在我們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三月）已成爲用全黨名義宣佈的新口號。大家知道，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正是確定了我們與中農堅固聯盟政策基本原則的代表大會。大家知道，我們聯共（布）底黨綱也是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

• 所有的着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上通過的。大家知道，在這個黨綱內有幾項專門條文，規定黨對於農村各個集團的態度：對於貧農的態度，對於中農的態度，對於富農的態度。在聯共（布）黨綱這幾項條文內，關於農村各個社會集團以及關於黨對於他們的態度，是怎樣規定的呢？請聽吧：

「俄國共產黨在其全部農村工作中，照舊還是倚靠着農村無產者階層和半無產者階層，首先就要把他們組織為獨立的力量，在農村中成立黨支部，成立貧農組織，成立農村無產者與半無產者特式職工會等等，竭力使他們與城市無產階級接近，使他們擺脫農村資產階級和小私有財產利益底影響。

俄國共產黨對於富農，對於農村資產階級的政策，就在於堅決反對他們剝削者的趨向，鎮壓他們反抗蘇維埃政策的行動。

俄國共產黨對於中農的政策，就在於逐漸地和有計劃地吸收他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黨底任務就是要使中農離開富農，細心關注中農底需要，以便把他們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用思想感化的辦法，而絕對不是用鎮壓的辦法來克服他們的落後性，在一切有關中農切身利益的地方，都要設法與中農達到實際協定，在決定社會主義改造工作方法的時候，要向中農讓步」。（見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九六頁）。

你試試找出黨綱這幾項條文與列寧口號間的區別，那怕就是最小的區別，那怕就是字句上的區別吧！你是找不出這種區別來的，因為天地間根本就沒有這種區別。不僅如此。毫無疑義的，列寧底

＊所有的著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口號不僅不與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問題的決議相矛盾，而且恰巧相反，它是這些決議底最精確最中肯的表述。須知，事實是這樣：聯共（布）黨綱是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專門討論了中農問題的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而列寧宣佈與中農協定口號的那篇反對索洛維的論文，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即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四個月以前出現於報章的。

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完全批准了列寧在他那篇反對索洛維的論文內所宣佈的口號，作為黨在整個現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內農村工作中所務必當作指南的口號，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列寧口號底要旨何在呢？

列寧口號底要旨就在於它非常準確地把握住黨在農村中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用一個簡短公式表示出來：（一）要倚靠貧農，（二）要與中農成立協定，（三）一分鐘也不停止反富農鬥爭。你若從這個公式內拿出某一部分作為現今農村工作底基礎，而忘記其餘兩部分，便一定會走入絕境的。在現今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條件下，不倚靠貧農，不進行反富農鬥爭，是否可以與中農建立真正的堅固的協定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在現今發展條件下，不倚靠貧農，不與中農協定，是否可以進行反富農的順利鬥爭呢？當然是不可以的。怎樣才能最中肯地把黨在農村中工作底這個三位一體的任務用一個概括口號表示出來呢？我認為列寧口號是這個任務底最中肯的表示。必須承認：誰也不能比列寧說得更中肯些：

為什麼正是在現時，正是在農村工作現今條件下，必須着重指出列寧口號底適當性呢？

因為正是在現時，有個別同志趨向於把黨在農村中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撕成幾部分，而將其

彼此隔開。這是我們今年一二月間的糧食採辦運動底實踐所完全證實了的。必須與中農成立協定，這是所有一切布爾什維克都知道的。但究竟怎樣來成立這個協定，却不是每個人都懂得的了。有些人想用放棄反富農鬥爭或減弱這個鬥爭來與中農成立協定；他們以為進行反富農鬥爭，就會嚇退一部分中農，即那部分豐裕中農。另外有些人則想用放棄組織貧農工作或減弱這個工作來與中農成立協定；他們以為組織貧農，就會使貧農獨樹一幟，而獨樹一幟，就會把中農從我們方面嚇走。由於這樣離開正確路線，結果便忘記了如下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中農是一個動搖階級，只有堅決反對富農並加緊在貧農中間進行工作，才可使與中農的協定成為堅固的協定，不然中農就會認為富農是強大的力量，而動搖到富農方面去。請記起列寧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吧：

「必須決定對沒有一定不移的堅固地位的，那個階級的關係。無產階級大多數都贊成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大多數都反對社會主義，——要決定這兩個階級間的關係，是容易的。可是，當我們講到如中農這樣一個階層時，那就可以看見這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一方面是私有主，另一方面又是勞動者。他是不剝削其他勞動者的。他在數十年內受盡千辛萬苦，勉強維持自己的地位，親身受到地主和資本家底剝削，忍受一切苦痛，但同時他又是有私心。因此，我們對於這個動搖階級的關係，是有莫大困難的。」（見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四六頁）。可是，也有另外一種離開正確路線的趨向，其危險性並不少於上述趨向。有時候，人們進行着反富農鬥爭，可是他們把它進行得這樣笨拙，這樣粗率，以致打擊到中農和貧農頭上來了。結果，

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富農仍然是完整無恙，而與中農聯盟的事業却發生裂痕，一部分貧農竟暫時落在那些對蘇維埃政策進行陰謀破壞鬥爭的富農爪牙裏去了。有時候，人們又企圖把反富農的鬥爭變為剝奪富農財產，把糧食採辦工作變為餘糧收集制，而忘記在我們現今條件下剝奪富農財產是一件蠢事，餘糧收集制並不是與中農聯盟，而是與中農鬥爭。

這些離開黨路線的趨向，是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呢？

就是由於不瞭解黨在農村中工作底三重任務是單一而不可分開的任務。由於不瞭解決不可把反富農鬥爭的任務和與中農協定的任務分開，決不可把這兩個任務和將貧農變為黨在農村中支柱的任務分開*。

爲要使這些任務在我們日常農村工作過程中不致彼此隔離，便要怎樣作呢？

爲此至少必須提出一個基本口號，把一切任務合併爲一個總公式，而不容許將其彼此隔離起來。

在我們黨的武庫內是不是有這樣一個公式，這樣一個口號呢？

是的，是有的。列寧所說「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協定，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農鬥爭，而只是穩穩

* 由此可見，離開正確路線的趨向能爲工農聯盟事業造成兩種危險：一方面的危險，是由於有些人想把——譬如說糧食採辦方面的臨時非常辦法變為最底經常的或長久的方針；另一方面的危險，是由於有些人想利用取消非常辦法這件事情來放鬆富農，來宣佈貿易完全自由，使貿易不受國家機關所調節。因此，爲要保證正確路線，就必須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

我還要重複指出，就是我們的刊物並不是常常都遵守這個規則，而有時表現出一些片面態度。例如，有時候揭露着

地倚靠着貧農」這一口號，就是這樣的公式。

因此，我認爲這個口號是最適當而能包括一切的口號，正是在現時，正是在農村工作現今條件下，必須把它提到第一位。

你認爲列寧底口號是「反對派的口號」，並且在你的來信內問道：「爲什麼這一個反對派口號竟能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一號前夜在真理報上登載出來呢？爲什麼這個口號竟然出現於聯共中央底機關刊物真理報上呢？這是否只是排印上的錯誤，抑或是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妥協呢？」不待說，話是說得氣勢汹汹的！可是，C同志，你總得在「轉變地方」慎重一點兒才好，免得你在氣頭上得出結論說要禁止刊印我們黨綱，因爲它完全批准了列寧的口號（是事實呵！），且基本上是由列寧（絕對不是反對派份子！）起草，而由我們黨（也不是反對派！）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請多尊重我們黨綱上關於農村各個社會集團的那些著名條文吧！請多尊重第八次黨代表大會關於中

那些把糧食採辦方面的臨時非常辦法變爲我們政策底經常方針，因而給工農聯盟造成一種威脅的人。這樣揭露是很好。可是不好而且不對的，就是同時却没有充分注意，沒有盡着揭露那些從另一方面威脅工農聯盟的人，沒有揭露那些屈服於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要求減弱反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要求規定貿易完全自由，使其不受國家調節，因而從另一種來破壞工農聯盟的人。這就不好了。這是片面態度。

有時候，揭露着那些認爲「譬如說」不可以，不宜於振興現今階段上還是農業基礎的個體小農中農經濟的人。這樣揭露是很好。可是不好而且不對的，就是同時沒有揭露那些忽視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意義，不懂得現時除必須振興個體小農中農經濟之外，還要切實發展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建設事業的人。這就是片面態度了。爲要保證正確路線，就必須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拋棄任何片面態度。

農的決議吧！：至於你說「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妥協」，那末我認為這句話簡直不值一駁，因為這句話大概是你冒火說出來的。

使你莫明其妙的，大概是這樣一個情況：在列寧底口號裏和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聯共（布）黨綱上所說的，是與中農協定；而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辭時所說的，却是與中農堅固聯盟。你大概認為在這裏有某種矛盾。也許你甚至還想這樣設想，以為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一種離開與中農聯盟的政策。這是不對的，C同志。這是個很大的錯誤。只有那些會讀口號字母而不會考察口號意思的人，才能這樣想。只有那些不知道關於與中農聯盟，關於與中農協定這個口號底歷史的人，才能這樣想。能這樣想的只有這樣一種人，這種人以為：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辭時說到要實行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而列寧在同是這次代表大會上所作另一篇演說內以及在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內，却又說我們現在需要實行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於是他就是自己離開了自己。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是因為列寧和黨——以第八次代表大會為代表——認為在「協定」與「聯盟」這兩個概念間沒有絲毫區別。原來是因為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一切演說內，到處都認為「聯盟」和「協定」這兩個概念是完全相等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對中農態度問題」的決議也是如此，在這裏也認為「協定」和「聯盟」這兩個概念是完全相等的。因為列寧和黨認為與中農協定的政策，並不是一個偶然的，很快就成過去的政策，而是一個長期的政策，所以他們過去和現在都有充分理由把與中農協定的政策稱為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反轉來說，他們過去和現在都有

充分理由把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稱為與中農協定的政策。只須讀一讀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底速記錄以及這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就可以深信這一點了。

請看從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摘引來的一段話吧：

「因為蘇維埃工作人員沒有經驗，因為問題困難，所以預定對付富農的那些打擊就往往落到了中農身上。我們在這裏犯了非常大的過失。在這方面積聚起來的經驗，將能幫助我們極力設法避免今後重犯這種過失。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不是理論上，而是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你們明白知道這個任務是困難的。我們還沒有什麼物質福利可以給與中農，而中農却是唯物主義者，實際主義者，他要求具體的物質福利，這種福利我們現在還拿不出來，而且國家也許還要在沒有這些福利的情況下渡過現時已表明有完全勝利希望的艱難鬥爭月份。可是，我們在我們的行政實踐中能做出很多事情：改善我們的機關，糾正大抵濫用職權的現象。我們能夠而且應當設法糾正，並完全糾正我們黨沒有充分注意到與中農同盟，與中農聯盟，與中農協定*的路線」（見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二四至二五頁）。

由此可見，列寧是沒有認為「協定」與「聯盟」有絲毫區別的。

又請看從第八次代表大會「對中農態度問題」的決議中摘引來的一段話吧：

「把中農和富農混淆起來，把對付富農的辦法在某種程度內推行到中農身上，那就不僅是最粗魯地違背蘇維埃政權一切法令及其全部政策，而且是最粗魯地違背共產主義底一切基本原

*這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則，這些原則指出：無產階級在其爲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決鬥時期與中農協定，是無痛苦地過渡到消滅任何剝削現象的條件之一。

因爲農業技術比較工業落後之故，——甚至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裏，俄國更不必說了，——中農具有比較堅固的經濟根蒂，所以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始以後，中農還會支持到頗久的時間。因此，蘇維埃工作人員以及黨工作人員在農村中的策略，應當是計算到與中農實行長期合作；——這樣，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實行完全正確的政策，就能保證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與中農的聯盟和協定：

：「工農政府和共產黨底政策，今後也應當本着無產階級和貧農兩者與中農實行這種協定的精神來進行」*（見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四一七至四二〇頁）。

可見，這個決議也是絕對沒有認爲「協定」與「聯盟」有什麼區別的。

不妨還指出一點，就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這個決議中，沒有一句話是講到與中農「堅固聯盟」的。但這是不是說決議因此就離開了與中農「堅固聯盟」政策呢？決不是。這只是說，決議認爲「協定」「合作」概念是與「堅固聯盟」概念完全相等的。而這是不言而喻的：不與中農「協定」，便不能與中農「聯盟」，而不與中農實行「長期」協定與合作，便不能使與中農聯盟成爲「堅固的」聯盟。

事實就是如此。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列寧和第八次黨代表大會離開了列寧關於與中農「堅固聯盟」的聲明，

*所有的着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或者必須拋棄這種不莊重的假設，而承認列寧和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並沒有認為「協定」與「堅固聯盟」這兩個概念有絲毫的區別。

總之，誰不願意成為空洞咬文嚼字主義底犧牲品，誰願意細心思索列寧口號，即倚靠貧農，與中農協定，與富農鬥爭這一口號底意思，誰就不能不瞭解與中農協定的政策乃是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你的錯誤，就在於你沒有懂得反對派撞騙的圈套，却中了他們挑撥離間的詭計，落入敵人給你掘好了的陷阱。反對派的騙子在那裏大喊大叫，硬說他們贊成列寧關於與中農協定的口號，同時又故意作出挑撥離間的暗示，說與中農「協定」是一回事，而與中農「堅固聯盟」却是另一回事。他們想這樣來一箭雙鵰：第一，隱瞞自己對於中農問題的真正立場，其內容不是要與中農協定，而是要「與中農爭執」（參看我在第十六次莫斯科省黨代表會議上所引證過的反對派份子斯米爾諾夫那篇有名的演說）；第二，把「協定」與「聯盟」間的虛構的區別當作圈套，來籠絡布爾什維克裏那些頭腦簡單的人，完全迷住他們，推着他們離開列寧。

而我們的某些同志又是怎樣回答這一點的呢？他們不僅不斷破反對派撞騙徒底假面具，不僅不揭破這些騙徒對黨隱瞞自己真正立場的欺騙行為，——却反而滾入圈套，滾入陷阱，讓別人推着他們離開列寧。反對派大吹大擂，暢談列寧口號，反對派份子把自己裝成擁護列寧口號的人，因此我應當避開這個口號，免得人家把我和反對派混在一塊，否則人家就會責備我是和「反對派妥協」，——這些同志底邏輯就是如此！

而且，這還不是反對派撞騙手段底唯一例子。例如就拿自我批評的口號來說吧。布爾什維克不

能不知道自我批評口號是我們黨行動底基礎，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是布爾什維克培養幹部方法底靈魂。反對派大聲囂嚷，硬說自我批評口號是他們（反對派）想出來的，硬說黨是從他們那裏抄襲這個口號，並因此而向反對派投降了的。反對派這樣幹法，至少是想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是想欺瞞工人階級，欺騙工人階級，不讓工人階級知道，以破壞黨性為目的的反對派自我批評和以鞏固黨性為目的的布爾什維克自我批評，是根本不同的；第二，是想籠絡某些頭腦簡單的人，並逼迫他們表示不同意於黨的自我批評口號。

而我們的某些同志又是怎樣對付這一點的呢？他們不僅不撕破反對派騙子底假面具，不僅不堅持布爾什維克自我批評口號，反而落入陷阱，離開自我批評口號，而聽憑反對派愚弄，並：向它投降，同時却又誤以為他們是表示不同意於反對派。

這樣的例子，是可以引出一大堆來的。

可是，我們在自己工作中，決不能聽憑他人愚弄，尤其不能以反對派對於我們的評論為指南。我們應當走自己的道路，既排斥反對派底拐騙手腕，又排斥我們某些落入反對派挑撥離間圈套的布爾什維克底錯誤。請記起馬克思所常用的話：「一心循着自己的道路走，讓人們隨便怎樣去說吧！」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發表於
《真理報》第一百五十二期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委員會

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認爲首先必須撇開小事情，撇開個人問題等等，以便解決我們所注意的右傾問題。在我們黨內是不是有右傾的機會主義的危險；是不是有一種利於這種危險的客觀條件；怎樣與這個危險作鬥爭，——這就是現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可是，我們若不撇開一切蒙蔽這個問題並妨礙我們來瞭解問題本質的小事情和次要成份，便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查波爾斯基說得不對，他竟認爲右傾問題是一個偶然的問題。他硬說，這裏全部問題並不在於右傾，而是在於意氣鬥爭，個人傾軋等等。暫時假定這裏也同在任何鬥爭裏一樣，意氣鬥爭和個人傾軋是有幾分作用吧。可是，拿意氣鬥爭來解釋一切，只看見意氣鬥爭而不見問題本質，便是離開了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像莫斯科組織這樣一個毫無疑義是老練而團結一致的巨大組織，是決不會因有幾個意氣鬥爭者或傾軋家努力，便弄得上上下下都被驚動，都被掀動起來的。同志們，天下決不會有這樣的怪事。我還不說，莫斯科組織底力量和能力是不可這樣輕視的。在這裏起作用，顯然是一些更加深刻而與意氣鬥爭或個人傾軋毫不相干的原因。

福龍托夫也說得不對，他雖然承認有右傾危險存在，但不認為這個危險值得認真求實的人去認真過問。照他這樣說來，右傾問題是空喊者所注意的問題，而不是求實的人所應注意的問題。我完全懂得福龍托夫底意思，他十分忙於日常的實際工作，而沒有工夫來想到我們的發展前途。可是，這還不是說我們應當把某些黨工作人員底狹隘實踐的事務主義變為我們的建設工作底教條。健全的事務主義本來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如果它在工作失掉前途，不自己的工作服從黨的基本路線，那它就會變成不良現象了。可是不難明白：右傾問題是關於我黨基本路線的問題，是關於我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所規定的發展前途是否正確的問題。

有些同志在討論右傾問題時把問題完全着重在那些代表右傾的個人身上，也是不對的。他們說，請指出右傾份子或調和派份子來，請說出他們的姓名來，讓我們好來懲辦他們。這樣提出問題，是不正確的。個人問題當然有相當作用。可是，這裏問題並不在於個人，而是在於黨內右傾危險所由產生的條件和環境。儘可以把個人排除，但這還不是說，我們這樣就算把我們黨內右傾危險根源打破了。所以個人問題雖然也確實值得注意，可是它不能有決定的意義。說到這裏，不能不回憶起一九一九年末和一九二〇年初在敖得薩地方發生的一件事情，那時我軍部隊已把鄧尼金軍隊逐出烏克蘭，而在消滅敖得薩一帶的鄧尼金軍隊的殘部。那時，有一部分紅軍戰士，怒氣沖沖，在敖得薩城內搜尋協約國，因為他們相信一拿獲協約國，那戰爭就會終結了。（全場發笑）。就假定紅軍戰士當時在敖得薩竟能拿獲協約國底某個代表人物吧。可是，協約國問題當然是不會因此而解決的，因為當時敖得薩雖然是鄧尼金隊伍底最後一塊地盤，但協約國底根源並不在敖得薩，而是在世界資

本主義中。我們某些同志談到右傾問題時專門着重於那些代表右傾的個人，而忘記產生這種傾向的條件，這實在是和上述故事相彷彿哩。

所以，我們在這裏首先應當說明的，就是關於離開列寧路線的右傾和「左」傾（托洛茨基主義傾向）所由產生的條件問題。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共產黨內的右傾就是一部分共產黨員離開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線，而走到社會民主黨方面去的趨向或偏向，固然是沒有正式形成的，也許是還沒有覺悟到的，但畢竟是這樣的一種偏向。既然有某一部分共產黨員認為在選舉鬥爭中不應實行「階級反對階級」的口號（法國），或反對共產黨提出獨立候選名單（英國），或不願加重反「左派」社會民主黨人鬥爭問題（德國）以及諸如此類等等，那就是說在共產黨內有人極力想使共產主義去遷就社會民主主義。如果右傾在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內獲得勝利，結果就會使共產黨在思想上被人粉碎，使社會民主主義大大加強起來。而使社會民主主義大大加強，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使資本主義加強和鞏固起來，因為社會民主黨是資本主義在工人階級裏的主要支柱。所以，右傾在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內的勝利，結果就會使保存資本主義所必要的條件增長起來。

在資本主義已被推翻，但資本主義根蒂尚未拔除的蘇聯發展條件下，共產黨內的右傾就是一部分共產黨員離開了我們黨底總路線，而走到資產階級思想方面去的趨向或偏向，固然是尚未正式形成的，也許是還沒有覺悟到的，但畢竟是這樣的一種偏向。既然我們有某部分共產黨員企圖拉着我們黨離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底決議而往後退，否認有向農村資本主義份子進攻的必要，或要求縮小

我國工業，認為現時工業發展速度是使國家趨於滅亡的，或認為資助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是不妥當，是枉費金錢的，或認為在自我批評基礎上進行反官僚主義鬥爭是不妥當的，認為自我批評能動搖我們的機關，或要求減弱對外貿易壟斷制等等，那就是說在我們黨隊伍內有人企圖使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去遷就（也許他們自己還不覺得）「蘇維埃的」資產階級底胃口和需要。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得到勝利，結果就會使我們國內資本主義份子大大加強起來。而使我們國內資本主義份子加強，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減弱無產階級專政，而加強資本主義恢復的機會。所以，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結果就會使在我國恢復資本主義所必要的條件增長起來。

在我們蘇維埃國家內，是不是有一種使資本主義恢復成為可能的條件呢？是的，是有的。同志們，這也許好像是很奇怪的，但這是事實。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加速發展着我們社會主義工業，並使農民經濟與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結合起來。可是，我們還沒有拔除資本主義底根蒂。這些根蒂到底是深藏在什麼地方呢？它們是深藏在商品生產裏，深藏在城市小生產和特別是在農村小生產裏。資本主義底力量，正如列寧所說，是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為，可惜小生產在世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很明顯的，既然小生產在我國甚為普遍，甚至佔有絕大的比重，既然它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經常地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所以我國就有使資本主義恢復成為可能的條件。

在我們蘇維埃國家內，是不是有消滅剷除資本主義恢復可能所必要的工具和力量呢？是的，是

有的。列寧所說在蘇聯有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的提綱，其所以正確，就是因為它是以這一點為基礎的。為此就必須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農聯盟，從國家工業化方面着眼來發展我國經濟命脈，加緊速度來發展工業，使全國電氣化，把全部國民經濟都轉到新技術基礎上，使農民羣衆合作化，提高農民經濟收成率，使農民個體農莊逐漸聯合成爲公共農莊，發展蘇維埃農莊，限制和克服城鄉資本主義份子，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

請看列寧如何說明了這一點吧：

「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經濟基礎。這是必須記着的。凡細心考察過農村生活，而把它與城市生活作過比較的人，都知道我們還沒有拔除資本主義根蒂，還沒有打破國內敵人底基礎和根基。國內敵人是支持在小經濟上面的，我們所能用以打破這個敵人基礎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全國經濟，包括農業在內，轉移到新技術基礎上，轉移到現代的大生產技術基礎上。只有電氣才是這樣的基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否則國家仍然是一個小農國家，這是我們必須明白覺悟的。我們不僅在世界範圍內，而且在國內也比資本主義弱些。這是人人皆知的。我們已覺悟到這點，而且我們一定會做到使經濟基礎從小農的過渡爲大工業的。只有國家電氣化了時，只有我們已爲工業、農業和運輸業建立起現代的大工業技術基礎時，我們才會獲得最終的勝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至四七頁）。

第一，由此可見，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當我們還沒有拔除資本主義根蒂時，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經濟基礎。有時候人們把樹砍倒了，而樹根子却還沒有拔除，因爲力量不

夠。由此就有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的可能。

第二，由此可見，除有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而外，在我國還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因為我們能夠消滅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能夠拔除資本主義底根蒂，達到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如果我們努力實行全國電氣化，如果我們爲工業、農業和運輸業建立起現代的大工業技術基礎的話。由此也就有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可能。

最後，由此可見，不能只在工業方面建設社會主義，而聽憑農業去自發地發展，以爲農村「自然會跟着」城市走。城市裏社會主義工業底存在，是農村裏社會主義改造底基本因素。但這還不是說，這個因素是完全足夠的。爲要使社會主義的城市能夠引導農村的農村到底，就必須依照列寧底指示，「把全國經濟，包括農業在內，轉移到新技術基礎上，轉移到現代的大生產技術基礎上」。

列寧這一句話，是不是與他所說「新經濟政策完全保證我們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一語相矛盾呢？不，是不相矛盾的。恰巧相反，這兩句話是完全相符的。列寧並沒有說新經濟政策給予我們現成的社會主義。列寧只是說新經濟政策保證我們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可能建成與社會主義實在建成，是大有差別的。決不可把可能與現實混爲一談。正是爲了把這個可能變成現實，列寧才主張全國電氣化，主張爲工業、農業和運輸業建立起現代的大工業技術基礎，作爲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底條件。

可是，要在一兩年內實現這個建成社會主義的條件是不可能的。決不可在一兩年內把全國工業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化，建成強大工業，使千百萬農民羣衆合作化，爲農業建立新技術基礎，把農民個體農莊合併爲巨大集體農莊，發展蘇維埃農莊，限制並克服城鄉資本主義份子。爲此就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多年的緊張的建設工作。當這一點還沒有做到時，——而這一點並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們就仍然是一個小農國家，在這裏，小生產是經常地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恢復底危險還是存在的。既然無產階級並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十分複雜最現實最實際的生活中，所以在小生產基礎上生長着的資產階級份子，就用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來從各方面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化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內部經常引起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由狂熱轉爲灰心等舊病復發的現象」（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九頁），並這樣把某種猶疑心理，某種動搖情緒，滲進到無產階級及其黨中來。

我黨隊伍內各種動搖和各種離開列寧路線的傾向，其根源和基礎就在這裏。

正因爲如此，所以不可把我們黨內右傾或「左」傾問題當作一個值不得注意的問題。

我們黨內的右傾，即公開機會主義傾向底危險，是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它輕視我們敵人，即資本主義底力量，看不見資本主義恢復底危險，不瞭解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底規律，因而很輕易地向資本主義讓步，要求降低我們工業發展底速度，要求寬待鄉村和城市中的資本主義份子，要求把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問題推到後面去，要求減弱對外貿易壟斷制等等。毫無疑義的，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結果就會放縱資本主義勢力，破壞無產階級底革命陣地，提高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起來的機會。

我們黨內「左」傾（托洛茨基主義傾向）底危險是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它誇大我們敵人，即

資本主義底力量，只看見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而看不見有用我國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悲觀失望，而不得不以妄說我黨正在特米多爾化來聊以自慰。列寧說「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經濟基礎」，——從列寧這句話當中，「左」傾就作出一種不正確的結論說，在蘇聯根本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和農民一起是幹不出什麼事情來的，工農聯盟思想是一個已經過時的思想，如果沒有西方獲得勝利的革命趕快來救急幫忙，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就會倒台或蛻化，如果不採納那種幻想的超工業化計劃，那怕是要以與農民決裂為代價來實行的計劃，社會主義事業在蘇聯就要算是已經滅亡了。由此就有「左」傾政策中的冒險主義。由此就有政策中的「超人類的」跳躍。毫無疑義，如果「左」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結果就會使工人階級脫離自己的農民基礎，使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脫離其餘工人羣衆，因而也就會使無產階級遭受失敗，使恢復資本主義的條件易於形成。

由此可見，這兩個危險，無論是「左」傾危險或右傾危險，這兩個離開列寧路線的傾向，無論是右傾或「左」傾，雖然各從不同的兩端出發，但它們所引起的結果却是一樣。

在這兩個危險中間，那一個壞些呢？我認為兩個都壞。從我們進行順利鬥爭反對它們的觀點上來說，這兩個傾向間的區別，就在於「左」傾現時對於黨是比右傾明顯些。我們已對「左」傾作過幾年的緊張鬥爭，——這個情況對於黨，當然不是枉然的。很明顯的，在對「左」傾——托洛茨基主義傾向——作鬥爭的幾年中，黨已學會了許多東西，誰要用「左」的辭句來欺騙黨，已經不是容易的事情了。至於右傾危險，它從前也是存在的，而現在因為去年糧食採辦工作危機使小資

產階級自發勢力加強的關係，已是更加顯露出來了，——我認爲這個危險對於我們黨某些黨員層還
不十分明顯。因此，任務就是一分鐘也不減弱對「左」傾危險，即對托洛茨基主義危險作鬥爭，而同
時要着重於反右傾的鬥爭，並極力設法使右傾危險，在黨看來也與托洛茨基主義危險一樣明顯。

右傾問題如果不是與關於我國發展過程中的困難的問題有聯繫，也許不會像現在這樣緊張的。
但問題也就在於右傾存在的事實使我國發展過程中的困難趨於複雜，阻難我們克服這些困難。正因
爲右傾危險阻難我們克服困難的鬥爭，所以克服右傾危險的問題對於我們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現在要稍微說說我國種種困難底性質問題。要知道，我國所有的困難並不是停頓過程或衰落
過程中的困難。有經濟衰落過程或經濟停頓過程中的困難，當有這種困難發生時，人們總是力圖把
經濟停頓現象弄得不是很沉重，或是使經濟衰落狀況來得不很深刻。我國所有的困難與這種困難毫不
相同。我國所有困難底特點就在於它們是高漲過程中的困難，是發展過程中的困難。當在我國講
到困難時，我們通常所講的，是究竟要把工業提高百分之幾，把播種面積擴大百分之幾，把收成率
增加多少普特等等。正因爲我國所有的困難是高漲過程中的困難，而不是衰落過程或停頓過程中的
困難，所以這種困難對於黨也就不應當有什麼特別的危險。但困難終究還是困難。正因爲要克服困難
就必須緊張一切力量，必須有剛毅性和堅定性，而剛毅性和堅定性又不是每個人都夠有的，也許因
爲有人覺得疲倦和疲勞，或是因爲有人寧願過着比較安靜的過活，而不願有鬥爭和風波，所以在這
裏也就發生猶疑和動搖，轉向到阻力最小的方面去，說什麼要減低工業發展速度，要求寬待資本主
義份子，否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並根本否認一切超出日常工作尋常安靜環境的事情。可是，

我們若不克服我們面前的困難，便不能向前進展。爲了克服困難，首先就必須打破右傾危險，克服右傾，因爲右傾阻礙我們克服困難的鬥爭事業，並企圖動搖我們黨克服困難的鬥爭意志。這裏所講的，當然是對右傾作真正的鬥爭，而不是口頭上的紙上的鬥爭。我們黨內有些人因爲怕良心上過不去，所以也不拒絕宣佈對右傾危險作鬥爭，好像傳教師有時唸着「上帝至善，上帝至善」一樣，可是並不採取任何實際辦法來把反右傾鬥爭放在應有的基礎上，並在事實上克服這個右傾。這樣的派別，就是我們所稱爲對右的公開機會主義傾向調和的派別。不難瞭解：反對這種調和派的鬥爭，是反右傾，反右傾危險的總鬥爭底組成部分。因爲不進行有系統的鬥爭反對這庇護機會主義者的調和派，便不能克服右的機會主義的傾向。

關於右傾代表者問題，毫無疑義是值得注意的，雖然它不能有決定的意義。在去年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發生危機時，我們在我們黨下層組織裏碰見過右傾危險代表者，當時在村鎮裏有一整批共產黨員起來反對黨底政策，設法去與富農份子勾結。你們知道，這種份子在今年春季已被清出我們黨外，這一點在今年二月間，已經在我們黨中央一個著名文件裏特別提到了。可是，如果說我們黨內再沒有剩下這種份子，那就不對了。如果往上面去看看縣黨組織和州黨組織，仔細查看蘇維埃機關和合作社機關，那你們用不着花費什麼工夫，就可在這裏找到右傾危險代表者以及對這種危險取調和態度的人。大家知道，在我們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好些工作人員所寄來的「書信」、「申明書」以及其他文件中，右傾趨向是表現得十分鮮明的。你們知道，在中央七月全會速記錄上提到了這些書信和文件。如果再往上去看看，而提出關於中央的問題，那就必須承認，在中央委員會中間，

也有一些對右傾危險取調和態度的份子，固然這些份子極少的。中央七月全會速記錄就是對於這一點的直接證明。而在中央政治局內又是怎樣呢？在中央政治局內有沒有什麼傾向呢？在我們中央政治局內，既沒有右傾份子，也沒有左傾份子，也沒有對他們採取調和態度的份子。這是必須在這裏十分鄭重說明的。仇視黨的份子以及各種反對派份子散佈謠言，說我們中央政治局內有右傾或對於右傾的調和態度，——拋棄這種謠言的時候已經到了。

在莫斯科組織中或它的上層機關莫斯科委員會內，是不是有過動搖和猶疑呢？是的，是有過的。如果現在硬說那裏未曾有過猶疑和動搖，那就愚蠢極了。彭可夫底誠懇演說就是對於這一點的直接證明。彭可夫並不是莫斯科組織和莫斯科委員會裏的沒有作用的人。你們已經聽見，他直接地公開地承認了他在我們黨政策許多極重要問題上所犯的錯誤。這當然不是說，整個莫斯科委員會都發生過動搖。不，不是這個意思。像今年十月莫斯科委員會告莫斯科組織全體黨員書這樣的文件，就毫無疑義是證明莫斯科委員會已克服了自己某些委員底動搖。我相信，莫斯科委員會底領導中堅是一定能完全糾正現狀的。

各區組織實行干涉這件事情，提出了必須剷除莫斯科組織裏某些領導人底錯誤和動搖的問題，但有些同志却對這點表示不滿。我真不知道這種不滿究竟有何理由。莫斯科組織裏各區積極份子會議提出自己的意見，要求剷除錯誤和動搖，這有什麼壞處呢？難道我們的工作不是在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評情況中進行的麼？自我批評可以提高黨的和一般無產階級的下層份子底積極性，這難道不是事實麼？如果各區積極份子會議竟然勝任了自己的責任，那又有什麼壞處或危險處呢？

中央出而干涉這件事情，這是不是做得對呢？我認為中央是做得對的。伯爾津認為中央提出撤換一個被區組織所反對的區領導人問題，是做得太激烈了。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可請伯爾津記起一九一九年或一九二〇年發生的幾件事情，當時有些中央委員犯了一些違背黨路線的錯誤，——我認為是很嚴重的錯誤，——當時遵照列寧提議懲罰了這些人，以警效尤，其中有一個人被派往土耳其斯坦，另一個人幾乎被取消了中央委員資格。列寧當時是不是處置得對呢？我以為他是處置得完全對的。當時中央裏的情形，不像現在這樣。當時有一半中央委員是跟着托洛茨基跑的，而中央本身裏的情形是不穩固的。現時，中央底處置法已是寬柔得無比了。為什麼呢？也許是因為我們想比列寧慈善些吧？不，原因並不在這裏。而是因為中央底情形現時已比當時穩固些了，所以中央現在已有比較從寬處置的可能。沙哈洛夫硬說中央干涉得太遲了，他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其所以不對，是因為他顯然不知道中央底干涉在事實上是從本年二月就開始了的。沙哈洛夫如果願意，就可信服這一點。固然，中央底干涉並沒有立刻收到具體的效果。可是，如果拿這一點去責備中央，那就奇怪了。

結論：（1）右傾危險是我們黨內的嚴重危險，因為它是根源於我國社會經濟環境的；（2）右傾危險因有各種困難而加深，不克服右傾以及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便不能克服這些困難；（3）在莫斯科組織裏有過動搖與猶疑，有過不穩固性底成份；（4）莫斯科委員會底中堅因有中央和各區積極份子會議底幫助，已採取了一切辦法去剷除這種動搖；（5）莫斯科委員會一定能克服從前暴露出來的錯誤，這是不容懷疑的；（6）任務就在於剷除內部鬥爭，使莫斯科組織團結一致，在擴展自我批評基礎上順利進行支部改選工作（鼓掌）。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摘錄——

(二) 階級的變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我們的意見分歧是在什麼地方呢？這些意見分歧是與什麼有聯繫的呢？

我們的意見分歧，首先是與最近我們國內以及資本主義各國所發生的階級變動問題有聯繫。有些同志認為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帶有偶然的性質。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之所以發生，是由於最近發生的那些階級變動和階級鬥爭尖銳化，引起了發展過程中的轉變。布哈林集團底主要錯誤就在於它看不見這些變動和這個轉變，看不見而且不願看見這些變動和這個轉變。正因為如此，所以新反對派不瞭解黨和共產國際底新任務，而這種不瞭解也就是新反對派底特徵。

新反對派底領導者們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發言時，完全避開了我們國內階級變動問題，一句話也沒有提到階級鬥爭尖銳化，甚至絲毫也沒有暗示到我們意見分歧正是與這種階級鬥爭尖銳化有聯繫的。同志們，你們是不是感覺到了這一點呢？他們講到了所有一切事情，

既講到了哲學，又講到了理論，可是關於現時決定我黨方針和實際工作的那些階級變動，却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到。為什麼有這樣一種怪事情呢？也許是因為他們有健忘病吧。當然不是！政治家是不能忘記主要事情的。這是因為他們看不見和不瞭解現時在我們國內以及在資本主義各國內所發生的新的革命過程。這是因為他們忽略了主要事情，忽略了政治家所不應忽略的階級變動。正因為如此，所以新反對派就在我黨新任務面前顯得張惶失措，束手無策。

試回想最近在我們黨內發生的種種事變吧。試回想我們黨近來因我們國內發生了新的階級變動而提出的各個口號吧。我所指的，是自我批評，加緊反官僚主義鬥爭和清洗蘇維埃機關，組織新經濟工作幹部和紅色專門家，加強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運動，進攻富農，減低成本費和根本改善職工會工作實踐以及清黨等等口號。有些同志覺得這些口號是令人胆戰心驚，令人頭昏目眩的。可是很明顯的，這些口號是黨在現時最必要最迫切的口號。

最初，我們因沙赫特案件發生而從新提出了培養新經濟工作幹部的問題，由工人階級人材中造就紅色專門家來代替舊專門家的問題。沙赫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是什麼呢？所暴露出來的是：資產階級還遠未被澈底擊破，它正在我國經濟建設方面組織着而且將來還會組織暗害勾當；我們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以及一部分黨組織，竟把我們階級敵人底暗中破壞工作忽略過去了；因此就必須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手段來鞏固和改善我們各個組織，發展和鞏固其階級警覺性。

於是就特別加重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問題。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不盡量發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把我們各個組織底工作放在羣衆監督下面，便不能改善我們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以及黨組織，便

不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鎮壓資產階級暗害勾當。而暗害勾當不僅在煤礦區內，並且在金屬工業方面，在軍事工業方面，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內，在黃金和白金工業以及其他等方面，都是有過而且現在還有的，——這是事實。於是就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

其次，因為有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因為富農進行反對蘇維埃價格政策的發動，我們就加重了盡量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問題，進攻富農的問題，壓榨富農豐裕份子而組織糧食採辦工作的問題。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所暴露出來的是什麼呢？所暴露出來的是：富農並不是在那裏睡覺，而是在發展着，並組織着暗中破壞勾當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底政策，而我們各個黨組織、蘇維埃組織以及合作社組織，至少是其中某一部分，却看不見敵人，或是去遷就敵人，而不去進行反對敵人的鬥爭。

於是就更加重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審查和改善我們黨組織、合作社組織和一般糧食採辦機關的口號。

再則，因為有按社會主義原則來改造工業農業的新任務，就產生了一貫減低成本費，鞏固勞動紀律，擴展社會主義競賽等等的口號。這些任務要求改造職工會和蘇維埃機關全部實際工作，根本振興這些組織，把官僚主義份子從這些組織裏清洗出去。

於是就加重了對職工會和蘇維埃機關中官僚主義作鬥爭的口號。

最後，關於清黨口號問題。如果以為不預先砥礪我黨本身，便可以鞏固我們各蘇維埃組織和經濟組織、職工會組織和合作社組織，把官僚主義骯髒東西從這些組織裏清洗出去，那就是笑話了。

官僚主義份子，不僅在經濟組織與合作社組織裏，不僅在職工會組織與蘇維埃組織裏生活着，而且還在我黨本身組織裏生活着，這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說黨是所有這一切組織底領導力量，那末清黨工作當然就是澈底振興和改善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的必要條件。於是就提出了清黨的口號。

這些口號是不是偶然的呢？不，決不是偶然的。——你們自己可以看見它們不是偶然的。它們是稱爲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份子進攻的那個分不開的鍊條上的一些必要環節。

首先，這些口號是與我國工農業按社會主義原則實行的改造又是什麼意思呢？它是社會主義向國民經濟中所有資本主義份子舉行的全面進攻。這是我國工人階級向着建成社會主義方面的一個最嚴重的進展。可是，爲要實行這個改造，首先就須改善和鞏固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幹部，包括經濟工作幹部，蘇維埃幹部和職工會幹部，黨幹部，合作社幹部在內，就須砥礪我們所有一切組織，把骯髒東西從這些組織裏清洗出去，就須提高千百萬工農羣衆底積極性。

其次，這些口號是與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份子反抗社會主義進攻的事實有聯繫的。決不可把所謂沙赫特案件看作一件偶然的事情。「沙赫特派」現時在我們所有一切工業部門裏活動着。其中有許多已被拿獲，但還遠未盡被拿獲。資產階級智識界底暗害勾當，是對發展着的社會主義進行反抗的最危險形式之一。其所以危險，更因爲暗害勾當是與國際資本有聯繫的。資產階級的暗害勾當，毫無疑義是指明資本主義份子還遠未放下武器，他們正在積蓄力量來作反蘇維埃政權的新發動。至於說到農村資本主義份子，那末富農迄今已繼續到第二個年頭的反對蘇維埃價格政策的發

動，更不可以說是一件偶然事情。許多人至今還不能解釋富農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自流式地交出糧食，而在一九二七年以後却已不復自流式地交出糧食的事實。但這個事實是毫不奇怪的。如果說從前富農還比較軟弱，還沒有可能認真佈置他的經濟，還沒有充分資本來鞏固他的經濟，因而不得不把全部剩餘糧食或幾乎全部剩餘糧食拿到市場上去，那末現時經過好幾個豐年後，他已把經濟佈置周到了，他已積蓄了必要的資本，於是 he 已有可能在市場上玩弄手腕，把糧食當作寶中之寶留下，作為自己的後備資本，而寧願把肉類、燕麥、大麥以及其他次要農產物運到市場上去。現在如果希望富農自願讓我們從他那裏取得糧食，那就可笑了。這就是富農現在實行反抗蘇維埃政府政策的根本原因。

城鄉資本主義份子反抗社會主義進攻，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底階級敵人已在重新配置力量，以圖保持舊制度，反對新制度。不難瞭解：這些情況是不能不引起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可是，為要打破階級敵人反抗，替社會主義進展肅清道路，那末除掉其他一切事情而外，還須砥礪我們所有一切組織，把官僚主義從它們中間清洗出去，改善它們的幹部，動員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和農村勞動階層羣衆去反對城鄉資本主義份子。

你們看，我們黨現時的口號就是在這些階級變動基礎上產生出來的。

關於資本主義各國階級變動，也要這樣說。如果以為資本主義穩定局面仍舊沒有改變，那就可笑了。如果硬說這個穩定局面日益鞏固和日益堅固，那就更可笑了。其實，資本主義穩定局面是逐月逐日削弱着，動搖着。爭奪市場和原料的鬥爭尖銳化，武裝的增長，英美矛盾的加緊，蘇聯社會

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的左傾，歐洲各國罷工和階級搏鬥時期的到來，各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內）革命運動的發展，世界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所有這一切事實，都毫無疑義地證明新革命高漲原素是正在資本主義各國增長着。

於是就必須加緊反對社會民主黨，首先是反對該黨「左」翼，因為它是資本主義底社會支柱。於是就必須加緊反對共產黨內右傾份子，因為他們是社會民主黨影響底代辦。於是就必須加緊反對那種對右傾調和的態度，因為它是共產黨內機會主義底避難所。於是就提出了把社會民主黨傳統從共產黨裏清除出去的口號。於是就提出了共產主義在職工會內工作的所謂新策略。有些同志不懂得這些口號底意思和意義。但馬克思主義者始終都懂得：不實現這些口號，便不能準備無產階級羣衆去作新的階級戰鬥，便不能戰勝社會民主黨，便不能實行挑選真正能引導工人階級去爲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的共產主義運動首領。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國內以及資本主義各國所發生的種種階級變動，結果就產生了我們黨在內部政策方面以及在共產國際方面的現時的口號。

我們黨看得見這些階級變動。它瞭解新任務底意義，並動員力量去解決這些任務。因此，它總能從容應付事變，而不害怕當前的困難，因為它有充分準備去克服這些困難。

新反對派底倒霉處，布哈林集團底倒霉處，就在於它看不見這些階級變動，不瞭解黨底新任務。正因為它不瞭解這些新任務，所以它就完全張惶失措，總是準備着逃避困難，見難而退，放棄陣地。

你們看見過大河中間，比方葉尼塞河這樣一條大河中間遇見大風浪時的漁夫麼？我看見過他們

多次。有一種漁夫遇見大風浪來時，就動員自己所有的力量，鼓勵自己所有的人心，大胆冒着風浪划船：『弟兄們，不要軟弱，努力抓着舵，破浪前進吧，我們是一定會勝利的！』。而另一種漁夫一聞見大風浪，就灰心喪氣，叫苦連天，使自己所有隊伍底精神頹廢：『真倒霉呀，大風浪來了，弟兄們，臥在船板底下，閉着眼睛，也許可以僥倖挨得到岸邊去的』。（全場大笑）。布哈林集團底方針和行爲，恰與遇見困難就張惶退却的第二種漁夫一樣，——這難道還須證明麼？

我們說：新革命高漲的條件是在歐洲成熟着，這種情況向我們所提出的新任務，就是要加緊反對各國共產黨內的右傾，把右傾份子從黨內趕出去，加緊反對掩護右傾的調和派，加緊反對各國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傳統等等。而布哈林却回答我們說：所有這些都是空話，我們並沒有什麼新任務，其實問題只是中央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布哈林「教訓一頓」而已。

我們說：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向我們所提出的新任務，是要一貫地減低成本費，在各企業裏鞏固勞動紀律，爲要執行這些任務，就非根本改變職工會全部實際工作不可。而托姆斯基却回答我們說：所有這些都是空話，我們並沒有什麼新任務，其實問題只是中央大多數委員想把他托姆斯基「教訓一頓」而已。

我們說：國民經濟改造事業向我們所提出的新任務，是要加緊反對蘇維埃經濟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從這些機關裏把腐化份子，異己份子和暗害份子清洗出去等等。而李可夫却回答我們說：所有這些都是空話，我們並沒有什麼新任務，其實問題只是中央大多數委員想把他李可夫「教訓一頓」而已。

同志們，這難道不是可笑麼？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除了自己的肚臍而外，便看不見世界上任何東西，——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布哈林集團底不幸，就在於他們看不見新的階級變動，不瞭解黨底新任務。正因為他們不瞭解黨底新任務，所以他們不得不做事變底尾巴，屈服於困難。

我們意見分歧底根源，就在這裏。

(二) 在共產國際各問題方面的意見分歧

我已經說過，布哈林看不見，不瞭解日益增長的新革命高漲條件向共產國際所提出的新任務，即是要從共產黨內趕出右傾份子，制止調和派，把社會民主黨傳統從共產黨內清除出去的任務。這種情形是我們在共產國際各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所完全證實了的。

這方面的意見分歧是從什麼開始的呢？

是從布哈林提交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的那篇論國際狀況問題的提綱開始的。從前，這種提綱照例都是預先在聯共（布）代表團內審核的。可是，這一次卻沒有遵守這個條件。結果，布哈林署名提出的提綱一面送往聯共（布）代表團，同時就分發給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各外國代表團了。可是，在這篇提綱上有許多條文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聯共（布）代表團不得不對這篇提綱加進了二十來個修正。

這個情況使布哈林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可是，這應歸咎於誰呢？試問布哈林為什麼要在尚未交給聯共（布）代表團審核以前，就把提綱分發給各外國代表團呢？既然提綱竟是不能令人滿意，那末聯共（布）代表團能否不加進一些修正呢？而結果竟是這樣：由聯共（布）代表團內得出來的，其實已是一篇論國際狀況問題的新提綱，而各外國代表團就拿這篇提綱去與布哈林所署名提出的那篇舊提綱對立。很明顯的，如果布哈林不是這樣急忙地把自己的提綱分發給外國代表團，便不會有這種不好意思的情形了。

我想指出聯共（布）代表團所加進布哈林提綱的四個基本修正。我所以想指出這些基本修正，是爲着更明顯昭示我們在共產國際各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底性質。

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資本主義穩定局面底性質問題。按照布哈林底提綱說來，現時並沒有發生任何一個動搖資本主義穩定局面的新現象，恰巧相反，資本主義是在改造着，基本上是比較穩固地支持着。很明顯的，對於所謂第三時期，即對於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的這樣一種估計，是聯共（布）代表團所不能同意的。其所以不能同意這一點，是因為如果保存這種對於第三時期的估計，就會使那些批評我們的人有所根據，說我們是主張所謂資本主義「健康化」的觀點，即希法亭底觀點，即我們共產黨人所不能主張的觀點。因此，聯共（布）代表團就加進了一個修正，從這個修正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穩定局面是不穩固的，而且是不能穩固的；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尖銳化，這個穩定局面是正被事變進程所動搖着，而且將來還會被事變進程所動搖的。同志們，這個問題對於共產國際各支部是有決定的意義。資本主義穩定局面究竟是動搖着，還是鞏固着呢，——共產黨

日常工作底全部方針都要由這一點來決定。我們現在究竟是處在什麼時期，是處在革命運動低落時期，即簡單聚集力量的時期，還是處在新革命高漲條件日益增長的時期，即準備工人階級去作當前階級戰鬥的時期呢？——共產黨底策略方針是要由這一點來決定的。聯共（布）代表團所提出而後來已由世界代表大會通過的修正，其好處也就在於它規定出指望於第二個前途，指望於新革命高漲條件日益增長的前途的明白方針。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問題。在布哈林提綱內說，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共產國際各支部底基本任務之一。這當然是對的。但這還不夠。爲要使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進行得有成效，就須特別加緊反對所謂社會民主黨「左」翼，即反對那玩弄「左派」辭句並以此而巧妙欺騙工人，阻礙工人脫離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很明顯的，不粉碎「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就不能克服一般社會民主黨。可是，在布哈林底提綱內，關於「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問題却完全沒有說到。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因此，聯共（布）代表團不得不對布哈林提綱加進了一個相當修正，這個修正後來已由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共產國際各支部內的調和態度問題。在布哈林底提綱內說到必須進行反對右傾的鬥爭，可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到要進行鬥爭反對那對右傾調和的態度。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因爲我們向右傾宣戰時，右傾份子總是裝扮爲調和份子，使黨陷於困難地位。爲要預防右傾份子這種手腕，就必須提出堅決反對調和態度的問題。因此聯共（布）代表團當時認爲必須對布哈林提綱加進一個相當修正，這個修正後來已由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四個問題，就是關於紀律問題。在布哈林底提綱內竟沒有說到必須在各共產黨內保持鐵的紀律。這也不是一個不大重要的缺點。爲什麼呢？因爲在加強反右傾鬥爭時期，在實行清除共產黨裏機會主義份子的口號時期，右傾份子總是組織成爲派別組織，建立其特殊的派別組織的紀律，而打破和破壞黨的紀律。爲要使黨不致受到右傾份子派別組織的襲擊，就須提出黨內鐵的紀律問題，黨員應該絕對服從這個紀律的問題。不然就根本談不到什麼反右傾的嚴重鬥爭。因此，聯共（布）代表團就對布哈林底提綱加進了一個相當修正，這個修正後來已由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我們能否不把這些修正加進布哈林底提綱中去呢？當然不能。古代有人關於哲學家柏拉圖說過：我們尊重柏拉圖，但我們更尊重真理。關於布哈林也可以這樣說：我們尊重布哈林，但我們更尊重真理，更尊重黨，更尊重共產國際。因此，聯共（布）代表團不得不把這些修正加進布哈林底提綱中去。

這可以說是我們在共產國際各問題上意見分歧的第一階段。

我們意見分歧的第二階段，是與所謂維托爾夫和特爾曼兩人案件有聯繫的。維托爾夫是漢堡黨前任書記，曾以濫用黨內經費被控，並因此而開除了黨籍。雖然特爾曼同志與維托爾夫犯罪行爲毫不相干，但德共中央裏的調和派竟以維托爾夫與特爾曼同志接近爲藉口，而把維托爾夫案件變成特爾曼案件，開始來攻擊德國共產黨底領導。你們大概已從報紙消息中知道，調和派份子愛維爾特和黑爾哈特當時竟能暫時拉攏德共中央大多數委員來反對特爾曼同志。結果怎樣呢？結果，他們

竟把特爾曼從領導機關中撤銷了，誣捏他爲舞弊營私，並且事先沒有通知共產國際執委，也沒有得到共產國際執委批准，就把「相當」決議公佈出來。於是他們事實上不僅沒有執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關於反調和派鬥爭的指示，不僅沒有反對右傾及調和派，反而最無理地違背了這個指示，反對德國共產黨底革命領導，反對特爾曼同志，以圖在德國共產黨員中間掩護右傾，並鞏固調和派底地位。

布哈林不但不去拉轉船舵，糾正現狀，不但不去恢復被違背了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指示底權力，不但不去制止調和派底越軌行動，反而在他的一封有名的信內提議批准調和派底這次政變，把德國共產黨交給調和派，而對於特爾曼同志，却又在報紙上加以誹謗，再次說他犯有罪過。而這還叫作是共產國際底「領導者」哩！難道天下有這樣的「領導者」麼？

中央討論了布哈林底提議，並否決了這個提議。這當然是布哈林所不高興的。可是，這應歸咎於誰呢？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並不是要叫人去違背它，而是要叫人去執行它。既然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決定向右傾及調和態度宣佈鬥爭，把德共領導保留給特爾曼同志所領導的基本中堅，而調和派份子愛維爾特和黑爾哈特却想推翻這個決議，那末布哈林底職責就是要制止調和派份子底越軌行動，而不是把德共領導留歸他們。布哈林自己應負其咎，因為他「忘記了」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

我們意見分歧的第三階段，是與反對德共內右傾份子鬥爭的問題，即是與粉碎布蘭德列爾和達里格麥爾派別組織以及把這派別組織底首領從德共黨裏開除出去的問題有聯繫的。布哈林和他的

朋友們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的「立場」，就在於他們總是迴避參加這個問題的解決。其實，當時所解決的問題是德國共產黨底生命問題。而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雖然明明知道這一點，但他們還是始終一貫地迴避參加相當機關底會議，因而阻礙這件事情的解決。是爲了什麼呢？大概是爲了在共產國際面前以及在德共黨內右傾份子面前，都不失爲「潔白君子」。是爲了在後來可以說：「把布蘭德列爾和達里格麥爾開除共產黨籍的，並不是我們布哈林派，而是他們，即中央大多數」。而這還叫作是反對右傾危險的鬥爭哩！

最後，我們意見分歧的第四階段。這階段是與布哈林向中央十一月全會提出的要求有聯繫的。他當時要求從德國召回蕭依曼，要求制裁特爾曼同志，說特爾曼同志似乎在某一次發言中批評了布哈林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我們當然不能同意布哈林底意見，因爲我們手中沒有任何文件可以證實布哈林底要求。布哈林當時答應交出文件來證實蕭依曼和特爾曼底錯處。可是，他連任何文件都沒有交出來。他不但沒有交出什麼文件來，而且把恩伯德洛在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內作的那篇有名的演說辭分發給聯共（布）代表團委員，而這篇演說辭就是後來被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圖評判爲機會主義演說辭的。布哈林當時把恩伯德洛底演說辭分發給聯共（布）代表團委員，並把它介紹爲控告特爾曼同志的材料，本來是想證明他要求召回蕭依曼和制裁特爾曼同志的主張正確。其實，他却以此證明了他同情於恩伯德洛的事實，而恩伯德洛底立場是共產國際執委所指斥爲機會主義立場的。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在共產國際各問題上意見分歧底各個主要點。

布哈林認為我們反對共產國際各支部裏的右傾以及對右傾調和的態度，把社會民主黨份子和社會民主黨傳統從德國共產黨和捷克斯拉伐克共產黨裏清除出去，把布蘭德列爾輩和達里格麥爾輩從共產黨內驅除出去，就是「瓦解」共產國際，「殺害」共產國際。反之，我們却認為我們實行這樣的政策，把問題着重於加緊反對右傾以及對右傾調和的態度，就是鞏固共產國際，把機會主義者從共產國際裏清除出去，使共產國際各支部布爾什維克化，幫助各國共產黨準備工人階級進行當前的革命搏戰。

由此可見，這並不是聯共（布）中央委員中間什麼簡單不同的色彩，而是在共產國際政策各根本問題上所發生的很嚴重的意見分歧。

（三）在國內政策各問題方面的意見分歧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和階級鬥爭。我已說過，布哈林集團患着瞎眼病，看不見這些變動，不瞭解黨底新任務。我已說過，在這個基礎上也就產生了新反對派底張惶失措心理，害怕困難和準備屈服於困難的心理。決不可說新反對派底這些錯誤是從天上落下來的。恰巧相反，它們是與那已經過去而叫作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發展時期有聯繫，當時建設事業是按和平道路進行，可以說是按自流道路進行，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階級變動，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階級鬥爭尖銳化。可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却是一個與舊時期，即與恢復時期不同的新的發展階段。我們

現在所處的時期，是新的建設時期，即整個國民經濟按社會主義原則實行改造的時期。這個新時期就引起新的階級變動，引起鬥爭尖銳化。它要求我們採取新的鬥爭方法，要求我們重新配置我們的力量，要求我們改善和鞏固我們所有一切組織。布哈林集團底不幸，也就在於他們現在還過着舊生活，看不見這個新時期底特點，不懂得必須採取新的鬥爭方法。由此他們就患着瞶眼病，張惶失措，害怕困難。

(一) 階級鬥爭問題

布哈林集團底這種瞶眼病和張惶失措心理，其理論基礎何在呢？

我認為，這種瞶眼病和張惶失措心理底理論基礎，就是布哈林對於我們國內階級鬥爭問題採取了不正確的態度，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我所指的，是布哈林所說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那個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及他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機密的不瞭解。

在這裏，有人已再三引證過布哈林所著社會主義之路一書裏所說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有名言論。可是，這裏所引證過的，却有一些遺漏。讓我把這段議論完全引證出來吧。同志們，爲着暴露布哈林遠遠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論的情形，這樣引證是必要的。請聽吧：

「我國農民合作社組織底基本網子，將由一些合作社細胞所組成，這些細胞不是富農式的，而是『勞動』式的，這些細胞將長入我們一般國家機關體系中去，因而變成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鏈條底單個環節。另一方面，富農的合作社的巢窩，也會同樣經過銀行等等長入這個體系

中去；但它們在某種程度內是異類物體，例如和租佃企業一樣」*。

有些同志從布哈林這本書裏引證這段議論時，却不知為什麼竟把最後一句關於租佃企業家的話遺漏了。羅季特大概是想替布哈林幫忙，便乘此機會從座上叫喊，說人家曲解了布哈林底意思。可是，這全段引證底要點，正在於最後一句關於租佃企業家的話。因為如果把租佃企業家與富農看作同等的東西，而富農又長入社會主義，那末從這裏就會得出什麼結論呢？結論只有一個，就是租佃企業家也長入社會主義，不僅富農，而且租佃企業家也長入社會主義哩。（全場大笑）。

這就是從他這句話裏所得出來的結論。

羅季特說：布哈林所說的是「異類物體」。

斯大林說：布哈林所說的並不是「異類物體」，而是「在某種程度內是異類物體」。所以，富農和租佃企業家「在某種程度內」是社會主義體系內的異類物體。可是，布哈林底錯誤就在於他認為富農和租佃企業家，雖然「在某種程度內」是異類物體，但終究還是長入社會主義的。你們看，布哈林底理論竟弄到何等荒謬的地步了。城市資本家和鄉村資本家，富農和租佃企業家，都長入社會主義，——你們看，布哈林已說出何等荒謬的話來了。同志們，我們絕對不需要這樣一種「社會主義」。讓布哈林自己把它拿去享用吧。

我們馬列主義者，至今都認為城鄉資本家與工人階級間有不可調和的利益對立性。馬克思主義

*著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的階級鬥爭論，正是建築在這一點上面的。而現在，照布哈林底資本家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說來，所有這些原理都要頭顱倒過來，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不可調和的階級利益對立性正在消滅，剝削者正在長入社會主義。

羅季特說：這是不對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預定要有的。

斯大林說：可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階級鬥爭最尖銳的形式。

羅季特說：問題就在這裏。

斯大林說：照布哈林說來，資本家是長入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你羅季特怎麼不瞭解這一點呢？如果城鄉資本家長入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去，那末到底是爲反對誰而必須進行鬥爭，爲反對誰而必須進行最尖銳形式的階級鬥爭呢？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需要，是爲着對資本主義份子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爲着鎮壓資產階級，根本剷除資本主義。可是，既然城鄉資本家，既然富農和租佃企業家都長入社會主義，那末是否一般還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呢？如果還需要，那又是爲着鎮壓什麼階級呢？

羅季特說：問題就在於照布哈林說來，長入是預定要有階級鬥爭的。

斯大林說：我覺得，羅季特已經賭咒發誓要替布哈林効勞了。可是，他的効勞却正好似狗熊効勞一樣，因爲羅季特本來是想去挽救布哈林的，而事實上却完全把他沉到水底下去了。難怪人們說：「喜歡効勞的狗熊是比敵人更危險的」。（全場哈哈大笑。）

二者必居其一：或是資本家階級與已爭得政權並奠定了自己專政的工人階級有不可調和的利益

對立性；或是沒有這種利益對立性，那就唯有宣佈階級利益協和而已。

或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或是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或是階級利益不可調和的對立性，或是階級利益協和的理論。二者必居其一。

像布連唐諾或維伯一類「社會主義者」鼓吹社會主義長入資本主義，資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的主張，那還可解，因為這些「社會主義者」在實際上就是反社會主義者，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可是，一個想做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竟也鼓吹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那就不可解了。

布哈林在發言中企圖援引列寧一段有名言論來辯護自己的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同時，他硬說列寧所說的，也同布哈林所說的一樣。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可容許地公然誣蔑列寧。請看列寧這一段話底原文吧：

「當然，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內，社會制度是建立在工農這兩個階級底合作上面的，現時在某種條件下，也容許「耐潑曼」，即資產階級來參加這個合作（摘自列寧所著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〇五頁）。

可見，這裏沒有一句話是講到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的。這裏只是說我們「在某種條件下」，也「容許」過耐潑曼，即資產階級來參加工農合作。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不是說我們因此也就容許過有耐潑曼長入社會主義的可能呢？當然不是。只有不知羞恥的人，才能這樣來解釋列寧這一段話。這只是說，我們暫且不消滅資產階級，我們暫且不沒收它的財產，而在某種條件下還容許它存在，所謂某種條件，就是要它絕對服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法律，就是以逐漸把資本家從國民經

濟生活中排擠出去爲目的，而日益加緊限制他們。不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是否可以實行排擠資本家和消滅資本主義底根蒂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在主張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下，是否可以消滅階級呢？當然是不可以的。這樣的理論和實踐只能培植和永遠保存階級，因爲這個理論是與階級鬥爭理論相矛盾的。而列寧這一段話却完全全是以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階級鬥爭理論爲基礎。在布哈林說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列寧說專政是殘酷階級鬥爭的理論中間，能有什麼相同之處呢？顯然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相同之處。布哈林認爲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鬥爭應當熄滅，應當取消，以便達到消滅階級。反之，列寧却教導說：只有經過堅持的階級鬥爭，階級才會消滅，而這個階級鬥爭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是比無產階級專政以前更加殘酷的。

列寧說：

「消滅階級是一件長期的困難的頑強的階級鬥爭事情，這個階級鬥爭在推翻資本政權後，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後，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後，並不會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和舊社會民主黨中的鄙陋人物所設想的那樣），而只會變更自己的形式，在許多方面成爲更加殘酷的」（摘自列寧所著向匈牙利工人致敬，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五頁）。

這就是列寧關於消滅階級問題的言論。

經過無產階級底殘酷階級鬥爭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列寧底公式。

經過階級鬥爭熄滅和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布哈林底公式。

這兩個公式能有什麼相同之處呢？當然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相同之處。

所以，布哈林的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是離開馬列主義階級鬥爭論的理論，是接近於講座社會主義派理論的理論。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所有一切錯誤底基礎，就在這裏。

也許有人說，布哈林的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值不得多說，因為它本身就是說着——不僅是說着，而且大喊大叫——來反對布哈林的哩。同志們，這是不對的！當這個理論還藏在櫃子裏面的時候，尚可不去注意它：在個別同志底作品中有些愚蠢話，這有什麼重要呢？直到最近以前，我們都是這樣處置的。可是近來環境已稍許改變了。最近幾年來囂張起來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已經在鼓舞着這一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使它具有迫切的性質。現在已不可說它是藏在櫃子裏的東西了。現在，布哈林這一奇怪理論企圖成爲我們黨內右傾底旗幟，機會主義底旗幟。因此，我們也就不能把這種理論忽略過去。因此，我們必須打碎這種理論，打碎這個不正確而有害的理論，以便利我們黨員同志們去與右傾作鬥爭。

(二) 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

布哈林從他第一個錯誤中產生出來的第二個錯誤，就是他對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對資本主義份子加緊反抗蘇維埃政權社會主義政策問題，採取了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這裏是說什麼呢？是不是說，資本主義份子比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部份增長得快些，因此加緊實行反抗來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呢？不是的，不是這個意思。況且，說資本主義份子比社會主義部份增長得快

些，是不對的。如果這是對的，那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會已經瀕於滅亡了。這裏所說的，是社會主義順利進攻着資本主義份子，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份子增長得快些，資本主義份子底比重因此降下去，正因為資本主義份子底比重降下去，所以資本主義份子就感覺得有滅亡危險，而加緊實行反抗。而他們暫時還有加強實行反抗的可能，這不僅是因為有世界資本主義幫助他們，而且還因為他們的比重雖然是降着，他們的相對增長與社會主義底增長比較起來雖然是減低着，但資本主義份子底絕對增長還是有的，這也就使他們有相當的可能來積聚力量，以便反抗社會主義增長過程。而在現今發展階段上，在現今力量對比條件下，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和城鄉資本主義份子反抗底加強，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底錯誤，就是他們不懂得這種簡明的道理。他們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不是用馬克思主義態度，而是用庸人態度觀察問題，企圖用各種偶然原因來解釋階級鬥爭尖銳化，例如說是因為蘇維埃機關「不中用」，因為地方同志們底政策「不謹慎」，因為「缺乏」靈活性，因為有「過火行動」等等。

例如，請看布哈林所著到社會主義之路一書內很可表明他用完全非馬克思主義態度觀察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的那段議論吧：

「鄉村中的階級鬥爭，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在其舊時形式中爆發出來，而且這種尖銳化通常都是由富農份子引起的。例如，富農，或靠剝削別人發財的人，鑽進蘇維埃機關裏來，實行刺殺農村通訊員，——這就是階級鬥爭在最尖銳形式中的表現（這是不對的，因為最尖銳鬥爭形式是暴動。——斯大林按）。可是，這種情形通常都是在地方蘇維埃機關向屬軟弱的區

境裏發生的。很明顯的，隨着這機關底改善，隨着蘇維埃政權一切下層支部底鞏固，隨着地方農村黨組織底改善和加強，這種現象便一定會日益稀少，歸根到底將完全消失」*。

這樣說來，階級鬥爭尖銳化是由於機關係質的原因，由於我們下層組織中用或不中用，軟弱或強固。這樣說來，例如沙赫特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暗害勾當，即資產階級份子對蘇維埃政權進行反抗底形式和階級鬥爭尖銳化底形式，竟不是由於階級力量對比，不是由於社會主義增長，而是因為我們的機關不中用。這樣說來，那末在大規模暗害勾當尚未出現於沙赫特一帶以前，我們的機關是好的；而後來在大規模暗害勾當出現的時候，這機關却不知為什麼已變成毫不中用了。這樣說來，在去年以前，當糧食採辦工作還是自流進行，而階級鬥爭尚未特別尖銳化的時候，我們各地方組織是好的，甚至是盡善盡美的；而從去年起，當富農反抗已採取特別尖銳形式時，我們各組織就忽然變壞，毫不中用了。這不是解釋，而是譏笑解釋。這不是科學，而是妖術。

這階級鬥爭尖銳化是由於什麼原因呢？

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是前進着，我們是進攻着，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是在工業和農業裏增長着，這種增長同時使得城鄉相當資本家隊伍受到相當排擠。我們現在所處的情形，是按照列寧所說『誰戰勝誰』的公式發生的：或是我們把資本家打翻，對他們作一個——正如列寧所說那樣——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最後的決戰；或是他們把我們打翻。

第二個原因，就是資本主義份子不願自動下台：他們實行反抗而且將來也還會實行反抗社會主義的，因為他們看見他們的生命末日到來了。而他們暫時還能夠實行反抗，因為他們的比重雖然降落了，但他們在絕對關係上還是增長着，城鄉小資產階級，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每日每時從自己中間分泌出資本家和小資本家來，而這些資本主義份子是拚命設法來保持自己生命的。

在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階級自動下台的事情。在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資產階級不用盡所有的力量來保持自己生命的事情。不管我們各下層蘇維埃機關好壞如何，而我們的進展，我們的進攻，總是要縮減資本主義份子，排擠他們的，而他們這些垂死階級是會不顧一切來實行反抗的。

階級鬥爭尖銳化底社會基礎，就在這裏。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底錯誤，就在於他們把資本家反抗底增長和資本家比重底增長混爲一談，而這樣混爲一談是沒有絲毫根據的。其所以沒有根據，是因為資本家進行反抗，並不是表明他們變成比我們強些了。實際情形恰巧相反。垂死的階級實行反抗，並不是因為他們變成比我們強些了，而是因為社會主義比他們增長得快些，因此他們日益比我們弱了。正因為他們日益削弱，所以他們覺到自己生命的末日，就不得不用盡一切力量，採取一切手段來實行反抗。

現今歷史時期階級鬥爭尖銳化和資本家反抗加強的原因，就在這裏。

客觀實際情況既是如此，那末黨底政策又應當怎樣呢？

它應當喚醒工人階級和農村被剝削羣衆，提高其戰鬥力，發展其戒備性，去進行反對城鄉

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去進行反對那正在實行反抗的階級敵人的鬥爭。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論底好處之一，就在於它便利着動員工人階級去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底敵人。

布哈林的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布哈林的對於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的見解，其害處是在什麼地方呢？

其害處就在於催眠工人階級，動搖我國革命力量底戒備性，渙散工人階級，便利着資本主義份子來進攻蘇維埃政權。

(三) 農民問題

布哈林底第三個錯誤是與農民問題有關。大家知道，農民問題是我們政治上最重要問題之一。在我國條件下，農民是由幾個不同的社會集團，即貧農、中農以及富農所組成。很明顯的，我們對於這些集團的態度是不能一樣的。貧農是工人階級底支柱，中農是同盟者，富農是階級敵人，——這就是我們對於這些社會集團的態度。所有這些都是不言而喻，盡人皆知的。可是，布哈林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却有些不同。在他估計農民時，階級分化底事實是失落了，各個社會集團存在底事實竟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剩下的只有一個叫做農村的灰色斑點。在他看來，富農不是富農，中農不是中農，而是什麼農村中的一片貧窮現象。而他在這裏發言時也就是這樣說：難道我國富農可以叫作富農麼？這是些窮人呵，——他說。我國中農難道像個中農麼？——布哈林在這裏聲言道。——這些些餓肚子的窮人呵。很明顯的，這樣看待農民的觀點，是與列寧主義不能相容的根本錯誤的觀點。

列寧說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個原理是否正確呢？是的，是絕對正確的。為什麼把農民看作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呢？因為農民在現時組成我國社會的兩個基本階級中，是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產為經濟基礎的階級。因為農民還是經營着小商品生產的農民時，是經常不斷地從自己中間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資本家來的。這個情況對於我們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待工農聯盟問題這一點，是有決定意義的。這就是說，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隨便一種工農聯盟，而只是以反對農民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為基礎的那個聯盟。由此可見，列寧說農民是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的提綱，不但不與工農聯盟思想相矛盾，恰巧相反；是給這個聯盟以根據，使它成為以反對我國經濟裏資本主義份子為目標的工農聯盟。列寧提出這個提綱，是要指明工農聯盟只有在它是以反對那些由農民本身所分泌出來的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為基礎時，才能是堅固的聯盟。

布哈林底錯誤就是他不懂得，不接受這個簡單的道理，忘記農村裏有幾個社會集團，看不見富農，看不見貧農，而只看見一片籠統的中農羣衆。這是布哈林毫無疑義的右傾，而與「左」傾，即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相反，「左」傾在農村中只看見貧農和富農，却看不見其他社會集團，看不見中農。

在工農聯盟問題上，托洛茨基主義和布哈林集團間的區別是在什麼地方呢？區別就在於托洛茨基主義反對與中農羣衆結成堅固聯盟的政策，而布哈林集團則主張與農民實行隨便一種聯盟。用不着證明：這兩個立場都是不正確的，它們兩者是好像半斤和八兩一樣的。

列寧主義絕對主張與農民基本羣衆堅固聯盟，主張與中農聯盟，但它不是主張隨便一種聯盟，而是主張能保證工人階級領導作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便利於消滅階級的那個聯盟。

列寧說：

『工農協定這一公式，是可以隨便來解釋的。從工人階級底觀點上看來，這個協定只有是能維持工人階級專政而成為消滅階級的手段之一的时候，才是可以容許的，才是正確和原則上可能的，如果不是這樣來觀察工農協定，那末工農協定這一公式，當然還是一切反對蘇維埃政權的人，一切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所主張的公式』（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八七頁）。

其次，列寧說：

『現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並領導着這個政權。它領導着農民。領導農民，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第一，力求消滅階級，而不是設法適應小生產者。如果我們離開這個根本的基本的路線，那我們就會不成其為社會主義者，而陷入那班小資產者，即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營壘，他們現在是無產階級底死敵』（同上，第三九九至四〇〇頁）。

這就是列寧對於與農民基本羣衆聯盟，對於與中農聯盟問題的觀點。

布哈林集團在中農問題方面的錯誤，就是他們看不見中農底兩重性，介於工人階級與資本家中間的兩重地位。列寧說『中農是動搖的階級』。為什麼呢？因為中農一方面是勞動者，這就使他與工人階級接近；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這就使他與富農接近。由此就有中農底動搖。這不僅在理論上是對的。這種動搖在實際上也是每日每時都表現出來的。

列寧說：

『農民既然是勞動者，他就趨向於社會主義，寧願工人專政而不願資產階級專政。農民既

然是糧食出賣者，他就趨向於資產階級，趨向於自由貿易，即退轉到『慣常的』舊有的『歷來的』資本主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四頁）。

因此，與中農聯盟，只有當這聯盟是以反對資本主義份子為目標，以反對一般資本主義為目標，只有當這聯盟是保證着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只有當這聯盟是便利於消滅階級時，才能是堅固的。

真是奇怪，布哈林集團竟把這些簡明道理忘記了。

（四）新經濟政策和市場關係問題

布哈林底第四個錯誤是與新經濟政策問題有關。布哈林在這裏的錯誤就在於他看不見新經濟政策底兩方面性，而只看見新經濟政策底一方面。我們在一九二一年施行新經濟政策時，是用這政策底鋒芒反對戰時共產主義，反對那些排除任何貿易自由的規則和秩序。我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新經濟政策是表示某種貿易自由的。布哈林是把這一方面記住了。這是很好的。可是，布哈林弄錯了，他竟認為新經濟政策只有這一方面。布哈林忘記了新經濟政策底另一方面。要知道新經濟政策絕對不是容許完全貿易自由，不是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新經濟政策是以保證國家在市場上起調節作用為條件，而只是在一定限度，一定範圍內的貿易自由。新經濟政策第二方面，就正在這裏。而且，新經濟政策這第二方面，並不比第一方面次要些，甚至於也許比第一方面重要些。在我國市場上並沒有像在資本主義各國所常見的那種自由玩弄價格的現象。糧食價格基本

上是由我們規定的。工業品價格是由我們規定的。我們努力實行減低成本費和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同時極力保持農產品價格穩定性。市場上這樣一種特殊的特別的秩序，是在資本主義各國內根本沒有的，——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在新經濟政策尚存在時，就應當保存其兩方面性：第一方面是反對戰時共產主義規則和以保證某種貿易自由為目的；第二方面是反對完全貿易自由，而以保證國家在市場上起調節作用為目的。如果你們取消這兩方面中的某一方面，那你們就不會有新經濟政策了。

布哈林認為新經濟政策只能受到「從左邊」來的危險，只能受到從那些想取消任何貿易自由的人們方面來的危險。這是不對的。這是極嚴重的錯誤。況且，這種危險現在是最不實在的，因為現在我們各地方組織和中央組織內，沒有一個人或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懂得保持某種貿易自由是完全必要和適當的。現在比較更實在得多的，是從右邊來的危險，是從那些想取消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想「解放」市場並這樣開闢完全貿易自由紀元的人們方面來的危險。毫無疑義的，現在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這種危險，是比較更實在得多的。不應忘記，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正是在這方面進行工作，即是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同樣應當記着，富農和豐裕份子底叫號，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底叫號，即我們的許多同志往往受其影響的叫號，正是從這方面來衝擊新經濟政策的。布哈林看不見這真正實在破壞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危險的事實，就是不容置疑地證明他是被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所俘虜了。

布哈林提議使市場「常態化」，按各區來「調度」糧食採辦價格，即增高糧食價格。這是什麼

意思呢？這就是說，他不滿意蘇維埃市場條件，而想漸漸消滅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主張向那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讓步。

暫時假定我們聽從了布哈林底勸告吧。由此會得出什麼結果呢？譬如說，我們在秋季，在糧食採辦工作初期提高了糧食價格。可是，因為在市場上總有些人，各種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能夠多拿幾倍的價錢來收買糧食，而我們又不能同投機商人去競爭，因為他們總共不過收買一千萬左右普特的糧食，而我們却需要收買幾萬萬普特的糧食，於是糧食所有者橫直還是會把糧食扣着不賣，等候繼續漲價。到春季的時候，當國家正開始最需要大批糧食的時候，我們又得增加糧食價格。而在春季來抬高糧食價格，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害死貧農和農村窮苦階層，他們在春季不得不買進糧食，一部份作為種子，一部份供給食用，而他們所買進的糧食，也就是他們在去年秋季賤價賣出去的那些糧食。做完這些手續以後，我們是不是能得到什麼重大結果，就是說得到充分的糧食呢？一定是不能得到的，因為總有些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又能比我們多拿幾倍的價錢來收買這些糧食的。於是我們又得準備更高糧食價格，白費氣力來與投機商人以及屯賣商人競爭。

既然如此，既然我們走上了提高糧食價格的道路，於是我們就會要繼續滾下去，而且始終沒有担保可以得到充分的糧食。

可是，事情並不就此完結。第一，我們既然提高了糧食採辦價格，就會也要提高原料價格，藉以維持各種農產品價格底相當比例。第二，我們既然提高了糧食採辦價格，就會在城市裏也不能維持低廉糧食價格，於是我們也會要提高糧食賣價。我們不能而且不應當得罪工人，於是就會要加

快速度來提高工資。可是，這樣一來，我們就不能不提高工業品價格，否則便會使財源違反着工業化事業利益，從城市裏流到鄉村中去。結果，我們就會不是根據降低的價格或至少是穩定的價格來調勻工業品與農產品底價格，而必須根據糧食和工業品一同高漲的價格來調勻這些價格。換言之，我們就會要採取使工業品和農產品漲價底方針。不難瞭解：這樣「調度」價格，不能不弄到完全取消蘇維埃價格政策，弄到取消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弄到完全放縱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這將有益於誰呢？這將僅僅有益於城鄉富裕階層，因為高價的工業品和農產品一定是工人階級，貧農和農村窮苦階層所買不起的東西。佔便宜的是富農，豐裕份子，耐潑曼及其他富足階級。

這也會是結合，但這是一種特殊結合，即是與鄉村和城市中的富足階層結合。工人和農村窮苦階層將有全權來質問我們：我們究竟是誰人的政權，是農民的政權呢，還是富農耐潑曼的政權呢？與工人階級以及與農村窮苦階層破裂，與農村和城市中的富裕階層結合——這就是布哈林的市場「常態化」和按區「調度」糧食價格的辦法所要弄出的結果。

很明顯的，黨是不能走這條死路的。

布哈林所有一切關於新經濟政策的觀念是混亂到什麼地步，他是被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俘虜到如何厲害的地步，這是在他對城市與農村間，國家與農民間的商品流轉底新形式問題採取極端反對態度的事實中也看得出來的。他看見國家變成了為農民供給商品者，而農民正在變成為國家供給糧食者的事實，便大發雷霆，叫罵不已。他認為這是違背新經濟政策一切規則，幾乎是破壞新經濟政策的。為什麼，有什麼根據呢？如果國家和國家工業變成了為農民供給商品者，而農民變成了為

工業和國家供給糧食者，那又會有什麼壞處呢？要是農民變成了爲國家工業供給棉花者，供給糖蘿蔔者，供給亞麻者，而國家工業變成了爲這些農業部門供給城市商品，種子，生產工具等物者，那從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新經濟政策方面看來，又會有什麼壞處呢？定貨合同制在這裏是建立城鄉間這些新商品流轉形式的基本方法。難道定貨合同制是與新經濟政策底要求相抵觸的麼？如果因採用這種定貨合同制，農民不僅是爲國家供給棉花、糖蘿蔔及亞麻等物者，並且也在變成爲國家供給糧食者，那又會有什麼壞處呢？爲什麼小買賣，零售生意可以叫作商品流轉，而按預訂條約（定貨合同）所規定的價格和貨物質量進行的大批生意，就不能叫作商品流轉呢？這種荒唐結論是從那裏得出來的呢？城市和鄉村按定貨合同制來實行交易的這些新的普遍形式，正是在新經濟政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正是我們的各個組織在加強對國民經濟實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的領導方面的一個極大進步，這難道不容易瞭解麼？

布哈林已經不會瞭解這些簡明的事情了，這不是奇怪麼？

（五）工業發展底速度和城鄉結合底新形式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是工業發展速度和城鄉結合底新形式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意見分歧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其所以重要，是因爲我們在黨經濟政策問題上實際意見分歧方面所有一切線索，都是集中於這個問題上的。

什麼是城鄉結合底新形式呢，這從我們經濟政策方面來看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這就是說，除城鄉結合底舊形式而外，我們現在還需要這個結合底新形式：在舊形式下，工業主要是滿足農民底個人需要（花布，靴鞋，一般布疋等等）；而在新形式下，工業却要滿足農民經濟底生產需要（農業機器，拖拉機，精良種子，肥料等等）。如果說我們從前主要是滿足農民個人需要，而少牽涉到農民經濟底生產需要，那末現在我們除繼續滿足農民底個人需要外，同時還須盡力供給他們那些與用新技術改造農業生產有直接關係的物品，即農業機器，拖拉機和肥料等等。從前的任務只是要恢復農業，使農民好好經營過去地主富農的土地，所以我們當時能以城鄉結合底舊形式為滿足。可是現在的任務已經是要改造農業，所以這已經是不夠了。現在必須更進一步，必須幫助農民用新技術和集體勞動來改造農業生產。

第二，這就是說，除重新武裝我國工業而外，我們同時還應開始來認真重新武裝農業。我們正在重新武裝着我國工業，而且已把一部分工業重新武裝過了，我們為工業奠定新的技術基礎，供給它新式的優良的機器，新的優良的幹部。我們建造着新工廠，我們改造着和擴大着舊工廠，我們發展着冶金工業、化學工業和機器製造業。在這個基礎上，城市日益增長，新的工業地點日益增多，舊的工業地點也日益擴大。在這個基礎上，對於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求日益增長。而農業却仍然使用着舊式工具，使用着古老陳舊的耕種方法，使用着一種粗笨而現在已不中用，或幾乎已不中用的舊式技術，採用着小農個人經營勞作的陳舊方式。例如，我國在革命前，約有一千六百萬農戶，而現在至少有二千五百萬農戶這一事實，該有何等重大的意義呢？所有這些，難道不是說明農業帶有愈益散漫零碎的性質麼？而散漫的小農經濟底特點，就是不能充分利用技術、機器、拖拉機

和農業科學成績，而只能出產很少的商品。由此就有農產品輸出額不夠的現象。由此就有城市與鄉村關係破裂，工業與農業關係破裂的危險。由此就必須催促農業發展，促使它趕上我們的工業發展速度。爲了防止這種破裂危險，就必須用新技術來認真改造農業。爲了改造農業，又必須逐漸把各個零碎農戶聯合爲巨大農莊，即聯合爲集體農莊，必須用集體勞動來建設農業，必須擴大集體農莊，必須發展新舊蘇維埃農莊，必須有系統地把普遍定貨合同形式應用於一切基本農業部門，必須擴大農業機器站網，藉以幫助農民熟習新技術，並使勞動集體化，——總而言之，必須逐漸把小農經濟轉移到巨大集體生產基礎上，因爲只有公共的，大規模的生產，才能盡量利用科學成績與新技術成績，一日千里地推進我國農業向前發展。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應當忽視個體貧農中農經濟。當然不是這個意思。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在爲工業供給糧食和原料方面，現在起着主要作用，而且在最近將來也還會起着主要作用，正因爲如此，所以必須幫助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但同時這又是說，單靠個體農民經濟已經不夠了。我們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就是一個明證。因此，除發展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而外，同時必須盡力發展集體農業形式和蘇維埃農莊。因此，必須普遍實行定貨合同制，成立農業機器站，盡量發展合作社，作爲個體貧農中農經濟過渡到集體公共農莊的橋樑，使農民易於把他們的細小個體經濟轉到集體勞動軌道上來。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真正發展農業。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解決穀物問題。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使貧苦農民階層擺脫貧窮困苦的地位。

最後，這就是說必須努力發展我國工業，因爲它是農業生產改造事業所仰給的基本泉源，必須

發展冶金工業、化學工業和機器製造業，必須建設拖拉機工廠和農業機器工廠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不經過普遍定貨合同制來促使基本農民羣衆進到集體經營形式，不用大批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等等來供給農業，便不能發展集體農莊，便不能發展農業機器站。可是，不加緊速度發展我國工業，便不能用機器和拖拉機供給農村。因此，加快速度發展我國工業，就是按集體制原則改造農業的關鍵。

城鄉結合新形式底意思和意義，就是如此。

布哈林集團在口頭上不得不承認城鄉結合新形式是必要的。但這不過是口頭上承認而已，其目的是要在口頭上承認城鄉結合新形式的幌子下偷運一種完全相反的東西。其實，布哈林是反對城鄉結合底新形式的。布哈林所持的出發點，並不是要加快速度發展工業，作為農業生產改造事業底槓桿，而是要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在布哈林看來，最主要的就是使市場「常態化」，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農產品價格，其實就是容許完全自由貿易。於是他就對集體農莊採取不信任的態度，而他這種不信任的態度，是他在中央七月全會上的演說內以及他在中央七月全會以前所起草的提綱內都表示出來的。於是他就對我們採辦糧食時所實行的一切用以對付富農的非常辦法，採取否定的態度。大家知道，布哈林躲避非常辦法，好像邪鬼躲避神香一樣。大家知道，布哈林至今還不能瞭解，富農在現今條件下是不會自願地自流式地交出充分數量的糧食的。這在現時已由我們糧食採辦工作兩年來的經驗所證明了。

那末，假如商品糧食畢竟還是不夠，又當怎樣辦呢？布哈林回答道：不要用非常辦法驚動富農；從外國輸入糧食就是了。他不久以前還提議要從外國輸入五千萬普特左右的糧食，就是說輸入

約值一萬萬金盧布的糧食。如果金幣需要用來輸入工業裝置品，那又怎樣辦呢？布哈林回答道：必須先從外國輸入糧食；這顯然是說要把輸入工業裝置品的事情擱置到後面去。

照他這樣說來，解決穀物問題和改造農業的基礎，並不是加快速度發展工業，而是要用自由市場和在自由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的手段來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包括富農經濟在內。

於是我們就看見兩個彼此不同的經濟政策計劃。

黨底計劃是：

(1) 我們改造工業。

(2) 我們開始認真改造農業。

(3) 爲此就須擴展建設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廣泛採用定貨合同制和設立農業機器站，作爲建立工業與農業間的生產結合的手段。

(4) 爲克服現時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起見，儘可採取一種倚靠中農貧農羣衆共同贊助的臨時非常辦法，作爲一種打破富農反抗和盡量取得他們所有剩餘糧食的手段，我們一定要取得這些剩餘糧食，才可不必從外國輸入糧食，而能把金幣保存起來發展工業。

(5) 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在爲國家供給糧食和原料方面，現時起着主要作用，而且將來也還會起着主要作用；可是現在單靠它來供給已經不夠了，因此，除發展個體貧農中農經濟而外，同時還須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廣泛採用定貨合同制，加緊發展農業機器站，以便易於把資本主義份子從農業中排擠出去，漸漸把個體農莊轉移到巨大集體農莊軌道上去，轉移到集體勞動軌道上去。

(6)可是，爲要做到這一切，首先就必須加緊發展工業，發展五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拖拉機工廠，農業機器工廠等等。否則無法解決穀物問題，無法改造農業。

結論：加快速度發展我國工業，就是農業改造事業的關鍵。

布哈林底計劃是：

(1)使市場『常態化』，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和提高糧食價格，那怕這會使工業品、原料和糧食都昂貴起來。

(2)盡力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同時要相當降低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發展速度(布哈林在七月間提出的提綱，布哈林在七月全會上的演說)。

(3)要自流式地採辦糧食，無論何時何地都不可採取，甚至不可局部採取非常辦法對付富農，即使這些辦法得到中農貧農羣衆底贊助，也是不可採取的。

(4)在糧食繳納不夠時，就從國外輸入約值一萬萬盧布的糧食。

(5)在金幣不夠同時開支糧食輸入和工業裝置品輸入時，就必須減少裝置品輸入額，也就是說降低我國工業發展速度，否則我國農業就會『踏步不進』，也許還會『筆直下降』。

結論：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就是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同志們！事情真相就是如此。

布哈林底計劃是降低工業發展速度和破壞城鄉結合新形式的計劃。

我們的意見分歧，就是如此。

我們對於發展城鄉結合底新形式，對於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等事情，是不是做遲了呢？有人硬說，黨至少是把這件事情做遲了兩年。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只有完全不懂蘇聯經濟的「左派」空喊者才能這樣說。把這件事情做遲了，這是什麼意思呢？如果是說預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性，那我們還在十月革命時就已開始來做這件事情了。至於黨還在當時，還在十月革命時就已預見到了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性，這是不容有絲毫疑義的。最後，還可拿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三月）所通過的我們黨綱來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性，在那裏是已經十分明顯地注意到了的。可是，爲着實現和組織建設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羣衆運動，單靠我們黨上層領導份子預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性，還是不夠的。所以，這裏所講的，並不是什麼預見，而是要實現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建設的計劃。可是，爲要實現這樣一個計劃，就需要有許多條件，這些條件是我們從前沒有，而直到最近一個時期才出現了的。問題就在這裏，同志們。

首先，爲了實行這一建設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羣衆運動的計劃，就要我們黨上層機關在這方面首先得到黨員羣衆底贊助。而大家知道，我們黨是人數達百萬的黨。因此，當時必須說服廣大黨員羣衆，使他們相信上層領導機關底政策是正確的。這是第一。

其次，爲了這點，就要在農民羣衆裏造成一種擁護集體農莊的羣衆運動，必須使農民不會害怕集體農莊，而是根據本身經驗相信集體農莊優於個體農莊，並自動加入集體農莊。而這件事情是一件需要相當時間的嚴重事情。這是第二。

再則，爲了這點，就要國家有一批爲資助這個運動，爲資助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所必需的經費。而這件事情是需要許多萬萬款子的哩，親愛的同志們。這是第三。

最後，爲了這點，就要把工業發展到能拿出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來供給農業的那個程度。這是第四。

可以說我們在兩年或三年以前已經有了這一切條件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

不要忘記，我們是執政黨，而不是在野黨。在野黨可以發出一些口號，——我所說的是運動中的根本實際口號，——以便後來取得政權時加以實現。誰也不能責備在野黨沒有立刻實現它的根本口號，因爲大家都懂得，執掌政柄的不是這個在野黨，而是其他的黨。而我們布爾什維克黨這樣一個執政黨所處的情形，却就完全不同了。這樣一個黨底口號，並不是什麼簡單的（鼓動的）口號，而是一種更重大得多的東西，因爲這些口號是有實際決定效力的，是有法律效力的，是應當立刻實行的。我們黨決不能提出某個實際口號，然後把它延擱下去，而不立刻加以實行。如果這樣，那就是欺騙羣衆。爲要發出口號，特別是如把千百萬農民羣衆轉移到集體制度軌道上去這樣一種嚴重口號，就要有一些可以使它直接實現的條件，最後就須創立和組織這些條件。正因爲如此，所以單是黨上層份子預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性，這對於我們還是不夠的。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就要有一些爲實現和具體執行我們口號所必需的條件。

我們黨底黨員羣衆，譬如說在兩年或三年以前，是否已有充分準備來盡量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呢？不，他們當時還沒有充分準備來做這件事情。黨員羣衆向着城鄉結合底新形式方面的嚴重

轉變，是直到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第一批嚴重困難發生時才開始的。只是因為發生了這些困難，黨員羣衆才感覺得十分需要加速建立城鄉結合底新形式，首先是加緊建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並堅決贊助自己的中央來進行這件事情。這就是我們從前沒有，而現在却已具備的一個條件。

在兩年或三年以前，我們是不是已經有了千百萬農民羣衆擁護集體農莊或蘇維埃農莊的嚴重運動呢？是未曾有過的。誰都知道，在兩年或三年以前，農民還仇視蘇維埃農莊，而譏笑集體農莊爲毫不中用的「康姆尼」。現在呢？現在已是另一回事了。現在我們已有整批整批農民階層認爲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是使農民經濟獲得種子，優良牲畜，機器和拖拉機等方面幫助的來源了。現在，只須供給他們機器和拖拉機，就可保證集體農莊事業加快速度前進了。

在某些很廣大農民階層中的這種轉變，是從那裏發生的呢？是由什麼促成的呢？首先就是由於合作社和合作社運動底發展。毫無疑義的，如果沒有合作社，特別是那些在農民中間造成了贊助集體農莊的心理基礎的農業合作社雄偉的發展，我們就不會有像現在整批整批農民階層所表現的這種趨向於集體農莊的熱心。現有的那些組織得優良的集體農莊在這裏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因爲它們給了農民一個很好的榜樣，表明小農農莊合併爲巨大農莊，合併爲集體農莊，就能把農業大大改善起來。現有的那些設備得優良的蘇維埃農莊在這裏也起了相當的作用，幫助農民改良了他們的經濟。我還不說你們大家所熟悉的其他種種事實。你們看，這又是我們從前沒有，而現在却已具備的一個條件。

其次，可以說在兩年或三年以前，我們已有可能認真資助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撥出數萬萬盧布來資助這件事情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你們很清楚知道，我們當時甚至不能拿出充分的經費

去發展最低限度的工業，去發展那爲實現工業化計劃所絕對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工業，更不必說改造農業了。我們當時不能從那成爲全國工業化基礎的工業方面取出這些經費，而將其轉交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呢？當然是不能這樣作的。現在呢？現在我們已有經費來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了。

最後，可以說在兩年或三年以前，我們在工業方面已有充分基礎來加緊供給農業機器和拖拉機等等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當時，任務是要創立最低限度的工業基礎，以便能在將來供給農業機器和拖拉機。當時，我們也就是用我們所有的區區經費來創立了這種基礎。現在呢？現在我們已有這種工業基礎來供給農業需要了。無論如何，這個基礎在我國是以加快速度創立着的。

可見，我們爲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普遍發展所必需的條件，是直到最近一個時期才造成了的。情形就是如此，同志們。

正因爲如此，所以不可說我們把發展城鄉結合底新形式這件事情做遲了。

(二) 理論家的布哈林

右傾反對派理論家布哈林在我們政策各基本問題上的主要錯誤，大體上就是如此。

有人說，布哈林是我們黨底理論家。他當然是一個理論家，而且是一個不小的理論家。可是，問題就在於他那套理論並不完全吉利。這是單從他在黨政策各問題上所作出的上述那一大堆錯誤中就可看出的。他在共產國際各問題，階級鬥爭問題，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農民問題，新經濟政策

問題，城鄉結合底新形式問題上所犯的這些錯誤，決不是偶然的。不，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布哈林底這些錯誤是從他那個不正確的立場，從他那些理論缺陷中產生出來的。是的，布哈林是一個理論家，但他是一個不完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他這個理論家還得要補習一下，然後才可成為完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

有些人援引着列寧同志評論理論家布哈林的那封有名的信。讓我們來讀讀這封信吧：
列寧說：

「從年輕的中央委員中間，我想關於布哈林和皮達可夫說幾句話。我以為這是最出色的人材（就最年輕的人材來說），關於他們必須注意以下一點：布哈林不僅是黨內一個很寶貴很大的理論家，他還理應被看作是全黨所喜愛的人；可是如果把他的理論觀點當作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是很可疑的，因為在他的理論觀點中有些學究式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並且我認為他從來也沒有完全懂得辯證法）」*（見一九二六年七月全會速記錄，第四冊，第六六頁）。

總之，不懂辯證法的理論家。學究式的理論家。如果把他的「理論觀點當作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是很可疑的」理論家。列寧給布哈林底理論面目所作的估計，就是如此。

同志們，你們自己懂得，這樣一個理論家是還須補習一下的。如果布哈林懂得，他還不是一個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完全成熟的理論家，他還需要補習一下，他是一個還沒有完全領會辯證法的理論家，而辯證法却是馬克思主義底靈魂，——如果他懂得這一點，那他就會謙遜一些，而這對於黨是只會有好處的。可是，倒霉處就在於布哈林並不怎樣謙遜。倒霉處就在於他不僅不怎樣謙遜，而且在許多問題，首先是在國家問題上，他還想去教訓我們的導師列寧。倒霉處就在這裏，同志們。

說到這裏，我要來引證一九一六年列寧與布哈林關於國家問題所發生的那次有名的理論爭辯。這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可以揭露布哈林妄想教訓列寧的那種太不量力的奢望，同時又可揭露他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階級鬥爭問題等等這樣重大問題上的理論弱點底根源。大家知道，一九一六年在青年國際雜誌上登出布哈林一篇署名爲 *Nos Bois* 的論文，這篇論文在事實上是專門反對列寧的。布哈林在這篇論文中寫道：

「……如果以爲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間的區別，是在於前者贊成國家，後者反對國家，那就完全錯了。其實，區別是在於革命社會民主黨想要組織新的社會生產，集中的生產，即技術上最進步的生產；而不集中的無政府主義的生產，却只是倒退到舊的技術，舊式企業上去。」

「……社會民主黨是羣衆底教師，或至少應當是羣衆底教師，它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必須着重指出它在原則上仇視國家的態度……現在的戰爭表明，國家觀念底根蒂是十分厲害地深入到工人心靈中去了。」

列寧在一九一六年發表的一篇專門批評布哈林這種觀點的論文中回答道：

「這是不對的。作者所提出的是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的態度上，有何區別的問題，但他所回答的並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另一個問題，即是他們對於將來社會經濟基礎的態度上，有何區別的問題。這當然是一個很重大和必要的問題。可是，由此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忘記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的態度上的主要區別。社會主義者主張在謀工人階級解放的鬥爭中利用現代國家及其各個機關，同樣也主張必須利用國家作為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特殊的過渡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的過渡形式，它也是一種國家。無政府主義者想「取消」國家，想「炸毀」(sprengen)它，如 *Nota Bene* 同志在一個地方就這樣說過，而且誤將這種觀點加在社會主義者頭上。社會主義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關於這問題所說的話引得太不完全了，——認為在資產階級被剝奪後，國家就會消亡，「逐漸」「死滅」……」。

「……要想「着重指出」「原則上仇視」國家的態度，就須真正「明白」瞭解它，但作者恰巧是沒有這種明白的見解。至於「國家觀念底根蒂」一語，是完全糊塗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非社會主義的。並不是「國家觀念」與否認國家的觀念相衝突，而是機會主義政策（即用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觀點對待國家的政策）與革命社會民主黨政策（即用革命社會民主黨的觀點對待資產階級國家，並按這種觀點去利用國家反對資產階級，以求推翻這個階級的政策）相衝突。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九六頁，青年國際）。

由此就可明白這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布哈林究竟是滾到了怎樣的半無政府主義泥坑中去了！斯騰說：當時列寧還沒有詳細闡明必須「炸毀」國家的問題。而布哈林雖然是犯了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却已着手來闡明這個問題了。

斯大林說：不，這裏所說的並不是這一點。這裏所說的，是對於一般國家的態度。這裏所說的，是按布哈林底意見，工人階級應當在原則上仇視任何國家，包括工人階級底國家在內。

斯騰說：列寧當時只說到利用國家的問題，至於「炸毀」的問題，他在批評布哈林時是絲毫也沒有說到的。

斯大林說：你弄錯了。我敢向你担保，這裏所指的，是布哈林（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們）認為工人應當着重指出他們在原則上仇視任何國家，因而也就是仇視過渡時期國家，仇視工人階級國家的態度。你試試向我們的工人解釋，說工人階級應當在原則上仇視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國家哩。布哈林在他登載於青年國際雜誌上的那篇論文中所發揮的主張，就是否認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國家的主張。布哈林在這裏沒有看見一件「小事情」，即是沒有看見整個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工人階級如果確實想鎮壓資產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沒有自己的國家是不行的。這是第一。第二，說列寧同志當時在批評中沒有說到「炸毀」「取消」一般國家的理論，這是不對的。從我們所引證過的那段話中就可看出，列寧不僅說到了這個理論，而且徹底批評了這個理論，說它是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並提出了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創造新國家，即創造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理論來與它對立。最後，不可把主張「炸毀」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理論，與主張「打

破」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混爲一談。同志們中間有人喜歡把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混爲一談，認爲它們都是同一思想底表現。但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同志們。列寧在批評那主張「炸毀」「取消」一般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理論時，正是根據主張「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的。

爲使問題更加明顯起見，我不妨在這裏引證列寧闡明國家問題的一篇手稿，這篇手稿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末或一九一七年初（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前）寫的。從這篇手稿中就很容易看見：（1）列寧批評布哈林在國家問題上所犯的半無政府主義錯誤時，是根據主張「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的；（2）雖然布哈林——據列寧說，——是「稍比考茨基近於真理」，但他還是「不僅沒有揭破考茨基份子，反而用自己的錯誤幫助了他們」。請看這篇手稿底原文吧：

「在國家問題上有非常重要意義的，是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寫的那封致伯爾的信。

現在把這封信中最重要的地方完全引錄如下：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按這個字底文法意思講來，自由國家就是可以由對待自己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橫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這一名詞來挖苦我們已夠多了，雖然在馬克思駁斥普魯東的著作中以及後來在共產黨宣言上，都已經直

裁說過：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施行後，國家就會自行消散（*sich auflöst*）和消逝的。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不得不用來以強力鎮壓敵人的一種暫時機關，那末說什麼自由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謂之談；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時，那就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成其爲國家了。因此，我們提議到處都把國家一字改成「公團」（*Gemeinwesen*）一字，這是個很好的德文古字，是與法文中的「公社」相當的」（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裏，這大概是最明顯最激烈的所謂「反對國家」的語句了。

(1)「應當拋棄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

(2)「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究竟是什麼呢？顯然是由國家過渡到無國家狀態的過渡形式！）

(3)「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這一名詞來『挖苦』（原文是 *in die Zähne geworfen* 指斥）我們已夠多了（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深以他們那些德國朋友犯了這種明顯的錯誤爲恥；但他們認爲——而且按當時情況說來，當然是正確地認爲——這個錯誤是遠不如無政府主義者底錯誤那樣嚴重的。請注意這點!!）。

(4)「從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施行時起」，國家就會「自行消解（『自行消散』）」（請注意！）和消逝的」……（請與以後的「消亡」一字對照看）……

(5)「國家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需要的『暫時機關』……（當然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

(6) 其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Niederhaltung）字按字面說來不是鎮壓，而是制止復辟，鎮服（無產階級底敵人）。

(7) 在有自由時，就不會有國家了。

(8) 「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主張『到處』（在綱領上）都把「國家」一字改成『公團』（Gemeinwesen），「公社」!!!

由此可見，不單是機會主義者，而且考茨基也根本俗化了和污辱了馬克思和恩格斯。

機會主義者是沒有懂得這八項極豐富思想中任何一項的！

他們只看見現今的實際需要：利用政治鬥爭，利用現代國家來訓練和教育無產階級，來「奪得讓步」。這是對的（在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意義上說），但這還只是百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如果可以用這樣用算術方式來表示的話。

考茨基在他的宣傳作品和一般時論著作上，完全抹煞了（或是忘記了？或是沒有瞭解？）馬克思所說的（1）（2）（5）（6）（7）（8）等項和「Zerbrechen」一字（考茨基在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與潘萊枯克辯論時（見下文第四五至四七頁），在這個問題上已完全淪落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

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主張（甲）現在利用國家，以及（乙）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利用國家（「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立刻就對於實際工作有最重要意義的兩項。（而布哈林恰巧是把這兩項忘記了！）

我們與機會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主張以下幾點更深刻「更恆久的」真理：（甲）國家是有「暫時」性的；（乙）現在關於國家的「廢話」是有「害」的；（丙）無產階級專政不完全帶有國家性質；（丁）國家與自由是相矛盾的；（戊）用「公園」一字代替國家一字，「公園」一字是更正確的觀念（概念，綱領名辭）；（己）「打破」（Zerbrechen）官僚軍事機器。還有一點不可忘記，就是德國的公開機會主義者（伯恩斯坦和科里布等等）直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而正式綱領和考茨基却間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在日常鼓動中不談到它，容忍科里布及其同流叛徒行爲。

在一九一六年八月已向布哈林寫過：「請你讓你自已關於國家的思想完全成熟時再說吧」。可是，他沒有讀他自己這些思想完全成熟，就署名「Nos Bene」爬到刊物上去發表文章，而結果又不僅沒有揭破考茨基份子，反而用自己的錯誤幫助了他們！而按實質說來，布哈林是稍比考茨基近於真理的（尼·列寧）。

關於國家問題的理論爭辯的簡要歷史，就是如此。

看來是很明白了：布哈林犯了半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已經是改正這些錯誤，而跟隨列寧前進的時候了。可是，只有列寧主義者才能這樣想。布哈林原來是不同意於這點的。他反而硬說：不是他錯了，而是列寧錯了；不是他跟隨了或應當跟隨着列寧走，而是相反，原來列寧不得不跟隨布哈林走。同志們，你們不相信麼？那末，就請再聽下去吧。自從一九一六年發生這些爭論以後經過了九年——在這九年當中，布哈林是沒有做聲的，——在列寧逝世一年以後，即在一九二五年，布哈林把

自己那篇標題爲談談帝國主義國家論的論文——即是從前社會民主黨人彙刊編輯部（即列寧）所沒有接受來發表的那篇論文登在法權革命彙刊上發表出來，——他在這篇論文附註中公然說道：在這次爭論中，對的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這看來也許是不可思議的，但這却是事實哩，同志們。請聽聽這個附註底本文吧：

「弗、依（即列寧）發表一篇小評來反對了青年國際雜誌上的那篇論文。讀者容易看到，我並沒有犯過所加在我頭上的那種錯誤，因為我明白看見了無產階級專政底必要性，另一方面，從依里奇底小評中可以看出，他當時對於「炸毀」國家（當然是資產階級國家）這一原理是持有不正確的態度，因為他把這個問題和無產階級專政消亡問題混淆了*。也許我當時應當多多發揮專政這一問題。可是我所能藉以辯護自己的，就是在當時社會民主黨人紛紛讚美資產階級國家的情形下，自然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關於炸毀這架機器的問題上。」

當我由美國回到俄國來會見納捷施達、康士坦丁諾福娜時（這是在秘密舉行的我們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當時弗、依躲藏起來了），她第一句話就是說：「弗、依請我轉告你，關於國家問題，他現在與你沒有意見分歧了。」依里奇在研究這一問題時，關於「炸毀」這一點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可是他已透澈發揮了這個問題以及專政學說，以至於在這方面的理論思想發展中開闢了一個新紀元」。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布哈林在列寧逝世以後一年時，就是這樣用筆墨來議論列寧的。

你們看，這就是沒有學習成就的理論家過分奢望底標本。

也許納捷施達、康士坦丁諾福娜真是對布哈林說過布哈林在這裏所寫的話，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從這裏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只可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列寧曾有某些根據來意料布哈林已經放棄了或準備放棄自己那些錯誤。不過是這樣罷了。可是布哈林却有另外一種打算。他竟認定：從今以後，應當算作馬克思主義國家論底創造者或至少是提倡者的，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我們向來都認為並且現在還照舊認為我們是列寧主義者。誰知列寧和他的門生，即我們大家，原來是布哈林主義者。這真是有點兒好笑哩，同志們。可是，你既碰到布哈林誇大吹牛的野心，那你有什麼辦法呢。

也許可以設想，布哈林在他上述那篇論文附註上，不過是偶然失言，無意中說出一番蠢話，而後來却已把它忘記了。但這原來是不對的。布哈林原來是完全認真說出這番話來的。這從下面一件事實中間也可以看得出來：布哈林在這個附註中所說列寧錯誤和布哈林有理等語，在不久以前，就是說在一九二七年，即在布哈林第一次襲擊列寧以後經過了兩年的時候，又在麻列茨基所作的布哈林傳略裏發表出來了，而且布哈林連想都沒有想到要去抗議麻列茨基底這種：大膽行為。很明顯的，布哈林反對列寧的言論，是不可算作偶然的。

照這樣說來，對的竟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寧；馬克思主義國家論底提倡者竟不是列寧，而是布哈林。

同志們！布哈林底理論錯誤和理論野心，就是如此。

雖然如此，而這個人在這裏發言時，却還有勇氣說在我們黨底理論立場中「有些腐朽東西」，說在我們黨底理論立場中有趨於托洛茨基主義的傾向！而說這種話的，正是這個布哈林，正是現在犯着（而且過去已經犯過）一些最嚴重理論錯誤和實踐錯誤，不久以前還作過托洛茨基門生，昨天還找過托洛茨基份子來做反對列寧主義者的同盟者，還跑去和他們暗中私通過的布哈林哩！同志們，這難道不是好笑麼？

（七）是五年計劃呢，還是兩年計劃呢

現在讓我來講李可夫底發言。布哈林是企圖給右傾思想奠定理論根據的，而李可夫却極力想在自己發言中替這件事情立定實際主張的基礎，拿我國農業困難方面的「可怕情形」來恐嚇我們。這並不是說李可夫沒有涉及理論問題。不是的，他是涉及了這些問題的。可是，他涉及這些問題時，至少是犯了兩個嚴重錯誤。

李可夫在他那個被中央政治局專門委員會否決了的五年計劃問題決議草案中說：「五年計劃底中心思想就在於國民勞動生產率底增長」。雖然中央政治局專門委員會否決了這個完全不正確的立場，可是李可夫在這裏發言時又來擁護了這個立場。說蘇維埃國家內五年計劃底中心思想就在於勞動生產率底增長，——這話對不對呢？當然是不對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國民勞動生產率底隨便一種增長。我們所需要的，是國民勞動生產率一定的增長，即是保證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部份能一

貫·超·過·資·本·主·義·部·份·的·那·種·增·長·。同志們，問題就在這裏。如果五年計劃忘掉了這個中心思想，那它就不是五年計劃，而是五年胡說了。勞動生產率底一般增長，是任何一個社會都願意的，是無論資本主義社會或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都願意的。蘇·維·埃社會與其他任何社會不同處，也就在於它所願意有的，並不是勞動生產率底隨便一種增長，而只是能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形式超過其他各種經濟形式，首先是超過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因而它能保證克服和排除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那種增長。而李·可·夫却把蘇·維·埃社會五年發展計劃底這一真正中心思想忘記了。他的第一個理論錯誤，就在這裏。

他的第二個錯誤，就是他看不出或不願意瞭解，如集體農莊這樣的經濟和任何的個體經濟（包括資本主義的個體經濟在內）在商品流轉這一點上的區別。李·可·夫說，從糧食市場上的商品流轉觀點看來，從取得糧食的觀點看來，他認為集體農莊和糧食私有主是沒有什麼區別的，所以在他看來，我們是從集體農莊方面，從私有主方面，或是從某個阿·根·廷糧食商販方面收買糧食，橫直都是一樣。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這是重複福·龍·金底那種有名言論，福·龍·金曾經說過，他認為無論在什麼地方和向什麼人，向私有主或是向集體農莊收買糧食，橫直都是一樣的。這就是用暗藏方式擁護、辯護與辯白富農在糧食市場上玩弄的手腕。雖然這種擁護是從商品流轉觀點上進行的，但這並不能改變事情真相，而終究是為富農在糧食市場上玩弄的手腕作辯護。如果從商品流轉觀點上看來，集體式經濟與非集體式經濟沒有什麼區別，那是否還值得去發展集體農莊，是否還值得給它們優待條件，是否還值得去實現克服農業資本主義份子的困難任務呢？李·可·夫顯然是採

取了不正確的方針。他的第二個理論錯誤，就在這裏。

而且這還不過是順便說說而已。現在來請李可夫在發言中所提出的實際問題吧。

李可夫在這裏硬說，除五年計劃而外，還需要有一個平行的計劃，即農業發展的兩年計劃。他援引農業困難作為提出這個兩年平行計劃的根據。他說過，五年計劃是一件好事情，他也是贊成這件事情的，可是如果我們同時還擬定農業兩年計劃，那就更好了，否則農業情形就會糟糕了。從表面上看來，這個提議似乎是一點也不壞的。可是如果切實去考察一下，就可知道他想出農業兩年計劃來，是爲了着重指出五年計劃含有不實在的，紙上空文的性質，而兩年計劃則相反。我們能同意這一點麼？我們當然不能同意這一點。我們向李可夫說過：如果你不滿意農業方面的五年計劃，如果你認爲五年計劃上所規定的農業發展經費不夠，就請你公開說出你的補充的提議來，說出你的補充的投資數目來，我們同意把農業方面的這些補充投資加進五年計劃中去。結果怎樣呢？原來李可夫並沒有什麼關於農業方面補充投資的補充提議。那末，究竟爲什麼需要農業的兩年平行計劃呢？其次，我們又向他說過：除五年計劃而外，還有年度計劃，即五年計劃底一部分。請把你關於發展農業的具體補充提議加進頭兩年的年度計劃中去，如果李可夫一般是有這種提議的話。結果怎樣呢？原來李可夫並沒有提出這種補充投資的具體計劃。那時我們就明白了：李可夫提出兩年計劃，並不是要去發展農業，而是想來着重指出五年計劃含有不實在的，紙上空文的性質，想來推翻五年計劃。爲了安慰「心靈」，爲了掩飾門面，就需要五年計劃；爲了進行事情，爲了進行實際工作，就需要兩年計劃，——這就是李可夫底戰略。李可夫所以提出兩年計劃來，是爲了後來

在五年計劃具體實行過程中，好拿兩年計劃來與五年計劃對立，好來改造五年計劃，使五年計劃去遷就兩年計劃，縮小和創小發展工業的經費。

我們就是根據這些理由來否決了李可夫關於兩年平行計劃的提議的。

(八) 播種面積問題

李可夫在這裏恐嚇我們黨，硬說全蘇聯播種面積有一貫縮小下去的趨勢。同時他指着黨來暗示說，播種面積底縮減是應歸咎於黨底政策的。他沒有公開說我們事情有退化的趨勢。可是，從他的發言中可得出的一種印象，以為我們是有類似退化的趨勢。說播種面積有一貫縮減下去的趨勢，這是否正確呢？當然是不正確的。李可夫在這裏所運用的，是按全國播種面積的平均數計算的方法。可是，平均計算方法若不用按區統計材料來修正，便不可算作科學的方法。也許李可夫讀過列寧所著資本主義發展一書。如果他讀過，就應當記得列寧怎樣責罵了那些在估計播種面積增長情形時採用平均計算法，而忽視按區統計材料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李可夫現在竟重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底錯誤，真是奇怪。所以，按區考察播種面積變動情形，即是按科學方法來考察問題，就可知道：某些區域裏的播種面積是一貫增加着，其他區域裏的播種面積，主要是由於氣候條件不良的關係，間或減少了一些，但是沒有什麼材料可以證明在我國有什麼地方，那怕是某一個重要穀物區域內的播種面積，有一貫縮減下去的趨勢。

的確，在某些遭受大冰凍或旱災的區域，如在烏克蘭有些區域裏，播種面積近來是有一些縮減的。

座上有人說：並不是整個烏克蘭。

施·赫·特爾說：烏克蘭播種面積增加了百分之二點七。

斯大林說：我所說的，是烏克蘭草原一帶。可是，在其他沒有被不良氣候條件所牽累的区域，例如西伯利亞和窩爾加河流域，在卡查赫斯坦和巴什基里亞的播種面積，是一貫增加着的。爲什麼某些區域裏的播種面積一貫增加，而別些區域裏的播種面積却有時縮減呢？當然不可說黨政策在烏克蘭是一種，而在蘇聯東部或中部又是另一種吧。這是說不通的，同志們。很明顯的，氣候條件在這裏是有不小的意義。

對的，富農不管氣候條件如何，總是縮減播種面積的。這也許可以「歸咎」於黨底政策，因爲黨底政策是幫助貧農中農羣衆，反對富農的。可是，由此應得出什麼結論呢？難道我們在什麼時候曾答應執行一種能使農村一切社會集團——包括富農在內——都能滿意的政策麼？而且一般說來，如果我們想要執行馬克思主義政策，那末難道我們可以實行一種能夠使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都感覺滿意的政策麼？如果因爲我們實行了限制和克服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這種列寧主義政策，結果使富農實行局部縮減他們的播種範圍，那又何足爲奇呢？難道可以不是這樣麼？也許這個政策是不對的吧，那就請向我們直截了當說出這點來。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竟一看見富農局部縮減着播種範圍，就大驚小怪起來，說這是表明一般播種面積已經縮減，却忘記了除富農而外，還有貧農和中農（他們的播種範圍是正在擴大的），還有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它們的播種範圍是在加快速度增長着的），這不是很奇怪麼。

最後，李可夫在發言中關於播種面積問題所說的話，還有一個不正確的地方。李可夫在這裏訴苦，說在某些地方，而且正好是在集體農莊最發展的地方，貧農中農的個人耕地面積開始縮減了。這是對的。但這有什麼壞處呢？怎能不是這樣呢？如果貧農中農開始拋棄個人耕地，加入集體農莊，那末集體農莊的擴大和增多，就一定會使貧農中農個人耕地相當縮減，這難道不很明白麼？而你想要怎樣呢？現在集體農莊方面有兩百餘萬海克脫土地。到五年計劃末，集體農莊就會有二千五百萬海克脫以上。集體農莊耕地面積是靠誰人土地來擴大的呢？是靠貧農中農底個人耕地來擴大的。而你想要怎樣呢？如果不然，那又怎樣把貧農中農底個體經濟轉移到集體經濟軌道上去呢？許多區域的集體農莊耕地面積將靠吸收個人耕地而增加起來，這難道不很明白麼？人們竟不願意瞭解這種簡單事情了，真是奇怪。

(九) 糧食採辦工作問題

關於我們的糧食困難問題，有人在這裏說了一大堆荒唐話。可是，他們却把我們糧食方面暫時性的困難中的主要點忽略過去了。他們首先就忘記了我們今年所收穫的黑麥和小麥——我說的是收成總額——約比去年少五六萬萬普特這一事實。這能不反映到我們糧食採辦工作麼？當然不能不反映到。也許這應歸咎於中央底政策吧？不，這是與中央底政策無干的。這是因為烏克蘭草原一帶的收成很不好（大冰凍和旱災），以及北高加索、中央黑土省和西北區有局部歉收的緣故。主要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去年到四月一日時，我們在烏克蘭已採辦了二萬萬普特糧食（黑麥和小麥），

而今年却只採辦了二千六百萬至二千七百萬普特。同樣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小麥與黑麥採辦額在中央黑土省幾乎降至八倍，在北高加索幾乎降至四倍。今年在東部某些區域內，糧食採辦額幾乎增至兩倍。可是，這當然不能補償，而且也沒有補償我們在烏克蘭、北高加索以及中央黑土省糧食採辦不足的情形。不要忘記，在常態收成下，在烏克蘭和北高加索所採辦的糧食，等於全蘇聯所採辦的全部糧食一半以上，有時甚至等於三分之二。李可夫竟把這個情況忽略過去了，真是奇怪。

最後，還有第二個情況，是我們糧食採辦工作方面遇到暫時困難的主要原因。我所指的，是富農和農村豐裕份子對蘇維埃政權糧食採辦政策的反抗。李可夫迴避了這個情況。可是，迴避這點，就是迴避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主要點。最近兩年來糧食採辦工作的經驗，是說明什麼呢？它是說明，握有大部分剩餘糧食並在糧食市場上起指揮作用的農村股實階層，不願意把我們所需要的糧食按蘇維埃政權規定的價格自動賣給我們。我們每年大約需要五萬萬普特糧食來供給城市和工業地點，供給紅軍和技術原料作物區域。用自流式的辦法，我們大約能採辦三萬萬至三萬五千萬普特。其餘一萬五千萬普特，却不得不用有組織逼迫富農和農村股實階層的手段來取得。最近兩年來糧食採辦工作的經驗所告訴我們的，就是這一點。

在最近兩年內究竟發生了什麼變遷，這種變遷究竟是從何而來，為什麼自流辦法從前有濟於事，而現在却已經不夠了呢？變遷就在於富農和股實份子在這幾年內已長大起來，幾次豐年對於他們不是白白地過去了，他們在經濟方面已鞏固起來，他們已積蓄起某些資本，因此他們現在已能在市場上玩弄手腕，把自己的剩餘糧食屯積起來等待高價，而拿其他農產品來週轉週轉。糧食不是

平常商品。糧食與棉花不同，棉花是不能吃的，是不能見人就賣出的。在我們現今條件下，糧食與棉花不同處，就在於糧食是大家都買，沒有它便不能生存的一種商品。富農注意到了這一點，所以把糧食屯積起來，使一般糧食所有人都沾染這種風氣。富農知道糧食是實中之寶，富農知道剩餘糧食不僅是他們發財的手段，而且是可以用來整剝貧農的手段。現在富農手裏的剩餘糧食，是在經濟上政治上加強富農份子勢力的手段，所以我們從富農方面取得這些剩餘糧食，就不僅便利着城市和紅軍底糧食供給，而且根本打破這種在經濟上政治上加強富農勢力的手段。

爲要取得這些剩餘糧食，就要怎樣辦呢？首先就要消滅那種危險有害的自流心理。就要組織糧食採辦工作。就要動員貧農中農羣衆去反對富農，並組織他們共同擁護蘇維埃政權加強糧食採辦工作的辦法。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一帶根據農民大會自己擬派繳納額的原則實行的糧食採辦方法，其意義也就在它使得有可能來動員農村勞動階層去反對富農以加緊糧食採辦工作。經驗已經表明這個方法能給予我們以良好的結果。經驗已經表明這些良好結果是我們按以下兩方面得到的：第一，我們徵取農村富裕階層底剩餘糧食，這樣來便利我國供給事業；第二，我們在這事情上動員貧農中農羣衆去反對富農，並在政治上教育這些羣衆，把這些羣衆組織爲我們在農村中的強有力的數千百萬人的政治軍隊。有些同志竟沒有注意到這第二個情況。而這個情況却正是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糧食採辦方法底重要結果之一，甚至可說是最重要的結果。固然，這個方法有時候是與反對富農的非常辦法配合着採用的，這就引起布哈林和李可夫底可笑的叫喊。但這究竟有什麼壞處呢？爲什麼不能在相當時候，在一定條件下採用非常辦法去反對我們的階級敵人，反對富農呢？爲什麼在城內可以

成十成百地逮捕投機商人，將他們放逐到土魯汗斯克邊區去，而對於那些企圖扼住蘇維埃政權咽喉和盤剝貧農的富農，獨不可按公共強制手續，按貧農中農出賣糧食給我們採辦機關的價格去取得他們的剩餘糧食呢？這是從那裏得出來的結論呢？難道我們黨曾經說它在原則上反對採用非常辦法對付富農麼？李可夫和布哈林顯然是在原則上反對採取任何非常辦法對付富農的。但這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策哩。你們不能不知道，列寧在施行新經濟政策以後，甚至還主張過——當然是在一定條件下——恢復貧農委員會政策。而什麼是局部採取非常辦法對付富農呢？這與貧農委員會政策比較，甚至於還算不得滄海一粟哩。

他們，布哈林集團中的人，希望說服階級敵人，讓他自願放棄他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剩餘糧食自願交給我們。他們希望那些已經長大，已有可能拿其他農產品來玩弄手腕，而隱藏自己所有剩餘糧食的富農，會按照我們的糧食採辦價格，自願把自己的剩餘糧食交給我們。他們不是發了瘋麼？這難道不是明白證明他們不懂得階級鬥爭底機密，不知道什麼是階級麼？而他們是不是知道在爲加強糧食採辦工作而召集的鄉民大會上，富農怎樣譏笑我們的工作人員和蘇維埃政權呢？他們是不是知道這樣的事實，就是例如在卡查赫斯坦，我們的鼓動員費了兩點鐘工夫去勸說糧食所有人把糧食交出來供給國家的時候，有一個富農口裏啣着煙斗，起來回答這位鼓動員說：「喂，小夥子，你跳個舞來看看，我就給你兩個普特的糧食」。

座上有人喊道：真是混蛋！

斯大林說：你們試試說服這樣的人吧。是呀，同志們，階級到底是階級呵。誰也逃不出這個真

理。烏拉爾和西伯利亞方法底好處，本來也就在於它使得更有可能來推動貧農中農階層去反對富農，使得更有可能來打破富農底反抗，強迫他們把剩餘糧食交給蘇維埃政權機關。

現時在新反對派中間，在布哈林集團中間最流行的字眼，就是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所謂「過火行動」。這個字眼是他們那裏最暢銷的貨物，因為它幫助他們掩飾他們的路線。當他們想掩飾自己的路線時，他們通常總是說：我們當然不反對逼迫富農，可是我們反對在這方面所犯的那些觸犯了中農的過火行動。然後就來敘述這些過火行動底可怕情形，宣讀「農民」信札，宣讀如馬爾科夫一類同志大驚小怪的信札，然後就做出結論說：必須取消逼迫富農的政策。因為在實行正確政策時犯有過火行動，所以就必須取消這個正確政策，這豈不是很妙麼？機會主義者底慣用手段，就是藉口說在實行正確路線時有過火行動，而要求取消這個路線，用機會主義路線來代替這個路線。同時，布哈林集團裏的人細心緘默，一句話也不說到另一種過火行動，更危險更有害的過火行動，其目的是要與富農結合，遷就鄉村裏的富裕階層，用右傾份子底機會主義政策去代替黨底革命政策。

當然，我們大家都是反對這些過火行動的。我們大家都是反對把對付富農的打擊手段用來觸犯中農。這是很明顯的。這是不容有絲毫懷疑的。可是，我們堅決反對用布哈林集團所努力宣傳的那套妄說過火行動的廢話來取消我們黨革命政策的企圖，反對用布哈林集團機會主義政策來代替我們黨革命政策的企圖。不行的，「你們這套把戲是要不通的」。

請你們說一說，在黨底政治辦法裏，究竟有那一個政治辦法在實行中是沒有發生過某些過火行動的。由此所應得出的結論，就是要反對過火行動。可是，難道可以根據這一點來責罵唯一正

確的路線麼？就拿實行七小時工作日這樣一個辦法來說吧。這個辦法是我們黨最近所實行的最革命的辦法之一，這是不容有絲毫懷疑的。誰不知道，這個實質上十分革命的辦法，在我們這裏實行時往往發生許多過火行動，有時甚至是極可惡的過火行動呢？這是不是說我們應當取消實行七小時工作日的政策呢？新反對派中的人是不是懂得，他們開口閉口說什麼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過火行動，就是證明他們已滾到怎樣污濁的泥坑裏去了呢？

(四) 反對右傾的鬥爭問題

這樣我們就把我們意見分歧所由產生的一切主要問題，無論是理論方面，無論是我們黨底共產國際政策及內部政策方面的一切問題，都逐條分析過了。由上所述，就可看出，李可夫說在我們中間有一致的路線，是不符實情的。由上所述，就可看出：其實我們中間是有兩條路線的。一條是黨底總路線，是我們黨所實行的革命的列寧的路線。另一條路線就是布哈林集團底路線。這第二條路線還沒有完全形成，一部分是因為在布哈林集團裏有不可思議的觀點糊塗，一部分是因為這第二條路線在黨內勢力薄弱，所以總想用某種方式掩飾起來。可是，這條路線顯然還是存在着，而且是一條與黨路線不同的路線，是一條幾乎在我們政策一切問題上都與黨總路線對立的路線。這第二條路線在基本上是右傾底路線。

布哈林在這裏說過，三個政治局委員受着「公民死刑」，據他說，這三個委員被我們黨內各個

組織所「教訓着」。他說，黨已經使這三個政治局委員——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受着「公民死刑」，因為黨在刊物上和會議上批評了他們的錯誤，而他們這三個政治局委員却「不得不」閉口不言。同志們，這是廢話。這是企圖減弱黨反右傾鬥爭的一種自由主義化的共產黨員底假話。

照布哈林說來，如果他和他的朋友們犯了右傾錯誤，那末黨是沒有權利來揭露這些錯誤的，黨應當停止反右傾鬥爭，等候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自願放棄自己的錯誤。布哈林所要求於我們的，豈不是太多了麼？他是不是以為黨應爲着他而存在，而不是他應爲着黨而存在呢？當全黨動員起來反對右傾，進行決戰去克服困難時，誰強迫他閉口不言，靜靜地坐着呢？爲什麼布哈林和他的知己朋友們現在不可出來進行堅決鬥爭去反對右傾及調和派呢？如果布哈林和他的知己朋友們決意採取這一個並不是怎樣困難的步驟，那末黨一定會歡迎他們，——這一點難道有誰可以懷疑麼？爲什麼他們不決意採取這一個歸根到底還是他們一定要採取的步驟呢？這不是因爲他們把自己集團底利益看得比黨和黨總路線底利益更高麼？在反右傾鬥爭中，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竟不在場，這應歸咎於誰呢？說三個政治局委員遭受「公民死刑」的話頭，乃是三個政治局委員所玩的一種掩飾得很巧妙的手段，目的是企圖迫使黨閉口不言，停止反對右傾的鬥爭，這還很明白麼？

反右傾鬥爭，並不是我們黨底次要任務。反右傾鬥爭是我們黨有決定意義的任務之一。如果我們在我們自己隊伍內，在我們自己黨內，在領導運動和引導無產階級前進的無產階級政治參謀部內，——如果我們在這個參謀部本身內，容許右傾份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動，而這些份子企圖使

黨廢弛，企圖腐化工人階級，企圖使我們的政策適合「蘇維埃的」資產階級底胃口，並這樣來在我國建設事業困難面前投降的，——如果我們容許這一切，那就會是說明什麼呢？這不會是說我們想漸漸消滅革命，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逃避困難，把陣地讓給資本主義份子麼？布哈林集團是不是懂得，拒絕反右傾鬥爭，就是販賣工人階級，販賣革命呢？布哈林集團是不是懂得，不克服右傾和調和派，便不能克服我們面前的困難，而不克服這些困難，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不能達到有決定意義的成功呢？既然這樣，那末所謂三個政治局委員受着「公民死刑」的無聊語句，究竟還有什麼價值呢？

不行的，你們用所謂「公民死刑」這類自由派的廢話，是嚇不倒黨的。黨要求你們來和全體中央委員站在一個行列中堅決反對右傾及調和派。黨要求你們這樣做，是爲着便利動員工人階級，組織社會主義的全面進攻，打破階級敵人底反抗，並保證克服我國建設事業方面的困難。或是你們來執行黨底這個要求，那時黨就會歡迎你們。或是你們不做這一點，但那時就請你們自己去埋怨自己吧。

大轉變的一年

——爲十月革命十二週年紀念而作——

過去的這一年，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各條戰線上都發生大轉變的一年。這個轉變過去和現在都是在社會主義堅決進攻城鄉資本主義份子的標誌下進行的。這個進攻底特點就是它使我們在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各個基本方面，都獲得了許多有決定意義的成功。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黨在新經濟政策最初幾個階段中，是適當地利用了退却，以便在新經濟政策往後各階段中組織一個轉變，並對資本主義份子實行順利的進攻。

列寧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說過：

「我們現在退却着，好像是向後退却，但我們這樣做，是好似預備跳遠一樣，首先退後幾步，然後便向前猛進，更有力地跳往前去。僅僅是在這個條件下，我們在實行我們新經濟政策時，才向後退却過：以便在退却以後，開始一個最堅決的向前進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六一至三六二頁）。

過去的這一年底總結就是不容置疑地說明，黨在自己的工作中是順利執行着列寧這個極重要指示的。

如果拿過去這一年在對於我們有決定意義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總結來說，那我們在這條戰線上進攻的成功，我們在這一年的成績，就可歸納為以下三個基本要點。

(一) 在勞動生產率方面

毫無疑義，我們的建設在最近這一年當中的最重要事實之一，或者說最重要的事實，就是我們在勞動生產率方面達到了根本的轉變。這個轉變是表現於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線上創造發作用和雄偉勞動熱潮的擴展。這就是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一個基本成績。

羣衆創造發作用和勞動熱潮的擴展，是按着下面三個基本方向促成的：第一，是用發展自我批評的手段反對了束縛羣衆勞動發作用和積極性的那種官僚主義；第二，是用進行社會主義競賽的手段反對了那些偷懶逃工，破壞無產階級勞動紀律的份子；最後，第三，是用實行不斷生產制的辦法反對了生產中頑固守舊的惡習。結果，我們在勞動戰線上就獲得了極大的成績，其表現是在我們這個幅員廣闊的國家，到處都看得見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努力勞動和互相鼓勵的熱潮。而這個成績是有無限偉大的意義，因為只有千百萬羣衆底勞動高潮和勞動熱忱，才能保證勞動生產率有蒸蒸日上的增長，而沒有這種增長，社會主義就不能最終戰勝資本主義。

列寧說：

「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條件。資本主義造成了

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是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四二頁）。
列寧根據這點，認為：

「我們應具有滿腔勞動熱忱、勞動意志和堅持精神，因為在目前只有這樣，才可最迅速挽救工農，挽救國民經濟」（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七七頁）。

這就是列寧在黨面前所提出的任務。

過去這一年來的事實表明黨是在順利執行這一任務，而堅決克服這條道路上所有的困難。黨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一個重要成績，就是如此。

（二）在工業建設方面

黨底第二個成績，是與它這第一個成績有密切聯系的。黨底第二個成績，就是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中，大體上已經順利解決了重工業基本建築工程資金積累問題，實行了發展生產資料製造業的加快速度，造成了把我國變為五金國的前提。這就是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二個基本成績。

輕工業問題是沒有什麼特別困難的。我們在幾年以前，就已把它解決了。而重工業問題却比較困難，而且更加重要了。其所以比較困難，是因為它需要巨量資金，而且工業落後國底歷史

表明，重工業沒有大批的長期的借款，是不能發展的。其所以更加重要，是因為我們如果不發展重工業，便不能建成任何工業，便不能實現任何工業化。既然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得到什麼長期的借款和若干長期的信貸，所以問題底緊張性對於我們是非常明顯的。各國資本家正是根據這點，所以不肯給予我們借款，不肯給予我們信貸，以為我們一定不能自力解決資金積累問題，一定會在重工業改造問題上遭受失敗，而不得不向他們低頭求救，甘受他們盤剝的。

過去的這一年底總結在這方面是說明什麼呢？過去這一年總結底意義，就在它把資本家老爺們底盤算打得粉碎。過去這一年已經表明：雖然我們蘇聯遇到明裏暗中的財政封鎖，可是我們並沒有去受資本家們盤剝，却用我們自己所有的力量來順利解決了資金積累問題，奠定了重工業底基礎。現在，甚至工人階級底死敵也不能否認這一點了。既然我們去年投入大工業的基本建設金共有十六萬萬餘盧布，其中約有十三萬萬餘盧布是投入重工業的，而今年投入大工業的基本建設金共有三十四萬萬餘盧布，其中有二十五萬萬餘盧布是投入重工業的；既然我們去年大工業出產總量增加的百分數等於百分之二十三，其中重工業出產總量增加的百分數等於百分之三十，而今年大工業出產總量應增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重工業出產總量應增加百分之四十六，——那末重工業建設資金積累問題對於我們並沒有什麼無法克服的困難，這難道不是很明白麼。我們現在正用加快速度來發展我們的重工業，超過舊時的速度，剷除我們「歷來的」落後性，這難道可以懷疑麼？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五年計劃底預料在過去這一年已被超過執行，而資產階級「作家」所認為是「無法實現的夢想」，我們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集團）聞之心驚的五年計劃最高標準，

事實上却成了五年計劃最低標準，這又何足奇怪呢？

列寧說：

「爲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興旺也還不夠，——我們還要有重工業：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爲獨立國家的地位：重工業是需要有國家補助金的。我們如果找不到這種補助金，便不能成爲文明的國家，更不必說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 第三四九頁）。

由此可見，列寧是多麼激烈地規定了重工業資金積累的問題和黨在建設重工業方面的任務。

過去這一年來的事實表明黨是在順利執行這一任務，而堅決克服這條道路上所有一切困難的。這當然不是說工業已經不會有嚴重的困難了。爲了建成重工業，不僅需要解決資金積累問題。爲了建成重工業，還必須解決幹部問題，這就是說：（1）我們要吸收成千成萬擁護蘇維埃政權的技術人材和專門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2）我們要從工人階級中間培養新起的紅色技師和紅色專門家。如果資金積累問題可以說在大體上已經解決了，那末幹部問題却還急待解決。而在現今工業技術改造時期，幹部問題正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決定一切的問題。

列寧說：

「我們尚嫌不夠的主要東西，就是文化程度和管理上的技能：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新經

濟政策完全保證我們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問題「只」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底文化人材」（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〇七頁）。

很明顯的，這裏所說的首先是「文化人材」問題，是爲一般經濟建設，特別是爲工業建設和工業管理事業供給幹部的問題。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雖然我們在資金積累方面已獲得了對於重工業有重要意義的極大成績，但在幹部問題尚未解決以前，是不可說重工業建成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的。

因此，黨底任務就是要切實實行解決幹部問題，無論如何都要佔領這個要塞。
黨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二個成績，就是如此。

（三）在農業建設方面

最後，就要說到黨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三個成績，這個成績是與上面兩個成績有密切聯系的。這裏所說的就是我國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變：由規模狹小的落後的個體農業，進到規模巨大的先進的集體農業，進到共耕制，進到農業機器站，進到基於新技術的農業勞動組合和集體農莊，以及各用數百架拖拉機和康拜因機武裝起來的巨大蘇維埃農莊。黨在這裏的成績，就是我們把許多區裏的基本農民羣衆，由舊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引上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舊的發展道路僅僅有利於少數富豪資本家，而極大多數的農民却不得不忍受貧困的痛苦；新的發展道路是要把

富豪資本家排擠出去，而把中農貧農從新武裝起來，用新工具把他們武裝起來，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把他們武裝起來，使其能夠擺脫貧困的境遇和富農的盤剝，而走上共同耕種，集體耕種的廣闊道路。黨底成績就是我們在農民中間造成了這個根本轉變，並引導廣大的貧農中農羣衆向前邁進，那怕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困難，那怕有富農和神父，以至庸人和右傾機會主義者爲止的一切黑暗勢力拚命的反抗。

讓我們舉幾個數目字來說吧。在一九二八年，蘇維埃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一百四十二萬五千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是等於六百餘萬公擔（即三千六百餘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一百三十九萬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約等於三百五十萬公擔（即二千餘萬普特）。在一九二九年，蘇維埃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一百八十一萬六千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約等於八百萬公擔（約四千七百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四百二十六萬二千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是等於一千三百萬公擔（約七千八百萬普特）。在當前的一九三〇年中，按計劃規定，蘇維埃農莊底播種面積應等於三百二十八萬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應等於一千八百萬公擔（約一萬一千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應等於一千五百萬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應等於四千九百萬公擔左右（約三萬萬普特）。換言之，在當前的一九三〇年中，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底穀物商品產量應等於四萬萬餘普特，即超過整個農業穀物商品總產量（即運出農村以外的穀物總量）百分之五十。

老實說，這樣飛快發展的速度，甚至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工業也未會有過，而一般說來，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工業是發展得很迅速的。

既然如此，那末我們年輕的社會主義巨大農業（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農業）有着偉大的前途，將顯出發展的奇蹟，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集體農莊建設事業獲得這種空前的成功，自有許多原因，其中所應指出的，至少有以下幾點。首先，這個成功是因為黨實行了列寧的教育羣衆的政策，用培植合作運動的方法來把農民羣衆一貫引向集體農莊。這個成功是因為黨進行了一種順利鬥爭，一方面反對那些企圖跳過運動，用命令手段發展集體農莊的份子（「左的」清談家），另一方面又反對那些企圖把黨拉向後退，甘作運動尾巴的份子（右傾糊塗蟲）。如果黨沒有執行這樣的政策，那它就會不能把集體農莊運動變爲農民本身真正羣衆的運動。

列寧說：

「當彼得格拉無產階級和彼得格拉防軍兵士奪取政權時，他們已經明白知道農村中的建設事業是會遇到巨大困難的；在這裏必須採取比較漸進的步驟；在這裏企圖用法令，用法律來施行其耕制，是很荒謬的；當時只有很少數覺悟農民能夠同意實行其耕制，而大多數農民却還沒有立意這樣辦。因此，我們當時僅僅採取了革命發展所絕對必要的辦法：無論如何都不跳過羣衆底發展程度，而是要等待從這些羣衆本身經驗中，從他們本身鬥爭中長成前進的運動」（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五二頁）。

若說黨在集體農莊建設戰線上獲得了極大勝利，那就是因為它確切遵行了列寧這一策略指示。第二，農業建設事業獲得這個空前的成功，是因為蘇維埃政權正確估計到了農民日益需要新式

農具和新式技術的情形，正確估計到了農民在保存舊式耕作方法時沒有任何出路的情形，也正因為它估計到了這一切，所以它及時給了農民多方的幫助：設立農具租借處，拖拉機隊和農業機器站，組織共耕制，成立集體農莊，以及用蘇維埃農莊底力量來多方幫助農民經濟。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現了這樣一個政權，即蘇維埃政權，這個政權已實際證明它有決心，有能力來給勞動農民羣衆以有系統的長期的生產幫助。歷來苦於缺乏農具的勞動農民羣衆不能不極力歡迎這種幫助而走上了集體農莊運動的道路，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從今以後，工人底舊口號「面向農村」，大概會有集體農民底新口號「面向城市」來補充，這有什麼奇怪呢？

最後，集體農莊建設事業獲得這個空前的成功，是因為我國先進工人擔起了這件事情。我在這裏所指的是那些協助農村工作的工人隊伍，他們散佈於我國所有一切主要區域，成十成百不等，奔走工作。必須承認：工人宣傳員是最善於在農民羣衆中進行集體農莊運動宣傳工作的宣傳員，是任何其他現有的和可能的宣傳員所趕不上的。既然如此，那末這些工人竟說服了農民羣衆，使其相信集體巨大農業優越於個體細小農業，何況現有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就是表明這種優越性的具體實例，這有什麼奇怪呢？

這就是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中的成績所由長成的根源，而這一成績，我認為是近年來所有一切成績中最重要和有決定意義的成績。

「科學」底反對意見，即反對組織面積五萬至十萬海克脫不等的大規模穀物工廠，而認為組織這種工廠是不可能而且不適當的意見，是已經破產而被打得粉碎了。實踐已把「科學」底反對

意見推翻，並且再次表明了，不僅是實踐應當向「科學」傾教，而且「科學」也不妨去向實踐學習。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大規模的穀物巨型工廠是無法生長的。但我們的國家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個「小小的」區別是不可忘記的。在資本家那裏，因為有土地私有制，所以不預先購買大批田地，或不繳納絕對地租，便不能設立大規模的穀物工廠，而為要購買大批田地或繳納絕對地租，就要使生產擔負極大的費用。而在我們這裏，恰巧相反，因為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既沒有什麼絕對地租，也沒有土地買賣制，——這種情況當然不能不造成使大規模的穀物農莊易於發展的順利條件。在資本家那裏，大規模的穀物農莊底目的是要獲得最高限度的利潤，至少是要獲得適合於所謂平均利潤率的利潤，否則資本家就根本不會樂於設立穀物農莊了。而在我們這裏，恰巧相反，大規模的穀物農莊也就是國營的農莊，這種農莊為保證其發展，並不需要最高限度的利潤，也不需要平均利潤率的利潤，而能以最低限度的利潤為限，有時並且不需要任何利潤，——這種情況也造成使大規模穀物農莊易於發展的順利條件。最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既沒有什麼優待大穀物農莊的特殊信貸，又沒有什麼優待大穀物農莊的特殊稅率，而在以幫助社會主義部份為己任的蘇維埃制度下，却實行着，而且將來還會實行這種優待辦法。高貴的「科學」竟把所有這一切都忘掉了。

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集團）底斷語，即妄稱（1）農民不會加入集體農莊；（2）加緊速度發展集體農莊，只能使羣衆不滿和工農聯盟破裂；（3）農村中的社會主義發展「大路」，不是集體農莊，而是合作社；（4）發展集體農莊和進攻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就會使國家得不到糧食等語，是已經破產而被打得粉碎了。所有這些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陳腐論調，都遭破產而被打得粉碎了。

第一，農民已加入了集體農莊，而且是整村、整鄉、整區一同加入了集體農莊。

第二，廣大的集體農莊運動，不僅沒有減弱工農聯盟，反而更加鞏固了這個聯盟，給了一個新的生產的基礎。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得見：如果基本農民羣衆還有什麼嚴重的不滿，那就不是由於蘇維埃政權底集體農莊政策，而是由於蘇維埃政權在用機器和拖拉機來供給農民方面，還趕不上集體農莊運動底發展。

第三，關於農村中社會主義發展「大路」問題的爭論，是只配愛恆瓦里得和斯列機科夫這班年輕的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去從事的學究式的爭論。很明顯的，在廣大的集體農莊運動還沒有發展的時，合作社底初級形式，即供給合作社和銷售合作社，本是這樣的「大路」；而當合作社底高級形式，即集體農莊已經出現的時候，集體農莊就成爲發展「大路」了。如果不用括弧來講，那就要說，只有列寧底合作化計劃，才算是農村中的社會主義發展大路，這個計劃包括所有一切農業合作形式，由初級形式（供給的，銷售的合作社）起，一直到高級形式（生產的，集體農業的合作社）止。把集體農莊與合作社對立起來，就是侮辱列寧主義，而暴露自己愚昧無知。

第四，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得見：如果我們沒有進攻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如果我們沒有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運動，那我們現在就不會有今年在糧食採辦工作方面所得到的這種有決定意義的成功，也不會有現在國家手裏所有的幾千萬普特不可侵犯的穀物儲存了。而且可以肯定斷言：因爲有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運動的發展，我們正在完全走出缺乏糧食的恐慌，或者說已經走出了這種恐慌。如果我們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愈益迅速發展下去，那末再過兩三年以後，我們的國家就

一定會成爲最富有糧食的國家之一，甚至也許會成爲世界上最富有糧食的國家。

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新現象究竟是什麼呢？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有決定意義的新現象，就是現時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已不像從前那樣只是幾人一隊，而是整村、整鄉、整區以至於整州一同加入的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中農加入集體農莊了。這就是農業發展中根本轉變的基礎，而這一根本轉變，就是蘇維埃政權在過去這一年來最重要的成績。

托洛茨基主義底孟什維克「主張」，即認爲工人階級不能領導基本農民羣衆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主張」，是陷於破產而被打得粉碎了。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得見：中農已經轉到集體農莊方面來了。現在大家都看得見：工業農業五年計劃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五年計劃，而那些不相信我國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是沒有權利來慶賀我們五年計劃的。

各國資本家妄想在蘇聯會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一點希望，即「神聖的私有原則」，已在崩潰而化爲灰燼。他們所認爲是資本主義滋養料的農民，已紛紛拋棄那所讚美的「私有制度」旗幟，而走上了集體制度的軌道，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軌道。妄想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一點希望，已在崩潰下去。

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我國資本主義份子拚命企圖掀起舊世界一切勢力來反對實行進攻的社會主義，因而使階級鬥爭尖銳化。資本是不願意「長入」社會主義制度的。

同樣，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最近以來，資本家底忠實惡狗，如司徒盧威輩與黑先輩，米留可夫輩與克倫斯基輩，唐恩輩與阿布拉莫維奇輩狂叫狂吠起來，反對布爾什維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一點希望陷於破產，這並不是好玩的事情呀。

階級敵人這樣瘋狂的憤恨，資本走狗這樣兇惡的狂吠，若不是證明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最困難戰線上確實獲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又是證明什麼呢？

列寧說：

「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底優越時，只有當它用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經濟來幫助了農民時，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實可靠地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頁）。

列寧就是這樣提出吸收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的方法問題，就是這樣提出把農民引上集體農莊建設軌道的方法問題的。

過去這一年來的事實表明黨是在順利解決這一任務，而堅決克服這條道路上所有一切困難的。列寧說：

「只有當我們真正改進和改善了中農生活底經濟條件時，中農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才會站到我們方面來。如果我們明天就能夠拿出十萬架頭等拖拉機，給以汽油，給以駕駛員（你們十分知道，這在目前還是一種夢想），那麼中農就會說：『我贊成康姆尼』（即贊成共產主義）。可是，爲要做到這一步，首先就必須戰勝國際資產階級，逼迫它給予我們這些拖拉機，或者我們就要把我們的生產率提高到足以親自製造這些拖拉機的程度。只有這樣提這個問題，才是對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七〇頁）。

列寧就是這樣提出改換中農技術武裝的方法問題，把中農吸收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方法問題的。過去這一年來的事實表明了，這一任務，黨也是在順利執行着。大家知道，到來年，即一九三〇年春天，我們的田場上就會有六萬餘架拖拉機，再過一年，就會有十萬多架，而再過兩年，就會有二十五萬多架了。幾年以前還看作「夢想」的事情，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把它變為現實而綽綽有餘了。

這就是中農轉到「康姆尼」方面來的原因。

黨底第三個成績，就是如此。

黨在這一年來的幾個基本成績，就是如此。

結束語

我們正開足馬力，沿着工業化的道路前進，向社會主義前進，拋棄我們歷來的「俄羅斯的」落後性。我們的國家日益成為五金業的國家，汽車化的國家，拖拉機化的國家。當我們把蘇聯架在汽車上，把農民架在拖拉機上的時候，就請那些以「文明」自誇的高貴資本家們來試試追上我們吧。我們且來看看，究竟那些國家可以「評定」為落後的國家，那些國家可以「評定」為先進的國家。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發表
於真理報第二百五十九期

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

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現在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基本事實，引起大家注意的事實，就是集體農莊運動大規模增長的事實。

現時集體農莊運動底特點，就是現在加入集體農莊的，不像從前那樣只是個別貧農集團，而是大批中農一同加入的。這就是說，集體農莊運動已從個別勞動農民集團和個別勞動農民階層的運動，變成了幾百萬幾千萬基本農民羣衆的運動了。也就是因爲如此，所以現在有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實，即集體農莊運動已具有強大的日益增長的、反富農的、巨浪性質，掃除自己發展道路上所有的富農反抗，擊破富農，並在農村中開闢廣闊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

可是，我們雖然可以誇耀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有許多實踐的成績，但關於我們在一一般經濟方面，特別是在農業方面的理論工作的成績，却就不可這樣說了。而且必須承認：我們的理論思想趕不上我們的實踐成績，在實踐成績與理論思想發展間有些隔離。其實，我們的理論工作不僅應當趕上實際工作，而且還要超過實際工作，武裝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去爭取社會主義勝利。

我現在不來多講理論底意義。你們關於理論底意義，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論如果是真正的理論，就能賦予實際工作者確定方針的能力，明白認識的前途，進行工作的把握，確信我們事業必勝的信念。凡此種種，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是有巨大意義的，而且是不能不有巨大意義的。不幸我們正是在這一方面，在我國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方面，却開始跛腳。如果不然，那為什麼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裏，關於我國經濟問題，總還流行着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理論和小資產階級理論呢？如果不然，那為什麼這些理論和所謂理論直到現在還沒有遇到應有的回擊呢？如果不然，那為什麼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底許多基本原理，這些最能打破資產階級理論和小資產階級理論的武器，竟開始被人忘掉，而不在我們的刊物上廣加宣傳，不被提到最前面呢？不根據馬列主義理論去對資產階級理論作不調和的鬥爭，就不能完全戰勝階級敵人，這難道難得瞭解麼？

新的實踐就產生出對於過渡時期經濟各種問題的新的看法。現在，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建設速度問題，結合問題，黨底政策問題，都應有新的提法。爲要不落後於實踐，就須立刻根據新環境來研究這一切問題。如果不然，那就無法打破各種模糊我們實際工作者頭腦的資產階級理論。如果不然，那就無法剷除這些已變爲頑固成見的理論。因爲只有對理論中的資產階級成見作鬥爭，才能鞏固馬列主義底陣地。

讓我現在把這些資產階級成見，把這些所謂理論拿出幾個來批評一下，並在說明我國建設幾個樞紐問題時來證明這些成見毫無根據吧。

(一)『平衡』論

你們當然知道，共產黨員中間至今還存在有說我國國民經濟各部份彼此『平衡』的所謂『平衡』論。這個理論當然是與馬克思主義毫無相同處的。可是，這個理論却爲右傾營壘裏許多人所宣傳着。按這個理論說來，我們這裏似乎是有兩個木桶，一個木桶裏裝着社會主義的經濟，而另一個木桶裏却裝着非社會主義的，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這兩個木桶循着彼此平行的軌道，並排向前滾去，和平共處，不相抵觸。大家知道，按幾何學說來，平行線是不會交合的。可是，這個高明理論底創作者却認爲這兩條平行線總有彼此交合的一天，而它們一交合起來時，我們就有社會主義了。這個理論沒有看見，在這兩個所謂『木桶』後面是有相當的階級站着，而這兩個『木桶』底運轉是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生死的鬥爭，以『誰戰勝誰』爲原則的鬥爭中間進行的。

不難瞭解：這個理論是與列寧主義毫無相同處的。不難瞭解：這個理論底客觀目的是要保整個體農民經濟底陣地，用『新的』理論武器把富農份子武裝起來反對集體農莊，破壞集體農莊底陣地。可是，這個理論直到現在還流行於我們的刊物上。而且不可說它遇到了我們理論家方面的嚴重回擊，更不用說致命的回擊了。這種荒誕的情形，不是因爲我們的理論思想界落後，又是因爲什麼呢？

可是，只要打開馬克思主義寶庫，拿出再生產論來和各部份彼此平衡論對立一下，就可把這後一個理論打得粉碎了。的確，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論教導說：現代社會沒有逐年增加的積累，便不能

發展，而逐年增加的積累，又非有逐年擴大的再生產不可。這是顯而易見，不言而喻的。我們的巨大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擴大再生產論發展着，因為它的容量逐年增加，它有自己的積累，並一日千里地前進。可是，我們的大工業並沒有包括整個國民經濟。反之，在我們國民經濟中，小農經濟還佔有較大的比重。可以說我國小農經濟是按照擴大再生產原則發展的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我國小農經濟，大部分不僅沒有逐年實現擴大的再生產，恰巧相反，它甚至運單純的再生產，也不是時時都有可能實現的。而這種小農經濟雖不能實現擴大再生產，却又是在我國國民經濟中佔有較大比重的力量。有這樣的小農經濟為農業基礎，難道可以加快速度推進我們社會主義工業麼？當然是不可以的。可以在多少長久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築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建築在最巨大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散漫落後的小商品農民經濟基礎上麼？當然是不可以的。長此以往，整個國民經濟都會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於使這個農業成為巨大的農業，使它成為能夠實行積累，能夠實現擴大再生產的農業，並以此而改造國民經濟底農業基礎。可是，怎樣才能使它成為巨大的農業呢？為要達到這一步，只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即是在農業裏培植資本主義，使農業成為巨大的農業，結果是使農民陷於貧困，而使資本主義企業在農業中發展起來。我們反對這條道路，因為這條道路是與蘇維埃經濟不能相容的。另外一條道路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即是在農業裏培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結果是使小農戶聯合成為用技術和科學武裝起來的巨大集體農莊，而把資本主義份子從農業裏排擠出去。我們主張走這第二條道路的。

所以問題是這樣：或者是走第一條道路，或者是走第二條道路，或者是向後退，退到資本主義，或者是向前進，進到社會主義。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第三條道路。而『平衡』論却是想規定第三條道路的企圖。正因為它指望着第三條道路（不存在的道路），所以它是空想的，反馬克思主義的。

所以，只要拿出馬克思底再生產論來和各部份彼此『平衡』論對立一下，就可以把這個『平衡』論打得體無完膚了。

為什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不幹這件事情呢？誰要這種令人發笑的『平衡』論流行於我們的出版物上，而把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論束諸高閣呢？

（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

現在來說政治經濟學中的第二個成見，來說第二個資產階級式的理論。我所指的，就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這個理論雖與馬克思主義毫無相同之處，可是却為右傾營壘中的同志所極力宣傳着。這個理論底創作者所說的約如下述。從前我們這裏是有過資本主義的，當時工業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着，而農村却自發地、自流式地跟着資本主義城市走，照着資本主義城市底形相和模樣改造着。既然在資本主義下是這樣，那末在蘇維埃經濟制度下又何嘗不可這樣呢？為什麼農村，小農經濟，不能自流式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自發地照着社會主義城市底形相和模樣

改造呢？這個理論底創作者根據這點，就斷言農村能自流式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由此就有這樣一個問題：既然農村能自然而然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那末我們是否還值得爲組織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操心呢？我們是否還值得爲此而努力奮鬥呢？

這又是一個按其客觀目的來說，是要給予農村資本主義份子一種新的武器去反對集體農莊的理論。這個理論底反馬克思主義實質，是毫無疑義的。

這個奇怪理論混亂着我們那些集體農莊實際工作人員底頭腦，而我們的理論家却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工夫去痛斥這個奇怪理論，這難道不是很奇怪麼？

毫無疑義，社會主義城市對於小農鄉村的領導作用是偉大而無可估量的。正因爲如此，所以工業就具有改造農業的作用。可是，單靠這一個因素，是否已足夠使小農鄉村自動跟着城市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呢？當然是不夠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村是自流式地跟着城市走的，因爲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民小商品經濟，基本上是同類的經濟。當然，小農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可是，它基本上是和資本主義經濟同類的，因爲它倚據於生產資料私有制。列寧在評論布哈林所著過渡時期經濟一書時說得萬分正確，他說「農民有商品資本主義趨勢」，即是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趨勢背道而馳的趨勢*。正因爲如此，所以「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語）。既是如此，是否可以說小商品農民經濟，在基本上是和城市中的社會主義生產同類的呢？很明顯的，若不離開馬克思主義，便不能這樣說的。否則列寧就不會

*着重點是列寧加的。——斯大林註。

說：「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經濟基礎」。所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是一種反列寧主義的腐敗理論。所以，爲要使小農鄉村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除其餘一切而外，還須在農村裏培植巨大社會主義農莊，即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作爲社會主義根據地，以引導基本農民羣衆跟着社會主義城市前進。

事情是很明白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的城市應當引導小農鄉村，在鄉村裏培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按照新的社會主義的軌範來改造鄉村。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直到現在都還沒有遇到我們土地問題理論家方面應有的回擊，這是很奇怪的。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現在來說政治經濟學中的第三個成見，來說小農經濟「穩固」論。大家知道，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反對馬克思主義說大經濟優越於小經濟的著名提綱，說這個提綱只是在工業中發生效力，而在農業中是不適用的。宣傳這個理論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如達維特和格爾茨一班人所企圖「倚據」的事實，就是說小農吃得苦，忍得住，他爲着保留自己那一小塊土地而不惜挨受千辛萬苦，所以小農經濟在與大農業經濟鬥爭時，就表現出它那穩固性。不難瞭解：這種「穩固性」是比任何不穩固性都

要壞些的。不難瞭解：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讚美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正因為它有這樣一個目的，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很容易就把這個理論打破了。可是，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於此。現在的問題是在於我們的實踐，我們的實際情況，已拿出各種新證據來反對這個理論，而我們的理論家却不知為什麼竟不願意或不能夠利用這個新武器來反對工人階級底敵人。我所指的實踐，就是我國土地私有制已經消滅，土地已經國有化，這就使小農已不復像奴隸一般忠順於自己的一小塊土地，而易於從小的農民經濟過渡到大的集體的經濟。

究竟在西歐方面有什麼東西過去，現在而且將來還會把小農束縛在小商品經濟上呢？首先而且主要是因為他有一小塊私有土地，因為存在有土地私有制。他多年積蓄一點金錢，買得一小塊土地，而他買得土地後，自然不願和它離別，寧願挨受萬般痛苦，寧願過牛馬生活，只圖保持自己這一小塊土地，即他那個人經濟底基礎。可以說這個因素在我們這裏，在蘇維埃制度條件下，也仍然如此發生作用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其所以不可這樣說，是因為在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正因為在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我們這裏的農民，也就不會像在西歐那樣奴隸一般地忠順於土地。這個情況也就不能不使小農經濟比較容易轉入集體農莊軌道。

這就是在我國，在土地國有化條件下，農村大經濟，即農村集體經濟能很容易表明它優勝於小農經濟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消滅了絕對地租、取消了土地私有制而實行了土地國有化的蘇維埃土地法所具有的偉大革命意義。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我們擁有新論據去反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反對那些說什麼小農經濟在和大經濟鬥爭中能表現穩固性的妄談。

為什麼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不充分利用這個新論據去反對所有一切資產階級理論呢？

我們在實行土地國有化時所持的出發點之一，就是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底名著剩餘價值論以及列寧底土地問題著作內所發揮的那些理論前提，這些著作是最豐富的理論思想寶庫。我所指的，就是一般地租論，特別是絕對地租論。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得明白：這些著作底理論原理是由我們在城市和鄉村中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所燦爛證實了。

試問為什麼查揚諾夫這班「蘇維埃」經濟學家底反科學理論，竟應當在我們的刊物上自由流行，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地租和絕對地租論的天才著作，倒不應當普遍宣傳和提到最前面，却應當束諸高閣呢？

你們大概記得恩格斯論「農民問題」的那本著名小冊子。你們當然記得恩格斯怎樣慎重看待把小農引入協作經濟道路，引入集體經濟道路的問題。讓我從恩格斯這本小冊子裏引證關於這個問題的一段話吧：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極力設法改善小農生活，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共耕制，要是他們決意這樣辦的話；如果他們還不能決意這樣辦，那我們就要設法給他們儘多的時間，讓他們在他們那一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你們看，恩格斯是很慎重看待把個體農戶引入集體制軌道問題的。恩格斯這種驟然看來未免過分慎重的態度，究竟怎樣來解釋呢？他在這裏是根據什麼情形出發的呢？他所由出發的顯然是有土地私有制存在，農民還佔有「他們那一小塊」土地而難和這塊土地別離的情形。西方農民是如此。在土地私有制存在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農民是如此。在這裏當然是須要非常慎重的。可以說我們蘇聯也有同樣的情形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其所以不可這樣說，是因為我們這裏並沒有什麼把農民束縛於個體經濟上的土地私有制。其所以不可這樣說，是因為我們這裏有使個體農民易於過渡到集體制軌道的土地國有制。

這就是近來我國集體農莊運動發展得比較容易而迅速的原因之一。

令人氣憤的，就是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還沒有企圖把我國農民狀況與西方農民狀況間的這種區別儘量揭示出來。可是，這樣的工作不僅對於我們蘇聯的工作人員有莫大的意義，而且對於世界各國共產黨員也有莫大的意義，因為將來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的初期，究竟是要在土地國有制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還是要在沒有這樣一個基礎的情形下建設社會主義，這對於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無產階級革命，並不是沒有關係的。

我在不久以前所發表的一篇論文（大轉變的一年）中發揮了幾個有名的論據，證明大農業經濟優勝於小農經濟，而我在當時所指的，是巨大的蘇維埃農莊。用不着證明，這一切論據對集體農莊這種巨大經濟單位，也是完全全適用的。我所指的，不僅是那些已經發達而有機器和拖拉機作為基礎的集體農莊，並且是那些初步的集體農莊，即代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所謂手工場時期而倚靠於

農民原有農具的集體農莊。我所指的，是現時在全盤集體化區域內所建立的那些初步的集體農莊，它們不過是把農民生產工具集合在一塊來耕種土地罷了。例如，拿前頓河省 鶴普爾區裏的集體農莊來說。從表面上看起來，從技術方面看起來，這些集體農莊彷彿是和小農經濟沒有什麼區別的（機器很少，拖拉機很少）。其實，在集體農莊裏面，單是把農民工具集合起來進行生產，就獲得了我們的實際工作者所想都沒有想到的一種功效。這種功效有何表現呢？其表現就是自農民加入集體農莊以後，播種面積已經擴大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為什麼有這種「衝昏頭腦」的功效呢？這是因為農民在單獨勞動的時候，本來是沒有什麼力量，而當他們把自己的農具集合起來組織了集體農莊的時候，他們就變成極大的力量了。這是因為在各人單獨勞動的時候，有許多荒土和生地很難耕種，而從組織集體農莊時起，農民却有可能來加以耕種了。這是因為農民已有可能把生地拿到自己手裏了。這是因為農民已經有可能動用荒原，零星小塊土地，田界以及其他等等了。

耕種荒土生地問題對於我國農業是有巨大意義的。你們知道，舊時俄國革命運動底樞紐就是土地問題。你們知道，消滅缺乏土地的現象是當時土地運動底目的之一。當時有許多人以為缺乏土地是絕對的，即是以為在蘇聯再沒有適宜於耕種的空閒土地了。而事實上究竟怎樣呢？現在大家都看得清楚，在蘇聯有過而且現在還有幾千萬海克脫的空閒土地。可是，農民用他們的可憐工具，是絕對無法耕種這些土地的。正因為他們當時無法耕種生地荒土，所以他也就趨向於耕種「熟地」，耕種屬於地主的土地，耕種在單獨勞動時便於用農民工具來耕種的土地。這就是「缺乏土地現象」底基本原因。因此，無怪乎我們的穀物托拉斯現在已有可能動用約近兩千萬海克脫的空閒土地，這

些土地是農民所沒有耕種過，而且是不能在各人單獨勞動時用小農工具耕種的。

集體農莊運動在它的各個階段上，在初級的階段或在具備有拖拉機的更發展的階段上的意義，就在於農民現時已有可能去動用荒土生地了。這就是播種面積在農民過渡到集體勞動時大大擴充起來了的原因。這就是集體農莊優勝於個體農民經濟的一個基本原因。

不待說，當全盤集體化區中的初級集體農莊能得到農業機器站和農業機器隊方面的幫助，而集體農莊又有可能備置大批拖拉機和康拜因機的時候，集體農莊優勝於個體農民經濟的情形，是會更加顯然的。

(四) 城市與鄉村

還有一種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培植的成見，即所謂「剪刀形態」論，這種成見也如其他一切不幸還流行於蘇聯刊物上的資產階級理論一樣，應當受到無情的反對。我所指的這個理論，是認為十月革命所給予農民的要比二月革命所給的少些，認為十月革命其實沒有給予農民絲毫東西。有一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曾在我們的刊物上鼓吹過這種成見。不錯，這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後來已經放棄了自己的理論。（喊聲：「到底是誰呢？」）。這就是格羅曼。可是，這個理論却受到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方面的極力擁護，並被它利用來反對黨。而且無論如何也不可說，現時在「蘇維埃的」輿論界中，這個理論已不流行了。同志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

牽連到城鄉相互關係問題。它牽連到消滅城鄉對立性問題。它牽連到最迫切的所謂「剪刀形態」問題。因此，我認爲這個奇怪理論是值得分析的。

說農民從十月革命方面沒有得到絲毫東西，這是否正確呢？讓我們來看事實吧。

我手裏有著名統計學家高蒙啓諸夫同志底著名統計表，這統計表已經在我所著的在糧食戰線上一文中公佈過了。從這個統計表上可以看出，在革命以前，地主「所生產的」穀物不下六萬萬普特。所以，地主當時是六萬萬普特穀物底所有人。富農當時所「生產的」穀物有十九萬萬普特。這是富農當時所擁有的一種很大的力量。而貧農、中農當時所生產的穀物，總共不過二十五萬萬普特。這就是舊時鄉村中，十月革命以前鄉村中的情景。

十月革命以後，在鄉村中發生了什麼變化呢？我又來引用這個統計表中的數目字。就拿一九二七年爲例吧。地主在這一年生產了多少穀物呢？他們當然是絲毫沒有生產而且也不能生產什麼的，因爲地主已被十月革命所消滅了。你們當然懂得，這不能不大大改善農民底狀況，因爲農民已擺脫地主桎梏了。這當然是農民從十月革命方面所得到的很大的好處。富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多少呢？已經不是十九萬萬普特而是六萬萬普特穀物了。所以，自十月革命以後，富農底力量已削弱了三倍多。你們當然懂得，這件事實是不能不改善貧農和中農狀況的。而貧農、中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多少呢？已經不是二十五萬萬普特，而是四十萬萬普特了。所以，貧農和中農在十月革命以後所生產的穀物，已經是比较革命前多十五萬萬普特。

這就是說明貧農和中農從十月革命方面得到了很大好處的事實。

這就是十月革命已經給予貧農和中農的東西。

既然如此，試問怎麼還可說十月革命沒有給予農民絲毫東西呢？

可是，同志們，這還不能概括一切哩。十月革命消滅了土地私有制，消滅了土地買賣制，確立了土地國有制度。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農民爲要生產穀物，已不須要購買土地了。從前，他們爲要買得一小塊土地，不得不積年累月，勉強積蓄一點金錢，東湊西借，以至於價台高築，遭受盤剝。購買土地的費用，當然也就使穀物生產底成本費增加起來。而現在，農民已不必這樣幹了。現在，他不必購買土地，便能生產穀物了。這是什麼——是改善農民底狀況，抑不是改善農民狀況呢？當然是改善農民狀況的。

其次，直到最近時候爲止，農民始終不得不用單獨勞動方法，用陳舊工具來勉強耕種土地。大家知道，農民用現在已不中用的陳舊生產工具來單獨勞動，是不能獲得必要利益，來享受寬裕生活，一貫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康莊大道的。現時在集體農莊運動加緊發展以後，農民已有可能聯合起來，把自己的勞動同鄰居的勞動打成一片，共同組織集體農莊，開墾生地，利用荒土，領得機器和拖拉機，這樣來把自己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兩倍，以至於三倍。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由於共同組織集體農莊的結果，現在農民已有可能用一樣多的勞動來生產比以前多得多的穀物。其次，這就是說，穀物生產底成本費已比先前便宜多了。最後，這就是說，在價格穩定時，農民因出賣穀物所能得到的金錢，是比以前多得多的。

既然如此，試問怎樣還可說十月革命沒有給予農民什麼利益呢？

散佈這種謠言的人顯然是想誣蔑我們黨，誣蔑蘇維埃政權，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但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裏就應得出如下的結論：現在，「剪刀形態」問題，消滅「剪刀形態」問題，都應有新的提法。從這裏就應得出如下的結論：如果集體農莊運動將來也按現有的速度發展下去，那末「剪刀形態」在最近將來就會消滅。從這裏就應得出如下的結論：城鄉關係已經是建立在新的基礎上，城鄉對立性是會加快速度消滅下去的。

這個情況對於我們整個建設工作有極大的意義，同志們。它改變着農民底心理，使農民面向城市。它造成消滅城鄉對立性的條件。它造成一種基礎，使黨所提出的「面向農村」的口號，將由集體農民所提出的「面向城市」的口號來補充。而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為農民現在從城市方面得到機器、拖拉機、農學家、組織者以及直接的幫助去反對富農，消滅富農。極不信任城市，把城市看作強盜的那種舊式農民已退到後面去了。他已由新式農民，即集體農民所代替了。集體農民對城市抱着希望，希望從城市方面得到切實的生產上的幫助。生怕降為窮人，只想暗中（恐怕喪失選舉權呵！）變成富農的那種舊式農民已由新式農民所代替了。新式農民有着新的前途：加入集體農莊，逃出貧困境地，而走上經濟高漲的康莊大道。

事情就是這樣變化的，同志們。

因此，同志們，更令人氣憤的，就是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竟沒有極力設法把所有一切企圖辱沒十月革命勝利品，企圖辱沒日益增長的集體農莊運動的那些資產階級理論，澈底揭穿，連根剷除。

(五) 論集體農莊底本質問題

集體農莊這一經濟種類，乃是社會主義經濟底形式之一。這是不容懷疑的。

有一個人在這裏發言辱沒過集體農莊。他硬說，集體農莊這一經濟組織，是與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毫不相同的東西。同志們，我認為他這樣估計集體農莊是完全不對的。這種估計毫無疑義是與列寧主義毫無相同處的。

經濟種類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呢？顯然是由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關係來決定的。那裏還有其他什麼東西可以決定經濟種類呢？難道在集體農莊內有生產資料私有者階級和被剝奪生產資料者階級麼？難道在集體農莊內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麼？難道集體農莊不是把一切基本生產工具實行公共化，並且是在屬於國家的土地上實行的公共化麼？有什麼根據來說集體農莊這種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一呢？

固然，在集體農莊裏還有矛盾。固然，在集體農莊裏還有一種個人主義心理，甚至富農心理的遺毒，這種遺毒還沒有消滅，可是，再過一些時候，隨着集體農莊底鞏固，隨着集體農莊底機械化，這種遺毒是一定會消滅的。可是，把集體農莊整個拿來說，把它的矛盾和缺點都一起拿來說，集體農莊這個經濟因素在基本上是農村發展底新道路，是農村發展底社會主義道路，是和富農資本主義道路相對立的道路，這難道可以否認麼？在我國條件下，集體農莊（我所指的，是真正的集體農莊，而不是冒牌的集體農莊）是農村中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底根據地和策源地，是在與資本主義份

子作生死決鬥中發展起來的根據地和策源地，這難道可以否認麼？

有些同志企圖辱沒集體農莊而把它稱為資產階級經濟底形式，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在一九二三年，我們還沒有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當時，列寧在他所著論合作制一書中指出的，是合作社底一切形式，包括低等形式（供給的，銷售的合作社）和高級形式（集體農莊）在內。他當時關於合作社問題，關於合作企業問題究竟說了些什麼話呢？請看列寧所著論合作制一書中的一段話吧：

「在我們的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因為它是建立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土地上，是建立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生產資料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可見，列寧在觀察合作企業時，並不是把它當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看待，而是把它拿來與我國現存制度聯繫起來觀察，注意到合作企業是在生產資料屬於國家的國家裏，在屬於國家的土地上面經營的；列寧既然這樣觀察合作企業，所以他斷定說合作企業與社會主義企業是沒有區別的。

這就是列寧關於一般合作企業的言論。

關於目前的集體農莊，更可以這樣說，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著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列寧認為在我國條件下「單純的合作制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發展」，其原因之一也就在此。由此可見，上面所講的那位發言人辱沒集體農莊，就是犯了極嚴重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

由這個錯誤中，也就產生了他的另一個錯誤，即關於集體農莊內階級鬥爭問題的錯誤。這個發言人把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誇張到如此地步，以致可以得出結論，說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是與集體農莊外的階級鬥爭沒有區別的。甚至於還可以得出更進一步的結論，說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要比集體農莊以外更殘酷。而且，不只是這位發言人犯了這個錯誤。妄談什麼階級鬥爭，聾嚷胡說集體農莊內部的階級鬥爭，這在現時是我們的一切「左的」叫喊者底通病。而最可笑的，就是這些聾嚷者在沒有或差不多沒有階級鬥爭的地方「看見」階級鬥爭，而在有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很厲害的地方，却又看不見階級鬥爭。

集體農莊內有階級鬥爭成份麼？是的，是有的。既然集體農莊內還保存有個人主義心理，甚至富農心理的遺毒，既然在集體農莊內還有某些不平等，那末集體農莊內也就不會沒有階級鬥爭底成份。可以說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與集體農莊以外的階級鬥爭是相同的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我們的「左的」清談家的錯誤，正在於他們看不見這個區別。什麼是集體農莊以外的，成立集體農莊以前的階級鬥爭呢？這就是與那些佔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而藉以剝削貧民的富農作鬥爭。這是拚死命的鬥爭。而什麼是集體農莊基礎上的階級鬥爭呢？第一，這就是說，富農已被擊破了，已被剝奪了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第二，這就是說，貧農和中農已在基本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化基礎上聯合成為集體農莊。最後，這就是說，這裏發生的是集體農莊莊員內部的鬥爭，其中一部

分人還沒有擺脫個人主義和富農心理的遺毒，想利用集體農莊內某些不平等情形來圖利營私；另一部分人却想要剷除這種遺毒和不平等情形。只有瞎子才看不見集體農莊基礎上的階級鬥爭與集體農莊外的階級鬥爭之間的區別，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如果以為有了集體農莊，就算是有了解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那就錯誤了。如果以為集體農莊莊員已變成了社會主義者，那就更其錯誤了。其實，還要做很多工作來改造集體農民，消除他們的個人主義心理，使他們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集體農莊機器化進行得越快，集體農莊拖拉機化進行得越快，我們達到這個目的也就會越迅速。但這絲毫也不能減少集體農莊是農村裏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槓桿的極大意義。集體農莊底偉大意義，正在於它是農業中採用機器和拖拉機的主要基礎，是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精神去改造農民，改造農民心理的主要基礎。

列寧說得對：

「改造小農，改造小農底全部心理和習慣，是需要有幾代工夫的事情。要解決這個小農問題，要健全小農底全部心理，就要有物質基礎，要有技術，要在農業中大規模採用拖拉機和機器，大規模實行電氣化」（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九頁）。

集體農莊就是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只有經過這個形式，數千百萬小農才能廣泛採用機器和拖拉機，作為保證經濟高漲和保證農業按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槓桿，這難道可以否認麼？

我們的「左的」清談家，竟把所有這些都忘掉了。我們的這位發言人，也把這些忘掉了。

(六) 階級的變動和黨政策中的轉變

最後，就要說到階級的變動和社會主義向農村資本主義份子進攻的問題。

我們最近一年來工作底特徵，就是我們黨，我們蘇維埃政權：第一，開展了向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實行的全線進攻；第二，這個進攻——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已經獲得並繼續獲得很具體的優良效果。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已從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了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實行而且還在繼續實行我們整個政策中一個有決定意義的轉變。

直到最近以前，黨始終是主張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大家知道，這個政策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就宣佈了的。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以及在我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又把這個政策重複宣佈過了。大家還記得，列寧在他給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那封有名的信裏（一九二二年），又重複說到必須實行這個政策的問題。最後，這個政策又由我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追認過了。而我們一直到最近以前所實行的，正是這個政策。

這個政策是不是正確呢？是的，絕對是正確的。五年以前或三年以前，我們能這樣進攻富農麼？當時我們能實行這樣一種進攻而指望獲得成功麼？當然是不能的。當時實行這樣一種進攻，便是最危險的冒險行動，便是把進攻當作兒戲的一種危險之至的舉動。因為我們如果這樣輕舉妄動，便一定會遭失敗，結果就會使富農底陣地鞏固起來。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我們在農村中還沒有可據

以向富農實行堅決進攻的支撐點，即密佈各地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可能用社會主義的生產形式，即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去代替富農的資本主義生產。

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時期，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拼命強迫黨來採取立刻進攻富農的政策。可是黨並沒有採取這種危險的冒險辦法，因為黨知道，認真的人是不會輕舉妄動，把進攻當作兒戲的。進攻富農是要認真幹的事情。不可把進攻富農與空口反對富農混為一談。也不可把對富農的進攻與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拼命強迫黨來採取的那種同富農搔扭的政策混為一談。進攻富農是要擊破富農，並消滅它這個階級。沒有這些目的，那末進攻就是空談，就是搔扭，就是空砲，隨便怎樣稱呼都可，只是絕對不可叫作真正的布爾什維主義的進攻。進攻富農就是準備去實際行動，並把富農打得一敗塗地，打得他再也不能翻身。這在我們布爾什維克方面就叫作真正的進攻。五年以前或三年以前，我們能實行這樣一種進攻而指望獲得成功麼？當然是不能的。

的確，富農在一九二七年所生產的穀物，共達六萬萬普特以上，其中運往農村以外出賣的，約有一萬萬三千萬普特。這是一個頗為嚴重而不可忽視的力量。而我們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當時生產了多少呢？約有八千萬普特，其中運往市場的（即商品穀物）約有三千五百萬普特。請你們自己去判斷一下，我們當時是否能夠用我們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生產和商品穀物去代替富農底生產和商品穀物呢？顯然是不能夠的。在這種條件下向富農實行堅決進攻，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一定會遭失敗，一定會加強富農陣地，而得不到穀物。正因為如此，所以不管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如何從事冒險主義的空談，我們當時不能夠而且也不應當向富農實行進攻。

現在呢？現在的情形怎樣呢？現在我們已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來打擊富農，來打破富農反抗，消滅富農階級，並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來代替富農生產了。大家知道，在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穀物產量，總共不下四萬萬普特（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經濟底總產量少二萬萬普特）。其次，大家知道，在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商品穀物，共有一萬萬三千萬普特以上（即是比一九二七年富農底商品穀物多些）。最後，大家也知道，在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穀物總產量，將不下於九萬萬普特（即是比一九二七年富農底總產量多些），其中商品穀物，將不下於四萬萬普特（即是比一九二七年富農底商品穀物多得不可比擬）。

這就是我國現在的情形，同志們。

這就是在我國經濟中所發生的變動。

這就是我國最近所發生的階級力量的變動。

由此可見，現在我們已具備有物質基礎來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代替富農生產了。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現在向富農的進攻，已有不容置疑的成功。你們看，如果是說真正的進攻，而不限於空洞的反富農清談，那就須這樣進攻富農。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近來已從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了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那末，對於剝奪富農財產的政策又是怎樣呢，可以容許在全盤集體化區域裏剝奪富農財產麼？許多人這樣問道。真是一個可笑的問題！從前我們還主張限制富農剝削趨向，我們還沒有可能實行堅決進攻富農，還沒有可能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代替富農生產，當時剝奪富農財產的

辦法，是不可容許的。當時，不容許剝奪富農財產的政策，是必需而且正確的。現在呢？現在已是另一回事了。現在我們已有可能來實行堅決進攻富農，打破富農反抗，消滅富農階級，並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來代替富農生產了。現在，剝奪富農財產是由實行全盤集體化的貧農中農羣衆自己來幹的。現在，在全盤集體化區域裏剝奪富農財產，已經不是什麼簡單的行政辦法了。現時在這些區域裏剝奪富農財產，是建立和發展集體農莊這一事業底組成部分。正因為如此，所以現在來贅述剝奪富農財產問題，便是可笑而不莊重了。既然割下了腦袋，也就不必憐惜頭髮了。

還有一個問題，即能否容許富農加入集體農莊的問題，也是很可笑的。當然不能容許富農加入集體農莊。其所以不能，是因為富農是集體農莊運動底死敵。看來是很明白了。

(七) 結論

同志們，以上就是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在理論工作中所絕對不可忽略的六個樞紐問題。

這些問題底意義，首先就在於用馬克思主義精神來闡明這些問題，就可以連根剷除所有一切資產階級理論，這些理論，有時——真使我們丟臉——竟被我們共產黨員同志散佈起來，而模糊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底頭腦。其實，老早就應當把這些理論連根剷除和摒棄的了。因為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底理論思想，是只有與這些理論作無情鬥爭，才能增長和鞏固起來的。

末了，這些問題底意義是在於它們使過渡時期經濟中的舊的問題具有了新的面貌。

現在，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集體農莊問題，過渡時期經濟問題，都有了新的提法。有些人把新經濟政策解釋為退却，而且解釋為僅僅是退却，這種錯誤見解是必須揭穿的。其實，列寧還在手施行新經濟政策時就說過，新經濟政策並不只是退却，而且是準備向城鄉資本主義份子作新的堅決進攻的政策。有些人以為我們需要新經濟政策，只是為了城鄉間的聯繫，這種錯誤見解是必須揭穿的。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城鄉間隨便一種聯繫。我們所需要的，是能保證社會主義勝利的那種聯繫。我們主張新經濟政策，只是因為它効勞於社會主義事業。當它不復効勞於社會主義事業時，我們就把它拋到九霄雲外去。列寧說新經濟政策是認真而長期施行的。但他從來也沒有說新經濟政策是永久施行的。

還必須提出普遍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論的問題。必須研究我們國民經濟對照表編製格式問題。中央統計局在一九二六年當作國民經濟對照表公佈的東西，並不是什麼對照表，而是一種玩弄數字的把戲。巴查羅夫和格羅曼對於國民經濟對照表問題的見解，也是不切實用的。蘇聯國民經濟對照表格式，應當由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製定出來，如果他們一般願意仔細研究過渡時期各經濟問題的話。

如果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指定一部分專門工作人員，根據過渡時期經濟問題底新提法來專門研究這些問題，那就很好了。

論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問題

（紅星報第十六期上所載消滅富農階級一文，一般說來，無疑是正確的，可是它有兩種不適當的說法。我認為這兩種不適當的說法是必須糾正的。

（一）在該文中說道：

「在恢復時期中，我們執行了限制城鄉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從改造時期開始起，我們就從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過渡到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了」。

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與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並不是兩個不同的政策，而是一個政策。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是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底必然結果和組成部分。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這還不是排擠富農階級。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就是排擠和克服那些受不住賦稅壓制，受不住蘇維埃政權所施行的限制辦法的個別富農隊伍。顯而易見，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限制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結果不能不排擠個別富農隊伍。因此，排擠個別富農隊伍，不能不看作是限制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底必然結果和組成部分。

我們不僅在恢復時期中執行了這個政策，而且在改造時期中，而且在我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以後時期中，而且在我們黨第十六次代表會議（一九二九年四月）時期中，以及在這次代表會議以後，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夏季爲止，也都執行了這個政策；而從一九二九年夏季起，我們已進到全盤集體化的階段，已轉變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如果看一看黨底各個最重要文件，例如從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起（根據中央工作總結報告通過的決議），至一九二九年四月第十六次代表會議止（關於農業高漲道路問題的決議）的文件，那就不能不看見，「限制富農剝削趨向」或「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提綱，總是與「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克服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提綱，同時並提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黨並沒有把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事情，與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即限制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分開。

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也如第十六次代表會議一樣，完全是站在「限制農業資產階級剝削趨向」這一政策基礎上（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農村工作問題的決議），站在「採取新辦法來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這一政策基礎上（同上），站在「堅決限制富農剝削趨向」這一政策基礎上（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五年計劃問題的決議），站在「進攻富農」，即「更進一步，更有系統和更堅決限制富農和私商」這一政策基礎上（同上），站在「更堅決在經濟上排擠」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份子」這一政策基礎上（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根據中央工作總結報告通過的決議）。

所以，第一，該文作者把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與排擠他們的政策看作兩種不同的政策，是不正確的。事實說明：這裏只有一個共同的政策，即限制資本主義的政策，而排擠個別富農隊伍就是這一政策底組成部分和結果。

所以，第二，該文作者說直到改造時期，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時期才開始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也是不正確的。其實，無論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前，即恢復時期，亦無論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後，即改造時期，都是有過排擠的。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時期中，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不過是因採取新的補充辦法而更其加強，因而對於富農個別隊伍的排擠也就更其加強罷了。

(二)在該文中說道：

「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完全是從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中產生出來的，它是後一政策在新階段上的繼續」。

這個說法是不確當的，因而也就是不對的。當然，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不能從天上落下來。它是由整個前一時期，限制農村資本主義份子，亦即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時期所準備起來的。但這還不是說這個政策不是與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根本不同，而似乎是限制政策底繼續。像這位作者那樣說，便是否認從一九二九年夏季起在農村發展中所發生的轉變。像他那樣說，便是否認在這個時期中，我們在我們黨的農村政策上實行了轉變。像他那樣說，便是替我們黨內的右傾份子造成一種思想上的護符，因為右傾份子現在正是企圖利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來反對我們黨底新政策，也好似福龍金曾企圖利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來反對設立集體農

莊和蘇維埃農莊的政策一樣。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在宣佈加強那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時，是以什麼爲出發點的呢？其出發點，就是認爲雖然這樣限制富農，但富農階級在相當時期內還是應當繼續存在的。根據這一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就決定保留農村僱傭勞動法，明明知道絕大多數承租人都富農。根據這一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就決定保留農村僱傭勞動法，並要求切實實行這個法律。根據這一點，就再度宣佈不准剝奪富農財產。這些法律和決議是不是與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相抵觸呢？絕對是不相抵觸的。這些法律和這些決議是否與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相抵觸呢？絕對是相抵觸的！所以，現時在全盤集體化區域內，也就只好把這些法律和決議拋棄，而全盤集體化區域之擴大，却不只是與日俱增，而且是與刻俱增。況且，這些法律和決議已被全盤集體化區域集體農莊運動進程本身所拋棄了。

既然這樣，試問怎樣可以說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底繼續呢？顯然是不可以的。

該文作者忘掉了：如果仍然把生產資料和土地自由使用權保留在富農階級手裏，如果在我們的實踐中仍然保留農村僱傭勞動法和租地法，禁止剝奪富農財產，而只採用抽稅辦法及其他限制手段，就會無法排擠富農這個階級。作者忘掉了：在進行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時，只可指望排擠富農個別隊伍，——這不僅不與暫時保留富農階級的情形相抵觸，反而是預定要暫時保留富農這一階級的。爲要排擠富農階級，單用限制和排擠富農個別隊伍的政策還不夠。爲要排

擠富農階級，就要在公開的戰鬥中擊破這個階級底反抗，剝奪它所藉以生存，藉以發展的一切生產條件（土地自由使用權，生產工具，租地權，僱傭勞動權等等）。而這正是轉變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否則所有關於排擠富農階級的議論，都不過是對於右傾份子愜意而有利的無謂空談。否則便不會有什麼嚴重的農村集體化，更談不到全盤集體化了。這一點是我們農村裏那些粉粹着富農，實行着全盤集體化的貧農中農已懂得很清楚的。而我們某些同志却大概還不懂得這一點哩。

所以，黨現時在農村中實行的政策，並不是繼續舊時的政策，而是由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舊政策轉變到消滅富農階級新政策。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發表於《紅星報》第十八期

勝利衝昏頭腦

——論集體農莊運動問題——

現在，大家都在說蘇維埃政權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的勝利了。甚至敵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有嚴重的勝利哩。而這些勝利確實是偉大的。

事實指明說，到今年二月二十日，蘇聯全國百分之五十的農戶已經集體化了。這就是說，到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日，我們已把五年計劃超過執行了一倍多。

事實指明說，到今年二月二十八日，集體農莊就已經給春種事業收藏三千六百萬公擔種子，即等於整個計劃百分之九十多，即約近二萬二千萬普特。不可不承認：單是在集體農莊方面順利執行了糧食採辦計劃後就收藏了二萬二千萬普特種子的事實，是一個極大的成績。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農村向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轉變，可說已有保障了。

這些勝利對於我國命運，對於我國領導力量的整個工人階級，以及對於我們黨本身，都有極大的意義，這是無須證明的。姑且不說這些勝利底直接的實際結果，而這些勝利對於我們黨本身內部的生活，對於我們黨底教育，也有巨大的意義。這些勝利使我們黨具有奮發的精神，確信自身力量

的信心。這些勝利用確信我們事業必勝的信念來武裝工人階級。這些勝利把千百萬新與後備力量吸引到我們黨底週圍來。

所以，黨底任務就是要鞏固既得的勝利，有計劃地運用這些勝利來謀更進一步的發展。

可是，勝利，特別是較爲「輕易」得到的勝利，「出乎意料以外」的勝利，也有其陰暗的一面。這樣的勝利有時使人發生自誇自大的心理，以爲「我們什麼都能做！」，「我們什麼都不在乎！」這些勝利往往使人心醉，使人們因有勝利而頭昏眼花起來，喪失權衡輕重的知覺，喪失瞭解實際情況的能力，一味誇大自己的力量，輕視敵人的力量，冒險來企圖「一舉」而解決社會主義建設底一切問題。於是人們也就絲毫不設法鞏固既得的勝利，不注意於有計劃地運用這些勝利來謀更進一步的發展。爲什麼我們要來鞏固既得的勝利呢，橫直我們都能夠「一舉」而跑到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因爲「我們什麼都能做！」，「我們什麼都不在乎！」。

所以，黨底任務就是要堅決反對這種有害於事的危險情緒，要把這種情緒從黨裏驅除出去。

不可說，這種有害於事的危險情緒在我們黨隊伍內有什麼廣泛的流行。可是，這種情緒在我們黨裏面畢竟是有的，而且不能斷定說這種情緒不會加強起來。如果這種情緒在我國得到大家的公認，那末集體農莊運動事業是一定會大大削弱，而這運動陷於破壞的危險就一定會成爲事實了。

所以，我們報章底任務，就是要有系統地揭穿這一類反列寧主義的情緒。

舉幾件事實來說吧。

(一) 我們集體農莊政策所以獲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這個政策是倚據於集體農莊運動自

願、原則和估計到蘇聯各個不同區域內特殊條件的原則。決不可用強力來設立集體農莊。如果這樣做，那就是愚蠢而反動了。集體農莊運動應以農民基本羣衆積極擁護爲倚據。決不可把先進區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模範，機械地搬到落後區裏去。如果這樣做，那就是愚蠢而反動了。這樣的「政策」一下子就會糟踏掉集體化思想。在規定集體農莊建設速度和方法時，必須仔細估計到蘇聯各個不同區域內的特殊條件。

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我們的穀物區比其他各區都要先進些。爲什麼呢？第一，因爲在這些區域內，我們有較多的已經強固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所以農民已有可能來確信新技術底力量 and 意義，新的集體的經濟組織底力量 and 意義。第二，因爲這些區域在糧食採辦運動中有了兩年反富農鬥爭的經驗，結果不能不使集體農莊運動事業易於進行。最後，因爲這些區域最近幾年來從工業中心方面得到了極多的優秀幹部。

是否可以說在其他區域內，比方在那些消費區內，例如我國北方各省，或是在那些還落後的民族區內，例如土耳其斯坦，也具備有這種特別順利的條件呢？

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

很明顯的，估計到蘇聯各個不同區域內特殊條件的原則，也和集體農莊運動自願性的原則一樣，是發展健全集體農莊運動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而事實上有時又是怎樣呢？是否可以說自願性和估計地方特點的原則沒有在某些區域裏被違背呢？可惜不可這樣說。大家知道，例如在北方某些消費區內，本來不如穀物區內那樣有立刻組織

集體農莊的順利條件，而人們却往往不去進行組織集體農莊的準備工作，却一味發佈強迫實行集體農莊運動的官僚主義命令，通過發展集體農莊的紙上決議，組織紙上虛文的集體農莊；這些集體農莊在實際上還沒有，可是妄說這些集體農莊「已經存在」的吹牛決議，却已製出一大堆了。或者是拿土耳其斯坦某些區域來說，這些區域內是比北方消費區更少有立刻組織集體農莊的順利條件的。大家知道，在土耳其斯坦某些區域內，有人曾企圖「趕上並超過」蘇聯先進區域，其方法就是以武力威脅此刻還不願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說誰不立刻加入集體農莊，便得不到灌溉水和工業品。

這種普力施巴也夫上士式的「政策」，究竟與黨倚據於集體農莊運動自願原則和估計到各地特點的政策，有什麼相同處呢？當然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絲毫相同處的。

誰需要這種曲解呢？誰需要用這種官僚主義的命令方法來處理集體農莊運動呢，誰需要這樣無理威脅農民呢？除了我們的敵人而外，是誰也不需要的！

這種曲解能產生什麼結果呢？結果只能加強敵人底力量，而糟踏集體農莊運動的思想。

這些以「左派」自居的曲解家在事實上是幫助右傾機會主義者，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二) 我們黨政治戰略底最大長處之一，就是它善於在每一個時機中選出整個運動底基本環節，抓住這個環節，便能把整個鏈條拖向一個總目標去解決任務。可以說黨在集體農莊建設體系中已選定了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環節麼？是的，可以而且必須這樣說。

這個基本環節是什麼呢？

也許是共耕社吧？不，不是共耕社。共耕社是還不實行把生產資料公共化的，它是集體農

莊運動中已往的階段。

也許是農業公社吧？不，不是農業公社。農業公社暫時在集體農莊運動中還是少見的現象。農業公社是不僅把全部生產實行公共化，而且把分配也實行公共化的，現在把它作為主要形式來實現的必要條件，還沒有成熟。

在現今時機中，集體農莊運動基本環節，集體農莊運動底主要形式，即現時必須努力抓住的一環，就是農業勞動組合。

在農業勞動組合中，基本的生產資料，主要是穀物經濟方面的基本生產資料，即勞動，土地使用權，機器和其他農具，耕畜以及經濟建築等是公共化了的。在農業勞動組合中，屋旁園地（小菜園，小菜園），住宅，某一部分產乳牲畜、小牲畜、家禽以及其他等等，是不公共化的。農業勞動組合現在是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環節，因為它是解決穀物問題的最妥當形式。而穀物問題又是整個農業體系中的基本環節，因為不解決穀物問題，就不能解決牲畜（小牲畜和大牲畜）問題，也不能解決為工業供給主要原料的技術作物和專門作物問題。正因為如此，所以農業勞動組合現在是整個集體農莊運動體系中的基本環節。

最終規定並於今天公佈了的集體農莊模範章程，就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我們的黨工作人員和蘇維埃工作人員也應當從這一點出發，而把切實研究這個章程和徹底實行

*見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的蘇聯報。

這個章程當作自己的任務之一。

這就是黨在現今時機的方针。

可以說黨這個方针是被確切實行，而沒有被人違背和曲解麼？可惜不可這樣說。大家知道，在蘇聯某些區域內，爭取集體農莊生存地位的鬥爭遠遠沒有完結，農業勞動組合還沒有鞏固，但是有人已在企圖超出農業勞動組合範圍，而一下子跳到農業公社那裏去。農業勞動組合還沒有鞏固，但他們已在實行把住宅、小牲畜和家禽「公共化」，而這種「公共化」也就變成了紙上的官僚主義的命令，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使公共化成為必要的條件。人們這樣胡作亂為，彷彿穀物問題在集體農莊中已經解決了，彷彿穀物問題已經是已往的階段，彷彿現今時機的基本任務不是解決穀物問題，而是解決養畜問題和養禽問題。試問誰需要這種把集體農莊各種形式混為一談的魯莽「工作」呢？誰需要這種有害於事，跑得太前的愚蠢行動呢？當穀物問題還沒有解決，集體農莊農業勞動組合形式還沒有鞏固時，竟把住宅、一切產乳牲畜、一切小牲畜和家禽實行「公共化」，藉以欺侮集體農民，——這樣的「政策」祇能使我們可恨的敵人得到方便和益處，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在這些急燥的「公共化主義者」當中，有一個人甚至於弄到了這樣的地步，竟向農業勞動組合下令：「限定三天以內將每個農戶所有的家禽按隻計算出來」，並指定專門「指揮官」來指揮計算和監督事宜，「佔領農業勞動組合中的險要陣地」，「指揮社會主義戰鬥，不得離開崗位」，而——當然的事——把整個農業勞動組合一舉握住。這是什麼呢——是領導集體農莊的政策，還是瓦解集體農莊和破壞集體農莊信用的政策？至於那些以取消教堂神鐘來開始組織農業勞動組合的所謂「革命家」，

那更不必說了。取消教堂神鐘，你看這是多麼革命呵！

爲什麼在我們的隊伍裏竟能發生這種「公共化主義」的魯莽兒戲，這種企圖跳過自身的可笑行爲，這種企圖迴避階級和階級鬥爭，而事實上却替我們的階級敵人幫忙的行動呢？這種行動只有當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戰線上獲得「輕易」勝利和「意外」勝利的空氣中，才能發生。這種行動之所以能發生，只是因爲黨內一部分人懷有魯莽情緒，以爲「我們什麼都能做！」，「我們什麼都不在乎！」。這種行動之所以能發生，只是因爲我們有些同志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暫時失去了明確的理智和清醒的眼光。

爲了糾正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工作路線，就必須消滅這種情緒。
黨底當前任務之一，就在這裏。

領導的藝術是一件嚴重事情。不可落在運動後面，因爲落在後面，就是脫離羣衆。可是，也不可跑得太前，因爲跑得太前，就是喪失自己與羣衆的聯繫。誰願意領導運動，同時又願意保持自己與千百萬羣衆的聯繫，那他應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既反對落在後面的份子，又反對跑得太前的份子。

我們黨之所以強而有力，不可戰勝，就是因爲它領導着運動，同時又善於保持並增加它與千百萬工農羣衆的聯繫。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發
表於真理報第六十期

給集體農莊工作同志們的答覆

大家從報上知道，斯大林所著的勝利衝鋒一文，和中央所通過的反對歪曲我黨集體農莊運動路線的有名決議，在集體農莊運動實際工作者中引起了許許多多的回聲。所以，近來我接到了集體農莊工作同志們許多來信，要我答覆他們在信內所提出的問題。我本應當用私人通信方式回答每個來信同志。可是，這竟是辦不到的，因為來信同志大半沒有寫明自己的通信處（忘記註明通信處了）。而且信內所涉及的問題，又是對於我們全體同志都有莫大政治興趣的。此外，對於那些忘記註明自己通信處的同志，也當然不能不給以答覆。因此，我不得不把信內所有緊要的問題總合起來作一個公開的答覆，即在報紙上答覆。況且中央對此已有直接的決議，所以我也就更樂意這樣來作了。

第一個問題。在農民問題方面所犯錯誤底根本原因是什麼呢？

答覆。是因為對中農採取了不正確的態度。是因為在與中農的經濟關係上採用了強力。是因為忘記了與中農羣衆的經濟結合決不可倚靠於強力手段，而應當倚靠於與中農協定，倚靠於與中農聯盟。是因為忘記了，現今集體農莊運動底基礎是工人階級與貧農聯合中農去反對一般資本主義份子，特別是反對富農。

當進攻富農的鬥爭還是與中農結成統一戰線來進行時，本來是一切都很順手的。可是，當某些

同志因被成功所薰醉，而漸漸由進攻富農的路上滾到反對中農的路上時，當他們因貪求集體化高度百分數而向中農採用強制手段，即剝奪中農選舉權，並像剝奪富農那樣去剝奪中農財產時，於是進攻路線就被曲解，與中農結成的統一戰線就被破壞，而富農當然也就獲得了企圖恢復他們勢力的可能。他們忘記了：在進行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中，強力是必要的，是有益處的；可是，如果用這種強力來對待我們同盟者的中農，那就是不容許，而且極端有害的了。

他們忘記了：在解決軍事性作戰任務時，輕騎突擊手段是必要的，是有益處的；可是，如果用這種輕騎突擊手段來解決集體農莊建設任務，而且是聯合中農來進行的建設任務，那就是藥不對症，而且極端有害的了。

這就是在農民問題上所犯錯誤底根本原因。

請看列寧論到與中農的經濟關係問題時所說的話吧：

「我們所應首先倚據的真理，就是這裏採用強力方法，其實是什麼也做不到的。這裏的經濟任務，是按完全另外一個方式擺着的。這裏並沒有什麼上層可以拆去，而把整個屋基和整個屋宇都保留起來。這裏並沒有如在城市裏所有過的那種上層，即資本家。在這裏採用強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業……誰想在中農經濟關係方面採用強力，那他就是在愚昧不過的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六八頁）。

其次：

「用強力對待中農，是極有害的。中農是人數衆多的，數千百萬人的社會階層。甚至在

西區方面，雖然那裏中農勢力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這樣巨大，雖然該處技術與文化、都市生活和鐵路交通特別發達，雖然該處本來最易發生用強力對待中農的思想，——可是，無論什麼人，無論那一個最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也沒有主張過用強力手段對待中農」（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六七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第二個問題。集體農莊運動中的主要錯誤是什麼呢？

答覆。這種錯誤，至少有三個。

第一，在建設集體農莊時違背了列寧的自願原則，違背了黨底基本指示以及農業勞動組合模範章程對於集體農莊建設自願原則問題的規定。

列寧主義教導說：必須按照自願原則，用說服農民相信公共集體農業優越於個體農業的方法來引導農民走上集體農業的軌道。列寧主義教導說：只有在農民面前具體表明，並用事實，用經驗證明了集體農莊確實優於個體農莊，集體農莊確實是比個體農莊有利些，集體農莊確實能使農民——貧農和中農——擺脫貧窮困苦狀況時，才可說服農民相信集體農莊底優越。列寧主義教導說：沒有這些條件，集體農莊便不能穩固。列寧主義教導說：企圖用強力來建立集體農莊，企圖用強迫手段來設立集體農莊，結果是只能壞事，使農民離開集體農莊運動的。

事實果然如此，當這個基本規則尚被遵照執行時，集體農莊運動是獲得節節勝利的。可是，有些爲成功所薰醉的同志，竟開始忽略這個規則，表現過分急躁，且因貪求集體化高度百分數而用強

迫手段設立集體農莊。無怪乎這種「政策」底惡果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一下子產生的集體農莊，也就一下子瓦解了，而一部分昨天還很信任集體農莊的農民，今天就開始離開集體農莊了。

這就是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一個錯誤，而且是主要的錯誤。

請看列寧說明集體農莊建設自願原則的一段話吧：

「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過渡到公共耕種制，過渡到巨大公共農莊。可是，任何強迫手段都是蘇維埃政權所不可採用的；任何法律都不強迫這樣辦。農業公社是按照自願原則成立的；過渡到公共耕種制只能是自願的，在這一方面，任何強迫手段，都是工農政府所不可採用，而且是法律所不容許的。如果你們中間有人看見過這樣的強迫，那末你們就應當知道，這是濫用威權，這是違反法律，這是我們正在竭力糾正而且定會要糾正的現象」*（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三頁）。

其次：

「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公共耕種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底優越時，只有當它用公共耕種的，勞動組合制的經濟來幫助了農民時，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實可靠地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因此，無論那一種促進公共耕種，勞動組合制農業辦法底意義，都不可過分誇大。我國有千百萬分散於各個窮鄉僻壤的個體農戶；只有在實踐上根據農民切近的經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驗來證明了必須而且可以過渡到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農業時，我們才可以說，在俄羅斯這樣幅員廣大的農民國家裏，我們在社會主義農業道路上已經有了嚴重的進步」*（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至五八〇頁）。最後，還要引證列寧著作中的一段話：

「蘇維埃政權代表們在鼓勵各種共耕社以及中農農業公社時，不應當容許在建立這種共耕社和農業公社方面採用任何強迫手段。只有那些由農民本身自由發起，而其益處已由農民本身實際考驗過的聯合，才是有價值的。在這件事情上的過份的急躁，是有害的，因為這只能加強中農守舊惡新的成見。凡是擅敢實行強迫——不消說直接強迫，那怕是間接強迫——農民加入公社的蘇維埃政權代表，都應受到極嚴厲的處分，而被撤銷其在農村中担任的工作」*（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七四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黨是會十分嚴格實行這些列寧指示的。

第二，人們在處理集體農莊建設問題時，違背了必須注意蘇聯各個不同區域特殊條件的列寧原則。人們忘記了：在蘇聯有彼此極不相同的區域，各有彼此不同的經濟結構和文化水準。人們忘記了：這中間有先進的區域，有中等的區域，也有落後的區域。人們忘記了：集體農莊運動底速度和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集體農莊建設底方法，在這些遠不一樣的區域裏，是不能彼此一樣的。

列寧說：

「如果我們簡單地按着死板格式來爲俄國各地抄襲千篇一律的法令，如果那些在烏克蘭和頓河區工作的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員，蘇維埃工作人員，竟不分青黃皂白，籠籠統統把這些法令推行到其他各地去，那就錯誤了！」因爲「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應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來拘束自己，無論如何也不可一勞永逸地決定，說我們的經驗，俄國中部的經驗，可以完全搬到一切邊區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

其次，列寧又說：

「用死板方式把俄國中部，烏克蘭以及西伯利亞混爲一談，使其服從於一定的死板格式，那就是愚蠢萬分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四三頁）。

最後，列寧責成高加索共產黨員說，他們

「要懂得他們的那種特殊情形，他們的共和國與俄羅斯共和國情形和條件有所不同的那種特殊情形；要懂得決不可機械地抄襲我們的策略，而要深思熟慮變更這一策略底形式，以求適合於特殊的具體條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九一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我們黨中央根據列寧這些指示，便在它論集體化速度的決議中（見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的真理報），按集體化速度的標準來把蘇聯各區分成三類：北高加索，高爾加河中游，高爾加河下

游的集體化工作，大體上能於一九三一年春天完結；其他穀物區（如烏克蘭，中部黑土省，西伯利亞，烏拉爾，卡查赫斯坦等等）集體化工作，大體上能於一九三二年春天完結；其餘各區集體化工作完結期限，可以延到五年計劃時期末，即延到一九三三年。

看來是很明白了。

而事實上又是怎樣呢？事實上，我們某些同志因迷戀於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一批成功，竟把列寧指示和中央決議都安然忘記了。莫斯科省因拼命貪求集體化虛張數字，竟責成自己的工作人員在一九三〇年春天結束集體化，雖然莫斯科省擁有不下三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二年底為止）。中部黑土省因不願「落後他人」，竟責成自己的工作人員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時就結束集體化，雖然中部黑土省擁有不下兩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一年底為止）。而南高加索人和土耳其斯坦人為拼命「趕上並超過」先進區域起見，竟決定在「最短期內」結束集體化，雖然南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擁有整整四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三年底為止）。那些對於集體農莊運動的準備程度較少的區域，既然採取這樣匆忙的集體化「速度」，以圖「超過」那些對於集體農莊運動的準備程度較少的區域，當然就不得不加緊採用行政壓制手段，企圖用自己的行政主義怒火來填補集體農莊運動迅速發展速度所缺少的因素。其結果是大家皆知的。大家知道，在這些區域內結果是弄出了一團糟，後來只好由中央來干涉才解開這一團糟。

這就是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二個錯誤。

第三，人們在處理集體農莊建設問題時，違背了列寧認為決不可跳過運動尚未完結形式的原

則，違背了列寧認為決不可跳過羣衆發展程度，決不可命令羣衆運動，決不可脫離羣衆，而要和羣衆一塊前進，并推動羣衆前進，把他們引到我們的口號下面來，幫助他們根據本身經驗來深信我們口號正確的這個原則。

列寧說：

「當彼得格拉無產階級和彼得格拉防軍兵士奪取政權時，他們已經明白知道農村中的建設事業是會遇到巨大困難的；在這裏必須採取比較漸進的步驟；在這裏企圖用法令，用法律來施行共耕制，是極荒謬的；當時只有很少數覺悟農民能夠同意實行共耕制，而大多數農民却還沒有立意這樣辦。因此，我們當時僅僅採取了革命發展所絕對必要的辦法：無論如何都不跳過羣衆底發展程度，而是要等待從這些羣衆本身經驗中，從他們本身鬥爭中長成前進的運動」*（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五二頁）。

中央在它那個有名的論集體化速度的決議中（見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的真理報），根據列寧這些指示，認為：（1）農業勞動組合現時是集體農莊運動底主要形式；（2）因此必須擬定一個關於農業勞動組合這種集體農莊運動主要形式的模範章程；（3）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決不可採取從上面「下令施行」集體農莊運動的辦法，決不可「把集體化當作兒戲」。

這就是說，我們現在所應抱定的方針不是建立農業公社，而是建立農業勞動組合，作為集體農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莊建設底主要形式；這就是說，決不可超過農業勞動組合階段，逕直跳到農業公社，決不可用「下令施行」集體農莊的手段和「集體農莊的兒戲」去代替農民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

看來是很明白了。

而事實上又是怎樣呢？事實上，我們某些同志因迷戀於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一批勝利，竟把列寧指示和中央決議都安然忘記了。這些同志不去組織成立農業勞動組合的羣衆運動，却把個體農民逕直「轉上」公社章程。他們不去鞏固運動底勞動組合形式，却用強迫手段把豬羊、家禽、自用乳牛和住房等實行「公共化」。列寧主義者所不容有的這種急燥態度所引起的惡果，是大家都已知道的。穩固的農業公社，通常當然是沒有建立成功。可是許多農業勞動組合却輕易放棄了。固然，「好的」決議是剩下來了。可是，它們有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三個錯誤。

第三個問題。為什麼會發生這種錯誤呢，黨應當怎樣來糾正這種錯誤呢？

答覆。這種錯誤是因我們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獲得迅速勝利而發生的。勝利有時能衝昏人們底頭腦。勝利往往產生出一種自誇自大的心理。執政黨中的人特別容易患這種毛病。特別是像我們黨這樣具有無限力量和威望的政黨中的人，更容易患這種毛病。列寧所痛斥的那種共產黨員誇大狂的表現，在這裏是很有可能發生的。相信法令萬能、決議萬能和訓令萬能的心理，在這裏是很有可能發生的。黨底革命設施在我們廣闊國家某個角落裏變爲黨個別代表底空洞官僚式命令手段的危險，在這裏是很實在的。我所指的，不僅是地方工作人員，而且是個別省委工作人員，而且是

個別中央委員。列寧說：「共產黨員誇大狂，就是說有一些側身於共產黨內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的人，竟妄想用共產黨員名義來發號施令，便能解決他自己的一切任務」（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〇至五一頁）。

集體農莊運動中的錯誤，歪曲我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路線的行動，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如果讓這種錯誤和行動繼續下去，如果不將其速即肅清無餘，那末它們就會有什麼危險呢？

其危險就在這種錯誤會使我們還直去糟踏集體農莊運動，去與中農紛爭，使貧農隊伍紊亂，使我們的隊伍錯亂，使我們全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削弱下去，使富農恢復起來。簡而言之，這種錯誤是要我們離開鞏固與基本農民羣衆聯盟的道路，離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而走上與這些羣衆決裂的道路，走上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

這種危險在二月下半月就已暴露出來了，當時我們有一部分同志迷戀於先前的勝利，竟與列寧主義路線背道而馳。黨中央注意到這個危險，所以立刻就來實行干涉，委託斯大林在專論集體農莊運動的文章中，給那些輕舉妄動的同志們一個警告。有些人以爲勝利街昏頭腦這篇論文是斯大林個人的創舉。這當然是廢話。我們黨中央之所以存在，並不是要讓什麼人在這種事情方面來表現個人的創舉。其實，這是中央所採取的一個仔細探查的辦法。而當錯誤底深度與範圍都已查明時，中央就立刻把它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通過的那個有名決議公佈出來，用它的全部威權來打擊這些錯誤。

要使瘋狂奔馳者懸崖勒馬，轉入正軌，自是困難的事情。可是，我們中央之所以叫做列寧黨底

中央，就是因為它善於克服困難，即使困難比這更大，也是能克服的。而且它在大體上已把這種困難克服了。

在這種情形下，對於黨內整批隊伍，要止住自己的奔馳脚步，及時轉入正軌，及時改編自己的隊伍，自是困難的事情。可是，我們黨之所以叫做列寧黨，就是因為它具有充分敏捷性來及時克服這種困難。而且它在大體上已把這種困難克服了。

這裏的主要問題，就在於要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要有立刻消滅這種錯誤的本事。因沉醉於不久以前獲得的勝利而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誤，害怕自我批評，不願迅速和堅決改正錯誤，——這就是主要的困難。只要一克服這個困難，只要一拋棄虛張聲勢的數目字和例行公事的官僚主義最高限度主張，只要轉而注意於執行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組織上經濟上的任務，就能使這種錯誤消滅無餘。毫無疑義，黨在大體上已把這個危險困難克服了。

列寧說：

「從前所有一切革命黨陷於滅亡，就是因為它們自傲，而看不見自己力量之所在，害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我們是不會滅亡的，因為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並且能學會克服弱點」。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〇至第二六一頁）。

列寧這一段話，是不可忘記的。

第四個問題。與歪曲黨路線的行動作鬥爭，這是不是後退，是不是退却呢？

●若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答覆。當然不是！只有那些把繼續錯誤和繼續歪曲當作進攻，把改正錯誤當作退却的人，才能說這是退却。用加深錯誤和加緊歪曲來實行進攻，該是多麼好的「進攻」呵。

我們把農業勞動組合提出來作為現時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形式，並規定了相當的模範章程作為集體農莊建設工作的指南。我們是不是在離開這件事情而退却呢？當然不是！

我們提出了鞏固工人階級和貧農方面與中農的生產結合，作為現時集體農莊運動底基礎。我們是不是在離開這件事情而退却呢？當然不是！

我們提出了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作為我們現時農村實際工作底主要口號。我們是不是在離開這件事情而退却呢？當然不是！

我們還在一九三〇年一月間就已規定蘇聯農業集體化的一定速度，並把蘇聯各區分成幾類，而為每一類規定了特別的速度。我們是不是在離開這件事情而退却呢？當然不是！

試問怎能說黨在「退却」呢？

我們是想使那些犯了錯誤和歪曲了黨路線的人從他們的錯誤中退出來，我們是想使那些魯莽從事者從他們的魯莽思想中退到列寧主義立場上來。我們之所以想這樣，是因為只有如此，才可以繼續向我們的階級敵人進行真正的進攻。這是不是說，我們這樣做就是後退呢？當然不是！這只是說，我們想實行正確的進攻，而不肯把進攻作為魯莽的兒戲。

只有那些糊塗人和「左傾」過火份子才能把黨底這個立場看作退却，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妄談什麼退却的人至少是不懂得兩件事情。

第一，他們不知道進攻法則。他們不懂得：實行進攻而不鞏固既得的陣地，就是實行必遭失敗的進攻。譬如在軍事方面，怎樣的進攻才可以成為勝利的進攻呢？爲要使進攻成為勝利的，那末進攻的軍隊就不可一味前進，而是還要努力鞏固既得的陣地，隨作戰環境變遷而重新配置自己的力量，提上後方機關，調上後備軍。爲什麼要這樣辦呢？是爲了防範意外，消滅任何一次進攻所不能絕對避免的個別失陷，並以此而準備完全消滅敵人。一九二〇年波蘭軍隊底錯誤，如果單就軍事方面來說，就在於他們忽視了這個規則。也就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當他們接連不斷地打到基輔時，隨後就不得不接連不斷地退到華沙。一九二〇年蘇維埃軍隊底錯誤，如果也單就軍事方面來說，就在於他們在進攻華沙的過程中踏了波蘭軍隊底覆轍。

關於階級鬥爭戰線上的進攻法則，也要這樣說。不鞏固既得的陣地，不重新配置自己的力量，不用後備力量保證前線，不提上後方機關等等，就不能實行順利進攻，以求消滅階級敵人。

全部問題就在於魯莽從事者不懂得進攻法則。全部問題就在於黨是懂得並實行着這些法則的。第二，他們不懂得進攻底階級本質。他們只知高喊進攻。究竟是向那個階級進攻，聯合那個階級去進攻呢？我們是聯合中農向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實行進攻，因爲我們只有這樣去進攻，才能獲得勝利。可是，如果這個進攻竟因黨內個別隊伍醉心於個別勝利而開始離開正軌，並轉移自己火力去反對我們的同盟者，反對中農，那又怎樣辦呢？難道我們所需要的是隨便一種進攻，而不是和一定階級聯盟去打擊一定階級的進攻麼？須知吉訶德先生也是以爲他衝擊磨坊就是進攻敵人哩。可是，大家知道，他在這種所謂進攻中，是把自己弄得頭破血流了的。

我們的「左傾」過火份子，大概是不肯讓吉訶德先生專美於前哩。

第五個問題。什麼危險在我們這裏是主要危險：是右傾危險，還是「左傾」危險呢？

答覆。右傾危險在我們這裏是主要危險。右傾危險在我們這裏會而且現在還是主要危險。

這個說法，是不是與中央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決議上認為「左傾」過火份子底錯誤和歪曲行為是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主要障礙的那個著名提綱相抵觸呢？不，絲毫也不相抵觸。因為「左傾」過火份子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的錯誤，造成使右傾在黨內加強和鞏固起來的順利環境。為什麼呢？因為這些錯誤把黨底路線歪曲起來，結果就會便利着破壞黨威信的企圖，就會便利着右傾份子進行反對黨領導的鬥爭。破壞黨領導底威信，也就是右傾份子進行反黨鬥爭的基本條件。「左傾」過火份子，他們的錯誤和歪曲黨路線的行動，就是為右傾份子造成這樣的條件。因此，要戰勝右傾機會主義，就須克服「左傾」機會主義者底錯誤。「左傾」過火份子在客觀上是右傾份子底同盟者。

「左傾」機會主義與右傾主義間的特殊聯繫，就是如此。

正因為有這種聯繫，所以就有某些「左傾」份子時常說要與右傾份子結成同盟的事實。也正因為有這種聯繫，所以就有一種特殊現象，就是有一部分「左傾」份子，昨天還「實行」一味進攻，企圖在兩三星期內就把蘇聯全國集體化，而今天却消極起來，袖手旁觀，把鬥爭地盤安然讓給右傾份子，因而實行真正在富農面前退却（沒有括弧的退却！）的路線。

目前時局底特點，就在於進行反「左傾」過火份子錯誤的鬥爭，是進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順利鬥爭底條件和特殊形式。

第六個問題。應怎樣估計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莊的事實呢？

答覆。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莊的事實，就是說明最近在我們這裏產生了一些不堅固的集體農莊，這些集體農莊現時正在清出不穩定的份子。這就是說，有名無實的集體農莊行將消失，而堅固的集體農莊一定會繼續保存並日益強固。我認為這是完全正常的現象。有些同志一看見這點，就悲傷不已，張惶萬分，拚命抓住那種誇大的百分數。而另外一部分人則幸災樂禍，預言集體農莊運動「失敗」。這兩種人都是非常錯誤的。這兩種人都遠不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瞭解集體農莊運動實質的。

退出集體農莊的，首先是那些所謂紙上掛名者。這甚至不能說是退出，而不過是暴露空架子而已。我們需要紙上掛名者麼？當然不需要。我認為北高加索人和烏克蘭人解散紙上的集體農莊而組織真正實在，真正穩固的集體農莊，是做得完全對的。這樣做法只是使集體農莊運動獲益不淺。

其次，退出集體農莊的是那些異己份子，直接敵視我們事業的份子。很明顯的，把這種份子驅除得愈快，集體農莊運動也就會獲益愈多。

末了，退出集體農莊的是那些動搖份子，他們既不能叫作異己份子，也不能叫作紙上掛名者。這是我們今天還沒有說服他們相信集體農莊事業正確，但我們明天就一定會說服他們的一些農民。這種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是集體農莊運動所受到的一個嚴重損失，雖然這個損失不過是暫時的。因此，爭取集體農莊中的動搖份子，就是現時集體農莊運動最迫切的任務之一。

由此可見，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莊，並不僅是一種壞現象。由此可見，這種退出，既然清出

集體農莊中的紙上掛名者和直接異己份子，所以它是使集體農莊趨於健全鞏固的一種有益過程。

一個月以前，有人以爲穀物區中的集體化已達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現在已很明白，如果拿真正的多少穩定的集體農莊來說，那末這個數目字顯然是過甚其詞。如果在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莊以後，穀物區內集體化百分數能保留到百分之四十，——而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也就算是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極大成績了。我只拿穀物區內的平均數來說，雖然我很知道我們有個別的全盤集體化區，其集體化百分數已達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穀物區內集體化達到百分之四十，——這就是說，到一九三〇年春天，我們就把原定五年集體化計劃超過完成了一倍。

誰敢否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發展方面這個歷史成績底決定意義呢？

第七個問題。動搖的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是不是作得正確呢？

答覆。當然是作得不正確的。他們退出集體農莊，是違反了他們本身利益的，因爲只有集體農莊才使農民能擺脫貧困黑暗的狀況。他們退出集體農莊，就是把自己放在較壞的地位，因爲他們使自己得不到蘇維埃政權所給予集體農莊的優待和便利。集體農莊中的錯誤和歪曲行爲，決不能成爲退出集體農莊的理由。必須留在集體農莊內來通力合作地糾正錯誤。何況蘇維埃政權將用全力反對這些錯誤，所以糾正這些錯誤是容易做到的。

列寧說：

「商品生產下的小經濟制度，決不能使人類免除羣衆生活貧困與遭受壓迫的狀況」（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二二頁）。

列寧說：

「靠小農經濟是擺脫不了貧困境遇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四〇頁）。

列寧說：

「如果我們仍舊依靠小農莊來生活，那怕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資格來生活，也是不免要滅亡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七頁）。

列寧說：

「只有採用共同的，勞動組合制的，共耕制的勞動，才可逃出帝國主義戰爭把我們逼進去了的那種絕境」（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三七頁）。

列寧說：

「必須過渡到巨大模範農莊中的共耕制」，因為「否則不能擺脫俄國現在所處的那種經濟破壞的狀況，那種簡直是絕望的狀況」（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八頁）。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明集體農莊是使農民能擺脫貧困黑暗境遇的唯一工具。

很明顯的，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是作得不正確的。

列寧說：

「你們大家當然都從蘇維埃政權底全部工作中知道，我們非常重視農業公社，勞動組合以及一切力求把細小個體農業轉變為公共耕作農業或勞動組合農業，並逐漸促進這個轉變過程的

組織」*（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頁）。

列寧說：

「蘇維埃政權把農業公社和共耕社放到了第一位，而給了它們直接優先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九頁）。

這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明蘇維埃政權將優待集體農莊，給它們優先權，而這是個體農戶享受不到的。這就是說明蘇維埃政權無論在分發土地方面，無論在供給機器、拖拉機和種子等方面，無論在減輕賦稅方面，無論在發給貸金方面，都是要優待集體農莊的。

為什麼蘇維埃政權優待集體農莊，給它們優先權呢？

因為集體農莊是使農民能免除貧困境遇的唯一工具。

因為用優待辦法幫助集體農莊是幫助貧農中農的最切實的方式。

幾天以前，蘇維埃政權已決定把集體農莊內一切公有的工作牲畜（馬匹和牯牛等等），以及集體農莊公共所有或各莊員個人所有的乳牛，豬，羊，家禽等等，概行免稅兩年。

此外，蘇維埃政權已決定把集體農莊莊員所欠國家貸金，展期至年底償付，並把加入了集體農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莊的農民在四月一日以前被判處的一切罰款和法庭處分概行取消。

最後，蘇維埃政權已決定在本年度內必須借給集體農莊莊員以五萬萬盧布貸金。

這種優待辦法是爲了幫助集體農民。這種優待辦法是爲了幫助用中流砥柱精神擋住了退潮，在反對集體農莊敵人鬥爭中受到了鍛鍊，保住了集體農莊並緊緊撐持着集體農莊運動偉大旗幟的那些集體農民。這種優待辦法是爲了幫助現時是我們集體農莊基本中堅，將鞏固並澈底形成我們集體農莊，並把千百萬農民爭取到社會主義方面來的那些集體貧農和中農。這種優待辦法是爲了幫助現時是集體農莊基本幹部，完全值得稱爲集體農莊運動英雄的那些集體農民。

退出了集體農莊的農民是得不到這些優待的。

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是作錯了，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他們只有回到集體農莊以後，才能享受這些優待，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第八個問題。怎樣處置農業公社呢，是不是應當把它們解散呢？

答覆。不，並不應當把它們解散，而且用不着解散。我所指的是真正的農業公社，而不是紙上的農業公社。在蘇聯穀物區裏，有一些值得獎勵贊助的很好的農業公社。我所指的是舊有的農業公社，這些農業公社已經過了多年考驗，受過了鬥爭鍛鍊，早已完全證實它們有存在的資格。至於不久以前成立的那些新的農業公社，那就一定要它們是按自願原則組織起來，並得到農民羣衆積極贊助而並不強迫實行日常生活公共化，才能維持下去。

成立和主持農業公社，是一件複雜而困難的事情。一定要有經驗豐富的幹部和久經鍛鍊的領導

者，才可保證巨大而穩定的農業公社存在和發展下去。如果匆忙從事，一下子由農業勞動組合章程過渡到農業公社章程，那就只能使農民離開集體農莊運動。所以，我們對於這件事情應當特別鄭重處置，絲毫不可急躁。農業勞動組合是比較容易作到的事情，是廣大農民羣衆比較容易懂得的。因此，農業勞動組合是現時集體農莊運動最流行的形式。只有隨着農業勞動組合日益鞏固和穩固，才能造成使農民羣衆趨向於農業公社的基礎。因此，農業公社這個集體農莊運動最高形式，只有在將來才能成爲集體農莊運動底主要環節。

第九個問題。怎樣處置富農呢？

答覆。我們以上所說的，都是關於中農的話。中農是工人階級底同盟者，因此我們對中農的政策應當是親善的政策。富農却是另一回事了。富農是蘇維埃政權底敵人。我們是沒有與富農講和平，而且也不能與他們講和平的。我們對富農的政策，是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一下子就能夠消滅富農階級。但這是說我們將力謀包圍並消滅富農階級。

請看列寧關於富農怎樣說：

「富農是最殘忍，最橫暴，最野蠻的剝削者，他們在其他各國歷史上屢次恢復過地主、皇帝、神父和資本家底政權。富農人數比地主和資本家多些。但富農在人民中間到底還是佔少數：這些吸血鬼在戰時利用民衆生活困苦而發了大財，他們用提高糧食及其他農產物價格的手段刮得了成千累萬的金錢。這些蜘蛛專靠吸取戰時破產農民底脂膏，專靠吸取饑餓工人底脂膏養肥了。這些吸血鬼吮吸了勞動羣衆底血液，而且城市和工廠裏的工人越是饑餓，他們

也就越加發財。這些吸血鬼過去和現在都把地主土地抓到自己手裏，再三盤剝貧農」（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〇六至二〇七頁）。

當我們還在實行限制這班吸血鬼和蜘蛛們剝削趨向的政策時，我們是會容忍過他們的。其所以容忍了他們，是因為我們當時沒有什麼可以用來代替富農經濟，代替富農生產。現在我們已有可能用我們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經濟來代替富農經濟，而且綽綽有餘了。現在已用不着再容忍這班蜘蛛和吸血鬼了。如果再容忍這班放火焚燒集體農莊、刺殺集體農莊活動家並企圖搗亂播種運動的蜘蛛和吸血鬼，那就是違反工農利益了。

因此，我們應當用我們布爾什維克所固有的全部堅毅精神和澈底精神，來實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第十個問題。集體農莊底最近實際任務是什麼呢？

答覆。集體農莊底最近實際任務，就是要為播種而奮鬥，為儘量擴大播種面積而奮鬥，為正確組織播種事宜而奮鬥。

現在，集體農莊其他一切任務，都須適應於播種任務。

現在，集體農莊中其他一切工作，都須服從於組織播種工作。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及其非黨員積極份子究竟如何穩固，集體農莊領導者及其布爾什維克中堅幹部究竟有多大才幹，將不是按響亮決議和堂皇祝詞，而是按播種事業是否組織得當的具體事實來檢查。

可是，要光榮實現這個實際任務，就要使集體農莊工作人員轉而注意集體農莊建設事業底經濟問題，集體農莊內部建設問題。

直到最近的時候，集體農莊工作人員總是專心注意於貪求集體化高度百分數，而且不願意看見真正集體化與紙上集體化間的區別。現在，這種貪求數字的心理是應該拋棄了。現在，集體農莊工作人員應當專心注意於鞏固集體農莊，在組織上完善集體農莊，在集體農莊裏面組織切實工作。

直到最近的時候，集體農莊工作人員始終是專心注意於組織巨大集體農莊，組織所謂「巨型農場」，而這些「巨型農場」，往往變成在鄉村裏沒有什麼經濟根基的笨重的紙上機關。於是，外表工作就往往代替了切實工作。現在，這種傾心於外表的心理是應該拋棄了。現在，工作人員應當專心於鄉村集體農莊組織方面和經濟方面的工作。當這個工作獲到應有成績時，「巨型農場」就會自然而然地出現的。

直到最近的時候，人們始終是很少注意吸收中農來參加集體農莊領導工作。可是在中農中間有許多出色的主管人材，他們能夠成為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很好的經濟工作者。現在，我們工作中的這一個缺點是應該剷除了。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吸收中農優秀份子來担任集體農莊領導工作，讓他們在這個事業中發揮他們的才能。

直到最近的時候，人們始終是沒有充分注意農婦中的工作。過去這一時期的事實表明農婦中的工作是我們工作中最弱的部分。現在，這個缺點是應該堅決徹底剷除了。

直到最近的時候，某些區裏的共產黨員始終是認為他們能夠單獨解決集體農莊建設事業上的一

切任務。他們由這一觀點出發，所以也就沒有充分注意吸收非黨員份子來參加集體農莊裏的負責工作，提拔非黨員份子來參加集體農莊裏的領導工作，在集體農莊裏組織廣大非黨員積極份子。我們黨底歷史已經證明，而集體農莊建設事業過去這一時期的事實，又再度表明這種立場是根本不正確的。共產黨員如果閉關自守而與非黨羣衆隔絕，便會葬送整個事業。共產黨人在爲社會主義鬥爭中獲得了勝利，榮光遍體，而共產主義底敵人却已被打得落花流水，其原因之一，也就是因爲共產黨善於吸收非黨員羣衆中的優秀份子來參加工作，因爲他們善於在廣大非黨員羣衆中間吸取力量，因爲他們善於把廣大非黨員積極份子團結在自己黨底周圍。現在，我們在非黨員羣衆中間工作上的這個缺點，是應該堅決澈底剷除的了。

糾正我們工作中的這些缺點，根本剷除這些缺點，也就是把集體農莊底經濟工作引上軌道。總之：

- (1) 正確組織播種工作，就是現在的任務。
- (2) 把注意力集中於集體農莊運動底經濟問題，就是爲解決這個任務所必要的手段。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發
表於真理報第九十二期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你們的代表會議工作快要結束了。現在你們要通過決議了。我相信你們的決議草案一定會一致通過的。在這些決議中——你們的決議，我是略知大概的——你們將贊同一九三一年工業發展大綱，並擔負起完成這個大綱的責任。

布爾什維克所說的話，不是說得好玩的。布爾什維克總是約許了就要執行的。可是，擔起完成一九三一年大綱的責任，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保證把工業生產總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而這乃是一個很大的任務。不僅如此。你們担起這樣的責任，那就是說你們不僅約許要在四年內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這是已經解決的事情，再不要有什麼決議，——而且約許要在三年內完成有決定意義的基本工業部門方面的五年計劃。

代表會議約許完成一九三一年計劃，約許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這當然很好。但我們已經受過『辛酸經驗』的教訓。我們知道，約言並不是時常都被履行的。在一九三〇年初，也曾約許過完成該年度的計劃。當時必須把我們的工業生產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百分之三十二。但這個約言

是沒有完全履行的。事實上，一九三〇年的工業生產額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我們應當問一問：今年不會重復這種情形麼？現在，我們的工業領導者，我們的工業工作人員約許在一九三一年度把工業生產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可是，有什麼東西能擔保這次約言一定會實現呢？

爲要完成大綱，爲要把生產額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爲要不是在四年內，而是在三年內完成有決定意義的基本部門方面的五年計劃，就要有什麼條件呢？

爲此就要有兩個基本條件：

第一是要有實在的可能性，或如我們通常所謂「客觀的」可能性。

第二是要有領導各企業的志願和技能，以便把這些可能性變爲現實。

我們去年有過完成計劃的「客觀的」可能性麼？是的，是有過的。關於這一點，有許多不容置辯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些事實就是去年三四月間，工業生產額超過前年百分之三十一。試問我們爲什麼沒有完成全年計劃呢？什麼東西阻礙了這一點呢？什麼東西不夠呢？就是利用現有可能性的技能不夠。正確領導工廠礦井的技能不夠。

我們有了第一個條件，即完成計劃所必要的「客觀的」可能性。可是我們却沒充分具備有第二個條件，即領導生產工作的技能。而正因爲領導生產工作的技能不夠，所以計劃也就沒有完成。我們沒有把工業生產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三十二，而僅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當然，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長額已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一九三〇年，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底生產量都沒有什麼增長，而且現在也沒有什麼增長。相反的，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底生產

都是一落千丈的。在這樣的條件下，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長額已算是一大進步。可是，我們本來能夠增加得更多，因為我們曾有一切必要的「客觀」條件。

那末，要怎樣才可擔保不致又重復去年的怪事，才可擔保完全完成計劃，才可使所有的可能性都被我們儘量利用，才可使你們的約言不致有一部分仍舊成爲紙上空文呢？

在各國家歷史中，在各國度歷史中，在各軍隊歷史中，往往有這樣一種情形：當時雖有得勝奏捷的一切可能性，可是這些可能性並沒有加以利用，因為領導者沒有看見這些可能性，沒有善於利用這些可能性，於是軍隊也就遭受了失敗。

我們有爲完成一九三一年大綱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麼？

是的，我們有這種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是什麼呢，要有什麼條件才可把這種可能性變爲現實呢？

首先，就要我國具備有充足的天然富源：鐵礦，煤炭，石油，糧食和棉花。我們有這些東西麼？是有的。而且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些。就拿烏拉爾來說吧，烏拉爾是任何一國都沒有的富源區。鐵礦，煤炭，石油，糧食，都是樣樣俱全，應有盡有！我國除橡皮以外，是連什麼都有的。而且再過一兩年，我們就連橡皮也會有了。在這方面說來，就天然富源來說，我們是完全有保障，甚至綽綽有餘的。

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願意而且能夠推動利用這些巨大天然富源來謀人民福利的政權。我們有這樣一個政

權麼？是有的。固然，我們在利用天然資源方面的工作，有時不免遇到我們自己工作人員中間的磨擦。譬如，蘇維埃政權去年在建立第二個煤鐵根據地的問題上，不得不作一些鬥爭，而我們沒有第二個煤鐵根據地，是不能繼續向前發展的。可是我們已把這些障礙克服了。我們在最近將來就會有這個根據地了。

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這個政權受着千百萬工農羣衆的擁護。我們的政權受着這種擁護麼？是的，受着這種擁護。在全世界上再沒有那一個政權，是如蘇維埃政權這樣深受工農擁護的。我不來援引種種事實，如社會主義競賽的增長，突擊運動的發展，以及工人羣衆爲迎展工業財政計劃而奮鬥的運動。所有這些顯然證明千百萬羣衆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事實，是盡人皆知的。

爲要完成並超過一九三一年大綱，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不患資本主義那種無可醫治的病症，而又大大優越於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失業，浪費和大衆貧困，這就是資本主義無可醫治的病症。而我們的制度却不患這種毛病，因爲政權是握在我們手裏，握在工人階級手裏，因爲我們進行着計劃經濟，有計劃地積累資源，並按國民經濟各部門來加以正確分配。我們不患資本主義所患的那種無可醫治的病症。這就是我們和資本主義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優勝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而這種優勝處是有決定一切的意義的。請看資本家是想怎樣擺脫危機吧。他們盡量減低工人工資。他們盡量減低原料和糧食價格。可是他們不願多少認真減低工業品價格。這就是說，他們想用剝削主要商品消費者，用剝削本國工

農羣衆，剝削原料糧食出產國的勞動羣衆的辦法來擺脫危機。資本家自己掘毀自己立足的基地。所以結果就不是擺脫危機，而是加深危機，造成一種新的前提來釀成新的更劇烈的危機。我們的優勝處就在於我們根本沒有什麼生產過剩危機，我們沒有而且不會有幾百萬失業工人，我們沒有生產無政府狀態，因為我們進行着有計劃的經濟。不僅如此。我們的國家是工業最集中的國家。這就是說，我們能夠用最優良的技術來建設我們的工業，因而保證空前未有的勞動生產率，空前未有的積累速度。我們過去的弱點就在於我國工業是以渙散狹小農業為根據的。可是這已成爲過去了。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了。在不遠的將來，也許再過一年，我們就會成爲世界上農業規模最大的國家。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而它們也就是大農業形式——在今年出產的穀物商品，已等於全國穀物商品總額半數。這就是說，我們的制度——蘇維埃制度——使我們能按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都夢想不到的速度前進。

爲要一日千里地向前猛進，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充分團結一致，能把工人階級一切優秀份子底努力都集中於一個目標上去，富有經驗，不會見難而退，而能一貫實行正確的革命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政策的政策。我們有這樣一個政黨麼？是的，是有的。它的政策正確麼？是的，是正確的，因為這個政策使我們獲得重大的成功。這一點，現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朋友，就連工人階級底敵人也都承認了。請看吧，大家皆知的「高貴」先生——美國的菲詩，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普恩加實是如何向我們黨拚命狂吠呀。爲什麼他們這樣拚命狂吠呢？就是因為我們黨底政策正確，因為這政策使我們獲得節節不斷的勝利。

同志們，這就是使我們易於實現一九三一年大綱，使我們能在四年內，而在有決定意義部門中，甚至能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的一切可能性。

這樣，為完成計劃所必需的第一個條件，即「客觀的」可能性，我們是具備了。

我們有沒有第二個條件，即利用這種可能性的技能呢？

換句話說，我們有對於工廠礦井的正確領導麼？在這裏是百事大吉麼？

可惜不是百事大吉。我們既是布爾什維克，就應當爽直而坦白地說出這一點。

什麼是領導生產呢？我們有些人並不是常常用布爾什維克觀點來看待企業領導問題的。我們有些人往往以為領導就是簽署文件。這當然是令人痛心的，但這是事實。有時候令人不得不起謝德林小說中的瞎知事。你們記得瞎知事太太怎樣教訓瞎知事兒子的故事吧。太太對兒子說：不要用功學習呵，不要諸通事理呵，讓別人去幹這種事情吧，這不是你的事情呀，——你的事情就是領導，就是簽署文件。使我們丟臉的，就是甚至在我們布爾什維克中間，也有不少的人是專靠簽署文件來進行領導的。如果你要他們諸通事理，精通技術，變成內行，那他們就會連說幾個「不」字了。

試問：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幹過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殘酷國內戰爭中獲得了勝利的人，是把最大的工業建設任務解決了的人，是把農民引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的人，為什麼在領導生產工作方面竟會屈服於文件呢？

原因就在於簽署文件要比切實領導生產工作容易得多。於是許多經濟工作人員也就走上這條阻力最少的道路。這裏並且有我們的過咎，中央機關底過咎。在十年以前提出了一個口號：「既然共

產黨員還不充分瞭解生產技術，既然他們還須要學習管理經濟，那末就讓舊技師、舊工程師和舊專門家去管理生產吧，而你們共產黨員則不要去干預工作技術；可是，雖說不干預，但同時務必努力研究技術，努力研究生產管理學，以便將來能與忠於我們的專門家一同成為真正的生產領導者，真正的內行」。口號曾是這樣。而在實際上又是怎樣呢？結果，這個公式後一部分是被拋棄了，因為學習是比紙上署名難些，而這個公式前一部分則被人庸俗化了，「不干預」幾字竟被人曲解為拒絕研究生產技術。結果竟釀成一種胡說，危險而有名的胡說，這種胡說是擺脫得愈快愈好的。

實際生活本身再三警告過我們說，在這方面的情形不好。沙赫特案件就是第一個警號。沙赫特案件已經指明黨組織和職工會底革命警覺性是不夠的。這一事件指明我們經濟工作人員在技術知識方面，實在是落後得不成樣子；許多舊工程師和舊技師，因為沒有人監督他們的工作，就比較容易滾入暗害道路，尤其是因為國外敵人又不斷用種種「建議」來纏繞他們。「工業黨」公審案就是第二個警號。

暗害勾當底基本原因當然是階級鬥爭。階級敵人當然是瘋狂反抗社會主義進攻的。可是，單用這一點來解釋暗害勾當如此猖獗盛行的事實，那就不夠了。

暗害勾當怎麼會能這樣猖獗盛行呢？這應歸咎於何人呢？這應歸咎於我們自己。如果我們不是那樣處理生產領導事情，如果我們在更早得多以前就已開始研究工作技術，開始精通技術，如果我們更時常而恰當地干預過經濟領導工作，那末暗害份子就會作不出這樣多的暗害事情了。

要我們自己變成專門家，變成工作內行，要我們自己轉而努力學習技術知識，——這就是實

際生活推動我們來幹的事情。可是，無論第一個警號，甚至第二個警號，都還沒有保證發生必要的轉變。已經是，而且早已經是面向技術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種過時的不干預技術的舊口號，而要自己成爲專門家，成爲諸通事情者，成爲完全內行的時候了。

有人時常問道：爲什麼在我們企業裏沒有一長制呢？在我們尚未有精通技術以前，我們就沒有一長制，而且不會有一長制。在我們中間，在布爾什維克中間，還沒有充分數量熟悉技術問題、經濟問題以及財政問題的人材以前，我們就不會有真正的一長制。如果你們不精通工廠礦井底技術、經濟以及財政，那末隨便你們寫多少決議，隨便你們怎樣宣誓，也是無濟於事的，也不會有一長制的。因此，任務就是要我們自己精通技術，要我們自己成爲工作內行。只有如此，才可以保證我們的計劃完全完成；也只有如此，才可以保證一長制能見諸實現。

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這是完全可以解決的事情。科學，技術經驗，知識，——凡此種種都是可以求得的東西。今天沒有，明天就會有了。這裏的主要點就是要有布爾什維克的熱烈志願去精通技術，精通生產學。只要有熱烈志願，那就一切都可辦到，一切都可解決了。

人們有時發問：難道不可稍許減低速度，延緩進展速率麼？不行的，不可以的，同志們！決不可減低速度！恰巧相反，還必須竭力和儘可能增加速度哩。我們在蘇聯工農面前所負的義務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在全世界工人階級面前所負的義務要我們這樣做。

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但我們不願挨打。不，我們絕對不願意！舊俄羅斯底歷史，其中有一點就是常因落後而挨打。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的

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它。英法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爵士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它落後。因為它的軍備落後，文化落後，國政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這既可獲利，又不致受到報應。你們記得革命前期的一位詩人底語句吧：「羅斯媽媽呵：你又豐富，你又單薄；你又強大，你又軟弱」。這些老爺們是把舊時詩人底這一段話背得很熟的。他們一面打着，一面又笑罵道：「你既然豐富」，那就不妨靠你發財。他們一面打着，一面又笑罵道：「你既然單薄軟弱」，那就可以隨便打你搶你。打擊落後者，打擊弱者，——這就是剝削者底法則。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法則。你落後了，你軟弱無力麼，那你就算是無理，於是也就可以打你，可以奴役你。你強大有力麼，那你就算是有理，於是就得小心對待你。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不可再落後。

在過去，我們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祖國的。但是現在，當我們已推翻資本主義，而我國政權又是工人政權時，我們已有祖國，而且我們將堅持其獨立。你們願不願讓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被人打破而喪失獨立呢？如果你們不願意，那你就應當在最短時期內消滅它的落後狀況，而開展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速度。除此而外，再沒有別的辦法。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在十月革命時說過：「或是滅亡，或是趕上並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以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以內跑完這個距離。或者是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或者就是我們會被人打翻。

這就是我們在蘇聯工農面前的義務所要求於我們的。

可是，我們還有其他一種義務，更鉅大更重要的義務。這就是我們在世界無產階級面前的義務。這種義務是與第一種義務相符合的。但我們却把這種義務看得更高。蘇聯工人階級是世界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我們所以勝利了，不僅是由於有蘇聯工人階級努力，而且是由於有世界工人階級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擁護，那我們就會早被粉碎了。人們說，我國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底突擊隊。這當然說得很好。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就擔負有極重大的義務。國際無產階級為什麼擁護我們呢？我們為什麼配受這種擁護呢？就是因為我們最先動手去與資本主義交鋒，我們最先建立了工人政權，我們最先開始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就是因為我們所做的事情一經成功，就會翻轉整個世界而解放全體工人階級。可是要怎樣才能達到這個成功呢？就是要剷除我國落後情況，加強布爾什維克高度建設速度。我們應當如此前進，使全世界工人可以望着我們說道：看哪，這就是我們的先鋒隊，這就是我們的突擊隊，這就是我們的工人政權，我們的祖國，他們幹着他們自己的事情，也就是幹着我們大家的事情，他們幹得好，讓我們大家來幫助他們反對資本家，並促進世界革命事業吧。我們應當不辜負世界工人階級這種厚望麼，應當履行我們在他們面前的義務麼？是的，是應當的，如果我們不願完全丟臉的話。

這就是我們的義務，我們的國內義務和國際義務。

你們看，就是這些義務要我們採取布爾什維克的發展速度。

我並不是說我們近幾年來在經濟領導工作方面沒有絲毫成績。有的，而且很多。我們已把工業出產量增加到超過戰前一倍了。我們已創立起世界上最大的農業生產。可是，如果我們在這個時

期中努力認真精通了生產，精通了生產技術，精通了生產底財政和經濟，那我們就會能作出更多的成績來。

我們至多是在十年當中就要跑完我們落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我們有一切「客觀的」可能性來做到這一點。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技能。而這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的。並且只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已經是學會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不干預生產工作的腐敗方針的時候了。已經是領會另一個方針，即適合現時期的要干預一切的新方針的時候了。你既是個工廠經理，就得干預一切事務，就要熟悉一切而連什麼也不要忽略過去，就得學習，再三學習。布爾什維克應當精通技術。已經是布爾什維克自己成為專門家的時候了。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一個担任經濟工作的人，竟不願意研究技術，不願意精通技術，那就是鬧笑話，而不是經濟工作人員了。

有人說，精通技術是一件困難事情。這是不對的！布爾什維克是無堅不摧，無攻不克的。我們已解決了許多最困難的任務。我們已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我們已取得了政權。我們已創立了極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已把中農引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建設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已經做成了。剩下來要我們做的事情，已經是不多了：就是要研究技術，精通科學。而當我們做到這步時，我們就會有我們現在夢想不到的速度。只要我們真正願意這樣幹，我們是一定會做到這步的！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從這次會議所有材料當中可以看出，我們各工業部門執行計劃的情形是十分參差不齊的。在過去這五個月當中，有些工業部門出產量比去年同時期內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有些工業部門却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最後，還有個別工業部門增加得極少極少，即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或且增加得更少。屬於最後這一種工業部門的，有採煤業與黑色金屬冶鑄業。你們看，情形是參差不齊的。

為什麼有這樣參差不齊的情形呢？為什麼某些工業部門落後呢？為什麼某些工業部門只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而採煤業與黑色金屬冶煉業增加得更少，因而落後於其他部門呢？

就是因為近來工業發展條件已經根本改變了，已形成了一種要求採取新式領導方法的新環境，而我們的某些經濟工作人員，却沒有改變工作方法，仍然拘守成規，按照舊方式工作着。所以問題就在於保證工業發展的新條件本來是要求採用新式工作方法，而我們有些經濟工作人員却不瞭解這一點，不瞭解現在有採用新式領導方法之必要。

這就是我國工業某些部門落後的原因。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新條件，究竟是什麼呢？這些新條件是怎樣形成的呢？

這些新條件至少有六個。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這些條件吧。

(二) 勞動力

首先就是要保證各企業勞動力的問題。從前，工人照例都是自動跑進到工廠裏來，所以當時在這件事情方面是有過某種自流动性。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有失業人口，有農民分化，有貧困，有逼迫人們離鄉進城的飢餓恐怖。你們大概還記得所謂「鄉下佬從鄉下逃進城裏去」的公式吧？當時有什麼東西迫使農民從農村裏跑進城市呢？就是因為有飢餓恐怖，因為有失業，因為當時農民覺得農村是他們的後母，而總想逃開她，隨便逃到什麼地方去，只要找得到一點什麼工作就行了。

在不久以前，我國情形曾是如此，或者幾乎是如此。

可以說我國現在的情形也是這樣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恰巧相反，現在環境已經根本變更了。正因為環境已經變更了，所以我們也就再沒有勞動力自流动性了。在這一時期，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更呢？第一，我們已經消滅了失業現象，因而也就消滅了壓迫「勞動市場」的力量。第二，我們已根本打破了農民分化的現象，因而也就消除了驅使農民由農村逃到城市的普遍貧困現

象。最後，我們用數萬架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了農村，擊潰了富農，組織了集體農莊，使農民有像人類那樣來生活和工作的可能。現在已經不可把農村叫作農民的後母了。正因為不可把它叫作後母，所以農民便留在鄉裏安居樂業，於是在我們這裏也就沒有『鄉下佬從鄉下逃進城裏去』的現象，也就沒有勞動力自流性了。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已有了完全新的環境和保證各企業勞動力的新的條件。

但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第一個結論，就是現在已不可再指望於勞動力自流性了。這就是說，應當拋棄自流『政策』，而採取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來供工業需要的政策。可是，要做到這步，就只有一個辦法，即各經濟組織與集體農莊和集體農莊莊員們訂立合同的辦法。你們知道，某些經濟組織和集體農莊已經開始採用這種辦法，而且實際經驗已經表明訂立合同的辦法，無論對於集體農莊或工廠企業，都是有功效的。

第二個結論，就是必須立刻實行把最繁重的生產手續機械化，並儘量開展這件事情（例如木材工業，建築業，採煤工業，裝卸工作，運輸業，黑金冶煉業等等）。這當然不是說要拋棄手工勞動。恰巧相反，手工勞動還會長期在生產中發生極大作用的。但這是說：生產手續機械化，是我們所應實行的一個新穎的和有決定意義的辦法，否則不能支持我們的發展速度，也不能維持我們的新的生產規模。

我們還有不少經濟工作人員，他們是『不相信』機械化，也『不相信』各企業與集體農莊訂立

合同的。這就是那些不懂得新環境，不願意按新方式去工作，而眷戀着勞動力「自流」到企業中來的「舊日黃金時代」的經濟工作人員。不待說，這種經濟工作人員是與我們在新環境中所負的新的經濟建設任務相隔天壤的。他們大概認為勞動力方面的困難是一件偶然事情，認為缺乏勞動力的現象將會自行消滅，將會按所謂自流方式消滅下去。這是錯誤的想法，同志們。勞動力方面的困難，決不會自行消滅。這種困難是只有靠我們自己努力工作，才可消滅的。

總之，任務是要用與集體農莊訂立合同的辦法，來有組織地招收工人，同時要把生產手續機械化。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一個新條件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二個條件。

(二) 工人工資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來供我們各企業需要的問題。可是，招收工人還不能完全了事。爲要保證我們各企業都有勞動力，還須把工人固定在生產中，使企業裏工人成份相當固定起來。沒有相當精通了技術，熟習了新式機械的固定工人成份，便無法前進，便無法完成生產計劃，這是無待證明的。沒有這種固定工人成份，就會要每次都來重新教導新的工人，就會要把一半時間用去教導新的工人，而不是用去進行生產。現在我們所有的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可以說我

們各企業裏工人成份是相當固定的麼？可惜還不可這樣說。恰巧相反，在我們各企業裏，還有所謂勞動力流動性。而且在許多企業裏，勞動力流動性不僅沒有消滅，反而增長，反而加強起來了。無論如何，在半年當中，或者甚至在第一季當中，沒有至少是百分之三四十的工人成份變更的企業，是不多見的。

從前在工業恢復時期，我們的技術設備還不複雜，生產規模還不宏大，尚可稍許「容忍」所謂勞動力流動性。現在情形却不同了。現在環境已經根本改變了。現時在擴展改造時期，生產規模已經擴大，技術設備已是極端複雜了，於是勞動力流動性也就成了妨害生產的奇災大禍，足以紊亂我們企業了。在現時還「容忍」勞動力流動性，就會瓦解我國工業，消滅完成生產計劃的可能，破壞改善產品質量的可能。

勞動力流動性底原因何在呢？

就在於工資定得不對，就在於工資標準定得不對，就在於工資方面有一種「左的」平均主義。我們許多企業裏現行的工資標準，幾乎是把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繁重勞動與輕易勞動間的差別完全抹煞了。因為有這種平均主義的現象，於是不熟練的工人也就不樂於變為熟練工人，因而喪失了上進的前途，於是他就覺得自己是這企業裏的「臨時住客」，只是暫時在這裏做做工，「賺幾個錢」，而過後就跑到別處去「尋找幸福」。因為有這種平均主義的現象，於是熟練工人也就不得不從一個企業跑到別一個企業，以便終於找到一個能夠真正重視熟練勞動的企業。

由此就有「普遍」流行的那種從一個企業跑到別一個企業的現象，就有勞動力流動性。

要消滅這種禍害，就須取消平均主義，打破舊的工資標準。要消滅這種禍害，就須定出適當的工資標準，注意到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繁重勞動與輕易勞動間的差別。熟練展鐵工人所得的工資與掃地工人所得的工資相等的情形，是不可容忍的。火車司機師所得的工資與抄寫人所得的工資相等的情形，是不可容忍的。馬克思和列寧說過：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甚至在階級消滅以後，也還會存在的；這種差別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會消滅；因此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資」也應按各人勞動來發給，而不應按各人需要來發給。可是，我們那些經濟工作人員和工會工作人員中的平均主義者，却不同意這點，而認為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下，這個差別已經消滅了。究竟是誰說得對呢？是馬克思和列寧呢，還是平均主義者呢？大概是馬克思和列寧吧。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誰在現時忽略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而根據平均主義「原則」來規定工資標準，誰就是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列寧主義。

在每個工業部門中，在每個企業中，在每個車間中，都有一部分主要的較為熟練的工人，我們如果真想保證企業裏有固定的工人成份，就應當首先而且主要是把他們固定在生產中。他們這一部分主要工人，就是生產工作底基本環節。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固定在車間中，也就是固定全體工人，而根本剷除勞動力流動性。可是，怎樣才可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呢？要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就一定要提拔他們上進，提高他們的工資水準，正確規定工資標準，使各工作人員熟練程度都能得到應有的報酬。而提拔他們上進，提高他們的工資水準，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除其他一切而外，還要使不熟練的工人有上進的機會，使他們有力求上進的刺激，力求變為熟練工人的刺

激。你們自己知道，我們現在需要有幾十萬幾百萬熟練工人。要培養熟練工人，就須使不熟練的工人有力求上進的刺激和前途。我們愈是大胆這樣辦，結果也就會愈好，因為這是消滅勞動力量流動性的基本方法。在這件事情上節省金錢，就等於作惡犯罪，而違反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利益。

但這還不能概括一切。

爲要把工人固定在企業裏，還須更加改善工人給養和居住條件。固然，我們近幾年來在住房建築和工人給養方面，已作了不少的事情。可是，我們所已作到的，還完全不夠滿足工人們迅速增長的生活需要。決不可藉口說什麼從前住房比現在少些，因此也可以用已有的成績來安慰自己。也不可藉口說什麼從前工人給養比現在不知要壞多少，因此也就可以認爲現有情形已算滿足。只有那些腐化的，完全腐朽了的人，才能藉口往事來妄自安慰。不要用往事來做標準，而要拿現在工人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來做標準。必須瞭解，我國工人生存條件已根本改變了。現在的工人已不是從前那樣的工人了。現在的工人，我們蘇聯的工人，希望滿足他們自己一切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就是說，他們既要有充足的糧食，又要有安適的住所，而且還要有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各種需要的保證。他們有享受這些幸福的權利，而我們則負有保證他們這些條件的義務。固然，他們已不復遭受失業痛苦，已擺脫了資本主義桎梏，已不是奴隸，而是自己事業的主人了。可是這還不夠。他們還要求滿足他們一切物質上和文化上的需要，而我們也就應該滿足他們這種要求。你們不要忘掉，現在我們自己也向工人提出一些要求，要求他們遵守勞動紀律，努力工作，實行社會主義競賽，進行突擊運動。你們不要忘掉，絕大多數工人已用無限熱忱接受了蘇維埃政權這些要求，並英勇地執行

着這些要求。既然如此，無怪工人們在執行蘇維埃政權這些要求時，也要求蘇維埃政權履行它所負的義務，即更加改善工人物質和文化生活的義務。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消滅勞動流動性，消滅平均主義，正確規定工資，改善工人生活條件。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二个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三個條件。

(三) 勞動組織

上面我已經說過必須消滅勞動流動性，要把工人固定在企業中。可是，單只把工人固定起來，還不能概括一切。單只消滅流動性，還是不夠的。除此而外，還須使工人處在相當的勞動條件下，使他們有可能來好好工作，提高生產率，改善產品質量。所以，必須在企業內適當地組織勞動，使生產率能夠一月高似一月，一季高似一季。

可以說現在我們企業中的勞動組織實況已適合於現代生產要求麼？可惜還不可這樣說。無論如何，我們總還有一些企業，那裏的勞動是組織得很不好，在那裏並不是秩序井然，工作協調，而是茫無頭緒，雜亂無章；那裏所流行的，並不是各負專責的情形，而是全不負責和無人負責的現象。

什麼是無人負責現象呢？無人負責現象就是對所担任的工作，以及對機器、機架和工具不負任何責任。在無人負責現象盛行時，當然是談不到什麼真正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產品質量，愛惜機器，愛惜機架，愛惜工具的。你們知道無人負責現象在鐵路運輸業方面引起了什麼結果。這種無人負責現象在工業中也正引起同樣的結果。我們在鐵路運輸業方面已消滅了無人負責現象，而提高了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在工業方面也應當這樣做，以便把這方面的工作提到更高程度。

不正確的勞動組織，是與無人負責以及各人對所担任具體工作不負責任的現象相處得來的。從前，靠這種不正確的勞動組織，還可以勉強「過得去」。現時的情形却就不同了。現在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在現今生產規模已經擴大，已經有了許多巨型企業的時候，無人負責現象便是危害我國工業的奇災大禍，能使我們各企業內一切生產上和組織上的成績都受到莫大危險。

為什麼無人負責現象竟能在我們某些企業裏根深蒂固起來呢？它是不正當地跟着不斷生產制混進企業中來的。如果說不斷生產制一定要引起生產中的無人負責現象，那就錯誤了。如果勞動組織得正確，如果每個人都對一定工作負責，如果指定一部分工人來經常使用一定的機器和機架，如果輪流班次安排得正確，各班質量和熟練程度彼此相等，那末不斷生產制就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工作質量，根本剷除無人負責現象。譬如鐵路運輸業中的情形就是如此，現在鐵路運輸業中雖實行着不斷生產制，可是無人負責現象却已不復存在了。可以說我們工業企業裏的不斷生產制實行情形，也是如此順利麼？可惜還不能這樣說。這是因為在我們有些企業裏，把不斷生產制實行得太匆忙了，沒有預備好相當條件，沒有適當地佈置質量和熟練程度多少相等的生產

班，沒有使每人都對每一具體工作負責。結果就使不斷生產制聽天由命而變成無人負責現象了。結果在許多企業裏就有紙上的口頭的不斷生產制，以及非紙上的實在的無人負責現象。結果就使人們對工作沒有責任心，不愛惜機器，讓機架大批毀壞，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刺激。無怪工人說：『我們本來很願意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工作質量，可是現在既然誰也不對任何事情負責，試問誰會看重我們呢？』。

由此可見，我們某些同志在某些地方把不斷生產制實行得過分匆忙了，因而也就曲解了不斷生產制，把它變成了無人負責現象。要消滅這種情形，要消滅無人負責現象，就只有兩條出路。或者是仿照鐵路運輸業方面的先例，把實行不斷生產制的條件改變，使其不致變成無人負責現象。或者是在現時還沒有實行不斷生產制的順利條件的地方，仿照斯大林格拉拖拉機工廠在不久以前所作出的例子，拋棄紙上的不斷生產制，暫時轉到六日生產制，並準備一些必要條件，以便日後可以再來實行真正的非紙上的不斷生產制，再來實行那不會有無人負責現象的不斷生產制。

其他出路是沒有的。

凡此一切，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當然都是十分懂得的。可是，他們却寧願默不做聲。為什麼呢？大概是因為害怕真情。可是，試問布爾什維克從什麼時候起竟害怕起真情來了呢？在某些企業內，不斷生產制已變成了無人負責現象，於是不斷生產制也就被曲解到了極點，這難道不是實情麼？試問誰需要這樣的不斷生產制呢？誰敢說，保存這種被曲解了的紙上不斷生產制的利益，是比正確組織勞動的利益重要些，是比發展勞動生產率的利益重要些，是比真正不斷生產制底利益重要些。

些，是比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利益重要些？我們把紙上的不斷生產制取消得愈快，我們實現真正而非紙上的不斷生產制也就愈快，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有些同志認為只要咒罵一頓，說幾句響亮話，就可剷除無人負責現象。據我所知，有些經濟工作人員反對無人負責現象的時候，只是常常在大會上把無人負責現象咒罵一頓，大概是以爲說罷這些話以後，無人負責現象就會自行消滅，就會按所謂自流方式消滅的。如果他們認爲單靠演說和咒罵，就可從實際工作中剷除無人負責現象，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不，同志們，無人負責現象始終不會自行消滅的。只有我們自己能夠而且應當消滅無人負責現象，因爲我們執掌着國家政權，我們對於一切事情都應負責，就連無人負責現象也在其內。我認爲，如果我們的經濟工作領導者不是從事於空談和咒罵，而是親自留在礦場或工廠裏——譬如說——考察一兩個月，研究勞動組織方面的一切細節和「小事」，在事實上把那裏的無人負責現象消滅，然後把這些企業方面的經驗傳佈到其他各企業中去，那就會好得多了。就會簡直不知要好多少了。就會是真正爲反對無人負責現象而鬥爭，爲用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正確組織勞動而鬥爭，爲在企業裏正確佈置勞動力而鬥爭了。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消滅無人負責現象，改善勞動組織，在企業裏正確佈置勞動力。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三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四個條件。

(四) 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智識界問題

一般工業指揮幹部，特別是工程技術人材的情形也變更了。

從前我國全部工業底基本來源，是烏克蘭煤鐵區。當時，我國所有一切工業區，無論是南俄也好，或莫斯科和列寧格拉也好，都是由烏克蘭供給鋼鐵的。同時，我們蘇聯所有一切基本企業所需要的煤炭，也是由烏克蘭供給的。這裏我把烏拉爾除開不講，因為烏拉爾當時所有的比重要比頓巴斯小得多。這樣，我們在當時是有三個培養工業指揮幹部的基本策源地：南俄，莫斯科區，列寧格拉區。很明顯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靠我國當時所有的那種最低限額的工程技術人材，是還可以勉強過得去的。

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如此。

可是，我們現在已有完全另外一種環境了。我認為，現在我們要支持現今的發展速度和宏大生產規模，單靠烏克蘭煤鐵根據地，已是顯然不夠了。你們知道，雖然烏克蘭煤鐵出產量日益增多，可是烏克蘭的煤鐵已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了。你們知道，我們因此也就不不得不在東方創立一個新的煤鐵根據地，即烏拉爾—庫茲巴斯區。你們知道，我們現在創立這個根據地，不是沒有成效的。可是這還不夠。我們還須在西伯利亞本地創立冶金業來滿足當地速增的需要。而且我們已在創立它了。此外，我們還須在卡查赫斯坦和土耳其斯坦創立一個新的有色金屬冶煉業根據地。最後，我們還須開展極廣大的鐵路建設工程。這是蘇聯全國利益，各邊疆共和國利益和中心區域利益所要求的。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我們從前尙覺足夠的那種最低限度數量的工程技術人材和工業指揮人材，現在已經不夠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舊有的培養工程技術人材的策源地已經不夠了，必須在烏拉爾，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一帶，創立一大批新的策源地。如果我們現在真正要實現蘇聯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計劃，那我們就須使我們有更多三倍五倍的工程技術人材和工業指揮人材。

可是，我們並不是需要隨便一種工業指揮人材和工程技術人材。我們所需要的是能瞭解我國工人階級底政策，能領會這個政策，並決意誠懇把它實現起來的那種人材。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國已經走入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此時工人階級應當造就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即能維護它這個統治階級在生產中的利益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向來無論那一個統治階級，都一定要有它自己的智識界。蘇聯工人階級當然也一定要有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蘇維埃政權注意到這點，所以極力吸收工人階級份子到國民經濟各部門高級學校去學習。你們知道，現在我國高級學校裏學習的有幾十萬農青年。從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高級學校是少數公子獨佔的場所，而現時在蘇維埃制度下，農青年却是高級學校裏的統治力量了。毫無疑義的，我們在最近將來就會從我們各高級學校裏獲得成千數的新的技師和工程師，我國工業的新的指揮員。

但這還只是問題底一方面。問題底另一方面，就在於組成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智識界的，不僅會有高級學校畢業生，而且還會有我們企業裏的實際工作人員，熟練工人，工廠礦井裏的工人階級

文化人材。社會主義競賽底發起人，突擊隊底隊長，勞動高潮底實際提倡人，各部分建設工作底組織者——這就是工人階級底新進階層，這個階層也就應當協同高級學校畢業同志來組成工人階級智識界底核心，我國工業指揮人材底核心。我們的任務就是不要埋沒這些富有首倡精神的同志，而要更大胆提拔他們去擔任指揮職務，使他們有表現其組織才能的機會，使他們有充實其知識的機會，並且不惜花費金錢來給他們造成相當的環境。

這些同志們中間有不少的非黨員同志。但這並不能妨礙我們更大胆提拔他們去擔任領導職務。恰巧相反，正是應當特別關心他們這些非黨員同志，應當提拔他們去擔任指揮職務，使他們根據事實來確信我們黨重視有才幹有本事的工作者。有些同志認為只有黨員同志才可提拔來擔任工廠領導職務。於是他們就往往埋沒那些有才能有首倡精神的非黨員同志，而把黨員同志提到首位，那怕這些黨員同志才能較少，沒有首倡精神。不消說，這種所謂「政策」是愚蠢而反動到極點的。這種「政策」只能破壞我黨威信，而使非黨員工人離開我黨，這是不必證明的。我們的政策，並不是要把黨變成閉關自守的門閥。我們的政策，是要黨員工人與非黨員工人間保持有「相互信任」的空氣，「相互審查」的空氣（列寧）。我們黨在工人階級中間享有隆重威信的原因之一，也就在於我們黨正是實行着這樣的政策。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我們蘇聯工人階級有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四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五個條件。

(五) 舊生產技術智識界中轉變的徵象

關於究竟怎樣對待舊資產階級生產技術智識界問題，也須有另一種提法。

兩年以前，我國舊技術智識界中最熟練的那一部分，是患着暗害病的。而且當時暗害勾當是一種時髦。有些人親自進行暗害勾當，另外有些人掩護這些暗害份子，有一部分人袖手旁觀和保守中立，還有一部分人則在蘇維埃政權與暗害份子之間動搖不定。當然，舊技術智識界中的大多數人仍然還是多少忠順地工作。但這裏所講的不是大多數，而是技術智識界中最熟練的那一部分人。

暗害運動究竟是由什麼所造成，是由什麼所培植起來的呢？就是由於蘇聯國內階級鬥爭尖銳化，由於蘇維埃政權對城鄉資本主義份子實行進攻政策，由於這些資本主義份子反抗蘇維埃政權政策，由於國際形勢複雜，由於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建設中有困難。如果說戰鬥部分的暗害份子積極性是由資本主義各國帝國主義者底武裝干涉陰謀以及我們國內的糧食困難所支持，那末另一部分舊技術智識份子向積極暗害份子方面的動搖，却是由那些胡說八道的托洛茨基份子和孟什維克們底時髦論調所加強起來，他們硬說「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橫直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說「蘇維埃政權橫直是會蛻化而且很快就要倒台的」，說「布爾什維克自己的政策就是促進武裝干涉的」等等。並且，既然右傾份子中間的某些老布爾什維克也沒能擋住「時風」而在當時離開了黨，那末從來沒有開過布爾什維主義氣味的一部分舊技術智識份子也蒙上天保佑而誤入了迷途，又何足怪呢。

很明顯的，在這種情形下，蘇維埃政權所能對舊技術智識界採取的唯一政策，便是粉碎積極損害份子，分化中立份子，吸引忠順份子。

一兩年以前的情形，便是如此。

可以說我們現在的環境也與當時完全相同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恰巧相反，我們現在的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首先，我們已擊破了城鄉資本主義份子，並且正在順利地消滅他們。這當然不能使舊智識界感到歡喜。也許他們還對他們這些已被擊破的朋友們流着同情淚哩。可是，同情者，尤其是中立者和動搖者，在他們這些積極活動的朋友們遭到很厲害的無可挽救的失敗以後，決不會甘願與他們這些朋友遭受同樣的命運。其次，我們已克服了糧食困難，而且不僅克服了困難，並且還輸運大批糧食出口，其數量之多，是蘇維埃政權存在以來所未曾有過的。於是，動搖份子所支持的這一「論據」，也陷於破產了。其次，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得見，我們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建設方面達到了極大的成功，獲得了確定不移的勝利。於是舊智識界「武庫」中最主要的東西，也就完全顛覆了。至於資產階級智識界對武裝干涉的希望，那就要承認這種希望已成了——至少是暫時成了——海市蜃樓。真的，人們約許實行武裝干涉已經六年了，可是武裝干涉一次也沒有敢於嘗試過。現在已經應當承認，我們的高明的資產階級智識界，不過是受騙上當而已。至於積極損害份子在有名的莫斯科公審案中的行為，本來應當而且真正已把暗害思想埋葬，那就更不必說了。所有這些新情況，當然不能不影響到我國舊技術智識界。新的環境本應在舊技術智識界中造成一種新的情緒，而且真正造成了這種新情緒。正因為如此，所以從前同情過暗害份子的那一

部分舊智識份子，已有開始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一定表現。現在不僅這一部分舊智識份子，而且那些明顯的昨天的暗害份子，昨天的暗害份子中的頗大一部分人，也開始在許多工廠裏與工人階級協力工作的事實，就是顯然證明舊技術智識界中的轉變過程已經開始了。這當然不是說我們這裏已沒有暗害份子了。當然不是。暗害份子仍然還是有的，而且當我國還有階級存在時，當還有資本主義包圍時，暗害份子在將來也還會有的。但這是說，既然舊技術智識界中頗大一部分從前這樣或那樣同情過暗害份子的人，現在已開始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那末剩下的積極暗害份子已是不多，已陷於孤立，而且不得不暫時深深隱藏起來了。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我們對於舊技術智識界的政策，也應該依此而改變。從前在暗害勾當猖獗盛行時期，我們對待舊技術智識界的態度，主要是表現於粉碎政策，而現時在這個智識界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時期，我們對待它的態度，主要就應表現於吸收和開明它的政策了。如果在已經改變的新條件下還繼續實行舊政策，那就是荒謬而不合辯證法了。如果現在幾乎把每個舊專門家和舊工程師當作尚未拿獲的犯人和暗害份子看待，那就是愚蠢而不合理了。在我們這裏，「反專門家主義」向來都是被看作，而且現在仍然是被看作有害和可恥現象的。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改變對舊工程技術人材的態度，多多關注和開明他們，更大胆吸收他們來參加工作。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五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最後一個條件。

(六) 論經濟核算制

爲使情形完全明顯起見，我還要說到一個新條件。這就是供給工業，供給國民經濟的資金積累來源問題，怎樣加緊這種積累速度的問題。

從資金積累方面看來，我國工業發展中的新的特殊的現象是什麼呢？這種新現象就是舊積累來源已不能充分保證工業繼續發展了。就是我們如果真想保持並加強布爾什維克的工業化速度，便要找得新的積累來源，加強舊的積累來源。

我們考察資本主義各國歷史，便可知道無論那一個想把自己的工業提到更高階段的新起國家，都不免要有外國的幫助，即長期的信貸或借款。西方各國資本家有鑒於此，所以完全不肯給予我國絲毫信貸和借款，以爲我國工業化事業得不到信貸和借款，就一定會遭受失敗的。可是資本家們失算了。他們沒有估計到我們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區別，殊不知我們國家有一種特別的積累來源，足以恢復並繼續發展工業。而且我們確實不僅恢復了工業，不僅恢復了農業和運輸業，並且已在順利實行着改造我國重工業，農業和運輸業的壯舉。當然，我們舉辦這件事情，是花費了幾百萬盧布的。試問這幾百萬盧布是從何處得來的呢？是從輕工業方面，農業方面，預算上的積累方面得來的。我們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如此。

現在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了。從前，舊的積累來源是足夠來改造工業和運輸業的，而現在這些積累來源，却已顯然不夠了。現在的問題並不是要改造舊工業。現在的問題，是要在烏拉爾、西伯

利亞和卡查赫斯坦一帶建立技術設備精良的新工業。現在的問題，是要在蘇聯各穀物區、養畜區和原料出產區建立大規模的新農業生產。現在的問題，是要建築一批橫貫蘇聯東西兩部的新鐵路。舊的積累來源，當然是已不能夠供應這種壯舉了。

不僅如此。此外，還要注意到一點，就是在我們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由於用一種浪費辦法來經營的結果，經濟核算的原則已被破壞無餘。事實上，有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的人早已忘從事於計算、估價及擬製正確收支對照表的工作。事實上，有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的人早已忘掉「節省」、「減少無謂費用」和「生產合理化」一類的概念。他們顯然是指靠着國家銀行「橫直會給我們撥發必需的經費」。事實上有許多企業中的生產成本費近來已開始提高。他們不僅沒有依照計劃規定，把成本費減低百分之十以至百分之十以上，反而把成本費提高了。而什麼是減低成本費呢？你們知道：把成本費減低百分之一，就等於在工業內部多積累一萬五千萬至二萬萬盧布。所以很明顯的，提高成本費，就是使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喪失數萬萬盧布。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我們已不可專靠輕工業，專靠預算上的積累，專靠由農業方面得到的收入了。輕工業是一個極豐富的積累來源，而且它現在也大有繼續發展的可能，可是這個積累來源不是沒有止境的。農業也是一種豐富的積累來源，可是在目前農業改造時期，農業本身也需要國家資助。至於國家預算上的積累，那末你們自己知道這種積累是不能夠而且也不應當沒有止境的。還有什麼呢？還有重工業。所以，必須設法使重工業——首先是機器製造業——也能拿出積累來。所以，除加強並擴展舊積累來源而外，同時還要設法使重工業——首先是機器製造業——也能拿出積累來。

這就是我們的出路。

爲此就要怎樣辦呢？就要消滅浪費現象，盡量動用工業內部的資源，在我們所有一切企業內施行並鞏固經濟核算制，有系統地減低成本費，在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工業部門裏加強工業內部的積累。

這就是達到出路的途徑。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施行並鞏固經濟核算制，提高工業內部的積累。

(七) 用新的方式來工作，用新的方式來領導

同志們，以上便是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新條件。

這些新條件底意義，就在於它們爲工業造成了新的環境，要求我們用新的方法來工作，用新的方法來領導。

由此可見：

(1) 現在已不可再像從前那樣指望勞動力自流性了。要保證工業勞動力，就必須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並使勞動手續機械化。如果以爲我們不必實行機械化，便能支持我們的建設速度和生產規模，那就等於希望可用匙子吸盡海水了。

(2) 其次，現在已不可再容忍工業中勞動力的流動性了。要免除這個禍害，就必須按新方法來規定工資，使企業裏的工人成份相當固定起來。

(3) 其次，現在已不可再容忍生產工作中無人負責的現象了。要免除這個禍害，就必須按新方法來組織勞動，適當地佈置力量，使每一部分工人都對工作，對機器，機架以及工作質量負責。

(4) 其次，現在已不可像從前那樣專靠資產階級俄國所遺留給我們的一種為數極少的舊工程技術人材了。要提高現時的生產速度和生產規模，就必須使工人階級有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5) 其次，現在已不可再像從前那樣把所有一切舊專門家和舊工程技術人材看成一丘之貉了。要適應已經改變的環境，就必須改變我們在這方面的政策，盡量關注那些顯然轉向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的專門家和工程技術人材。

(6) 最後，現在已不可像從前那樣專靠舊有的積累來源了。要保證工農業繼續發展，就必須動用新的積累來源，消除浪費現象，施行經濟核算制，減低成本費，提高工業內部的積累。

這就是保證工業發展的新條件，要求我們採用新的工作方法，採用新的領導經濟建設的方法。爲了實現新式領導，就要怎樣辦呢？

首先，就要我們的經濟工作領導者瞭解新環境，具體研究那些保證工業發展的新條件，適應於新的環境要求來改造我們的工作。

其次，就要我們經濟工作領導者不是「一般地」領導企業，不是「從空中」領導企業，而是具體

切實地領導企業；就要他們不是根據一般空談，而是以嚴格求實態度來對待每一個問題；就要他們不限於紙上敷衍搪塞或一般辭藻和口號，而要精通工作技術，熟悉工作詳情，熟悉『小事情』，因為現在大事情是由『小事情』積成的。

其次，就要把我們現有的龐大的聯合局（現在一個聯合局往往包括有一兩百個企業）立刻分小，分成幾個聯合局。一個聯合局主席兼管着一百個以至一百個以上的工廠，當然是無法切實知道這些工廠及其生產能力和工作狀況的。他既然不知道工廠，當然也就不能領導這些工廠。所以，爲了使各聯合局主席有可能真正研究工廠情形，領導工廠，就須使他們卸脫太多的工廠，就須把一個聯合局分成幾個聯合局，使聯合局與工廠接近。

其次，就要我們各聯合局由集議管理制過渡到一長管理制。現在的情形是聯合局委員會照例都有十個以至十五個委員坐在那裏，寫公文，作辯論。同志們，這樣的管理方法是不可繼續下去的。必須停止紙上的『領導』，而去進行真正切實的布爾什維克的工作。留下一個主席和幾個副主席來主持聯合局，就完全足夠來管理聯合局了。其他的委員，最好是派到下層去，派到工廠中去。這無論對於他們自己，無論對於事情本身，都會是有益得多的。

其次，就要聯合局主席和副主席常常去巡視各工廠，更多花些時間留在那裏工作，更仔細認識工廠中的工作人員，不僅要教導當地工作人員，而且要向他們學習。如果以爲現時可以坐在遠離工廠的管理處裏，從辦公室裏領導工廠，那就是錯誤的想法了。要領導工廠，就須時常與廠內工作人員接洽，與他們維持活的聯繫。

最後，我要簡略說一說我們一九三一年的生產計劃。有些在我黨周圍踱來踱去的庸人，硬說我們的生產計劃是不實在的，是不能完成的。這正好似謝德林小說中愛說廢話的「怪聰明的小魚」一樣。我們的生產計劃是不是實在呢？是絕對實在的！這個生產計劃是實在的，至少是因為我們具備有完成這個計劃所必需的一切條件。這個生產計劃是實在的，至少是因為現在這個計劃底完成，全靠我們自己，全靠我們是否能夠，是否願意利用我們所有的極豐富的可能性。如果不然，那為什麼許多企業和工業部門已經超過完成了原定計劃呢？如果以為生產計劃就是一張數字表和工作任務一覽表，那就是愚蠢的想法了。其實，生產計劃是千百萬人底活的實際行動。我們的生產計劃底實在性，就是創造新生活的千百萬勞動者。我們的生產計劃底實在性，就是活的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的勞動意志，我們按新方法來工作的決心，我們執行計劃的決心。我們有這種決心麼？是的，有這種決心。所以，我們的生產計劃也就是可能而且應當實現的。（鼓掌多時）。

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敬重的同志們！

我提出堅決抗議，反對你們把斯魯茨基標題為布爾什維克論戰前遭受危機時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那篇半托洛茨基主義的反黨論文，當作討論的文章刊載於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一九三〇年第六期）上的這種舉動。

斯魯茨基硬說：列寧（布爾什維克們）輕視過德國及一般戰前社會民主黨內中派主義底危險，就是說輕視過暗藏機會主義底危險，輕視過對於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底危險。換言之，照斯魯茨基說來，列寧（布爾什維克們）沒有對機會主義進行過不可調和的鬥爭，因為輕視中派主義，實際上就是拒絕對機會主義進行擴展的鬥爭。這樣說來，列寧在戰前時期還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而是直到帝國主義大戰時期，或且是直到這次大戰結束時，才成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斯魯茨基在他自己的論文中就是這樣瞎說的。你們不僅不痛斥這個新出台的「歷史家」所幹的誹謗和偽造的行爲，反而去和他進行討論，供給他說話的講壇。我不能不提出抗議，反對你們把斯魯茨基論文當作討論

的文章刊載於你們雜誌上的舉動，因為決不可把列寧底布爾什維主義立場問題，列寧是否對中派主義這種機會主義作過不調和的原則鬥爭，列寧會是否是真正布爾什維克的問題，變成討論的對象。

你們在你們十月二十日呈交中央委員會的「編輯部聲明」內承認說：編輯部把斯魯茨基論文當作討論的文章發表出來，是一個錯誤。這當然很好，雖然編輯部底聲明是出現得太遲了的。可是你們在你們的聲明中又犯了一個錯誤，因為你們在聲明中宣稱：「編輯部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上繼續闡明一切有關於布爾什維克與戰前第二國際間相互關係的問題，是政治上十分迫切必要的事情」。這就是說，你們又立意把人們拉去討論那些本是布爾什維主義定理的問題。這就是說，你們又立意把列寧底布爾什維主義立場問題，由定理變成爲尚須「繼續闡明」的問題。爲什麼呢？根據什麼理由呢？大家知道，列寧主義正是在對各色機會主義作無情鬥爭中產生、長大和鞏固起來的，其中包括有對西方中派主義（考茨基）以及對我國中派主義（托洛茨基等等）所作的無情鬥爭。這一點是甚至布爾什維主義底公開敵人也不能否認的。這是定理。而你們却把我們拉向後退，企圖把定理變成爲尚須「繼續闡明」的問題。爲什麼呢？根據什麼理由呢？也許是因為你們要實行腐敗自由主義，想使斯魯茨基和其他的托洛茨基門徒不能說人家禁止他們說話吧？真是很奇怪的一種用犧牲布爾什維主義切身利益爲代價來實行的自由主義呵！

究竟編輯部認為在斯魯茨基論文裏有什麼東西值得討論呢？

（一）斯魯茨基硬說：列寧（布爾什維克們）沒有進行過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者，與戰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決裂分裂的路線。你們想進行討論來反對斯魯茨基這一托洛茨基主義的提

綱。但這裏有什麼東西值得討論呢？斯魯茨基分明是在誹謗列寧，誹謗布爾什維克，這難道不很明白麼？誹謗是須加以痛斥，而不應把它變成討論對象的。

每個布爾什維克——如果他真正是布爾什維克——都知道還在大戰很久以前，約從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起，當布爾什維克派已在俄國形成，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初露頭角的時候，列寧就進行了與機會主義者決裂分裂的路線，無論在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裏，亦無論在第二國際（包括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內）中，都進行了這個路線。每個布爾什維克都知道：正因為如此，所以第二國際中的機會主義者還在當時（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年）就給布爾什維克加上了一個『分裂主義者』和『搗亂派』的頭銜。可是，既然社會民主黨左派自己當時在第二國際，首先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裏是個軟弱無力的集團，在組織上沒有形成，在思想上沒有素養，甚至害怕說出『決裂』和『分裂』字眼的集團，那末當時列寧究竟能有什麼辦法，布爾什維克究竟能有什麼辦法呢？大概是不可要求列寧，要求布爾什維克從俄國去替左派在西方黨內造成分裂吧。我還不說，組織上和思想上的軟弱，不僅在戰前時期是社會民主黨左派底特點。大家知道，這個弱點甚至在戰後時期也還是在左派方面保存着的。大家知道，列寧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即是在大戰開始兩年多以後所寫的那篇標題為論尤尼烏斯所著一書的有名論文中，對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作了個估計，在這裏，列寧批評了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所犯的許多最嚴重的錯誤，而說到了『德國所有一切左派份子軟弱無力的情

• 尤尼烏斯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底首領盧森堡。

形，他們在各方面都被考茨基那種可鄙的虛偽態度、學究氣以及對機會主義者的「友愛態度」緊密纏繞着；在這裏，列寧說「尤尼烏斯還沒有完全擺脫德國那些甚至是左派的社會民主黨人底『包圍』，這些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是害怕分裂的，是害怕澈底說出革命口號的」。

當時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派別中間，只有俄國布爾什維克才是具有豐富組織經驗和思想素養，而能採取一種嚴重辦法去與自己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者公開實行分裂，公開實行分裂的派別。如果斯魯茨基輩縱然不是企圖來證明，而只是企圖來假定說列寧和俄國布爾什維克沒有運用所有一切力量去與機會主義者（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唐恩）實行分裂，把中派主義者（托洛茨基及其他的八月聯盟派份子）驅逐出去，那末，關於列寧底布爾什維主義立場問題，關於布爾什維克底布爾什維主義立場問題，也許還有爭論的餘地。可是，問題就在於斯魯茨基輩絲毫不敢提及這種荒謬的假定。其所以不敢，是因為他們懂得，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一九〇四至一九一二年間）實行過與各色機會主義者決裂的堅決政策的那些盡人皆知的事實，是大聲反對這種假定的。其所以不敢，是因為他們懂得，他們立刻就會受到痛斥的。

於是就發生一個問題：如果俄國布爾什維克沒有進行過與第二國際中的機會主義者及中派主義者實行決裂分裂的路線，那他們是否能在帝國主義大戰很久以前（一九〇四至一九一二年）就實現了與本國機會主義者及中派調和主義者的分裂呢？當時俄國布爾什維克認為他們對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所採取的政策是西方左派所應仿效的政策模範，這一點有誰能夠懷疑呢？當時俄國布爾什維克竭力推動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包括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在內——去與其本國機會

主義者及中派主義者實行決裂，實行分裂，這一點有誰能夠懷疑呢？至於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竟沒有成熟到效法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地步，那就怪不得列寧和俄國布爾什維克了。

(2) 斯魯茨基責備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說他們沒有堅決逕直贊助過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而只是在嚴重的附帶條件下贊助過這個左派，又說派別組織性的計較妨礙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去徹底贊助這個左派。你們想進行討論來反對這種完全捏造的騙人的責難。但這裏究竟有什麼東西值得討論呢？斯魯茨基是在這裏玩弄手腕，想以提出來反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捏造責難，去掩飾德國左派立場中的真正過失，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往往是在布爾什維主義和孟什維主義間動搖不定的，所以布爾什維克除非提出一些嚴重的附帶條件，除非嚴格批評他們的錯誤，便不能贊助他們，否則便是背叛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革命，這難道不很明白麼？騙人手腕是須加以痛斥，而不應把它變成討論對象的。

是的，布爾什維克只是在一定嚴重附帶條件下才贊助過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同時批評了他們的半孟什維主義的錯誤。可是因此就應稱讚布爾什維克，而不應加以責難。

有人懷疑這一點麼？

讓我們來看看最明顯的歷史事實吧。

(甲)一九〇三年，俄國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在黨員資格問題上的嚴重意見分歧暴露出來了。當時，布爾什維克想用他們自己關於黨員資格的定義來造成一種組織上的屏障，防止非無產者份子湧進黨內來。因為當時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所以非無產者份子湧進黨內來的

危險是非常實在的。俄國孟什維克堅持了相反的立場，主張爲非無產者份子大開入黨之門。因爲俄國革命底各個問題對於世界革命運動有重要意義，於是西歐社會民主黨人就決定來干預此事。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巴烏斯和盧森堡，即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當時的首領，也出而干預此事。結果怎樣呢？他們兩人都表示反對布爾什維克，而且責備布爾什維克有過分集中主義和布朗基主義的趨勢。後來孟什維克也就附和了這種卑劣的市僧的誣蔑論調，把它散佈於全世界。

(乙)一九〇五年，俄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俄國革命性質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開展起來了。布爾什維克堅持了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的思想。布爾什維克斷言：必須力謀成立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以便在保證貧農贊助下，立刻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而俄國孟什維克則排斥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思想，寧願採取與自由資產階級妥協政策，而反對工農聯盟政策，竟認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是與資產階級革命發展相矛盾的反動布朗基主義方案。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巴烏斯和盧森堡當時是怎樣對待這種爭論的呢？他們造作出一種空想的半孟什維主義的不斷革命方案（對於馬克思革命方案的畸形曲解），澈頭澈尾充滿了孟什維克否認工農聯盟政策的精神，並把這個方案拿來與布爾什維克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方案對立。後來托洛茨基（馬爾托夫部分地）也就附和了這個半孟什維主義的不斷革命方案，把它變成了反對列寧主義的武器。

(丙)大戰前夜時期，在第二國際各黨裏顯現出來了的最迫切問題之一，就是民族和殖民地問題，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問題，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解放問題，反帝鬥爭的道路問題，推翻帝國主

義的道路問題。布爾什維克爲擴大無產階級革命和國攻帝國主義起見，提出了根據民族自決原則來援助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政策，發揮了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及被壓迫國民族革命解放運動結成一戰線的方案。於是，各國機會主義者，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和社會帝國主義者，立刻發動起來反對布爾什維克。他們把布爾什維克當作瘋狗來攻擊。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當時採取了什麼立場呢？他們發揮了半孟什維主義的帝國主義論，排斥了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自決原則（一直到實行分立而組織獨立國家爲止的民族自決原則），駁斥了認爲殖民地和被壓迫國解放運動有嚴重革命意義的提綱，駁斥了認爲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統一戰線可能實現的提綱，並把這整個完全輕視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半孟什維主義糊塗思想拿來與布爾什維克底馬克思主義方案對立。大家知道，後來托洛茨基也就附和了這種半孟什維主義的糊塗思想，把它利用爲反對列寧主義的鬥爭武器。

這就是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所犯的一些盡人皆知的錯誤。

我還不說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所犯的其他種種在列寧相當論文中受到嚴厲批評的錯誤。

同樣，我還不說他們估計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時期政策時所犯的那些錯誤。

從戰前歷史中引來的德國左派所犯的這些錯誤，難道不是證明左派社會民主黨人雖有其左派性，但還沒有擺脫孟什維主義行囊麼？

當然，德國左派不僅有其嚴重的錯誤。他們同時也有一些巨大而嚴重的革命功業。我所指的就是他們在內政問題上，例如在選舉鬥爭問題上，在國會鬥爭和國會以外鬥爭問題上，在總罷工問題

上，在戰爭問題上，在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問題上等等，都有許多功績和革命言行。正因為如此，布爾什維克才把他們當作左派看待，贊助他們，推動他們前進。可是，這並不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一件事實：就是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同時也有許多極嚴重的政治錯誤和理論錯誤，他們沒有擺脫孟什維主義的貨色，因此也就需要布爾什維克給他們一個極嚴重的批評。

現在請你們自己評判一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既然不肯背叛工人階級利益，既然不肯背叛革命利益，既然不肯背叛共產主義，那末他們怎能不提出一些嚴重的附帶條件，不嚴格批評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所犯的錯誤，而就去予以贊助呢？

斯魯茨基把他（如果他是個布爾什維克的話）所應因以稱讚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事實用來非難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於是也就徹底暴露出他自己是個半孟什維克，是個暗藏托洛茨基份子，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斯魯茨基竟假定說，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在估計西方左派時，是根據自己的派別組織性的計較出發的，這就是說，俄國布爾什維克是為謀他們自己的派別組織利益而犧牲了偉大的國際革命事業。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假定是卑污下賤到極點的。其所以卑污到極點，是因為現在甚至孟什維克中間那些露骨的卑鄙份子也開始瞭解到，俄國革命並不是俄國人底私事，恰巧相反，它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底事業，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事業。其所以下賤到極點，是因為現在甚至第二國際中間那些專以造謠中傷為業的人也開始瞭解到，布爾什維克始終一貫的徹底革命國際主義立場，是昭示於世界各國工人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模範。

是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把俄國革命底根本問題，如政黨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態度問題，工農聯盟問題，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國會的鬥爭和國會外的鬥爭問題，總罷工問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帝國主義問題，民族自決問題，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解放運動問題，援助這個運動的政策問題等等，提到了首位。他們把這些問題提出來作為檢驗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革命堅定性的試金石。他們有權這樣來作麼？當然是有權這樣來作的。不僅有權這樣來作，而且應該這樣來作。其所以應該這樣來作，是因為所有這些問題，同時又是世界革命底根本問題，而布爾什維克正是以世界革命任務為其政策和策略準則的。其所以應該這樣來作，是因為只有根據這些問題，才可以真正檢驗第二國際各派別底革命性。試問這裏究竟有什麼俄國布爾什維克底「派別組織性」呢？試問這究竟與「派別組織性的」計較有何相干呢？

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間，就在他所著做什麼？一書中寫過：「歷史現在向我們提出的最近的任務，是比其他任何一國無產階級所有一切最近任務都更要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把歐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而且是把亞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結果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為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自從做什麼？一書出版以來，已經有三十年了。誰也不敢否認，這一時期中的事變已燦爛證實了列寧底這一段言論。可是，從這裏豈不是應得出結論說，俄國革命曾經是（而且現在還是）世界革命底樞紐，而俄國革命底根本問題同時也曾是（而且現在還是）世界革命底根本問題麼？

只有根據這種根本問題，才可以真正檢驗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底革命性，這難道不很明白麼？誰把這些問題看作「派別組織性的」問題，誰就是徹底暴露他自己是個卑鄙小人和蜕化變節份子，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3) 斯魯茨基硬說：現在還沒有找到充分數量的正式文件，可以證明列寧（布爾什維克們）對中派主義進行過堅決不調和的鬥爭。他把這個官僚主義提綱當作一種無可反駁的論據，來證明他說什麼可見列寧（布爾什維克們）輕視過第二國際裏中派主義危險的那種議論。你們着手討論來反對這種荒謬議論，反對這種騙人把戲。但這裏究竟有什麼東西值得討論呢？斯魯茨基是極力用什麼文件的廢話來掩飾他那所謂立場底貧乏和虛偽，這難道還不很明白麼？

斯魯茨基認為現有的黨文件還不足夠。為什麼呢，根據什麼理由呢？難道第二國際以及俄國社會民主黨黨內鬥爭方面那些盡人皆知的文件，還不足以十分確鑿證明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用革命的不調和精神進行了反對機會主義者和反對中派主義者的鬥爭麼？斯魯茨基究竟看見過這些文件沒有呢？他還需要什麼文件呢？

假定除了大家已經知道的文件而外，又會找到一大堆其他的文件，譬如布爾什維克再三說明必須消滅中派主義的決議。這是不是說，只要有一些紙上文件，就足以證明布爾什維克用真正革命精神和真正不調和態度對待過中派主義呢？除了無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而外，還有誰能專靠紙上文件呢？除了檔庫老鼠而外，還有誰不懂得爲要審查黨和首領，首先就須根據他們的行動，而不只是根據他們的宣言呢？歷史上有過不少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樂意簽署任何革命決議去搪塞那些討厭的批

評者。但這還不是說他們實行過這些決議。再則，歷史上還有過不少的社會主義者，他們說得滿口涎沫，要求其各國工人黨採取最革命的動作。但這還不是說他們在他們自己的黨內或他們自己的國家內，沒有屈服於他們自己的機會主義者和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難道不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教導我們說，在審查革命黨派別和首領時，不要根據他們的宣言和決議，而要根據他們的行動來審查麼？

斯魯茨基如果真想審查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是否用不調和精神對待過中派主義，那末他在他這篇文章中，就不應當以個別文件和兩三封私信為根據，而是要以布爾什維克底行為，布爾什維克底歷史，按布爾什維克底行動來審查布爾什維克為根據，這難道不很明白麼？難道在我們俄國社會主義黨裏沒有過機會主義者，中派主義者麼？難道布爾什維克沒有對所有這些派別進行過堅決不調和的鬥爭麼？難道這些派別不是無論在思想上或組織上，都與西方機會主義者及中派主義者有聯繫麼？難道布爾什維克不是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左派集團都更徹底擊潰了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麼？既然如此，試問怎麼可以說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輕視過中派主義危險呢？為什麼斯魯茨基竟忽視了這些對於估計布爾什維克有決定意義的事實呢？為什麼他沒有運用按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底行為動作來審查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這種最可靠的方法呢？為什麼他寧願採用了在偶然碰着的紙堆中翻來翻去的這種較不可靠的方法呢？

這是因為假如採用按布爾什維克底行動來審查布爾什維克的這種較更可靠的方法，馬上就會根本推翻斯魯茨基底整個立場。

這是因爲假如按布爾什維克底行爲來審查布爾什維克，就會表明布爾什維克是世界上唯一的革命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徹底擊破了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把他們逐出黨外去了。

這是因爲假如以布爾什維克底實際行爲和實際歷史爲根據，就會表明斯魯茨基底老師托洛茨基份子是在俄國培植了中派主義，並爲此而建立了一個專門組織——八月聯盟——作爲中派主義策源地的主要和基本的集團。

這是因爲假如按布爾什維克底行爲來審查布爾什維克，就會完全揭破斯魯茨基是個偽造我黨歷史的人，他企圖用誣蔑責備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輕視過中派主義危險的手段，來掩護戰前托洛茨基主義底中派主義立場。

編輯同志們！斯魯茨基和他那篇文章的情形，就是如此。

你們由此便可知道，編輯部容許和這個偽造我黨歷史的人進行討論，就算是犯了錯誤。

什麼東西竟能推動編輯部走上這條不正確的道路呢？我認爲，推動編輯部走上這條道路的，是現時在一部分布爾什維克中間頗爲流行的那種腐敗的自由主義態度。有些布爾什維克認爲托洛茨基主義是共產主義運動內的派別，固然是個犯了錯誤的，做了不少愚蠢事情的，有時候甚至是反蘇維埃的，但總還是共產主義運動內的派別。於是就對托洛茨基份子和具有托洛茨基主義思想的人採取一種自由主義態度。顯然用不着證明，這樣一種看待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是極端錯誤而有害的。其實，托洛茨基主義早已不復是共產主義運動內的派別了。其實，托洛茨基主義是進行鬥爭反對共產主義運動，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那個反革命資產階級底前鋒隊。

是誰給予了反革命資產階級一種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精神武器，如說我國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提綱，說布爾什維克必然蜕化的提綱等等呢？這種武器是托洛茨基主義所給予它的。有一件決非偶然的事實，就是蘇聯境內所有一切反蘇維埃集團在企圖論證他們不免要進行反蘇維埃政權鬥爭時，總是援引托洛茨基主義所說我國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說蘇維埃政權必然蜕化，說資本主義一定會恢復的著名提綱。

是誰給予了蘇聯境內反革命資產階級一種策略武器，如舉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公開發動的嘗試呢？這種武器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試圖在莫斯科和列寧格拉舉行反蘇維埃示威的托洛茨基份子所給予它的。事實是如此：托洛茨基份子所舉行的反蘇維埃發動，鼓舞了資產階級底精神，放縱了資產階級專門家庭暗害工作。

是誰給予了反革命資產階級一種組織武器，如設立秘密反蘇維埃組織的嘗試呢？這種武器是組織了自己那個反布爾什維克的非法團體的托洛茨基份子所給予它的。事實是如此：托洛茨基份子所進行的秘密的反蘇維埃工作，便利了蘇聯境內各個反蘇維埃集團在組織上的形成。

托洛茨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底前鋒隊。

正因為如此，所以對托洛茨基主義，那怕是對已被擊潰的暗藏的托洛茨基主義採取自由主義態度，就是魯莽昏聩到極點，幾乎是犯罪，幾乎是叛變工人階級。

正因為如此，所以某些『著作家』和『歷史家』企圖把暗藏的托洛茨基主義廢物私販到我們文壇上來的行爲，就應當受到布爾什維克方面堅決的回擊。

正因為如此，所以決不容許去和托洛茨基主義的私販者進行文字上的討論。我覺得，托洛茨基主義私販者中的『歷史家』和『著作家』，暫且是企圖在兩方面進行其走私勾當的。

第一，他們力圖證明列寧在戰前時期輕視過中派主義危險，於是就讓那些幼稚的讀者去妄加推測，以為那末列寧在當時還不是真正的革命家，而是直到大戰以後，即在托洛茨基幫助下『改換武裝』以後，才成了真正的革命家。斯魯茨基可算是這類私販者底標本代表人物。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斯魯茨基及其同流，是不值得我們與之長久周旋的。

第二，他們力圖證明列寧在戰前時期沒有瞭解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於是就讓那些幼稚的讀者去妄加推測，以為那末列寧在當時還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而是直到大戰以後，即在托洛茨基幫助下『改換武裝』以後，才瞭解了這一轉變的必然性。聯共（布）黨史教本作者瓦洛色維奇可算是這類私販者底標本代表人物。固然，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經寫過：『我們將立刻從民主革命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恰巧是依照我們的力量為標準，依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為標準，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停頓的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固然，這類事實和文件在列寧著作中是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可是，難道瓦洛色維奇願意理會列寧生平事業中的事實麼？瓦洛色維奇輩著作文章，是為了要塗着一層布爾什維克的顏色來偷運他們自己的反列寧主義的私貨，誹謗布爾什維克，偽造布爾什維克黨歷史。

你們由此就可知道，瓦洛色維奇輩和斯魯茨基輩原是一丘之貉。

這就是托洛茨基主義私販者們底「道路和歧途」。

你們自己知道，把討論壇供給這一類「歷史家」去便利他們的走私勾當，這並不是編輯部所應作的事情。

據我看來，編輯部底任務是要把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問題提到應有的高度，把我黨歷史研究工作放在科學的布爾什維主義的軌道上，叫大家加強注意力去反對那些托洛茨基主義的和其他一切偽造我黨歷史的人，有系統地揭破他們的假面具。

其所以更加必須這樣作，是因為甚至在我們的歷史家中（我所指的，是沒有括弧的歷史家，我們黨中的布爾什維克歷史家），也有些人犯了替斯魯茨基輩和瓦洛色維奇輩助長聲勢的錯誤。可惜，這裏就連雅羅斯拉夫斯基同志也不是例外，他所主編的聯共（布）黨史教科書，雖然有相當優點，但也包含有許多原則性的和歷史性的錯誤。

此致

共產主義敬禮！

斯大林

一九三一年發表於《無產階級革命》
雜誌第六期（第一百一十三期）

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報告——

（一）五年計劃底國際意義

同志們！當五年計劃出現的時候，人們未必預料到五年計劃能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反之，當時有許多人都認為五年計劃是蘇聯私自的事情，固然是一件重要的和嚴重的事情，但總是蘇聯私自的一國的事情。

可是歷史表明了，五年計劃有無限偉大的國際意義。歷史表明了，五年計劃不是蘇聯私自的事情，而是整個國際無產階級底事情。

還在五年計劃尚未出現很久以前，當我們還在結束着我們反對武裝干涉者的鬥爭，而開始實行過渡到經濟建設軌道的時期，列寧就已說過：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有深刻的國際意義；蘇維埃政權在經濟建設道路上每一步的進展，都在資本主義國家各種各樣的階層中遇到深刻的反應，並把人們分成兩個營壘——一個是擁護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營壘，另一個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營壘。

列寧在當時說道：

『目前，我們主要是用我們的經濟政策來影響着國際革命。所有的人，全世界各國所有的勞動者，都注視着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的確是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例外，而且這絲毫也不是過甚其詞。這一層已經達到了：在這方面的鬥爭是有全世界意義的。我們一解決這個任務，那我們就是一定和最終地在國際範圍內獲得了勝利。因此，經濟建設問題對於我們真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這個戰線上，我們應當用慢慢的，逐漸的，——求速是不行的，——但是一往直前的上升和進展，來取得勝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一〇至四一一頁）。

列寧說這話的時候，我們還在結束我們反對武裝干涉者的戰爭，我們還在實行由反對資本主義的軍事鬥爭過渡到經濟戰線上的鬥爭，過渡到經濟建設的時期。

從那個時候起，已經過去許多年了，而蘇維埃政權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每一步驟，每一年，每一季，都燦爛地證實着列寧同志這些話底正確。

可是，把列寧這些萬分正確言論證實得最明顯的，却是我們的五年建設計劃，這一計劃底產生，這一計劃底發展，這一計劃底實現的確，在我國經濟建設道路上，無論那一個步驟，大概都是沒有像五年計劃及其發展和實現問題那樣在歐美國亞三大洲資本主義國家各種各樣的階層中，遇到如此深刻的反應。

最初，五年計劃在資產階級及其報章方面遇到的是嘲笑。『空想』，『夢囈』，『烏托邦』，這就是他們當時給予我們五年計劃的稱呼。後來，當他們已開始看見五年計劃實現過程產生

出實在結果的時候，便敲起警鐘來，硬說五年計劃會危及資本主義各國底生存，硬說五年計劃底實現將使歐洲市場充滿商品，將使傾銷政策加強，將使失業現象加深。後來，當所利用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這套把戲也沒有獲得預期的結果時，便有各種公司、報館、各種社團等等各種各樣的代表，接踵遊歷蘇聯，想親眼看看蘇聯底情形究竟怎樣。我在這裏不說工人代表團，他們是自五年計劃最初出現時起，就表示欽佩蘇維埃政權底創舉和成功，就表示決意擁護蘇聯工人階級的。

自此時起，所謂輿論界，資產階級出版界，各種資產階級社團等等，就開始發生分裂。有一些人硬說五年計劃已經完全破產，說布爾什維克已瀕於滅亡。而另外有些人却說：布爾什維克雖是些壞人，但他們的五年計劃尚能成事，他們大概會達到自己的目的。

說到這裏，也許不妨引證引證資產階級各種機關報底評論吧。

例如，就拿美國的紐約時報來說吧。該報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末寫道：

『五年工業計劃抱有打破任何比例觀念的目的，且無論如何都要達到這個目的，『不管代價如何』，如莫斯科往往傲然自誇的那樣。其實這並不是什麼計劃，而不過是投機的把戲』。

這樣說來，五年計劃甚至不是個計劃，而是一種空洞的投機把戲。又如英國資產階級的每日電訊報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末評論道：

『如果把五年計劃看作實行『計劃經濟』的嘗試，那我們就應當說它已完全失敗了』。
紐約時報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評論道：

『集體化事業已遭到可恥的失敗。它已使俄羅斯瀕於饑荒了』。

波蘭資產階級的波蘭報在一九三二年夏季評論道：

『按實際情形來看，蘇維埃政府及其農村集體化政策，似已陷入絕境』。

英國資產階級的財政時報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評論道：

『斯大林及其黨所實行的政策，結果已使他們處在五年計劃體系破產及其所應實現的一切任務概遭失敗的面前了』。

意大利的政治雜誌評論道：

『如果以爲一萬六千萬的人民四年來的工作，布爾什維克制度這樣一個強大的制度四年來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非凡努力沒有作出這一點事情來，那就荒謬了。相反的，他們已作出了許多事情：可是，奇災大禍畢竟已成爲有目共觀的事實。這是朋友和仇敵，布爾什維克和反布爾什維克，左傾反對派和右傾反對派，都已確信無疑的』。

最後，美國資產階級的現代史雜誌評論道：

『所以，吾人考察俄羅斯目前狀況以後，就應得出結論說：五年計劃按其所標榜的目的來說，尤其是按其基本社會原則來說，都已遭失敗』。

這就是一部資產階級刊物底評論。

對於這些評論的作者，未必值得加以批評吧。我想是不值得的。其所以不值得，是因為這些『硬頭』人物是如中古時代掘出的頑石一類的東西，在他們看來，事實是沒有意義的，無論我們這裏怎樣實現五年計劃，他們也橫直是要固執己見的。

我們現在再來看這個資產階級營壘裏其他機關刊物上的評論吧。

法國著名的資產階級報紙時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評論道：

『蘇聯不藉外資幫助而實行工業化，也就是證明它已贏得了第一局』。

這個時報在一九三二年夏季又評論道：

『共產主義用極快速度完成其改造事業，而資本主義制度却只能緩步前進；法國因為地產分散於無數小私有者之間，農業機械化是無法實行的；但蘇維埃却使農業工業化而解決了這個任務；布爾什維克和我們比賽中成了勝利者』。

英國資產階級的圓桌雜誌評論道：

『五年計劃底成績是一種驚人現象。哈爾科夫和斯大林格兩城的拖拉機工廠，莫斯科阿摩汽車工廠，尼什涅城汽車工廠，德涅泊水電站，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和庫茲涅茨克兩地的巨大鋼鐵廠，烏拉爾許多機器製造廠和化學廠——烏拉爾日益變成蘇聯的魯爾——所有這一切成績以及全國其他各種工業成績，都證明蘇聯工業好像灌溉優良的植物一樣，不管有何種困難，還是日益增長，日益鞏固起來；五年計劃為蘇聯將來發展奠定了基礎，非常加強了蘇聯底實力』。

英國資產階級的財政時報評論道：

『機器製造業方面所達到的成績，是絲毫不容置疑的。他們在報章和演說中稱讚這些成績，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不要忘记，從前俄羅斯所出產的，只是些極簡單的機器和工具。固然，就是在目前，機器和工具輸入額絕對數目，也還在增加；可是進口機器與蘇聯本國所製機

器數目相比較，却不斷減少。現在，蘇聯製造着本國冶煉工業和電氣工業所必需的一切裝置品。它已經創立了本國的汽車工業。它已創立了製造一切工具和儀器的工業，由很準確的最小儀器起，直到最笨重的壓榨機爲止。在農業機器方面，蘇聯已經不依賴於國外輸入了。同時蘇聯政府正設法使五年計劃四年實現的事業不致因煤鐵出產遲誤而受到阻礙。毫無疑義，新建築的巨型工廠是能保證重工業產品大量增加的。奧國資產階級的新自由報在一九三二年初評論道：

『布爾什維主義是可以咒罵的，可是必須知道它。五年計劃是一個新的龐然大物，必須加以注意，至少是必須顧到它在經濟方面的意義』。

英國資本家，『領地聯合銀行』總經理基勃遜、札爾維在一九三二年十月評論道：

『我要聲明，我並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布爾什維克，而始終是一個資本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俄羅斯正向前進展着，而我們這裏却大批大批工廠停閉，約有三百萬失業業者完全無法找到工作。人們曾嘲笑五年計劃，預言它必遭失敗。但你們可以相信，在五年計劃條件下所達到的實際結果，已超過原來的規定：在我所遊歷過的一切工業城市中，都有新區域出現，這些新區域，按照一定計劃築成，其中有用樹木和花園所點綴的寬廣街道，有最新式的樓房，有學校，有醫院，有工人俱樂部，當然免不了還有許多替女工照顧孩子的托兒所和幼稚園：不要輕視俄羅斯人的計劃，不要以爲蘇聯政府會遭受失敗：今日的俄羅斯是一個精神煥發，理想深遠的國家，俄羅斯是積極性非常濃厚的國家。我相信俄羅斯所抱定的志向是健全

的：也許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俄羅斯全體青年和全體工人，都具有一件可惜現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所缺少的東西，——這件東西就是希望」。

美國資產階級的民族雜誌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評論道：

『五年計劃在四年內獲得了真正卓絕的成績。蘇聯用戰時強度從事於創造新生活基礎的建設任務。國家面貌簡直已改變到不可認識的地步：莫斯科便是如此，這裏有成百數的新數柏油的街道，新設立的美麗花園，新落成的樓房，附近有新建設的市鎮，有林立於城邊的新工廠。其他較小城市也是如此。甚至在荒原沙漠地帶，也有許多新城市出現，並且不是幾個城市，而至少當在五十以上，其中居民約由五萬至二十五萬人不等。所有這些城市都是最近四年來產生的，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或幾個新建的工廠，開發天然富源，製造各種產品。幾百個新區電站以及如德涅泊爾電站一類的許多巨型電站，使列寧所說『社會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電氣化』這一公式，逐漸見諸實現：蘇聯已設立了無數種新的生產部門，大批出產着舊俄所從未出產的許多物品：拖拉機，康拜因機，上等鋼，人造橡皮，珠球滑輪，巨型發動機，具有五萬瓩發電能力的渦輪機，電話裝置品，供鑛業用的電力機，飛機，汽車，腳踏車以及幾百種新機器等等：在俄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開採鋁、鎂、磷灰石、碘、鉀以及其他許多貴重礦物。蘇聯平原底指路標，已經不是十字架和教堂圓頂，而是積穀倉與穀草垛。在集體農莊裏建築着房屋，牲畜棚和豬欄。電氣已深入於農村，無線電和報紙已普及於農村。工人正在學習使用最新機器。青年農人在生產方面使用着最新式農業機器，這種機器比美國任何時候所見

過的更巨大，更複雜。俄羅斯已開始『用機器來思想』了。俄羅斯正在迅速由木器時代進到鋼、鐵、三合土和摩托時代』。

英國『左派』改良主義的前進雜誌在一九三二年九月評論道：

『特別惹人注目的是蘇聯所進行的偉大建設工作。新的工廠，新的學校，新的電影院，新的俱樂部，新的高大樓房，——到處都有新的建築物。其中許多工程已經落成，還有許多尚在建築中。要把最近兩年來已經完成的工作和繼續進行的工作，都向英國讀者一一敘述出來，是很困難的。要相信這一切，就得親眼去看。吾人在戰時所達到的成績，與蘇聯現時建設工程相比，真是不足掛齒。美國人承認說：即在美國西部各州最興奮的創造時期，也絲毫未嘗有像蘇聯目前這樣熱烈創造努力的地方。蘇聯最近兩年來的變化既然這樣多，那末再經過十年工夫，其進展之偉大，自難設想了：請你們拋棄頑固而盲目造謠誹謗蘇聯的英國報紙所敘說的那些可怕的神話吧！請你們拋棄淺見的智識份子所散佈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論和感想吧！這些智識份子完全不知道蘇聯實在情形，却以中產階級眼光來小視蘇聯，以至於散佈這樣似是而非的言論和感想：『蘇聯是根據健全原則建設着新社會。爲要實現這個目的，就須不怕危險，就得用世界上空前未有的熱忱和毅力來工作，就得設法克服他們力求在與其餘世界隔絕的廣大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時無法避免的莫大困難。』可是，我在兩年內第二次遊歷蘇聯以後，却得到了這樣一個印象，就是蘇聯是在切實前進着，努力計劃着，努力創造和努力建設着，而且規模極大，真好像是要和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實行比賽哩』。

這就是資產階級營壘裏所發生的意見分歧和分裂，其中有些集團主張消滅蘇聯及其照他們說來已經失敗的五年計劃，而另外一些集團顯然是主張與蘇聯實行商業合作，大概是希望由五年計劃成績當中取得一些利益。

至於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對於五年計劃問題，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問題的態度，却是一個要特別去講的問題。每年都有許多外國工人代表團到蘇聯來參觀，這裏我們只要引證比利時工人代表團底評論做例就夠了。比利時工人代表團所作的這個評論，足以代表任何一國工人代表團所作的評論，無論英國代表團或法國代表團，德國代表團或美國代表團，以及其他各國代表團所作的評論都是如此。這個評論原文如下：

「我們在旅行時所看見的偉大建設，真使我們不勝欽佩。在所有一切城市裏，無論在莫斯科或馬開葉夫克，或哥爾洛夫克，或哈爾科夫以及列寧格勒，到處都是用莫大的熱忱進行着工作。所有一切機器都是最新式的。工廠裏設備清潔，空氣新鮮，光線明亮。我們親眼看見在蘇聯怎樣給工人以醫藥衛生幫助。工人住宅是建築在工廠附近。在工人住區裏設立有學校與托兒所，極仔細地照料兒童。我們看見，新工廠和新住宅與舊工廠及舊住宅迥然不同。我們所看見的一切，都使我們知道共產黨所領導來建設新社會的勞動者具有偉大的力量。我們看見蘇聯人民文化程度澎湃高漲，而其他各國却是滿目蕭條，大批工人失業。我們親眼看見蘇聯勞動者在前進途中遇到怎樣可怕的困難。因此我們更加瞭解他們以其勝利指明給我們看時所表現的那種自豪態度。我們深信，他們是定能克服一切障礙的」。

這就是五年計劃底國際意義。只須我們在兩三年內進行了一番建設工作，只須我們顯示了五年計劃第一批成功，就使全世界分成了兩個營壘：一個營壘裏的人向我們狂吠不已，另一個營壘裏的人却目覩五年計劃成功而感覺驚異；更不必說，在全世界上都有我們自己日益加強起來的營壘，這就是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的營壘，他們因蘇聯工人階級成功而感覺歡樂，決意幫助蘇聯工人階級，而使全世界資產階級胆戰心驚。

這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五年計劃底國際意義，五年計劃所有各種成功和成績底國際意義，是不容懷疑的。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各國孕妊着無產階級革命，正因為它們孕妊着無產階級革命，所以資產階級便想從五年計劃失敗中吸取反對革命的新證據，而無產階級却力求從五年計劃勝利中吸取，並且實際上已經在吸取新證據去擁護革命，反對全世界資產階級。

五年計劃底成功動員世界各國工人階級革命力量去反對資本主義，這是不容置辯的事實。五年計劃有莫大的國際革命意義，這是不容懷疑的事實。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應當更加注意五年計劃，這個計劃底內容及其基本任務問題。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應當更加仔細分析五年計劃底總結，五年計劃執行和實現底總結。

(二)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和實現這一任務的道路

現在我們就要說到五年計劃問題本身。

什麼是五年計劃呢？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是什麼呢？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要把我們這個技術落後，往往是落後到中世紀程度的國家，移到新技術，現代技術軌道上來。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要把我們蘇聯由一個依賴於資本主義各國意旨的貧弱農業國家，變成爲毫不依賴於世界資本主義意旨而完全獨立的富強工業國家。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要在實行把蘇聯變爲工業國家時，澈底排除資本主義份子，擴大社會主義經濟戰線，並造成經濟基礎來在蘇聯消滅階級，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要在我國創立一種不僅能把全部工業，而且能把運輸業和農業都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改組過來的重工業。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要把散漫細小個體農業移到巨大集體農業軌道上，藉以保證社會主義在鄉村中的經濟基礎，並這樣來消滅資本主義在蘇聯恢復的可能性。

最後，五年計劃底任務，就是要在國內造成一切技術上經濟上的必要前提來最高限度提高國防能力，以至於能澈底打退所有一切外來的武裝干涉企圖，澈底打退所有一切外來的武裝侵犯企圖。

除掉資本主義底根蒂，還沒有打破國內敵人底基礎和根基。國內敵人是支持在小經濟上面的，我們所能用以打破這個敵人基礎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全國經濟，包括農業在內，轉移到新技術基礎上，轉移到現代的大生產技術基礎上來：只有國家電氣化了時，只有我們已爲工業、農業和運輸業建立起現代的大工業技術基礎時，我們才會獲得最終的勝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至四七頁）。

黨規定五年計劃和決定五年計劃基本任務時所持的理由，就是以這些原理爲基礎的。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如此。

可是，爲要實行這種偉大計劃，決不可茫無頭緒，隨便動手來作。爲要實行這種計劃，首先要找到計劃中的基本環節，因爲只有找到並抓住這個基本環節以後，才可把這計劃其他一切環節拖出來。

五年計劃底基本環節是什麼呢？

五年計劃底基本環節，就是重工業和它的核心，即機器製造業。因爲只有重工業，才能把全部工業，運輸業以及農業都改造過來，振興起來。因此也就必須從重工業來着手實行五年計劃。所以就必須把恢復重工業當作實現五年計劃的基礎。

關於這點，我們也有列寧底指示：

「爲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興旺也還不夠，我們還要有重工業：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

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爲獨立國家的地位：重工業是需要有國家補助金的。我們如果找不到這種補助金，便不能成爲文明的國家，更不必說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了。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九頁）。

可是，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特別是在像五年計劃開始時我們這樣一個落後而不富裕的國家裏，原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因爲大家知道，重工業需要巨量的資金和相當數量的熟練技術人材，否則根本不能恢復重工業。黨知道這一點並估量到了這一點麼？是的，是知道這一點的。它不僅知道，並且當衆宣佈了這一點。黨知道在英德美等國重工業是怎樣建成的。它知道這些國家裏的重工業所以能建成，是因爲得到了大批貸款，或是因爲掠奪了其他國家，或是因爲同時採用了這兩種手段。黨知道這兩種手段都是我們國家所不可採用的。那末，它當時所指望的，究竟是什麼呢？它所指望的，是我國本身的力量。它是指望我們既有蘇維埃政權，並依據於土地，工業，運輸業，銀行和商業國有制，便能夠實行極嚴格的節省辦法，來積蓄爲恢復和發展重工業所必需的資金。黨當時爽直地說過：這件事情需要有重大犧牲，如果我們真想達到目的，就應公開和自覺地去接受這種犧牲。黨是指望用我國內部力量實現這個任務，而不要外來的苛刻信貸和借款。

請看列寧如何說明了這個問題吧：

「我們所應當努力建成的國家，是要工人能夠保持他們對於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於他們的信任，並以極大節省辦法把自己社會關係中任何一種浪費現象的任何遺跡剷除乾淨。

我們應當把我們國家機關儘量節省。我們必須把國家機關中所有一切浪費現象的

遺跡剷除乾淨，而沙皇俄羅斯及其官僚資本主義機關所遺留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這種遺跡，尙是很多的。

這不會是農民的狹隘眼界麼？

決不是。我們只要能保持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就能在我們國家裏用極嚴格節省的辦法把任何一點貯蓄都保存起來，藉以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加緊開採泥炭，完成瓦爾霍夫水電站建設工程等等。

我們的希望就在這裏，而且僅僅在這裏。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夠——拿個比喻來說——從一匹馬上跨到另一匹馬上，由農民的，莊稼漢的，窮苦的馬上，由倚靠於破產農民國家的種種節省辦法的馬上，跨到無產階級所努力尋求，而且不能不尋求的馬上去，跨到巨大機器工業，電氣化，瓦爾霍夫水電站等等的馬上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七頁）。

從窮苦莊稼漢的馬上，跨到巨大機器工業的馬上去，——這就是黨制定五年計劃和努力實現五年計劃時所想達到的目的。

規定極嚴格節省的辦法，積蓄為資助我國工業化所必需的經費，——這就是我們為達到恢復重工業和實現五年計劃目的所應走的道路。

是個大膽的任務麼？是條困難的道路麼？可是，我們黨所以叫做列寧的黨，也就是因為它沒有權利害怕困難哩。

不僅如此。黨十分相信五年計劃可能實現，信任工人階級力量，所以它認為可以力求在更短期

間完成這件困難事業，就是說不是在五年內，如五年計劃所要求的那樣，而是在四年內，實在講起來（如果把特別季算進去的話），是在四年零三個月內完成這件困難事業。

由此就提出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這個有名的口號。

結果怎樣呢？

後來事實表明了：黨原來是對的。

事實表明了：如果黨沒有這種勇氣，如果它不是這樣相信工人階級力量，就會不能達到我們現在所能引以自豪的勝利。

（三）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現在我們來說五年計劃實現的總結問題。

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怎樣呢？

我們在這方面達到了勝利麼？

是的，達到了勝利。不僅達到了，而且超過了我們所期待的，超過了我們黨內那些具有最熱頭腦的人所能期待的程度。現在，甚至敵人也不否認這一點了。我們的朋友，當然更是不能否認這一點。

我們從前沒有黑金屬冶煉業，即全國工業化底基礎，而我們現在却有了。

我們從前沒有拖拉機製造業，而我們現在却有了。

我們從前沒有汽車製造業，而我們現在却有了。

我們從前沒有機架製造業，而我們現在却有了。

我們從前沒有重大的現代化學工業，而我們現在却有了。

我們從前沒有真正的重大的現代農業機器製造業，而我們現在却有了。

我們從前沒有航空工業，而我們現在却有了。

我們從前在電力製造業方面是佔最末位，而我們現在却已升到首位之一了。

我們從前在煤油品和煤炭出產量方面是佔最末位，而我們現在却已升到首位之一了。

我們從前只是在烏克蘭有一個煤鉄根據地，而且我們當時就連這個根據地也沒有把它充分佈置

好。而我們現在不僅振興了這個根據地，並且在東部創造了我國所能引以自豪的一個新的煤鉄根

據地。

我們從前只是在我國北部有一個紡織工業根據地。而我們現時很快就會有中亞細亞和西西伯利
亞的兩個新的紡織業根據地了。

我們不僅創立了這些新的巨大工業部門，並且使這些部門具有了遠非歐洲工業所能比上的規模
和範圍。

由於有這一切，結果就把資本主義份子最終和永遠排除出工業範圍以外，而使社會主義工業
成了蘇聯唯一的工業形式。

由於有這一切，結果就使我們國家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因為工業出產量底比重，與農業出產量相較，已由五年計劃初（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八，增至五年計劃第四年度（一九三二年）末的百分之七十了。

由於有這一切，結果我們就能在五年計劃第四年度末，把全部工業原定在五年內完成的出產大綱執行到百分之九十三點七，使工業出產總量超過戰前水準兩倍以上，超過一九二八年水準一倍以上。至於重工業出產大綱，那麼我們已把五年計劃執行到百分之一百零八。固然，我們的全部工業五年計劃大綱，還有百分之六沒有完成。但這是因為鄰邦拒絕同我們簽訂互不侵犯公約，又因為在遠東方面發生了糾紛，所以我們為加強國防起見，不得不立刻把一批工廠實行改組來製造現代國防武器。因為這種改組需要經過相當準備時期，所以這些工廠停止出產至四個月之久，而這種情形當然不能不影響到五年計劃所定整個生產大綱在一九三二年的執行。由於實行這個辦法的結果，我們已完全彌補了國防能力方面的缺陷。可是，這個辦法却不能不使五年計劃所定出產大綱執行時受到不良的影響。如果沒有這種外來的情況，那末我們就會不僅已經完成，而且一定會超過完成了五年計劃原定的數目。

最後，由於有這一切，結果就使蘇聯由國防準備不足的弱國變成了國防能力雄厚的強國，變成了能夠隨時應付一切意外事件的國家，變成了能夠大批製造一切現代國防武器，並將其供給自己軍隊去抵禦外侮的國家。

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實現的總結，大體上就是如此。

現在請你們自己來判斷一下：既然有這一切，那末資產階級報章說什麼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遭受『失敗』的廢話，究竟還有什麼價值呢。

現在遭受嚴重危機的資本主義國家，按其工業產品增長情形來說，又是怎樣呢？請看人所共知的官方統計吧。

蘇聯工業出產總量，在一九三二年末已比戰前水準增加到了百分之三百三十四，而美國工業出產總量在同一時期內降到了百分之八十四，英國降到了百分之七十五，德國降到了百分之六十二。

蘇聯工業出產總量在一九三二年末已比一九二八年水準增加到了百分之二百一十九，而美國工業出產總量在同一時期內降到了百分之五十六，英國降到了百分之八十，德國降到了百分之五十五，波蘭降到了百分之五十四。

這些統計難道不是證明資本主義工業制度與蘇維埃工業制度競賽時沒有經得住考驗，而蘇維埃工業制度是比資本主義工業制度優越得多麼。

有人向我們說道，好吧，你們建成了許多新工廠，奠定了工業化底基礎，可是，你們如果拋棄了工業化政策，拋棄了擴大生產資料製造業的政策，或者至少是把這件事情放到了末位，而多製造些布疋、皮鞋、衣服以及其他各種日用品，那就會更好得多了。日用品製造得不夠用，結果也就引起了相當的困難。

可是，必須知道，必須想一想，這種把工業化任務放在末位的政策能使我們得到怎樣的結果。

當然，我們能從這時期內耗費於重工業設備方面的十五萬萬金盧布中，拿出半數來向國外購買棉花、皮革、羊毛和橡膠等等。那時我們就會有更多的布疋，皮鞋和衣服。可是，那時我們就沒有拖拉機製造業，也沒有汽車製造業，就會沒有多少嚴重的黑金屬冶煉業，就會沒有金屬來製造機器，結果也就會在擁有新式技術武裝的資本主義國家包圍面前陷於手無寸鐵的狀況。那時，我們就會沒有可能用拖拉機和各種農業機器來供給農業，結果也就會落得沒有糧食。那時，我們就會無法戰勝國內資本主義份子，結果也就會大大增加資本主義復辟的機會。那時，我們就會不能有一切新式國防武器，而使我國底國家獨立地位不能維持下去，使我國變成外敵用武的對象。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與現在中國所處地位多少相同，中國因為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而被一切逞性妄爲的人所蹂躪着。

總而言之，我們那時所有的，就會是武裝干涉，就會不是互不侵犯公約，而是戰爭，而且是個有致命危險的戰爭，實力懸殊的流血戰爭，因為我們在這個戰爭中就會幾乎是沒有武裝，而敵人却擁有一切現代的進攻武器。

事情就是這樣變化的呵，同志們。

自重的國家政權，自重的黨，當然是不能採取這種亡國主張的。

正是因為黨排斥了這種反對革命的立場，所以黨在工業方面實現五年計劃事業中達到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黨在實現五年計劃和組織工業建設勝利時，實行了加緊速度發展工業的政策。黨好似是鞭策了

國家，督促它向前突飛猛進。

黨實行這種最高速度的政策，是不是作得正確呢？

是的，是絕對正確的。

落後了一百年並因落後而有滅亡危險的國家，是不能不加以督促的。當時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趕快用新式技術來重新武裝自己，而終於走上康莊大道。

其次，我們不能不知道帝國主義者究竟會在那一天來進攻蘇聯，打斷我國建設；而他們隨時都能利用我國技術經濟弱點來進攻我們，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黨不得不鞭策國家前進，以免放過時機，而盡量利用暫息時間，趕快在蘇聯建立工業化基礎，即蘇聯富強底根基。黨在當時沒有可能等待什麼機會和玩弄什麼手腕，而應當實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最後，黨應當在最短期間消滅我國國防底弱點。時局的條件，資本主義各國武裝的增長，裁軍思想的失敗，國際資產階級對蘇聯的仇視，——凡此種種都迫使黨來迅速加強國防能力，作爲國家獨立底基礎。

可是，黨有過實現最高速度政策的實際可能麼？是的，是有過這種可能的。它所以有這種可能，不僅是因爲它及時發動了我們國家迅速前進，而且首先是因爲它在實行新的擴大建設中能夠倚靠舊有的工廠或革新的工廠，這些工廠既爲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所熟習，也就給了我們實行最高發展速度的可能。

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所有的那種迅速的新建設的高漲，擴大建設的熱潮，努力從事新建

設的英雄和突擊隊員，洶湧澎湃的發展速度，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生長起來的。

可以說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也還要實行完全同樣的最高發展速度的政策麼？不，決不可這樣說。

第一，由於五年計劃順利實現的結果，我們基本上已完成了五年計劃底主要任務，即是爲工業、運輸業和農業創立現代新技術基礎的任務。既然如此，試問是否還要繼續和督促國家呢？很明顯的，現在已沒有這種必要了。

第二，由於五年計劃順利完成的結果，我們已把國防能力提到了應有的高度。既然如此，試問是否還要繼續和督促國家呢？很明顯的，現在已沒有這種必要了。

最後，由於五年計劃順利完成的結果，我們已新建成了成十成百擁有新式複雜技術的大工廠和聯合廠。這就是說，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工業出產量方面起基本作用的，不是那些技術已經熟習的舊工廠，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那樣，而是那些技術還沒有熟習而必須熟習的新工廠。可是，熟習新企業和新技術，要比利用那些技術已經熟習的舊工廠或革新工廠的事情困難得多。這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提高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底熟練程度，來獲得完全利用新技術的新技能。既然如此，那末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特別是在五年計劃頭兩三年，即使我們想要實行，也不能實行最高發展速度的政策，這難道不很明顯麼。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認爲我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必須採取較慢的工業出產量增長速度。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出產量是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二十二。我認爲我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

時期，必須實行工業出產量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三至十四的標準。這樣的工業出產量增長速度是資本主義國家夢想不到的。且不說這樣的速度，就是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五的標準，也是它們現在夢想不到的。而這也就是它們之爲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色哩。具有蘇維埃經濟制度的蘇維埃國家，却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我國經濟制度下，我們完全可以，而且應當實現出產量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三至十四的標準，作爲最低限度。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組織了進行新建設的熱忱和熱潮，達到了有決定意義的成功。這是很好的。可是，現在這已經不夠了。現在，除此而外，我們還要有熟習新工廠新技術的熱忱和熱潮，還要認真提高勞動生產率，認真減低成本費。

現在主要點就在這裏。

因爲我們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夠大約到第二個五年計劃後半期開始的時候，無論是在建設方面或在工業產量增長方面，都實行一個新的迅速的跑步。

最後，還要簡略說說我們的速度和每年產量增長百分率所包含的內容問題。我們的工業家是很少研究這個問題的。而這却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什麼是產量增長的百分數呢？每個增長的百分所包含的內容怎樣呢？例如，拿一九二五年，即恢復時期來說吧。那時一年出產增長額是等於百分之六十六。當時工業產品總值爲七十七萬盧布。當時增長百分之六十六，按絕對數目說就是增加三十餘萬盧布。所以，當時每個增加的百分是等於增加四百五十萬盧布。再拿一九二八年來說。一九二八年產量增長額是百分之二十六，按百分數說是幾乎比一九二五年少到三倍。當時工業

產品總值爲一百五十五萬盧布。所以，全年增長額絕對數目是三十二萬八千萬盧布。所以，當時每個增加的百分，是等於增加一萬二千六百萬盧布，即幾乎比一九二五年（該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六）多至三倍。最後，拿一九三一年來說。一九三一年產量增長額是百分之二十二，即幾乎比一九二五年少到三倍。當時工業產量總值爲三百零八萬萬盧布。該年增長額絕對數目是五十六萬萬餘盧布。所以，當時每個增加的百分是等於增加二萬五千萬盧布以上，即比一九二五年（該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六）多至六倍，比一九二八年（該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強）多至兩倍。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就是說明，在研究產量增長速度時，決不可以考察一般增長額百分數爲限，而是還要知道每個增長的百分所包含的內容和全年產量增長的總數。例如，我們決定把一九三三年產量增加百分之十六，即比一九二五年產量增長的百分數少到四倍。但這還不是說這年產量增長的絕對數目也會少到四倍。一九二五年產量增長的絕對數目是三十餘萬萬，每個增長的百分是等於四千五百萬盧布。毫無疑義的，一九三三年產量既然增長百分之十六，那末絕對增長數目就會不下五十萬萬盧布，即幾乎比一九二五年多至兩倍，而每個增長的百分，至少也會等於三萬二千萬至三萬四千萬盧布。即比一九二五年每個增長的百分所包含的數目，至少也會多至七倍。

同志們，如果具體考察增加額速度和百分數問題，那末情形就是如此。

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就是如此。

(四) 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現在我們來講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問題。

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是集體化的五年計劃。黨實行集體化時是從什麼出發的呢？

黨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定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除工業化而外，還須由小規模的個體農業過渡到擁有拖拉機和新式農業機器的大規模的集體農業，作為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唯一堅固基礎。

黨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定不實行集體化，便不能把我國引上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康莊大道，便不能使千百萬勞動農民擺脫貧困愚昧的狀況。

列寧說過：

「靠小農經濟是擺脫不了貧困境遇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四〇頁）。

列寧說過：

「如果我們仍舊依靠小農莊來生活，那怕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資格來生活，也是不免要滅亡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七頁）。

列寧說過：

「只有採用共同的，勞動組合制的，共耕制的勞動，才可逃出帝國主義戰爭把我們逼進去了的那種絕境」（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三七頁）。

列寧說過：

「必須過渡到巨大模範農莊中的共耕制，否則不能擺脫俄國現在所處的那種經濟破壞的狀況，那種簡直是絕望的狀況」（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八頁）。

列寧根據這點，就得出如下的基本結論：

「掌握着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底優越時，只有當它用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經濟來幫助了農民時，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實可靠地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頁）。

黨實行農業集體化大綱，實行五年計劃農業發展大綱時，就是從這些列寧原理出發的。

因此，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的任務，就是要把那些無法利用拖拉機和新式農業機器的零散細小個體農戶，聯合成爲用一切新式先進農業工具武裝起來的巨大集體農莊，並在所有一切空閒土地上建立國營模範農莊，即蘇維埃農莊。

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的任務，就是要把蘇聯由農業規模狹小的落後國家，變成爲擁有規模巨大，根據集體勞動組織起來而能供給最多商品產物的那種農業的國家。

黨在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所定農業發展大綱時達到了什麼成績呢？黨是把這個大綱實現了呢，還是遭了失敗呢？

黨所達到了的成績，就是它在不過三年的時期內，便組織了二十餘萬個集體農莊和約近五千個

出產穀物和養畜的蘇維埃農莊，同時在四年內把播種面積擴大了二千一百萬海克脫。

黨所達到了的成績，就是集體農莊已包括了全國農戶總數百分之六十以上，以及全國農民播種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這就是說在三年內便把五年計劃超過完成到三倍了。

黨所達到了的成績，就是它現在已能每年採辦十二萬萬至十四萬萬普特穀物，而在個體農民經濟佔主要地位的那個時期，每年祇能採辦五萬萬至六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

黨所達到了的成績，就是我們擊潰了富農階級，不過還沒有完全把它剷除；我們使勞動農民擺脫了富農盤剝和剝削，而在鄉村中爲蘇維埃政權奠定了堅固的經濟基礎，即集體經濟基礎。

黨所達到了的成績，就是蘇聯已由一個小農經濟的國家，變成了世界上農業規模最大的國家。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內完成的總結，大體上就是如此。

現在請你們自己來判斷一下：既然這樣，那末資產階級報章說什麼集體化「失敗了」，說什麼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破產了」的廢話，究竟還有什麼價值呢？

現在遭受嚴重農業危機的資本主義各國農業情形，又是怎樣呢？請看人所共知的官方統計吧。

在各個基本的產穀國家裏，播種面積縮減了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美國棉花播種面積縮減了百分之十五；德國和捷克斯拉伐克的糖蘿蔔播種面積縮減了百分之二十二至百分之三十；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亞麻播種面積縮減了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

據美國農業部統計，美國農業出產總值由一九二九年的一百一十萬萬美元減少到了一九三二年

的五十萬萬美元，即減低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國穀物出產總值由一九二九年的十二萬八千八百萬美元減少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三萬九千一百萬美元，即減少了百分之六十八以上。美國棉花出產總值由一九二九年的十三萬八千九百萬美元減少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三萬九千七百萬美元，即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所有這些事實，難道不是證明蘇維埃農業制度優勝於資本主義農業制度麼？這些事實，難道不是證明集體農莊是比個體農莊和資本主義農莊更有生命能力的經濟形式麼？

有人說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是不充分生利的，說它們耗費金錢很多，說保留這種企業是毫無理由的，說最好是解散這些農莊，而只把其中生利者保留起來。可是，只有絲毫不懂國民經濟問題，絲毫不懂經濟問題的人，才能這樣說。幾年以前，紡織工廠大半是不生利的。當時，我們有一部分同志勸我們關閉這些工廠。如果我們聽從了他們的話，那我們就會怎樣呢？我們就會在國家面前，在工人階級面前幹出了極大的罪過，因為我們這樣作，就會破壞了我們當時已在興盛的工業。我們當時是怎樣做了呢？我們等了一年多，結果是把全部紡織工業都變成爲生利的工業了。而我們的高爾基城的汽車工廠呢？它暫時也是不生利的哩。難道也要把它關閉起來麼？又如我們的暫時也是不生利的黑金屬冶煉業呢？難道也要把它關閉起來麼，同志們？如果這樣去觀察生利問題，那我們就會只應當盡量發展幾個最能生利的工業部門，如糖菓工業，麵粉工業，化妝品工業，編織品工業和兒童玩具工業等等。我當然不反對發展這些工業部門。恰巧相反，我們應當發展它們，因為它們也是居民所需要的。可是，第一，它們沒有重工業來供給機器和燃料，便不能發

展。第二，它們不能成爲工業化底基礎。同志們，問題就在這裏。

決不可用商人眼光，決不可根據眼前情形來觀察生利問題，而應當從全部國民經濟幾年情況的觀點上來觀察這個問題。只有這種觀點才能稱爲真正列寧主義的觀點，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這種觀點不僅應該用來看待工業，而且尤其應該用來看待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你們只要想一想：在區區三年以內，我們就創立了二十餘萬個集體農莊和五千左右的蘇維埃農莊，即創立了完全新的大企業，這種企業對於農業的意義，也如工廠對於工業的意義一樣重大。請你們再指出一個國家，說它能在三年內創立若干新的巨大企業，姑且不說二十萬零五千個，就是二萬五千個也好。你們一定指不出來，因爲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國家，而且未曾有過這樣的國家。我們在農業方面却創立了二十萬零五千個新企業。而世界上竟有一些人要求這些企業立刻生利，如果不能立刻生利，就要將其破壞，將其解散。這些非常奇怪的人，豈不是顯然不肯讓遺臭萬年的格羅斯特拉德專美於前麼？

我說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不生利時，我的意思絕對不是想說它們一概不生利。絕對不是！大家知道，我們現在已有許多十分生利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我們現在已有幾千個集體農莊和幾十個蘇維埃農莊是充分生利的。這些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是我們黨底得意之作，蘇維埃政權底得意之作。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當然不是到處都一樣。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中間，有舊的，有新的，也有完全年輕的。這些還很幼弱，還沒有完全形成的經濟機體。它們在其組織建設中所處的階段，差不多與我們的工廠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所處的階段相當。固然，其中大多數

還是不能生利的。可是，毫無疑義，它們經過兩三年以後就一定能夠生利，也同我們的工廠在一九二一年以後就能生利一樣。如果藉口說它們現在還不是一概都能生利，便不肯予以種種幫助，那就是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面前幹出滔天的大罪了。只有人民公敵和反革命份子，才能提出用不着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問題。

黨在農業方面實現五年計劃時是以加緊的速度實行了集體化的。黨實行這種加緊速度進行集體化的政策，是做得正確麼？是絕對正確的，雖然在這方面不免有過一些急操作動。黨在實行消滅富農階級和剷除富農巢穴的政策時決不能半途而廢，而是應當把這件事情貫徹到底。

這是第一。

第二，黨既擁有大批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同時又利用我國沒有土地私有制的情況（土地國有！），於是就有一切可能來加速進行農業集體化事業。而黨在這方面確實已達到了極大的成功，因為它把五年計劃所定的集體化大綱超過完成到三倍了。

這是不是說我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也應實行加緊集體化速度的政策呢？當然不是。因為我們基本上已經把蘇聯各基本區域集體化事業完成了。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所做到的，已超過了我們所可預期的程度。我們不僅基本上完成了集體化，而且已使絕大多數農民認識了集體農莊是最適當的經濟形式。同志們，這是個莫大的成績。既然如此，那末現在是否還有必要急求加緊集體化速度呢？當然是沒有必要的。

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加緊集體化速度的問題，尤其不是集體農莊能否存在的問題，因為這個

問題早已肯定解決了。集體農莊已經穩穩奠定了，退向個體舊經濟的道路已是永遠截斷了。現在的任務是要在組織上鞏固集體農莊，把暗害份子從這裏驅逐出去，挑選受過審查的真正布爾什維克幹部來供給集體農莊，使集體農莊成為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集體農莊。

現在，主要點就在這裏。

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完成的情形，就是如此。

(五) 五年計劃在改善工農物質

狀況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上面我已說明了工業和農業方面的成功，說明了蘇聯工業和農業高漲的情形。從改善工農物質狀況方面看來，這些成功已產生了什麼結果呢？從根本改善勞動者物質狀況方面看來，我們在工業和農業方面所有成功底基本結果是什麼呢？

第一個基本結果，就是我們剷除了失業現象，消滅了工人中間那種朝不保夕的情形。

第二個基本結果，就是幾乎全體貧農都加入了集體農莊建設，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打破了農民分化為富農貧農的過程，並因此而剷除了農村貧窮困苦的現象。

同志們，這是個莫大的成績，是無論那一個資產階級國家——那怕它是最「民主的」國家

——所夢想不到的成績。

我們蘇聯的工人早已忘掉失業現象了。大約三年以前，我們還有約近一百五十萬個失業業者。兩年以前，我們便把失業現象剷除了。在這兩年當中，工人已經忘掉了失業現象，忘掉了失業痛苦，忘掉了失業慘狀。而資本主義國家在失業基礎上發生着何等慘慘的事情呵。在這些國家裏，現在至少有三四千萬個失業業者。這是些什麼人呢？普通都說這是一些「走頭無路的人」哩。

他們每天都想法覓得工作，尋找工作，幾乎任何工作條件都情願接受，可是誰也不收容他們，因為他們是些「多餘的」人。同時却又大批工業品和農產品被那些逞性妄為的地主資本家的富豪子弟任意揮霍。不給失業業者飯吃，因為他們無飯錢可付；不給他們屋住，因為他們無房錢可付。他們怎麼過活，何處棲身呢？他們所藉以糊口的，是從老爺棹上拋下來的微薄的施舍，他們在垃圾堆裏尋找腐爛的殘餘食品，他們住在大城市的貧民窟裏，而且大多數是住在郊外用木箱板和樹皮匆忙架成的茅屋裏。不僅如此。不僅失業工人苦於失業現象。而且在業工人也苦於失業現象。他們所以苦於失業現象，是因為大批工人失業的情形使他們在生產中的地位不穩，使他們朝不保夕。今天他們還在工廠裏面做工，可是他們不敢担保明朝醒來時不會聽說他們已被開除了工作。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基本成績之一，就是我們已剷除了失業現象，使蘇聯工人免除了失業慘狀。

關於農民，也要這樣說。他們也已忘掉了分化為富農貧農的情形，忘掉了富農剝削貧農的情形，忘掉了每年都迫使幾十萬幾百萬貧農變為乞丐的破產情形。三四年以前，在我國農民人口中

間，貧農至少佔百分之三十，即有一千餘萬人。而在更早的時候，在十月革命以前，貧農至少佔農民人口百分之六十。什麼是貧農呢？這就是在經營農業時照例都缺乏種子，或缺乏耕馬，或缺乏農具，或是連所有這一切東西都缺乏的人。貧農就是過着半饑半飽生活，通常都受富農剝削，而在舊俄時代是既受富農剝削，又受地主盤剝的人。在不久以前的時候，還約有一百五十萬貧農，有時甚至到整整二百萬貧農，每年跑到南部，跑到北高加索和烏克蘭去謀生，受富農僱用，而在更早的時候，是受富農和地主僱用。他們每年跑到工廠門口來補充失業軍隊的人數更多。當時不僅貧農處於這種惡劣地位，而且中農也大半是如貧農一樣受着貧窮困苦的。關於所有這一切苦況，農民都早已忘掉了。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結果，給予了貧農和下層中農一些什麼呢？它打破和擊碎了富農階級，使貧農和大部分中農擺脫了富農剝削。它把貧農和大部分中農吸入了集體農莊，並為他們造成了穩固的地位，於是就剷除了農民分化為剝削者（富農）和被剝削者（貧農）的可能。它把加入集體農莊的貧農和下層中農變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而剷除了農民破產貧困的過程。現在我國已經沒有幾百萬農民每年離鄉背井跑到遠方去謀生的現象了。現在要農民離開自己的集體農莊，被吸收到什麼地方去做工，就須和集體農莊訂立合同，而且還要送給集體農莊莊員免費車票。現在我國已經沒有幾十萬幾百萬農民陷於破產，站在工廠門口哀求工作的現象了。這種事情從前是有過的，但它早已成為過去了。現在農民是生活有保障的主人，是擁有拖拉機、農業機器、存種和存糧等等的集體農莊中的莊員。

這就是五年計劃給予了貧農和下層中農的一些東西。

這就是五年計劃在改善工農物質狀況方面的基本成績。

由於在改善工農物質狀況方面達到了這些基本的成績，所以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就有了如下的事實：

(1) 大工業方面的工人和職員人數，已比一九二八年增加到兩倍，即超過了五年計劃百分之五十七；

(2) 國民收入，也就是說工農收入，在一九三二年增加到四百五十一萬萬盧布，即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

(3) 大工業方面的工人和職員全年平均工資，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即超過了五年計劃百分之十八；

(4) 社會保險基金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九十二（一九三二年為四十一萬二千萬盧布，而一九二八年為十萬零五千萬盧布），即超過了五年計劃百分之一百一十一；

(5) 公共飯堂迅速增加，共包括各最主要工業部門工人百分之七十以上，即超過了五年計劃六倍。

固然，我們還沒有達到完全滿足工農物質需要的地步。而且我們在最近幾年內也未必會達到這個地步。可是，我們毫無疑義已達到逐年改善我國工農物質狀況的地步了。只有蘇維埃政權底死敵，也許還有某些資產階級報界份子，包括資產階級報界一部分駐莫通訊員在內，才能懷疑這一

點，而他們對於國民經濟和勞動者狀況的瞭解，是未必勝過阿比西尼亞國王對於高等數學的瞭解程度的。

資本主義各國工農狀況，又是怎樣呢？

請看官方統計吧。

資本主義各國的失業人數已增加到駭人聽聞的地步。美國據官方統計來看，單是製造業中的在業工人數目，就由一九二八年的八百五十萬人減少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五百五十萬人；而按美國勞動同盟所作的統計，美國全部工業中的失業工人數目，在一九三二年末已達一千一百萬人。英國據官方統計來看，失業人數已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二十九萬人增至一九三二年的二百八十萬人。德國據官方統計來看，失業人數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三十七萬六千人增加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五百五十萬人。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也是如此，而且官方統計照例都是故意減少了失業工人的數目字，其實資本主義各國失業人數總共已達三千五百萬以至四千萬人。

工人工資是一貫減低的。據官方統計，美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比一九二八年水準減低了百分之三十五，英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在同一時期內減低了百分之十五，而德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甚至減低了百分之五十。據美國勞動同盟統計，由於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減低工資的結果，美國工人所受損失，等於三百五十萬美元以上。

英德兩國本來很低的工人保險基金大大減少了。在美法兩國完全沒有或者幾乎完全沒有任何失業保險形式，因此美國無家可歸的工人和無人照料的兒童人數，也就增加得特別快。

資本主義各國農民羣衆狀況也是很壞的，那裏的農業危機根本破壞農民經濟，使數千百萬破產農民和法麥爾變成乞丐。

五年計劃在改善蘇聯勞動者物質狀況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就是如此。

(六) 五年計劃在城鄉間商品 流轉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現在我們就來說說五年計劃在城鄉間商品流轉額增長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工業和農業產量的大大增長，工業和農業所有商品剩餘量的增長，以及工農需要額的增加，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不使城鄉間商品流轉活躍和擴大起來，而且真正使它活躍和擴大起來了。

城鄉間的生產結合是基本的結合形式。可是，單靠生產結合還不夠。必須用商業結合來補充生產結合，使城鄉聯繫成爲堅固而不可分離的聯繫。爲要達到這步，就絕對必須發展蘇維埃商業。如果認爲單只經過某一條溝道，例如經過合作社，便可發展蘇維埃商業，那就不正確了。爲要發展蘇維埃商業，就必須利用所有一切溝道：合作社體系，國營商業體系，集體農莊商業。

有些同志以爲發展蘇維埃商業，尤其是發展集體農莊商業，便會是同復到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這種想法是完全不對的。

蘇維埃商業，包括集體農莊商業在內，是與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的商業根本不同的。

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我們容許過資本主義的活躍，容許過私人的商品流轉，容許過私商、資本家和投機者底「活動」。

這是一種多少自由的商業，不過是由國家調節作用來加以限制。當時在國內商品流轉方面，私人資本主義部份還佔頗大的地位。更不必說我們當時既沒有像現時這樣發展的工業，又沒有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按計劃而工作並供給國家巨量的後備農產品和工業品。

可以說我們現在的情形也是這樣麼？當然不可這樣說。

第一，決不可把蘇維埃商業和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雖然是由國家所調節的那種商業相提並論。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的商業，是容許資本主義活躍，容許私人資本主義部份在商品流轉方面活動的，而蘇維埃商業却是以不許資本主義活躍，不許私人資本主義部份在商品流轉方面活動爲出發點的。什麼是蘇維埃商業呢？蘇維埃商業就是沒有大小資本家參加的商業，沒有大小投機商人參加的商業。這是特種商業，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而只有我們布爾什維克才在蘇維埃制度發展條件下加以實行的商業。

第二，我們現在有頗發展的國家工業與整批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供給國家巨量後備農產品和工業品來擴展蘇維埃商業。這是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條件下所沒有，而且是當時所不能有的。

第三，我們在最近時期以來已把私販、私商和各種中介人完全逐出商品流轉範圍以外了。這當

然不是說私販和投機商人已絕對不會利用他們最方便的場所，即利用集體農莊商業而按隔世遺傳律重新出現於商品流轉範圍了。況且，集體農莊莊員自己有時也甘願做一做當然不會使他們臉上增光的投機生意哩。可是，我們有蘇維埃政府不久以前所頒佈的制止投機和懲罰投機商人辦法的法律，來反對這種惡劣現象。你們當然知道，這個法律是不很柔和的。你們當然懂得，這樣的法律是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條件下所沒有，而且是當時所不能有的。

既然如此，如果還妄說什麼回復到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的商業，那難道不顯然是表示絲毫不懂得，真是絲毫不懂得我們蘇維埃經濟麼。

有人向我們說：沒有健全的金融和健全的貨幣，便無法擴展商業，縱然這種商業是蘇維埃商業，也是無法擴展的；必須預先醫治我國金融和我們蘇維埃貨幣，因為據說我們蘇維埃貨幣是沒有絲毫價值的。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學家就是這樣對我們說的。我認為：這些尊貴的經濟學家對於政治經濟學的認識，並不勝過——舉例來說——肯特爾伯尼主教對於反宗教宣傳的認識。怎能說我們蘇維埃貨幣沒有什麼價值呢？難道我們不正是用這種貨幣建築了馬格尼托工廠，德涅泊爾電站，庫茲涅茨工廠，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哈爾科夫拖拉機工廠，高爾基城汽車工廠，莫斯科汽車工廠以及幾十萬集體農莊和幾千蘇維埃農莊麼？這些老爺們莫非認為這一切企業都是由麥草或泥土，而不是由具有一定價值的實際材料築成的麼？如果估計到在我國商品流轉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有組織的市場，而不是那只有附屬作用的無組織的市場，那末我國貨幣穩定性是由什麼所保證的呢？當然不僅是黃金準備。保證我國貨幣穩定性的，首先就是國家所支配的巨量商品，這些商品是按照穩

定價格加入商品流轉範圍的。試問有那一個經濟學家，能夠否認蘇聯所獨有的這種保證要比任何黃金準備更能切實保證貨幣穩定性呢？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學家是否終究會懂得，他們已經是完全被那把黃金準備當作貨幣穩定性唯一保證的理論弄糊塗了呢？

關於與擴展蘇維埃商業有關的種種問題，就是如此。

由於五年計劃實現的結果，我們在發展蘇維埃商業方面達到了什麼成績呢？

我們在五年計劃總結中有如下的成績：

(1) 輕工業產量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七；

(2) 合作社商業與國營商業零售額，按一九三二年價格計算已增加到三百九十六萬盧布，就是說，零售商品量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

(3) 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網，比一九二九年增加了十五萬八千個舖子和商店；

(4) 集體農莊商業日益擴展，個別國家機關和合作社機關所採辦的農產品數量日益增加。事實就是如此。

資本主義各國內部商品流轉情況却就完全不同了，在那裏，由於經濟危機的結果，商業萬分減縮，大批企業關閉，中小商人破產，巨大商號倒閉，商店貨棧充斥的存貨無法銷售出去，而勞動羣衆購買力却不斷降低。

五年計劃在商品流轉發展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就是如此。

(七) 五年計劃在與敵對階級餘孽鬥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由於五年計劃在工業、農業以及商業方面完成的結果，我們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都已剷除了資本主義份子，而奠定了社會主義原則。

這種情形對於資本主義份子應當產生什麼結果，而且確實產生了什麼結果呢？

結果，垂死階級底最後餘孽，即工業家及其從僕，商人及其走卒，從前的貴族和神父，富農和富農走狗，從前的白衛軍官和警佐，從前的警察和憲兵，各種沙文主義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以及其他一切反蘇維埃份子，都已被打翻了。

這些從前的人物既被打翻，散落在蘇聯各地，便設法鑽進到我們的工廠、我們的機關和商業組織、鐵路運輸和水上運輸企業中來，特別是鑽進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中來。他們戴上「工」「農」假面具，鑽進到這裏隱藏起來，其中有些人甚至鑽進黨裏來了。

他們是帶着什麼東西鑽進這些地方來的呢？當然是帶着仇視蘇維埃政權，痛恨新式經濟、新式生活及新式文化的心理鑽進來的。

這些老爺們已經是沒力量來直接進攻蘇維埃政權了。他們和他們的階級屢次舉行過這種進攻，可是他們已被擊潰，已被打散了。因此，他們現在還能採取的唯一辦法，便是實行危害和暗

害工人，集體農民，蘇維埃政權和黨。於是他們就用暗中拆台手段來竭力進行危害勾當，放火焚燒倉庫，破壞機器，組織怠工事件，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裏面組織暗害工作，而且其中有些人，其中還有某些大學教授，瘋狂般地進行暗害工作，以至於實行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牲畜中間散佈瘟疫和炭疽熱，在馬匹中間散佈腦膜炎等等。

可是，主要點還不在此。這些從前人物底主要「活動」，就是組織大批偷竊侵吞國家財產，合作社財產以及集體農莊財產的勾當。在工廠裏進行偷竊侵吞勾當，在鉄路上實行偷竊侵吞貨載，在堆棧和商店裏進行偷竊侵吞勾當，尤其是在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裏進行偷竊侵吞勾當，——這就是這班從前人物底基本「活動」形式。他們憑靠着自己的階級本能，覺察到公有制是蘇維埃經濟底基礎，所以爲要危害蘇維埃政權，就必須動搖這個基礎，而他們也就實行用組織大批偷竊侵吞勾當的手段來動搖公有制。

爲了組織侵吞勾當，他們便利用昨天還是個體農民，今天已是集體農民的那些集體農莊莊員底私有主義習慣和遺毒。你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當然知道人們意識底發展是落後於人們底實際地位的。就地位講，集體農民已不是個體份子，而是集體份子了，但他們的意識暫時還是舊有的意識，私有主義的意識。於是剝削階級出身的那些從前的人物就利用集體農民私有主義習慣，來組織侵吞公產的勾當，以求動搖蘇維埃制度底基礎，即公有制。

我們有許多同志竟寬容這種現象，不懂得這種大批偷竊侵吞公產的事實底意思和意義。他們好像瞎子一樣，看不見這些事實，以爲「這裏並沒有什麼特別了不得的事」。但這些同志們是大錯

而特錯了的。也如資本主義底基礎是私有制一樣，我們蘇維埃制度底基礎就是公有制。如果說資本家當時用宣佈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辦法，而達到了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那末我們共產黨人就更加應當宣佈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來鞏固一切生產部門與商業部門方面的社會主義新經濟形式。容許偷竊公有財產，容許侵吞公有財產，不管是國家財產也好，或合作社和集體農莊財產也好，而不理會這種反革命的胡行，便是幫助敵人來破壞我們這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蘇維埃制度。我們蘇維埃政府不久以前所公佈的關於保護公有制的法律，就是根據這一點出發的。這個法律是現時革命法制底基礎。每個共產黨員，每個工人和每個集體農民底主要職責，就是必須極嚴格地執行這個法律。

有人說：現時的革命法制和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革命法制毫無區別，現時的革命法制是恢復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革命法制。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革命法制底主要鋒芒是要反對戰時共產主義過火成分，反對「非法的」沒收和捐稅。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革命法制在私有主，個體經濟者和資本家嚴格遵守蘇維埃法律的條件下，保障了他們財產的安全。而現時革命法制却完全不同了。現時革命法制底主要鋒芒並不是反對戰時共產主義過火成分，因為這種成分早已不存在了，而是要反對公共經濟中的盜賊和暗害份子，反對惡棍和侵吞公產的人。由此可見，現時革命法制底基本關法是要保護公有財產，而不是其他什麼事情。

因此，為保護公有制而鬥爭，用蘇維埃政權法律所規定的一切方法和手段去作鬥爭，就是黨底基本任務之一。

堅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爲粉碎那些垂死階級最後餘孽並打破其盜竊勾當所必需的東西。

有些同志把消滅階級，建立無階級社會以及國家消亡的提綱，瞭解爲辯護苟且偷安和泰然自安態度的論據，瞭解爲辯護階級鬥爭熄滅和削弱國家政權的這一反革命理論的論據。這種人當然是不能與我們黨有什麼相干的。這是應被逐出黨外的變節份子或兩面派。階級的消滅不是經過階級鬥爭熄滅的道路，而是經過階級鬥爭加強的道路達到的。國家的消亡不是經過國家政權削弱，而是經過國家政權最高限度加強的道路到來的；只有最高限度加強國家政權，才可以最終剷除垂死階級底餘孽，並組織國防去抵禦還沒有被消滅掉，而且還不是很快就會被消滅掉的資本主義包圍。

由於五年計劃完成的結果，我們已完全把敵對階級底最後餘孽從他們的生產陣地上趕走了，我們已把富農階級擊破，並準備好了消滅富農階級的基礎。這就是五年計劃在與資產階級最後隊伍作鬥爭方面的總結。但這還不夠。現在的任務是要把這些從前的人物從我們自己的企業和機關中趕出去，使其永遠不能爲害。

當然不可說這些從前的人物能用暗害與偷竊手段來絲毫改變蘇聯現今的狀況。他們要與蘇維埃政權底設施對立，已經是無能爲力了。可是，如果我們的同志不用革命警惕性武裝起來，如果我們的同志不從實踐中拋棄那種寬容偷竊侵犯公產事實的庸人泰然自安態度，那末從前的人物便能作出不少的害處來。

要知道，蘇維埃國家威力越增長，垂死階級最後餘孽底抵抗也就會愈猛烈。垂死階級底最後餘孽正因為他們已在死亡，奄奄待斃，所以必將採用愈趨劇烈的反抗手段，唆使和發動居民中落後階層來反對蘇維埃政權。這些從前的人物用盡各種陷害和誣蔑手段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企圖發動落後份子。在這個基礎上，各種舊時的反革命黨，即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中部和邊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底所有一切殘兵敗將，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反對派與右傾反對派餘孽份子，是能復活和蠢動起來的。這當然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可是，我們如果願意迅速剷除這些份子而免受特別犧牲，便必須注意到這一切情形。

正因為如此，所以革命警覺性就是布爾什維克現在特別必需的品性。

(八) 一般結論

這就是五年計劃在工業和農業方面，在改善勞動者生活和發展商品流轉方面，在鞏固蘇維埃政權方面和擴展反對垂死階級餘孽及遺毒的階級鬥爭方面完成的基本總結。

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在最近四年來所獲得的成功和成績。

如果根據這些成功而認為我們百事大吉，那就錯誤了。當然，我們還不是百事大吉的。在我們的工作中還有許多缺點和錯誤。我們的實踐方面還有浪費現象和糊塗從事的情形。可惜我現在不能說明這些缺點和錯誤，因為委託我做的總結報告範圍不容許我來暢談這些問題。可是，現時問題並

不在此。問題是在於雖然有各種缺點和錯誤，——而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否認有這些缺點和錯誤的，——可是我們終究達到了使全世界工人階級欽佩喜躍的嚴重成功，終究達到了真正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

試問有什麼東西能夠而且確實表現了主要作用，使我們黨不管有各種錯誤和缺點，而終究達到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偉大成功呢？

究竟是什麼基本因素使我們不顧一切而達到了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勝利呢？

首先就是千百萬工人和集體農民所表現的積極性和舍己精神，熱忱和首倡性，他們和工程技師人員一起施展巨大力量來發展了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沒有這個情況，我們就會不能達到目的，就會不能前進一步，這是無可懷疑的。

其次，就是黨和政府所實行的堅強領導，它們號召羣衆前進，並克服了前進途中的一切困難。最後，就是蘇維埃經濟制度所特有的種種長處和優勢，它包含有克服一切困難所必需的雄厚能力。

這就是保證蘇聯獲得了歷史勝利的三個基本因素。

一般結論：

(1) 五年計劃底總結推翻了資產階級活動家和社會民主黨活動家妄說什麼五年計劃是幻想，是夢話，是不可實現的夢想的那種斷語。五年計劃底總結表明五年計劃是已經完成了。

(2) 五年計劃底總結，打破了妄說工人階級只能破壞舊制度，而不能建設新制度的那個著名

的資產階級「信條」。五年計劃底總結表明工人階級也如它善於破壞舊制度那樣善於建設新的制度。

(3) 五年計劃底總結打破了社會民主黨人說什麼在單獨一個國家裏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那個提綱。五年計劃底總結表明在一個國家裏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個社會底經濟基礎在蘇聯已經建成了。

(4) 五年計劃底總結推翻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說什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最好體系，而其他一切經濟體系都不穩固，都不能克服經濟發展中的困難的那種斷語。五年計劃底總結表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腳根動搖而不穩固的東西，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已在衰頹，而應當讓位給別的更高的經濟體系，即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只有蘇維埃經濟體系，才是不怕危機而能克服資本主義所不能解決的種種困難的唯一經濟體系。

(5) 最後，五年計劃底總結表明只要黨選定有正確的方針而不害怕困難，那它便是不可戰勝的。

(經久不息的熱烈鼓掌，轉為歡呼，全場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

論農村中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在聯共（布）中央

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認爲各位發言同志已把我黨農村工作狀況，工作缺點和工作優點，特別是把工作缺點，作了一個正確的敘述。可是，我總覺得他們還沒有把我們農村工作缺點方面的最主要點說出來，還沒有把這些缺點底根源揭露出來。而這一點却是我們所最應注意的。因此，就讓我來發表我對於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意見，用布爾什維克所固有的全部爽直精神來發表我的意見。

在去年，在一九三二年，我們的農村工作方面的主要缺點是什麼呢？

主要缺點就是我們去年的糧食採辦工作遇到了比前年，即比一九三一年更大的困難。

決不可說這是由於收成不好，因為去年收成不僅不比前年壞些，而且要比前年好些。誰也不能否認，一九三二年糧食收穫總量是比一九三一年多些，一九三一年因為蘇聯東北五個基本區域發生過旱災的結果，糧食數量是大大減少了的。固然，我們在一九三二年的收成，也因為庫班和特勒克以及烏克蘭幾個區域內氣候條件不好而受到了某些損失。可是，毫無疑義，去年所受的損失

還沒有一九三一年因東北各區發生旱災所遭受的損失一半那樣多。所以，我國一九三二年份的糧食收成是要比一九三一年多些。雖然如此，而我們在一九三二年糧食採辦工作方面，還是遇到了比前年更大的困難。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我們的工作為什麼有這個缺點呢？這種矛盾現象應怎樣來解釋呢？

（一）這首先是因為我們的地方工作同志，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沒有估計到農村中因宣佈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所形成的新環境。正因為他們沒有估計到這個新環境，所以他們也就沒有根據新環境來從新改變工作方式。在還沒有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在沒有國家所定價格與市場價格這兩種糧食價格並存時，農村中的環境是一回事。自從宣佈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起，農村中的環境就必定要急劇變更了，因為宣佈集體農莊貿易就是承認較高於國家所定價格的市場糧食價格為合法價格。這種情況當然也就使農民在向國家交納糧食時表現着一種吝嗇態度。農民當時這樣盤算着：「集體農莊糧食貿易已宣佈實行了，市場價格已經合法化了，於是我把同等數量的糧食拿到市場上去賣，就能比交納給國家時得到較多的錢，所以我如果不是傻子，當然就要把糧食留一手，少交納一些給國家，多留一些來做集體農莊貿易，以便在出賣同等數量的糧食時可以多賺一些錢。」

這本來是最簡單而自然的邏輯！

可是不幸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至少是其中許多人，竟沒有懂得這個簡單而自然的事情。在這個新環境中，為要不致破壞蘇維埃政權所定糧食採辦計劃，共產黨員本來是應當在收穫開始時，即在一九三二年七月時，就竭力加緊和督促糧食採辦工作。這是客觀環境所要求的。而他們在事實上

又是怎樣幹了呢？他們並沒有督促糧食採辦工作，反而督促實行各種貯存，結果就使糧食交納者在履行其對國家所負義務時更加吝嗇起來。他們既沒有懂得新環境，於是他們就不來顧慮農民在交納糧食方面的吝嗇態度能障礙糧食採辦工作，反而來焦心農民會想不到要留下一些糧食，以便後來運到市場上去做集體農莊的貿易，焦心農民會不幸而把自己全部糧食統統交給國家倉庫。

換句話說：我們的農村共產黨員，至少是其中的多數人，只看見了集體農莊貿易底長處，只懂得，只領會了集體農莊貿易底長處，却完全沒有懂得，沒有領會集體農莊貿易底短處，——他們沒有懂得，如果他們這些共產黨員不是從收穫糧食最初幾天起就極力督促糧食採辦運動，那末集體農莊貿易底短處是會使國家大受其害的。

而且不僅集體農莊工作人員犯了這種錯誤。許多蘇維埃農莊經理也犯了這種錯誤，他們竟犯罪式地把應該交納給國家的糧食留下來，却按較高價格賣給旁人。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在其關於發展集體農莊貿易的著名決議中，是不是顧到了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所形成的這種新環境呢？是的，是顧到了的。在決議上直接說過：只有把糧食採辦計劃完全執行並把種子收齊以後，才可以開始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在決議上直接說過：只有把糧食採辦工作和收藏種子的工作結束以後，大約是到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的時候把這些條件都執行完結後，才可以開始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當時簡直是用它們的這個決議來警告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說：不要因顧慮種種貯蓄和貯存而模糊自己的視線，不要離開主要任務，而應當從糧食收穫最初幾天起就開展糧食採辦工作，並特別加緊這個工作，因為第一個任務是

完成糧食採辦計劃，第二個任務是貯藏種子，你們只有把這些條件執行完結後，才可以開始實行和發展集體農莊糧食貿易。

也許中央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是錯在沒有充分割切強調這一點，沒有充分嚴厲預告我們農村工作人員關於集體農莊貿易所包含的危險。可是，它們毫無疑義是把這些危險情形預告了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而且預告得十分明白。老實說，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對於我們各地方工作人員——不僅是區工作人員，而且某些省工作人員——所具有的列寧主義鍛鍊和明達性，未免估量得有點過分了。也許本來是不應該宣佈施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的吧？尤其是因為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不僅有其長處，而且還有一些短處，那末宣佈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也許是個錯誤吧？

不，這並不是個錯誤。無論那一個革命辦法，如果它實行得不正確，都是不能担保沒有某些短處的。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也是如此。集體農莊貿易，無論對於農村或城市，無論對於工人階級或農民，都是同樣需要而且有利的。正因為它是有利的，所以必須加以施行。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在施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是根據什麼理由出發的呢？

首先，就是因為要擴大城鄉間商品流轉基礎，改善供給工人們農產品和供給農民們城市製造品的事業。毫無疑義，單靠國營貿易和合作社貿易，是做不到這一層的。除了這些商品流轉溝道而外，還要利用新的溝道，即集體農莊貿易。我們施行集體農莊貿易，也就造成了這些新的溝道。其次，就是因為要經過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來給予集體農莊莊員一種附加收入的源泉，鞏固他們的經濟狀況。

最後，就是因為要靠施行集體農莊貿易來更加推動農民去改善集體農莊工作，改善播種和收穫方面的工作。

你們知道，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所持的這些理由，是由近來集體農莊生活中的具體事實所完全證實了的。集體農莊更加鞏固了，退出集體農莊的現象停止了，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意向加強了，集體農莊莊員力求按更嚴格選擇的原則來接受新莊員，——所有這一切以及其他許多類似的事實，都是顯然證明集體農莊貿易不僅沒有使集體農莊地位減弱，反而使集體農莊地位加強和鞏固起來了。

所以，我們農村工作方面的缺點，並不是由於施行了集體農莊貿易，而是因為我們的工作人員沒有始終正確實行集體農莊貿易，因為他們不善於顧到宣佈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所形成的新環境，不善於適應這個新環境來改造自己的隊伍。

(二) 我們農村工作方面的缺點所由發生的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們的地方工作同志——而且不僅這些同志——沒有瞭解我們農村工作條件因集體農莊在基本穀物區內統治地位奠定而發生了變更的情形。在我國穀物區裏，集體農莊經濟形式已經成為統治形式，——這件事實是我們大家都感覺高興的。至於這個情況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我們在發展農業方面的關注和責任這一點，卻就不是大家都懂得的了。許多人認為：既然集體化在某區某省已達到百分之七八十左右，那就是說一切事情都已妥貼了，我們也就可以不必管事，而聽其自然，聽其自然，以為集體化自然會解決一切，自然會提高農業的。但這是一種很大的錯誤，同志們。其實，集體農莊成為我國農業中統治形式的事實，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我們對於農業的關注；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共產

黨員在提高農業方面的領導作用。在目前這時候，自流態度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危險，比任何時候都要嚴重些。在目前這時候，自流態度是能葬送一切的。

當個體農莊主人還在農村中佔主要地位時，黨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干預，尚能以個別的幫助辦法，個別的忠告或警告為限。當時，個體農民只得各自關照自己的經濟，因為這個經濟只是他個人的經濟，他不能把經營這個經濟的責任推諉到其他任何人身上；當時他除了自己而外，是再沒有什麼人可以指望的。當時，個體農民如果不願意挨餓，不願意餓死，就得親自照料播種收穫以及其他一切耕作手續。而一經轉入集體經濟時，情形就根本改變了。集體農莊不是個體經濟。所以，集體農莊莊員現在這樣說：「集體農莊是我的，又不是我的；集體農莊是我的，但同時又是張三李四王五及其他集體農莊莊員的，集體農莊是大家的。現在集體農莊莊員，昨天還是個體農民，今天已是集體農民的莊員，已經能把責任推諉到本集體農莊其他莊員身上了，已經能指靠其他莊員了，因為他知道集體農莊是不會使他挨餓的。因此，集體農莊莊員所有的關注，也就比他過去經營個人經濟時少些了，因為現在對於集體農莊經濟的關注和責任，是由全體莊員分擔的。」

從這裏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所應得出的結論，就是對於處理經濟所負責任的重心，已經由個別農民身上移到集體農莊底領導機關，集體農莊底領導中堅身上來了。現在，農民並不是要求自己，而是要求集體農莊領導機關，或更確切一點說，與其說是要求自己，不如說是要求集體農莊領導機關來關注經濟和正確處理事務了。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黨現在已不能以對農業發展過程採取個別干預辦法為限了。它現在應當親身担起集體農莊領導責任，應當親自擔起對於工作

的責任，並幫助集體農莊莊員根據科學技術成績來推進自己的經濟。

不僅如此。集體農莊是巨大經濟，而巨大經濟沒有計劃是不能經營的。包含有幾百個農戶，有時甚至包含有幾千個農戶的巨大農莊，是一定要按計劃指導才可經營的。它沒有計劃指導，就會破壞，就會瓦解。你們看，這就是集體農莊制度下的另一個新條件，這個條件是與經營個體細小經濟的條件根本不同的。可以把經營這種巨大農莊的事宜交給所謂事物自然行程，自流過程麼？當然是不可以的。為要經營這種經濟，就須保證集體農莊某種最低限度數量的具有普通常識的人材，這些人材應能計劃經濟並有組織地經營之。很明顯的，除非由蘇維埃政權來經常干預集體農莊建設事業，除非由蘇維埃政權來經常幫助這一事業，便無法辦好這個經濟。

從這裏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所應得出的結論，就是集體農莊制度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黨和政府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關注與責任。從這裏所應得出的結論，就是黨如果願意領導集體農莊運動，便應當熟悉集體農莊生活和集體農莊領導中的一切詳情。從這裏所應得出的結論，就是黨不應當減少，而應當增加它和集體農莊的聯繫，應當知道集體農莊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以便能及時幫助集體農莊，並預防那些威脅着集體農莊的危險。

而我們事實上所看見的情形又是怎樣呢？我們事實上所看見的，是有一些區組織和省組織竟與集體農莊生活隔離，不知道集體農莊底需求。人們在辦公室內坐着，自滿自足地寫東寫西，殊不知集體農莊是在官僚主義辦公室外面發展着的。有時，他們竟與集體農莊完全隔離了，某些選委委員竟不是從本邊疆內相當區組織方面，而是在莫斯科從中央委員方面得到關於本邊疆集體農莊內

情形的消息。同志們，這是很痛心的，但這是事實。由個體經濟過渡到集體農莊，本應使共產黨員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加強起來。而在事實上這一過渡却往往使共產黨員專以集體化高度百分數自誇，以至於高枕而臥，漠不關心，聽其自流，聽其自然。必須對集體農莊經濟實行有計劃領導的問題，本應加強共產黨員在集體農莊裏的領導作用。而事實上呢，共產黨員却往往袖手旁觀，讓那些從前的白衛軍官，從前的皮特柳爾份子以及一般工農敵人去把持集體農莊。

我們的農村工作方面缺點所由產生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如此。

(三)我們的農村工作方面缺點所由產生的第三個原因，就是我們許多同志過分估計了集體農莊這個新經濟形式底作用，結果竟把集體農莊看作偶像。他們認定：既然有了集體農莊這一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於是一切事情都已妥貼了，於是集體農莊事務底正確進行，集體農莊經濟底正確設計，集體農莊變為模範社會主義的農莊，都有保證了。他們沒有瞭解：集體農莊按其組織結構來說還很幼弱，而需要黨方面的重大幫助，需要黨給予它們一些堅定布爾什維克的幹部，需要黨對集體農莊事務實行日常的領導。但這還不能概括一切，甚至不是主要之點。這裏的主要缺點，就是我們許多同志過分估計了集體農莊這種新農業組織形式底力量和可能性。他們沒有瞭解：集體農莊雖然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可是它還遠遠沒有免除各種危險，還沒有免除各種反革命份子鑽進集體農莊領導機關裏來的危險，還沒有免除反蘇維埃份子在某種條件下爲了自己的目的來利用集體農莊的危險。集體農莊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正如蘇維埃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形式一樣。無論集體農莊和蘇維埃，都是我國革命底極大成果，工人階級底極大成果。但集體農莊和蘇維埃不過是個組織

形式，固然是社會主義的組織形式，但終究是個組織形式。一切都依這個形式包含有什麼內容爲轉移。我們知道有工兵代表蘇維埃在一定時期內幫助反革命來反對過革命的事實。在我們蘇聯有過這樣的事實，例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間，蘇維埃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領導的，所以蘇維埃當時掩護反革命來反對過革命。一九一八年末在德國也有過這樣的事實，蘇維埃當時是社會民主黨人所領導的，所以蘇維埃當時掩護反革命來反對過革命。所以，問題不僅在於蘇維埃這個組織形式，雖然這個形式是個極大的革命成果。問題首先就在於蘇維埃底工作內容，問題是在於蘇維埃底工作性質，問題是在於蘇維埃究竟是由誰所領導，是由革命者所領導，抑是由反革命者所領導。正因爲如此，所以反革命者並不是時時都表示反對蘇維埃的。例如大家知道，在喀琅施塔得暴動時，俄國反革命魁首米留可夫曾表示贊成蘇維埃，但不要共產黨人參加。「擁護不要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這就是俄國反革命魁首米留可夫當時所提出的口號。反革命者懂得：問題不僅在於蘇維埃本身，而且首先是在於由誰領導蘇維埃。

集體農莊也是如此。集體農莊這個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如果是由真正的革命者，即布爾什維克，即共產黨員所領導的，那它就能顯出經濟建設奇蹟來。反之，集體農莊如果是由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皮特柳爾的軍官和其他白衛份子，從前的鄧尼金份子和高爾察克份子所把持的，那它在一定時期內就能變成各種反革命罪行底掩護物。同時還要注意到，集體農莊這個組織形式不僅沒有免除反蘇維埃份子鑽進來的危險，而且在第一個時期甚至使反革命份子有一種暫時加以利用的方便的機會。當農民還在進行個體經濟時，他們是散居各處，彼此分立，因此反蘇維埃份子在

農民中間的反革命陰謀還不能發生多大的效果。而在農民過渡到了集體農莊經濟以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裏農民已經有現成的羣衆組織形式，即集體農莊。因此，反蘇維埃份子鑽進集體農莊和進行反蘇維埃活動，也就獲得比較大的效果了。反蘇維埃份子一定是顧到了這一切情形的。大家知道，例如在北高加索一帶，有一部分反革命份子自動設法建立一種類似集體農莊的組織，並利用這些組織作爲掩護他們祕密組織的合法護符。同樣大家知道，反蘇維埃份子在他們還沒有被揭破，還沒有被擊潰的那些區域裏，樂意加入集體農莊，甚至於還讚美集體農莊，以便在集體農莊內建立反革命工作底巢穴。同樣大家知道，現在有一部分反蘇維埃份子自動表示贊成集體農莊，但以不要共產黨員參加集體農莊爲條件。「擁護不要共產黨員參加的集體農莊」——這就是反蘇維埃份子們現在所擬製的口號。所以，問題不僅在於集體農莊這個社會主義組織形式本身，而首先是在於這個形式包含着什麼內容，——問題首先是在於誰主持集體農莊，誰領導集體農莊。

從列寧主義觀點看來，集體農莊這個組織形式，也如蘇維埃一樣，乃是一個武器，而且僅僅是一個武器。在某種條件下，這個武器是用來反對革命的。這個武器是用來反對反革命的。它能服務於工農。在某種條件下，它能服務於工農敵人。全部問題是在於這個武器究竟握在誰手中，這個武器究竟是被利用去反對誰。

工農敵人根據他們的階級本能，已開始瞭解這一點了。

可惜我們有些共產黨員還沒有瞭解這一點。

正因爲我們有些共產黨員沒有瞭解這件簡單事情，所以現時就有些善於隱藏原形的反蘇維埃份子在某些集體農莊裏把持一切，並在那裏組織着暗害工作和怠工勾當。

(四)我們的農村工作方面缺點所由產生的第四個原因，就是我們許多地方工作同志不善於改變反富農鬥爭的戰綫，不瞭解階級敵人底面目近來已經改變了，不瞭解農村中階級敵人底策略已經變更了，不瞭解因此必須改變我們自己的策略以求達到成功。敵人已瞭解這種變更了的環境，已瞭解農村新制度底力量和威勢，因此他們也就改變了自己的工作方法，改變了自己的策略，即是由直接衝擊集體農莊的策略，過渡到了暗中拆台的策略。而我們却沒有瞭解這一點，沒有看透這個新環境，却還繼續在已經沒有敵人的地方去尋找敵人，繼續採用那和富農作簡易鬥爭的舊策略，雖然這個策略早已陳舊不堪了。

人們竟在集體農莊以外尋找敵人，以為敵人還是些面孔兇惡，牙齒巨大，頸項肥胖，持着半截槍的人。人們還在尋找我們在標語上所看見的那樣的富農。可是，這樣的富農早已不存在於地面上了。現時的富農及其走狗，現時的農村反蘇維埃份子，大多數都是「沈默寡言的」，「很和氣的」人，幾乎是些「潔白君子」。他們用不着你到集體農莊很遠以外去找，他們是坐在集體農莊裏面担任管倉人，庶務員，會計員，秘書等等職務的。他們無論何時也不會說「打倒集體農莊」。他們是「贊成」集體農莊的。可是，他們在集體農莊裏面進行非常厲害的怠工勾當和暗害工作，使集體農莊將會大吃其虧。他們無論何時也不會說「打倒糧食採辦工作」。他們是「贊成」糧食採辦工作的。他們「只是」進行蠱惑勾當，要求集體農莊劃出超過實際需要多倍的養畜存糧，要求集體農莊劃出超過實際需要多倍的保險存糧，要求集體農莊按每個工作者一日六磅至十磅糧食的標準發給公共伙食等等。經過這種「貯存」和公共伙食頒發以後，經過這一番狡詐蠱惑勾當以後，集體農莊底經

濟勢力，當然是要大受損傷，而糧食採辦工作當然也就沒有進行餘地了。

要看透這種狡猾敵人，而不落入蠱惑圈套，就要具有革命警覺性，就要有本事來揭破敵人底假面具，而向集體農莊莊員指明敵人的反革命真面目。可是，我們在農村中是不是有很多具備這種品質的共產黨員呢？共產黨員往往不僅沒有揭破這種敵人，反而自行落入了敵人的狡詐蠱惑圈套，甘做敵人底尾巴。

我們有些同志既沒有看破這已經戴着新假面具的敵人，既不善於揭穿他們的攪騙手腕，就往往妄自安慰，以為世上已經沒有了富農，以為農村中的反蘇維埃份子已因消滅富農階級政策實行的結果而被剷除了，以為因此也就可以讓「中立的」集體農莊存在，這種「中立的」集體農莊既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也不是反蘇維埃的，而是一定會按所謂自然方式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但這是個很大的錯誤，同志們。富農是被打破了，可是還遠遠沒有剷除乾淨。而且，如果共產黨人竟打起瞋睡來，泰然自安，以為富農會按所謂自然發展方式跑到墳墓裏去，那末富農是不會很快就被澈底消滅的。至於說到「中立的」集體農莊，那在天地間根本就沒有這種集體農莊，而且也不會有這種集體農莊。「中立的」集體農莊是雖有眼睛而毫無視力的人所臆想出來的。在現時我們蘇維埃國家發生這種尖銳階級鬥爭的條件下，「中立的」集體農莊決沒有存在的餘地；在這種環境中，集體農莊或者是布爾什維克的，或者就是反蘇維埃的。如果某個集體農莊不是我們所領導的，那它就會是反蘇維埃份子所領導的了。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

(五)末了，還要說到我們的農村工作方面缺點所由產生的最後一個原因。這個原因就是有人

看輕了共產黨員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中的作用和責任，看輕了共產黨員在糧食採辦工作中的作用和責任。說到糧食採辦困難時，共產黨員通常都把責任卸到農民頭上，硬說一切都是農民的過失。但這是完全不對的，是絕對不公平的。農民與此毫不相干。如果說到責任和過失，那末責任是完完全全要由共產黨員來担負，而全部過失都是我們共產黨員底過失。

世界上沒有而且未曾有過如像我們蘇維埃政權這樣一個強大而富有威信的政權。世界上沒有而且未曾有過如像我們共產黨這樣一個強大而富有威信的政黨。誰也沒有阻碍，而且誰也不能阻碍我們按照集體農莊底利益，按照國家利益底要求來進行集體農莊事業。如果我們並不是時時都按照列寧主義底要求來進行集體農莊事業，如果我們往往作出了許多不可寬恕的嚴重錯誤，例如在糧食採辦方面，那末這裏的過失就是我們的過失，而且只是我們的過失。

我們的過失，就是我們沒有看出集體農莊糧食貿易底短處，而犯了一些極嚴重的錯誤。我們的過失，就是我們有不少的組織脫離了集體農莊生活，却高枕而臥，聽其自然。我們的過失，就是我們有不少的同志還在過分估計集體農莊這個羣衆組織形式底作用，却不懂得主要點並不是這個形式，而是要親自担負起領導集體農莊的重任，並把反蘇維埃份子從集體農莊領導機關中驅逐出去。我們的過失，就是我們沒有看破新環境，沒有瞭解階級敵人用暗中拆台手段來動作的新策略。

試問這與農民有什麼相干呢？

我知道有許多多集體農莊都在向前發展，日益繁榮，按時確切執行國家所規定的任務，並在經濟上日益鞏固起來。另一方面，我又知道，有些集體農莊，雖然是與上面那些集體農莊為隣，雖

然是與那些集體農莊有同樣的收成和同樣的客觀條件，但它們却日見衰弱和腐化下去。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於第一種集體農莊是由真正的共產黨員所領導，而第二種集體農莊是由癡獸子所領導的，這些癡獸子雖也帶有黨證，但終究是些癡獸子。

試問這與農民有什麼相干呢？

人們由於看輕了共產黨員底作用與責任，也就往往不是到應當尋找的地方去尋找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原因，而缺點也就因此而仍然沒有剷除。

不要在農民中間尋找那阻難糧食採辦工作的原因，而要在我們自己中間，要在我們本身隊伍中間來尋找這個原因。因為我們執掌着政權，我們擁有國家資具，我們担负有領導集體農莊的使命，於是我們也就應當對農村工作負完全責任。

我們農村工作方面缺點所由發生的各種主要原因，就是如此。

也許有人以為我所描寫的情形未免太糟了，以為我們的農村工作盡是一些缺點。但這當然是不對的。其實，除這些缺點而外，我們的農村工作還有許多有決定意義的重大成績。可是，我在開始發言時就已經說過，我並不立意來敘述我們的成績，而只來講一講我們在農村工作中的缺點。

這些缺點可以糾正麼？是的，是絕對可以糾正的。我們在最近將來就會糾正這些缺點麼？是的，是絕對會糾正的。關於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

我認為，農業機器站政治部和蘇維埃農莊政治部，就是我們所能用來在最短期間消滅這些缺點的最重要工具之一。（經久不息的熱烈鼓掌）。

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

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集體農莊男女莊員同志們！我本沒有打算在你們代表大會上來發言。其所以沒有打算，是因為在我以前發言的各位同志，已經把所有要說的話都講過了，而且說得很好，說得很中肯。既然如此，是不是還值得出來發言呢？可是因為你們定要我出來說話，而權力又在你們手裏（鼓掌多時），我也只好唯命是聽了。

現在我就關於個別問題說幾句話。

（二）集體農莊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第一個問題——集體農民所走上的道路是不是正確呢，集體農莊道路是不是正確呢？

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沒有意思的問題。你們集體農莊突擊隊員，關於集體農莊站在正確道路上這一點，大概是不會懷疑的。所以，這個問題在你們看來也許是個多餘的問題。可是，並非

個個農民都像你們這樣想法。有不少的農民，其中也有集體農莊莊員，還懷疑集體農莊道路是條正確的道路。而這是毫不奇怪的。的確，數百年來，大家都過着舊的生活，走着舊的道路，替富農和地主，替高利貸者和投機者出力生利。雖不可說這條舊道路，這條資本主義道路得到過農民方面的贊同。可是，這條舊道路總是一條已經走熟了走慣了的道路，而且誰也沒有實地證明可以過另外一種生活，過較好的生活。何況現時在所有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裏，人們仍然還過着舊生活哩！而布爾什維克却像狂風暴雨一般，突然衝進這個舊的暗淡無光的生活裏來說道：已經是拋棄舊道路的時候了，已經是開始來過新生活，來過集體農莊生活的時候了，已經是不照現在資產階級國家裏大家那樣生活，而來過新生活，來過勞動組合制的生活的時候了。而誰知道這新生活究竟是怎樣一種生活呢。恐怕它比舊生活更壞哩。無論如何，新道路總是一條沒有走慣的道路，是一條沒有走熟的道路，是一條還沒有完全熟悉的道路。倒不如留在舊道路上吧？倒不如等待一下，然後進到新道路，即集體農莊道路上去吧？是不是值得冒險呢？

這就是現在一部分勞動農民所懷着的疑問。

我們應該消除這些疑問麼？我們應該揭露這些疑問而指明其毫無價值麼？當然是應該的。

所以，上面所提出的那個問題，也就不可說是個沒有意思的問題。

那末，集體農莊所走上的道路是不是正確呢？

有些同志以為我們過渡到新道路，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是在三年以前開始的。這種意見只是局部正確。固然，廣大的集體農莊建設是在三年以前開始的。大家知道，這個過渡底特徵就是富農

被擊潰，千百萬貧農中農羣衆加入集體農莊。所有這一切都是對的。可是，爲要使這種廣大集體農莊建設能夠開始實行起來，就要具備一些預備條件，否則廣大集體農莊運動就會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就需要有一個幫助了，並且繼續幫助着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道路的蘇維埃政權。第二，必須趕走地主和資本家，剝奪他們的工廠和土地，並宣佈工廠和土地爲人民公產。第三，必須壓制富農，剝奪他們所有的機器和拖拉機。第四，必須宣佈，只有加入集體農莊的貧農中農才能享用機器和拖拉機。最後，必須使全國工業化，設立新的拖拉機工業，建成新的農業機器製造廠，以使用數量充足的拖拉機和機器來供給集體農民。沒有這些預備條件，便根本談不到三年前所開始的那個廣大集體農莊運動。

所以，要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首先就得實現十月革命，推翻資本家和地主，剝奪他們所有的土地和工廠，創立新工業。

過渡到新道路，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的運動，是從十月革命時起就開始了的。這個運動所以直到三年前才大大擴展起來，是因爲十月革命底經濟果實直到那個時候才完全顯露了出來，因爲我們直到那個時候才推進了全國工業化的事業。

在各國人民史上有過不少的革命。它們和十月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們都是些片面性的革命。對勞動者剝削形式是新陳代謝了，但剝削制本身仍然存在。剝削者和壓迫者是新陳代謝了，但剝削者和壓迫者本身仍然存在。只有十月革命才抱定了消滅任何剝削制，消滅所有一切剝削者和壓迫者的目的。

奴隸革命是把奴隸主消滅了，是把奴隸主對勞動者的剝削形式廢除了。可是，這革命用農奴主來代替了奴隸主，用農奴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來代替了奴隸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一種剝削者是別一種剝削者所代替了。在奴隸制度下，「法律」允許奴隸主打死奴隸。在農奴制度下，「法律」只允許農奴主出賣農奴。

農奴革命是把農奴主消滅了，是把農奴制的剝削形式廢除了。可是，這革命用資本家和地主來代替了農奴主，用資本家和地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來代替了農奴制的剝削形式。這一種剝削者是由別一種剝削者所代替了。在農奴制度下，「法律」允許出賣農奴。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法律」只允許使勞動者陷於失業和貧困，陷於破產和餓死。

只有我們蘇維埃革命，只有我們十月革命，才力求不是用一種剝削者來代替別一種剝削者，不是用一種剝削形式來代替別一種剝削形式，而是根本剷除任何剝削制，根本剷除所有一切剝削者，所有一切富豪和壓迫者，不管他們是新的也好，舊的也好。（鼓掌多時）。

正因為如此，所以十月革命是使農民能過渡到新道路，即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的預備條件和必要前提。

農民幫助十月革命，是不是作得正確呢？是的，他們是作得正確的。其所以作得正確，是因為十月革命幫助他們擺脫了地主和資本家，高利貸者和富農，商人和投機者。

但這還只是問題底一方面。趕走壓迫者，趕走地主和資本家，壓制富農和投機者，——這當然是很好的。但這還不夠。爲了最終擺脫舊時羈絆，僅僅擊潰剝削者還是不夠的。爲了這一點，還

要建立新生活，還要創造出一個使勞動農民能改善他們的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增進他們的幸福的生活。爲了這一點，就要在農村中建立新制度，即集體農莊制度。這就是問題底另一方面。

舊制度與集體農莊的新制度有什麼區別呢？

在舊制度下，農民們總是單獨做工，用古老的方法，用舊式的農具做工，替地主和資本家，替富農和投機商人做工，替他們生財致富，而自己却是一輩子忍飢受餓。而在新制度下，在集體農莊制度下，農民們却是共同做工，按勞動組合方式做工，用新式農具，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做工，大家都是爲自己，爲自己的集體農莊做工，過着沒有資本家和地主，沒有富農和投機者插足的生活，他們做工，是爲了一天比一天改善自己的物質和文化狀況。在舊制度那裏，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是幫助富豪來反對勞動農民的。而在新制度這裏，在集體農莊制度這裏，政府却是工農的，是幫助工農來反對所有一切富豪的。舊制度引向於資本主義。而新制度引向於社會主義。

你們看，這裏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另一條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條是向前走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另一條是向後退到資本主義的道路。

有人以爲有什麼第三條道路可走。有些同志還猶豫不決，表示動搖，不完全相信集體農莊道路是條正確道路，而特別喜歡援引這誰也不知道的第三條道路。他們想要我們恢復舊制度，恢復個體經濟，不過是不要地主和資本家而已。同時，他們要我們「只」容許富農以及其他各種小資本家存在，作爲我國經濟制度中的正常現象。其實，這並不是第三條道路，而是第二條道路，即走向資本

主義的道路。請問什麼是恢復個體經濟，恢復富農呢？這就是恢復富農盤剝，恢復富農對農民的剝削，使富農佔有勢力。可是，難道可以恢復富農，而同時保持蘇維埃政權麼？當然是不可以的。恢復富農，結果就會成立富農政權，取消蘇維埃政權，於是就會成立資產階級政府。而成立資產階級政府，結果就會恢復地主和資本家，恢復資本主義。所謂第三條道路，其實就是第二條道路，就是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道路。請你們問一問農民，——問他們是不是願意恢復富農盤剝，是不是願意恢復資本主義，是不是願意取消蘇維埃政權而恢復地主資本家政權吧？你們只須問一問農民，就會知道大多數勞動農民究竟是把那一條道路看作唯一正確的道路了。

所以，只有兩條道路：或者是向前走，向上走到新制度，即集體農莊制度；或者是往後退，向下走到舊制度，即富農資本家制度。

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勞動農民拒絕資本主義道路而走上集體農莊建設道路，是作得正確的。

有人說，集體農莊道路雖是一條正確道路，但它同時又是一條困難道路。這種說法只是局部正確。當然，在這條道路上是有困難的。優美生活是不能憑空得到的。可是，問題是在於主要困難已經渡過了，而現時擺在你們面前的困難，甚至不值得認真去說。無論如何，你們各位莊員同志面前所有的困難，與工人在十年至十五年前所經受的那些困難比較起來，是很小很小的。你們的發言人在這裏講話時，稱讚了列寧、格拉、莫斯科、哈爾科夫和頓巴斯的工人。他們說：他們的工人那裏有各種各樣的成績，而我們集體農莊莊員這裏所有的成績，却就少得多了。我覺得，你

們的這些發言人在演說中甚至流露出一些同志態度的羨妒心：如果我們集體農莊莊員也和你們列寧格勒，莫斯科，頓巴斯和哈爾科夫工人一樣有這種成績，那就很好了！所有這些都是對的。但你們知道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工人是用很大的代價換得這些成績，是經受過許多痛苦，才達到這些成績的麼？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些關於一九一八年工人生活情形的事實。當時，往往是一整個星期沒有發給工人一塊麵包，更不必說肉類和其他食品了。當時只要能發給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工人一兩半黑麵包——而且一半還是油渣，——就算是最好的日子了。而這種情況不僅是繼續了幾個月，不僅是繼續了半年，而且繼續了整整兩年之久。但工人們總是忍耐着，並沒有灰心喪氣，因為他們知道好時光必會到來，他們必會達到決斷的成績。結果怎樣呢，——你們自己知道工人果然沒有想錯哩。你們只須把你們的困難痛苦和工人們所受過的困難痛苦比較一下，便知道你們的困難痛苦甚至值不得認真去說了。

究竟要有一些什麼條件，才可推進集體農莊運動和儘量擴展集體農莊建設呢？

首先，就要集體農莊擁有十分穩定而適於耕種的土地。你們有這種土地麼？是的，有這種土地。大家知道，一切優良土地都已轉交集體農莊，而且是穩固地留歸集體農莊了。所以，集體農莊莊員儘可安心來耕種和改良這些土地，而不必害怕這些土地會落到別人手裏去。

第二，就要集體農莊莊員能享用拖拉機和機器。你們有這些東西麼？是的，有這些東西。大家知道，我們的拖拉機製造廠和農業機器製造廠，首先而且主要是爲了用一切新式工具供給集體農莊而工作的。

最後，還要政府實行用人材和經費來儘量幫助集體農民，而不讓敵對階級餘孽破壞集體農莊。你們有這樣的政府麼？是的，有這樣的政府。這個政府就叫做工農蘇維埃政府。請你們指給我看，究竟還有那一個國家的政府不是幫助地主和資本家，不是幫助富農以及其他富豪，而是幫助勞動農民的。天地間再沒有這樣一個國家，而且從來也沒有過這樣一個國家。祇有我們蘇維埃國家裏的政府，才是竭力保護工人和集體農民，保護城鄉一切勞動者，而反對一切富豪和剝削者的。（鼓掌時）。

所以，你們具有擴展集體農莊建設和完全擺脫舊時羈絆的一切必要條件。

現在所要求於你們的，只是要誠懇工作，按勞動分配集體農莊收入，保護集體農莊財產，保護拖拉機和機器，仔細照料馬匹，執行你們工農國家所定的計劃，鞏固集體農莊，把混進集體農莊來的富農和富農走狗驅逐出去。

你們想必同意我的意見，認為要克服這些困難，就是說要誠懇工作和保護集體農莊財產，是很難作到的。何況你們現在又不是為富豪作工，不是為剝削者作工，而是為自己，為自己集體農莊作工哩。

由此可見，集體農莊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對於勞動農民是條唯一正確的道路。

(二) 我們最近的任務，是要把一切集

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

第二個問題——我們在新道路上，在集體農莊道路上，已達到了什麼成績，以及最近兩三年內又想達到什麼成績呢？

社會主義是一件好事情。幸福的社會主義生活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所有這些都是將來的事情。現在的主要問題，並不是我們將能達到什麼成績的問題，而是我們現時已達到了什麼成績的問題。農民已走上集體農莊道路了。這當然很好。可是，農民在這條道路上達到了什麼成績呢？我們在集體農莊道路上前進時，究竟達到了什麼具體成績呢？

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就是我們幫助千百萬貧農羣衆加入了集體農莊。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就是千百萬貧農羣衆已因加入集體農莊和在集體農莊裏享用優良土地和優良農具而昇到中農水準了。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就是千百萬從前忍飢挨餓的貧農羣衆，現時在集體農莊裏已成爲中農，成爲生活有保障的人了。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就是我們已打破了農民分化爲貧農富農的過程，擊潰了富農，並幫助貧農成爲集體農莊裏本身勞動主人翁，成爲中農了。

四年以前，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尚未擴展以前的情形是怎樣呢？當時富農日益豪富，向上昇進，而貧農日益貧窮破產，遭受富農盤剝。當時中農想爬上去變成富農，但每一次都滾落下來變成

了貧農，使富農心悅意樂。在所有這些紊亂情形中佔到便宜的，當然只有富農，或者也許還有幾個豐裕農。當時在農村每一百家農戶中有四五家是富農，八家或十家是豐裕農，四十五至五十家是中農，以及三十五家是貧農。所以，受富農盤剝的貧農至少要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三十五。我還不說那些能力單薄的中農，他們在中農總數中佔大半數，他們論地位是與貧農很少區別，也是直接依賴於富農的。

我們擴展集體農莊建設的結果，消滅了這種不公平的紊亂現象，打破了富農盤剝，把所有這些貧農羣衆都吸收到集體農莊裏來了，並在集體農莊裏給了他們有保障的生活，把他們提到了中農水準，使他們能夠享用集體農莊土地，享受集體農莊所有的優待權，享用拖拉機以及各種農業機器。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不下二千萬農民，不下二千萬貧農，已擺脫了貧困破產痛苦，擺脫了富農盤剝，並因加入集體農莊而變成生活有保障的人了。

同志們，這是個巨大的成績。這樣的成績是世界上最沒有見過的，是世界上最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沒有達到過的。

這就是集體農莊建設事業所達到的實際的具體的結果，這就是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道路的結果。但這還只是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道路上所達到的第一個步驟，第一個成績。

如果以爲我們應當停留在這第一個步驟上，停留在這第一個成績上，那就不正確了。不，同志們，我們決不可停留在這個成績上。要繼續推進並最終鞏固集體農莊，我們就應實行第二個步驟，就應當達到新的成績。這第二個步驟是什麼呢？這第二個步驟就是要把所有的集體農莊莊員，把從

前的貧農和從前的中農底地位都提得更高。這第二個步驟就是要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是的，同志們，正是要把他們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鼓掌多時）。

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就是我們倚靠着集體農莊，把貧農提高到中農水準了。這當然很好。但這還不夠。我們現在還應當更進一步，還要幫助集體農莊全體莊員，幫助從前的貧農和從前的中農昇到生活豐裕的程度。我們可以達到這一步，而且無論如何都應當達到這一步。（鼓掌多時）。我們現在有達到我們這個目的所必需的一切條件。現在我們的機器和拖拉機還利用得不好。我們的土地還耕種得不好。我們只須改良機器和拖拉機的使用，只須改良土地的耕種，就能把我們的收成增加一兩倍。這樣就完全能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集體農莊田場勞動者了。

從前，豐裕農是怎樣一種情形呢？當時要成爲豐裕農，就得欺侮自己的鄰人，就得剝削他們，賣東西給他們要賣貴些，向他們買東西要買賤些，僱傭一些雇農，極力剝削他們，積累一些本錢，然後一經穩固，就可變成富農了。正因為如此，所以從前在個體經濟制度下，豐裕農也就引起貧農中農方面的不信任和仇恨。現在的情形已經不同了。現在的條件也不同了。現在，集體農莊莊員要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完全不必欺侮或剝削自己的鄰人。而且現在要剝削某一個人也不容易了，因為我們這裏土地私有制或租佃制已不存在，機器和拖拉機一概是屬於國家的，而擁有資本的人在集體農莊裏面已經不是時髦了。從前是有過這種時髦的，但它已一去不返了。現在，要變成爲豐裕的集體農莊莊員，只要在集體農莊裏誠懇工作，正確利用拖拉機和機器，正確利用耕畜，正確耕種土地，愛護集體農莊財產就行了。

人們有時說：既有了社會主義，何必還要勞動呢？從前勞動，現在又勞動，——難道還沒有到停止勞動的時候麼？這種說法是根本不對的，同志們。這是懶漢底哲學，而不是誠懇勞動者底哲學。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勞動。恰巧相反，社會主義正是建築在勞動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和勞動是分不開的。我們的偉大導師列寧說過：「不勞動者不得食」。列寧底話是什麼意思，是反對什麼人的呢？就是要反對那些剝削者，反對那些不勞而獲的人，即反對那些強迫他人做工，靠剝削他人來發財致富的人。此外，還要反對什麼人呢？還要反對那些好吃懶做，想靠他人來享福的人。社會主義並不是要大家好吃懶做，而是要大家誠懇勞動，不是替別人去勞動，不是替富豪和剝削者去勞動，而是爲自己，爲社會而勞動。假使我們誠懇勞動，爲自己，爲自己的集體農莊來誠懇勞動，那我們在最近兩三年內就一定會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把這些從前的貧農和從前的中農變成爲生活富裕的人，變成爲享有豐富產品並過着完全文明生活的人了。

這就是我們最近的任務。這一步是我們能夠做到，而且無論如何都應當做到的。（鼓掌多時）。

（三）幾點個別的意见

現在讓我來說說幾點個別的意见。

首先就要說說我們的農村中的黨員。你們中間有許多黨員，可是非黨員還要更多。參加這次大會的非黨員比黨員更多，這是種好現象，因爲我們首先就要吸收非黨員來參加我們的事業。有些共

產黨員是用布爾什維克態度來對待非黨員集體農民的。可是，還有一些共產黨員却以自己的黨員資格自傲，不許非黨員來和他接近。這是不好的，而且是有害的。布爾什維克所以有力量，共產黨員所以有力量，就是因為他們善於把千百萬非黨員積極份子團結在我們黨週圍。我們布爾什維克如果沒能使千百萬非黨員工農羣衆來信任我們黨，便不會有現在這樣的勝利。可是，要怎樣才可做到這一步呢？要做到這一步，就要黨員不與非黨員隔絕，不要閉戶幽居，不要以自己的黨員資格自傲，而要傾聽非黨員底意見，不僅是要教導非黨員，而且要向非黨員學習。

不要忘記，黨員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要記着，所有一切黨員自己都是由非黨員變成黨員的。今天他是一個非黨員，明天他就會成爲黨員了。究竟有什麼可以自傲的地方呢？我們老布爾什維克當中有許多同志已在黨內做了二三十年的工作。而我們自己過去也有一個時候不會是黨員哩。假使在二三十年以前，當時的黨員也鄙視我們，不許我們接近黨，那我們會有怎樣的情形呢？我們也許會在黨外多混幾年的。可是，同志們，我們老布爾什維克並不是一些最中用的人哩。（聽衆笑容滿面，鼓掌多時）。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的黨員，我們的現時還很年輕而有時瞧不起非黨員的那些黨員，就應當記着這一切情形。應當記着：使布爾什維克增光的，不是驕傲，而是謙遜。

現在，我要說說婦女問題，說說集體農莊女莊員問題。同志們，集體農莊中的婦女問題是個大問題。我知道，你們中間有許多年輕視婦女，甚至於嘲笑婦女。可是，同志們，這是一個錯誤，這是一個嚴重錯誤。這裏，問題不僅在於婦女佔人口半數。問題首先是在於集體農莊運動

已提拔出許多出色的能幹的婦女來擔任領導職務。你們只要看看這次代表大會，看看代表成份，就知道婦女早已由落後者升為先進者了。婦女在集體農莊中是個巨大的力量。埋沒這個力量，就是犯罪了。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在集體農莊中提拔婦女，運用這個力量。

固然，蘇維埃政權在不久以前是與集體農莊女莊員發生過一點小小的誤會。這就是關於乳牛問題。可是，現在，乳牛問題已經妥當解決了，於是這個誤會也就消釋了。（長時間的鼓掌）。我們已經做到使大多數集體農莊莊員每家都有一條乳牛了。再過一兩年，就不會再有一個集體農莊莊員沒有自家的乳牛了。我們布爾什維克總是要設法使我們的集體農莊莊員每家都有一條乳牛的。（長時間的鼓掌）。

至於集體農莊女莊員自己，她們就應當記着集體農莊對於婦女的作用與意義，應當記着她們祇有在集體農莊裏面才有可能獲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沒有集體農莊，就沒有平等；而在集體農莊裏面，就有男女平等權。請集體農莊女莊員同志們記着這一點，請她們要像愛護瞳珠一樣來愛護集體農莊制度。（長時間的鼓掌）。

現在，我要說說集體農莊中的男女青年團員問題。同志們，青年是我們的將來，是我們的希望。青年將來應當替換我們這些老頭子。青年將來應當把我們的旗幟撐持到最終的勝利。在農民當中有不少的老頭子懷着舊見解，抱着舊習慣，思慕舊生活。當然，這樣的老頭子不是時常都能跟得上黨，跟得上蘇維埃政權的。我們的青年就不同了。我們的青年並沒沾染有什麼舊見解，所以最容易瞭解列寧遺訓。正因為青年最容易瞭解列寧遺訓，所以青年就有引導落後份子前進，引導動搖份

子前進的使命。固然，青年還缺乏知識。可是，知識是可以求得的东西。今天沒有知識，明天就會有知識了。因此，你們的任務就是要學習和再三學習列寧主義。男女青年團員同志們！學習布爾什維主義和引導動搖份子前進吧！少講空話，多做工作，——那你們便一定會有成功的（鼓掌）。

現在，我要說說個體農民問題。這裏很少說到個體農民問題。但這還不是說個體農民已不復存在於人世了。決不是這樣一回事。個體農民還存在着，決不可忽略他們，因為他們是我們明天的集體農莊莊員。我知道，有一部分個體農民已經完全墮落，跑去作投機事業了。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的集體農莊莊員在接收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時，總是實行嚴格挑選，有時甚至完全不接收他們。這當然是正確而不容有異議的。可是，除此而外，還有其他更大一部分的個體農民，他們沒有作投機事業，而是專靠誠懇工作來維持生活。這些個體農民也許是不拒絕加入集體農莊的。可是，他們至今還沒有加入進來，一則因為他們還懷疑集體農莊道路底正確，二則因為現在集體農莊莊員中間有一種仇恨個體農民的心理。

當然，要瞭解集體農莊莊員，要諒解他們。他們近幾年來受到了個體農民方面不少的侮辱和嘲笑。可是，侮辱和嘲笑在這裏不應有決定的意義。一個領導者竟不肯忘掉這種侮辱，却把自己的感情看得比集體農莊事業利益還高，那他就不是一個不好的領導者了。你們如果想作領導者，就應當忘記個別個體農民所加於你們的侮辱。兩年以前，我接到了一位寡居農婦從窩爾加區域寄來的一封信。她對我訴說人家不願意接收她加入集體農莊，並且要我幫助她。我當時就寫信去問這個集體農莊。這個集體農莊給我回信說，他們不能夠接收她加入集體農莊，因為她侮辱過集體農民大會。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原來是在一次農民大會上，集體農莊莊員號召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而這位寡婦聽了這個號召後，就掀起自己的裙子來說道：「唯！把你們的集體農莊拿去吧！」（全場大笑）。這位寡婦當然作得不對，而且確實是侮辱了大會。可是，既然她經過一年以後已經誠懇悔過和承認了錯誤，是否還可拒絕她加入集體農莊的請求呢？我認為是不可拒絕的。於是我就把這種意見寫給那個集體農莊。而他們馬上就把這位寡婦接受了。結果怎樣呢？原來，她現時在集體農莊裏做工做得很好，不僅沒有落後，而且是站在前列哩。（鼓掌）。

你們從這個例子中又可以看出：一個身居領導者地位的人，如果想成為真正的領導者，那末他爲着事業利益計，在必要時就得忘掉他所受到的侮辱。

關於一般個體農民，也要這樣說。我並不反對經過選擇來接受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可是，我反對那種不分青黃皂白，籠統不許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辦法。這不是我們布爾什維克的政策。集體農莊莊員不應當忘記，他們自己在不久以前也曾是個體農民哩。

最後，我還要說說別金楚克區集體農莊莊員所寫來的一封信。這封信已在報紙上發表過了，你們大概都已讀過。這封信確實是很好的。這封信證明，我們的集體農莊莊員中間已有許多很有經驗，很有覺悟的集體農莊事業組織者和鼓動者，真是我國可以引以自豪的人。可是，這封信裏也有一點不正確的地方，對於這一點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贊同的。原來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把他們在集體農莊中的勞動看作是平凡的勞動，幾乎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勞動，而把那些往往說得滔滔不斷的演說家和領袖們底勞動看作偉大的勞動，創造性的勞動。可以贊同這種意見麼？不，同志們，無論如何也和領袖們底勞動看作偉大的勞動，創造性的勞動。可以贊同這種意見麼？不，同志們，無論如何也

是不可贊同這種意見的。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在這裏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也許是因講客氣而犯了這個錯誤。可是，錯誤並不因此而不成其為錯誤。把領袖看作唯一的歷史創造者，而把工人和農民看得一錢不值的那種時候，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民族和國家底命運不只是由領袖來決定，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萬勞動羣衆來決定的。工人和農民埋頭苦幹，毫不聲張地建設工廠和製造廠，建設礦井和鐵路，建設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創造一切生活品，把衣食供給全世界，——這就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創造者。我們的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大概是把這一點忘記了。誇大本身力量，誇功自傲，這當然是不好的。這就會弄到妄自尊大，而妄自尊大却是一種不好的事情。可是，小視自己的力量，不知道自己所幹的『平凡的』『不顯著的』勞動在事實上正是決定歷史命運的偉大和創造性的勞動，那就更壞了。

我希望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接受我對他們那封信所作的這個小小的修正。

同志們，我們就講到這裏為止吧。

（長時間的鼓掌，轉為歡呼。全場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大呼『烏啦』。會場中高呼：『斯大林同志萬歲，烏啦！先進的集體農莊莊員萬歲！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同志萬歲！』）

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 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世界資本主義底延續危機和蘇聯底外部狀況

同志們！自從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時起，迄今已有三年多了。時期雖不很長，可是這個時期比其他任何時期都含有更豐富的内容。我認爲，在最近十年以來，再沒有那一個時期包含有這樣豐富的事變。

在經濟方面，這些年份是世界經濟危機延續的年份。這次危機不僅包括了全部工業，而且包括了全部農業。這次危機不僅是在生產範圍和商業範圍裏洶湧流行起來，而且蔓延於信貸範圍和金融範圍，完全推翻了各國間原有的信貸關係和金融關係。從前在某些地方還有人爭論是否有世界經濟危機，但現在誰也不來爭論這個問題了，因為經濟危機及其破壞作用已經是非常明顯的事實。

現在所爭論的，已經是另一個問題，就是能否找到走出危機的出路，如果找不到出路，那末應當怎樣來實現這條出路呢。

在政治方面，這些年份是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關係以及各國內部關係更加尖銳化的年份。日本對華開戰和佔領東三省，結果已使遠東關係尖銳化；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和復仇思想的猖獗，結果已使歐洲關係尖銳化；日德兩國退出國際聯盟，結果是更加推動了軍備的擴張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法西斯主義在西班牙的失敗，再次證明革命危機已在成熟起來，而法西斯主義底壽命是很不長久的，——這就是報告期內最重要的事實。無怪乎資產階級和平主義已奄奄待斃，而裁軍趨勢便公開直接由擴充軍備和補充軍備的趨勢所代替了。

在這種經濟震動和軍事政治災變的狂風大浪中，蘇聯却似中流砥柱，巍然屹立，繼續進行其社會主義建設並為維護和平而奮鬥的事業。在資本主義國家那裏，經濟危機仍然在洶湧流行，而在蘇聯這裏，無論工業或農業都在繼續高漲。資本主義國家是在瘋狂地準備着重新分割世界和勢力範圍的新戰爭，而蘇聯却一貫繼續進行着堅決鬥爭反對戰爭危險，維護和平，而且不可說蘇聯在這方面的努力沒有獲得什麼成功哩。

這就是現時國際形勢底一般情景。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狀況和政治狀況方面的基本材料。

(二) 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危機底變動

現時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危機和以前一切經濟危機的區別之一，就在於這次危機是最長久最拖延的危機。從前的危機只以一兩年為限，而現時的危機迄今已繼續到第五個年頭，使資本主義各國經濟一年比一年空虛，並把它往年所積累起來的脂膏消耗殆盡。無怪乎這次危機是所有一切危機中最沉重的危機。

為什麼現時工業危機具有這種空前拖延的性質呢？

第一，是因為工業危機普及到了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結果是使它們彼此難於玩弄損人利己的手腕。

第二，是因為工業危機與普及於一切農業國家和半農業國家的農業危機互相錯綜起來，結果不能不使工業危機更加複雜，更加深入。

第三，是因為農業危機在這時期中已經加劇，而普及於一切農業部門，包括養畜業在內，竟使全部農業陷於退化，由機器生產退到手工勞動，用馬匹代替拖拉機，大大減少人造肥料的採用，甚至完全停止採用人造肥料，結果便使工業危機更加拖延下去。

第四，是因為那些在工業中佔居統治地位的壟斷性的卡德爾極力保持高度物價，結果便使經濟危機成為特別痛苦的危機，並阻礙着存貨消散的過程。

最後，並且主要是因為這次工業危機爆發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此時資本主義無論在各

基本國家或各殖民地和依賴國裏，都已經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它在大戰和十月革命以前所有過的那種力量 and 堅固性；此時資本主義各國工業由帝國主義大戰方面承受了一種再也無法擺脫的遺產，即企業中生產能力經常不能全部利用和數千萬人失業的現象。

以上便是使現時工業危機具有十分拖延性質的種種情況。

同時，這些情況又使這次經濟危機不僅包括到生產範圍和商業範圍，而且蔓延於信貸關係，金融和債務等等範圍中，打破了各個國家彼此間以及各個國家內部各社會集團間歷來因襲的關係。

物價的跌落在這裏起了巨大的作用。不管那些壟斷性的卡德爾如何反抗，但商品價格總是兇猛跌落下去，並且價格跌得最先最厲害的是那些無組織的商品佔有人，即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本家所有的商品，而那些有組織的商品佔有人，即加入了卡德爾的資本家出賣商品的價格，却跌得比較慢，比較少。物價的跌落使債務人（工業家，手工業者，農民等等）境遇惡劣不堪，而使債權人境遇空前優越。這種情況當然要使許多公司和單個企業主受到極大的破產，並且真正使它們遭到了這種破產。最近三年來，在美德英法等國有成千成萬股份公司都因此相繼破產了。股份公司破產以後，接着就是貨幣跌價，結果就稍許減輕了債務人所受的困難。貨幣跌價以後，接着就有國家法定停付內債外債的事情。如德國的達姆司泰銀行和特烈士登銀行，奧國的信用機關等等銀行，以及瑞典的克萊格爾康采恩，美國的股蘇爾康采恩等等破產的事實，是人所共知的。

這些動搖了信貸制基礎的現象，當然要引起，而且真正引起了停付信貸和外債，停付各協約國間債務，停止資本輸出，更加縮小對外貿易，更加減少商品出口的現象，加緊爭奪國外市場的鬥

爭，各國彼此進行商業戰爭，實行傾銷政策。是的，同志們，的確是傾銷政策。我所說的，並不是歐美高貴國會中某些高貴議員在不久前還叫得聲嘶力竭的那種臆造的蘇維埃傾銷政策，而是幾乎所有一切「文明」國家都在實行，但爲這些勇敢和高貴議員巧加隱諱的那個真正傾銷政策。

同樣，這些陪伴着工業危機而爆發於生產範圍以外的破壞性的現象，又當然要反過來影響到工業危機進程，使其更加深入，更加複雜。

這就是工業危機變動底一般情景。

現在且從官方統計中引證一些說明報告期內工業危機進程的數目字。

工業出產量比較表（把一九二九年出產量當作一百計算）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蘇聯	一〇〇	一二九・七	一六二・九
美國	一〇〇	八〇・七	六八・一
英國	一〇〇	九二・四	八三・八
德國	一〇〇	八八・三	七一・七
法國	一〇〇	一〇〇・七	八九・二
			六九・一
			七七・四
			二〇一・六
			六四・九
			八六・一
			六六・八

這個統計表是無須說明的。

各基本資本主義國家底工業，與一九二九年水準相較，是一年比一年低落下去，直到一九三三年才開始恢復一些，但是也遠遠未達到一九二九年的水準；而蘇聯工業在同一時期却是不斷高漲

着，一年比一年增加起來。

各基本資本主義國家一九三三年末的工業出產量，與一九二九年的水準相較，平均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而蘇聯工業出產量在同一時期却增加了一倍多，即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以上。（鼓掌）。

照這個統計表看起來，也許覺得在這四個資本主義國家中，英國所處的情況是最吉利的了。但這是不完全正確的。若把這幾國工業拿來和它們的戰前水準比較一下，那末情形就有些不同了。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工業出產量比較表（把戰前出產量當作一百計算）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蘇聯	一〇〇	一九四·三	二五二·一	三一四·七	三五九·〇	三九一·九
美國	一〇〇	一七〇·二	一三七·三	一一五·九	九一·四	一一〇·二
英國	一〇〇	九九·一	九一·五	八三·〇	八二·五	八五·二
德國	一〇〇	一一三·〇	九九·八	八一·〇	六七·六	七五·四
法國	一〇〇	一三九·〇	一四〇·〇	一二四·〇	九六·一	一〇七·六

由此可見，英德兩國工業至今尚未達到戰前水準，美法兩國稍微超過了戰前水準；而蘇聯的工業出產量在這個時期却已大大提高，即比戰前水準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九十以上。（鼓掌）。

可是從這些統計表當中還應得出一個結論。

各基本資本主義國家底工業，從一九三〇年起，特別是從一九三一年起，始終是往下低降，在一九三二年達到了最低落點，而在一九三三年却已開始稍許復元和上昇起來。如果拿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各月統計材料來看，就更能證實這個結論，因為這些統計材料說明，這幾個國家底工業出產量，雖然在一九三三年間起伏不定，可是並沒有表現出降低到一九三二年夏季最低落點的趨勢。

這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明，各基本資本主義國家底工業大概已經渡過了最低落點，而在一九三三年中間已沒有回復到這個最低落點了。

有些人愛說這種現象完全是由於準備戰爭和通貨膨脹的行情一類人造因素的結果。毫無疑義，準備戰爭和通貨膨脹的行情在這裏是起着不小的作用。這對於日本說來是特別正確的，因為這種人造因素在日本是引起某些工業部門——主要是軍事工業部門——稍許活躍的有決定作用的主要力量。可是，若用準備戰爭和通貨膨脹的行情來解釋一切，那便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單就我在上面所說明過的那種工業上的某些進展，不僅是在個別區域和偶然區域內，而且是在所有一切或幾乎所有一切工業國家——包括幣制穩定的國家在內——都可以看見的事實來說，便可知這種解釋是不正確的了。顯然，除了由準備戰爭和通貨膨脹所造成的行情以外，資本主義內部的經濟力量在這裏也起着相當的作用。

資本主義已經把工業困難情形稍許減輕了一些，這首先是由於加緊剝削工人，即用加緊工人勞動強度的辦法來加緊剝削工人；其次是由於加緊剝削本國農民，即用儘量減低他們的勞動產品價格，即減低糧食價格和減低一部分原料品價格的政策來加緊剝削他們；最後是由於加緊剝削殖民地裏和經濟薄弱國家裏的農民，即用加緊減低他們的勞動產品價格，主要是減低原料價格，其次是減低糧食價格的手段來加緊剝削他們。

這是不是說，現在發生的是從危機過渡到普通的蕭條，即過渡到將會引起新的工業高漲和工業興旺的蕭條呢？當然不是。無論如何，現時還沒有什麼能直接或間接證明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高漲行將到來的事實。況且，按一般情形來看，這種事實是不會有的，至少是在最近將來不會有的。所以不會有，是因為那些不讓資本主義國家工業較為認真向上發展的不利條件還繼續起着作用。這些不利條件便是：這次經濟危機所處的資本主義總危機是在繼續着，企業生產能力經常不能全部利用，大批失業者經常存在着，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互相錯綜着，沒有什麼較為認真革新固定資本的趨向，即通常都是工業高漲到來先聲的趨向，以及其他等等。

顯然，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從工業最低落點，從工業危機最深點過渡到蕭條，但它不是普通的蕭條，而是特種的蕭條，它決不會把工業引到新的高漲和興旺，可是也不會使工業回復到最低落點。

(二) 資本主義各國政治狀況的尖銳化

拖延性的經濟危機底結果，便是資本主義各國內部以及它們彼此間政治狀況空前未有的尖銳化。

爭奪國外市場鬥爭的加強，自由貿易最後一點遺跡的消滅，禁止舶來品的關稅制，商業戰爭，貨幣戰爭，傾銷政策以及其他許多表明經濟政策上極端民族主義的類似辦法，都使各國相互關係極度尖銳化，給武裝衝突造成基礎，把戰爭提到日程上作為重新分割世界和勢力範圍而使較強的國家得利的手段。

日本對華戰爭和佔領東三省，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和進攻華北，結果已使形勢更加尖銳化了。爭奪太平洋鬥爭的加強和日美英法海陸軍備的擴張，便是這一尖銳化的結果。

德國退出國際聯盟而力圖實行報復，結果已使歐洲形勢更加尖銳化，使歐洲各國軍備更加增長起來。

無怪乎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現在簡直是奄奄待斃，而裁軍的廢話就由實行增加軍備和補充軍備的「正經」議論所代替了。

現在又像一九一四年那樣，黷武的帝國主義黨，戰爭黨和復仇黨，又是最出風頭的了。

新的戰爭顯然已經逼近起來。

同時，這些因素又使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狀況更加尖銳化了。四年來的工業危機已把工人階級

弄到精疲力竭和痛苦不堪的地步。四年來的農業危機不僅使各基本資本主義國家裏貧苦農民階層完全破產，而特別是使依賴國和殖民地國家裏貧苦農民階層也完全破產了。事實是如此：不管資產階級統計機關如何玩弄狡猾手段，故意減少失業者數目字，而按資產階級機關正式公佈的材料來說，失業人數在英國達三百萬，在德國達五百萬，在美國達一千萬，更不必說歐洲其他各國了。如果除此而外，還注意到人數超過千萬的半失業者和無數百萬的破產農民羣衆，那就知道勞動羣衆飢寒交迫和痛苦不堪的大概情形了。民衆雖還沒有達到實行衝擊資本主義的地步，可是衝擊思想已在羣衆意識中成熟起來，這是未必可以懷疑的。例如西班牙革命已把法西斯制度推翻，中國蘇維埃區域日益發展，而中國資產階級和外國資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反革命勢力都不能阻止這種發展的事實，便是一種明證。

正因爲如此，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也就極力設法把工人階級所能利用去反對壓迫者的國會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底最後一點遺跡都盡行消滅，或化爲烏有，把共產黨逼入祕密狀態，並實行用公開的恐怖手段來保持自己的專政。

把沙文主義和準備戰爭作爲對外政策底基本要素；在內政方面鎮壓工人階級和實行恐怖手段，作爲鞏固將來戰線後方的必要手段，——這就是現代帝國主義政治家在目前所特別努力進行的事情。

無怪乎法西斯主義現時在黷武資產階級政治家中間已成了最時髦的貨物。這裏我所指的不僅是一般法西斯主義，而首先是德國式的法西斯主義，這個德國式的法西斯主義以民族社會主

義自稱，是完全不正確的，因為那怕你拿着顯微鏡到它裏面去找，也是找不出一點社會主義影子的。

因此，不僅要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看作是工人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看作是替法西斯主義當清道夫的社會民主黨叛變工人階級的結果。同時還須把它看作是資產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它表明資產階級已不能用國會制的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舊方法來實行統治，所以不得不在對內政策上採用恐怖的管理方法；它表明資產階級已不能用和平對外政策來找到擺脫現狀的出路，所以不得不採用戰爭的政策。

情形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作爲擺脫現狀出路的新帝國主義戰爭是日益逼近了。

當然，沒有根據來假定戰爭能給予真正的出路。恰巧相反，戰爭一定會使現狀更加混亂起來。而且戰爭一定會展開革命，並且也如像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過程中一樣，會使某幾國資本主義本身存亡根本發生問題。如果資產階級政治家竟不顧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經驗，而終究抓着戰爭，如溺人抓着水上乾草來救命一樣，那就是說明他們已經完全弄糊塗，走到了懸崖絕境，而甘願跳入無底深淵了。

因此，我們不妨把資產階級政治家現在擬製着的那些組織戰爭的計劃，拿來簡略考察一下。

有些人認爲必須發動戰爭來反對某一個強國。他們想把這個強國弄得一敗塗地，並靠剝削它來補救自己的事情。假定說他們真正發動了這樣一個戰爭吧。由此就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大家知道，

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人們也曾想消滅一個強國，即消滅德國，並靠剝削它來獲利享福。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他們並沒有消滅德國，却在德國散播了一種仇恨戰勝國的心理，並為復仇思想造成了一種豐富的基礎，直到現在還不能把他們自己所幹出來的這一團糟糕醜事弄清楚，並且大概也不會很快就能弄清楚的。結果竟是資本主義在俄國被擊破，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獲得勝利，以及

——當然的事——蘇聯成立起來。試問有什麼東西能担保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會使他們獲得比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好些」的結果呢？如果作相反的推測，豈不是比較靠得住些麼？

另外有些人認為必須發動戰爭來反對某一個軍力薄弱而市場廣大的國家，例如反對中國，反對這個據他們說並不能稱為一個真正國家，而不過是一塊需要強國來佔領的「無組織的地區」的中國。他們顯然是想把中國完全瓜分掉，並靠剝削它來補救自己的事情。假定說他們果然發動了這樣一個戰爭吧。由此就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大家知道，在十九世紀初葉，人們看待意大利和德意志，也完全是和現在人們看待中國一樣，即是曾把意大利和德意志當作「無組織的地區」，而不把它們當作國家，並奴役了它們。結果怎樣呢？大家知道，結果是德意志和意大利都進行了爭取獨立的戰爭，並把自己統一成了獨立的國家。結果是使這兩國人民仇恨奴役者的心理加強起來，而引起至今還沒有消滅，並且大概是會很快就能消滅的惡果。試問有什麼東西能担保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戰爭，不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呢？

還有些人認為必須由「上等人種」，譬如說由日耳曼「人種」發動戰爭來反對「下等人種」，首先是反對斯拉夫人；他們認為只有這種戰爭才可給予擺脫現狀的出路，因為「上等人種」負有培

種「下等人種」並統治「下等人種」的使命。假定說這個與科學相隔天壤的奇怪理論果然變成了實踐吧。由此就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大家知道，從前古代羅馬帝國看待現代德國人和法國人底祖先，也完全是和現時「上等人種」底代表人物看待斯拉夫種族一樣。大家知道，從前古代羅馬帝國總是瞧不起德國人和法國人，稱他們爲「下等人種」和「野蠻人」，認爲他們應該永遠屈服於「上等人種」，即屈服於「大羅馬帝國」；而且，老實說，古代羅馬帝國當時這樣做還有一些理由，而現時「上等人種」底代表人物却就不然了。（掌聲如雷）。結果怎樣呢？結果是那些非羅馬人，即所有「野蠻人」，都統一起來反對共同敵人，並轟轟烈烈地把羅馬帝國推翻了。試問有什麼東西能担保現時「上等人種」代表人物底野心，不會遇到同樣悲慘的結果呢？試問有什麼東西能担保柏林那些耍弄文墨的法西斯政治家，會比羅馬帝國老資格的富有經驗的征服者更幸運些呢？如果作相反的推測，豈不是比較靠得住些麼？

最後，還有些人認爲必須發動戰爭來反對蘇聯。他們想擊潰蘇聯，想瓜分它的領土，想靠剝削它來發財享福。如果以爲只有日本某些軍閥武人這樣想，那就錯誤了。我們知道，歐洲某些國家政治領導者中間也擬製着這樣的計劃。假定說這班老爺們真正由言論進到了實際行動吧。由此就會得到什麼結果呢？毫無疑義，這樣的戰爭一定會是對於資產階級最危險的戰爭。其所以是最危險的戰爭，不僅是因爲蘇聯各民族人民將爲革命成果來拚命作戰。其所以是對於資產階級最危險的戰爭，還因爲這次戰爭將不僅是在前線上進行，而且會是在敵人後方進行的。資產階級可以相信，蘇聯工人階級在歐亞各國的數千百萬朋友，一定會努力從後方來打擊本國那些挑起反對世界工人階級祖國的

萬惡戰爭的壓迫者。如果在這樣一個戰爭以後第一天，資產階級老爺們就會失去幾個與他們親近而現在「明天保佑」平安統治着的政府，那就請他們不要來埋怨我們吧（掌聲如雷）。這樣的反蘇聯戰爭已經有過一次了，你們大概還記得這是在十五年以前的事。大家知道，人人尊敬的邱吉爾當時把這次戰爭歸結為一個富有詩意的句子：「十四國聯軍的征討」。你們當然記得，這次戰爭把我國全體勞動者團結成了共同挺胸抵禦外寇而保衛自己工農祖國的奮勇戰士的軍營。這次戰爭結局如何，是大家都知道的。其結局是把武裝干涉者從我國境內趕走了，並在歐洲成立了許多革命「行動委員會」。毫無疑義，第二次反蘇聯戰爭，結果是會使侵略者完全失敗，使歐亞某些國家爆發革命，並使這幾個資產階級地主政府完全潰滅的。

頭腦昏迷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們底軍事計劃，就是如此。

可見，他們原來是些既不怎樣聰明，也不怎樣勇敢的人。（鼓掌）。

可是，如果資產階級選定戰爭道路，那末資本主義各國被四年危機和失業陷入痛苦不堪情況的工人階級却就要走上革命道路了。這就是說，革命危機是在成熟着，而且將會更加成熟起來。資產階級愈是深深陷入他們那種戰爭的勾當，愈是時常採用恐怖鬥爭手段來反對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革命危機也就會愈加迅速增長起來的。

有些同志認為：既然有了革命危機，那末資產階級也就應陷入沒有出路的位置，於是資產階級底死期已經預定，革命勝利因此已有保證，他們只須等待資產階級覆亡而起草勝利決議就行了。這是個很嚴重的錯誤。革命勝利無論何時也不會自動來到。它是需要人去準備和奪取的。而能準

備和奪取它的，却只有強大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有時候，革命形勢是有了，資產階級政權是根本動搖了，而革命勝利却終究不會到來，這是因為還沒有一個按力量 and 威信均能領導羣衆和奪取政權的革命無產階級黨。如果以為決不會有這樣的「變故」發生，那就不合理了。

說到這裏，我們不妨回憶一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論到革命危機時所說的一段至理名言：

「現在我們就說到了作爲我們革命行動基礎的革命危機問題。而這裏首先就須指出兩種流行的錯誤。一方面，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用英國人雅緻字眼來把這個危機描寫爲簡單的「麻煩」。另一方面，革命家有時竟力圖證明，說危機是絕對沒有出路的。這是一個錯誤。絕對沒有出路的狀況是不會有的。資產階級底行爲好似一隻瘋狂的昏頭昏腦的野獸，接連不斷地幹着蠢事情，使狀況尖銳化，加速自己的滅亡。所有這些都是事實。可是決不能「證明」，說它絕對沒有什麼可能去用某種細小讓步來麻醉某一小部分被剝削者，說它絕對沒有什麼可能去鎮壓某部分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底某種運動或武裝起義。企圖事先「證明」「絕對」沒有出路，那就是空洞的學究主義，或者是玩弄概念和玩弄字眼。在這個問題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上，只有實踐纔能成爲真正的「證據」。全世界上的資產階級制度都遭遇着極大的革命危機。現在必須用革命黨底實踐來「證明」：這些革命黨具有充分的覺悟性，組織性，與被剝削羣衆的聯繫，堅決性和智能，足以利用這個危機來進行順利的革命，進行勝利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〇至三四一頁）。

(三) 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係

在這個戰雲密佈的險惡環境中，蘇聯當然是很難實行其和平政策的。

在這種戰前狂熱已普及於許多國家的環境中，蘇聯在這幾年來繼續堅決不移地站在自己的和平立場上，反對戰爭危險，維護和平，歡迎那些在某種程度內主張維護和平的國家，揭露並撕破那些準備戰爭和挑撥戰爭者底假面具。

蘇聯在這個困難而複雜的維護和平的鬥爭中，究竟指靠於什麼呢？

(一) 是指靠於自己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

(二) 是指靠於世界各國切身需要維護和平的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底精神援助。

(三) 是指靠於那些由於某種動機而不願破壞和平，並願意與蘇聯這樣一個守信主顧發展通商關係的國家底審慎態度。

(四) 末了，是指靠於我們決意抵禦外侮而保衛國家的光榮軍隊。

在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了我們力求與各鄰國締結互不侵犯公約和侵略國定義公約的運動。你們知道，這個運動是有成功的。大家知道，我們不僅和我們西方和南方大多數鄰國——包括芬蘭和波蘭在內——締結了互不侵犯公約，而且和法意這樣的國家締結了互不侵犯公約；關於侵略國定義的公約，我們也和這些鄰國——包括小協約國在內——締結過了。

同時，在這個基礎上又鞏固了蘇聯與土耳其間的友善關係，把蘇聯與意大利間的關係改善成

了確能令人滿意的關係，改善了我們與法國，與波蘭以及與波羅的海沿岸諸國的關係，恢復了我們與美國的關係，我們與中國的關係等等。

在反映蘇聯和平政策成功的種種事實中，應當特別指出兩件確有嚴重意義的事實。

第一件事實，就是蘇波關係和蘇法關係近來所發生的好轉。大家知道，從前我國與波蘭的關係是不大好的。當時在波蘭有人殺害過我國代表。當時波蘭是以西方各國反對蘇聯的壁壘自居的。當時所有一切帝國主義者都打算利用波蘭來做武裝侵犯蘇聯時的前鋒。當時蘇法關係也並不比較好些。只須回憶在莫斯科審判拉姆靖暗害份子集團時的一些事實，就可以想見當時蘇法關係是如何了。而這種不良關係現已開始漸漸消失下去。這種不良關係現正由別種關係所代替，由一種只可說是彼此接近的關係所代替。問題不僅在於我們和這些國家訂立了互不侵犯公約，雖然這個公約也有極嚴重的意義。問題首先是在於互相猜疑的空氣已開始消散下去。這當然不是說可以把這種已開始的接近進程看作是充分穩固而能保證事業最後成功的現象。政策上的意外事端和曲折變化，例如在反蘇聯情緒過厲害的波蘭，還是遠非絕無可能的。可是，我們相互關係中的好轉，不管其將來的結果如何，總算是一件事實，是我們所應把它當作改善和平事業的因素來特別指出，推向前進的事實。

這個好轉底原因何在，它是由什麼所促成的呢？

首先就是由於蘇聯力量和威勢的增長。

在現今時代，人們照例是不肯顧及弱者，而只肯顧及強者的。其次，是由於德國政策中發生了

一些反映德國復仇主義情緒和帝國主義傾向增長的變更。

有些德國政治家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說蘇聯現在採取了指靠法波兩國的方針，說蘇聯已由反對凡爾賽條約的國家變成擁護凡爾賽條約的國家了，說這種變化是因為德國建立了法西斯制度。這是不對的。當然，我們千萬不會因德國有法西斯制度而感覺歡喜。可是，這裏問題並不在於法西斯主義，例如意大利雖然也是個法西斯主義統治的國家，但蘇聯還是與意大利建立了最好關係的事實，就可證明這點了。問題也不在於我們對凡爾賽條約的態度發生了人們所臆想的那種改變。受過了布列斯特和約恥辱的我們，那裏會讚美凡爾賽條約呢。我們只是不贊同人們藉口這一個條約來把全世界捲入新戰爭漩渦的行動。關於人們所臆想的什麼蘇聯改變方針，也要這樣說。我們並沒有採取過什麼指靠德國的方針，也如我們現在沒有採取什麼指靠法波的方針一樣。無論過去或現在，我們都是抱定指靠蘇聯自己，而且只是指靠蘇聯自己的方針。（熱烈鼓掌）。如果蘇聯利益要求我們去和某些不願破壞和平的國家接近，那我們是會毫無猶豫地去和這些國家接近的。

不，問題並不在這裏。問題是在於德國政策上的變更。問題是在於還當現今德國政治家上台執政以前，尤其是自他們上台執政以後，在德國已開始了兩條政治路線間的鬥爭，舊政策與「新」政策間的鬥爭：舊政策是表現在蘇德兩國所訂立的著名條約上；而「新」政策在大體上却與曾經佔領過烏克蘭，進攻過列寧格勒，把波羅的海沿岸諸國變為這進攻根據地的過去德皇政策相彷彿，而且「新」政策顯然是比舊政策佔着上風的。擁護「新」政策的人們在各方面都佔有優勢，而主張舊政策的人們却處在不得志地位的事實，這決不是偶然的。顧恆伯爾格在倫敦所發表的著名言

論，也不是偶然的；德國當權黨對外政策領導者羅森伯爾格所發表的同樣著名的言論，也不是偶然的。問題就在這裏，同志們。

第二件事實，就是蘇美兩國正常關係的恢復。毫無疑義，這一舉動在整個國際關係方面都有極重大的意義。問題不僅是在於這一舉動提高了保持和平事業的機會，改善了兩國間的關係，鞏固了兩國間的商業聯系，並造成了彼此合作底基礎。問題是在於這一舉動劃清了新舊兩時期的界線：在舊時期中，各國曾把美國當作一切反蘇聯趨勢的支柱，而在新時期中，這個支柱却已自動拆去，以求適應兩國雙方利益了。

這就是反映蘇聯和平政策成功的兩個基本事實。

可是，如果以為我們在報告期內一切都順遂，那就不正確了。不，我們並不是一切都很順遂的。

你們只要記起英國所採取的壓制手段，為禁止蘇聯輸出品而頒布的禁令，以及企圖干涉我國內政，藉以試探我國抵抗能力的事實吧。固然，這種企圖是完全沒有什麼成功的，而禁令後來也取消了，但這種襲擊行動所留下來的惡果，却至今還在一切有關蘇英關係的事情方面，包括兩國商務條約談判在內，都令人感覺得到。決不可把這種反蘇聯的襲擊行動看作一件偶然的事情。大家知道，有一部分英國保守黨人不進行這種襲擊，便不能過活。正因為這些襲擊行動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所以我們應當估計到，人們今後也會實行襲擊蘇聯，造成種種威脅，使它受到損害等等的。

同時也不可注意到蘇日兩國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必須大大改善的。日本拒絕締結它同蘇聯一

樣需要的互不侵犯公約這一事實，就是再次着重指明我們兩國間的關係並不完全順遂。關於中東路問題談判的停頓，——而這種停頓是不能歸咎於蘇聯的，——以及日本辦事人員在中東路上所幹出的不可容忍的事情，非法拘捕中東路上的蘇聯職員等等，也是如此。況且，日本有一部分軍人在另一部分軍人顯然贊同下，在刊物上公開鼓吹要和蘇聯開戰，要奪取沿海州，而日本政府却假裝與此無關，絲毫也沒有約束過這些挑戰份子。這種情況自然不能不造成一種令人焦慮不安的空氣。當然，我們今後也將斷然進行和平政策，並力謀改善我國與日本間的關係，因為我們是願意改善這種關係的。但這並不能完全依我們為轉移。因此，我們同時應當極力設法保障我國能免除意外的事件，並準備着保衛我國去打退外來的侵犯。（熱烈鼓掌）。

由此可見，除了我們和平政策方面的種種成功而外，我們還有一些不良的現象。

蘇聯底外部狀況，就是如此。

我們的對外政策是很明顯的。它是維護和平並增進我們與各國商務關係的政策。蘇聯並不想威脅任何人，尤其是不想侵犯任何人。我們是主張和平並堅持和平事業的。可是，我們並不怕他人底威脅，而是準備着用打擊去回答戰爭挑撥者底打擊。（熱烈鼓掌）。誰願意和平並力求與我們發生業務聯繫，誰就總會得到我們方面的贊助。而那些擅敢侵犯我國的人，却總會遇到致命的回擊，使得他們以後再也不敢把自己的豬鼻嘴，伸到我們蘇維埃的菜園子裏來。（掌聲如雷）。

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是如此。（掌聲如雷）。

任務就是要在今後也十分堅決一貫實行這個政策。

(二) 蘇聯國民經濟繼續高漲和內部狀況

現在我來講蘇聯內部狀況問題。

從蘇聯內部狀況方面看來，報告時期是無論國民經濟或文化方面的高漲都日益加強的時期。

這個高漲，不只是單純的數量上的力量積累。這個高漲特別顯著的地方，就是它使蘇聯結構發生了原則上的變更，使蘇聯全國面目根本改變了。

蘇聯在這個時期內已經根本改變樣子了，它已經拋棄了落後的中世紀的面貌。它已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它已由一個小規模個體農業的國家，變成了大規模機械化集體農業的國家。它由一個黑暗無知，居民不識字，不文化的國家，變成了——更確切一點說，正在變成——人人識字的文化的國家，到處設立有用蘇聯各民族語言教授的高級學校，中等學校和初等學校的國家。

創立了許多新的生產部門：機架，汽車，拖拉機，化學，發動機，飛機，康拜因機，巨型渦輪機，發電器，上等鋼，化合鐵，人造橡皮，淡氣，人造纖維等等的製造業。（鼓掌多時）。

在這個時期內建成和開始出貨的，有幾千個完全現代化的新企業。新建成了許多巨型企業，如德涅泊爾電站，馬格尼托哥爾聯合廠，庫茲涅茨克工廠，齊爾賓斯克聯合廠，波布里克聯合廠，烏拉爾機器聯合廠，克拉姆托爾機器聯合廠等等。有幾千個舊企業都在新技術基礎上改造過了。在蘇聯各民族共和國和各邊境區域，如在別洛露西亞，烏克蘭，北高加索，南高加索，中亞細亞，卡查赫斯坦，布爾特蒙古，捷爾里亞，巴什基里亞，烏拉爾，東西伯利亞，西西伯利亞，遠東邊疆等等地方，

建成了許多新企業，創立了許多工業根據地。

成立了二十多萬個集體農莊和五千多個蘇維埃農莊，並爲它們創立了新的區域中心和工業地點。

在幾乎荒野的地帶出現了居民衆多的新的巨大城市。舊的城市和工業地點也大大擴展了。

庫茲涅茨克焦煤與烏拉爾鐵礦連接起來經營的烏拉爾、庫茲涅茨克聯合廠底基礎，已經奠定了。於是，東方的新冶金業根據地，可說是已由理想變成事實了。

在烏拉爾山脈西南斜面區，即是在烏拉爾省，巴什基里亞和卡查赫斯坦一帶的新的強大的煤油根據地基礎，已經奠定了。

顯然的，國家在報告期內投入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共達六百餘萬盧布的鉅量資金，並沒有白費，而是已開始產生果實了。

由於這些成績的結果，蘇聯底國民收入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二百九十萬萬盧布，增加到了一九三三年的五百萬萬盧布，而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國民收入在同一時期却大大降低了。

這一切成績與這全部高漲，當然要——而且已真正——使蘇聯內部狀況更加鞏固起來。

爲什麼一個技術落後，文化落後的廣大國家，在區區三四年內就發生了這樣巨大的變更呢？這不是一件怪事麼？如果這種增長是在資本主義和個體小經濟基礎上發生，那就真會是一件怪事。可是，如果注意到我國這一增長是在擴展社會主義建設基礎上發生的話，那就不可把它叫做怪事了。當然，這種雄強的高漲是只有在順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只有在數千萬人共同勞動的基

礎上，只有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勝於資本主義和個體農民經濟制度的基礎上，才能開展起來的。因此，無怪乎蘇聯在報告期內的雄強經濟文化高漲，同時也就是消滅資本主義份子和把個體農民經濟排擠到後面去的過程。事實是如此：現時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底比重在工業方面佔百分之九十九，在農業方面，按穀物播種面積來說，佔百分之八十四點五，而個體農民經濟底比重却只佔百分之十五點五。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經濟在蘇聯是已被消滅，而個體農民經濟在農村中是被排擠到次等地位了。

列寧在着手施行新經濟政策時說在我國有五種社會經濟結構成分：（一）宗法經濟（多半是自給經濟），（二）小商品生產（出賣糧食的農民中的大多數），（三）私人經營的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五）社會主義。列寧認為，在這五種經濟結構中，結果一定是社會主義結構佔統治地位的。我們現在可以說：第一種，第三種和第四種社會經濟結構已不存在了，第二種社會經濟結構是被排擠到次等地位了，而第五種社會經濟結構，即社會主義結構，已成了在全部國民經濟中獨佔統治的唯一指揮力量。（熱烈鼓掌多時）。

總結就是如此。

這個總結就是蘇聯內部狀況穩固底基礎，就是蘇聯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前方陣地和後方陣地強固底基礎。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蘇聯經濟政治狀況個別問題的具體材料。

(一) 工業高漲

在我們國民經濟所有一切部門中，發展最快的部門是工業。在報告期內，即是從一九三〇年起，我國工業已增加了一倍有餘，即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一點六，而與戰前水準比較起來，却已增加到約近三倍，即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九十一點九。

這就是說，我國工業化是進行得非常迅速的。

由於工業化迅速增長的結果，工業產量在全部國民經濟總產量中已佔首要地位了。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工業在國民經濟總產量中所佔百分比重表（按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價格計算）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工業(小工業除外)	四二·一	五四·五	六一·六	六六·七	七〇·七	七〇·四
(二)農業	五七·九	四五·五	三八·四	三三·三	二九·三	二九·六
總計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這就是說，我們國家已堅實可靠地最終變成工業國家了。

在工業化事業方面有決定意義的，是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製造業在全部工業發展總和中的比重的增長。報告期內的統計材料，指明這一項底比重已在全部工業總和中佔居主要的地位。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大工業兩種基本部門產量比重表（按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價格計算）

	總產量（單位：千萬盧布）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全部大工業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〇	一九三二·一	一九三三·二	一九三三·三
（甲）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	一一〇·〇	二七·五	三三·九	三八·五	四一·九
（乙）消費品	一〇〇·二	一四·五	一八·八	二二·〇	二四·三
	一〇·八	一三·〇	一五·一	一六·五	一七·六
	比重（百分率）				
（甲）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	四八·五	五二·六	五五·四	五七·〇	五八·〇
（乙）消費品	五一·五	四七·四	四四·六	四三·〇	四二·〇
總計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這統計表顯然是無須解釋的。

在我們這個技術還幼稚的國家裏，工業負有特別重大的任務。它不僅應當用新技術來改造自己，不僅應當改造各個工業部門，包括輕工業，食品工業和木材工業在內。它還應當改造各種運輸業和一切農業部門。可是，只有當機器製造業，即國民經濟改造事業基本槓桿在它中間佔居主要地位時，它才能完成這一個任務。報告期內的統計材料，正是指明我國機器製造業已在我國全部工

業總和中獲得主導作用了。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全蘇聯各個工業部門比重表(各部門對工業總產量的百分比)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
石煤業	二·九	二·一	一·七	二·〇
焦煤業	〇·八	〇·四	〇·五	〇·六
煤油開採業	一·九	一·八	一·五	一·四
煤油製造業	二·三	二·五	二·九	二·六
黑金屬冶煉業	未詳	四·五	三·七	四·〇
有色金屬冶煉業	未詳	一·五	一·三	一·二
機器製造業	一一·〇	一四·八	二五·〇	二六·一
基本化學業	〇·八	〇·六	〇·八	〇·九
棉織業	一八·三	一五·二	七·六	七·三
毛織業	三·一	三·一	一·九	一·八

這就是說，我們工業是在健全的基礎上發展着，而改造事業底關鍵，即機器製造業，是完全操於我們掌握的。只是必須好好利用它，合理地利用它。

報告期內工業發展情形，按各社會部份來說，是很值得注意的。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大工業總產量按各社會部份的分佈情形（按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價格計算）

總產量（單位百萬盧布）

全部產量			全部產量			全部產量			全部產量		
中其		公有工業	中其		公有工業	中其		公有工業	中其		公有工業
私人工業	合作工業	國營工業	私人工業	合作工業	國營工業	私人工業	合作工業	國營工業	私人工業	合作工業	國營工業
一九二九年	二一,〇二五	二〇,八九一	一九,一四三	一,七四八	一三四	一九二九年	二一,〇二五	二〇,八九一	一九,一四三	一,七四八	一三四
一九三〇年	二七,四七七	二七,四〇二	二四,九八九	二,四一三	七五	一九三〇年	二七,四七七	二七,四〇二	二四,九八九	二,四一三	七五
一九三一年	三三,九〇三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一九三一年	三三,九〇三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一九三二年	三八,四六四	三八,四三六	三五,五八七	二,八四九	二八	一九三二年	三八,四六四	三八,四三六	三五,五八七	二,八四九	二八
一九三三年	四一,九六八	四一,九四〇	三八,九三二	三,〇〇八	二八	一九三三年	四一,九六八	四一,九四〇	三八,九三二	三,〇〇八	二八
一九二九年	九九・四	九九・一	八・三	〇・六	一九二九年	九九・四	九九・一	八・三	〇・六	一九二九年	九九・四
一九三〇年	九九・七	九〇・九	八・八	〇・三	一九三〇年	九九・七	九〇・九	八・八	〇・三	一九三〇年	九九・七
一九三一年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一九三一年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一九三一年	未詳
一九三二年	九九・九三	九二・五二	七・四一	〇・〇七	一九三二年	九九・九三	九二・五二	七・四一	〇・〇七	一九三二年	九九・九三
一九三三年	九九・九三	九二・七六	七・一七	〇・〇七	一九三三年	九九・九三	九二・七六	七・一七	〇・〇七	一九三三年	九九・九三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工業中的資本主義份子已被消滅，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現在已成爲

我國工業中獨佔統治的唯一體系。(鼓掌)。

但工業在報告期內所獲得的一切成績中，最重要的成績是工業在這時間內造就和鍛鍊了成千成萬的新人材和新工業領導者，大批大批的新工程師和技師，以及幾十萬精通了新技術並推動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前進的青年熟練工人。毫無疑義，沒有這些人材，我國工業就不會有我們現在所能引以自豪的這種偉大成功。統計材料指明，在報告期內，工業從工廠藝徒學校裏調入生產的較熟練的工人，約有八十萬；從高等專門學校、大學及中等技術學校調入生產的工程技術人員有十八萬餘人。如果說幹部問題確實是我國發展中最大的問題，那就要承認我們工業已在切實解決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國工業底基本成績。

可是，如果以為我國工業只是有成績，那就不對了。不，它也有缺點。其中主要的缺點便是：

- (1) 黑金屬冶煉業仍然落後；
- (2) 有色金屬冶煉業還沒有整理就緒；
- (3) 沒有充分估計到，發展地方煤礦開採事業（如莫斯科附近礦區，高加索，烏拉爾，卡拉甘達，中亞細亞，西伯利亞，遠東，北方邊疆等等）對於全國燃料出產總量有極重大的意義；
- (4) 沒有充分注意到在烏拉爾，巴什基里亞和恩巴等區建立新煤、油、根、據、地的問題；
- (5) 沒有認真注意擴充輕工業和食品工業以及木材工業方面的日用品的生產；
- (6) 沒有充分注意到擴展地方工業的問題；
- (7) 完全不容許地忽視了改善產品質量的問題；

(8) 提高勞動生產率，減低成本和施行經濟核算制方面的工作，仍然落後；

(9) 勞動和工資組織得不好的現象，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和工資制中的平均主義現象，還沒有剷除；

(10) 在各經濟人民委員部——包括輕工業人民委員部和食品工業人民委員部在內——及其所屬各機關中的官僚形式主義的領導方法，還遠未消滅。

這一切缺點當然是絕對須要趕快剷除的。大家知道，黑金屬冶煉業與有色金屬冶煉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內沒有完成自己的計劃。它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一年度內也沒有完成自己的計劃。如果它們今後還是繼續落後，那它們就會成爲妨礙工業發展的障礙物和引起工業虧空的原因。至於建立石煤業和煤油業新根據地問題，那末我們若不解決這個刻不容緩的任務，就一定會使工業和運輸業都陷於擱淺了。日用品生產和發展地方工業的問題，以及改良產品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減低成本和施行經濟核算制等等的問題，也是無庸解釋的。至於勞動和工資組織得不好的現象，以及官僚形式主義的領導方法，那末頓巴斯方面的實例，以及輕工業和食品工業企業方面的實例，都已表明這個危險病症流行於一切工業部門中，並妨礙着它們的發展。如果我們不把這個病症剷除掉，那末工業就會寸步難移了。

當前的任務是：

(1) 要保持機器製造業現時在全部工業中的主導作用。

(2) 要剷除黑金屬冶煉業底落後情形。

(3) 要整頓有色金屬冶煉業。

(4) 要盡量擴展各個查明了的煤礦區中的地方煤礦開採事業；建立新的採煤區（例如在遠東的布萊區），並把庫茲巴斯克變成頓巴斯第二（鼓掌多時）。

(5) 要在烏拉山脈西南斜面各區認真着手創立煤油根據地。

(6) 要在各經濟人民委員部所轄企業中擴展日用品的生產。

(7) 要發展地方蘇維埃工業，使其能積極製造日用品，並儘量用原料和經費幫助這個工業。

(8) 要改良產品質量，停止出產不完備的物品，不顧情面地懲罰一切違背或迴避蘇維埃政權關於出產美質和完備產品的法律的那些同志。

(9) 要一貫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費和施行經濟核算制。

(10) 要徹底剷除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和工資制中的平均主義現象。

(11) 要消滅各經濟人民委員部一切環節中的官僚形式主義的領導方法，有系統地審查各下級機關執行各中央領導機關決議和指示的情形。

(二) 農業高漲

農業方面的發展情形，是稍有不同的。農業基本部門在報告期內高漲速度，要比工業遲慢許多倍，但總比個體經濟佔主要地位時快些。而在養畜業方面我們却甚至有過後退的情形，即牲畜數量減少的現象，而是直到一九三三年時，並且只是在養豬業方面，才表現出一些向上高漲的徵象。

農業高漲速度的遲慢，牲畜業發展方面較為長期的低落，顯然是由許多原因所必然預決了的，這些原因便是：把散漫細小農戶合併為集體農莊，在幾乎荒野地帶創立許多大規模穀物農莊和養畜農場的事情是很困難的；並且改造個體農業和把個體農業轉上集體農莊新軌道的改組時期，根本就需要花費許多時間與大批成本。

按實質說來，報告時期與其說是農業迅速高漲和飛快進展的時期，不如說是造成種種前提來保證在最近時期發生這種高漲和這種進展的時期。

如果拿一切農作物播種面積增加情形的統計來看，特別是拿技術作物播種面積增加情形的統計來看，那末報告期內農業發展情形，便如下表。

蘇聯全國所有農作物播種面積統計表（單位百萬海克脫）

全部播種面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穀物	技術作物	蔬菜瓜類	飼料	穀物	技術作物	蔬菜瓜類	飼料	穀物	技術作物	蔬菜瓜類	飼料
	一〇五・〇	一一八・〇	一二七・二	一三六・三	一三四・四	一二九・七	一〇一・五	一一・〇	八・六	七・三		
	九四・四	九六・〇	一〇一・八	一〇四・四	九九・七	一〇一・五	一一・〇	八・六	七・三			
	四・五	八・八	一〇・五	一四・〇	一四・九	一一・〇	八・六	七・三				
	三・八	七・六	八・〇	九・一	九・二	八・六	七・三					
	二・一	五・〇	六・五	八・八	一〇・六	七・三						

蘇聯全國技術作物播種面積統計表(單位百萬海克脫)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棉花	〇·六九	一·〇六	一·五八	二·一四	二·二七	二·〇五
長稈亞麻	一·〇二	一·六三	一·七五	二·三九	二·五一	二·四〇
橡膠樹	〇·六五	〇·七七	一·〇四	一·二九	一·五四	一·二一
油類作物	二·〇〇	五·二〇	五·二二	七·五五	七·九八	五·七九

這兩個統計表所反映的是農業中的兩條基本路線：

第一條路線是在農業改組工作最熾烈時期，當成千累萬集體農莊相繼建立起來的時候，當這些集體農莊把富農驅逐於土地以外，而把那些空閒出來的土地拿到自己手裏來的時候，竭力擴大播種面積；

第二條路線是拒絕籠統擴大播種面積的辦法，拋棄籠統擴大播種面積的手段，轉而採用改良耕種工作，正確輪種制和預耕制，提高收成率，在有實際必要時，暫且縮小現有播種面積的辦法。

大家知道，第二條路線，即農業中的唯一正確路線，是在一九三二年宣佈實行的，當時農業改組時期快要完結，而提高收成率問題已成為保證農業高漲的基本問題之一了。

可是，關於播種面積增加情形的統計，還不能完全表明農業發展情形。有時候，播種面積雖有增

加，而出產量却沒有增加，或且降低下去，這是因為耕種工作變壞，每畝面積收成率降低之故。因此，除關於播種面積的統計而外，還必須看看關於總產量的統計。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蘇聯全國穀類作物和技術作物總產量統計表（單位百萬公担）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穀類作物	八〇一・〇	七二七・四	八三五・四	六九四・八	六九八・七	八九八・〇
棉花	七・四	八・六	一一・一	一二・九	一二・七	一三・二
亞麻纖維	三・三	三・六	四・四	五・五	五・〇	五・六
糖蘿蔔	一〇九・〇	六二・五	一四〇・二	一二〇・五	六五・六	九〇・〇
油類作物	二一・五	三五・八	三六・二	五一・〇	四五・五	四六・〇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農業改組工作最熾烈的年份，即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是穀物產量縮減得最厲害的年份。

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因為在蘇棉產區裏，農業改組工作速度較慢，所以蘇棉出產幾乎完全沒有受到損失，而是比較平整地和一往直前地向上高漲，並保存其高度發展水準。

第三，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油類作物只受到少許的波折，與戰前水準相較，始終是保持了高度發展水準；而糖蘿蔔種植業却不是如此，因為糖蘿蔔產區裏的農業改組工作速度最高，

而且進入改組時期最晚，所以在農業改組最後一年，即一九三二年，糖蘿蔔的出產有過最厲害的低落，把出產量降到了戰前水準以下。

最後，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一九三三年，即改組時期完結後第一年，是穀類作物和技術作物發展過程中轉變的一年。

這就是說，從今以後，穀類作物以及技術作物，就會腳踏實地，勇往直前地洶湧高漲起來了。

在改組時期感到最大困難的，是農業中的養畜部門。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蘇聯全部牲畜統計表（單位：百萬頭）

	一九一六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甲)馬	三三·一	三三·〇	三〇·二	二六·二	一九·六	一六·六
(乙)牛	五八·九	六八·一	五二·五	四七·九	四〇·七	三八·六
(丙)綿羊和山羊	一一五·二	一四七·二	一〇八·八	七七·七	五二·一	五〇·六
(丁)豬	二〇·三	二〇·九	一三·六	一四·四	一一·六	一二·二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我國牲畜數量在報告期內不僅沒有增加，反而繼續低於戰前水準。顯然，一方面，當時農業各養畜部門中含有最多巨大的富農成份，另一方面，富農在改組年份乘機

加緊煽惑農民大殺牲口的事實，都在這個統計表內反映出來了。

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從改組第一年起（一九三〇年），牲畜數量已開始減少，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三年，並且減少程度在頭三年最大，而在一九三三年，即改組時期終結後第一年，當穀類作物已向上高漲起來的時候，牲畜數量減少率就縮到最低限度了。

最後，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在養豬業方面已開始了相反的過程，並且在一九三三年已表現出逕直高漲的徵象。

這就是說，一九三四年應當，而且能夠成為全部養畜業轉變到向上高漲的一年。

我國農戶集體化在報告期內是怎樣發展了的呢？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集體化統計表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集體農莊(單位一千)	五七・〇	八五・九	一一一・一	二二一・〇五	二二四・五
集體農莊內農戶(單位百萬)	一・〇	六・〇	一三・〇	一四・九	一五・二
農戶集體化百分數	三・九	二二・六	五二・七	六一・五	六五・〇

按各部份來說，穀物播種面積變動情形又是怎樣呢？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穀物播種面積按各部份的分佈情形統計表

(穀物播種面積，單位百萬海克脫)

別類份部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各部份在一九三三年播種面積中所佔百分數
	蘇維埃農莊	蘇維埃農莊	蘇維埃農莊	蘇維埃農莊	蘇維埃農莊	
集體農莊	一·五	二·九	八·一	九·三	一〇·八	一〇·六
集體農莊	三·四	二九·七	六一·〇	六九·一	七五·〇	七三·九
個體農民	九一·一	六九·二	三五·三	二一·三	一五·七	一五·五
全蘇聯穀物播種面積	九六·〇	一〇一·八	一〇四·四	九九·七	一〇一·五	一〇〇·〇

這些統計表是說明什麼呢？

這些統計表是說明農業改組時期，即集體農莊及其莊員數目滔滔增長的時期，已經結束，並且是在一九三二年時就已經結束了。

所以，今後的集體化過程，將是由集體農莊來漸漸吸收和重新教育個體農戶殘餘的過程。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已經是最終地和永遠地勝利了。(熱烈鼓掌多時)。

其次，這些統計表說明，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總共佔有蘇聯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總數百分之八十四點五。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總和起來，已成了決定全部農業及其各部門命運的力量。

其次，這些統計表說明加入了集體農莊的農戶，即佔全國農戶總數百分之六十五的農戶，一

共佔有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總數百分之七十三點九，至於所剩下佔全國農民人口總數百分之三十五的全體個體農戶，却只佔有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總數百分之十五點五。

此外，還要注意到一件事實，就是集體農莊在一九三三年所交給國家的各項糧食共有十萬萬餘普特，而個體農民雖也完全執行了糧食採辦的計劃，可是他們所交給國家的糧食却只有一萬三千萬普特左右，但從前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度，個體農民交給國家的糧食約有七萬八千萬普特，集體農莊當時交給國家的糧食不過一萬二千萬普特。這件事實便是十分明顯地說明，在報告期內，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民雙方的作用已經完全改換了，集體農莊在這時期內變成了農業中的統治力量，而個體農民變成了次要力量，不得不服從集體農莊制度，不得不適應集體農莊制度。

必須承認：勞動農民，我們蘇聯的農民，已經是最終地和永遠地站在社會主義紅旗下面來了。

（鼓掌多時）。

讓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閒談婦，資產階級和托洛茨基主義的閒談婦信口亂談，說什麼農民有反革命天性，說什麼農民担任有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使命，說什麼農民不能成為工人階級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事業中的同盟者，說什麼在蘇聯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吧。事實說明：這些老爺們原來是誣蔑蘇聯，誣蔑蘇聯農民的。事實說明：我們蘇聯的農民已經是最終地離開了資本主義邊岸，而與工人階級聯合一致向着社會主義進展了。事實說明：我們在蘇聯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底基礎，我們現在所還要做的事情不過是在這個基礎上建成上層建築物，而這件事情毫無疑義是要比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基礎容易得多。

可是，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力量不僅表現於它們播種面積和出產總量底增長上，而且表現於它們所有的拖拉機數量和機器數量底增長上。毫無疑義，我們的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在這方面已有了長足的進展。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蘇聯全國農業所有拖拉機數量統計表（折損數目除外）

		架數(單位千架)					
拖拉機總數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其中：屬於農業機器站者		三四·九	七二·一	一二五·三	一四八·五	二〇四·一	二四〇·一
屬於一切部門蘇維埃農莊者		二·四	三一·一	六三·三	七四·八	一二三·三	一四一·八
		九·七	二七·七	五一·五	六四·〇	八一·八	一〇一·八
		馬力(單位一千)					
拖拉機馬力總數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其中：屬於農業機器站者		三九·四	一,〇〇三·五	一,八五〇·〇	二,二二五·〇	三,一〇〇·〇	三,一〇〇·〇
屬於一切部門蘇維埃農莊者		二二·九	三七二·五	八四八·〇	一,〇七七·〇	一,七八二·〇	一,七八二·〇
		一一三·四	四八三·一	八九二·〇	一,〇四三·〇	一,三一八·〇	一,三一八·〇

可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已擁有二十萬零四千架拖拉機和三百一十萬馬力。這個力量顯然是很不小的，它能完全剷除鄉村中的一切資本主義根蒂。這個力量已超過了列寧當時作爲遙遠前途說過的那個拖拉機數量一倍。

關於各農業機器站和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會部所轄各蘇維埃農莊中的農業機器數量，有如下的統計表可以說明。

屬於各農業機器站者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康拜因(單位千架)	七架	〇・一	二・二	一一・五
發動機和蒸汽發動器(單位千架)	〇・一	四・九	六・二	一七・六
複式和半複式打穀機(單位千架)	二・九	二七・八	三七・〇	五〇・〇
打穀機發電器	一六八	二六八	五五一	一，二八三
農業機器站中修理場數量	一〇四	七七〇	一，二二〇	一，九三三
較重汽車(單位千輛)	〇・二	一・〇	六・〇	一三・五
輕便汽車(單位一輛)	一七	一九一	二四五	二，八〇〇

屬於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會所轄各蘇維埃農莊者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康拜因機(單位千架)	一·七	六·三	一一·九	一三·五
發動機和蒸汽發動器(單位千架)	〇·三	〇·七	一·二	二·五
複式和中複式打穀機(單位千架)	一·四	四·二	七·一	八·〇
發電器	四·二	一·二	一六·四	二二·二
修理 { 基本修理場 中等修理場 臨時修理場	七·二 七·五 二〇·五	一三·三 一六·〇 三二·〇	二〇·八 二一·五 五七·八	三〇·二 四七·六 一,一六六
載重汽車(單位千輛)	二·一	三·七	六·二	一〇·九
輕便汽車(單位一輛)	一一·八	三八·五	六二·五	一,八九〇

我認爲這些統計是無須解釋的。

在農業機器站和蘇維埃農莊成立政治部，用熟練工作人員供給農業，也是對於發展農業有了重要的意義。現在大家都承認，政治部工作人員在改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工作方面，起了莫大

的作用。大家知道，黨中央委員會在報告期內一共派了二萬三千餘黨員到鄉村中去鞏固農業幹部，其中有三千餘人擔任農業部工作，有兩千餘人擔任蘇維埃農莊工作，有一萬三千餘人擔任農業機器站政治部工作，有五千餘人擔任蘇維埃農莊政治部工作。

用新的工程技術人員和農業專家供給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問題，也是如此。大家知道，在報告期內，這種工作人員被派到農村中去的計有十一萬一千餘人。

在報告期內所造就並派去工作的拖拉機手，康拜因機正副司機和汽車夫，單就農業人民委員會一個系統來說，就有一百九十萬人以上。

在同一時期內所造就和補習過的集體農莊管理部主席和委員，耕作隊長，養畜隊長和簿記員，有一百六十萬人以上。

這當然還不能滿足我國農業底要求。但這總算是有了一些了。

可見，國家已造成了各種各樣的條件，使農業人民委員會和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會所屬各機關，都易於領導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建設事業。

可以說這些條件是儘量利用了麼？

可惜還不可這樣說。

首先，這兩個人民委員會，比之其他各人民委員會更患有用官僚形式主義態度處置事情的毛病。它們只是決定着問題，可是並沒有想到要審查執行情形，沒有想到要制止違背領導機關指示和命令的人，沒有想到要提拔忠實誠懇執行指示的人。

本來，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既然這樣多，各農業機關是應當好好保管這些貴重機器，及時加以修理，比較合理地加以使用的。它們在這一方面究竟做了一些什麼呢？可惜做得很少。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是沒有好好保管的。修理工作也做得不好，因為它們至今還不願意明白，主要的修理工作是臨時修理和中等修理，而不是基本修理。至於利用拖拉機和一般機器的情形，那末，它之不能令人滿意，更是盡人皆知，無庸證明的。

農業方面的當前任務之一，就是要採用正確的輪種制，擴展預耕制以及改良各農業部門的選種工作。在這方面做了一些什麼呢？可惜暫時還做得很少。穀種和棉種方面的情形真是亂七八糟，還要花費許多時間，才可把它整理就緒。

供給技術作物以肥料，是提高技術作物收成的有效辦法之一。在這方面做了些什麼呢？暫時還做得很少。肥料是有的，可是農業人民委員會所屬各機關却不善於加以接收，而接收以後，又不設法把它按時送往各地去合理利用。

至於蘇維埃農莊，它們是至今都還沒有勝任的。我絕對不輕視我們蘇維埃農莊所有的那種巨大的革命化的作用。可是，如果把國家投入蘇維埃農莊事業的巨量資金與蘇維埃農莊工作現有的實際結果對照一下，那就可以看出一種很不相稱而使蘇維埃農莊大有遜色的情形。其所以有這種不相稱的情形，主要是因為我們穀物蘇維埃農莊規模過分龐大，經理人無力應付龐大的蘇維埃農莊，而蘇維埃農莊本身又過於專門化，沒有採用輪種制和預耕制，沒有養畜業的部分。顯然是必須把各個蘇維埃農莊規模縮小，取消它們那種過分專門化的性質。有人也許以為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會一定是

及時提出了這個問題，並力謀把它解決的了。其實不然。這個問題是與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部毫不相干的那些人所發起提出，並加以解決了的。

最後，就要講到養畜業問題。關於養畜業底嚴重狀況，我已經報告過了。也許有人以爲我們各農業機關已在極力設法剷除養畜業恐慌，以爲它們已發出警號，動員工作人員去力求解決養畜業問題的了。可惜絲毫沒有過這麼一回事，而且現在也沒有這麼一回事。他們關於養畜業方面的嚴重狀況，不但沒有發出警號，反而極力抹煞了問題，有時甚至在報告中企圖蒙蔽全國輿論，隱瞞養畜業底真相，而這種行爲是布爾什維克所完全不應有的。既然如此，如果還希望農業機關會把養畜業引上發展大道和提到應有高度，那就是畫餅充飢了。養畜業應當由我們全黨擔任起來，應當由我們全體黨員工作者和非黨員工作者擔任起來，因爲養畜業問題是目前最主要的問題，也好像我們所順利解決過的穀物問題是昨天最主要的問題一樣。蘇聯的人是在前進途中不止一次打破過嚴重障礙的人，他們當然是連這個障礙也定能打破的。（掌聲如雷）。

這就是我們所必須剷除的種種缺點的一個簡略而很不完全的目錄，以及必須在最短期內加以解決的種種任務的目錄。

但這些任務還不能概括一切。除此而外，在農業方面還有一些任務也要稍許說說。

首先就要注意到，先前把我國各省區劃分爲工業區和農業區的那種舊分法，已失去時效了。現在我國已沒有什麼專把穀物、肉類以及蔬菜供給工業區的純粹農業區，同樣現在我國也沒有什麼能專靠外面，專靠他區來供給一切必需食品的純粹工業區了。發展底趨勢是使我國所有各區都成爲多

少是工業的區域，而且愈往前去，它們也就會愈加成爲工業區域。這就是說，烏克蘭，北高加索，中央黑土省及其他許多舊有農業區，已不能像過去那樣把大批食品運往他處，運往工業中心，因為它們現在已不得不供給本地日益增加的城市和工人了。但由此所應得出的結論，是每一區都應建立自己本地的農業基礎，能夠出產供給自己的蔬菜，馬鈴薯，牛油和牛奶，並在某種程度內出產供給自己的穀物和肉類，免得陷入困難地位。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完全做得到，而且現時已在進行中。

任務就是無論如何都要把這件事情做到底。

其次，還要注意到，先前把我國各區劃分爲消費區和生產區的那種有名分法，現在也開始失去其特別意義了。莫斯科省和高爾基省這樣的「消費」區，今年已交給了國家約達八千萬普特的穀物。這當然不是一件小事情。在所謂消費地帶內約有五百萬海克脫灌木叢生的荒地。大家知道，這一帶地方的氣候並不惡劣，雨水充足，沒有旱災危險。如果把這些土地上的灌木除去，並施行一些組織辦法，那就可能造成一個莫大的穀物產區，它在這些地方通常的那種豐收條件下，將能每年糧出大宗穀物，其數量將不少於窩爾加河下游或窩爾加河中游現在所能糧出的數量。這就會是對於北部各工業中心的一種巨大幫助。

很明顯的，任務就是要在消費地帶各區內造成大規模的穀物產地。

最後，我要說到窩爾加河東岸區的防旱事業問題。在窩爾加河東岸各區培植森林和造成樹蔭地帶，是有莫大意義的。大家知道，這個工作已在進行中，不過還不可說它進行得十分緊張。至於窩爾加河東岸區的灌溉事業，是關係防旱工作極大的一件事情，當然不可長久延擱下去。固

然，這件事情是因為有迫使我們耗費了大批人力物力的外界情況而受到了一些阻礙。但現在已沒有什麼理由把這件事情繼續延擱下去了。我們在窩爾加河流域一定要有一個完全穩定，絲毫不受偶然天災影響，而能每年釀出約近兩萬萬普特穀物的重大產穀基地。這是絕對必要的，一方面因為窩爾加河流域的城市數目日益增長，另一方面又因為在國際關係上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各種各樣的糾紛。任務就是要着手進行組織窩爾加河東岸區灌溉事業的嚴重工作。（鼓掌）。

（三）勞動者物質狀況和文化水準的提高

這樣，我們就說明了我國工業農業狀況，我國工業農業在報告期內發展的情形，我國工業農業在現時的情形。

總結起來，我們所有的成績是：

（1）無論是工業方面或農業基本部門方面的生產，都有雄強的高漲。

（2）在這一高漲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無論在工業方面或農業方面，都最終戰勝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變成了全部國民經濟底唯一體系，資本主義份子從國民經濟所有各方面都被排擠出去了。

（3）絕大多數個體農民最終脫離了小商品個體農業，而加入了以集體勞動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集體農莊，集體農業完全戰勝了小商品的個人農業。

（4）集體農莊吸收着個體農戶，更加擴展起來，結果便使個體農戶數量一月少於一月，實際

上變成爲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輔助力量。

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戰勝剝削者的勝利，當然不能不使勞動者物質狀況及其全部日常生活根本改善起來。

由於消滅寄生蟲階級的結果，人剝削人的現象也消滅了。工農勞動擺脫了剝削。從前剝削者由人民勞動中榨取的那種收入，現在已是完全留在勞動者手裏，其中有一部分用來擴展生產和吸收勞動者新隊伍參加生產，而另一部分則用來直接提高工農收入。

工人階級最感痛苦的那個奇災大禍，即失業現象，已經消滅了。現時在資產階級國家裏有千百萬失業者因爲找不着工作而遭受飢寒痛苦，而我國却已沒有領不着工作和工資的工人了。

隨着富農盤剝制的消滅，於是農村中的貧窮現象也消滅了。現在，隨便那一個農民，不管他是集體農民也好，個體農民也好，只要願意誠懇工作，而不偷懶，不游蕩，不侵吞集體農莊財產，就有享受人生幸福的可能。

剝削制的消滅，城市中失業現象的消滅，鄉村中貧窮現象的消滅，——這就是勞動者物質狀況中的一種有歷史意義的成績，這種成績是無論那一個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裏的工農所夢想不到的。

我國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底面貌已經改變了。資產階級國家各大城市不可避免的特徵，就是那些破爛矮屋，即城郊一帶的所謂工人住區，黑暗的潮濕的破落不堪的處所，大半都是地窖，其中居民照例都是一些輾轉於污泥中，埋怨厄運，吞聲叫苦的窮人。而在我們蘇聯由於革命的結果，

這種破爛矮屋已經絕跡，而由那些新建的美麗光亮的工人住區，往往比城市中心還要美觀得多的工人住區所代替了。

鄉村底面貌更是改變了。在舊時鄉村中最出風頭的是教堂廟宇，立在前面的的是巡官，神父和富農底樓房，而立在後面的是農民底破爛草屋，——這種舊式鄉村現在已開始消失了。它們日益由一些新式鄉村所代替，這種新式鄉村中有公共的經濟建築，俱樂部，有無線電收音器，電影院，學校，圖書館和托兒所，有拖拉機，康拜因機，打穀機和汽車。舊時的名人，即剝削者的富農，吸血鬼的高利貸者，投機商人，巡官老爺等，已經絕跡了。而今日的名人，却是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小學校和俱樂部中的活動家，拖拉機隊長和康拜因機隊長，耕作隊長和養畜隊長，集體農莊田場上的優秀男女突擊隊員。

城鄉間的對立性日益消滅下去。城市在農民心目中已不是剝削他們的中心了。城鄉間的經濟上文化上結合的線索日益堅固起來了。現在，鄉村經常由城市及其工業方面得到種種幫助：拖拉機，農業機器，汽車，人材和經費等等。而且，鄉村本身現在也有自己的工業，如農業機器站，修理場，集體農莊中的各種製造場，小型電站等等。城鄉間文化程度懸殊的深淵日益填平了。

這就是勞動者在改善他們物質狀況，日常生活以及文化方面的基本成績。

在這些成績基礎上，我們在報告期內便有如下情形：

(1) 國民收入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三百五十萬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百萬萬盧布，更因為資本主義份子（包括租借企業家在內）現時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部份已不滿百分之小數點

五，所以幾乎全部國民收入，都是歸工人，職員，勞動農民，合作社和國家所有了。

(2) 蘇聯人口已由一九三〇年末的一萬六千零五十萬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末的一萬六千八百萬人。

(3) 工人和職員人數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一千四百五十三萬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千一百八十八萬三千人，其中體力勞動人數在這時期內由九百四十八萬九千人增加到一千三百七十九萬七千人，大工業工人（運運輸工人包括在內）數量由五百零七萬九千人增加到六百八十八萬二千人，農業工人數量由一百四十二萬六千人增加到二百五十一萬九千人，商業工人和職員數量由八十一萬四千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九萬七千人。

(4) 工人和職員底工資基金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一百三十五萬九千七百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三百四十二萬八千萬盧布。

(5) 工業工人每年平均工資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九百九十一個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一千五百一十九個盧布。

(6) 工人和職員社會保險基金已由一九三〇年的十八萬一千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四十六萬一千萬盧布。

(7) 全部地面工業都已過渡到七小時工作制。

(8) 國家為幫助農民而設立了二千八百六十個農業機器站，一共投入了二十萬萬盧布的資金。

(9) 國家為幫助農民而發給了集體農莊十六萬萬盧布的信貸。

(10) 在報告期內，國家爲幫助農民而借給了他們二萬六千二百萬普特的穀物，作爲種子和糧食。

(11) 國家爲幫助能力單薄的農民而給予了他們的免稅和保險優待，共計三萬七千萬盧布。

關於我國文化發展情形，我們在報告期內有如下的事實：

(1) 在蘇聯全國施行了普及的初級義務教育，識字人口已由一九三〇年來的百分之六十七，提高到一九三三年末的百分之九十。

(2) 各級學校學生人數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一千四百三十五萬八千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千六百四十一萬九千人，其中受初級教育者由一千一百六十九萬七千人增加到一千九百一十六萬三千人，受中等教育者由二百四十五萬三千人增加到六百六十七萬四千人，受高級教育者由二十萬零七千人增加到四十九萬一千人。

(3) 受育嬰教育的兒童人數已由一九二九年的八十三萬八千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百九十一萬七千人。

(4) 普通大學和專門大學數目已由一九一四年的九十一所，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六百所。

(5) 科學研究所數目已由一九二九年的四百所，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八百四十所。

(6) 俱樂部式的機關數目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三萬二千所，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萬四千所。

(7) 電影院，俱樂部電影機和流動電影機數目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九千八百部，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萬九千二百部。

(8) 報紙每日出版份數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一千二百五十萬份，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三千六百五十萬份。

此外，也許不妨指出，在我國各大學學生中，工人成份佔百分之五一點四，勞動農民成份佔百分之二六點五，而例如在德國各大學學生中，工人成份在一九三二—三三學年間只佔百分之三點二，小農成份只佔百分之二點四。

還要指出一件可喜的事實和鄉村文化水準增長的明證，這就是集體農莊女莊員在社會組織工作方面積極性底增長。大家知道，例如現時在集體農莊女莊員中，約有六千人當集體農莊主席，有六萬餘人當集體農莊管理部委員，有二萬八千人當生產隊長，有十萬人當生產班長，有九千人當集體農莊商品農場主任，有七千人當拖拉機駕駛人。這些統計材料當然是很不完全的。可是，就從這一個很不完全的數目中間，也可顯然看見鄉村文化水準銳增的情形。這個情況是有莫大意義的，同志們。其所以有莫大意義，是因為婦女佔我國人口半數，是一支龐大的勞動軍，而且她們負有使命來教育我們的兒童，我們的後輩，即我們的將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可讓這支龐大的勞動軍沉淪於黑暗無知的境地！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應當歡迎勞動婦女日益積極參加社會生活和被提拔來擔任領導工作的情形，作為我國文化水準增長的一個毫無疑義的明證。(鼓掌多時)。

最後，還應指出一件事實，但這是一件不良的事實。我所說的這個不可容許的現象，就是師範「科」和醫「科」在我們這裏至今尚被輕視。這是幾乎等於違背國家利益的一個大缺點。這個缺點是一定要剷除的。而且剷除得愈快愈好。

(四) 商業高漲與運輸業

這樣，我們就有如下的情形：

(1) 工業產量——包括日用品出產在內——增長了；

(2) 農業產量增長了；

(3) 城鄉勞動羣衆對於農產品和工業品的需要和需求額增長了。

爲了把這些條件結合起來，並使全體消費者大衆都能得到必需的工業品與農產品，還要有什麼條件呢？

有些同志認爲，只要有這些條件，就足以使全國經濟生活十分活躍了。這是很錯誤的。即令這一切條件都已完全具備，可是如果商品不達到消費者手上，那末經濟生活不僅不能十分活躍，反而會根本解體和紊亂起來的。到底必須瞭解：商品畢竟不是爲生產而生產，而是爲消費而生產的。我們有過這樣一種事實，就是工業品和農產品本來不少，但這些產品不僅沒有達到消費者手上，反而積年徘徊於官僚主義的迂迴曲折的路上，即所謂商品轉運網中，而不能與消費者見面。很明顯的，在這種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就失去其擴展生產的任何刺激，商品轉運網就堆滿貨物，而工農羣衆却落得沒有工業品和農產品。結果，雖有大宗工業品和農產品，而全國經濟生活還是陷於解體。爲要使全國經濟生活十分活躍起來，而工業與農業又有不斷擴大生產的刺激，那就還要有一個條件，這個條件就是城市與鄉村間，區與區間，省與省間，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擴展的商品流轉。必須使全國

各地都佈滿批發處，商店和貨攤。必須使商品源源不斷地從生產場所經過這些批發處，商店和貨攤流到消費者手上去。必須使國營商業網，合作社商業網，地方工業，集體農莊以及個體農民，都來參加這一事業。

這就是我們所稱呼的擴展的蘇維埃商業，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業，沒有投機者參加的商業。

由此可見，擴展蘇維埃商業是一個最迫切的任務，不解決這個任務，便無法繼續前進。

雖然這個真理是十分明顯的，但黨在報告期內終究不得不克服擴展蘇維埃商業道路上的許多障礙，這些障礙，如果加以簡要的估計，便可說是由於一部分共產黨員完全不懂蘇維埃商業必需和重要的結果。

首先，在一部分共產黨員中間，仍然流行着一種高傲鄙視一般商業以及蘇維埃商業的態度。這些所謂共產黨員認為蘇維埃商業是一件沒有什麼價值的事情，而認為商業工作人員是些毫無出息的人。這些人大概是不懂得，他們這種鄙視蘇維埃商業的觀點根本不是布爾什維克的觀點，而是一種大有野心而毫無本事的失意貴族的觀點。(鼓掌)。這些人不懂得蘇維埃商業是我們切身的布爾什維克的事業，而商業工作人員，包括店裡工作人員在內，只要他們誠懇工作，就是我們革命布爾什維克事業底執行者。(鼓掌)。當然，黨只好把這些所謂共產黨員稍許打整了一下，而把他們那種貴族偏見拋到了垃圾堆裏去。(鼓掌多時)。

其次，我們還克服了另一種偏見。此地所說的，就是流行於我們一部分工作人員中的「左派」

廢話，說蘇維埃商業已成了過去的階段，說我們必須實行產品直接交換制，說貨幣很快就要取消，因為貨幣似乎已變成了簡單的核算符號，說根本用不着發展商業，因為產品直接交換制已是指日可待了。應當指出，這種幫助資本主義份子來破壞蘇維埃商業擴展事業的「左派」小資產階級廢話，不僅是流行於一部分紅色教授中間，而且還流行於某些商業工作人員中間。這些人甚至不能辦好最簡易的蘇維埃商業的事情，却在那裏妄說他們決意要辦好更複雜困難的產品直接交換事情，——這當然是滑稽可笑的。可是，吉訶德一流的先生之所以叫作吉訶德先生，也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最低限度的人生知覺哩。這些與馬克思主義相隔十萬八千里的人，大概是不懂得，貨幣在我們這裏還會長期存在，一直存在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完成時為止。他們不懂得，貨幣是蘇維埃政權從資產階級經濟那裏拿到自己手裏來適應社會主義利益，盡量擴展蘇維埃商業，藉以準備條件去實行產品直接交換制的一種工具。他們不懂得，產品直接交換制，只有在蘇維埃商業辦得盡善盡美的時候，才能代替蘇維埃商業，而辦得盡善盡美的蘇維埃商業現在我們還完全沒有的，並且不會是很快就有的。所以，黨在設法擴展蘇維埃商業的時候，當然也就只好把這些「左派」畸形兒打擊一下，並把他們的那種小資產階級廢話拋到九霄雲外去。

其次，我們曾必須克服商業工作人員機械分配商品的不良習慣，剷除忽視貨物種類和買者要求的態度，剷除機械運送貨物的辦法以及商業中的無人負責現象。為此目的而添設了許多省批發處和區間批發處，開設了幾萬個新商店和新貨攤。

其次，我們曾必須消滅合作社獨佔市場的狀態，因而責成各人民委員會開始各自經營銷售本

部產品的商業，責成供給事業人民委員會開展廣泛的營業性的農產品貿易，結果是一方面用競賽辦法把合作社商業改善了，另一方面又把市場上的物價降低了，把市場情形健全化了。

開展了廣泛的廉價飯堂網（「公共飯堂」），在各工廠中組織了工人給養部，取消了與各該工廠無關的人所領取的給養證，單是在重工業人民委員會這一方面，就取消了不下五十萬個局外人所領取的給養證。

整理了統一集中的短期信貸銀行，即國家銀行，它有二千二百個能資助商業活動的區分支行駐設於各地。

由於實行這種辦法的結果，我們在報告期內就有了如下的成績：

（1）商店與貨攤數目在一九三〇年是十八萬四千六百六十二所，而在一九三三年則已增加到二十七萬七千九百七十四所；

（2）新設立的省批發處有一千零十一個，新設立的區間批發處有八百六十四個；

（3）新設立的工人給養部，共有一千六百處；

（4）營業性的糧食商店網已經擴大而普及於三百三十個城市；

（5）公共飯堂網已經擴大而包括有一千九百八十萬個用膳者；

（6）經過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包括公共飯堂在內）機關所進行的商業流轉總額，在一九三〇年等於一百八十九萬萬盧布，而在一九三三年則已增加到四百九十萬萬盧布。

如果以為蘇維埃商業這全部發展規模已能滿足我國經濟需要，那就是錯誤的想法了。恰巧相

反，從來也沒有像現在看得這樣明顯，商品流轉底現狀決不能滿足我國需要。因此，任務就是要繼續擴展蘇維埃商業，吸收地方工業來參加這件事情，加強集體農莊的農民的商業，以求在提高蘇維埃商業方面獲得有決定意義的新成功。

可是必須指出：問題不能局限於擴展蘇維埃商業。要發展我國經濟，就必須發展商品流轉，必須發展蘇維埃商業，而為要發展蘇維埃商業，又必須發展我國運輸業——鐵路運輸業，水上運輸業和汽車運輸業。可以發生這樣一種情形：有商品，有充分擴展商品流轉的可能，但運輸業却趕不上商品流轉底發展，不能充分轉運貨物。大家知道，我們往往正有這樣一種情形。因此，運輸業現時是這樣一個狹窄處，我國整個經濟，首先是我國商品流轉，都能碰到它而跌交，而且也許已在開始跌交了。

固然，鐵路運輸業底轉運量是增加了：在一九三〇年等於一千三百三十九萬噸哩，而在一九三三年則已增加到一千七百二十萬噸哩。可是這還不夠，這對於我們，對於我國經濟是還嫌太少的。

水上運輸業底轉運量也增加了：在一九三〇年等於四百五十六萬噸哩，而在一九三三年已增加到五百九十九萬噸哩了。可是這還不夠，這對於我國經濟是還嫌太少的。

更不必說汽車運輸業，它所有的汽車數量（載重汽車和輕便汽車）雖有增加，在一九一三年是八千八百輛，而在一九三三年末則已增加到十一萬七千八百輛，可是，這對於我國國民經濟是少得簡直不方便去說的。

當然，運輸機關如沒患有所謂官僚形式主義領導方法的有名病症，那末所有這各種運輸業就會工作得好得多。因此，除了用人材和經費幫助運輸業而外，還必須在運輸業各機關內根本剷除官僚形式主義的辦法，而使它們成爲更靈活的機關。

同志們！我們已把工業各基本問題正確解決了，於是工業現在是腳根穩固了。我們把農業基本問題也正確解決了，於是農業——我們可以直截這樣說——現在也是腳根穩固了。可是，如果我們的商業竟開始跛足，如果我們的運輸業竟成爲我們腳上的贅累，那我們是會喪失這些成績的。因此，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擴展商品流轉額和斷然改良運輸業，我們不解決這個任務，便不能繼續前進。

(三) 黨

現在我要來說關於黨的問題。

本次代表大會是在列寧主義獲得了完全勝利的情形下舉行的，是在肅清了各反列寧主義集團餘孽的情形下舉行的。

反列寧主義的托洛茨基份子集團是已被擊破和擊散了。現時這個集團底組織者們是在國外資產階級黨底後院中遊蕩着。

反列寧主義的右傾份子集團是已被擊破和擊散了。這個集團底組織者們早已放棄了自己的觀點，而現時正極力設法來在黨面前改過自新。

民族主義傾向者的集團是已被擊破和擊散了。這些集團底組織者們或者是和主張武裝干涉的僑民打成一片，或者是表示悔過自新。

這些反革命集團中的大多數參加者，都不得不承認黨路線正確，而在黨面前表示投降。

如果說我們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還必須證明黨路線正確，還必須和那些有名的反列寧主義集團作鬥爭，後來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也還必須給予這些集團最後信徒一個最後打擊，那末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却已沒有什麼東西還要證明，而且大概也沒有什麼人還要打擊的了。大家都看得見，黨底路線已經勝利了。（掌聲如雷）。

全國工業化的政策已經勝利了。它的成果現在已是有目共觀。有什麼東西能用來反駁這個事實呢？

消滅富農階級和實行全盤集體化的政策是已經勝利了。它的成果也是有目共觀的。有什麼東西能用來反駁這個事實呢？

我國經驗已經證明，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是完全可能的。有什麼東西能用來反駁這個事實呢？

顯然，所有這些成功，尤其是五年計劃底勝利，已把所有一切反列寧主義的集團打得完全垂頭喪氣，打成粉碎了。

必須承認，黨在現時已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一致。（熱烈鼓掌多時）。

(一) 思想上政治上的領導問題

但這是不是說鬥爭已經終結，而社會主義底繼續進攻已經失了時效，成了贅舉呢？

當然不是。

這是不是說在我們黨內已經是百事大吉，在它內部再不會有任何傾向發生，因此現在已可高枕而臥呢？

當然不是。

黨底仇敵，各色機會主義者和各種民族主義傾向者都被我們擊潰了。可是，他們那種思想的餘毒是還在個別黨員頭腦中生存着，而且往往流露出來的。決不可把黨看作是與週圍的人們隔絕的東西。黨是在圍繞着它的人們中間生存和動作的。無怪乎有一些不良的情緒往往由外界侵入到黨內來。至於我國有產生這種種情緒的園地，却是毫無疑義的，因為我國城市和鄉村中至今都還存在有一些中間居民階層，他們便是產生這種情緒的泉源。

我們黨第十七次代表會議說過：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時的基本政治任務之一，就是「克服那些遺留在經濟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餘毒」。這是個完全正確的思想。可是，難道可以說我們已克服了遺留在經濟中的一切資本主義餘毒麼？當然還不可這樣說。更不可說我們已克服了遺留在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餘毒。其所以不可這樣說，不僅是因為人們意識底發展落後於人們底經濟地位，而且是因為還有資本主義包圍勢力存在着，這些資本主義包圍勢力總是假法復活和支持遺留在

蘇聯經濟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餘毒，而我們布爾什維克正應時刻戒備起來反對這些資本主義包圍勢力。

當然，這種餘毒不能不成爲一種便利的園地，使那些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思想能在我們黨個別黨員頭腦中活躍起來。況且，我們黨大多數黨員底理論水準又還不很高，黨機關底思想工作尙屬薄弱，而我們黨工作人員又因忙於純粹實際工作，沒有機會來充實自己的理論行囊，結果就使個別黨員對於某些列寧主義問題抱有一種糊塗觀念，這種糊塗觀念往往流露到我們的刊物上，並使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底思想餘毒易於活躍起來。

正因爲如此，所以決不可說鬥爭已經終結，決不可說社會主義進攻政策已經沒有什麼必要。

可以舉出列寧主義中的幾個問題，來說明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底思想餘毒還在某些黨員中間活躍着。

例如，拿建成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來說吧。第十七次黨代表會議說過：我們是朝創立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的方向前進着。當然，無階級社會決不會按所謂自流方式到來。它是必須由全體勞動者共同努力，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手段，用開展階級鬥爭的手段，用消滅階級的手段，用消滅資本階級餘孽的手段，在反對內外敵人的戰鬥中爭得和建成的。

這看起來是很明白的了。

可是，誰不知道，列寧主義這一簡明提綱的宣佈竟在一部分黨員中間引起了不少的糊塗觀念和不良情緒呢？我們向無階級社會進展的提綱本來是當作口號發出的，而他們却把它誤解爲自發的

過程。於是他們就盤算着：既然說無階級社會，那就是說可以削弱階級鬥爭，可以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和一般取消國家，因為國家橫直是要在最近將來消亡的。因此，他們就像癡兒一樣，歡天喜地，束手而待，以為既然很快就會沒有任何階級，於是也就不會有階級鬥爭，於是就再也不必操心，不必麻煩，於是也就可以放下兵器，高枕而臥，靜候無階級社會自行來臨了。（全場大笑）。

毫無疑義，這種糊塗觀念和情緒恰與右傾份子底有名觀點一模一樣，照這種觀點看來，舊東西應當自流式地長入到新東西中去，而我們在某一個良辰吉日裏，就會不知不覺地落到社會主義社會中去。

由此可見，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底思想餘毒是完全可能復活起來，而遠遠沒有失去生機的。

不言而喻，如果這種糊塗觀點和這些非布爾什維克情緒普及了我們黨大多數黨員，那末我們黨一定是會陷於廢弛而被解除武裝了。

其次，拿農業勞動組合和農業公社的問題來說吧。現在大家都承認，勞動組合在現今條件下是唯一正確的集體農莊運動形式。這是完全明白的，因為第一，勞動組合把集體農莊莊員底個人日常生活利益與他們的公共利益正確配合起來；第二，勞動組合很恰當地把個人日常生活利益適應於公共利益，因而便利於用集體主義精神來教育昨天的個體農民。

農業公社却與勞動組合不同，因為在勞動組合中只把生產資料公共化，而在農業公社中，不久以前卻不僅把生產資料公共化了，並且把每個社員底日常生活也公共化了，——這就是說，農業公

社社員與勞動組合組員不同，他們沒有個人佔有的家禽，小牲畜，乳牛，穀物和園圃土地。這就是說，在農業公社中，沒有顧到各社員底個人日常生活利益，沒有把它與公共利益配合起來，却爲了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利益而用公共利益把它蒙蔽起來了。這當然是農業公社底最大弱點。正因爲如此，所以農業公社也就沒有廣泛流行起來，而只是偶然碰得見幾個或幾十個。同樣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農業公社爲了維持自己的生存，爲了避免瓦解，竟不得不放棄那種把日常生活公共化的辦法，而開始按照勞動日來進行工作，給社員分發穀物回家享用，允許社員個人佔有家禽，小牲畜和乳牛等等，可是由此可見，農業公社在事實上已改爲勞動組合了。這當然是沒有什麼壞處，因爲這恰巧是廣大集體農莊運動底健全發展利益所要求的。

這當然不是說農業公社根本用不着了，已經不是集體農莊運動底最高形式了。不，農業公社是需要的，而且它當然還是集體農莊運動底最高形式；但這不是現時在技術不發展與產品不夠的基礎上產生，並且已經自動改變成了勞動組合的農業公社，而是將來在技術更發展與產品極豐富的基礎上產生的農業公社。現今的農業公社是在技術不很發展和產品不充足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因此現今的農業公社也就實行了平均主義辦法，而很少顧到社員們底個人日常生活利益，因此它現在也就不得不改爲勞動組合，把集體農莊社員底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適當配合起來。將來的農業公社是要從發展了的豐裕的勞動組合中長成的。將來的農業公社是在勞動組合田場上和農場中有了豐富的穀物、家禽、家畜、蔬菜及其他種種產品的時候，在勞動組合中附設有機械洗衣坊、新式廚房、食堂、麵包廠等等的時候，集體農莊社員看見從農場方面領取肉類和牛奶是比自己飼養

乳牛和小家畜便宜些的時候，集體農莊女莊員看見在公共飯堂中用膳，向麵包廠領取麵包，向公共洗衣坊領取乾淨衣服是比自己料理這種事情方便些的時候產生出來的。將來的農業公社是在技術更發展和勞動組合更發展的時候，在產品十分豐富的時候產生出來的。這在什麼時候才會呢？當然不是很快就會有。但這是一定會有的。如果用人工方法勉強加速勞動組合轉變為將來農業公社的過程，那就是罪惡了。這樣來作，便會是紊亂一切計劃，幫助敵人了。勞動組合轉變為農業公社的過程，應當是逐漸發生，應當是隨着全體集體農莊莊員確信有這種轉變必要的程度發生。

關於農業勞動組合與農業公社問題，就是如此。這看起來是很明白的，而且幾乎是很淺顯的。

可是，有一部分黨員對於這個問題却抱着一大堆糊塗觀念。他們認為黨既然宣佈勞動組合為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形式，於是就離遠了社會主義，由集體農莊運動最高形式的公社退到低級形式上去了。試問為什麼呢？原來是因為在農業勞動組合中沒有平等，因為在農業勞動組合裏還保存有各組員底個人消費和日常生活中的差別，而在農業公社中却有平等，因為在農業公社裏各社員底個人需要和日常生活狀況都是彼此平均化了的。可是，第一，我國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在個人消費和個人生活方面都實行一律平均了的農業公社。實踐已經表明：如果農業公社沒有放棄平均主義辦法，沒有在事實上改變為農業勞動組合，那它就定會是已經滅亡了。所以，根本就用不着援引那已不復存在於天地間的東西。第二，每一個列寧主義者，只要他是一個真正列寧主義者，都知道需要和個人生活方面的平均制是一種反動的小資產階級謬論，這種謬論只適合於某種原始禁慾主義教門，

但它不適合於按照馬克思主義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決不可要求所有的人都有一樣的需要和胃口，決不可要求所有的人都過着一個模樣的個人日常生活。最後，在工人中間豈不是也保留有需要方面和個人日常生活方面的差別麼？這是不是說工人比農業公社社員離社會主義離得遠些呢？

這些人大概認為社會主義要求把社會組成員們底個人需要和個人日常生活都平均，劃一和均等起來。不待說，這種設想是與馬列主義毫不相干的。馬克思主義所瞭解的不等，並不是個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階級之消滅。這就是說：第一，在推翻和剝奪資本家以後，一切勞動者都平等地擺脫剝削而得到解放；第二，在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以後，對於大家都是平等地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第三，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各人勞動領取勞動報酬的平等權利（社會主義社會）；第四，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各人需要領取勞動報酬的平等權利（共產主義社會）。同時，馬克思主義認為各人底胃口和需要，無論按質量或數量來說，無論在社會主義時期或共產主義時期，都不會是，而且不能是彼此一樣，大家平等的。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平等觀。

任何其他一種平等，都是馬克思主義沒有承認過，而且也不會承認的。

如果由此作出結論，說社會主義要求把社會組成員們底需要都平均，劃一和均等起來，要求把他們的胃口和個人日常生活都均等起來，說按馬克思主義者底計劃，大家都應當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和同量的飲食，那就是胡說八道，誹謗馬克思主義了。

到底應當瞭解，馬克思主義是堅決反對平均主義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痛斥了那種簡陋的空想的社會主義，並因為它鼓吹「普遍禁慾主義和鄙俗平均思想」而稱它為反動的社會主義。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一書中，闡出整整一章，專門痛切批評了杜林所用來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對立的那種「急進派的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

恩格斯當時說：

「無產階級平等要求底實在內容，就是要消滅階級。任何超過這一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會得出荒謬的結論」。

列寧也這樣說過：

「恩格斯寫得千真萬確：平等概念除消滅階級而外，就是最荒謬的一竅不通的偏見。資產階級教授們企圖藉口平等概念來誣賴我們，硬說我們想把所有的人都弄得一模一樣。他們企圖把他們自己臆造的這個謬論加在社會主義者頭上。可是，他們由於自己昏暗無知，竟不知道社會主義者——而且正是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平等二字若不瞭解為消滅階級，便是一句空話。我們是想消滅階級的，我們在這方面是主張平等的。可是，如果以為我們能把所有的人都弄得一模一樣，那就是最空洞的辭句和智識份子的拙劣臆造了」（節自列寧論自由平等口號來欺騙民衆的把戲的演說，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九三至二九四頁）。

這看起來是很明白的了。

資產階級作家們喜歡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容成爲沙皇時代的營房，那裏是一切都服從平均主義「原則」的。可是，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對資產階級作家底昏暗魯鈍習性負責。

毫無疑義，個別共產黨員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所持的這種糊塗見解，以及他們對於農業公社平均主義趨向所持的迷戀態度，恰與「左派」糊塗蟲底小資產階級觀點一模一樣，這些糊塗蟲會把農業公社當作偶像崇拜，而企圖在工廠裏培植公社制度，要各按本人手藝做工的熟練工人和不熟練工人都把所得工資交出來混在一塊，然後按人平均分配。大家知道：「左派」糊塗蟲所玩的這些平均主義的兒戲，是使我國工業受到了莫大害處的。

由此可見，被擊破了的反黨集團底思想餘毒還有頗大的生機。

顯然，如果這些「左派」觀點在黨內獲得了勝利，那末黨就會不成其爲馬克思主義黨，而集體農莊運動就會完全解體了。

例如又拿「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這一口號來說吧。這個口號不僅與集體農莊莊員有關。它尤其是與工人有關，因爲我們想把所有的工人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變成爲享受豐裕和完全文明的生活的人。

這看起來是很明白的了。如果我們做不到使我國民衆享受美滿生活，那又何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實行推翻資本主義，多年建設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並不是要大家貧窮困苦，而是要剷除貧窮困苦，要給社會上全體成員造成豐裕和文明的生活。

可是，這一個十分明白，而且實在是很淺顯的口號，竟在一部分黨員中間引起了許多誤會，糊

塗觀念和混亂思想。他們說：這個口號不是回復到黨所推翻了的那個「發財吧」的舊口號麼？他們接着又說：如果大家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如果再也沒有窮人存在，那末我們布爾什維克進行工作的時候又倚靠於什麼人呢，我們沒有窮人，怎能工作呢？

這聽起來也許是很可笑的，但這種幼稚的反列寧主義觀點却確實存在於一部分黨員中間，而成爲一件不可忽視的事實。

這些人大概不瞭解：「發財吧」的口號與「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的口號，是根本不同的。第一，能夠發財致富的只有個別份子，或個別集團，至於豐裕生活的口號，不是與個別份子或個別集團有關，而是與一切集體農莊莊員有關的。第二，個別份子或個別集團發財致富，是爲了奴役和剝削他人，至於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能在集體農莊內生產資料公有化條件下享受豐裕生活的口號，却絕對排斥任何人剝削人的可能。第三，「發財吧」的口號是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中提出來的，當時資本主義局部地恢復起來，富農還有勢力，個體農戶還在國內佔居大多數，集體農莊經濟還處在萌芽狀態中；至於「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的口號，却是在新經濟政策最後階段中，即是工業中的資本主義份子已被剷除，農村中的富農已被擊潰，個體農民經濟已被排擠到了次等地位，而集體農莊已變成了農業統治形式的時候提出的。況且，「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的口號並不是單獨提出，而是與「把集體農莊變成爲布爾什維克的農莊」的口號一同提出，不可分開的。

「發財吧」的口號實質上是號召恢復資本主義，而「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

人」的口號，却是號召用加強集體農莊底經濟實力和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爲生活富裕的勞動者的手段，來徹底剷除資本主義底最後餘孽，——這難道不是很明白麼？（喊聲：「對呀！」）。

這兩個口號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相同之處，——這難道不是很明白麼？（喊聲：「對呀！」）。

至於說沒有窮人，便不能有布爾什維克的工作，便不能有社會主義，那就甚至是不好意思去說的一種套話了。當有資本主義份子和有被資本家剝削的窮人存在的時候，列寧主義者是倚靠於窮人的。可是，當資本主義份子已被擊潰，窮人已免除剝削，而貧苦現象和窮人所藉以存在的前提已被消滅的時候，列寧主義者底任務就不是要把貧苦現象和窮人固定起來，保存起來，而是要剷除貧苦現象和把窮人變成爲生活富裕的人了。如果以爲社會主義能在貧窮困苦的基础上，在縮減個人消費的基礎上，在降低人們生活水準至窮人生活水準的基礎上建設成功，那就是愚蠢的想法了，何況窮人自己也不願照舊做窮人，而是力求上進去過豐裕生活哩。試問誰需要這種所謂社會主義呢？這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而是一種譏笑社會主義的諷刺畫。社會主義只有在社會生產力蓬勃發展的基础上，在農產品和工業品豐盈的基礎上，在勞動者生活富裕的基礎上，在文化水準湧湧昇高的基礎上，才可建成。因爲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並不是減少個人需要，而是要盡量擴大和發展個人需要，並不是限制或不肯滿足個人需要，而是要盡量和完全滿足文化程度很高的勞動者底所有一切需要。

毫無疑義，個別黨員對於貧困和豐裕問題所持的這種糊塗見解，是「左派」糊塗蟲觀點底反

映，這些「左派」糊塗蟲把窮人當作偶像來崇拜，以為窮人是布爾什維克在任何條件下永遠倚恃的靠山，而把集體農莊看作是殘酷階級鬥爭的舞台。

由此可見，在這裏，在這個問題上，被擊潰了的反黨集團底思想餘毒也還沒有失去生機哩。

顯然，如果這種糊塗觀點在我們黨內獲得了勝利，那末集體農莊就不會有它們在最近兩年來所達到的成績，而是很快就會陷於瓦解了。

例如又拿民族問題來說吧。在這裏，在民族問題方面，也如在其他問題方面一樣，有一部分黨員也抱着一種造成相當危險的糊塗見解。我已經說過資本主義餘毒底生機。應當指出，在民族問題方面，遺留在人們意識裏的資本主義餘毒，要比在其他任何問題方面更有生機。其所以更有生機，是因為它們能在民族外衣下面巧妙暗藏起來。許多人以為斯克賴卜尼克底墮落變節，是一種罕見的例外的現象。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斯克賴卜尼克和他在烏克蘭的集團墮落變節，並不是什麼例外的現象。在其他民族共和國裏，也有個別同志表現出這種毛病哩。

民族主義傾向，不管它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也好，或地方民族主義傾向也好，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民族主義傾向就是要把工人階級底國際主義政策適應於資產階級底民族主義政策。民族主義傾向所反映的，是「自家的」「本族的」「資產階級想破壞蘇維埃制度，恢復資本主義的企圖。由此可見，這兩個傾向是有共同的根源。這個根源就是離開列寧國際主義。你們如果想要打擊這兩個傾向，首先就應當打擊這個根源，打擊離開國際主義的人，不管他們是傾向於地方民族主義也好，或傾向於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也好。（熱烈鼓掌）。

有人在那裏爭論：究竟什麼傾向是主要危險，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呢，還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呢？在現時條件下，這是一種形式上的爭論，因此也就是一種毫無意思的爭論。如果想要定出適用於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的一種辨別主要危險和次要危險的現成藥方，那就是愚蠢的想法了。天地間根本就沒有這樣一種藥方。主要危險就是人們中止與它作鬥爭而讓它滋長成了禍國危險的那種傾向。（鼓掌多時）。

在烏克蘭方面，烏克蘭民族主義傾向在很不久以前還不是主要危險，但當人們中止與它作鬥爭而讓它滋長到與武裝干涉者打成一片的時候，這個傾向就成為主要危險了。爲了解答民族問題方面的主要危險問題，並不是要進行空洞的形式上的爭論，而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分析當時的實際情形，並研究在這方面所犯的錯誤。

關於一般政治方面的右傾和「左」傾，也要這樣說。在這裏，也如在其他方面一樣，個別黨員也抱着許多糊塗見解。人們與右傾作鬥爭時，往往寬容了「左」傾，減弱了反「左」傾的鬥爭，以爲它沒有危險或是不很危險。這是一種有危險的嚴重錯誤。這種向「左」傾讓步的態度是黨員所不容許的。其所以不容許，尤其是因爲近來「左派」已完全滾到右派立場上去了，它在實質上已與右派沒有任何區別了。

我們向來都說：「左派」也就是右派，不過他們是用左派詞句掩飾其右派本性而已。現在，「左派」自己已證實了我們這個說法。試拿去年出版的托洛茨基份子「公報」來看吧。托洛茨基份子這班老爺們在那裏要求些什麼，寫着些什麼呢，他們的「左派」綱領表現於什麼呢？他們要求

解散蘇維埃農莊，認為蘇維埃農莊是不生利的東西；他們要求解散一部分集體農莊，認為這些集體農莊是虛張聲勢的空架子；他們要求放棄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他們要求恢復租讓政策和出租我國許多工業企業，認為這些企業都是些不生利的東西。

這就是可惡怯夫和投降份子底綱領，這就是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綱領！

它與極右派底綱領有什麼區別呢？顯然是沒有任何區別的。由此可見，「左派」已公開附和右派底反革命綱領，以便和他們結成聯盟來共同進行反黨鬥爭了。

既是如此，怎樣還可說「左派」沒有危險或者不很危險呢？說這種蠢話的人，難道不是替列寧主義底死敵助威麼？

可見，在這裏，在關於各種離開黨路線的傾向方面，無論是一般政治方面的傾向也好，或民族問題方面的傾向也好，遺留在人們意識中和我們黨個別黨員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餘毒，也是有充分生機的。

這就是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幾個嚴重迫切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有一部分黨員懷有模糊見解，糊塗觀念，甚至懷有一種直接離開列寧主義的偏向。而且這還不是可以拿來暴露個別黨員觀點糊塗的唯一問題哩。

既然如此，怎樣還可以說我們黨內百事大吉呢？

當然不可這樣說。

我們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任務是：

- (1) 要把黨底理論水準提到應有的高度；
- (2) 要在黨底一切環節中加強思想工作；
- (3) 要在黨員中間努力不倦地宣傳列寧主義；
- (4) 要用列寧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黨組織及其周圍的非黨員積極份子；
- (5) 不要抹煞，而要大胆批評個別同志離開馬列主義的偏向；
- (6) 要有系統地揭露反列寧主義派別底思想和思想餘毒。

(二) 組織上的領導問題

我已經說過我們的成功。我已經說過黨路線在國民經濟和文化方面，以及在克服黨內各種反列寧主義集團方面的勝利。我已經說過我們勝利底全世界歷史意義。但這並不是說在無論什麼地方，在一切事情方面都已獲得勝利，一切問題都已解決了。天地間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成功和勝利。我們還有不少尚未解決的問題和各種各樣的缺陷。我們面前還有一大堆需要解決的任務。但這毫無疑義是說明，大部分急待解決的當前任務都已順利解決了，而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黨獲得極大勝利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於是就要問：這個勝利是怎樣造成的呢，它實際上是怎樣獲得的呢，是用什麼鬥爭，用何種努力獲得的呢？

有人以為只要把黨底正確路線規定出來，把它當衆宣佈出來，把它製成一般提綱和一般決議而

一致表決通過，就可使勝利自行到來，即所謂自流式地到來了。這種想法當然是不對的。這是個大錯誤。只有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才能這樣設想。其實，這些成功和勝利並不是按自流方式取得，而是在力求實行黨路線的殘酷鬥爭中爭得的。勝利無論何時也不會自行到來，它通常都是由人們拖來的。通過擁護黨總路線的好決議和好宣言，還只是事情底開端，因為它們只是表示爭取勝利的願望，而並不是勝利本身。當正確路線已經提出來的時候，當問題已經正確決定了的時候，事業底成功就要取決於組織工作，取決於組織鬥爭來實現黨路線，取決於正確挑選人材，取決於審查各領導機關決議執行情形。如果不然，那末正確的黨路線和正確的決議就會受到嚴重的損失。況且：當正確政治路線已經規定以後，組織工作就能決定一切，就中也決定政治路線本身底命運，即政治路線底實現或失敗。

其實，我們的勝利是用進行有系統的殘酷鬥爭去反對一切阻礙實現黨路線的困難的手段，用克服這些困難的手段，用動員全體黨員和工人階級去克服困難的手段，用組織鬥爭去克服困難的手段，用撤銷那些不中用的工作人員而選用有本事克服困難的優秀工作人員的手段所獲得和爭得了的。

這是些什麼困難呢，這些困難是潛藏在什麼地方呢？

這些困難是我們組織工作方面的困難，是我們組織上的領導方面的困難。這些困難是潛藏在我們本身中間，潛藏在我們的領導工作人員本身中間，潛藏在我們的組織中間，潛藏在我們各個組織底機關，即黨機關，蘇維埃機關，經濟機關，職工會機關，共產主義青年團機關以及其他各種機關中間。

必須瞭解：我們的黨組織，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和其他各種組織及其領導工作人員底力量和威信，已增長到空前未有的程度。正因為他們的力量和威信已增長到空前未有的程度，所以現在一切事情或幾乎一切事情都取決於他們的工作。援引所謂客觀條件，是沒有什麼理由的。既然黨政治路線底正確性已為多年實際經驗所證實，而工農擁護這個路線的決心已是不容置疑的了，那末所謂客觀條件底作用就降到最低限度，而我們各組織及其領導人員底作用便是特別重大，足以決定一切了。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從今以後，我們工作虧空與缺點方面的責任，十分之九都不是落在「客觀」條件身上，而是落在我們自己身上，而且只是落在我們自己身上。

我們的黨有兩百多萬個黨員和候補黨員。我們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有四百多萬個團員和候補團員。我們有三百多萬個工農通信員。我們的國防航空化學協進會有一千二百多萬個會員。我們的職工會有一千七百多萬個會員。我們是因爲有這些組織而獲得種種成功的。如果雖有這些組織和這些便利我們得到成功的可能性，而我們在工作中還是有不少的缺點與虧空，那末對此應負其咎的，就只是我們自己，我們的組織工作，我們的不好的組織上的領導。

管理機關中的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用所謂「一般領導」的廢話來代替活的具體的領導；各組織按職能標準造成的結構和缺乏專責制的現象；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和工資制中的平均主義；缺乏有系統審查執行情形的工作；害怕自我批評，——這就是我們所有困難底根源，這就是我們目前困難底潛藏處。

如果以爲能靠決議和決定來剷除這些困難，那就是幼稚的想法了。官僚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早

已慣於在口頭上表示盡忠於黨和政府底決議，事實上却把這些決議置諸高閣，不去執行。我們爲了打破這些困難，會必須剷除我們組織工作落後於黨政治路線要求的現象，必須把國民經濟所有各方面的組織上的領導底水準提高到政治領導底水準，必須設法使我們的組織工作能保證實際實現黨底政治口號和決議。

我們爲了打破這些困難而達到成功，會必須組織鬥爭來克服這些困難，必須吸引工農羣衆來參加這個鬥爭，必須把黨本身動員起來，必須把一切不可靠的份子，動搖份子和蜕化份子從黨和各經濟組織中清洗出去。

我們爲此而會須做些什麼工作呢？

我們會須組織下列各項工作：

- (1) 擴展自我批評和揭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
- (2) 動員黨組織，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職工會組織以及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去爲克服困難而奮鬥；
- (3) 動員工農羣衆去爲實現黨和政府底口號和決議而奮鬥；
- (4) 在勞動羣衆中間擴展競賽和突擊運動；
- (5) 廣設農業機器站和蘇維埃農莊政治部，使黨領導和蘇維埃領導更接近於鄉村；
- (6) 把各人民委員部，各總管理局，各托拉斯底規模分小，使經濟領導更接近於企業；
- (7) 剷除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消滅工資制中的平均主義現象；

(8) 取消「職能制」，加強專責制，採取廢除合議制的方針；
(9) 加強審查執行情形的工作，採取改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查院來加強審查執行情形工作的方針；

(10) 把熟練工作人員由辦公處調到接近生產的地方去工作；

(11) 揭破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把他們逐出管理機關；

(12) 把違背黨和政府決議，誇功騙人，專說廢話的人概行撤銷職務，而任用新的人材，任用能具體領導所負工作，並能鞏固黨紀律和蘇維埃紀律的求實人材；

(13) 清洗蘇維埃組織和經濟組織，裁減冗員；

(14) 最後，把不可靠的份子和蜕化的份子從黨內清洗出去。

大體說來，黨為克服困難，為把我們的組織工作水準提高到政治領導工作水準，藉以保證黨路線實現而會應採取的種種辦法，就是如此。

你們知道，我們黨中央在報告期內也就是這樣進行了它的組織工作的。

中央在這裏所倚據的，是列寧認為組織工作底主要點是挑選人材和審查執行情形的那個英明思想。

關於挑選人材和撤換那些不稱職者的問題，我要說幾句話。

除我們大家一致認為必須摒除的那些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與形式主義者而外，我們還有兩種工作人員阻礙着我們的工作，妨礙着我們的工作，不讓我們前進。

第一種工作人員，就是那些從前有過某種功勞，而現在儼然以顯貴自居的人，他們竟以為黨法律和蘇維埃法律完全與他們無關，而是專為蠢漢製定的。這些人並不認為自己應該執行黨決議和政府決議，因而破壞了黨紀律和國家紀律底基礎。他們違背黨的法律和蘇維埃的法律，究竟是指望於什麼呢？他們指望，蘇維埃政權會因他們昔日有功而不去觸犯他們的。這些妄自尊大的顯貴以為他們是無可替代的人物，以為他們能隨便違背領導機關決議而不會受到處分。應當怎樣處置這種工作人員呢？應當毫無遲疑地撤銷他們的領導職務，不管他們從前有過怎樣的功勞。(喊聲：「對呀！」)。應當撤換他們，降低他們的職位，並把此事在報章上公佈出來。(喊聲：「對呀！」)。其所以必須這樣辦，是因為必須打破這些妄自尊大的顯貴官僚底傲慢習氣，叫他們安分守己。其所以必須這樣辦，是因為要在我們整個工作中鞏固黨紀律和蘇維埃紀律。(喊聲：「對呀！」鼓掌)。

現在來說第二種工作人員。這就是那些愛說廢話的人，可以說是些忠實的愛說廢話的人(笑聲)，這是些忠心於蘇維埃政權，但是不能做領導工作，不能組織什麼事情的誠實人。去年，我和這樣一個同志談過話，他是一個很受尊敬的同志，但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愛說廢話的人，能把任何一件活事情都沉沒在廢話中去。以下便是這次談話底內容。

我問：你們的播種工作情形怎樣呢？

他回答：斯大林同志，你是問播種工作情形麼？我們已經動員了。(笑聲)。

我問：結果怎樣呢？

他回答：我們已把這個問題直截了當地提出來了。(笑聲)。

我問：後來又是怎樣呢？

他回答：斯大林同志，我們已有了轉變，很快就會有轉變了。（笑聲）。

我問：究竟怎樣呢？

他回答：在我們那裏已開始呈現出一種進展。（笑聲）。

我問：你們的播種工作情形究竟怎樣呢？

他回答：我們的播種工作暫時還沒有絲毫頭緒哩，斯大林同志。（全場哈哈大笑）。

你們看，這就是那些愛說廢話的人底面目。他們已經動員了，已經把問題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他們既有轉變，又有進展，可是工作成績一點也沒有。

這完全和一位烏克蘭工人在不久以前描寫某一個組織情形時所說的一樣，當有人問這個組織裏有沒有路線時，他回答道：「路線麼……路線當然有，只是看不見什麼工作」。（全場大笑）。大概，這個組織也有其誠實的愛說廢話的人哩。

當我們把這些愛說廢話的人撤職，而使他們遠遠離開實際領導工作時，他們便帶着一種疑惑的神情問道：「爲什麼撤銷我們的工作呢？我們豈不是把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做完了麼，我們豈不是召集過突擊隊員大會麼，豈不是在突擊隊員大會上宣佈過黨和政府底口號麼，豈不是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爲名譽主席團麼（全場大笑），豈不是給斯大林同志打過賀電麼，——你們究竟還要我們做些什麼事情呢？」（全場哈哈大笑）。

應當怎樣處置這些不可救藥的愛說廢話的人呢？如果仍然讓他們担任實際領導工作，他們就會

把任何一件活事情都沉沒到滔滔不斷的廢話裏去。顯然必須撤銷他們的領導職位，而派他們去做別的工作，去做非實際領導性的工作。愛說廢話的人是沒有資格去擔任實際領導工作的。

(喊聲：「對呀！」鼓掌)。

關於中央怎樣指導了蘇維埃組織和經濟組織中挑選人材的工作，怎樣設法鞏固了審查執行情形的工作，我已經簡略報告過了。在我們進行代表大會議事日程第三項時，卡甘諾維奇同志就會更詳細地報告你們的。

關於今後加強審查執行情形的工作問題，我想說幾句話。

正確組織審查執行情形的工作，這在反對官僚主義和反對形式主義的鬥爭中是有決定意義的。領導機關底指示究竟是被執行着呢，還是被官僚主義者與形式主義者擱置起來了呢？這些指示究竟是被正確執行着呢，還是被人曲解了呢？某某機關究竟是誠實地本着布爾什維克精神進行工作呢，還是一味敷衍呢？——關於這一切，只有好好組織審查執行情形的工作，才可及時知道的。組織得完善的審查執行情形的工作，好似探照燈一樣，能幫助隨時查明各個機關底工作狀況，隨時揭破官僚主義者與形式主義者。可以肯定說，我們的缺點與缺陷，十分之九都是由於缺乏組織得正確的審查執行情形的工作。毫無疑義，如果有這種組織得正確的審查執行情形的工作，那末缺點與缺陷是一定會事先防止了的。

可是，爲要使審查執行情形的工作能達到目的，至少是需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必須使審查執行情形的工作是有系統地進行，而不是時斷時續的；第二，必須使各級黨組織、蘇維埃組織以及

經濟組織中主持執行情形審查工作的不是次要的人，而是擁有充分威信的人，即該組織底領導者自己。

正確組織審查執行情形的工作，對於各中央領導機關是有極大意義的。工農檢查院按其組織結構來說，已不能保證這樣完善組織審查執行情形的工作了。幾年以前，我們的經濟工作還較為簡單，還比較不能令人滿意，還可以指望有可能檢查各人民委員部和各經濟機關底工作，當時工農檢查院是能勝任的。可是，現在，我們的經濟工作已經擴大和更加複雜了，已經沒有必要，而且沒有可能由一個中央機關來檢查這個工作了，於是工農檢查院也就應當實行改組了。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並不是檢查工作，而是審查執行中央機關決議的情形，——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監督執行中央機關決議的情形。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一個並不抱定檢查一切的萬有目的，而專門負責監督，負責審查蘇維埃政權中央機關決議執行情形的組織。只有蘇聯人民委員會直屬下的蘇維埃監督委員會，才能成為這樣的組織，蘇維埃監督委員會應遵照人民委員會指示工作，並在各地有其不由地方機關所支配的代表。爲要使它擁有充分威信，並能在必要時給任何負責人員以處分，就必須使蘇維埃監督委員會委員候選人是由黨代表大會提出，並由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的。我認爲，只有這樣的組織，才能鞏固蘇維埃監督工作和蘇維埃紀律。

至於中央監察委員會，那末大家知道，它首先而且主要是爲防止黨內分裂而設立的。你們知道，在過去有個時候，我們黨內確實有過分裂的危險。你們知道，中央監察委員會及其所屬組織是把這種分裂危險防止了的。可是，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分裂危險了。同時，我們却又十分需要

有一個能夠專心審查黨和黨中央決議執行情形的組織。只有聯共(布)中央直屬下的黨監督委員會，才能成爲這樣的組織，它應遵照黨及其中央指示工作，並在各地有其不由地方組織所支配的代表。當然，這樣一個負責的組織應擁有很大的威信。爲要使它擁有充分威信，並能處罰任何一個犯了過失的負責工作人員，包括中央委員在內，就必須使這監督委員會底委員是由黨底最高機關，即黨代表大會所選出，而且只有這個代表大會才能加以撤換的。毫無疑義，這樣的組織完全能夠保證黨中央機關決議執行情形的監督並鞏固黨的紀律。

關於組織上的領導問題，就是如此。

我們在組織工作方面的任務是：

- (1) 今後也要設法使我們的組織工作能適應於黨政治路線底要求；
- (2) 把組織上的領導提到政治上的領導底水準；
- (3) 使組織上的領導能完全保證黨政治口號及其決議的實現。

*

*

*

同志們，我現在就要結束總結報告了。

從這個總結報告當中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現在，大家都承認我們的成功是偉大而非尋常的了。我國在一個較短的期間就轉上了工業化和集體化的軌道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了。這就使我們的工作人員發生一種自豪的意識，並鞏

固他們對於自身力量的信心。這當然是很好的。但成功有時也是有其陰暗面的。成功有時也是能產生某些危險的，如果讓這些危險滋長下去，那它們是能葬送全部事業的。例如，有這樣一種危險，就是我們有些同志也許會因有這些成功而頭腦昏眩起來。大家知道，我們是有過這種情形的。現在有這樣一種危險，就是我們某些同志也許會因有成功而神魂顛倒起來，誇功自滿，拿一些矜誇的論調來妄自安慰，說「我們現在可以徒步過海」，「我們能投帽壓敵」等等。這種危險不是絕對沒有可能的，同志們。這種情緒是再危險不過的，因為這種情緒能解除黨底武裝，能廢弛黨底隊伍。如果這種情緒竟在我們黨裏佔得優勢，那末我們所有一切成功就會概被葬送。當然，第一個五年計劃是順利完成了。這是對的。可是，我們的事業並不就此結束，而且也不能就此結束哩，同志們。第二個五年計劃還擺在我們面前，這個計劃也是必須完成，而且也是必須順利完成的。你們知道，計劃是在與困難作鬥爭中，是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完成的。這就是說將來還會有困難，於是也就要與這些困難作鬥爭。莫洛托夫同志和庫依貝舍夫同志將把第二個五年計劃報告給你們聽。你們從他們的兩人的報告中，就會知道，我們爲要實行這個宏偉計劃，還須克服何等巨大的困難。這就是說：決不要使黨高枕而臥，而要在黨內發展警覺性；不要使黨酣睡，而要把它保持在戰鬥戒備狀態中；不要解除黨底武裝，而要把它武裝起來；不要廢弛黨底隊伍，而要把它保持在動員狀態中，以便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

由此所應得出的第一個結論是：不要醉心於已有的成功，不要驕傲。我們所以達到了成功，是因為我們有黨底正確領導路線，並善於組織羣衆來實行這個路線。如

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我們當然是不能有現在我們達到了的，並理應引以自豪的成功。有正確路線而又善於加以實現的情形，是執政黨生活中極其罕見的情形。

請你們看看我們周圍各國吧：你們能找到許多有正確路線而又加以實現的執政黨麼？老實說，這樣的執政黨現時在世界上是沒有的，因為它們都是過着一種沒有前途的生活，都是在紊亂不堪的危機裏面掙扎，看不見什麼逃出絕境的道路。只有我們黨才知道正確動作的方向，並循着這個方向順利前進着。我們黨為什麼有這種優勢呢？就是因為它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是列寧主義的黨。就是因為它的工作是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為指南。毫無疑義，只要我們始終忠實於這個學說，只要我們始終把握着這個指南針，那我們今後在自己工作中也一定會有成功的。

有人說：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某些國家裏已被消滅了。有人說：它已被命名為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潮所消滅了。這當然是胡說八道。只有不知道歷史的人才能這樣說。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底科學表現。要消滅馬克思主義，就須消滅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是無法消滅的。自馬克思主義出現於舞台以來，迄今已有八十多年了。在這八十多年間，有幾十幾百個資產階級政府會企圖消滅馬克思主義。結果怎樣呢？資產階級政府是新陳代謝了，而馬克思主義仍然存在着（熱烈鼓掌）。況且，馬克思主義已在全球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獲得了完全勝利，而且恰巧是在人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完全消滅了的那個國家裏面獲得了勝利。（熱烈鼓掌）。不是偶然的，現在世界上只有馬克思主義已在那裏獲得了完全勝利的國家，才是不知危機和失業為何物的國家，而在其他一切國家，包括法西斯國家在內，經濟危機和失業浩劫迄今已繼續彌漫了四年之久。不，

同志們，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呵！（鼓掌多時）。

是的，同志們，我們所以獲得了種種成功，是因為我們是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旗幟下面工作和鬥爭了的。

由此所應得出的第二個結論是：要始終忠實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底偉大旗幟。（鼓掌）。

蘇聯工人階級所以強大有力，不僅是因為它有其受過戰鬥考驗的列寧黨。其次，蘇聯工人階級所以強大有力，還因為世界無產階級都援助和幫助它。蘇聯工人階級是世界無產階級底一部分，是世界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而我們的共和國就是世界無產階級底產兒。毫無疑義，如果蘇聯工人階級沒有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底擁護，那它就會不能保持自己手裏的政權，就會不能保障有社會主義建設條件，於是它也就會不能獲得現有的成功了。蘇聯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間的國際聯繫，蘇聯工人與世界各國工人間的兄弟聯盟，這便是蘇維埃共和國所具力量和威勢的基石之一。西方工人說，蘇聯工人階級是世界無產階級底突擊隊。這是很好的。這就是說，世界無產階級今後也是決意竭力設法來援助蘇聯工人階級的。但因此我們就坦負有嚴重的義務。這就是說，我們應該努力工作，證明我們不辜負全世界無產階級突擊隊這一光榮稱號。於是我們就應該更加好好工作，更加好好奮鬥，使社會主義在我國最終勝利，使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國勝利。

由此所應得出的第三個結論是：要始終忠實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事業，忠實於世界各國無產者底兄弟聯盟事業。（鼓掌）。

結論就是如此。

不可戰勝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偉大旗幟萬歲！

(全場熱烈鼓掌多時。全體代表向斯大林同志歡呼致敬。唱國際歌。唱完國際歌後，又加緊歡呼。高呼：「斯大林萬歲！」，「斯大林萬歲，烏拉！」，「黨中央萬歲！」)。

幾句代替結論的話

同志們！代表大會上的討論表明了，我們的黨的領導者們底觀點，可以說在黨政策所有一切問題上的觀點，都是完全一致。你們知道，對於工作總結報告是沒有提出過任何異議的。於是就表明了，我們黨隊伍無論在思想政治方面或組織方面都是異常團結一致。(鼓掌)。既然這樣，試問還有做結論的必要麼？我認為是沒有必要的。所以，就請你們恕我不做結論吧。

(熱烈歡呼，全場起立，高呼「烏拉！」；共同高呼「斯大林萬歲！」，全體起立，唱國際歌。唱完國際歌後，又齊聲歡呼。高呼「烏拉！」，「斯大林萬歲！」，「中央萬歲！」)。

在克列姆里宮舉行的紅軍 學院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

同志們！不可否認：我們近來無論在建設方面或在管理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成功。於是在我們這裏關於領導者底功績，關於領袖們底功績，就未免講得太多了。人們把所有一切，幾乎把我們所有一切成績都歸功於領袖們。這當然是不對的，不正確的。問題不僅在於領袖們。但我今天所想說的，不是這一點。我想簡略說到的，是幹部問題，我們的一般幹部，尤其是我們的紅軍幹部問題。

大家知道，我們從舊時代方面所得到的遺產，是一個技術落後的國家，幾乎是赤貧的，破產的國家。它是既被四年帝國主義戰爭所破壞了，又被三年國內戰爭所破壞了的，其中居民很少識字，技術落後，工業好像個別孤島一樣沉沒在無數極小農莊這一汪洋大海中，——這就是舊時代所遺傳給我們的國家。當時的任務是要把這個國家由中世紀的黑暗無知的軌道上，轉移到現代工業和機器化農業的軌道上去。可見，任務是很嚴重，很困難的。當時的問題是這樣擺着：或者是在最短

期間就把這個任務解決成功，於是在我國把社會主義鞏固起來，或者是我們解決不了這個任務，那時我們這個技術薄弱，文化落後的國家就會喪失獨立的地位，而變成爲帝國主義列強的玩具。

我國當時是處在技術十分缺乏的時期，沒有充分機器來供給工業，沒有機器來供給運輸業，沒有國家工業改造事業所絕對必需的，那種最低限度的技術基礎，而只有一些創立這種基礎的前提。當時須創立頭等重工業，必須使這個重工業在技術上不僅能夠改造工業，而且能夠改造農業，而且能夠改造我國鐵路運輸業。因此也就必須甘願忍受犧牲，在各方面實行極端節省，節省飲食，節省教育經費，節省布疋，以求積累創立工業所必要的資金。我們當時沒有其他什麼辦法可以消滅十分缺乏技術的現象。列寧就是這樣教導我們，而我們也就是這樣跟着列寧底脚步行進了的。

當然，在這樣巨大艱難的事業中，決不能期待獲得接連不斷，迅速表現出來的成功。在這種事業中，只有經過幾年以後，才會有成功表現出來。因此必須用堅強的精神，用布爾什維主義的堅定性，用堅忍不拔的意志把自己武裝起來，以求克服初次挫折，而勇往直前地向着偉大目的前進，不許在自己隊伍內有什麼動搖和猶疑。

大家知道，我們正是這樣進行了這件事業的。可是，堅強精神，忍耐性和堅定性，並不是我們所有一切同志都充分具備的。當時在我們的同志中間有些人一遇見初次困難，就叫人退却。常言道：「既往不咎」。這當然是對的。可是，人總有記性，所以我們在總結我們工作的時候，也就會於無意中想起過去的事情來。（全場歡動）。是的，我們當時有一些同志是害怕困難並叫黨退却的。

他們說「你們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機器，鋼鐵，拖拉機，康拜因機和汽車，對我們有什麼用處呢？倒不如多給我們一些布疋，多買一些原料來生產日用品，多給居民們一切點綴日常生活的零件細物吧。要在我國落後情形下創立工業，何況是創造頭等工業，那就是危險的幻想」。

當然，我們當時也許是能不把我們用嚴格節省方法獲得的三十萬萬金盧布拿去創立國家工業，而用去輸入原料並增加日用品的生產。這也是一種「計劃」。可是，如果我們採用了這種「計劃」，那我們就會沒有什麼冶金業，機器製造業，拖拉機和汽車，飛機和坦克了。那我們在外來敵人面前就會成為手無寸鐵的人了。那我們就會破壞了我國社會主義底基礎了。那我們就會成為國內國外資產階級底俘虜了。

顯然，當時必須在兩個計劃中間選定一個：一個是退却計劃，是要使社會主義遭受失敗，而且不能不使社會主義遭受失敗的計劃；另一個是進攻計劃，是要使社會主義獲得勝利，而且——你們知道——真正已使社會主義在我國獲得了勝利的計劃。

我們也就選定了進攻計劃，循着列寧道路前進，而拋開那些鼠目寸光，根本不願看見我國最近將來，不願看見我國社會主義將來的同志。

可是，這些同志並不是始終都只限於批評和消極抵抗。他們以在黨內舉行暴動反對中央來威脅過我們。而且，他們還用槍彈威脅過我們某些人。他們大概是指望嚇倒我們，並迫使我們離開列寧道路。但他們顯然是忘記了，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具着特殊氣概的人。他們忘記了，布爾什維克是既不怕困難，也不怕威脅的。他們忘記了，把我們鍛鍊成鋼的，是在鬥爭中不知恐懼為何物，根

本不承認恐懼二字的偉大列寧，即我們的領袖，我們的導師，我們的父親。他們忘記了，敵人愈是發瘋，黨內敵對份子愈是神經錯亂，那末布爾什維克也就會愈加堅強奮發地進行新的鬥爭，愈加猛烈地向前邁進。

當然，我們根本沒有打算離開列寧道路。而且，我們在這條道路上穩立了起來的時候，便更加猛烈地向前行進了，掃除了前進途中所有一切障礙物。固然，我們在向前行進時不得不沿途打翻這些同志中間的某些人。可是有什麼別的辦法呢。我應當承認，我對於這件事情也是出了一臂之力的。（熱烈鼓掌，高呼「烏啦」）。

是的，同志們，我們真正是自信地猛烈地沿着使我國工業化和集體化道路走了的。現在這條道路可算是已經走過的了。

現在大家都承認我們在這條道路上已達到偉大的成功了。現在大家都承認我們已經有了強大的頭等的工業，強大的機械化的農業，日益開展的蒸蒸直上的運輸業，組織精密和武裝優良的紅軍了。

這就是說，我們在基本上已渡過了十分缺乏技術的時期。

可是，渡過了十分缺乏技術的時期以後，我們就走進了新的時期，走進了可說是十分缺乏人材，十分缺乏幹部，十分缺乏善於駕馭技術並推動技術前進的工作者的時期。問題是在於我們有工廠，有集體農莊，有蘇維埃農莊，有運輸業，有軍隊，我們有技術來供給這全部事業，可是我們實缺乏一些具有充分必要經驗來最高限度利用這種技術的人材。從前我們是說：「技術決定一切」。這

個口號幫助我們消滅了十分缺乏技術的現象，並在一切工作部門裏創立了極廣大的技術基礎，以便用頭等技術來武裝我們的人材。這是很好的。但這還千萬不夠。爲要使技術動作起來並把它利用到底，就需要有精通技術的人材，就需要有善於學會利用和巧於運用這種技術的幹部。技術沒有精通技術的人材，便是死的東西。技術有精通技術的人材來使用，便能夠而且應當顯出奇蹟來。如果在我們的頭等工廠裏，在我們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裏，在我們的運輸業裏，在我們的紅軍裏，有充分數量能夠駕馭這種技術的幹部，那末我們國家所得到的效果，就會比它現時所有的還要多三四倍了。正因為如此，所以現在應當特別注重人材，特別注重幹部，特別注重精通技術的工作者。正因為如此，所以舊口號，即「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反映着已經過去時期的口號，反映着我們十分缺乏技術時期的口號，現在應當由新口號，即「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來代替。現時的主要點，就在這裏。

可以說我們的人完全瞭解和認識了這個新口號底偉大意義麼？我認爲是不可這樣說的。否則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便不會有人時常用一種豈有此理的態度去對待人材，去對待幹部，去對待工作者了。「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要求我們各領導人員對於我們的工作者，對於無論在那一方面做工作的「大」「小」工作者，都表現出最關切的態度，很懇懇地培植他們，當他們需要扶助時就予以幫助，當他們作出初次成績時，就予以獎勵，提拔他們上進等等。而我們在實際上却往往看見那種用官僚主義的刻薄態度，用一種簡直豈有此理的態度對待工作者的事實。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往往也就不去考察人材，不把他們考察以後才任用他們，而是往往把他們東拋西擲，如同拋擲棋盤上

的小卒一樣。重視機器，呈報在我們工廠裏有多少技術品，這算是已經學會了。可是，我從未聽見有人用同樣熱情來呈報說我們在某個時期內培植了多少人材，我們怎樣幫助了工作者在工作中長進和鍛鍊起來。這是由於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學會重視人材，重視工作者，重視幹部。

說到這裏，我回想起了我被流放在西伯利亞時所碰見的一件故事。這是在春天漲水時發生的。當時有三十個人跑到河裏撈取波濤洶湧的大水所沖下來的木料。到黃昏的時候，他們回到村莊來了，可是缺少了一個同伴。當我問第三十個人在那裏時，他們就冷淡地回答道：「第三十個人」留在那裏了」。我問：「怎麼會留在那裏呢？」。他們又同樣冷淡地回答說：「那還要問什麼，當然是淹死了」。當時在他們中間就有一個人忙著要走，說是「要去給母馬灌水喝了」。當時我責備他們，說他們憐惜人還不如憐惜牲畜，於是他們中間便有一個人其餘同伴贊同下回答道：「我們為什麼要憐惜人呢？人是我們隨時都可做出來的。而母馬呢？你試一試做出一匹母馬來吧」。（全場顯見活躍）。你們看，這就是一個也許不大重要，但很標本的例子。我覺得，我們有些領導者對於人材，對於幹部所採取的冷淡態度以及不會重視人材的習氣，正是上面那個遙遠西伯利亞故事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奇異的對人態度遺留下來的餘毒。

所以，同志們，我們如果想要順利地消滅十分缺乏人材的現象，並使我國得到充分數量能夠推進技術和運用技術的幹部，首先就應當學會重視人材，重視幹部，重視每一個有益於我們共同事業的工作者。畢竟應該瞭解：人材，幹部是世界上所有一切寶貴資本中最寶貴，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應該瞭解，在我們現時的條件下，「幹部決定一切」。如果我們在工業，農業，運輸業和軍

隊中將有人數衆多的優良幹部，那我們的國家就會是不可戰勝的。如果我們不會有這種幹部，那我們就會寸步難移。

我就說到這裏爲止。讓我舉杯敬祝我紅軍學院畢業生康健和進步！我希望他們在組織和領導我國國防事業中一切都順利！

同志們！你們已在最高學府畢了業，並在那裏受到了初步的鍛鍊。可是，學校還只是一個預備階段。幹部底真正鍛鍊，是要在活的工作中，在學校以外，在和困難作鬥爭中，在克服困難的過程取得的。同志們，請記着吧：只有那些不害怕困難，不躲避困難，反而前去迎接困難，以求克服和消滅困難的幹部，才是優良的幹部。真正的幹部，只能在和困難作鬥爭中鍛鍊出來。如果我們的軍隊有充分數量真正受過鍛鍊的幹部，那它就會成爲不可戰勝的軍隊。

同志們，我敬祝你們康健！（全場熱烈鼓掌。全體起立，高呼「烏啦」，向斯大林同志表示致敬）。

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

同志們！關於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在這裏，在這次會議上，有人已經說得很多，而且說得很好，因此我實在沒有多少話可說了。可是，既然你們已把我叫到講台上來，我就得說幾句話。

決不可把斯達漢諾夫運動看作一個普通的男女工人運動。斯達漢諾夫運動是定會成爲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史上最光榮篇幅之一的男女工人運動。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何在呢？

首先就在於它是社會主義競賽底新高漲，是社會主義競賽底新的更高的階段。爲什麼是新的階段呢，爲什麼是更高的階段呢？因爲斯達漢諾夫運動這一社會主義競賽形式，是優越於社會主義競賽底舊階段的。在過去，在三年以前，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競賽第一個階段時期中，社會主義競賽

並不一定要與新技術相聯繫的。而且，我們當時本來也就幾乎沒有什麼新技術。反之，社會主義競賽現今階段，即斯達漢諾夫運動，却一定要與新技術相聯繫。沒有新的更高的技術，就不會有斯達漢諾夫運動。在座的這些人，像斯達漢諾夫，布寧根，斯美坦寧，克里沃諾斯，普羅寧，兩位維諾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是些新的人材，都是些完全精通了本行工作技術，駕馭並鞭策着這種技術前進的男工和女工。三年以前，我們沒有這樣的人材，或者是幾乎沒有這樣的人材。這些是些新的特別的人材。

其次。斯達漢諾夫運動這一男女工人運動底目的，是要打破現今的技術定額，打破現行的生產標準，打破現行的生產計劃和對照表。其所以要打破，是因為所有這些定額，對於現今時期，對於我們新人材，已經是陳舊的了。這個運動打破了對於技術的舊觀點，打破了舊的技術定額，舊的生產標準和舊的生產計劃，而要求規定新的更高的技術定額，新的更高的生產標準，新的更高的生產計劃。它負有在我國工業裏實行一個革命的使命。正因為如此，所以斯達漢諾夫運動在基本上是具有深刻革命性的運動。

這裏有人已經說過，斯達漢諾夫運動是新的更高的技術定額底表現，它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造成，而非資本主義所能達到的那種高度勞動生產率底模範。這是完全正確的。為什麼資本主義打破了克服了封建制度呢？就是因為它創立了比封建制度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它使社會有可能得到比在封建制度下更多得無比的產品。就是因為它使社會更加富足了。為什麼社會主義能夠，應當而且一定會戰勝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呢？就是因為它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能作出更高的勞動模範，更高的勞

動生產率。就是因為它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能給予社會更多的產品，能使社會更加富足起來。

有些人以為社會主義可能在貧苦生活基礎上，用稍許展平各人物質狀況的方法鞏固起來。這種想法是不對的。這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觀。其實，社會主義只有在很高的勞動生產率基礎上，只有在比資本主義制度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基礎上，只有在生產品和各種消費品十分豐富的基礎上，只有在社會全體組成員都過着豐裕文化生活的基礎上，才能獲得勝利。可是，爲要達到社會主義這個目的，並把我們蘇維埃社會變成最豐裕的社會，就必須使我國有超過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勞動生產率。不然，就絕對不會有十分豐富的生產品和各種消費品。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就在於它這一運動能打破不充分的舊時技術定額，並且往往超過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底勞動生產率，這樣就造成了在我國更加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把我國變成最豐裕國家的實際條件。

可是，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還不止於此。它的意義還在於它準備好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

社會主義底原則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各個人在工作時是各盡所能，但在領取消費品時，還不是各取所需，而是以各人爲社會所作的工作爲標準。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底文化技術水準還不很高，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依然存在，勞動生產率還沒有達到能保證消費品豐富的高度，於是社會也就只得不按社會各個成員底需要，而是按他們爲社會所作的工作來分配消費品。

共產主義是更高的發展階段。共產主義底原則是：在共產主義社會裏，各個人在工作時是各盡所能，在領取消費品時已不是按各人所作的工作，而是以各個文化程度很高的人所有的需要爲標

準。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底文化技術水準已達到了足以打破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對立性基礎的高度，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已經消滅了，而勞動生產率已經增加到可以保證消費品完全豐富的高度，於是社會也就有可能按各個成員底需要來分配這些消費品了。

有些人以為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這一目的，可能在智力勞動者、工程師和技師文化技術水準降低到中等熟練工人水準的基礎上，用稍許把智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文化技術水準展平一下的方法來達到。這種想法是完全不對的。只有那些小資產階級的空談家，才能這樣來想像共產主義。其實，只有在工人階級文化技術水準提高到工程師技師水準的基礎上，才可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如果以為沒有提高到這個水準的可能，那就是可笑的想法了。這在蘇維埃制度下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裏全國的生產力擺脫了資本主義底枷鎖，勞動擺脫了剝削制度的壓迫，工人階級掌握着政權，工人階級底青年有受到完備技術教育的一切機會。毫無疑義，一定要把工人階級文化技術水準提到這樣的高度，才可打破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對立性底基礎；也只有這樣，才可保證必要的高度勞動生產率與十分豐富的消費品，以便開始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從這方面看來，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就在於它恰巧是包含有我國工人階級這種文化技術水準高漲底萌芽，雖然還嫌幼弱，但畢竟是已經有了的萌芽。

例如，請你們仔細看看這些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同志吧。這是些什麼人呢？他們大多數都是些年輕的或中年的男工和女工，是些有文化素養，有技術素養的人物，他們作出準確工作和着實工作的

模範；他們善於重視工作中的時間因素，他們學會了愛惜時間，不僅一分鐘，就是一秒鐘也不浪費的技能。在他們中間，大多數人都學過了所謂基本技術知識，而且還繼續充實着自己的技術知識。他們並沒有沾染某些工程師、技師以及經濟管理員所有的那種保守主義和頑固思想；他們很勇敢地前進着，打破陳舊的技術定額，創造新的更高的技術定額；他們對於我國工業領導者所製定的生產標準和經濟計劃提出修改，而且往往補充和糾正工程師和技師底意見，他們時常教導工程師和技師，並推動工程師和技師前進，因為他們是完全精通了本行工作技術，善於最高限度利用技術的人材。今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還不多，可是明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就一定會增至十倍，——這一點有誰能夠懷疑呢？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是我國工業裏的革新家，斯達漢諾夫運動是我國工業未來之花，它包含有工人階級將來文化技術高漲底種子，它為我們開闢了唯一的途徑，去達到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指標，即從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所必需的指標，為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所必需的指標，——這難道不是很明白麼？

同志們，這就是斯達漢諾夫運動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意義。

當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着手打破舊的技術定額時，他們是否想到了斯達漢諾夫運動底這種偉大意義呢？當然是沒有想到的。他們當時所關注的，只是想要消滅他們企業裏的虧空，並超過完成經濟計劃。但他們在力求達到這一目的時，却必須打破舊的技術定額，把勞動生產率發展到超過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程度。可是，如果以為這個情況能絲毫減少斯達漢諾夫運動底偉大歷史意義，那就是可笑的想法了。

關於一九〇五年第一次在我國組織了工人代表蘇維埃的那些工人，也可以這樣說。這些工人當然沒有料想到工人代表蘇維埃竟會成為社會主義制度底基礎。他們當時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只是爲了防禦沙皇政府底進攻，防禦資產階級底進攻。可是，這個情況絲毫也不與一件毫無疑義的事實相矛盾，就是由列寧、格拉工人和莫斯科工人在一九〇五年所開始的那個爭取工人代表蘇維埃的運動，歸根到底引起了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粉碎資本主義和達到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

(二)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根源

現時我們是站在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搖籃面前，是站在這運動底泉源面前。應當指出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某些特點。

最觸目的事實，就是這個運動是自行開始的，幾乎是自發開始的，由下層開始的，並沒有受到我們各企業管理處方面的任何督促。不僅如此。這個運動，在某種程度內是違反着我們各企業管理處底意志，甚至是在和他們作鬥爭中誕生和擴展起來的。莫洛托夫同志已經向你們敘述過，阿爾漢格爾斯克的鋸木工人毛斯斯基同志，竟不得不背着經濟機關底眼睛，背着工作監督員底眼睛，而暗地裏作出了新的更高的技術標準，足見他是換過了怎樣的折磨。斯達漢諾夫本人底遭遇也並不見得好些，因為他向前進展時不僅必須防禦過某些管理人員，並且必須防禦過某些因他「創新立異」而加以譏笑和攻擊的工人。至於布寧，那末大家知道，他是因爲自己「創新立異」而幾乎被

開除了工作，只是多謝分廠主任蘇科寧斯基同志出來干涉，才在廠裏留下了的。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各企業管理處對於斯達漢諾夫運動有過什麼動作，那末這種動作的目的就不是要幫助它，而是要阻難它。所以，斯達漢諾夫運動是從下層誕生出來，從下層擴展起來的運動。正因為它是自行誕生出來的，正因為它是從下層發生的，所以它是現代最有生命力而不可遏止的運動。

其次，還應講到斯達漢諾夫運動底另一個特點。這個特點就在於斯達漢諾夫運動並不是逐漸地，而是空前迅速地，好似狂風一樣散佈到我蘇聯全國各地的。事情是怎樣開始的呢？斯達漢諾夫把掘煤技術定額提高到五六倍，甚至更多。布塞根和斯美坦寧也作到了這一步，布塞根是在機器製造業方面，斯美坦寧是在皮鞋製造業方面。報紙把這些事實登載出來了。於是斯達漢諾夫運動底大火焰就立刻燃遍全國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為什麼斯達漢諾夫運動散佈得這樣迅速呢？也許是因為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是兩個巨大的組織家，在蘇聯各省各區都大有聯絡，而親自組織了這件事情的吧？當然不是！也許是因為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居心要做我國偉人，而親自把斯達漢諾夫運動底火星子散佈到全國各地去了的吧？同樣不是。你們在這裏已經看見了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他們在這次會議上發了言。他們是些謙恭樸實的人，並沒有什麼想出風頭，想做蘇聯全國偉人的野心。我甚至覺得，他們看見這個運動出乎他們意料以外而在我國這樣廣泛發展起來的時候，且表現出一些驚異的樣子。雖然這樣，而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兩人所點燃起來的火星子畢竟使這件事情發展成了大火焰，那就是說明，斯達漢諾夫運動是一件完全成熟的事情了。只有完全

成熟而有一觸即發之勢的運動，才能這樣迅速散佈起來，好似雪團一般長大起來。

爲什麼斯達漢諾夫運動竟是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呢？這個運動散佈得這樣迅速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根源怎樣呢？

這裏至少有四個原因。

(1) 成爲斯達漢諾夫運動基本原因的，首先就是工人物質狀況底根本改善。生活好些了，同志們。生活快樂些了。生活既然快樂，工作也就來得有勁。於是也就有高度的出產額。於是也就有勞動英雄，——男英雄，女英雄。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根源，首先就在這裏。如果在我國有危機，如果我國有使工人階級受苦極深的失業，如果我國人民生活得不好，不舒服，不快樂，那末我國是不會有什麼斯達漢諾夫運動的。(鼓掌)。在全世界上，只有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才不僅把自己的政治果實，而且把自己的物質果實顯示給人民看了。在過去一切工人革命中，只有一次工人革命勉強強取得過政權。這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並沒有存在過多久。固然，它也曾企圖打破資本主義的枷鎖，但是它沒有來得及把這種枷鎖打破，尤其是沒有來得及把革命底物質生活幸福的果實顯示給人民看。只有我國革命才不僅打破了資本主義的枷鎖，不僅給予了人民自由，而且給予了人民享受豐裕生活的物質條件。我國革命力量雄厚而不可戰勝的原因就在於此。趕走資本家，趕走地主，趕走沙皇衛隊，奪得政權，取得自由，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情。這是很好的。可是，單靠一個自由，可惜還是千萬不夠的哩。如果穀米不夠，油類不夠，布疋不夠，住宅不好，那末單靠一個自由是走不多遠的呀。單靠一個自由是很難生活的呵，同志們。(聽衆齊聲表示贊同，鼓掌)。爲要保證享受

優裕快樂生活的可能，那末除了政治自由幸福而外，還要造成物質幸福。我國革命底特點就在於它不僅給予了人民自由，而且給予了人民物質幸福，而且給予了人民享受豐裕文化生活的可能。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在我國已造成了快樂的生活，而斯達漢諾夫運動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生長起來的。

(2)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第二個泉源，就是我國已沒有剝削現象了。我國的人不是替剝削者做工，不是替不勞而獲者做工生財，而是爲自己做工，爲自己的階級做工，爲自己這個由工人階級優秀份子掌握政權的蘇維埃社會做工。正因爲如此，所以勞動在我國有着社會的意義，它是一件光榮體面的事情。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是私人個人性質的勞動。你做得多些麼，那就讓你多賺些錢去過你自己的生活吧。誰也不知道你，而且誰也不願意知道你。你是替資本家做工麼，你是替他們生財麼？又怎能不是這樣呢？人家僱傭你，也就是要你去替剝削者生財哩。你不願意這樣幹麼，那就請你滾到失業工人隊伍中去苟延殘喘吧，而我們是隨時都能僱得其他的更馴服的工人的。正因爲如此，所以在資本主義下，人底勞動是不受重視的。在這種條件下，當然不會有什麼斯達漢諾夫運動發生。可是，在我們蘇維埃制度條件下，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這裏，勞動者是備受尊敬的。在這裏，他並不是替剝削者做工，而是爲自己做工，爲自己的階級做工，爲社會做工。在這裏，勞動者不會覺得自己是個無人過問的人，零丁孤苦的人。恰巧相反，在我們這裏，勞動者覺得他是自己國家中的自由公民，是一種社會活動家。他好好做工，盡力効勞社會，就是一位勞動英雄，就會榮光遍體。顯然，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能有斯達漢諾夫運動誕生出來。

(3)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第三個泉源，就是在我國已經有了新技術。斯達漢諾夫運動是與新技術有密切聯系的。如果我國沒有新技術，沒有新工廠，沒有新設備，那末我國也就不會有斯達漢諾夫運動誕生出來。如果沒有新技術，那末至多也只能把技術定額提高到一兩倍。而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所以能把技術定額提高了五六倍，也就因為他們是完全全倚靠於新技術的。由此可見，我國工業化，我國工廠底改造，新技術和新設備底具備，乃是使斯達漢諾夫運動產生出來的原因之一。

(4) 可是，單靠新技術是走不多遠的。儘管你有頭等技術，頭等工廠，但如果你沒有一些能夠駕馭這技術的人材，那末你的這些技術也始終不過是一些技術而已。爲使新技術能夠發生效果，就一定還要有能夠指揮和推進這種技術的人材，男工女工的幹部。斯達漢諾夫運動底誕生和增長，也就是表明在我國男工女工中間已產生了這樣的幹部。約在兩年以前，黨已經說過：我們雖然建成了新工廠，雖然給予了我們各企業新設備，但我們畢竟還只做到一半事情。黨在當時已經說過：除了努力建設新工廠的熱忱而外，還要有努力學會運用這些新工廠的熱忱，只有這樣，才可把事情進行到底。顯然的，在這兩年以來是進行了學會利用這新技術的工作，同時新幹部人材也相繼產生出來了。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我們是已經有了這樣的新幹部了。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幹部，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新人材，那我們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麼斯達漢諾夫運動。所以，男工女工中間那些學會了利用新技術的新人材，乃是一個形成了和推進了斯達漢諾夫運動的因素。

這就是產生了和推進了斯達漢諾夫運動的種種條件。

(三) 新的人材和新的技術定額

我已經說過，斯達漢諾夫運動並不是逐漸發展起來，而是有如大水決堤一般，突然爆發式地發展起來的。顯然，這一個運動會須冲破某些堤防。有人妨礙過它，有人拘束過它，而這個斯達漢諾夫運動既經把精銳積蓄起來，就冲破這些堤防而汎溢於全國了。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究竟是誰妨礙過它呢？

妨礙過它的，就是舊技術定額以及站在這些定額背後的那些人。幾年以前，我國工程技術人員和經濟工作人員，根據我國男工女工當時的技術落後性規定了相當的技術定額。自從那個時候起，已經過去幾年了。在這幾年中間，人材已經長進了，已經獲得技術素養了。而技術定額却仍舊沒有改變。當然，這些定額對於我國新材已經是陳舊不堪了。現在大家都在責罵這些現行技術定額。可是，這些定額並不是從天空裏掉下來的。而且這裏問題並不在於當時把這些技術定額規定得太低。問題首先是在這些技術定額已經陳舊的時候，還有人企圖把它們當作現代的定額保留下去。人們拼命把我國男工女工底技術落後性當作根據，專門指靠於這種落後性，把這種落後性當作出發點，以至於拿起這種落後性來耍把戲了。可是，如果這種落後性已經成了過去，那又怎樣辦呢？難道我們應當崇拜我們的落後性，把它奉為偶像，奉為神聖麼？如果男工女工已經長進了，已經獲得了技術素養，那又怎麼辦呢？如果舊技術定額已經是不合實際情形，而我國男工女工已在事實上超過它們五倍以至十倍了，那又怎樣辦呢？難道我們賭過咒，發過誓，說一定要盡忠於我們的落後性

麼？同志們，我們彷彿沒有這樣幹過吧？（全場大笑）。難道我們會以指望我國男工女工永遠落後爲出發點麼？我們好像是沒會以此爲出發點吧？（全場大笑）。那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我們沒有充分勇氣打破我們某些工程師技師底保守主義觀點，打破舊傳統和舊定額，而給予工人階級新與人材廣闊活動的場所麼？

有些人那裏談論什麼科學。他們說：科學底原理，技術指南和技術規則底原理，是與斯達漢諾夫工作者要求新的更高技術定額的情形相矛盾的。可是，試問他們所說的究竟是那一種科學呢？科學底原理向來都是由實踐，由經驗來考驗的。如果科學和實踐斷絕了關係，和經驗斷絕了關係，那它還算是什麼科學呢？如果科學就是像我們某些保守主義同志所形容的那樣的一種東西，那它對於人類豈不是早已沒有什麼作用了麼。科學所以叫作科學，正是因爲它不承認偶像，不怕推翻過時舊物，却很仔細傾聽實踐經驗底呼聲。如果不然，那我們就會根本沒有什麼科學，譬如說，就會沒有什麼天文學，而直到如今都會信奉着那陳腐不堪的普托萊米地心說了；就會沒有什麼生物學，而直到如今都會迷信着上帝造人的神話了；就會沒有什麼化學，而直到如今都會相信着鍊金術士底預言了。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認爲，如果我們那些遠遠落到了斯達漢諾夫運動後面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經濟工作人員翻然悔悟，不再去繼續拘守舊技術定額，而是認真來改變態度，用科學精神，用新的斯達漢諾夫的精神來改變態度，那就會很好了。

也許有人會對我們說：好吧，那末怎樣一般處置技術定額呢？技術定額究竟是工業所需要的

呢，還是完全不要任何技術定額也可過得去呢？

有些人說：我們已不復需要任何技術定額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而且是很愚蠢的。沒有技術定額，便無法進行計劃經濟。除此而外，其所以需要技術定額，是爲了督促落後羣衆來趕上先進份子。技術定額是一種巨大的調節力量，它能在生產中把廣泛工人羣衆組織在工人階級先進份子周圍。所以，我們需要有技術定額，但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現行的定額，而是較高的定額。

另外有些人說：技術定額是需要的，可是現在就必須把它提高到斯達漢諾夫、布塞根、兩位維諾格拉多娃及其他等人所已經達到的高度。這也是不對的。這樣一種定額在目前這個時候是不實際的，因爲那些比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等人底技術素養低些的男工和女工，就會不能完成這一種定額。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技術定額，應當是一個介乎現行技術定額與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等人所達到的標準間的定額。例如就拿瑪利亞、德姆青科來說吧。大家知道，她是在糖蘿蔔種植業方面從每一海克脫面積上收穫五百公擔的突擊隊員。她達到了從每一海克脫面積上收穫五百公擔和五百公擔以上糖蘿蔔的成績。譬如說，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成績當作烏克蘭全部糖蘿蔔種植業底收成定額呢？當然是不可以的。此刻還談不到這一點。瑪利亞、德姆青科從一海克脫面積上收穫了五百公擔以及五百公擔以上的糖蘿蔔，而今年每一海克脫面積平均收成率，例如在烏克蘭，却只等於一百三十公擔到一百三十二公擔。可見，這裏的差別是不小的。可以把糖蘿蔔收成定額規定爲每一海克脫出產四百公擔或三百公擔麼？所有的內行人都說，此刻還不可這樣做。很明顯的，在烏克蘭方面，一九三六年的收成定額，必須規定爲每一海克脫出產二百至二百五十公擔。而這個定額是不怎樣小的，

因為我們完成這個定額，就能獲得比一九三五年多至兩倍的糖。工業也是如此。斯達漢諾夫大概已超過現行技術定額十倍，甚至於十倍以上。如果把他所達到的這種成績宣佈為全體汽鑽掘煤工人底新技術定額，那就不合理了。很明顯的，我們必須規定一個介乎現行技術定額和斯達漢諾夫同志所達到的標準間的定額。

但無論如何有一點總是很明顯的，就是現行技術定額已經不符實際情形了，這些定額已經落後而變成阻礙我國工業的東西了，所以為要不致阻礙我國工業，就必須用新的較高的技術定額來代替它們。既然有了新的人材，新的時期，也就應當有新的技術定額。

(四) 最近的任務

從發展斯達漢諾夫運動方面看來，我們最近的任務是什麼呢？我們為集中注意力起見，且把這件事歸納為兩個最近任務。

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幫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去繼續擴展斯達漢諾夫運動，使它擴大和深入到蘇聯全國各省各區去。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要把經濟工作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中間所有一切死守成規，不願前進，一味阻礙斯達漢諾夫運動擴展的份子約束一下。為要把斯達漢諾夫運動儘量推行到我國各地，單靠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本身，當然還是不夠的。還一定要我們各個黨組織參與這個事業，幫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把運動進行到底。頓涅茨省黨組織在這一方面表現了不容置辯

的巨大倡導作用。莫斯科省黨組織和列寧格拉省黨組織，在這一方面也工作得很好。其他各省的情形怎樣呢？其他各省大概是還在「準備動作」哩。例如，烏拉爾方面就好像是一點聲息也沒有，或者是很少聲息，同時大家都知道烏拉爾是一個很大的工業中心。在西西伯利亞和庫茲巴斯那裏也是如此，那裏的人大概也是還沒來得及「動作起來」哩。不過，我們各個黨組織無疑是一定會擔任起這件事情，並幫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克服各種難關的。至於另一方面的事情，即是把經濟工作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中間的頑固保守份子約束一下的事情，却就比較複雜一些了。這裏首先就會要實行勸導，用同志態度來耐心勸導工業方面的這些保守份子，使他們相信斯達漢諾夫運動底進步性，使他們相信有用斯達漢諾夫精神改變態度的必要。如果勸導方法不能奏效，那就會要採取更堅決的辦法。例如拿鐵路人民委員部來說吧。不久以前，在這個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裏，有一些教授、工程師以及其他專家，其中也有共產黨員，硬說每小時十三至十四公里的貨車駛行速率已是一種界限，超出這個界限，便是甘願違背「營業學」了。這是頗有威信的一部分人，他們在口頭上和刊物上鼓吹自己的觀點，並向鐵路人民委員部所屬各機關發出種種訓令，而且他們根本就是鐵路營業人員中間的「思想權威」。我們雖不是鐵路事業專家，但我們根據鐵路事業方面許多實際工作人員底建議，也奉勸過這些有威信的教授們說：十三至十四公里的速率，決不能當作一種界限；在工作組織得當時，是可以越出這個界限的。但他們不僅沒有來傾聽這種經驗和實踐底呼聲和改變態度，反而拚命反對鐵路事業方面的進步份子，更加緊宣傳那些保守主義觀點。當然，我們只好把這些受人尊敬的人物輕輕打擊了一下，並客客氣氣地請他們離開了鐵路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

(鼓掌)。結果怎樣呢？我們現有的貨車駛行速率已經是每小時十八至十九公里了。(鼓掌)。同志們，據我的意見，在我們國民經濟其他部門裏，如有絕對必要時，也須採取這種辦法，當然只有當那些頑固保守份子不停止其妨礙和阻撓斯達漢諾夫運動的行爲的時候才採取這種辦法。

第二個任務就是要幫助另外一種經濟工作人員、工程師和技師去改變他們的工作方法，使他們能領導斯達漢諾夫運動，這些人並不想阻撓斯達漢諾夫運動，他們是同情這個運動的，但他們還沒能改變他們的工作方法，還沒能領導這個運動。同志們，我應當說，這樣的經濟工作人員、工程師和技師在我國已是不少了。只要我們切實來幫助這些同志，那他們在我國是一定會更其增加起來的。

我認爲如果我們把這些任務切實執行，那末斯達漢諾夫運動就會盡量開展起來，而普及於我國各省各區中去，給我們顯示出新成功的奇蹟來。

(五) 兩句話

現在我關於這次會議，關於這次會議底意義，還要說幾句話。列寧教導說：只有不僅善於教導工農，而且還善於向工農學習的領導者，才能是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在布爾什維克中間竟有些人聽不慣列寧這幾句話。可是，歷史却向我們表明，列寧就在這一方面也是百分之百正確的。的確，千百萬勞動者，工人和農民，是在勞動着，生活着，奮鬥着。他們並不是白白生活着，他們

生活奮鬥時，當然也就積蓄着很豐富的實踐經驗，——這一點有誰能夠懷疑呢？忽視這種實踐經驗的領導者，決不能算作真正的領導者，——這一點難道可以懷疑麼？所以，我們，黨和政府底領導者，不僅應當教導工人，而且還應當向工人學習。我當然不否認，你們這些參加本次會議的人，在這裏，在本次會議上，是從我們政府領導者方面學得了一些東西。可是，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認，我們政府領導者，也從你們方面，從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方面，從參加本次會議的人方面學得了許多東西。因此，實在感謝你們諸位同志，感謝教益，非常感謝！（熱烈鼓掌）。

最後，關於應如何標榜本次會議以誌紀念的問題，我還有兩句話要說。我們在主席團這裏已經商量過了，大家認為必須給這次會議——政府領導者與斯達漢諾夫運動領導者的會議——留下某種紀念。結果，我們就決定要從你們中間，薦舉一百個至一百二十個人去榮膺最高獎章。

座中一齊喊道：對呀。（熱烈鼓掌）。

斯大林說：同志們，既然你們贊成，那我們就來實行這樣辦吧。

（參加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的人全體向斯大林同志熱烈歡呼致敬。雷一般的鼓掌聲和雄壯的「烏啦」聲震動全場。從全場四面八方發出慶祝全黨領袖斯大林同志的無數歡呼聲音。最後，三千個參加會議的人一致高唱無產階級的國際歌。）。

論蘇聯憲法草案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非常第八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當斯大林同志走上講台時，全場熱烈鼓掌歡迎多時。全場起立。到處高呼：「斯大林同志萬歲！」，「斯大林同志萬歲，烏拉！」，「偉大的斯大林萬歲！」，「偉大的天才斯大林同志萬歲！」，「萬歲！」，「紅色戰線！」，「斯大林同志光榮呵！」）

（一）憲法委員會之成立及其任務

同志們！

大家知道，提出憲法草案來供本次代表大會審核的憲法委員會，是根據第七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特別決議所成立的。這個決議是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通過，其原文如下：

「（1）按照以下方向來修改蘇聯憲法：

（甲）使選舉制更加民主化——用平等的選舉來代替不完全平等的選舉，用直接的選舉來代替多級的選舉，用不記名的選舉來代替記名的選舉；

（乙）確定憲法底社會經濟基礎——使憲法適合於蘇聯現時階級力量對比關係（新的社會主義工

業已建立成功，富農階級已被粉碎，集體農莊制度已經勝利，社會主義所有制已奠定為蘇維埃社會底基礎等等）。

(2) 委託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憲法委員會，根據第一項所定原則來擬定修正的憲法條文，然後提交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批准。

(3) 蘇聯蘇維埃政權機關下屆選舉，應根據新選舉制舉行。

這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的事。在通過這個決議案後的次日，即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就舉行第一次全會，並為執行第七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決議而成立了憲法委員會，由三十一個委員組成。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會委託憲法委員會擬定修正的蘇聯憲法草案。這就是憲法委員會所應根據來進行工作的正式理由，和蘇聯最高機關底指令。

於是，憲法委員會就應當估計到從一九二四年至現今在蘇聯生活中向社會主義方面發生的一切進展，來修改一九二四年通過的現行憲法。

(二)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

間在蘇聯生活中發生的變更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在蘇聯生活中究已發生什麼變更，而是憲法委員會必須在其憲法草案中加以反映的呢？

這些變更底實質何在呢？

我們在一九二四年間的情形怎樣呢？

這是新經濟政策第一個時期：當時，蘇維埃政權在儘量發展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曾容許資本主義有些許的活躍；當時，它是打算在兩個經濟體系——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競賽過程中造成社會主義體系高過於資本主義體系的比重。當時的任務是要在這一競賽過程中鞏固社會主義底陣地，消滅資本主義份子，完成社會主義體系，即國民經濟基本體系底勝利。

當時，我國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情形，是很不雅觀的。固然，它當時已在慢慢恢復起來，可是它的生產量還遠未達到戰前水準。它當時所依據的，是落後的不豐富的舊技術。當然，它當時是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了的。當時我國工業中的社會主義部份底比重，約佔百分之八十。可是，資本主義部份在工業中所佔比重，畢竟還不少於百分之二十。

當時，我國農業情形是更不雅觀的。固然，地主階級是已被消滅了，可是，農業資本家階級，即富農階級，還有頗大的力量。當時，整個說來，農業好像是由無數用中世紀落後技術經營的細小的團體農戶所形成的一片汪洋大海，而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則好像是這個大海中的一些零星細小的島嶼，老實說，它們當時在我們國民經濟中，還沒有什麼嚴重意義。當時，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尚屬薄弱，而富農則還有力量。我們當時還沒有說消滅富農，而只是說限制富農。

關於國內商品流轉，也要這樣說。當時在商品流轉方面，社會主義部份尚只約佔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而其餘地盤却尚被商人、投機者及其他私人佔據着。

我國經濟在一九二四年的情形，便是如此。

我們現時在一九三六年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如果說我們當時是處於新經濟政策第一個時期，新經濟政策開始時期，資本主義有些許活躍的時期，那末我們現在則是處於新經濟政策最後一個時期，新經濟政策終結時期，資本主義在國民經濟所有一切部門中都已完全被消滅的時期。

首先來看我國工業吧。我國工業在這個時期已經長成爲巨大的力量了。現在已經不可說它是力量薄弱和技術設備不好的工業了。恰巧相反，它現在所倚據的，是新的豐富的現代的技術，特別發展的重工業以及更發展的機器製造業。而最主要的，就是資本主義已從我國工業範圍中完全被驅逐出去了，社會主義的生產形式現時是在我國工業中獨佔統治的體系。我國現時社會主義工業按出產量說來已超過戰前工業至七倍以上的事實，是不可看作一件小事的。

在農業方面，我們現在所有的，已經不是由無數技術落後的細小個體農戶所形成的，由富農佔強的汪洋大海，而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機器化的，用新技術武裝起來的生產，即包括一切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體系。大家知道，在農業中，富農已被消滅了，而那倚據於中世紀落後技術的細小個體農民經濟部份僅佔很小的地位，它在農業播種面積方面所佔的比重，至多也不過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不可不指出一件事實，就是集體農莊現在已擁有三十一萬六千架拖拉機，共五百七十萬馬力，而與蘇維埃農莊一共計算起來，已有四十餘萬架拖拉機，共七百五十八萬馬力。

至於國內商品流轉，那末商人與投機者已被我們從這方面完全驅逐出去了。現在全部商品流

轉，都完全握在國家、合作社與集體農莊手中。新的蘇維埃的商業，沒有投機者參加的商業，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業，已經產生而且發展了。

這樣，社會主義體系在國民經濟所有一切部門中的完全勝利，現在已經是事實了。

而這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人剝削人的現象已被剷除和消滅了，而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已奠定爲我們蘇維埃社會不可動搖的基礎。（鼓掌多時）。

由於蘇聯國民經濟方面有這一切變更的結果，於是我們現在就有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這個經濟不知危機和失業爲何物，不知貧困和破產爲何物，而使公民們有一切可能享受豐裕文化的生活。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在我國經濟方面所發生的變更，大體上就是如此。

由於在蘇聯經濟方面發生了這些變更，於是我國社會底階級結構也與此適應而變更了。

大家知道，地主階級已因國內戰爭勝利結束的結果而早被完全消滅了。其他剝削階級，也遭到了與地主階級同樣的命運。在工業方面已沒有資本家階級了。在農業方面已沒有富農階級了。在商品流轉方面已沒有商人和投機者了。這樣，所有一切剝削階級都被消滅了。

剩下的有工人階級。

剩下的有農民階級。

剩下的有智識界。

可是，如果以爲這些社會集團在這時期中没有發生任何變更，比方說，如果以爲他們還是與在資本主義時期一樣，那就錯誤了。

例如拿蘇聯工人階級來說吧。人們往往照舊稱它爲無產階級。但什麼是無產階級呢？無產階級就是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屬於資本家，資產階級剝削着無產階級的那個經濟體系下被剝奪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階級。無產階級就是被資本家剝削的階級。而在我國，大家知道，資本家階級已被消滅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已從資本家手中奪來轉交給那以工人階級爲領導力量的國家了。於是，我國已沒有什麼能於剝削工人階級的資本家階級存在了。於是，我國工人階級不僅沒有被剝奪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反而是與全體人民一起佔有着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既然它佔有着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而資本家階級又已被消滅，於是任何剝削工人階級的可能都完全剷除了。既然如此，難道還可以把我國工人階級稱爲無產階級麼？當然是不可以的。馬克思說：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必須粉碎資本家階級，從資本家手中奪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並消滅那些產生無產階級的生產條件。可以說蘇聯工人階級已實現了解放自己的這些條件麼？絕對可以，而且應當這樣說。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蘇聯無產階級已變成了完全新的階級，變成了已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消滅，已把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奠定，並引導着蘇維埃社會按其產主義道路前進的蘇聯工人階級。由此可見，蘇聯工人階級是完全新的，擺脫了剝削制的工人階級，這樣的工人階級是人類史上未曾有過的。

現在我們來說農民問題。人們通常都說，農民是個小生產者階級，其中組成份子，好像一盤散沙，散佈在全國地面上，各人單獨在自己的小農莊上運用落後技術來勉強從事耕種，他們是私有制度的奴隸，是被地主、富農、商人、投機者、高利貸者等等放肆剝削的。的確，資本主義國家裏的

農民，就其基本羣衆來說，正是這樣的階級。可以說我國現代農民——蘇聯農民——羣衆是與這樣的農民相像麼？當然不可這樣說。這樣的農民在我國已經沒有了。我們蘇聯的農民是完全新的農民。在我國已沒有什麼能於剝削農民的地主和富農，商人和高利貸者存在了。於是，我國農民是已擺脫了剝削制的農民。其次，我們蘇聯的農民，絕大多數都是集體農莊的農民，就是說，他們的工作和財產不是建築在個體勞動和落後技術上，而是建築在集體勞動和現代技術上。最後，我國農民底經濟基礎不是私人所有制，而是在集體勞動基礎上長成的集體所有制。

由此可見，蘇聯農民是完全新的農民，這樣的農民是人類史上未曾有過的。

最後，我們就要說到智識界問題，工程技術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以及一般職員等問題。在過去這一時期中，我國智識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更。這已經不是那企圖把自己看作超階級的，實則大多數都是替地主資本家服務的舊的頑固的智識界了。我們蘇聯的智識界，是與工人階級和農民骨肉相聯的完全新的智識界。第一，智識界底成份變更了。在我們蘇聯的智識界中，由貴族和資產階級出身的份子，只佔很小的百分數。蘇聯智識界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是由工人階級、農民以及其他勞動階層出身的份子。最後，智識界底活動性質也變更了。從前，它應服務於富人階級，因為它當時沒有別的出路。現在，它却應服務於人民，因為剝削階級已不復存在了。正因為如此，所以它現在是蘇維埃社會中享有平等權利的一員，在這裏，它與工農携手建設着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新社會。由此可見，這是完全新的勞動的智識界，這樣的智識界是地球上任何其他國家內都找不到的。這就是過去這一時期在蘇維埃社會底階級結構方面所發生的變更。

這些變更是說明什麼呢？

第一，這些變更說明：工人階級與農民間以及這兩個階級與智識界間的界線，是在泯滅着，而舊時的階級特殊性也在消失下去。這就是說，這些社會集團間的距離日益縮減下去。

第二，這些變更說明：這些社會集團間的經濟矛盾是在降低着，是在泯滅下去。

最後，這些變更說明：這些社會集團間的政治矛盾也是在降低着，也是在泯滅下去。這就是蘇聯階級結構方面的變更。

關於蘇聯社會生活變更的情形，如果不說說還有一方面的變更，那是不完全的。我所指的是蘇聯境內民族相互關係的方面。大家知道，在蘇聯境內約有六十個民族、民族集團和小民族。蘇維埃國家是多民族的國家。因此，不言而喻的，關於蘇聯各民族人民相互關係的問題，對於我們不能不有第一等的意義。

大家知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於一九二二年在第一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它是根據蘇聯各民族人民平等自願原則組成的。一九二四年所通過的現行憲法，是蘇聯第一個憲法。那時，各民族人民間的關係還沒有應有的調整；對於大俄羅斯人的不信任心理底遺毒尚未消失；離心勢力還繼續發生作用。當時必須在這種條件下，在經濟政治軍事互助基礎上調整各民族人民底兄弟合作，把他們聯合為一個聯盟的多民族國家。蘇維埃政權不能不看見這件事業的困難。它看見了資產階級國家中建立多民族國家的失敗實驗。它看見了舊奧匈帝國破產的實驗，但它畢竟舉行了創立多民族國家的實驗，因為它知道，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產生的多民族國家，一定

能經受住所有一切考驗。

從那時起，已經有十四年了。這樣一個時期，已足夠來審查這一實驗了。結果怎樣呢？過去這一時期，毫無疑義地證明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建立多民族國家的實驗，是完全成功了的。這是列寧民族政策所達到的毫無疑義的勝利（鼓掌多時）。

爲什麼能有這一勝利呢？

因爲那個組織民族紛爭的主要勢力，即剝削階級，已被消滅；因爲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熾民族主義狂熱的剝削制已被消滅；因爲政權是由根本反對一切奴役制而忠實實現國際主義思想的工人階級執掌着；因爲各族人民在經濟社會生活所有各方面互助原則已經切實實現；最後，因爲蘇聯各族人民底民族文化，即形式爲民族的，而內容爲社會主義的文化，已有蓬勃的發展——因爲有這一切以及諸如此類的事實，所以蘇聯各族人民底面貌已經根本改變了，他們中間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經消失，而互相友愛的情感已經發展，並因此而造成了各族人民在一個統一聯盟國家體系中真正兄弟合作的關係。

結果，我們現在已有完全形成的，經住一切考驗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底堅固性，是世界上任何一洲的任何一個單民族國家都比不上的。（熱烈鼓掌）。

這就是過去這一時期在蘇聯民族相互關係方面所發生的變更。

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在蘇聯經濟生活和社會政治生活方面所發生的種種變更底總結。

(二) 憲法草案底基本特點

蘇聯生活中所發生的這一切變更，究竟在新憲法草案中得到了什麼反映呢？換句話說：提交本次代表大會來審核的憲法草案底基本特點怎樣呢？

憲法委員會曾受委託來修改一九二四年憲法底條文。由於憲法委員會工作的結果，就得出憲法底新條文，即蘇聯新憲法草案。憲法委員會在起草新憲法草案時所持的出發點，是認為憲法不應與綱領混淆起來。這就是說，綱領與憲法有重大的差別。綱領上所說的是尚不存在的東西，是應在將來達到爭得的東西；反之，憲法上所應說的却是已有的東西，是現在已達到已爭得的東西。綱領主要是說明將來，而憲法則是說明現在。

讓我們舉兩個例證來說吧。

我們蘇維埃社會已達到這一步，就是它在基本上已實現了社會主義，已創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又稱之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的制度。這就是說，我們在基本上已實現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鼓掌多時）。大家知道，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底基本原則就是「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一公式。我們的憲法是否應當反映這一事實，即社會主義已由我們爭得的事實呢？我們的憲法是否應當以社會主義已由我們爭得的這一事實為基礎呢？絕對是應當的。其所以應當，是因為社會主義在蘇聯是已達到已爭得的東西。

可是，蘇維埃社會還沒有實現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式為基本原則的共產主義最高階段，

雖然它是以在將來達到實現共產主義最高階段爲目的。我們的憲法是否能以現時尙不存在，尙應爭取的共產主義最高階段爲基礎呢？當然是不能這樣作的，因爲共產主義最高階段是蘇聯尙未實現，而應在將來實現的東西。它決不能這樣作，如果它不願意變成綱領或關於將來成功的宣言的話。

這就是我們的憲法在現今歷史時期的範圍。

這樣，新憲法草案是已走過的道路底總結，是已爭得的種種成功底總結。所以，它是把事實上已達到已爭得的種種成功登記起來，用立法手續固定起來。（熱烈鼓掌）。

這就是蘇聯新憲法草案底第一個特點。

其次。各資產階級國家底憲法，通常是以資本主義制度永古不移的信念爲出發點的。構成這些憲法主要基礎的是資本主義底原則，是資本主義底基本柱石：對於土地、森林、工廠以及其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人對人的剝削，以及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存在；社會兩個極端底對立，在一個極端上是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貧窮困苦，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則是不勞而獲的少數人奢侈揮霍；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各資本主義國家底憲法，就是倚據於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資本主義柱石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底憲法反映着這些柱石，用立法手續把這些柱石固定起來。

蘇聯新憲法草案與資本主義各國憲法相反，而以資本主義制度在蘇聯內已被消滅的事實，以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內已獲得勝利的事實爲出發點。構成蘇聯新憲法草案主要基礎的是社會主義底原則，是已爭得已實現的社會主義基本柱石：對於土地、森林、工廠以及其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剝削制和剝削階級的消滅；大多數人貧困和少數人奢侈揮霍現象的消滅；

失業現象的消滅；勞動是每個有工作能力公民按「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公式履行的義務和光榮職責。勞動權，即每個公民領得有保障工作之權；休息權；受教育權；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新憲法草案，就是倚據於這些以及與此類似的社會主義柱石的。它反映着這些柱石，用立法手續把這些柱石固定起來。

這就是新憲法草案第二個特點。

再其次，資產階級憲法是一致依據於下述的前提：社會是由彼此對抗階級，即佔有財富的階級和沒有財富的階級所組成；無論由那一個黨來執政，而對於社會的國家領導權（專政），總應當屬於資產階級；憲法所以需要，是爲了把對於有產階級愜意而有利的社會秩序固定起來。

蘇聯新憲法草案與資產階級憲法相反，而依據於下述的前提：在社會中已經沒有了彼此對抗的階級；社會是由兩個互相友愛階級，即工人和農民所組成；執掌政權的正是這兩個勞動階級；對於社會的國家領導權（專政）屬於工人階級，即社會先進的階級；憲法所以需要，是爲了把對於勞動羣衆愜意而有利的社會秩序固定起來。

這就是新憲法草案第三個特點。

再其次，資產階級憲法是一致依據於下述的前提：各個民族種族彼此不能平等；有享受完備權利的民族，也有一種無完備權利的民族；除此而外，還有第三種民族或種族，例如在殖民地方面，他們所有的權利要比那些無完備權利的民族更少。這就是說，所有這些憲法基本上是民族主義的憲法，即各統治民族底憲法。

蘇聯新憲法草案與資本主義各國憲法相反，而具有深刻的國際主義性質。它所持的出發點，是認為一切民族和種族都完全平等。它所持的出發點，是認為各個民族種族在膚色或語言，在文化水準或國家發展水準方面的區別，以及其他任何區別，都不能成為辯護民族不平等現象的根據。它所持的出發點，是認為一切民族和種族，不管它們過去和現在狀況如何，不管它們強弱怎樣，都應在社會所有一切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國家生活及文化生活方面，享有同等的權利。

這就是新憲法草案底第四個特點。

新憲法草案底第五個特點，就是它那一貫的徹底堅定的民主主義。從民主主義觀點看來，各資產階級憲法可分兩類：第一類憲法直接否認公民平權和民主自由，或在事實上把公民平權和民主自由化為烏有。另一類憲法樂意接受，甚至標榜民主主義原則，但同時又加上許多附帶條件與限制，而把民主權利與自由損傷無餘。他們說一切公民都有平等選舉權，但同時又用居住年限、教育程度以至於財產資格來加以限制。他們說公民有平等權利，但同時又加上附帶條件，把女子或一部分女子除外。還有其他諸如此類等等。

蘇聯新憲法草案底特點，就在於它完全沒有此類附帶條件和限制。它根本不知道有什麼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之分，而認為所有一切公民都是積極的。它不承認男性與女性，「久居者」與「暫居者」，有產者與無產者，受過教育者與未受過教育者有權利上的差別，而認為所有一切公民都有平等權利。決定每個公民在社會上的地位的不是財產狀況，不是民族出身，不是性別，不是職位，而是各人的能力和各人的勞動。

最後，新憲法草案還有一個特點。資產階級的憲法通常是以規定公民底形式權利爲限，而不注意實現這些權利的條件，實現這些權利的可能，實現這些權利的物質條件。他們暢談公民平等，可是他們忘記了，如果資本家與地主在社會上佔有財富和政治威權，而工人與農民却没有財富和政治威權，如果資本家和地主是剝削者，而工人和農民則是被剝削者，那末廠主與工人間，地主與農民間，就不能有真正的平等。又如：他們暢談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可是他們忘記了，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擁有適當的會場、良好的印廠、充分的印刷紙張等等，那末這些權利對於工人階級說就會變成空話。

新憲法草案底特點，就在於它不以規定公民底形式權利爲限，而注重於保障這些權利的問題，實現這些權利的物質條件問題。它不是簡單宣佈公民權利平等，而是還用立法手續把剝削制度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起來，把一切公民已擺脫任何剝削的事實固定起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它不是簡單宣佈勞動權，而是還用立法手續把在蘇維埃社會沒有危機的事實，把失業現象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起來，以保證勞動權。它不是簡單宣佈民主自由，而是還按立法手續，用一定物質條件來保證這些自由。因此，很明顯的，新憲法草案底民主主義，並不是一般「通常的」、「公認的」民主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

這就是蘇聯新憲法草案底各個基本特點。

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蘇聯經濟社會政治生活中所發生的種種進展與變更在新憲法草案上的反映。

(四) 資產階級對憲法草案的批評

現在要說說資產階級對憲法草案的批評。

外國資產階級報章怎樣對待憲法草案的問題，當然是有相當趣味的。外國報章既然反映各資產階級國家裏各種居民階層底輿論，所以我們不能不來說說這些報章反對憲法草案的批評。

外國報章對於我國憲法草案的最初反響，是表現於故意隱瞞，而不提及這個憲法草案。我在此地所指的，就是最反動的法西斯的報章。這一種批評家認為最好是簡單隱瞞，而不提及憲法草案，似乎天地間根本就未曾有過，根本就沒有這個憲法草案。也許有人說，隱瞞並不是批評。但這是不對的。作為特別藐視辦法的隱瞞手段，也是一種批評方式，固然是愚蠢可笑的，但畢竟是一種批評方式。（全場大笑，鼓掌）。可是，他們所採取的隱瞞手段，並沒有發生什麼效果。他們歸根到底，總不得不打開閤葫蘆，並通告世界說，真可痛心，蘇聯憲法草案終究存在，不僅存在而已，並且已開始對於人心發生有害的影響。不這樣做是不可能的，因為世界上總還有什麼輿論，總有讀者，總有活的人，這些人要知道事實的真相，而要長久橫蠻欺騙這些人，是沒有任何可能的。憑靠欺騙，是走不多遠的啊！

第二種批評家承認憲法草案確實存在於天地間，但他們認為這憲法草案並沒有多大趣味，因為它事實上不是憲法草案，而是一紙空文，是用來玩弄某種手腕和欺騙人們的一種空洞約言。他們同時還補充說：而且蘇聯也不能擬出較好的草案，因為蘇聯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而不過是一個

地理概念（全場大笑），既然蘇聯不是一個國家，那末它的憲法也就不能是真正的憲法。這種批評家底標本代表，就是——倒也奇怪——德國半官場雜誌德意志外交政治通信。該雜誌簡直說：蘇聯憲法草案是一種空洞約言，是一種欺騙，是「模將金的鄉村」。它毫不猶豫地宣稱：蘇聯不是一個國家，蘇聯「不過是一個確定的地理概念」（全場大笑），所以蘇聯憲法也就不能認為是真的憲法。

關於這種所謂批評家，可以說什麼話呢？

俄國偉大作家謝德林在他一篇傳奇小說中，描寫了一個剛愎自用，眼界十分狹小，生性十分魯鈍，可是極端自信和努力盡職的官僚。這個官僚在他所「管轄的」區域內殺了成千累萬的居民，燒燬了幾十座城市，建立了「秩序與治安」以後，眺望四周，忽然在天際雲邊看見了美國，這個國家雖然是不很著名，但那裏却有着誘惑人心的自由，但那裏却用別種方法來統治國家。這個官僚一看見了美國，就氣忿忿地說道：這是個什麼國家，它是從那裏來的，它有什麼理由存在呢？（全場大笑，鼓掌）。固然，它是在數世紀以前偶然被人打開的，可是難道不能又把它封閉起來，使它完全無聲無臭麼？（全場大笑）。他說罷這一番話以後，就批示道：「把美國封閉起來！」（全場大笑）。

我覺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信雜誌中的那些老爺們，是與謝德林小說中的官僚一模一樣的人物。（全場大笑，鼓掌表示贊同）。蘇聯早已成為這些老爺們底眼中釘了。蘇聯如燈塔一樣，已屹立了一十九年，它用解放精神薰染着全世界工人階級，使工人階級底敵人瘋狂發怒。而它，這個蘇聯，卻不僅是存在而已，並且日益增長；不僅增長而已，並且日益繁榮；不僅繁榮而已，並且編

製着新憲法草案，編製着這使各被壓迫階級精神奮發而發生新希望的草案。（鼓掌）。既然如此，德國半官場雜誌社中的老爺們又怎能不氣忿呢？他們大聲叫喊道：這是個什麼國家，它有什麼理由存在呢（全場大笑）。如果它是一九一七年十月打開的，那為什麼不可又把它封閉起來，使它完全無聲無臭呢？說罷這一番話以後，就批示道：把蘇聯封閉起來，並當衆宣佈說蘇聯不成其爲國家，說蘇聯不過是一個簡單的地理概念而已！（全場大笑）。

謝德林小說中的官僚，雖然十分愚鈍，可是他寫下又把美國封閉起來的批示時，總還表現出一點瞭解實情的能力，因爲他立刻就捫心自問道：「但也許這是不能由我作主的吧」。（歡笑聲爆發，掌聲雷動）。我可不知道，德國半官場雜誌社中的老爺們是否有充分智力，猜到他們在紙上當然能夠「封閉」這個或那個國家，可是如果認真講起來，那末「這是不能由他們作主的」：（歡笑聲爆發，掌聲雷動）。

至於說蘇聯憲法好像是一種空洞約言，好像是「撲將金的鄉村」等等，那我就援引一批已經確定不移而無待證明的事實。

在一九一七年，蘇聯各族人民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是事實，而不是約言。

其次，蘇維埃政權消滅了地主階級，並把從前屬於地主、官府和寺觀的一萬萬五千萬餘海克脫的土地轉交了農民，而那些原先屬於農民的土地尚不在其內。這是事實，而不是約言。

其次，蘇維埃政權剝奪了資本家階級，沒收了他們的銀行、工廠、鐵路以及其他的生產工具和

生產資料，把這些東西宣佈爲社會主義財產，並委任工人階級優秀人物來主持。這是事實，而不是約言。（鼓掌多時）。

其次，蘇維埃政權，既按社會主義的新原則，用新技術基礎來組織了工業和農業，於是就達到了這樣的成績：現在蘇聯農業出產量比戰前多至一倍半，工業出產量比戰前多至七倍，而國民收入則比戰前增至四倍。凡此種種都是事實，而不是約言。（鼓掌多時）。

其次，蘇維埃政權消滅了失業現象，實現了勞動權，休息權，受教育權，保證了工人農民和智識份子以良好的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使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能見諸實行。凡此種種都是事實，而不是約言。（鼓掌多時）。

最後，蘇聯製定了新憲法草案，這個草案不是約言，而是把這些盡人皆知的事實登記起來，用立法手續固定起來；把已達到已爭得的東西登記起來，用立法手續固定起來。

既然如此，試問德國半官場雜誌社中的老爺們妄說什麼「模將金的鄉村」的廢話，若不是爲着對人民隱瞞蘇聯真相，使人民誤入迷途，欺騙人民，又是爲着什麼呢。

事實就是如此。而事實却恰如俗話所說那樣，是頑強的東西。德國半官場雜誌社中的老爺們也許會說，他們是根本不顧事實的人。（全場大笑）。可是，那時就可以用一句俄國名言來回答他們：「法律不是爲着傻子寫的」。（全場歡笑，鼓掌多時）。

第三種批評家不嫌承認憲法草案具有相當的價值，他們認爲這個草案是一種好現象，但他們却很懷疑草案中有些條文未必能夠見諸實現，因爲他們確信這些條文根本無法實現，所以這些

條文應成爲紙上空文。這——如果說得客氣一點——就是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者是各國都有的。

老實說，我們並不是第一次遇到他們的。當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奪取政權時，懷疑論者會說：布爾什維克也許不是壞人，但掌握政權的事情，他們是辦不通的，他們一定會遭失敗的。但遭受了失敗的却不是布爾什維克，而是懷疑論者。

在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時期，這種懷疑論者曾說：蘇維埃政權當然是不壞的東西，但鄧尼金和高爾察克，又加上外國人，大概會戰勝這個政權的。但懷疑論者就在這一點上也失算了。

當蘇維埃政權公佈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懷疑論者又跑出台來說道：五年計劃當然是一件好事，但它未必可能實現吧；五年計劃，布爾什維克大概是辦不成功的。但事實又證明懷疑論者倒黜：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了。

關於新憲法草案以及懷疑論者對這一草案的批評，也要這樣說。草案一公佈出來，而這種批評家就重新跑出台來發表他們那一套悲觀的懷疑議論，說憲法中有些條文未必可能實現。毫無疑義，懷疑論者現在這一次，也會像他們過去屢次失敗那樣遭受失敗的。

第四種批評家在攻擊新憲法草案時，認爲這個草案是「向右轉」，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是「取消布爾什維克制度」。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道：「布爾什維克已經向右轉了，——這是事實」。在這方面特別賣力的，便是某些波蘭報紙以及一部分美國報紙。

關於這些所謂批評家，可以說些什麼話呢？

如果擴大工人階級專政基礎，使專政變成對社會實行國家領導的更靈活，亦即更強大的體系這

一事實，竟被他們解釋成爲不是加強工人階級專政，而是削弱這個專政，甚至是放棄這個專政，那就以問一問：這些老爺們一般是否知道什麼是工人階級專政呢？

如果用立法手續把社會主義勝利固定起來，用立法手續把工業化、集體化和民主化事業種種成功固定起來這一事實，在他們看來竟是「向右轉」，那就可以問一問：這些老爺們一般是否知道左右的區別呢？（全場大笑，鼓掌）。

毫無疑義，這些老爺們在批評憲法案案時是完全弄糊塗了；既然他們弄糊塗了，於是他們就把左右都弄錯了。

說到這裏，不可不記起戈果里所著小說死人口中的一個貴族家裏的女僕，片拉格姬「丫頭」。據戈果里所描寫，這個「丫頭」有一次自告奮勇來給齊切科夫底馬車夫謝里芳指示道路，但她因爲不會辨別道路的左右，於是就弄糊塗了，弄到委實不好意思。老實說，波蘭報館中的批評家雖然十分自負不凡，但他們却與死人口中的貴族家裏的女僕片拉格姬「丫頭」底瞭解程度相去不遠。（鼓掌）。你們記得，馬車夫謝里芳因片拉格姬弄不清左右，而認爲必須把她譴責一下，於是對她說：「哎，你這個驕腳丫頭……竟不知道那邊是右，那邊是左」。我覺得也應當把這些倒毒的批評家這樣譴責一下，對他們說：哎，你們這班所謂批評家……竟不知道那邊是右，那邊是左。（鼓掌多時）。最後，還有一種批評家。如果上面那種批評家責備憲法案案是放棄工人階級專政，那末這一種批評家却恰巧相反，責備憲法案案絲毫沒有改變蘇聯現狀，絲毫沒有觸犯工人階級專政，沒有容許政黨自由，反而完全保留着蘇聯共產黨現在的領導地位。同時，這一種批評家認爲在蘇聯

沒有政黨自由，就是一種違背民主主義原則的標誌。

我應當承認，新憲法草案確實保留着工人階級專政制度的效力，同樣也保留着蘇聯共產黨現在的領導地位而毫無變更。（熱烈鼓掌）。如果可敬的批評家認為這是憲法草案底缺點，那就只可對此表示惋惜。可是，我們布爾什維克却認為這是憲法草案底長處。（熱烈鼓掌）。

至於說到各種政黨存在的自由，那末在我們這裏却抱着與此有些不同的觀點。黨是本階級底一部分，是本階級底先進部分。幾個黨，也就是說政黨自由，只是在有利益相反而不可調和的對抗的階級的社會裏，比方說有資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農民，有富農和貧農等等的社會裏，才能存在。可是，在蘇聯已經沒有資本家、地主、富農等這一類的階級了。在蘇聯只有兩個階級，即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底利益不僅不彼此敵對，而是恰巧相反，是互相友愛的。所以，在蘇聯也就沒有幾個政黨存在的基礎，也就是說沒有這些政黨自由的基礎。在蘇聯只有一個黨，即共產黨存在的基礎。在蘇聯只有一個黨可以存在，這就是勇敢和徹底保護工農利益的共產黨。而它把這兩個階級底利益保護得不壞，是未必可以絲毫懷疑的。（熱烈鼓掌）。

人們說什麼民主。但什麼是民主呢？民主在有彼此對抗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歸根到底是供有勢力者享受的民主，是供有財產的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反之，民主在蘇聯却是供勞動者享受的民主，也就是說供一切人享受的民主。由此可見，違背民主主義原則的不是蘇聯新憲法草案，而是資產階級的憲法。正是因此，所以我認為蘇聯憲法是世界上唯一徹底民主的憲法。

資產階級對蘇聯新憲法草案的批評，就是如此。

(五) 對於憲法草案的修正和補充

現在，我們就來說公民們在全民討論憲法草案時所提出的對於憲法草案的修正和補充。

大家知道，在全民討論憲法草案時提出了頗多的修正和補充。所有這些修正和補充，都在蘇聯報章上公佈過了。因為這些修正所含內容既很不一律，而其價值又不一致，所以我認為應將其分為三類。

第一類修正底特點，就在於它們所說的並不是憲法問題，而是將來立法機關日常工作問題。關於保險事業的個別問題，關於集體農莊建設事業的某些問題，關於財政事宜的問題，——這就是此類修正所提到的問題。提出這些修正的人，大概沒有懂得憲法問題和日常立法問題的區別。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力圖盡量多滲進一些法律到憲法中去，簡直要把憲法變成一部法律大全。可是，憲法並不是法律大全。憲法是根本法，而且僅僅是根本法。憲法並不排除將來立法機關底日常立法工作，而是預定要有一種工作。憲法給予這種機關將來立法工作以法定的基礎。這類的修正和補充既與憲法沒有直接關係，所以我認為應當把它們交到我國將來的立法機關去。

應歸入第二類的修正和補充，是企圖在憲法內加進一些歷史備考成份，或者加進一些關於蘇維埃政權現時還沒有達到，而將來應當達到的成功的宣言成份。要在憲法內指出黨、工人階級以及一切勞動羣衆多年以來在爲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中克服了種種困難；要在憲法內說明蘇維埃運動底終極目的是建成完全共產主義社會，——這就是此類修正用各種說法所提到的問題。我認為此類修

正和補充既與憲法沒有直接關係，所以也應擱置一旁。憲法是把已經爭得，已有保障的勝利品登記起來，用立法手續固定起來。如果我們不願意曲解憲法這一基本性質，那我們就不應在憲法內填寫一些關於已往的歷史備考消息，或關於蘇聯勞動羣衆將來勝利品的宣言。對於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用其他方式和其他文件去說。

最後，應歸入第三類的是與憲法草案有直接關係的修正和補充。

此類修正中有一大部分都含着字句修改的性質。因此，此類修正可以交給本屆代表大會審編委員會，我想代表大會一定會成立這樣一個委員會，並委託它把新憲法全文最後審編一番。

至於第三類修正中其餘一部分，則因它們有較關實質的意義，所以我認為必須在這裏說說這些修正。

(1) 首先就要說到對憲法草案第一條的修正。這裏有四個修正。第一個修正是主張用「勞動者國家」字樣來代替「工農國家」字樣。另一個修正是主張把「工農國家」字樣改為「工農及勞動智識界底國家」。第三個修正是主張用「蘇聯境內所有一切種族和民族底國家」字樣來代替「工農國家」字樣。第四個修正是主張用「集體農莊莊員」或「社會主義農業勞動者」幾字來代替「農」字。

是否應當採納這些修正呢？我認為是不應當的。

憲法草案第一條所說明的是什麼呢？它是說明蘇維埃社會底階級成份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否可以在憲法內不說到我國社會底階級成份問題呢？當然不可以。大家知道，蘇維埃社會是由兩個階級，即工人和農民組成的。憲法草案第一條所說的正是這一點。所以，憲法草案第一條，也

就正確地反映着我國社會底階級成份。也許有人會問：而勞動智識界呢？要知道，智識界從來不是一個階級，而且也不能是一個階級，——它過去是，而且現在還是由社會裏各階級出身的份子組成的階層。在舊時，組成智識界的多半是由貴族和資產階級出身的份子，一部分是由農民出身的份子，而由工人出身的份子，則為數極少極少。而在我們蘇維埃時代，智識界主要是由工農出身的份子組成的。可是，不管它的成份如何，不管它的性質怎樣，但它畢竟是一個階層，而不是一個階級。

這種情形不會損傷勞動智識界底權利麼？一點也不會！憲法草案第一條所說的並不是蘇維埃社會各階層底權利，而是這社會底階級成份。蘇維埃社會各階層底權利，包括勞動智識界底權利在內，主要是在憲法草案第十一兩章內載明的。從這兩章內可以明白看出：工人、農民以及勞動智識界，在全國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及文化生活所有各方面，都享有完全的平權。所以，關於勞動智識界底權利會被損傷的話，是根本說不上的。

關於蘇聯境內各民族和各民族，也要這樣說。在憲法草案第二章內已經載明蘇聯是各平權民族底自由聯盟。是否應當在憲法草案上說明蘇維埃社會階級成份，而不是說明蘇維埃社會民族成份的第一條裏，重複這一公式呢？顯然是不應當的。至於蘇聯境內各民族和各种族底權利，則在憲法草案第二章、第十章及第十一章內都已載明了。從這幾章內可以明白看出：蘇聯各民族和各种族，在全國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及文化生活所有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利。所以，關於民族權利會被損傷的話，是根本說不上的。

同樣，用「集體農莊莊員」字樣，或用「社會主義農業勞動者」字樣來代替「農」字，也是不

正確的。第一，在農民中間，除集體農莊莊員而外，還有一百多萬非集體農莊莊員的農戶。怎樣處置他們呢？提出這個修正的人，是不是想把他們除開不算呢？如果這樣想，那就不合理了。第二，雖然大多數農民已在進行集體農莊經濟，但這還不是說他們已經不是農民了，他們已經不復有其個人經濟，個人園圃等等了。第三，如果照這一修正推論下去，那就必須用「社會主義工業勞動者」字樣來代替「工」字了；但不知為什麼提出這個修正的人竟沒有提議這樣作。最後，難道我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已經消失了麼？如果他們還沒有消失，那是否應當把它們倆者固有名稱從字典中一筆勾銷呢？提出這個修正的人，大概不是指現有社會而言，而是指將來社會，指將來已沒有階級，而工人和農民都已變成統一的共產主義社會裏的勞動者的社會而言。所以，他們顯然是跑到前面去了。可是，在製定憲法時，決不應從將來出發，而應從現在，從已有的事實出發。憲法不可以，而且不當跑到前面去。

(2) 其次，就是對於憲法草案第十七條的修正。這個修正，是主張把憲法草案上說各盟員共和國均保留有自由退出蘇聯之權的第十七條完全刪去。我認為這個修正是不正確的，因此是代表大會所不應採納的。蘇聯是各平權盟員共和國底自願聯盟。如果從憲法內把關於自由退出蘇聯之權一條刪去，那就是違背這聯盟底自願性質。我們可以同意這個步驟麼？我認為是不可以，而且不當同意這個步驟的。有人說：在蘇聯沒有一個共和國竟會願意退出蘇聯，所以第十七條沒有什麼實際意義。說在我們蘇聯沒有一個共和國竟會願意退出蘇聯，這當然是對的。可是絕對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不當在憲法上明文規定盟員共和國有自由退出蘇聯之權。同樣，在蘇聯也沒有那個盟

員共和國竟會願意壓迫另一個盟員共和國。可是絕對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應當從蘇聯憲法裏把關於盟員共和國權利平等一條刪去。

(3) 再其次，有人提議在憲法草案第二章內另外加上一條說：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其經濟和文化發展到相當水準時，即可改組爲盟員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個提議可以採納麼？我認爲是不可採納的。這個提議，不僅按其內容說來不正確，而且按其所持理由來說，也是不正確的。把自治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決不可以該共和國底經濟和文化成熟性爲理由；同樣，把某個共和國保留爲自治共和國，也不可以該共和國底經濟和文化落後性爲理由。如果以此爲理由，那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看法，不是列寧主義的看法了。例如韃靼共和國仍是自治共和國，而卡查赫共和國却要改爲盟員共和國，但這還不是說，從文化和經濟發展程度方面看來，卡查赫共和國高於韃靼共和國。實際情形恰巧相反。例如，關於窩爾加河流域日耳曼人自治共和國和基爾吉茲盟員共和國，也要這樣說，從文化和經濟方面來看，前者高於後者，但前者則仍爲自治共和國。

究竟要具備那些標誌時，才有根據把自治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呢？

這種標誌有三。

第一，一定要這共和國是個邊疆的，而不是四週皆爲蘇聯領土所包圍的共和國。爲什麼？因爲如果給盟員共和國保留着自由退出蘇聯之權，那就一定要這個已改爲盟員共和國的共和國有可能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提出退出蘇聯的問題。而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却只有那與某一外國相毗連，亦即不是四週皆爲蘇聯領土所包圍的共和國。當然，我們蘇聯沒有那一個共和國竟會在事實上

提出退出蘇聯的問題。可是，既然給盟員共和國保留着退出蘇聯的權利，就必須使這個權利不致變成一種毫無意思的紙上虛文。例如拿巴什基里亞共和國或捷裡共和國來說吧。假定這兩個自治共和國已改爲盟員共和國。試問，它們能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提出退出蘇聯的問題麼？當然不能。爲什麼呢？因爲它們四週都被蘇維埃共和國和蘇維埃省區所包圍着，所以實在說來，它們就是要想退出蘇聯，也是無處可退的。（全場大笑，鼓掌）。因此，如果把這些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那是不正確的。

第二，一定要這個民族在用它的名稱命名的那個蘇維埃共和國人口中是佔比較密集的多數。例如拿克里木自治共和國來說吧。它雖然是一個邊疆共和國，但克里木的韃靼人在該自治共和國內並不佔多數，而是佔少數。所以，如果把克里木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那是不正確的，不合邏輯的。

第三，一定要這個共和國按其人口數量說來不是一個很小的共和國，一定要它所有的人口至少是不在一百萬以下，而是在一百萬以上。爲什麼呢？因爲如果以爲人口極少而軍隊不大的一個小蘇維埃共和國能夠指望維持獨立的國家的生存，那就不正確了。毫無疑義，帝國主義猛獸們是一定會把它抓去吞食的。

我認爲：沒有具備上述三個客觀標誌而在現今歷史時期中提出關於把某個自治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的問題，是不正確的。

（4）再其次，有人提議，把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

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以及第二十九條內關於各盟員共和國屬下各邊區和各省行政區域劃分的詳細記載，一概刪去。我認為這個提議也是不可採納的。在蘇聯有些人非常樂意和孜孜不倦地隨便變更各邊區各省的界線，以致在工作中造成一種混亂而無把握的心理。憲法草案正是要給這些人一個限制。而這是很好的，因為在這方面，也如在其他許多方面一樣，我們要有很有把握的自信空氣，要有穩定性，明確性。

(5) 第五個修正是與第三十三條有關的。提出這個修正的人認為建立兩院制是不適當的，並提議取消民族蘇維埃。我認為這個修正也是不正確的。如果蘇聯是單民族的國家，那末一院制是會優於兩院制的。但蘇聯並不是單民族的國家。大家知道，蘇聯是多民族的國家。我們有一個不分民族而代表蘇聯一切勞動者共同利益的最高機關。這就是聯盟蘇維埃。可是，蘇聯各民族除了共同利益而外，還有與其民族特點關連的各自特有的特別的利益。可以忽視這些特別利益麼？當然是不可以的。是否需要一個恰巧反映這些特別利益的專門最高機關呢？絕對是需要的。沒有這樣一個機關，就會無法管理蘇聯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是毫無疑義的。這樣的機關就是第二院，即蘇聯民族蘇維埃。

有人援引歐美各國國會制度史中的事實，說兩院制在這些國家裏只是產生了許多壞處，第二院照例都變為反動勢力底中心，變為阻碍進步的障礙物。所有這一切都是對的。可是，這些現象所以發生，是因為這些國家裏的兩院彼此不平等。大家知道，第二院往往比第一院享有較多的權利，而且第二院照例是用非民主方法組織起來，往往是由上面指定其議員的方法組織起來的。毫無疑

義，如果使兩院彼此平等，使第二院也如第一院那樣按民主手續組織起來，就不會有這種壞處。

(6) 其次，有人對憲法草案提出補充，要求使兩院代表名額相等。我認爲這個提議是可以採納的。據我看來，這個提議能產生明顯的政治優點，因爲它更加着重指出兩院底平等。

(7) 再其次，有人對憲法草案提出補充，說民族蘇維埃代表，也應如聯盟蘇維埃代表一樣按直接選舉法來選舉。我認爲這個提議也是可以採納的。固然，它能使在選舉方面發生某些技術上的不便。可是，它能產生巨大的政治益處，因爲它一定會提高民族蘇維埃底威信。

(8) 又其次，是對於第四十條的補充，說應賦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以頒佈臨時法律的權利。我認爲這個補充是不正確的，是代表大會所不應採納的。不由某一個機關而由許多機關立法的情形究竟必須剷除才是。這種情形與法律穩定性原則相抵觸。而法律穩定性，却是我們現時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的。立法權在蘇聯只應當由一個機關，即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來行使。

(9) 再其次，是對於憲法草案第四十八條的補充，說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不應由蘇聯最高蘇維埃選出，而應由全國人民選出。我認爲這個補充是不正確的，因爲它與我國憲法底精神不合。依照我國憲法制度，在蘇聯不應有與最高蘇維埃同等由全國人民選出，而能與最高蘇維埃對立的個人總統。蘇聯的總統是集體的——這就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包括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在內，這個主席團不是由全國人民，而是由最高蘇維埃選出，並應向最高蘇維埃報告工作。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樣建設最高機關的辦法，是最民主的，是能夠保障國家免除不良變故的。

(10) 再其次，是對於同一條，即對於第四十八條的修正。這個修正底內容是主張將蘇聯最高

蘇維埃主席團副主席增至十一人，使每一盟員共和國都有一個副主席位置。我認為這個修正可以採納，因為它會改善我們的事業，而且只會鞏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底威信。

(11) 再其次，是對於第七十七條的修正。這個修正是要求組織新的全蘇聯人民委員會——國防工業人民委員會。我認為這個修正也應加以採納（鼓掌），因為把我國國防工業特別分出來，正式建立一個相當人民委員會來主持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我覺得這只會改善我國國防事業。

(12) 再其次，是對於憲法草案第一百二十四條的修正，要求按禁止舉行宗教儀式方向來修改該項憲法條文。我認為這個修正應被否決，因為它與我國憲法底精神不合。

(13) 最後，還有一個比較有關實質的修正。我所說的是對於憲法草案第一百三十五條的修正。其內容是主張褫奪僧侶，從前的白衛份子，以及所有一切從前的人物和不參加有益社會的勞動的人們底選舉權，或無論如何，應限制這種人底選舉權，只給他們選舉權，而不給他們被選舉權。我認為這種修正也應被否決。蘇維埃政權從前褫奪那些不勞動份子和剝削份子底選舉權，並不是一種永久的辦法，而是暫時的，到一定時期為止的辦法。從前有過一個時候，這些份子進行過反對人民的公開戰爭，反抗過蘇維埃的法律。關於褫奪他們選舉權的蘇維埃法律，原是蘇維埃政權對於他們這種反抗行動的回答。從那時起，已經過去不少的時間了。在過去這一時期中，我們已把剝削階級消滅，而蘇維埃政權則已變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了。難道還沒有到審改這種法律的時候麼？我認為是已經到了。有人說這有危險，因為那些敵視蘇維埃政權的份子，某些從前的白衛份子，從前的富農以及神父等等，會鑽進國家最高機關裏來。但這裏究竟有什麼可怕呢？你怕狼

麼，那你就不要到樹林裏去。（全場歡動，熱烈鼓掌）。第一，並非所有一切從前的富農、從前的白衛份子或神父都敵視蘇維埃政權。第二，如果人民在某些地方竟會選上敵視蘇維埃政權的份子，那就是證明我們的鼓動工作做得太壞，於是我們就理應受到這種恥辱；如果我們的鼓動工作真是按布爾什維克精神去進行，那末人民就決不會容許這些敵視蘇維埃政權的份子混進自己的最高機關裏來。這就是說，應當努力工作，而不應當叫苦（熱烈鼓掌），應當努力工作，而不應當等待用行政命令方式把一切都安排妥當。列寧還在一九一九年就已說過，蘇維埃政權在不遠的將來就會認為施行沒有任何限制的普選制是有益處的。請你們注意：沒有任何限制。他說這話的時候，外國武裝干涉還沒被消滅，而我國工業和農業還處在極壞狀態哩。從那時起，已經過去十七年了。同志們，難道還沒有到實行列寧這一指示的時候麼？我認為是已經到了。

請看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寫的俄共（布）黨綱草案中如何說過吧。請讓我讀一下：

「為避免從一時歷史需要中得出不正確的普遍結論起見，俄國共產黨應當向勞動羣衆解釋，在蘇維埃共和國內褫奪一部分公民選舉權的辦法，完全不像在大多數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內所常見的一樣，涉及某一種宣佈為終身褫奪公權的公民，而只是涉及剝削者，只是涉及那些不顧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基本法律，而進行頑強反抗，以謀維持自己剝削者地位，以謀保存資本主義關係的份子。因此，一方面，在蘇維埃共和國內，因社會主義日益鞏固，以及因那些在客觀上有可能維持其剝削者地位或保存資本主義關係的份子日益減少之故，被褫奪選舉權者的百分數自然會日益減少。現時在俄國，這個百分數未必多於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另一方

面，在很不遠的將來，因外國武裝干涉停止，以及剝奪剝削者的事業完成之故，在某種條件下會造成這樣一種局面，那時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將採取另外一種鎮壓剝削者反抗行動的方法，並實行沒有任何限制的普選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九四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六）蘇聯新憲法底意義

按繼續了幾及五月之久的全民討論結果來說，可以預料憲法草案定會被本次代表大會批准。

（熱烈鼓掌，轉為歡呼，全場起立。）

再經過幾天，蘇聯就會有以擴展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原則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新憲法了。

這將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它用簡單明瞭的語句，幾乎是用記錄的體裁，來說明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事實，來說明蘇聯勞動羣衆擺脫資本主義奴隸制度而得到了解放的事實，來說明擴展的最徹底的民主制在蘇聯勝利的事實。

這個文件證明，資本主義國家裏千百萬忠誠人們過去和現時還在渴望着的東西，已在蘇聯實現了。（熱烈鼓掌）。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這個文件證明，凡在蘇聯所已實現的東西，是在其他國家裏也完全可能實現的。（熱烈鼓掌）。

由此可見，蘇聯新憲法底國際意義是無限偉大的。

現在，當法西斯濁流污辱着工人階級底社會主義運動，污辱着文明世界優秀人士底民主主義趨向時，蘇聯新憲法將是一張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公訴書，說明社會主義與民主制度是不可戰勝的。（鼓掌）。蘇聯新憲法對於所有現今進行反法西斯野蠻暴行的鬥爭的人士，將是一種精神上的幫助和實際的助力。（熱烈鼓掌）。

蘇聯新憲法對於蘇聯各民族人民有着更大的意義。如果說蘇聯新憲法對於資本主義各國人民是行動的綱領，那末它對於蘇聯各民族人民，便是他們奮鬥的總結，是他們在爲人類解放而奮鬥的戰線上勝利的總結。由於已經走過的鬥爭道路和忍受艱辛的結果，現在得到這一個說明我們勝利果實的憲法，該是如何歡欣快樂呵。知道我們的人究竟爲着什麼而作了堅忍的奮鬥，以及他們怎樣獲得了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該是如何歡欣快樂呵。知道我們的人所流的許多血原來沒有白流，而是產生了應有的結果，該是如何歡欣快樂呵。（鼓掌多時）。這就會在精神上武裝我國工人階級，我國農民，我國勞動智識界。這就會推動他們向前邁進，並提高其正當的自豪心。這就會鞏固他們對自己力量的信心，並動員他們去進行新鬥爭，以爭取共產主義底新勝利。（熱烈鼓掌歡呼。全場起立。「烏啦」之聲如雷。一致高呼「斯大林同志萬歲！」。全體代表起立，唱國際歌。唱完國際歌後，又鼓掌歡呼。高喊：「烏啦！」。「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同志萬歲！」）。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一九三八年九月作——

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列主義黨底世界觀。其所以叫作辯證唯物主義，是因為它對自然界現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現象的方法，它認識這些現象的方法，是辯證的，而它對自然界現象的解釋，它對自然界現象的瞭解，它的理論，是唯物主義的。

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應用於社會生活現象，應用於研究社會，應用於研究社會歷史。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說明他們的辯證法時，通常都援引黑格爾，認為他是表述了辯證法基本特徵的哲學家。但這並不是說，馬克思與恩格斯底辯證法和黑格爾底辯證法是一個東西。其實，馬克思與恩格斯僅僅從黑格爾辯證法中採取了它的「合理的內核」，而摒棄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外殼，並向前發展了辯證法，因而賦與了辯證法一個現代的科學的形態。

馬克思說：

「我的辯證法不僅根本上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而且與它絕對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所稱為觀念而甚至將其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界底創造主，而

現實界不過是思維過程底外部表現。在我看來，恰巧相反，觀念現象不過是被移置於人類頭腦中並在人類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現象而已」（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言）。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說明他們的唯物主義時，通常都援引費爾巴黑，認為他是恢復了唯物主義應有權威的哲學家。但這並不是說，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唯物主義和費爾巴黑底唯物主義是一個東西。其實，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從費爾巴黑唯物主義中採取了它的「基本的內核」，把它向前發展成了科學的哲學唯物主義理論，而摒棄了它那唯心主義的和宗教的倫理雜質。大家知道，費爾巴黑雖在基本上是個唯物主義者，但他極力反對唯物主義這個名稱。恩格斯屢次說過：費爾巴黑「雖有其唯物主義的基礎，但還沒有擺脫舊時的唯心主義羈絆」，「我們考察費爾巴黑底倫理學和宗教哲學時，便可立刻看出他實在有一種唯心主義思想」（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六五二至六五四頁）。辯證法是導源於希臘文“*dialego*”一字，其含義就是進行談話，進行論戰。古代人所謂辯證法，就是以揭露對方議論中的矛盾並克服這些矛盾來求得真理的方術。古代有些哲學家認為思維矛盾的揭露以及對立意見的衝突，是發現真理的最好方法。這個辯證的思維方式後來推廣到自然界現象中去，就變成了認識自然界的辯證方法，這個方法把自然界現象看作永恆運動着，永恆變化着的現象，而把自然界底發展看作自然界中各種矛盾發展的結果，自然界中對立勢力互相影響的結果。

辯證法是與形而上學根本相反的。

(壹)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特徵：

(1)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什麼彼此隔離，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賴的各個對象或各個現象底偶然堆積，而是把它看作有內在聯系的統一整體，其中各個對象或各個現象是互相關切聯系着，互相依賴着，互相制約着的。

因此，辯證法認為自然界中任何一種現象，如果把它孤獨拿來看，把它看作是與其週圍現象沒有聯系的現象，那它就會是不可瞭解的東西，因為自然界任何部分中任何一種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週圍條件沒有聯系的現象，看作是與它們隔離的現象，那它就會是毫無意思的東西；反之，任何一種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週圍現象密切聯系而不可分離的現象，把它看作是受週圍現象所制約的現象，那它就是可以瞭解，可以論證的東西了。

(2)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靜止不動的狀態，停頓不變的狀態，而是看作不斷運動，不斷變化的狀態，不斷革新，不斷發展的狀態，其中始終都有某種東西在產生着和發展着，始終都有某種東西在敗壞着和衰頹着。

因此，辯證法要求我們觀察現象時不僅要從各個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方面去觀察，而且要從它們的運動，它們的變化，它們的發展，它們的產生和衰亡方面去觀察。

在辯證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那怕它現時似乎還不堅固，因為在辯證法看來，只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才是不可戰勝的。

恩格斯說：

「整個自然界，由其最小單位到最大物體，由沙粒到太陽，由 Protist（原始的活細胞。——斯大林註）到人，都是處在永恆的產生和消滅過程中，處在毫不間斷的流動中，處在始終不停的運動和變化中」（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四八四頁）。

因此，——恩格斯說，——辯證法「觀察物象及其在頭腦中的反映時，主要是從它們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結合，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滅方面去觀察」（同上，第二三頁）。

（3）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是把發展過程看作什麼簡單增長的過程，看作數變不會引起質變的過程，而是看作由不顯露的細小數變進到顯露的變，進到根本的變，進到質變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質變不是逐漸地發生，而是迅速和突然地發生，即表現於由一種狀態突變為另一種狀態，並不是偶然發生，而是規律式地發生，即是由許多不明顯的逐漸的數變積累而引起的結果。

因此，辯證法認為不應把發展過程瞭解為循環式的運動，不應把它瞭解為過去事物底簡單重複，而應把它瞭解為前進的運動，上升的運動，由舊質態進到新質態，由簡單發展到複雜，由低級發展到高級的過程。

恩格斯說：

「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現代的自然科學既提供了進行這種檢驗的非常豐富而與日俱增的材料，於是就證明出，自然界中一切現象歸根到底是辯證式地發生，而不是形而上

學式地發生；自然界不是在永遠一樣的經常重複的循環週裏運轉着，而是經歷着實在的歷史這裏首先就應當指出達爾文，他給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一個極有力的打擊，因為他證明整個現代有機界，植物和動物，因而也包括人類在內，都是延長到數百萬年的發展過程底產物」（同上，第二三頁）。

恩格斯說明辯證發展過程是由數變進到質變的過程時寫道：

「在物理學中：每一種變化都是數轉變為質，即某個物體所固有或某個物體所承受的某種運動數量成份改變的結果。例如，水底溫度最初對於水底液體狀態是不發生絲毫作用的，但當液體水底溫度不斷增加或不斷減少到一定的程度時，這一結合狀態就會發生變化，水就會變為蒸汽或冰塊：例如必須具有一定最低限度的電力時，白金絲才會開始發光；例如每種金屬都有其一定的熔解熱度；例如每種液體都有其其在相當氣壓下特有的一定的冰點和沸點，——只要我們能用我們所有的工具造成相當的溫度；最後，例如每種氣體都有其一定的危機點，我們在這點上施以相當的氣壓和冷化，就可把它變成為液體：物理學中所謂 constants（即由某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轉變點。——斯大林註），大部分都不過是這樣一些交錯點底名稱，在這些交錯點上，運動底數量增減（數變）引起該種物態底質變，亦即數轉變為質」（同上，第五二七至五二八頁）。

其次，恩格斯進而講到化學時說道：

「化學可以稱為研究種種物體因數量成份改變而發生質變的科學。黑格爾自己已知道這

點：譬如拿氧氣來說：如果結合在一個分子中的有三個原子，而不是如普通那樣只有兩個原子，那我們就會得到臭氧，即得到一種按其氣味和作用是與普通氧氣顯然不同的物體。更不待說，如果把氧氣與淡氣或硫黃按各種比例結合起來，那末其中每一種結合都產生出一種在質的方面與其他一切物體不同的物體哩！」（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五二八頁）。

最後，恩格斯批評着杜林，批評着那大罵黑格爾而暗中又剽竊黑格爾所說無感覺世界轉變為感覺世界，無機物世界轉變為有機物世界是轉變為新狀態的突變這一著名原理的杜林時說道：

「這正是黑格爾的度量關係交錯綫，在這交錯綫上，純粹數的增減到一定交錯點上就會引起質的突變，例如水液被燒熱或冷化時，沸點或冰點便是這樣的交錯點，在這些交錯點上——在通常的氣壓下——就發生由舊的物態轉變為新的物態的突變，亦即數轉變為質」（同上，第四五至四六頁）。

（4）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所持的出發點是：自然界的對象或自然界的現象含有內在的矛盾，因為所有這些對象或現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過去和將來，都有其衰頹着的東西和發展着的東西，而這種對立面底鬥爭，舊東西與新東西間的鬥爭，衰亡着的東西和產生着的東西間的鬥爭，衰頹着的東西和發展着的東西間的鬥爭，便是發展過程底實在內容，由數變進到質變的這一過程底內容。

因此，辯證法認為低級發展到高級的過程不是表現於各現象協和的開展，而是表現於各對象或各現象本身固有矛盾底揭露，表現於在這些矛盾基礎上動作的互相對立趨勢的「鬥爭」。

列寧說：

「辯證法本來就是研究對象本身內部矛盾的」(列寧，哲學筆記簿，第二六三頁)。

其次：

「發展就是對立面的『鬥爭』」(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三〇一頁)。

簡略說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底基本特徵，就是如此。

顯而易見，把辯證法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該有如何巨大的意義；把這些原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應用到無產階級黨底實際活動上去，該有如何巨大的意義。

既然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現象，既然所有一切現象都是彼此關聯，互相制約，那末在估計歷史上每一個社會制度和每一個社會運動時，當然也就不可如歷史家常作的那樣從「永恒正義」或其他某種成見出發，而是要從這個制度和這個社會運動所由產生並與其相聯結的那些條件出發。

奴隸制度，就現代的條件來看，是很荒謬的現象，反常的荒誕事情。而奴隸制度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條件下，却是完全可以瞭解並且合於規律的現象，因為它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進一步。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社會存在的條件下，譬如說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是完全可以瞭解的一種正確的革命的、和革命的要求，因為資產階級共和國在當時是前進一步。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就我們蘇聯現時的條件來看，却是一種荒謬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

爲資產階級共和國與蘇維埃共和國相比是後退一步。

一切都依條件，地方和時間爲轉移。

顯然，沒有這種觀察社會現象的歷史觀點，那歷史科學就會無法存在和發展，因爲只有這樣的觀點才能使歷史科學不致變成一筆偶然現象的糊塗賬，不致變成一堆荒謬絕倫的錯誤。

其次。既然世界是處在不斷運動和不斷發展中，既然舊東西衰亡和新東西生長是發展底規律，那末當然也就沒有什麼「永世不移的」社會秩序，什麼私有制和剝削制的「永恆原則」，什麼農民服從地主，工人服從資本家的「永恆觀念」。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制度可以用社會主義制度來替代，正如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替代了封建制度一樣。

由此可見，不是要指靠社會裏已經不再發展的階層，那怕這些階層在現時還是佔優勢的力量，而是要指靠社會裏正在發展，具有遠大前途的階層，那怕這些階層在現時還不是佔優勢的力量。

在第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當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鬥爭的時候，俄國無產階級與當時佔居民絕大多數的個體農民比較起來，還是佔很小的少數。但當時無產階級是個發展着的階級，而農民却是個日趨瓦解的階級。正因爲無產階級是個發展着的階級，所以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指靠着無產階級。而且他們並沒有弄錯，因爲大家知道，無產階級後來已由一個不大的力量發展成了歷史上和政治上的頭等力量。

由此可見，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後看。

其次。既然由緩慢的數變進到迅速的突然的質變是發展底規律，那末由被壓迫階級所實行的革命的變革，當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現象。

由此可見，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擺脫資本主義壓迫，決不能經過緩慢變化，經過改良來實現，而只能經過資本主義制度底質變，經過革命來實現。

由此可見，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義者。

其次。既然發展過程是經過內在矛盾底揭露，是經過基於這些矛盾的彼此對立勢力衝突來克服這些矛盾而進行的，那末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當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現象。

由此可見，不是要掩飾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各種矛盾，而是要暴露和揭開這些矛盾，不是要熄滅階級鬥爭，而是要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

由此可見，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執行不調和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策，而不要執行調協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政策，不要執行使資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的妥協主義政策。

以上便是應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去觀察社會生活，去觀察社會歷史的情形。

至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它是與哲學唯心主義根本相反的情形。

(貳)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底特徵是：

(1) 唯心主義認爲世界是「絕對觀念」，「宇宙精神」，「意識」底體現，而馬克思底哲學唯物主義却與此相反，認爲：世界按其本質說來是物質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現象是運動着的物質底

各種形態；各現象由辯證法所判明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是運動着的物質底發展規律；世界是按物質運動規律發展着，而並不需要什麼「宇宙精神」。

恩格斯說：

「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過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瞭解，而並不附加以任何外來的成份」

（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六五一頁）。

古代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保持着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體，它並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造成的，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按規律燃燒着，按規律熄滅着的永恆活火」，——列寧論到這個唯物主義觀點時說：「這是對於辯證唯物主義基礎的一種很好的說明」（列寧，哲學筆記簿，第三一八頁）。

（2）唯心主義硬說，只有我們的意識才是真實存在着的，物質世界，存在或自然界只是在我們的意識中，只是在我們的感覺，觀念或概念中存在着，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却與此相反，認為：物質，自然界或存在，是在意識以外，不依賴於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物質是第一性的現象，因為它是感覺，觀念或意識底來源；而意識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因為它是物質底反映，存在底反映；思維是發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質底產物，即人腦底產物，而人腦是思維底器官；因此，如果不願意大錯特錯，便不可把思維和物質隔開。

恩格斯說：

「全部哲學底最高問題，都是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哲學家就是依其如

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兩大營壘的。凡斷定說精神先於自然界存在的，便組成唯心主義的營壘。凡認為自然界是基本起源的，則屬於唯物主義底各派」（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三二九頁）。

其次：

「可以感覺得到的物質的世界，即我們自己所屬的世界，是唯一的真實世界：我們的意識與思維，不管它怎樣好像是超感覺的東西，總是物質實體器官底產物，即人腦底產物。物質不是精神底產物，而精神本身倒祇是物質底最高產物」（同上，第三三二頁）。

馬克思談到物質與思維問題時說道：

「決不可把思維與思維着的物質隔開。物質是一切變化底主體」（同上，第三〇二頁）。列寧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時寫道：

「唯物主義一般就認為客觀現實的存在（物質）是不依賴於人類意識，感覺和經驗等等的意識：僅僅是存在底反映，至多也不過是存在底近乎正確的（相等的，盡量確切的）反映」（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六六至二六七頁）。

其次：

「物質就是作用於我們感官而引起感覺的東西；物質是我們可以感覺得到的客觀現實：物質，自然界，存在和物理現象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精神，意識，感覺和心理現象是第二性的現象」（同上，第一一九至一二〇頁）。

「世界底情景就是物質怎樣運動着和「物質怎樣思維着」的情景」（同上，第二八八頁）。

「人腦是思想底器官」(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二五頁)。

(3) 唯心主義否認世界及其規律底可知性，不相信我們知識底確實性，不承認客觀真理，並認為世界上充滿着科學永遠不能認識的「自在之物」，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却與此相反，認為：世界及其規律完全可能認識，我們對於自然界規律的那些已由經驗和實踐考驗過的知識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知識，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之物，而只有現在尚未認識，但將來却會由科學和實踐力量揭示和認識之物。

恩格斯批評康德及其他唯心主義者所謂世界不可認識和「自在之物」不可認識的意見，而堅持唯物主義認為我們的知識是確實知識的這一著名原理時寫道：

「把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遁辭駁斥得最澈底的就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既然我們能以親自製造出自然界某一現象，依它的條件把它產生出來，並使它服務於我們目的的事實來證明我們對於這一現象認識的正確，那末康德的那個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要完結了。在動植物軀體上所形成的種種化學原素，當有機化學還沒有開始把它們一一製造出來時，便始終是這類的「自在之物」；而當有機化學已開始把它們一一製造出來時，「自在之物」就變成了爲我之物了；例如拿亞里查林，即茜素顏料來說，我們現在並不是從那生長於田野的茜草根上取得它，而是用更便宜得多，更簡單得多的方法從煤焦油中取得它。哥白尼底太陽系學說在三百年間被人視為假說，固然是種很可信的假說，但終究是一種假說。可是，當列月爾根據這太陽系學說底證據，不僅證明一定有一個前此所未知的行星存在，而且已用計算方法確定它在天體中的位置，後來

加列果然已發現這個行星時，哥白尼底太陽系學說就被證明了」（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三〇頁）。

列寧責備波格丹諾夫，巴查羅夫，尤史克維奇及其他馬赫信徒爲非德主義者（非德主義是排斥科學，崇尚信仰的反動理論），而堅持唯物主義認爲我們關於自然界規律的科學知識是確實知識，認爲科學定律是客觀真理的這一著名原理時說道：

「現代的非德主義並不否認科學；它只是否認科學底「過度奢望」，即科學想成爲客觀真理的奢望。既然有客觀真理存在（如唯物主義者所想的那樣），既然只有那在人類「經驗」上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學能提供我們以客觀真理，那末任何非德主義就毫無條件地被推翻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〇二頁）。

簡略說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特徵，就是如此。

不言而喻，把哲學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該有何何巨大的意義；把這些原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應用到無產階級黨實際活動上去，該有何何巨大的意義。

既然自然界中各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是自然界發展底規律，那末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生活中各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也同樣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會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社會生活，社會歷史，已不復是一堆「偶然現象」，因爲社會歷史已成爲社會底規律性的發展，而社會歷史底研究已成爲一種科學。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實際活動決不應以「卓越人物」底善良願望爲基礎，決不應以

「理性」、「普遍道德」等等底要求爲基礎，而應以社會發展底規律爲基礎，應以研究這些規律爲基礎。

其次。既然世界可能認識，既然我們關於自然界發展規律的知識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知識，那末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生活，社會發展也同樣可能認識，科學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材料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材料。

由此可見，社會歷史科學，不管社會生活中的現象怎樣複雜，都能成爲例如生物學一樣的準確科學，能利用社會發展規律來供實際的應用。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在它的實際活動中，決不應以什麼偶然動機爲準則，而應以社會發展規律，以及由這些規律中所得出的實際結論爲準則。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已由關於人類美滿未來的空想變成了科學。

由此可見，科學和實際活動間的聯系，理論和實踐間的聯系，它們的一致，應當成爲無產階級黨底南針。

其次。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現象，而意識，思維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既然物質世界是不依賴於人們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意識是這客觀現實底反映，那末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底物質生活，社會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社會底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社會底物質生活是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底精神生活是這客觀現實底反映，存在底反映。

由此可見，社會底精神生活所由形成的來源，社會思想，社會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所由產生的來源，並不是要到思想，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本身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中，要到社會存在中去探求，因為這些思想，理論和觀點等等，是這社會存在底反映。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在社會歷史各個不同的時期可以看見各種不同的社會思想，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如果我們在奴隸制度下所遇見的是一種社會思想，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所遇見的是另一種，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遇見的又是一種，那就不是由於什麼思想，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本身底「天性」和「屬性」，而是因為在各個不同的社會發展時期有各個不同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

社會存在怎樣，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怎樣，社會思想，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也就會怎樣。

因此馬克思說：

「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頁）。

由此可見，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爲了不致陷入空洞臆想家的地位，那末無產階級黨在自己的活動中，就不應從抽象的「人類理性原則」出發，而應從具體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即從社會發展底決定力量出發；不應從「偉大人物」底善良願望出發，而應從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現實需要出發。

空想派——包括民粹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在內——陷於覆亡的原因之一，就

是他們不承認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首要作用，而陷入了唯心主義，不把自己的實際活動建築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上，却不顧這種需要並違反着這種需要而把它建築在脫離社會現實生活的「理想計劃」和「包羅萬象的方案」上。

馬列主義之所以強而有力和生氣勃勃，也就是因為它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正是憑藉於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無論何時也不脫離社會底現實生活。

可是，決不應當從馬克思底話中作出結論，說社會思想，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在社會生活中沒有作用，說它們不反轉來影響到社會存在，影響到社會生活物質條件底發展。我們在這裏暫且只是說到社會思想，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底起源，只是說到它們的產生，只是說到社會精神生活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底反映。至於社會思想，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底意義，至於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那末歷史唯物主義不僅不否認，恰巧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們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上的嚴重作用和意義。

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有舊的思想和理論，它們是已經衰頹，並為社會上那些衰頹着的勢力底利益服務的東西。它們的作用就是阻礙社會發展，阻礙社會前進。同時又有新的先進的思想和理論，它們是為社會上的先進勢力利益服務的東西。它們的作用就是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前進，而且它們愈是確切反映着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便能獲到愈加巨大的意義。

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只有當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的任務時，才會產生出來。可是，它們既已產生出來，便會成為最嚴重的力量，能促進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

的新任務，能促進社會前進。在這裏也就表現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新的政治觀點和新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那種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和改造的意義。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所以產生出來，正是因為它們為社會所必需，因為若沒有它們那種組織的、動員的和改造的工作，便無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既已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中提出的那些新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便能掃除障礙，深入民衆意識，動員民衆，組織民衆去反對社會上衰頹着的勢力，因而便利着推翻社會上正在衰頹而阻礙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勢力。

於是，社會思想，理論和政治制度既已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中，社會存在發展過程中業經成熟的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便能反轉來影響到社會存在，影響到社會物質生活，造成必要條件來澈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中業經成熟的任務，並使這社會物質生活可能向前發展。

因此馬克思說：

「理論一掌握了羣衆，便立刻成為物質的力量」（馬恩全集，第一卷，第四〇六頁）。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為要有可能去影響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並加速其發展，加速其改善，便應憑藉於這樣一種社會理論和社會思想，這種理論和思想能正確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因而能發動廣大民衆，能動員他們，把他們組織成一支決意打破社會反動勢力並為社會先進勢力開闢道路的無產階級黨的偉大軍隊。

「經濟主義者」和孟什維克陷於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承認先進理論和先進思想有動員的、組織的和改造的作用，而陷入了庸俗唯物主義，竟把先進理論和先進思想底作用看成幾等於

等，因而使黨陷於消極無爲，陷於萎靡不振的地步。

馬列主義之所以強而有力和生氣勃勃，就是因爲它憑藉於正確反映着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需要的先進理論，把這個理論提到它所應有的高度，並努力來澈底利用這個理論所有的動員的，組織的和改造的力量。

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這樣來解決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間，社會物質生活發展條件和社會精神生活發展間相互關係問題的。

（叁）歷史唯物主義。

現在還要說明一個問題：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來，究竟把歸根到底決定社會面貌，社會思想，觀點和政治制度等等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瞭解爲什麼東西呢？

這「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究竟是什麼；它們的特徵究竟怎樣呢？

首先，「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這一概念，當然是把環繞着社會的自然界，即地理環境包含在內，因爲這個環境是社會物質生活所必要的和經常的條件之一，而且無疑是影響到社會底發展。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怎樣呢？地理環境是不是決定社會面貌，人們社會制度性質，以及由一個制度過渡到另一個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歷史唯物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否定的。

地理環境當然是社會發展底經常必要的條件之一，而且它無疑是能影響到社會底發展，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程。但它的影響並不是決定的影響，因爲社會底變更和發展要比地理環境底變更

和發展快得不可計量。歐洲在三千年內已更換過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歐洲東部，即在蘇聯，甚至更換了四種社會制度。可是，在這同一時期內，歐洲境內的地理條件不是完全沒有變更，便是變更得很少，甚至地理學也不肯提到它。而這是不言而喻的。地理環境方面一種稍許嚴重的變更都需要幾百萬年，而人們社會制度中甚至最嚴重的變更，也只需要幾百年或一兩千年就夠了。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地理環境決不能成為社會發展底主要原因，決定原因，因為在數萬年間幾乎仍舊不變的現象，決不能成為那在幾百年間就發生根本變更的現象發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口底增長，居民密度底高低，當然也包含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這一概念中，因為人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中的必要成分，沒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便不能有任何社會物質生活。人口底增長是不是決定人們社會制度性質的主要力量呢？

歷史唯物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也是否定的。

人口底增長當然能影響到社會底發展，促進或延緩社會底發展，但它不能成為社會發展中的主要力量，它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不能是決定的影響，因為人口底增長並不能給我們說明為什麼某個社會制度恰巧要由一定的新制度來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個制度來替代；為什麼原始公社制度恰巧是由奴隸制度所替代，奴隸制度恰巧是由封建制度所替代，封建制度恰巧是由資產階級制度所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制度所替代。

如果人口底增長是社會發展中的決定力量，那末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會產生出相當於它的較

高形式的社會制度。可是，事實上却沒有這樣的情形。中國人口密度比美國高至四倍，但美國在社會發展程度上高於中國，因為中國仍然是半封建制度佔統治，而美國却早已達到資本主義發展底最高階段。比利時人口密度比美國高至十九倍，比蘇聯高至二十六倍，但美國在社會發展程度上高於比利時，而蘇聯比之比利時，更是高出一整個歷史時代，因為比利時還是資本主義制度佔統治，而蘇聯却已消滅了資本主義並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人口底增長不是，而且不能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面貌的主要力量。

（甲）既然如此，那末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體系中，究竟什麼是決定社會面貌，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這樣的力量，據歷史唯物主義看來，便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謀得方式，便是社會生活和發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和生產工具等物質資料生產方式。

爲要生活，就需要有食品、衣服、靴鞋、住房和燃料等等，爲要有這些物質資料，就必須生產它們，而爲要生產它們，就需要有人們所利用來生產食品、衣服、靴鞋、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種種生產工具，就需要善於生產這些工具，就需要善於使用這些工具。

生產物質資料時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以及因有相當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而發動着生產工具並實現着物質資料生產的人，——這些要素總合起來，便構成爲社會底生產力。

但生產力還只是生產底一方面，生產方式底一方面，其所表示的是人們對於他們所利用來生

產物質資料的物件和自然界力量間的關係。生產底另一方面，生產方式底另一方面，便是人們彼此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關係，即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和自然界鬥爭以及利用自然界來生產物質資料，並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絕，各人單獨進行，而是以團體為單位，以社會為單位來共同進行的。因此，生產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是社會的生產。人們在實現物質資料生產時，也就建立彼此間在生產內部的某種相互關係，即某種生產關係。這些關係可能是不受剝削的人們彼此間的合作和互助關係，可能是統治和服從的關係，最後，也可能是由一個生產關係形式過渡到另一個生產關係形式的過渡關係。可是，不管生產關係帶着怎樣的性質，而它們在任何時候和在任何制度下，都如社會底生產力一樣是生產底必要原素。

馬克思說：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影響着自然界，而且互相影響着。他們如果不用相當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生產。爲了實現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係，只有經過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係，才會有人們對於自然界的關係存在，才會有生產」（馬恩全集，第五卷，第四二九頁）。

所以，生產，生產方式是把社會底生產力和人們底生產關係兩者都包含在內，而體現着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

（乙）生產底第一個特點就是它永遠也不會長久停留在一點上，而是始終處在變更和發展狀態中，同時生產方式中的變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會制度，社會思想，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底變更，

即引起全部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底改造。人們在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有着各個不同的生產方式，或者粗淺一點說，過着各種不同樣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一種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下有另一種生產方式，在封建制度下有第三種生產方式，餘此類推。同時，人們底社會制度，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的觀點，他們的政治制度，也與此適應而各不相同。

社會底生產方式怎樣，社會本身在基本上也就會怎樣，社會底思想和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也就會怎樣。

或者粗淺一點說：人們底生活樣式怎樣，人們底思想樣式也就會怎樣。

這就是說，社會發展史首先便是生產發展史，數千百年來新陳代謝的生產方式發展史，生產力和人們生產關係發展史。

由此可見，社會發展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底歷史，即身為生產過程中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社會生存所必需物質資料生產的那些勞動羣衆底歷史。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要想成爲真正的科學，便不能再把社會發展史歸結爲帝王將相底行動，歸結爲國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動，而是首先應當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各國人民底歷史。

由此可見，研究社會歷史規律的關鍵，並不是要到人們底頭腦中，到社會底觀點和思想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會在每個一定歷史時期所採取的生產方式中，即要到社會底經濟中去探求。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底首要任務是要研究和揭示生產底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底規律，

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要想成爲真正的黨，首先就應精通生產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無產階級黨在製定自己的黨綱以及進行實際活動時，首先應以生產發展底規律，應以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爲出發點。

(丙)生產底第二個特點就在生產底變更和發展始終是從生產力底變更和發展上，首先是從生產工具底變更和發展上開始。所以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要素。起初是社會底生產力發生變更和發展起來，然後，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底經濟關係也依賴於這些變更並與這些變更相應而發生變更。但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不影響到生產力底發展，生產力不依賴於生產關係。生產關係雖然是依賴於生產力底發展而發展，但同時它們又反轉來影響到生產力，加速或延緩其發展。而且必須指出：生產關係不能過分長久落後於生產力底增長並和這一增長相矛盾，因爲只有當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底性質及狀況，並使生產力有發展餘地時，生產力才能儘量發展起來。因此，無論生產關係怎樣落後於生產力底發展，但它們遲早總應而且一定會去適合於生產力底發展水準，適合於生產力底性質。不然，便會有生產體系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統一底根本破壞，全部生產破裂，生產危機以及生產力破壞的情形。

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不適合的實例，它們兩者間衝突的實例，便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所發生的經濟危機，那裏的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和生產過程底公共性質，是和生產力底性質極不適合

的。這種不適合的結果，便是使生產力陷於破壞的經濟危機，而這種不適合的情況就是那負有使命破壞現存生產關係，並建立起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新生產關係的社會革命底經濟基礎。

反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完全適合的實例，便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這裏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生產過程底公共性質是完全適合的，因此在蘇聯便沒有經濟危機，也沒有生產力破壞的情形。

所以，生產力不僅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要素，而且是生產發展過程中央定的要素。

生產力怎樣，生產關係也就應怎樣。

生產力底狀況所回答的是人們用怎樣的生產工具來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物质資料的問題，而生產關係底狀況所回答的則是生產資料（土地，森林，水流，礦源，原料，生產工具，生產建築物，交通聯絡工具等等）歸誰所有，生產資料由誰支配——是由全社會支配，還是由單個的人，集團和階級支配並利用去剝削其他的人，集團和階級的問題。

以下便是從古代到今日的生產力發展的一般情景。由粗笨的石器過渡到弓箭，並與此相應而由狩獵生活過渡到馴養動物和原始畜牧；由石器過渡到金屬工具（鐵斧，鐵口鋤等等），並與此相應而過渡到種植植物，過渡到農業；金屬的製造工具繼續改良，過渡到冶鐵風箱，過渡到陶器生產，並與此相應而有手工業的發展，手工業脫離農業的分立，獨立手工業生產以及後來手工業工場生產的發展；由手工業生產工具過渡到機器，手工業工場生產轉變為機器工業；再進而過渡到機器制，以及現代機器化工業的出現，——這就是人類史上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大致而遠不完備的

情景。同時，生產工具底發展和改善當然是由參加生產的人們所實現，而不是與人們無關，所以，由於生產工具底變更和發展，人們，即生產力中最重要原素，也隨着變更和發展起來，他們的生產經驗，勞動技能以及運用生產工具的本領，也隨着變更和發展起來。

隨着社會生產力在歷史上變更和發展，於是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底經濟關係，也與此適應而變更和發展。

歷史上有五種基本生產關係：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這在基本上是與當時的生產力性質相合的。石器以及後來出現的弓箭，使人絕對不能單身去和自然界勢力及猛獸作鬥爭。人們當時為要在森林中採集果實，在水裏捕獲魚類，建築某種住所，便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則便會餓死，便會成為猛獸或鄰近部落底犧牲品。公共的勞動也就引起了生產資料和生產品的公有制。這裏還不知道什麼是生產資料私有制，不過有些同時用以防禦猛獸的生產工具是歸個人所有。這裏並沒有什麼剝削，也沒有什麼階級。

在奴隸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奴隸主佔有生產資料和佔有生產工作者，這生產工作者便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來買賣屠殺的奴隸。這樣的生產關係在基本上是與當時的生產力狀況相合的。此時人們所擁有的已經不是石器，而是金屬工具；此時所有的已不是那種不知畜牧業為何物，也不知農業為何物的貧乏原始的狩獵經濟，而是已經出現了的畜牧業，農業，手工業以及這些生產部門彼此間的分工；此時已有可能在各個人間和各部落間交換生產品，已有可能把財富積聚在少數人手

中，而且真正把生產資料積累於少數人手中，已有可能迫使大多數人服從少數人並把這大多數人變為奴隸。這裏已不是社會中一切成員在生產過程中共同地和自由地勞動，而是由那些被不勞而獲的奴隸主所剝削的奴隸們底強迫勞動佔主要地位。因此也就沒有了生產資料和生產品的公有制。它已被私有制所替代了。這裏，奴隸主是第一個和基本的十足的私有主。

富人和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享有完全權利的人和毫無權利的人，他們彼此間的殘酷階級鬥爭，——這就是奴隸制度底情景。

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封建主佔有生產資料和不完全佔有生產工作者，這生產工作者便是封建主雖已不能屠殺，但仍可以買賣的農奴。當時除封建所有制外，還存在有農民和手工業者以本身勞動為基礎佔有生產工具和自己私有經濟的個人所有制。這樣的生產關係在基本上是與當時的生產力狀況相合的。鎔鐵和製鐵工作更進一步的改善；鐵犁和織布車的散佈；農業，園圃業，釀酒業和製油業的繼續發展；與手工業作坊並存的手工業工場企業的出現，——這就是當時生產力狀況底特徵。

新的生產力所需要的是在生產中能表現某種自動性，願意勞動，對勞動感覺興趣的生產者。因此，封建主就把奴隸拋棄，因為奴隸是對勞動不感興趣和完全沒有自動性的工作者；而寧願利用農奴，因為農奴有自己的經濟，有自己的生產工具，具有為耕種土地並從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實物繳給封建主所必需的某種勞動興趣。

私有制在這裏已經繼續發展了。剝削幾乎仍如奴隸制度下的剝削一樣殘酷，不過是稍許減輕

一些罷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階級鬥爭，便是封建制度底基本特徵。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同時這裏已經沒有了私自佔有生產工作者的情形，這時的生產工作者，即僱傭工人，是資本家既不能屠殺，也不能出賣的，因為僱傭工人已免除了人格上的依賴，但他們卻沒有生產資料，所以他們爲要不致餓死，便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並忍受繁重的剝削。除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外，還存在有免除了農奴制依賴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以本身勞動爲基礎佔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且這種私有制在第一個時期是很流行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場企業已由機器化的大工廠所代替了。用農民粗笨生產工具耕作的貴族地產，已由根據農藝學經營和使用農業機器的資本主義大農場所代替了。

新的生產力所需要的是比閉塞無知的農奴們文化些，伶俐些，能夠懂得機器並正確使用機器的生產工作者。因此，資本家寧願利用免除了農奴制羈絆而有相當文化程度來正確使用機器的僱傭工人。

可是，資本主義把生產力發展到巨大規模的時候，便陷入它自己不能解決的矛盾中。資本主義生產出日益增多的商品並減低着商品價格，便使競爭尖銳化，使大批小私有主和中等私有主陷於破產，把他們變成無產者，減低他們的購買力，因而就使生產出來的商品無法銷售出去。資本主義擴大生產並把千百萬工人集合在大工廠內，便使生產過程具有了公共的性質，因而破壞了自己本身的基礎，因為生產過程底公共性質要求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而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却仍然是資本主義私人性的，即與生產過程底公共性質勢不兩立的所有制。

生產力性質與生產關係間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是暴露於週期的生產過剩危機中，此時資本家因他本身使廣大民衆遭受破產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便不得不燒燬生產品，消滅已製成的商品，停止生產，破壞生產力；此時千百萬民衆被迫失業挨餓，而這並不是由於商品不夠，却是因爲商品出產太多。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不復與社會生產力狀況相適合，而是已與社會生產力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

這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制度裏成熟着革命，其使命就是要用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來代替現存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

這就是說，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乃是資本主義制度底基本特徵。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此刻還只實現於蘇聯的這個制度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生產關係底基礎。這裏已沒有什麼剝削者，也沒有什麼被剝削者。生產出來的物品是根據「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來按勞動分配的。這裏生產過程中人們相互關係底特徵，乃是不受剝削的工作者們間同志的合作和社會主義的互助。這裏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狀況完全相合，因爲生產過程底公共性質是由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所鞏固的。

因此，蘇聯的社會主義生產也就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週期的生產過剩危機，以及與此危機相聯結的荒謬現象。

因此，生產力在這裏是加速發展着，因爲適合於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使生產力有這樣發展的充分

廣濶的餘地。

這就是人類史上人們生產關係發展的情景。

這就是生產關係發展對於社會生產力發展，首先是對於生產工具發展的依賴性，而因為有這種依賴性，所以生產力底變更和發展遲早要引起生產關係與此相應的變更和發展。

馬克思說：

「勞動資料*的使用和創造，雖其萌芽形式已為某種動物所固有，畢竟是人類勞動過程所獨具的特徵，所以佛蘭格林說人類是製造工具的動物。勞動資料底遺骸對於研究已經消亡的諸社會經濟形態，也如動物骨骼底遺骸結構對於研究已消亡的諸種動物底軀體組織一樣，有極重要的意義。各個經濟時代所由以區別的不是生產什麼，而是怎樣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底尺度，並且是勞動在其中實現的社會關係底指標」（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二一頁，一九三五年版）。

其次：

「社會關係是和生產力密切聯結的。人們既獲得了新的生產力，便會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着生產方式底改變，即本身生活保障方式底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所有一切社會關係。手力的磨坊產生了以緒則連（即封建主）。——斯大林註）為首的社會；蒸汽力的磨坊產

*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資料」，主要是指生產工具而言。——斯大林註。

生了以工業資本家爲首的社會」(馬恩全集，第五卷，第三六四頁)。

「生產力增長底運動，社會關係底破壞以及思想底產生都是毫不間斷地發生着，不動的只是運動底抽象」(同上，第三六四頁)。

恩格斯在解釋共產黨宣言內所表述的歷史唯物主義時說道：

「每一歷史時代底經濟生產以及必然從它發生的社會結構，便是這時代的政治和思想歷史底基礎……與此相應的，是——自從原始公社的土地佔有制瓦解時起——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階段上被剝削階級與剝削階級，被支配階級與統治階級間鬥爭的歷史……在這個鬥爭現今所達到了的階段上，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爲要擺脫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已非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以及階級鬥爭不可了……」(恩格斯爲宣言德文版所作的序言)。

(丁)生產底第三個特點就在新的生產力以及與其相適合的生產關係產生的過程，並不是離開舊制度而單獨發生，不是在舊制度消滅以後發生，而是在舊制度內部發生；不是由於人們有意自覺活動底結果，而是自發地，不自覺地，不依人們意志爲轉移地發生的。其所以是自發地和不依人們意志爲轉移地發生，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人們不能自由選定這種或那種生產方式，因爲每一新輩人開始生活時，他們已遇到現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即前輩人所工作的結果，因此這新輩人在最初一個時候，應當接受他們在生產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現成東西，應當去適應這些東西，以便有可能生產物質資料。

第二個原因，就是人們在改善這種或那種生產工具，這種或那種生產力要素時，不會覺悟到，不會瞭解到，也不會想到這些改善將會引起怎樣一種社會結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減輕自己的勞動，謀得某種直接的，可以感觸到的益處。

當原始公社社會中某些社員逐漸地摸索式地由石器過渡到鉄製工具時，他們當然不知道，當然沒有想到這種革新會引起怎樣一種社會結果；他們並沒有瞭解到，沒有意識到，由石器過渡到金屬工具意味着生產中的變革，結果一定會引起奴隸制度，——當時他們只是想要減輕自己的勞動和謀得眼前的感覺得到的益處，——他們當時的自覺活動只局限於這種日常個人利益的狹隘範圍。

當歐洲年輕資產階級在封建制度時期開始建造巨大手工工場企業，以與細小行業作坊並列，因而推進社會生產力時，它當然不知道，當然沒有想到它這種革新辦法會引起怎樣一種社會結果；它並沒有意識到，沒有瞭解到，這種「細微的」革新辦法會引起社會力量的重新配合，結果會發生一個要把它當時所十分感戴的王室政權以及它的優秀代表所往往夢想側身其間的貴族都一概推翻的革命，——當時它只是想要減低商品生產成本費，更多拿些商品到亞洲市場以及剛才發現的美洲市場去銷售，藉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它當時的自覺活動只局限於這種日常實踐的狹隘範圍。

當俄國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一起加緊在俄國培植現代機器化大工業，絲毫也不觸動沙皇制度，而聽憑地主們宰制農民時，他們當然不知道，當然沒有想到生產力這種嚴重的增長會引起怎樣一種社會結果；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沒有瞭解到，這個在社會生產力方面發生的嚴重躍進會引起社會力量的重新配合，結果會使無產階級能和農民聯合起來實現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當時他們只是

想要極端擴大工業生產，掌握巨大的國內市場，變成壟斷家並從國民經濟中吸取更多的利潤，——他們當時的自覺活動並沒有超出他們日常的狹隘實踐的利益。

因此馬克思說：

「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即是在生產爲人們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中。——斯大林註）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頁）。

但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底變更以及由舊生產關係到新生產關係的過渡是一帆風順地進行，而不經過什麼衝突，不經過什麼震動。恰巧相反，這樣的過渡通常是表現於用革命手段來推翻舊生產關係而奠定新生產關係。到一定時期爲止，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生產關係方面的變更，是不依人們意志爲轉移而自發進行的。但這只是到一定時候爲止，只是到已經產生和正在發展的生產力還沒有充分成熟的時候爲止。而當新生產力已經成熟時，現存的生產關係及其體現者的統治階級就變成了「不可克服的」，只有經過新階級自覺活動，只有經過新階級強力行動，只有經過革命才可掃除的障礙。這裏特別明顯地表現出應該用強力把舊生產關係消滅掉的那些新社會思想，新政治制度和新政權底偉大作用。在新生產力與舊生產關係互相衝突的基礎上，在社會底新經濟需要的基礎上產生出新的社會思想；新的思想組織和動員羣衆；羣衆團結成爲新的政治軍隊，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權，並運用這個政權去用強力消滅生產關係方面的舊秩序而奠定新秩序。於是，自發的發展過程就讓位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於人們自覺的活動，和平的發展就讓位於強力的變革，進化就讓位於革命。

馬克思說：

『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團結成爲階級：它藉實現革命而把自己變爲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資格去用強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共產黨宣言一九三八年版，第五二頁）。其次：

『無產階級運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奪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於國家手裏，集中於已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儘量迅速地增加全部生產力』（同上，第五〇頁）。

『強力是每一個舊社會在懷孕着新社會時的產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六〇三頁，一九三五年版）。

以下便是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爲他那部名著政治經濟學批評所寫的有歷史意義的序言中，對歷史唯物主義底實質所作的一個天才的表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就組成爲社會底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物所藉以樹立起來，而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其相應的那個現實基礎。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並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

識。社會底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於是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物中也就會或遲或速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經濟生產條件方面所發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學精確眼光指明出來的物質變革，去與人們所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形式，——簡言之，思想形式，——分別清楚。正如我們評判一個人時不能以他對於自己的態度為根據一樣，我們評判這樣一個變革時代時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恰巧相反，這個意識正須從物質生活底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中求得解釋。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當它所給以充分發展餘地的一切生產力還沒有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它所藉以存在的那些物質條件還沒有在舊社會胞胎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會抱定自己所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我們仔細去看時總可看出，任務本身，只有當它所能藉以得到解決的那些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的」（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至二七〇頁）。

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應用於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的情形。
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基本特徵。

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

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一) 蘇聯底國際形勢

同志們！自從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時起，迄今已有五年了。你們看，這個時期是不小的。在這個時期中，世界已經歷了許多重大的變化。各個國家以及它們彼此間的關係，在許多方面都變成完全另外一個樣子了。

在這個時期中，國際情形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呢？我國內外的形勢究竟有了什麼變化呢？

在資本主義國家方面，這個時期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是發生極嚴重震動的時期。在經濟上，這些年份是蕭條的年份，而從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起，又是新經濟危機的年份，是美英法三國工業重新衰落的年份，因而也就是發生新的經濟糾紛的年份。在政治上，這些年份是發生嚴重的政治衝突和政治震動的年份。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已進到了第二個年頭，這個戰爭是在從上海到直布

羅陀海峽的廣大地面上發生着，它捲入了五萬萬以上的人口。歐非亞三大洲的地圖是被用暴力改變着。戰後所謂和平制度的體系全部都被根本動搖了。

反之，在蘇聯方面，這些年份是它增長和繁榮的年份，是它的經濟和文化更加高漲的年份，是它的政治和軍事實力更加增長的年份，是它爲保持全世界和平而鬥爭的年份。

這就是一般的情景。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關於國際形勢中所發生變化的具體材料吧。

(一) 各資本主義國家裏新的經濟危機。爭奪銷售

場、原料來源以及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尖銳化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在資本主義各國所開始的經濟危機，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三年底。此後危機轉爲蕭條，繼而又開始了工業少許活躍，少許高漲的過程。可是，這個工業的活躍並沒有像通常活躍時期那樣轉爲繁榮。相反的，從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起，又開始了新的經濟危機，首先是捲入了美國，接着便把英法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也捲入進去了。

於是，各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醫好它們從不久以前的經濟危機方面所受到的創傷，便又遭遇到新的經濟危機了。

這種情形自然使失業現象加強起來。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失業人數，本已從一九三三年的三千萬減少到一九三七年的一千四百萬，而現在由於發生新危機的結果，又增加到一千八百萬人了。

新危機底特點就是它與上次危機大不相同，而其不同之處又不是比上次危機好些，而是比上次危機更壞。

第一，新的危機並不是像一九二九年開始的危機那樣在工業繁榮時期以後開始，而是在蕭條和少許活躍後開始的，但這個活躍又沒有轉為繁榮。這就是說，現時的危機比上次危機更加沉重，更加難於克服。

其次，現今危機並不是在和平時候發生，而是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已經開始的時期發生的：此時，日本和中國作戰已到了第二年，它正破壞極廣大的中國市場，使其他各國商品幾乎沒有染指的餘地；此時，意德兩國已把它們的國民經濟轉上了戰時經濟的軌道，並為此而消耗了它們所有的原料和現金；此時，其餘一切巨大資本主義強國都開始按戰時需要來實行改造了。這就是說，資本主義所能藉以用平常方式逃脫現時危機的資源，要比上次危機時期更少得多。

最後，現今危機與上次危機不同處，就在於現今危機不是普遍的危機，而暫時主要還只捲入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即那些還沒有轉上戰時經濟軌道的國家。至於日德意這些已把自己的經濟按戰時需要改造過的侵略國，却由於它們加緊發展自己的軍事工業，而暫時還沒有陷於生產過剩的危機，雖然它們已在接近到這個危機。這就是說，當那些經濟實力強大的非侵略國開始爬出危機階段時，各侵略國就會因為它們已在戰爭狂熱中消耗盡了自己的現金和原料，而一定會走入極劇烈危機的階段。

只要舉出各資本主義國家所有的有形現金的統計，便可明白看出這一點。

各資本主義國家有形現金數目（單位百萬舊美金元）

	一九三六年年底	一九三八年九月
總 共	一二, 九八〇	一四, 三〇一
美 國	六, 六四九	八, 一二六
英 國	二, 〇二九	二, 三九六
法 國	一, 七六九	一, 四三五
荷 蘭	二八九	五九五
比利時	三七三	三一八
瑞 士	三八七	四〇七
德 國	一六	一七
意大利	一二三	一二四
日 本	二七三	九七

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德意日三國所有的現金數目加在一起，也是一個比瑞士一國所有的現金數目還小的數目。

下面的數目字，便可說明最近五年來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危機的情形和蘇聯工業高漲的情形。以一九二九年爲標準的工業出產量比較表（以一九二九年爲一百）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美國	六六·四	七五·六	八八·一	九二·二	七二·〇
英國	九八·八	一〇五·八	一一五·九	一二三·七	一一二·〇
法國	七一·〇	六七·四	七九·三	八二·八	七〇·〇
意大利	八〇·〇	九三·八	八七·五	九九·六	九六·〇
德國	七九·八	九四·〇	一〇六·三	一一七·二	一二五·〇
日本	一二八·七	一四一·八	一五一·一	一七〇·八	一六五·〇
蘇聯	二三八·三	二九三·四	三八二·三	四二四·〇	四七七·〇

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世界上只有蘇聯才是不知危機爲何物，而其工業總是一貫向上昇長的國家。

其次，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在美英法三國，嚴重的經濟危機已經開始了，並正在發展着。再其次，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比德國更早就把自己國民經濟轉上戰時經濟軌道的意大利兩國，它們工業底低降過程在一九三八年就已經開始了。

最後，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比意日兩國較遲接戰時需要來改造本國經濟的德國，它的工業暫時還處在少許向上昇長的狀態中，固然昇長得不大，但總算是向上昇長着，——這恰與日意兩國最近以前的情形相當。

毫無疑義，假如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情，德國工業也一定會走上日意兩國所走上了的那條下降的道路。要知道，把國內經濟轉上戰時經濟軌道，就是使工業循着片面的軍事的趨向發展，極力擴大專供戰爭需要而與居民消費無關的那些物品底生產，極力縮小居民消費品底生產，特別是縮小居民消費品底出售，因而縮減居民底消費額，使國家陷入經濟危機。

這就是各資本主義國家裏新經濟危機進程底具體情形。

顯然，這樣不順利的經濟局勢不能不使列強相互關係尖銳化。上次危機已經紊亂了全局，使爭奪銷售場和原料來源的鬥爭尖銳化了。日本強佔東三省和華北，意大利強佔阿比西尼亞的事實，都是列強鬥爭尖銳化的表現。新的經濟危機一定而且真正已使帝國主義鬥爭更加尖銳化。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市場上的競爭，不是商業競爭和傾銷政策了。這些鬥爭手段早已認為是不夠的了。現在的問題是要用軍事行動來重新分割世界，勢力範圍和殖民地。

日本替自己的侵略行動辯護說，在締結九國公約時，人家分配給它的贓物太差，沒有讓它用侵佔中國土地的手段來擴大自己的領土，而英法兩國却佔有龐大的殖民地。意大利回憶起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後實行分贓時，人家分配給它的太差了，所以它應當靠侵佔英法勢力範圍來彌補自己所受到的損失。德國因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與凡爾賽和約結果而受到了嚴重的損失，便附和了日本

和意大利，要求擴大它在歐洲的領土，索還它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後爲戰勝國所奪去了的殖民地。三個侵略國底同盟便這樣開始形成起來。

用戰爭重新分割世界的問題，已提到日程上來了。

(二) 國際政治形勢的尖銳化，戰後和約

體系的崩毀，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開始

現在我把報告期內所發生的那些激起了新帝國主義戰爭的最重要事變，列舉一下。一九三五年，意大利實行侵犯阿比西尼亞，並把它佔領了。一九三六年夏，德意兩國實行武裝干涉西班牙，當時德國佔據了西班牙北部和西屬摩洛哥，而意國佔據了西班牙南部和巴列阿爾羣島。日本佔領東三省後，又於一九三七年侵入華北，佔據平津上海，並開始把它的那些外國競爭者從佔領區域裏排擠出去。德國在一九三八年初奪去了奧地利，而在一九三八年秋又奪去了捷克斯拉伐克底蘇台區。日本在一九三八年末佔領了廣州，而在一九三九年初又佔領了海南島。

於是，無形中臨到各國人民面前的戰爭，便捲入了五萬萬以上的人口，彌漫於廣闊的地面，從天津、上海和廣州起，經過阿比西尼亞，一直到直布羅陀海峽。

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後，戰勝國，主要是英法美三國，建立了新的國際關係制度，即戰後和平制度。這個制度底主要基礎在遠東是九國公約，而在歐洲便是凡爾賽條約及其他許多條約。

國際聯盟本來負有在這個制度範圍內，以各國統一戰線為基礎，以集體保護各國安全為基礎來調節各國相互關係的使命。可是，三個侵略國以及它們所開始的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却把這個戰後和平制度體系根本推翻了。日本撕毀了九國公約，德意撕毀了凡爾賽條約。爲了便於自由行動起見，這三個國家都退出了國際聯盟。

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已成爲事實了。

在我們這個時代，不顧各種條約，不顧社會輿論，而想一下子擺脫頸圈，逕直奔去開戰，是不很容易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很知道這一點。法西斯專權者也知道這點。因此，法西斯專權者在奔去開戰之前，便決定設法籠絡社會輿論，就是說，迷惑它，欺騙它。

德意結成軍事同盟反對英法在歐洲的利益麼？那裏有什麼同盟呢！「我們」並沒有什麼軍事同盟，而不過有一個毫無妨害的「柏林—羅馬軸心」，即一點兒幾何學的軸心公式罷了（笑聲）。

德意日結成軍事同盟反對美英法在遠東的利益麼？沒有的事！「我們」並沒有什麼軍事同盟，而不過有一個毫無妨害的「柏林—羅馬—東京三角形」，即是一點兒幾何學的玩藝罷了（全場大笑）。

反對英法美三國利益的戰爭麼？胡說！「我們」進行戰爭是要反對共產國際，而並不是反對這些國家。你不相信麼，請你讀一讀德日三國所締結的「反共產國際協定」吧。

侵略者老爺們就是想這樣來籠絡社會輿論的，雖然這明明是一套掩耳盜鈴的愚蠢把戲，因爲要在蒙古沙漠上，在阿比西尼亞叢山間，在西屬摩洛哥密林中去尋找共產國際底「策源地」，是很可笑的（笑聲）。

但戰爭是鉄面無情的。它是無論用什麼東西也掩蓋不了的。無論用什麼「軸心」、「三角形」和「反共產國際協定」，都掩蓋不了一件事實，就是日本在這個時期內強佔了中國很大一部分領土，意大利強佔了阿比西尼亞，德國強佔了奧地利和蘇台區，德意兩國共同強佔了西班牙，而且這都是違反着非侵略國利益來進行的。戰爭始終還是戰爭，侵略者軍事同盟始終還是軍事同盟，而侵略者始終還是侵略者。

新帝國主義戰爭底特點，就在它還沒有成爲普遍的世界的戰爭。現在進行戰爭的是侵略國，它們多方損傷着非侵略國底利益，首先是損傷英法美三國底利益，而後面這三個國家却實行退走，表示退却，給予侵略者接二連三的讓步。

於是，目前所發生的，便是損害非侵略國利益而公開實行重新分割世界和勢力範圍的戰爭，而非侵略國却絲毫也沒有企圖抵抗，甚至給予相當的協助。

這是很奇怪的，但這是事實。

爲什麼新帝國主義戰爭有這種奇怪的片面性質呢？

爲什麼擁有巨大能力的非侵略國，不加抵抗而就這樣輕易放棄了自己的陣地和自己的義務，去討好於侵略者呢？

這是不是由於非侵略國力量薄弱呢？當然不是！非侵略的民主的國家聯合起來，無論在經濟方面或軍事方面，都顯然要比法西斯國家強大得多。

既然如此，那末爲什麼這些國家對侵略者一貫實行讓步呢？

譬如說，這種情形也許可以用害怕革命的心理來解釋，因為非侵略國一旦加入戰爭，而戰爭又會成為世界性的戰爭，便會有革命爆發出來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當然知道，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已使革命在一個極大的國家裏獲得了勝利。他們害怕，第二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也會使革命在一個或幾個國家裏獲得勝利的。

但在目前，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在大多數非侵略國，首先是英法兩國，拒絕了集體安全的政策，拒絕了集體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而轉上了「不干涉的立場，轉上了「中立」的立場。

從表面上說來，也許可以把「不干涉政策估計成這樣：『讓每個國家隨自己的志願，按自己的能力去防禦侵略者吧，這與我們無干，我們要侵略國做生意，也要和被它們侵略的國家做生意』。但事實上，「不干涉政策是縱容侵略，展開戰爭，因而就是把它變成世界戰爭。在「不干涉政策中浸透有一種趨向，一種願望，就是不妨礙侵略國去幹它們的黑暗勾當，譬如說不妨礙日本糾纏於對華戰爭，更好是對蘇戰爭；譬如說不妨礙德國陷落於歐洲事務和糾纏於對蘇戰爭；讓一切交戰國都深深陷入戰爭深淵；暗中鼓勵它們這樣幹；讓它們彼此削弱，互相消耗；然後，當它們十分疲憊時，就帶着新鮮力量出台活動，當然是「爲了和平」來出台活動，迫使那些精疲力竭的交戰國來接受它們所提出的條件。

真是價廉物美呵！

例如拿日本來說吧。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開始侵入華北以前，英法一切有權威的報紙都大聲

疾呼地說，中國能力單薄，不能抵抗，而日本和它的軍隊是能在兩三個月內把中國征服的。然後，歐美的政治家就來等待觀望。後來，當日本開展了軍事行動時，他們就向日本讓出了外國資本在華的中心上海，讓出了英國影響在華南獨佔的基礎廣州，讓出了海南島，讓它來包圍香港。所有這些難道不很像是鼓勵侵略者說：你儘管深深陷進戰爭裏去，那時我們再看吧。

譬如又拿德國來說吧。他們把奧地利讓給了德國，雖然他們擔負有保護奧地利獨立的義務；他們讓出了蘇台區，違背所有一切義務而把捷克斯拉伐克拋棄不顧，然後就在報章上囂囂造謠說，「俄國軍隊軟弱無力」呵，「俄國空軍瓦解了」呵，蘇聯內部發生「騷亂」呵，這樣推動德國人更往東進，約許他們可能輕易獲得的勝利品，而勸告他們說：你們只要對布爾什維克開戰就是了，以後一切都會順暢的。必須承認，這也很像是推動侵略者，鼓勵侵略者哩。

英法報界和北美報界關於蘇維埃烏克蘭問題所發出的噪聲，也是值得注意的。這些報界人物聲嘶力竭地喊道：德國人正向蘇維埃烏克蘭進軍，德國人現在已掌握了約有七十萬人口的所謂喀爾巴阡烏克蘭，德國人至遲在本年春季，便會把人口三千多萬的蘇維埃烏克蘭併入所謂喀爾巴阡烏克蘭。這種形跡可疑的噪聲，目的顯然是要激起蘇聯對於德國的憤怒，散布有毒的空氣，挑撥我們去和德國發生沒有根據的衝突哩。

當然，在德國很有可能是有一些瘋子，夢想把一隻巨象，即蘇維埃烏克蘭合併到一隻蚊蟲，即所謂喀爾巴阡烏克蘭那裏去。如果德國真有這樣的瘋子，那末在我們國家裏是一定找得到必需數目的繩索來細綁這些瘋子的。（大鼓掌）。可是，如果不去理會瘋子，而轉過來問問常態的人，那末

要認真說把蘇維埃烏克蘭合併到所謂喀爾巴阡烏克蘭去，豈不顯然是愚笨可笑麼？你們只要設想一下：一隻蚊蟲跑到巨象面前，把雙手往腰裏一插，向它說道：「唉！我的小兄弟，我是多麼可憐你呀！你總是在這裏生活着，既沒有地主，又沒有資本家，既沒有民族壓迫，又沒有法西斯專權者，——這算什麼生活呢？我瞧着你時，不能不告訴你，除非合併到我這裏來，你是別無救藥的。」（全場大笑）。好吧，就這樣來作吧，我允許你把你這塊不大的領土合併到我這個廣闊無垠的領土上來。（全場大笑，鼓掌）。

更值得注意的，是歐美有些政治家和報界人物，對「向蘇維埃烏克蘭進軍」一事等待得不耐煩了，便自行揭露出不干涉政策底內幕。他們公開說道，並且是白紙黑字寫道：德國人太使他們「失望」了，因為德國人並沒有繼續東進去反對蘇聯，却折轉向西去索取殖民地了。可以設想：人家把捷克斯拉伐克各區奉送給德國人，本來是作為一種代價來換得德國人實行向蘇聯開戰這一義務的，而現在德國人却拒絕兌現，且叫他們遠遠滾開。

說到不干涉政策問題時，我絕不想來宣傳什麼道德，絕不想說什麼變節，背叛等等。如果向一些根本就不承認人類道德的人們去宣傳道德，那就幼稚了。政治終究是政治，正如那些老奸巨猾的資產階級外交家所說的一樣。可是必須指出，那些主張不干涉政策者所開始的巨大而危險的政治把戲，結果是會使他們自己遭受嚴重失敗的。

這就是現時流行的那個不干涉政策底真面目。

這就是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政治形勢。

(三) 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

戰爭在國際關係中造成了新的環境。它給這些關係帶進了驚惶不安和恐慌焦慮的空氣。戰爭打破了戰後和平制度底基礎，推翻了國際公法底起碼概念，結果便使國際條約和國際義務底價值發生了問題。和平主義和裁軍草案已被埋葬下去。代之而起的是擴大軍備的狂熱。所有一切大小國家都來擴大軍備了，其中尤以那些實行不干涉政策的國家爲最甚。現在誰都不復相信妄說慕尼黑會議上對侵略國所作的讓步和慕尼黑的協定開闢了「梭靖」時代新紀元的油滑言論了。甚至參加慕尼黑協定的英國和法國自己也不相信這種言論，而爭先恐後地加強起自己的軍備來了。

蘇聯當然不能不顧及到這些險惡的事變。侵略者所開始的任何一個戰爭，即令是在世界上某一個遙遠角落裏開始的一個不大的戰爭，顯然都是對於愛好和平國家的一種危險。至於把亞非歐五萬萬多人口捲入漩渦了的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當然是更其嚴重的一種危險了。因此，我國一方面始終不渝地實行着維護和平的政策，同時又極力加強了我們紅軍和我們紅海軍底作戰準備。

同時，蘇聯爲鞏固自己的國際地位起見，又決定採取了其他一些步驟。一九三四年末，我國加入了國際聯盟，因爲我國認爲國際聯盟雖屬軟弱，但總還可以作爲揭露侵略者的場所，作爲一種雖然薄弱，但總還可以阻礙戰爭瀾漫的和平工具。蘇聯認爲在這樣令人感覺不安的時候，甚至對於國際聯盟這樣一個軟弱的國際組織，也不應加以忽視。一九三五年五月，蘇聯與法國締結了互助公

約，以對付侵略者方面可能的侵犯。同時又與捷克斯拉伐克締結了同樣的條約。一九三六年三月，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締結了互助公約。一九三七年八月，蘇聯與中華民國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

在這樣困難的國際情形下，蘇聯實行着它的對外政策，堅持着維護和平的事業。

蘇聯底對外政策是明白而顯然的：

(1) 我們維護和平，並鞏固我國與世界各國間的業務聯繫，只要它們也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而不來試圖侵犯我國利益的時候，我們是始終都保持這個立場的。

(2) 我們對所有與蘇聯交界的鄰國，都保持和平親近善鄰的關係，只要它們也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而不來試圖直接或間接破壞我蘇維埃國家疆土完整安全利益的時候，我們是始終都保持這個立場的。

(3) 我們援助遭受侵略而為本國獨立奮鬥的民族。

(4) 我們不怕侵略者底恫嚇，而決計用雙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試圖侵犯蘇聯疆土安全的戰爭挑撥者底打擊。

這就是蘇聯底對外政策。(掌聲如雷，經久不息)。

蘇聯在其對外政策中所倚靠的是：

(1) 自己日益增長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實力；

(2) 我們蘇維埃社會在這義上政治上的一致；

(3) 我國各族人民底友誼；

(4) 自己的紅軍和紅海軍；

(5) 自己的和平政策；

(6) 切身需要保持和平的世界各國勞動者底精神援助；

(7) 由於某種原因而不願破壞和平的那些國家底審慎態度。

黨在對外政策方面的任務是：

(1) 今後也實行維護和平並鞏固我國與世界各國間業務聯系的政策；

(2) 小心謹慎，決不讓那些慣於假手他人而從中漁利的戰爭挑撥者把我國捲入衝突中去；

(3) 極力鞏固我國紅軍和紅海軍底戰鬥力量；

(4) 鞏固我們與需要國際和平友善的世界各國勞動者間的國際友誼聯系。

(二) 蘇聯底內部狀況

現在我們來說我國內部狀況。

從蘇聯內部狀況方面看來，報告時期是我國全部國民經濟更加高漲，我國文化更加發展，我國政治實力更加鞏固的時期。

在報告期內，國民經濟發展方面的最重要結果，便是工農業按現代新技術實行改造這一事業的完成。我國已經沒有，或幾乎已沒有什麼使用落後技術的舊工廠和使用古老農具的舊農戶了。現在構成我國工業和農業基礎的，是現代的新技術。可以毫無誇張地說：從生產技術方面看來，從工業底新技術裝備上看來，我國是比其他任何國家更為先進的國家，因為其他國家裏舊的裝備是懸在生產腳根上的累贅，阻礙着新技術的採用。

在報告期內，我國社會政治發展方面的最重要成績，便是剝削階級餘孽最終被消滅的事實，工農及智識份子團結為一個總的勞動戰線，蘇維埃社會在道義上政治上一致性的鞏固，我國各族人民友誼的鞏固，而結果便是我國政治生活的完全民主化，新憲法的成立。誰也不敢否認，我們的憲法是世界上民主的憲法，而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和各盟員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選舉底結果，便是最明顯的例證。

結果便是我國內部狀況十分穩定，我國政權異常鞏固，使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都比不上它。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關於我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具體材料。

(一) 工業與農業更進一步的高漲

(甲) 工業。我國工業在報告期內的進展，是一幅蒸蒸直上高漲的情景。這個高漲不僅反映着一般出產量底增長，而且首先反映着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工業底繁榮，另一方面是私有工業底滅亡。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間蘇聯工業增長情形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單位百萬盧布(按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價格計算)

全部生產品 四二,〇三〇 五〇,四七七 六二,一三七 八〇,九二九 九〇,一六六 一〇〇,三七五

其社會主義工業 四二,〇〇二 五〇,四四三 六二,一一四 八〇,八九八 九〇,一三八 一〇〇,三四九

中私有工業 二八 三四 二三 三一 二八 二六

與上年相較的百分數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對一九三八年
年的百分比

全部生產品 一一〇・一 一一三・一 一一三〇・二 一一一・四 一一一・三 二三八・八

其社會主義工業 一一〇・一 一一三・一 一一三〇・二 一一一・四 一一一・三 二三八・九

中私有工業 一二一・四 六七・六 一三四・八 九〇・三 九二・九 九二・九

		百 分 比					
全部生產品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九九・九三	九九・九三	九九・九六	九九・九六	九九・九七	九九・九七	
其中社會主義工業							
中(私有工業)	〇・〇七	〇・〇七	〇・〇四	〇・〇四	〇・〇三	〇・〇三	

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我國工業在報告期內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出產量底全部增長都是社會主義生產方面的增長。

其次，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社會主義體系是蘇聯工業中的唯一體系。

最後，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私有工業底最終滅亡，是瞎子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了。

私有工業底滅亡，並不是偶然的。第一，其所以滅亡，是因為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高超於資本主義的體系。第二，其所以滅亡，是因為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給了我們可能在幾年內就以現代新技術為基礎來把我們全部社會主義工業改造過來了。這樣的可能性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所沒有產生，而且也是它所不能產生的。事實是如此：從生產底技術方面看來，從工業生產底新技術裝備上看來，我國工業已佔全世界第一位。

若把我國工業發展速度和戰前水準作一百分數的比較，並把這種速度與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速度比較一下，便可看見如下的情景：

蘇聯工業發展情形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情形（一九一三至一九三八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蘇聯	一〇〇・〇	三八〇・五	四五七・〇	五六二・六	七三二・七	八一六・四	九〇八・八
美國	一〇〇・〇	一〇八・七	一一二・九	一二八・六	一四九・八	一五六・九	一二〇・〇
英國	一〇〇・〇	八七・〇	九七・一	一〇四・〇	一一四・二	一二二・九	一一三・三
德國	一〇〇・〇	七五・四	九〇・四	一〇五・九	一一八・一	一二九・三	一三一・六
法國	一〇〇・〇	一〇七・〇	九九・〇	九四・〇	九八・〇	一〇一・〇	九三・二

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我國工業與戰前水準相較，已增至九倍以上，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底工業却依然留在戰前水準周圍踏步不進，只超過戰前水準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這就是說，就發展速度來說，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已佔全世界第一位。

由此可見，就生產技術和我國工業發展速度來說，我們已經趕上並且超過了各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

我們究竟在那一方面還落後呢？我們是在經濟方面，即在我國工業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出產額方面仍然落後。我們在一九三八年出產了約近一千五百萬噸生鐵，而英國在一九三八年則只出產了七百萬噸。驟然看來，好像我們在這方面的情形要比英國好些。可是，若把這些噸數的生鐵拿來按人口平均分配一下，便可知道：在一九三八年，英國每人可以分得一百四十五個基羅格蘭姆的生鐵，

而蘇聯每人只能分得八十七個基羅格蘭姆。又如：英國在一九三八年出產了一千零八十萬噸的鋼和二百九十萬噸左右瓦特的電力（電力產量），而蘇聯出產了一千八百萬噸的鋼和三百九十萬多瓦特的電力。驟然看來，好像我們在這方面的情形要比英國好些。可是，若把這些噸數和瓦特拿來按人口平均分配一下，便可知道：在一九三八年，英國每人可以分得二百二十六個基羅格蘭姆的鋼和六百二十瓦特的電力，而蘇聯每人只能分得一百零七個基羅格蘭姆的鋼和二百三十三瓦特的電力。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就是因為我國人口比英國人口多幾倍，所以需要額也比英國多：蘇聯有一萬萬七千萬人口，而英國不過四千六百萬。在考察一國工業底經濟實力時，不要單看一般工業出產量，不顧及國內人口多少，而是要注意到工業出產量與國內每人消費額間的對比情形。一個國家按人口平均分配時落到每人份上的工業出產品愈多，這個國家底經濟實力也愈高，反過來說，一個國家按人口平均分配時落到每人份上的工業出產品愈少，這個國家和它的工業底經濟實力也愈低。所以，某一國家人口愈多，那末這個國家對於消費品的需要額也愈大，於是這個國家底工業出產量也應當愈大。

例如拿生鐵出產來說吧。爲要在生鐵出產方面，在經濟上超過英國（它的生鐵出產額在一九三八年是七百萬噸），那我們就要把我國每年生鐵冶煉量提高到二千五百萬噸。爲要在經濟上超過德國（它的生鐵出產額在一九三八年總共是一千八百萬噸），那我們就要把我國每年生鐵冶煉量提高到四千萬至四千五百萬噸。爲要在經濟上超過美國（此地不是拿危機年度的一九三八年水

準來說，當時美國只出產有一千八百八十萬噸生鐵；而是拿一九二九年度水準來說，當時美國有過工業高漲，出產有四千三百萬噸左右的生鐵，那我們就要把我國每年生鐵冶煉量提高到五千萬至六千萬噸。

關於鋼和展鐵底生產，關於機器製造業等等，也要這樣說，因為所有這些工業部門，也如其餘各部門一樣，歸根結底是依生鐵出產為轉移的。

我們在生產技術和工業發展速度方面已超過了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這當然很好。但是這還不夠。必須在經濟方面也超過它們。我們能夠做到這一步，而且我們應當做到這一步。只有當我們在經濟上也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時，我們才可希望我國有完全充足的消費品，有豐富的食品，那時我們就有可能實行從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第二階段。

爲要在經濟上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就需要有什麼呢？爲了這件事，首先就要有嚴重而堅決的前進志願，要有不惜坦受犧牲的決心，不惜拿出巨量建設基金來極力擴大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決心。我們有這種條件麼？當然有！其次，爲了這件事，就需要有高度的生產技術和高度的工業發展速度。我們有這種條件麼？當然有！最後，爲了這件事，就需要有時間。是的，同志們，要有時間。必須建築新工廠。必須給工業造就新幹部。可是，爲了這件事，就需要有時間，而且是需要有不少的時間。在兩三年以內，是不能在經濟上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爲了這件事，是需要有更多時間的。例如又拿生鐵及其出產來說吧。在生鐵出產方面，我們要有多少時間才可在經濟上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呢？在起草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國家計劃委員會舊成份中的某些工作人

員，提議把第二個五年計劃終結時的生鐵出產額，規定爲六千萬噸。這就是說，他們認爲生鐵冶煉額每年平均增加率，可能達到一千萬噸。這當然是一種幻想，甚至比幻想更壞。而且這些同志不僅是在生鐵出產方面沉於幻想。例如，他們認爲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蘇聯人口每年增加率應當是三四百萬，或且更多。這也是一種幻想，甚至比幻想更壞。可是，如果撇開幻想家而站在現實基地上來觀察問題，那末我們根據現時的冶煉技術狀況，便可以把生鐵冶煉額每年平均增加率，規定爲二百萬至二百五十萬噸，作爲完全可能的增加率。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史以及我國工業史都告訴我們，這樣的每年增加率雖很緊張，但却是完全可能達到的。

所以，要有時間，而且要有不少的時間，才可在經濟上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我國勞動生產率愈高，我國生產技術愈完善，我們也就能迅速實現這個最重要的經濟任務，也就能大大縮短實現這個任務的期限。

(乙)農業。在報告期內，農業也和工業一樣是按高漲路線發展了。這一高漲不僅表現於農業出產量底增加，而且首先表現於一方面是社會主義農業底增長和鞏固，另一方面是個體農民經濟底滅亡。集體農莊底穀物播種面積在一九三三年是七千五百萬海克脫，而在一九三八年則已增加到九千二百萬海克脫；同時個體農民底穀物播種面積從一千五百七十萬海克脫縮減到六十萬海克脫，即縮減到全部穀物播種面積千分之六。我還不去說技術作物播種面積，在這方面，個體農民經濟底作用已等於零了。此外，大家知道，現時已加入集體農莊的共有一千八百八十萬農戶，即佔全農戶總數百分之九十三點五，而集體漁場及其他集體營業場還沒有包括在內。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已最終地確立和鞏固，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已成為我國農業底唯一形式。若把報告期內各種農作物播種面積增加情形，和革命前播種面積比較一下，就可看見如下的情景：

蘇聯全國所有各種農作物播種面積（單位百萬海克脫）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一三年對比 (以百分數計算)
播種面積總數		一〇五・〇	一三一・五	一三二・八	一三三・八	一三五・三	一三六・九	一三〇・四
穀物的		九四・四	一〇四・七	一〇三・四	一〇二・四	一〇四・四	一〇二・四	一〇八・五
技術作物的		四・五	一〇・七	一〇・六	一〇・八	一一・二	一一・〇	二四四・四
其中 菜蔬瓜類的		三・八	八・八	九・九	九・八	九・〇	九・四	二四七・四
飼料的		二・一	七・一	八・六	一〇・六	一〇・六	一四・一	六七・四

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我國所有一切農作物播種面積都增加了，尤其是飼料，技術作物和菜蔬類的播種面積增加了。

這就是說，我國農業已成為更完善，更富於出產能力的農業，而正確輪種制的採用已有更實際的基礎。

我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所有的拖拉機、康拜因機及其他各種機器數量在報告期內增加情形怎樣呢，——以下的統計表便可回答這個問題：

(1) 蘇聯農業中拖拉機數目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與 1933年對 比(以百分 數計算)
拖拉機總數	210.9	276.4	360.3	422.7	454.5	438.5	229.3
其中：							
(甲)農業機器站中的	123.2	177.3	254.7	338.5	365.8	394.0	319.8
(乙)蘇維埃農莊和輔助農場中的	83.2	93.6	102.1	88.5	84.5	85.0	102.2
(乙)農莊中的							
全部拖拉機馬力	3,203.2	4,462.8	6,134.0	7,672.4	8,865.0	9,356.2	288.4
其中：							
(甲)農業機器站中的	1,758.1	2,768.9	4,281.6	6,856.0	6,679.2	7,437.0	423.0
(乙)蘇維埃農莊和輔助農場中的	1,401.7	1,669.5	1,861.4	1,730.7	1,647.5	1,761.8	125.0

(2) 蘇聯農業中康拜因機及其他機器數目

(單位千架；以年底為標準)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比(以百分 數計算)
康拜因機	26.4	32.3	50.3	87.8	123.8	153.5	604.3
內燃發動機和 蒸汽發動機	43.0	60.9	69.1	72.4	77.9	83.8	174.6
各式和牛馬 式的打穀機	120.3	121.9	120.1	123.7	126.1	130.8	108.7
載重汽車	26.6	40.3	63.7	96.2	144.5	193.8	736.1
輕便汽車(每位一輛)	3,991	5,583	7,555	7,630	8,156	9,594	240.4

除這些數目字而外，如果還注意到在報告期內，我國農業機器站總數從一九三四年的二千九百處增加到一九三八年的六千三百五十處的事實，那末根據這些數目字，便可確信地說，我國農業以現代新技術為基礎的改造，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於是，我國農業與任何一國農業相較，不僅是規模最大和機械化程度最高，即商品產額最大的農業，而且是現代技術裝備最充足的農業。

若把報告期內穀物和技術作物出產量增長情形，和革命前時期比較一下，就可看見如下的情景：

蘇聯全國穀物和技術作物出產總量（單位：百萬公担）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一三年對比 (以百分數計算)
穀物	八〇一・〇	八九四・〇	九〇一・〇	八二七・三一	二〇二・九	九四九・九	一一八・六
棉花(生棉)	七・四	一一・八	一七・二	二二・九	二五・八	二六・九	三六三・五
亞麻(纖維)	三・三	五・三	五・五	五・八	五・七	五・四六	一六五・五
糖蘿蔔	一〇九・〇	一一三・六	一六二・一	一六八・三	二一八・六	一六六・八	一五三・〇
油類植物	二一・五	三六・九	四二・七	四二・三	五一・一	四六・六	二一六・七

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雖然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八年在東部各區和東南各區有過旱災，雖然一九一三年有過空前豐裕的收成，可是我國穀物和技術作物在報告期內每年出產總量，比之一九一三年水準，還是不斷地向上增長了。

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穀物生產中的商品額問題，是值得特別注意的。據著名統計學家斯蒙啓諸夫同志計算，在戰前時期，從五十萬萬普特的穀物出產總量中拿到市場上出賣的穀物，不過一

十三萬萬普特左右，即估當時穀物出產總量百分之二十六。同時，據昂蒙啓諾夫同志計算，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這種大規模生產中的商品額，例如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約佔出產總量百分之四十七，而個體農民經濟中的商品額約佔百分之十二。如果更謹慎地觀察這個問題，把一九三八年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中的商品額算作出產總量百分之四十，那末結果就是這樣：我國社會主義穀物業能夠供給，而且在本年度內確實供給了二十三萬萬普特左右的商品穀物，即比戰前穀物生產中的商品額多過十萬萬普特。

所以，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生產中的高度商品額，是它的最重要的特點，對於國家供給有莫大的意義。

正因為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有這個特點，所以我國能很容易而迅速地解決了穀物問題，解決了為我們這個龐大國家充分供給商品穀物的問題。

應當指出，在最近三年以來，我國每年採辦的穀物數量始終沒有降到十六萬萬普特以下，有時候，例如在一九三七年間，甚至增加到十八萬萬普特。如果更加上國家每年所收買的二萬萬普特左右的穀物，以及集體農民經過集體農莊穀物貿易路線所賣出的數萬萬普特穀物，那末我們便可得出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所提供的上述商品穀物總數。

其次，還要指出，最近三年以來，商品穀物底根據地已從一向號稱我國穀倉的烏克蘭移到了北部和東部，即是移到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大家知道，最近兩三年以來，烏克蘭每年採辦的穀物將近四萬萬普特，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每年採辦的商品穀物等於十

一萬萬至十二萬萬普特。

這就是穀物出產方面的情形。

至於養畜業，那末在這個最落後的農業部門中，最近幾年來也表現出重大的進展。固然在養馬業和畜羊業方面，我們還落後於革命前的水準，可是在養牛業和養豬業方面，我們已超過了革命前的水準。

下面便是這方面的統計：

蘇聯全國所有牲畜數目（單位百萬頭）

以每年七月為標準

	1916年(按調查結果)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與1916年(按調查結果)對比(以百分數計算)	1938年與1933年對比(以百分數計算)
馬匹	35.8	16.6	15.7	15.9	16.6	16.7	17.5	48.9	105.4
牛	80.6	88.4	42.4	49.2	56.7	67.0	63.2	104.8	104.6
騾、牛和山羊	121.2	50.2	51.9	61.1	73.7	81.3	102.5	84.6	204.2
豬	20.9	12.1	17.4	22.5	30.5	22.8	30.6	146.4	252.9

養馬業和畜羊業部門的落後情形，顯然是在最短期間就會消滅的。

(丙) 商品流轉與運輸業。隨着工業和農業的高漲，我國商品流轉額也增長了。在報告期內，

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底零售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底零售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八。集體農莊市集貿易額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一十二。

下面便是相當的統計：

	商 品 流 轉 額						1938年與 1933年對 比(以百分 數計算)
(1)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底 零售額(商店與貨棧)—— 以年底為標準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285,355	286,236	288,713	289,473	327,361	356,980	125.1
(2)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底 零售額(包括公共飲食在 內)——以年底為標準	49,789.2	61,814.7	81,712.1	106,760.9	125,913.2	136,674.8	278.3
(3)集體農莊市集貿易額——以 年底為標準	14,500.0	14,000.0	14,500.0	15,607.2	17,739.7	24,399.2	212.2
(4)食品工業、輕工業、重工 業、木材業等人民委員會 及各盟員共和國地方工業 人民委員會所產各商品 批發——以年底為標準	718	836	1,141	1,793	1,912	4,994	277.7

我國商品流轉額，假如沒有運輸業轉運額底相當增加，當然是不會這樣擴展起來的。的確，在報告期內，所有各種運輸業方面的轉運額都增加了，特別是鐵路運輸業和航空運輸業方面的轉運額

增加了。水上運輸業方面的轉運額也有增加，不過增加得很不平整，而一九三八年水上運輸業方面的轉運額，可惜還比上年減低了一些。

下面便是相當的統計：

	轉 運 額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與1933 年對比(以百 分數計算)
鐵道運輸(單位十萬 噸哩)	169.6	206.7	266.1	323.4	354.8	369.1	217.7
內河與海洋運輸(單位 十萬噸哩)	60.2	66.6	68.3	72.3	70.1	66.0	131.5
民用航空運輸(單位百 萬噸哩)	3.1	6.4	9.3	21.9	24.9	31.7	1,032.6

一九三八年水上運輸業稍許落後的情形，顯然是在一九三九年就會消滅的。

(二) 人民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更進一步的提高

工業和農業的繼續高漲，當然不能不引起，而且真正引起了人民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更進一步的改善。

剝削制的消滅，社會主義體系在國民經濟中的鞏固，失業現象以及與其相連的城鄉貧困情形的絕

跡，工業大規模的擴展，工人數量的不斷的增加，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土地永遠留歸集體農莊使用，集體農莊獲得巨量頭等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的供給，——這一切都造成了工農物質狀況更進一步提高的實際條件。工農物質狀況的改善，自然又使構成我國重大力量而為工農利益服務的智識份子底物質狀況改善起來。

現在，問題已經不是要怎樣想點辦法，發點慈悲心，為那些拚命逃出農村，忍飢受餓，無工可作，無家可歸的農民在工業中找點工做了。這樣的農民在我國早已沒有了。這當然是很好的，因為這是我國農村生活豐裕的明證。現在的問題只能是勸集體農莊尊重我們的請求，每年供給我們至少一百五十萬左右的青年莊員，來滿足我們工業發展方面的需要。過着豐裕生活的集體農莊莊員應當知道，如果沒有他們方面的這種幫助，便很難繼續擴展我們的工業，如果工業不擴展，我們便不能滿足農民對於日常消費品的日益增長的需求。集體農莊完全能夠滿足我們的這個請求，因為集體農莊有豐富的技術，能解放農村中一部分人的工作，這些人一移轉到工業中來，就能給我們全部國民經濟莫大的幫助。

總結起來，在報告期內，我們在改善工農物質狀況方面便有如下的成績：

(1) 國民收入在一九三三年等於四百八十五萬萬盧布，而在一九三八年則已增加到一千零五十萬萬盧布；

(2) 工人和職員數目在一九三三年是二千二百餘萬人，而在一九三八年則已增加到二千八百萬人；

(3) 工人和職員全年工資基金已由三百四十九萬五千三百萬盧布，增加到九百六十四萬二千五百萬盧布；

(4) 工業工人每年平均工資在一九三三年是一千五百一十三個盧布，而在一九三八年則已增加到三千四百四十七個盧布；

(5) 集體農莊底貨幣收入在一九三三年是五十六萬六千一百九十萬盧布，而在一九三七年則已增加到一百四十一萬八千零十萬盧布；

(6) 穀物區內每年平均發給每個集體農戶的穀物在一九三三年是六十一個普特，而在一九三七年則已增加到一百四十四個普特，並且種子和保險種子存額，公共牲畜飼料存額，對於國家的穀物交納，對於農業機器站工作的實物報酬等，尙不計算在內；

(7) 國家按預算支出舉辦社會文化設施的款項，在一九三三年等於五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萬盧布，而在一九三八年則已增加到三百五十二萬零二百五十萬盧布。

同時，人民底文化狀況也隨人民底物質狀況提高而提高了。

從人民底文化發展方面看來，報告時期真正是文化革命底時期。普通初級義務教育制用蘇聯各民族語言的實現，各級學校與學生數目的增加，畢業於高級學校的專門家數目的增加，新的蘇維埃的智識界的養成和鞏固，——這就是人民文化程度高漲底一般情景。

下面便是相當的統計：

(1) 人民文化水準增高的情形

指 標	計算單位	1938-1939年度 1934年度	1938-1939年度 1934年度	1938-1939年度與 1933-1934年度增 長(以百分數計算)
各級學校學生總數	單位千人	23,814	33,965.4	142.6
其中：				
(甲)受初等教育者	單位千人	17,873.5	21,288.4	119.1
(乙)受中等普通教育和中等專門教育者	同上	6,482.2	12,076.0	220.3
(丙)受高等教育者	同上	458.3	601.0	131.1
蘇聯所有的學習人數(包括一切學習方式)	同上	—	47,442.1	—
我國圖書館數目	單位千所	40.3	70.0	173.7
其中讀者數目	單位百萬册	86.0	126.6	147.2
俱樂部式的機關數目	單位千所	61.1	96.6	156.5
戲院數目	單位一所	537	790	134.6
電影戲(放映微小影片者除外)	單位一部	27,467	30,461	110.9
其中放映有聲片者	同上	498	15,202	增31倍
農村中電影機數目(放映微小影片者除外)	同上	17,470	18,991	108.7
其中放映有聲片者	同上	24	6,670	增278倍
報紙每年銷數	單位百萬份	4,984.6	7,092.4	142.3

(2)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蘇聯新建學校數目

	城市及市鎮地方 的學校數目	鄉村地方 的學校數目	學校數目總計
一九三三年	三二六	三,二六一	三,五八七
一九三四年	五七七	三,四八八	四,〇六五
一九三五年	五三三	二,八二九	三,三六二
一九三六年	一,五〇五	四,二〇六	五,七一十
一九三七年	七三〇	一,三二五	二,〇五三
一九三八年	五八三	一,二四六	一,八二九
一九三三至一九 三八年的總數	四,二五四	一六,三五三	二〇,六〇七

(3)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間畢業於高級學校的年輕專家人數(單位一千)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蘇聯全國每年畢業專家人數(軍事專家除外)	三四·六	四九·二	八三·七	九七·六	一〇四·八	一〇六·七
(1) 工業和建築業工程師	六·一	一四·九	二九·六	二九·二	二七·六	二五·二
(2) 運輸和郵電業工程師	一·八	四·〇	七·六	六·六	七·〇	六·一
(3) 農業機械化工程師， 農學家，獸醫以及動 物飼養家	四·八	六·三	八·八	一〇·四	一一·三	一〇·六
(4) 經濟工作人員和律師	二·五	二·五	五·〇	六·四	五·〇	五·七
(5) 中學，工人速成中學， 中等實業學校教員以及 其他教育工作人員(包 括藝術工作人員在內)	一〇·五	七·九	一二·五	二一·六	三一·七	三五·七
(6) 醫生，藥劑師及體育 工作人員	四·六	二·五	七·五	九·二	一二·三	一三·六
(7) 其他專家	四·三	一一·一	一二·七	一四·二	九·九	九·八

由於這一切大規模的文化工作的結果，在我國誕生和形成了人數衆多的新的蘇維埃的智識份子，他們都是從工人階級、農民和蘇維埃職員中間出身，與我國人民血肉相連，根本不知剝削制的羈絆爲何物，仇恨剝削者，並決計忠誠服務於蘇聯各族人民的。

我認爲，這個新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智識界之誕生，就是我國文化革命底最重要成果之一。

(三) 蘇維埃制度更進一步的鞏固

報告時期中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我國內部狀況更進一步的穩固，蘇維埃制度更進一步的鞏固。而且事實上也不能不是如此。社會主義體系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的確立，工業和農業的高漲，勞動者物質狀況的增進，民衆文化程度的提高，民衆政治積極性的增長，——所有這一切都是蘇維埃政權領導下實現的，結果也就不能不引起蘇維埃制度更進一步的鞏固。

現時蘇維埃社會與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蘇維埃社會裏已沒有什麼彼此對抗敵視的階級了，剝削階級已被消滅了，而構成蘇維埃社會的工人、農民和智識份子是在友愛合作基礎上生活和工作着。現在，資本主義社會正被工人和資本家間，農民和地主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所撕裂着，使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情況動搖不穩，而我們的免除了剝削制羈絆的蘇維埃社會，却根本沒有這種矛盾，沒有階級衝突，而表現爲一幅工人、農民以及智識份子友愛合作的圖畫。在這種共同性的基礎上，也就有蘇維埃社會在道義上政治上的一致，蘇聯各族人民友誼，蘇維埃愛國主義這樣的動力擴展了起來。在同一基礎上，又產生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所通過的蘇聯憲法，以及

我國各最高機關選舉制完全民主化的事實。

至於我國最高機關底選舉，那就要指出它是構成我國內部狀況特徵的蘇維埃社會統一，以及蘇聯各民族人民友誼關係光輝燦爛的表示。大家知道，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時，幾乎有九千萬個選舉人，即佔所有參加了選舉的人數百分之九十八點六，是投票擁護共產黨人和非黨份子聯盟的，而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選舉各盟員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時，有九千二百萬個選舉人，即佔所有參加了選舉的人數百分之九十九點四，是投票擁護共產黨人和非黨份子聯盟的。

這就是蘇維埃制度堅強鞏固，蘇維埃政權力量源源不絕的基礎和根源。

這就是說，在戰爭一旦爆發時，我國軍隊底後方和前線，由於性質單純和內部統一的關係，一定會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更加鞏固，這是國外那些愛鬧軍事衝突者所應當牢牢記住的。

國外某些報界人物胡言亂語，硬說我們把間諜，兇手和暗害者，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伽米涅夫，雅基爾，屠哈切夫斯基，羅津果里茨，布哈林及其他暴徒從蘇維埃組織中清除出去，便「動搖了」蘇維埃制度，引起了「瓦解」。這種粗鄙的廢話是只應受到恥笑的。把蘇維埃組織中的暗害份子和敵人份子清除出去，這怎麼會能動搖和瓦解蘇維埃制度呢？托洛茨基份子和布哈林份子這一小夥間諜，兇手與暗害者，是在外國面前奴顏婢膝的賤人，是在每一個外國官老爺面前匍匐伏跪拜，甘願投奔到他那裏去擔任間諜勤務的奴才，他們不懂得每一個擺脫了資本枷鎖的最平常蘇維埃公民，都比國外任何一個背着資本主義奴隸制枷鎖的大官顯宦高出萬萬，——這樣一個小得可憐的賣國奴匪幫，試問誰人需要呢，他們對於人民能有什麼價值呢，他們能「瓦解」什麼人呢？一九三七

年，判決槍斃了屠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烏波列維奇及其他暴徒。隨後，我們就舉行了蘇聯最高蘇維埃底選舉。選舉中所有參加投票人數百分之九十八點六，是投票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一九三八年，判決槍斃了羅津果里茨，李可夫，布哈林及其他暴徒。隨後，我們就舉行了各盟員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底選舉。選舉中所有參加投票人數百分之九十九點四，是投票擁護蘇維埃政權的。試問這裏有什麼「瓦解」的表現呢，為什麼這個「瓦解」沒有在選舉結果中反映出來呢？

假如聽信外國這些胡說八道的人，那就可以得出結論說：如果我們讓間諜，兇手和暗害份子逍遙法網，任憑他們進行暗害勾當，行兇殺人和從事間諜活動，那末蘇維埃組織就會更堅強穩固得多了（笑聲）。這些老爺們如此厚顏辯護間諜，兇手和暗害份子，豈不是把自己的黑幕暴露得太早了麼？如果說，從蘇維埃組織中肅清間諜，兇手和暗害份子，必定會而且真正引起了這些組織更進一步的鞏固，豈不是較為正確麼？

舉例說，哈桑湖事件豈不是證明從蘇維埃組織中肅清間諜和暗害份子，正是鞏固這些組織的最可靠的辦法麼？

黨在國內政策方面的任務是：

（1）繼續加緊發展我國工業，繼續加緊提高勞動生產率，繼續加緊完善生產技術，使我們在生產技術和工業發展速度方面已經超過了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水準的蘇聯，能於最近將來十年至十五年間在經濟上也超過它們。

(2) 繼續加緊發展我國農業和養畜業，以求在最近將來三四年中把每年穀物產額提高到八千萬萬普特，把每個海克脫底平均收成率增加到十二至十三公擔，把技術作物產額平均增加百分之三十三至三十五，把羊和豬的數目增加一倍，把牛的數目增加百分之四十，把馬的數目增加百分之三十五。

(3) 繼續改善工人、農民和智識份子底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

(4) 始終一貫地實施我國社會主義憲法，徹底實現我國政治生活民主化，鞏固蘇維埃社會在道義上政治上的一致，工人、農民及智識份子間的友愛合作；極力鞏固蘇聯各族人民底友誼，發展和培植蘇維埃愛國主義。

(5) 不要忘記資本主義包圍存在的事實，而要時刻記住，外國偵探機關將繼續派遣間諜、兇手和暗害份子到我們國家裏來，必須記住這一點，並加強我國社會主義的偵探機關，有系統地幫助它粉碎和剷除人民公敵。

(三) 聯共(布)更進一步的鞏固

從政治路線和日常實際工作方面看來，報告時期是我們黨的總路線完全勝利的時期。(熱烈鼓掌，經久不息)。

社會主義體系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確立，工農業在新技術基礎上改造事業的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的先期完成，每年穀物產額提高到七十萬萬普特的水準，貧困和失業現象的消滅，人民

物質文化狀況的提高，——這便是表明我們黨政策正確，表明我們黨領導正確的基本成績。

在這些偉大成績面前，我們黨總路線底一切敵人，各種各樣「左傾的」和「右傾的」派別，所有一切蛻化變節的份子，即托洛茨基份子和皮達可夫份子，布哈林份子和李可夫份子，不得不把身子縮緊，隱藏他們的陳腐「政綱」，而轉到秘密活動。他們沒有順從人民意志的勇氣，寧願與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以及法西斯蒂打成一片，去替外國偵探機關服務，受僱爲間諜，並担任幫助蘇聯底敵人來分裂我們的國家，來在我國恢復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

這就是反對我們黨路線而後來已變成了人民公敵的那些人所遭到的可恥的結局。

粉碎了人民公敵並肅清了黨組織和蘇維埃組織中的變節份子之後，黨在它的政治和組織工作上更加一致了，它更加緊密團結在它的中央委員會周圍了。（熱烈鼓掌。全體代表起立向報告人致敬。高呼：「烏啦！斯大林同志萬歲！斯大林同志萬歲！我們黨底中央委員會萬歲！烏啦！」）現在，我們就來看看表明黨內部生活發展，黨在報告期內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情形的具體材料。

（二）改善黨成份的辦法。把組織單位分

小。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工作

在報告期內，黨和它的領導機關底鞏固，首先是從兩方面實現的：一方面是調節黨底成份，排除不可靠的份子而選擇優秀的份子；另一方面，便是把組織單位分小，把個別組織底範圍縮小，並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切實具體的工作。

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是代表着一百八十七萬四千四百八十八個黨員。如果把這個數目和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所代表的黨員數目比較一下，便可以看出，從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至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時期，黨內增加了六十萬個新黨員。黨不能不感覺到，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三年的條件下，這樣大批的人加入黨，是它的成份上的一種不健全和不適宜的擴充。黨知道，加入黨的不僅有真誠忠實的人，而且也有一些偶然的份子，也有一些企圖利用黨旗幟來謀個人目的的野心份子。黨不能不知道，它的堅強不僅要靠自己黨員底數量，而首先要靠自己黨員底質量。於是就提出了調節黨成份的問題。當時決定把一九三三年就開始了的清洗黨員和候補黨員的工作繼續進行下去，而這個工作便確實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五年五月為止。其次，黨又決定停止接受新黨員入黨，而這個辦法便確實一直繼續實行到一九三六年九月為止，接受新黨員入黨的工作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才恢復起來。其次，基洛夫同志慘遭兇殺事件證明黨內有不少的可疑份子，於是當時決定實行審查和調換黨證，這兩項工作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方告結束。只是在此以後，黨才宣佈接受新的黨員和候補黨員。由於實行這一切辦法的結果，黨從它的隊伍中間肅清了那些偶然，消極，圖謀私利和直接敵對的份子，而選拔了最堅定最忠實的人。決不能說，在實行這個清洗時沒有犯過嚴重的錯誤。所犯的錯誤，可惜竟比原來所能預料的還多。毫無疑義的，我們今後無須再來採用大批清洗的方法。可是，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的清洗終究是必不可免的，而且它在基本上提供了良好的結果。本屆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代表着將近一百六十萬個黨員，即比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時少了二十七萬個黨員。但這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恰巧相反，這正是向好的方面進展的現象，因為黨是靠

清除惡劣份子而鞏固起來的。現在我黨按黨員數量說雖減少了一些，但按質量說却更加優良了。這是個重大的成績。

至於改善日常的黨的領導工作，使其更接近於下層工作，使其更加具體化，那末黨就認為把組織單位分小，把個別組織底範圍縮小的辦法，是使黨機關易於領導這些組織，並使領導工作本身成為更具體，更生動，更切實的最好的辦法。把組織單位分小的辦法，不僅在各人民委員部方面，而且在行政區域組織方面，即在各盟員共和國，各邊疆，各省和各區等方面都實行過了。由於實行各種設施的結果，我們現在所有的已經不是七個盟員共和國，而是十一個盟員共和國，不是十四個蘇聯人民委員部，而是三十四個蘇聯人民委員部，不是七十個邊疆和省，而是一百一十個邊疆和省，不是二千五百五十九個市區和鄉區，而是三千八百一十五個市區和鄉區。同時與此相應的，是我們現時在黨領導機關系統中總共有十一個以聯共（布）中央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六個邊疆委員會，一百零四個省委員會，三十個州委員會，二百一十二個城市委員會，三百三十六個市區委員會，三千四百七十九個鄉區委員會，十一萬三千零六十個初級的黨組織。

決不能說，把組織單位分小的工作已經完竣了。把組織單位分小的工作，多半還會繼續進行下去。可是，無論如何，它在改善日常的領導工作方面，以及使領導本身更接近於下層具體的工作方面，都產生了良好的結果。我還不去說，把組織單位分小的辦法，已經幫助我們提拔了成百成千個新的人材來擔任領導工作。

這也是一個重大的成績。

(二) 挑選幹部，提拔幹部，佈置幹部

調節黨成份，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具體的工作，這並不是，而且也不能是更進一步鞏固黨及其領導的唯一辦法。在報告期內所實行的另一個鞏固黨的辦法，就是根本改善對於幹部的工作，改善挑選幹部、提拔幹部、佈置幹部以及在工作過程中審查幹部的事情。

黨底幹部是黨底指揮人員，並且因為我們黨是執政的黨，所以他們也就是國家領導機關底指揮人員。在實踐中考驗過了正確的政治路線規定後，黨底幹部就成為黨領導和國家領導方面的決定力量。具有正確的政治路線，當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這還不夠。正確的政治路線並不是用來裝飾門面，而是要實現起來的。爲了實現正確政治路線，就需要有幹部，就需要有懂得黨底政治路線，把它當作自己的路線來接受，決意把它實現起來，善於切實把它實現起來，能夠對它負責，能夠保護它，能夠爲它而奮鬥的人材。沒有這個條件，正確的政治路線就不免要化爲紙上空文了。在這裏也就發生了正確挑選幹部，培養幹部，提拔新材，正確佈置幹部以及按其所作的的工作來審查幹部的問題。

正確地挑選幹部，是什麼意思呢？

正確地挑選幹部，這並不是說爲自己找幾個代理人和助手，成立一個辦公廳，從那裏發出各種指令來。（笑聲）。這也不是說濫用自己的職權，毫無意思地把幾十人幾百人從甲處調到乙處，又從乙處調到甲處，進行沒有止境的「改組」。（笑聲）。

正確地挑選幹部，這就是說：

第一，要重視幹部，把他們視為黨和國家底寶貴基金，愛護他們，尊重他們。

第二，要知道幹部，細心考查每一個幹部人員底優點和缺點，知道他究竟是在怎樣的職位上能最容易發揮他的才幹。

第三，要細心培養幹部，幫助每一個發展着的工作人員向上升進，不惜花費時間去「照顧」這樣的工作人員，並加速他們的發展。

第四，要及時和大膽提拔新起的年輕幹部，不讓他們永遠停滯在一個地方，不讓他們冷淡下去。

第五，要這樣按職位來佈置各個工作人員，使得每一個人都感覺自己處在適當的位置上，使得每一個人都把他個人所有的能力最高限度供獻於我們共同的事業，使得幹部佈置工作底一般方向，完全適合於它所應促進其實現的那個政治路線底要求。

這裏特別重要的，是大胆和及時提拔新起年輕幹部的問題。我覺得我們還有一些人不十分明白這個問題。有一部分人認為在挑選幹部時主要是應注重老幹部。反之，另一部分人認為主要是應注重年輕幹部。我覺得這兩種意見都是錯誤的。老幹部當然是黨和國家底一筆大財富。他們擁有年輕幹部所沒有的東西，即領導方面的豐富經驗，馬列主義的原則鍛鍊，深諳事理的知識，確定方向的能力。可是第一，老幹部通常是比所需要的數量少，而且由於宇宙自然法則的關係，他們已部分地開始衰老死亡下去。第二，在老幹部中，有些人喜歡拘泥於已往，拘守過去的東西，拘守舊的東西，而看不見實際生活中的新東西。這就叫做喪失對於新事物的知覺。這是個很嚴重而危險的缺

點。至於年輕幹部，他們當然沒有老幹部所具備的那種經驗，鍛鍊，深諳事理的知識和確定方向的能力。可是第一，年輕幹部佔絕大多數；第二，他們年輕，所以暫時還遭遇不着衰老死亡的危險；第三，他們具有很充足的對於新事物的知覺，而這乃是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工作者底寶貴品質；第四，他們長進得和開明得很快，他們向上飛奔得很快，所以在不遠的將來，就會趕上老幹部，與他們齊肩並立，並不愧成為他們的替班。所以，任務並不是要注重老幹部或注重年輕幹部，而是要力求把老幹部和年輕幹部配合起來，結合在黨和國家領導工作的總的合奏樂隊中。（鼓掌多時）。

正因為如此，所以必須及時地和大膽地提拔年輕幹部來擔任領導的職務。

在報告期內，黨在鞏固黨的領導工作方面重大的成績之一，就是它在挑選幹部時，正是自下至地上地，成效卓著地實行了這個配合老工作者和年輕工作者的方針。

在黨中央裏有許多材料可以證明，在報告期內，黨提拔了五十多萬個年輕的黨員布爾什維克和非黨員布爾什維克，來擔任國家和黨的領導職務，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以上是婦女。

現在的任務是什麼呢？

現在的任務就是要把各級機關挑選幹部的工作完全集中起來，並把它提到應有的，科學的，布爾什維主義的高度。

為此就要剷除那把考查，提拔和挑選幹部的工作分散於各部各科的現象，而要把它集中於一處。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幹部局，以及每一個共和國、邊疆和省黨組織中的相當的幹部部，便應當成為這一工作集中之處。

(三) 黨的宣傳工作。用馬列主義教育黨員和黨幹部

黨在報告期內藉以實行鞏固本黨及其領導機關的，還有一個工作部門，且是很重要很負責的工作部門，這就是黨的口頭的和刊物的宣傳鼓動，就是用馬列主義精神教育黨員和黨幹部，提高黨及其工作人員底政治和理論水準的工作。

關於黨宣傳事業，關於用馬列主義教育我們工作人員的事業有最嚴重意義的問題，顯然用不着說明。我在這裏所指的，不僅是黨機關中的工作人員，而且包括青年團，職工會，商業機關，合作社，經濟機關，蘇維埃，教育機關，軍事機關及其他機關中工作人員在內。調節黨成份，以及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工作的事情，儘可辦得滿意；提拔幹部、挑選幹部和佈置幹部的事情，儘可辦得滿意；儘可把這一切都辦得很好，但如果我們黨的宣傳工作因某種原故而跛起腳來，如果用馬列主義教育我們幹部的事業衰弱下去，如果我們提高這些幹部底政治和理論水準的工作削弱下去，而這些幹部本身又因此而不再關心我們向前進展前途，不復瞭解我們事業底正確性，而變成一些茫無前途，盲目式和機械式執行上級指示的事務主義者，那末我們全部國家的和黨的工作，也就一定會衰弱下去。

在國家工作和黨工作任何一個部門中，工作人員底政治水準和馬列主義覺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底結果也愈有效力；反過來說，工作人員底政治水準和馬列主義覺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誤和失敗也愈多，工作人員本身也會愈加變為鼠目寸光的小人，墮落成爲一些只圖眼前利益的事務主義者，而他們也就愈易蜕化變節，——這要算是一個定理。可以

大膽地說：如果我們能把我們所有各工作部門中的幹部人員在思想上造就到這樣的程度，在政治上把他們鍛鍊到這樣的程度，使得他們能夠隨時認清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如果我們能把他們造成爲十分成熟的馬列主義者，使得他們能夠解決國家領導問題而不犯什麼嚴重錯誤，那末我們就有一切根據，認爲我們所有的問題十分之九都已經解決了。而這個任務，我們是絕對能夠解決的，因爲我們有解決這個任務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和條件。

我們的年輕幹部底培養和形成，通常都是按着個別科學部門和技術部門，按着各個專門知識來進行的。這是必要而且適當的。沒有什麼必要使得一位醫學專家，同時又是一個物理學專家或植物學專家；反過來說也是一樣。但有一個科學部門的知識，却是所有一切科學部門中的布爾什維克所必須具備的，這就是馬列主義關於社會、社會發展規律、無產階級革命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規律以及共產主義勝利的科學。那種局限於自己的專門知識，譬如說局限於數學、植物學或化學，而除了自己的專門知識以外，再也看不見其他什麼東西的人，雖然他們自稱爲列寧主義者，也決不能視爲真正列寧主義者的。列寧主義者決不能僅僅是他自己所喜愛的那門科學的專家，他同時還應當是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積極關懷本國命運，通曉社會發展規律，善於運用這些規律，並力求成爲積極參加國家政治領導工作的人。當然，這對於布爾什維克專家是一種附加的負擔。但這是有出息的一種負擔。

黨的宣傳工作的任務，用馬列主義教育幹部的任務，就是要幫助我們所有各工作部門中的幹部人員精通馬列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

關於宣傳工作和用馬列主義教育幹部的工作改善辦法問題，是聯共（布）中央吸收各省黨組織中宣傳員來參加討論過多次的問題。當時注意到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出版的事實，當時認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出版，奠定了我國馬列主義宣傳工作更進一步高漲的始基。聯共（布）中央工作底結果，是在它論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之出版和黨的宣傳工作進行的辦法這一有名決議中公布的。

聯共（布）中央根據這個決議，並注意到聯共（布）中央三月全會（一九三七年）論黨工作中的缺點的有名決定，便規定了如下的主要辦法，以期剷除在黨的宣傳工作方面的缺點，並改善用馬列主義教育黨員和黨幹部的事業：

（1）把黨的宣傳鼓動工作集中於一處，把聯共（布）中央的宣傳鼓動部和出版部統一為一個宣傳鼓動局，同時在每一個共和國、邊疆和省黨組織中成立相當的宣傳鼓動部；

（2）認為傾心於小組制的宣傳是不正確的，而認為由黨員各人獨立研究馬列主義基礎的方法是更適當的，所以必須使黨集中注意於刊物上宣傳和講演制宣傳的組織；

（3）在每一個省中心裏成立學期一年的講習所，以供我們的下級幹部補習；

（4）在我國許多中心城市成立學期兩年的列寧學校，以供我們的中級幹部學習；

（5）在聯共（布）中央下成立學期三年的馬列主義高級學校，以造就我們黨的深造的理論幹部；

（6）在我國許多中心城市成立學期一年的宣傳員和報紙工作人員講習所；

(7) 在馬列主義高級學校下成立學期六個月的講習班，以供各高級學校中的馬列主義課程的教員補習。

這些已在實行，但還沒有充分實現的辦法，一定會立刻產生出良好的結果。

(四) 幾個理論問題

在我們的宣傳和思想工作缺點中，還有必須指出的一點，即我們有些同志對於幾個具有嚴重實際意義的理論問題，還沒有完全明確的認識，而持有一種糊塗的觀念。我所指的，就是關於一般國家，特別是關於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以及關於我們蘇維埃智識界的問題。

人們有時發問：「我們這裏剝削階級已被消滅了，我們國家內已經沒有什麼敵對階級了，再沒有什麼人可以鎮壓了，也就是說再不需要什麼國家了，國家應當消亡下去，那末為什麼我們不促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消亡下去，為什麼我們不努力來結束它，難道現在還不是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棄掉的時候麼？」

或者又發問：「我們這裏剝削階級已被消滅了，社會主義在基本上已經建成了，我們是向共產主義前進着，而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是認為在共產主義下不應當有任何國家存在的，為什麼我們不促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消亡下去，難道現在還不是把國家送進古物陳列所的時候麼？」

這些問題證明出，發問的人是誠心誠意地讀熟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學說底個別原理。但

這些問題同時又證明出，發問的同志並沒有瞭解這一學說底實質，沒有弄清這一學說底個別原理究竟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規定的，特別是沒有瞭解現時的國際環境，忽視了資本主義包圍的事實，以及由這事實而產生的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種種危險。從這些問題中，不僅可以看出他們輕視了資本主義包圍的事實。從這些問題中，還可以看出他們輕視了資產階級國家及其機關派遣間諜、兇手和暗害份子到我們國家裏來，並力圖利用時機來實行武裝侵犯我國的那種作用和意義；從這些問題中，同樣又可以看出他們輕視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及其軍事、懲罰和偵探機關是為保護社會主義國家以防外國侵犯所必需的那種作用和意義。必須承認，不僅上面所講的那些同志犯了這種輕視的過失。在某種限度內，我們大家一無例外的布爾什維克都犯了這種過失。我們直到最近的時候，即是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間，才知道上層托洛茨基份子和上層布哈林份子所幹的那種間諜和陰謀勾當，而從材料中却可以看出，這些老爺們還遠從十月革命最初的時日起，就已經充當着外國偵探機關底間諜，並進行了陰謀的活動——這難道不是很奇怪麼？我們怎樣會忽略了這樣嚴重的事情呢？這一過失究竟應如何解釋呢？人們通常總是這樣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能預測這些人竟會墮落到這樣卑鄙的地步。可是，這並不能解釋，尤其是不能辯護這種過失，因為我們犯了過失的事實始終還是事實。這一過失究竟應如何解釋呢？這一過失應當這樣來解釋，就是因為輕視了圍繞着我們的各資產階級國家及其偵探機關這一機構底力量和意義，它們力圖利用人們底弱點，利用人們底虛榮心，利用人們底無氣節性而把他們籠絡到自己的間諜網中去，用他們來包圍我們蘇維埃國家機關。這一過失應當這樣來解釋，就是因為輕視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及其偵探機關這一機構底作用和

意義，輕視了這個偵探機關，却胡說八道，說蘇維埃國家條件下的偵探機關是種小事情和無關重要的東西，說蘇維埃偵探機關以及蘇維埃國家本身很快就要送進古物陳列所去。

我們的這種輕視態度，是在怎樣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呢？

它是在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底某些一般原理尚未儘量闡明，尚不充分的這個基礎上產生的。它之所以能夠流行起來，是因為我們對於國家論中的各個問題，抱有一種不容許的疏忽態度，雖然我們二十年來的國家活動底實際經驗，供給我們從事理論綜合的豐富材料；雖然我們祇要願意，便能順利地填補這個理論缺陷。我們忘記了列寧底一個極重要的指示，他認為我們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擔負的理論義務是要向前開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關於這點，列寧說道：

「我們並不把馬克思底理論視為一成不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巧相反，我們深信，它僅僅為一個科學奠定了基礎，而社會主義者若不願意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個科學向前推進。我們認為俄國社會主義者特別必須獨立開發馬克思底理論，因為它僅僅提供出一般的指導的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局部說來，在英國是與法國不同，在法國是與德國不同，在德國是與俄國不同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卷，第四九二頁）。

例如，請看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發展論的典型公式吧：

「當任何一個必須加以控制的社會階級都不復存在時，當一個階級對於另一個階級的統治，以及根源於現代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單獨生存競爭已不復存在，而由此產生的衝突和過火情事已

經濟滅時，就會再沒有什麼必須加以鎮壓和約束了，而為實行鎮壓所必需的特殊力量，即國家政權，也就會再不需要了。國家將來以全社會真正代表資格所作的第一個行動，即用社會名義佔有生產資料的行動，同時也就是它以國家資格所作的最後一次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便會逐漸成為贅舉而自行泯滅下去。那時，對於人的管理，便會由對於物的管理和對於生產過程的指導所替代。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見恩格斯著反杜林，黨出版局一九三三年版，第二〇二頁）。

恩格斯底這個原理是不是正確的呢？

是的，是正確的，但只有在下面兩個條件中某一條件下才是正確的：（甲）如果僅僅從某國內部發展方面來研究社會主義國家，而預先就撇開國際因素不說，並為了便於研究起見，把這個國度和這個國家看作是離國際環境而孤立的；或者是（乙）如果假定說社會主義已在所有一切國家或大多數國家中獲得了勝利，那時所有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包圍，而是社會主義的包圍，而再也沒有什麼外國侵犯的威脅，再也沒有什麼加強軍隊和國家的必要。

好吧，假如社會主義僅僅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了勝利，並且因此無論如何也不能撇開國際條件不顧，那又應當怎樣呢？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底公式是沒有給予回答的。而且恩格斯本來就沒有給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因此他也就不能對這個問題有所答覆。恩格斯所持的出發點，是假定社會主義已經多少同時在所有一切國家或大多數國家中獲得了勝利。所以，恩格斯在這裏研究的並不是某一國度底某個具體社會主義國家，而是一般社會主義國家底發展，同時假定社會主義已在

多數國家中獲得了勝利，即是按如下的公式：「假定說社會主義已在大多數國家中獲得了勝利，試問：在這個情形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應當發生怎樣的變化呢」。只是因為問題帶有這樣一般的抽象的性質，才可以解釋，為什麼恩格斯在研究社會主義國家問題時，完全撇開了如像國際條件，國際環境這樣的因素。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決不可把恩格斯關於一般社會主義國家命運的一般公式，推廣來運用到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中獲得勝利的局部的具體的情形下來，這個國家在自己周圍是有着資本主義的包圍，這個國家遭遇着外來武裝侵犯的威脅，因此它也就不能撇開國際環境不顧，並且它應當擁有訓練得很好的軍隊，組織得很好的懲罰機關，堅強的偵探機關，因此也就是說，應當擁有十分強有力的國家，能保護社會主義底成果，打退外來的侵犯。

我們決不能向那距現時四十五年 and 五十五年以前逝世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要求，要他們預見到在遙遠的將來，在每一個別國家裏所發生的一切和任何的歷史曲折。如果要求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給我們規定出可能在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後，在每一個別國家裏發生的所有一切理論問題的現成答案，使我們——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底後代子孫——可以安然躺在火炕上來咀嚼現成答案，那就可笑之至了。（全場大笑）。但是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向現代馬列主義者提出要求，要他們不局限於讀熟馬克思主義中的個別一般原理，而要他們領會馬克思主義底實質，要他們學會估計到社會主義國家已在我國存在二十年來的經驗。最後，要他們學會依據於這個經驗，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實質，來把馬克思主義中的個別的一般原理具體化，使其更加確切，更加完善。一九一七年八月，即是在十月

革命和蘇維埃國家成立幾個月以前，列寧寫成了他那部有名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列寧認為他這部著作底主要任務是要保護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反對機會主義者方面對於這學說的曲解和庸俗化。列寧當時立意寫國家與革命一書第二部分，在這一部分裏，他打算把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作一個主要的總結。毫無疑義，列寧在他這本書第二部分裏，是想依據我們國家裏蘇維埃政權存在的經驗，來繼續闡明和發揮國家理論的。可是，他還沒有實現這個任務，就不幸逝世了。但列寧所沒完成的事業，是他的門生所應該去完成的。（掌聲如雷）。

國家是在社會分裂為敵對階級的基礎上產生的，其所以產生，是為了剝削者少數底利益來約束被剝削者多數。國家政權底工具，主要是集中於軍隊，懲罰機關，偵探機關和監獄。國家底活動是表現於兩種基本職能上：內部的（主要的）職能，是約束被剝削者多數；外部的（非主要的）職能，是靠侵略他國領土來擴大本國統治階級底領土，或是保護本國領土以防他國侵犯。從前，在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曾是如此。現時，在資本主義下的情形，也是如此。

爲了要推翻資本主義，不僅必須打倒資產階級底政權，不僅必須剝奪資本家，而且必須完全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器，打破它的舊軍隊，打破它的官吏機關，打破它的警察，而代以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制度，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大家知道，布爾什維克就是這樣作了的。但是決不可由此得出結論，說在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方面，決不能保存舊國家底某些職能，加以變更而使其適應於無產階級國家底需要。尤其是不可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底形式應當始終不變，說我們國家底一切最初原有職能在將來也應當完全保存。其實，我們國家底形式，是隨我國發展和外部環

堪變更而變更着，而且將來還會變更的。

列寧說得完全對：

「各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非常繁雜，但它們的本質是同一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在本質上却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三頁）。

自十月革命以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其發展中，已經過了兩個主要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從十月革命起，一直到消滅各剝削者階級為止的時期。這個時期底基本任務就是鎮壓已被推翻的那些階級底反抗，組織國防以抵禦武裝干涉者底侵犯，恢復工業和農業，準備起消滅資本主義份子的條件。於是我們的國家在這個時期也就實現了兩個基本的職能。第一個職能就是鎮壓國內已被推翻的階級。這一點使我們的國家在外表上和從前的國家相似，因為從前的國家底職能是要鎮壓那些不順從的人，但這裏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就是我們的國家是為勞動者多數底利益來鎮壓剝削者少數，而從前的國家却是為了剝削者少數底利益來鎮壓被剝削者多數的。第二個職能就是保衛國家以防外來的侵犯。這一點也使我們的國家在外表上和從前的國家相似，因為從前的國家也進行過武裝保護本國的事情，但這裏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就是我們的國家反對外來的侵犯是為了保護勞動者多數底勝利品，而從前的國家反對外來的侵犯，却是為了保護剝削者少數底財富和特權。這裏還有過第三個職能——這就是我們國家各機關底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

作，其目的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新經濟底萌芽，並以社會主義精神重新教育人民。可是，這個新職能在這個時期並沒有得到重大的發展。

第二個階段，就是從消滅城鄉資本主義份子時起，一直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完全勝利和通過新憲法為止的時期。這個時期底基本任務就是要在全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消滅資本主義份子最後的餘孽，組織文化革命，組織保衛國家的完全現代式的軍隊。於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底職能也因此而改變了。在國內實行武力鎮壓的職能已經消失了，消亡了，因為剝削制已被消滅了，剝削者已不存在了，再沒有什麼人必須加以鎮壓了。代替鎮壓職能的，是國家防範那些偷竊侵吞人民財富者而保護社會主義公產的職能。武力保護國家以防外來侵犯的職能仍然是完全保存着，因此紅軍，紅海軍以及爲捉拿懲罰外國偵探機關派到我國來的間諜、兇手和暗害份子所必需的那個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也是仍然保存着。國家機關底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職能仍然保存着，並且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現在，我們的國家在國內的基本任務，就是進行和平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於我們的軍隊、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那末它們的鋒芒已經不是向着國內，而是向着國外去對付外部敵人了。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是有一個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它是歷史上從所未有，並且按其形式和職能來說是和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大不相同的。

但是，發展過程並不能停止在此地。我們是在繼續前進，向共產主義前進。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在共產主義時期也會保存呢？

是的，會保存的，假如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尚未消滅，而外來的武裝侵犯危險尚未剷除的話。同時很明顯的，我們國家底形式，又會隨着國內和國外環境變化而變更。

不，不會保存而會消亡下去，假如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已經消滅，而被社會主義包圍所替代了的話。

這就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問題的情形。

第二個問題，就是蘇維埃智識界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也如在國家問題上一樣，我們黨內存在有一些模糊見解和糊塗觀念。

雖然黨對於蘇維埃智識界問題的立場十分明顯，可是在我們黨內終究有一些敵視蘇維埃智識界而與黨底立場不能相容的觀點流行着。大家知道，這種不正確觀點底代表人物，以藐視和鄙棄態度對待蘇維埃智識界，認為它對於工人階級和農民是一種異己的，甚至是敵視的力量。固然，智識界在蘇維埃發展時期內，無論是按成份或地位來說，都已根本變更，而與人民接近並與人民誠心合作，因此也就根本與舊時資產階級智識界不同了。可是，這些同志大概是不肯顧及這一點。他們還是不厭重彈舊調，把那些在舊時，當智識界還替地主資本家服務時，本來是有根據的觀點和態度，不正確地搬來對待蘇維埃智識界。

在舊時，在革命前的時候，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智識界大半都是有產階級，即貴族，工業家，商人和富農等等出身的份子。在智識界隊伍中也有過小市民，小官吏，甚至農民和工人出身的份子，可是他們並沒有而且也不能在那裏起什麼決定的作用。整個說來，智識界當時是就食於有產階級

和効勞於有產階級的。因此當時我國革命份子，首先是工人，當然也就對智識界懷着一種不信任的心理，甚至往往懷着一種仇視的心理。固然，舊時智識界也產生了個別和成十數的勇敢而革命的份子，他們接受了工人階級底觀點，並終身把自己的命運和工人階級底命運聯結起來。但這樣的人在當時智識界中是太少了，所以他們並不能改變整個智識界底面貌。

可是，在十月革命以後，在外國武裝干涉被粉碎以後，特別是工業化和集體化事業勝利以後，當剝削制的消滅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確立已造成了實際的條件，使國家能規定新憲法並實施這個新憲法的時候，智識界底情形就根本改變了。舊時智識界中最有影響最熟練的一部分，還在十月革命最初時日起，就已經脫離了其餘的智識份子羣衆，而向蘇維埃政權宣佈鬥爭，並去做怠工者了。這一部分人因此也就受到了應得的懲罰，而被蘇維埃政權機關打破和驅散了。後來，其中所保留下來的大多數人，都被我國敵人招募去做暗害份子和間諜，並因此而置身於智識界隊伍以外。舊智識界中的另一部分，即熟練程度較差而人數較多的一部分，很久還是踏步不前，等候「好日子」的來臨，可是後來他們大概已感覺到沒有其他出路，便拋棄了自己的念頭，而決定來做供職的人，決定來和蘇維埃政權和睦相處。這一部分舊智識份子大多數已經是年老了，並開始衰亡。舊智識界中的第三部分人，主要是其中的下層部分，他們比上述那一部分人底熟練程度更差，他們已和人民聯合起來擁護蘇維埃政權了。他們須要補習，而他們也就確實開始來在我們的高級學校裏補習了。可是，當時與舊智識界這種分化瓦解的痛苦過程並進的，還有新智識界形成，動員和積聚力量的淘漉過程。數十萬的年輕人，從工人階級，農民和勞動智識份子中間出身的人，進了高級學校和中

等實業學校，他們畢業後就補充了智識界薄弱的隊伍。他們把新的血液注進智識界中去，並用新的方式，用蘇維埃的方式把它復活起來。他們按照自己的形像和模樣來根本改變了智識界底整個面貌。舊智識界底殘餘已溶解在新的蘇維埃的人民的智識界中了。這樣就造成了新的蘇維埃的智識界，它是和人民密切聯繫着，其中絕大多數人都決意竭誠盡忠服務於人民。

總結起來，我們現在便有人數衆多的，新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智識界，它無論按成份或社會政治面貌來說，都是根本和舊時資產階級智識界不同的。

對於舊的，革命前的那些服務於地主資本家的智識界，採用關於智識界的舊的理論，即指明必須對它抱不信任態度並與它作鬥爭的理論，原是完全適當的。現在，這個理論已經過時了，已經不適宜於我們的新的蘇維埃的智識界了。對於新的智識界，須要運用新的理論，即指明必須用友愛態度對待這個智識界，必須關懷它，尊敬它，必須和它合作，以造福於工農利益的理論。

這看起來是很明白的。

所以，尤其使人驚奇詫異的，就是雖然在智識界地位中有了這一切根本的變更，而在我們黨裏面竟然還有人企圖把那種反對資產階級智識界的舊理論，用來對待我們的新的蘇維埃的智識界，對待這個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智識界。原來，這些人認為那些在不久以前還是在工廠和集體農莊中按斯達漢諾夫方式做工的工人和農民，後來一被派送到高級學校裏去求學，就不復是真正的人，而變成爲第二等人了。這樣說來，學識竟是一種有害而危險的東西哩。（笑聲）。我們想把所有的工人和所有的農民都變成爲文化的有學識的人，而且我們再過一些時候，就會做到這一步的。可

是，按這些奇怪同志底觀點看來，我們的這種計劃竟包含有莫大的危險，因為工人和農民一變成爲文化的有學識的人的時候，就會有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險。（全場大笑）。也許這些奇怪的同志再過一些時候，就會滾落到頌揚落後性，頌揚愚昧無知，頌揚黑暗，頌揚反動觀點的地步。而這是當然的。理論上的失足，是從來沒有使人得到好處，而且也不會使人得到好處的。

這就是關於我們的新的社會主義的智識界問題的情形。

在更進一步鞏固黨的方面，我們的任務是：

（1）有系統地改善黨底成份，提高黨員底覺悟程度，按單個挑選手續，只把那些受過考驗並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同志接受入黨；

（2）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工作，把它們的領導工作變成更加是切實和具體的，而不是專門開會和例行公事式的；

（3）集中挑選幹部的工作，細心地培養幹部，精細地研究工作人員底優點和缺點，更大胆地提拔年輕工作人員，使挑選幹部和佈置幹部的事業適應於黨政治路線底要求；

（4）集中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擴大馬列主義思想的宣傳，提高我們幹部底理論水準和政治鍛鍊。

同志們！我要結束我的報告了。

我已把我們黨在報告期內所經歷的道路作了一番概括的敘述。黨和它的中央在這個時期內工作的結果，是大家知道的。我們的工作中有過缺點和錯誤。黨和它的中央並沒有隱諱這些缺點和錯誤，而是努力把它們糾正了。我們也有重大的成功和巨大的成績，但這些成功和成績決不應使我們頭腦發昏。

主要的總結就是我國工人階級已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並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而向全世界證明了自己事業底正確。這就是主要的總結，它鞏固了確信工人階級力量和工人階級必然獲得最終勝利的信心。

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硬說，人民沒有地主和資本家，沒有商人和富農是活不下去的。我國工人階級已用事實證明了，人民沒有剝削者是能順利活下去的。

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硬說，工人階級破壞了資產階級的舊制度以後，決不能建設什麼新的東西來代替舊的東西。我國工人階級已用事實證明了，工人階級不僅能破壞舊的制度，而且完全能建成新的，優美的，社會主義的制度，根本不知什麼是危機，不知什麼是失業現象的制度。

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硬說，農民決不能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國集體農民已用事實證明了，農民是能順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

世界各國資產階級及其改良主義走狗們所特別力求達到的，主要是想剷除工人階級對於本身力量的信心，打破它對於自己有可能而且必然獲得最終勝利的信心，因而保證資本主義奴隸制度永存

不朽。原來資產階級知道，如果說資本主義還沒被推翻而還繼續存在着，那就不是因為資本主義本身有什麼良好的品質，而是因為無產階級對於它自己可能獲得勝利這點還沒有充分的信心。決不能說資產階級在這方面的努力完全沒有什麼成就。必須承認，資產階級及其在工人階級中間的走狗，在某種程度內成功了用猶疑不決和缺乏信心的毒藥敗壞工人階級的心靈。假如我國工人階級底成功，假如它的鬥爭和勝利，能提高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底精神，並鞏固它對於本身力量的信心，對於自己必能獲勝的信心，那末我們黨就可以說它的工作並不是徒勞無功的了。可以用不着懷疑，情形一定會是這樣的。（熱烈的，經久不息的鼓掌）。

我們的勝利工人階級萬歲！（鼓掌）。

我們的勝利集體農民萬歲！（鼓掌）。

我們的社會主義智識界萬歲！（鼓掌）。

我國各族人民底偉大友誼萬歲！（鼓掌）。

蘇聯布爾什維克共產黨萬歲！（鼓掌）。

（全體代表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齊聲歡呼多時。高呼：「烏啦！斯大林同志萬歲！偉大的斯大林萬歲，烏啦！我們敬愛的斯大林萬歲，烏啦！」）。



